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三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2 022 9464 0

说　　明

GD7-7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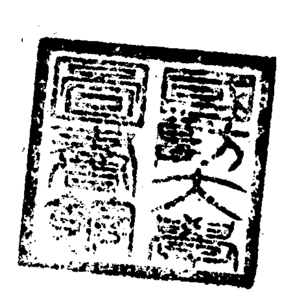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军队院校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党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的教学以及研究生班的需要，我们对本室一九七九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11册）作了增补，将近年来党史研究中发掘和收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史料，续编七册（序号12—18）：党的创立时期一册（12）；一战时期一册（13）；二战时期二册（14、15）；抗战时期二册（16、17）；三战时期一册（18）。同时，编辑社会主义时期十四册（19—32）。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只供内部研究和教学参考，不得翻印。为保持文件原貌，所有资料均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曲延绩、张天荣、肖甡、胡庆云、林蕴晖、何礼、李兴仁、从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编选。由赵更群、魏政、李浚负责印刷出版，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集、整理工作。

第13册由胡庆云、肖甡选编，林蕴晖、李浚统编。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编者按：本文系李大钊同志一九二四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结果。在筹备改组国民党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邓泽如、林直勉等人曾以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反对孙中山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当国民党"一大"会议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又跳出来捣乱，竟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这一问题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李大钊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发言，并印发了这份"意见书"（原件为油印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大钊同志的发言光明磊落，理直气壮地批驳了国民党右派的谬论，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使之成为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诸位同志们　兄弟深不愿在改造的新运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

兄弟们到广州来承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棉薄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热诚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的精神但有少数先进的同志终不免对于我等加入本党致其怀疑者使此怀疑不能涣然冰释则于本党改造的新机中即预伏一种妨害将来发展的危机此断非吾辈之所愿想亦非先进诸同志之所愿用是不能不将我等加入本党的理由开诚布公的讲出来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那方在潜萌的危机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安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刚是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间改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

* 原题为：《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因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诸同志与我们共同担负的

有一部分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了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的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收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役（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

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所惧我们的才力不胜不能担当此任还望先进诸同志不吝指导而匡助之是我们的欣幸

总之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吾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尔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尔其的国民党于土尔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磨（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已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惟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自今以往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本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

〔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筹备工作

民国十二年初，当总理致力于本党改进计划施行之际，本党讨伐陈炯明之军队，亦告克复广州，正拟贯彻初志，巩固党基，而粤中忽有一月下旬沈鸿英在江防会议之变。原沈鸿英密受北方贿使，佯投讨贼军。至是乃乘人不备，在江防会议中，思一网打尽国民党中负重责诸人，挟滇军以掳粤。虽幸粤中将领集中应变，即告平息，顾陈炯明时仍盘踞东江，阴谋再逞，故广州一隅，情势依然恶劣。总理为应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之请，遂于十二年二月终回粤主持。而在沪刷新党务及计划全局之原计，乃暂为搁置。迨在粤讨沈既平，乃转致全力于讨陈。讵陈负隅顽抗，凶黠异常，致吾军竭数月之力，攻惠州而不克。其年冬陈军且乘我之虚，反攻至我白云山。虽赖各军力御击退，而其时北京方面曹锟贿选，早告成功；外交团便借口总理欲收回关余，派舰至广州示威。总理以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未周，遂使党员之间，不肖者挂名投机，不识主义，遑言政策；贤者虽明主义与政策，然以历来倚赖领袖之积习太深，委责军队之观念太甚，不能自动为有组织之奋斗，故党的内部，渐形涣散，而革命力量乃日见消失也。补救之策，厥惟重组本党，严格训练党员之思想与行动，使全体党员共负革命之责任。盖必先有健全之党员，方能组完全之党，有完全之党，方能建完全之国家也。

总理于十月二十五日委任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清、谢英伯、杨庶堪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委林直勉、谢良牧、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承去岁改进之初旨，进而为彻底改组本党之筹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十月二十八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旋于十一月发表本党改组宣言。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计自十月二十八日成立起，截至十三年一月十九日止，共开会二十八次，议决案件四百余件。其中最要之工作，则为：(一)全国代表大会之筹备，决定会期为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规定代表名额每省六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各省党员互选三人，海外总支部支部约十二人；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制定大会议事日程纲要；假定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会址。(二)广州党人之严重登记。(三)广州市区党部区分部之组织。(四)农工及中层阶级状况之调查。(五)统一宣传机关，裁并大本营党务处及大本营直辖委员会广东宣传局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六)联络全国同情之报馆，应付反对之报馆。(七)限制党员对外发表关于党务意见，组织国民党周刊，以归纳党内意见，阐扬革命主义，宣示改组真谛。(八)设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九)草拟筹办党报及宣传学校计划。(十)指导海内外大会代表之选举(十一)慰劳前敌将士等等。总计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自成立以迄结束，共五十日，其工作成绩，至为可观，上述仅其概要耳。

（选自台湾罗家伦：《革命文献》第8辑，1955年3月版）

〔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名单

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大会于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海内外代表总额共为一百九十六人，当时出席者计一百六十五人。兹将全体代表一百九十六人名单录志于后。

地名	指派代表			推选代表		
广东	廖仲恺	邓泽如	陈树人	冯自由	谢英伯	胡文灿
广西	刘崛	苏无涯	覃超	覃卓凡	施正甫	
福建	刘通	丁超五	黄韫山	林严生	林黄巷	许卓然
云南	李宗黄	杨友棠	胡盈川	周自得	杨华馨	刘国祥
湖南	程潜	谭延闿	陈嘉佑	林祖涵	罗迈	邹永成
	李执中	谢晋	刘况	夏曦	袁达时	毛泽东
江西	萧炳章	彭素民	王恒	徐苏中	周道腴	胡谦
				赵干	刘伯伦	洪宏文
浙江	杭辛斋	沈定一	戴傅贤	戴任	胡公冕	宣中华
贵州	周仲良	李元著	王度	凌霄	韦杵	简书
直隶	王法勤	于树德	李永声	韩麟符	于兰渚	陈镜湖
山西	王用宾	刘盥训	刘景新	邓鸿业	苗培成	赵连登
陕西	于右任	焦易堂	路孝忱	江伟藩		
山东	王乐平	丁惟汾	张苇村	王尽美	杨泰峰	孟广浩
江苏	茅祖权	刘云昭	狄侃	朱季恂	张凌霄	顾子扬
安徽	柏文蔚	张秋白	陈独秀	李次宋	曹似冰	杨虎
四川	杨庶堪	赵铁桥	谢持	刘泳恺	刘泉如	
湖北	刘成禺	詹大悲	夏声	刘芬	张知本	孙镜
河南	刘荣棠	张善与	丁骞	王友梅	赵峻	薛广汉
	李衡	王傅恕				
奉天	朱霁青	祁耿寰	宁武			
	王秉谦					
吉林	李希莲	董耕云	徐青和	张晋	李忠选	赵志超
黑龙江	田铭璋	乔根	傅汝霖	龚德宣	常毓堃	韩喜亭
甘肃	施世昌	张宸枢				
新疆	张凤九					
西藏	乌勒吉					
蒙古	恩克巴图	克兴额	白云梯			
广州特别区	孙科	吴铁城	谭平山	方瑞麟	董维	陈竸西

上海特别区　叶楚伧　何世桢　伏　彪　黄谈台　张拱辰　谭惟洋　朱之洪
北京特别区　谭熙鸿　李守常　石　瑛　延琪祺　许宝驹　谭克敏
汉口特别区　居　正　李　法　彭介石　　　　　　李能至　廖乾五

海外华侨代表

檀香山支部　刘福珠
墨西哥支部　余和鸿
缅甸仰光支部　黄德源
越南支部　冯苇渔
越南河内支部　陈觉梦
美国三藩市支部　刘芦隐
澳洲雪梨支部　黄右公
加拿大支部　黄季陆　暹罗支部　萧佛成
菲律宾怡郎支部　杨挺秀
巴城支部　李国瑞
芙蓉支部　萧振堂
西贡总支部　陈飚生

（以上选出）

西贡总支部　林永伦　加拿大　赵卫平　黄发文
香　港　阮　旺　李　林　墨西哥　黄宽禄
哈尔滨　秦广学　南　洋　陈璧君　陈汉子　陈鸿锐
美　国　叶崇濂
暹　罗　林伯歧　仰　光　黄馥生

（以上指派）

菲律宾第二分部　梁为杰
联义分部　林达生
日里棉兰分部　梁如九
日本东京第二分部　宋垣忠
暹罗分部　陈美堂
西贡薄寮分部　何觉非
西贡金瓯分部　欧家荣
西贡美获分部　许英祥
西贡金分部　陈有庚
日本神户分部　刘士木
菲律宾龙马总地　赵鸿汉　雷　鹏
澳　门　蔡蕊林
指派女代表　陈璧君　何香凝　唐允恭
列席者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六人

（选自台湾罗家伦：《革命文献》第8辑，1955年3月版）

〔附〕中国国民党改组后之党务进行

（甲）中央党部之成立

大会闭幕之翌日，中央执监委员暨候补委员在总理指导之下，开首次全会于广州，到会者三十二人，总理主席。首推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而于中央党部之组织，则议决设下列各机关：

一、秘书处；
二、组织部；
三、宣传部；
四、工人部；
五、农民部；
六、青年部；

七、妇女部；

八、调查部；

九、军事部。

其部长人选，则为谭平山长组织，戴季陶长宣传，邹鲁长青年，廖仲恺长工人，林祖涵长农民，曾醒长妇女，许崇智长军事，〇〇〇长调查，中央党部之组织大体遂定。继以中央偏处广州，指挥各处党务，有鞭长莫及之感，故又决定除广州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外，其余特别区，如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皆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到各该地组织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党务之进行。同时又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直接管辖区域，以专责成；并分派中央监察委员，行使监察职权。兹录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之中央执监委员姓名、与其管辖区域如左：

甲、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委：廖仲恺、李烈钧、戴季陶、谭延闿、杨希闵、邹　鲁、柏文蔚、林　森、谭平山。

候补执委：邓家彦、李宗黄、林祖涵、彭素民。

中央监委：邓泽如。

候补监委：刘震寰、许崇智、樊钟秀、杨庶堪。

直辖区域：广东、广西、云南、福建。

乙、北京执行部：

中央执委：李守常、石　瑛、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

候补：于方舟、张苇村、韩麟符、张国焘、傅汝霖、白云梯。

中央监委：李石曾。

候补：蔡元培。

直辖区域：直隶、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甘肃、新疆、青海、内蒙。

丙、四川执行部：

中央执委：熊克武、石青阳。

中央监委：（无）。

直辖区域：四川、贵州、西藏。

丁、上海执行部：

中央执委：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张静江。

候补：毛泽东、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瞿秋白。

中央监委：张　继、吴稚晖、谢　持。

直辖区域：江苏、安徽、浙江、江西。

戊、汉口执行部：

中央执委：覃　振。

候补：张知本。

中央监委：（无）

直辖区域：湖北、湖南、陕西。

己、哈尔滨执行部：

中央执委：居　正。

候补：张秋白。

中央监委：（无）

直辖区域：东三省、外蒙古、北方、国外。

至职权方面，则各地执行委员乃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负指导监督当地执行部工作之责。此中央党部与各地执行部组织原则通过之情形也。其后二月十六日中央第六次常会通过中央各部职务概要，二十日第七次常会通过办事关系条例，中央党部乃正式成立。迨后因事实上之需要，曾次第添设三部：一海外部，林森长之；二实业部，汪精卫长之；三商人部，伍朝枢长之。然不久而商人、实业、调查三部撤销，仍维当初一处八部之原状。至各地执行部先后成立者，为上海、北京、汉口三处。而哈尔滨、四川两处，以环境关系，迄未成立。上海、汉口二处成立之后因办理不善，亦先后停止进行。其成绩较著，而存在最久者，惟北京执行部一处。

（乙）各地党务之进行

中央党部既成立，对于各地党务之进行计划，有慎重之策划。为咨询各地地方特殊情形、并征集各地代表意见、决定党务进行有效统一方法计，遂由中央党部分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讨论，结果草成各省党务进行计划草案，经提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正如下：

（一）各特别区之范围，由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自行决定之。

（二）各特别区党部之组织，由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直接办理之。

（三）各省设临时省执行委员会，由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派员筹备组织之。

（四）临时省执行委员会筹备员之人数为一人至三人。

（五）派出之筹备员，应于一星期内启程前赴该地筹备。

（六）临时省执行委员会之成立期，预定为一个月，正式省执行委员会之成立期，预定为五个月，如在预定期间不能成立者，应改派员筹备，但期间之计算，应以筹备员到该地之日起计。

（七）临时省执行委员会之产生，应由派出之筹备员到各该地召集党员会议，推定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介绍于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请其指派。

（八）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受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之指挥，办理本省党务。

（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对于党务进行方法，拟定如左：

（甲）先择重要市镇及重要县份，设立市或县临时执行委员会。

（乙）市或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所属区域内设立各区分部。

（丙）市或县临时执行委员会于所属区域内有三个区分部以上成立时，得召集各区分部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组织区党部。有三个区党部成立时，由临时省党部召集全市或县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组织正式市或县党部。

（丁）省内有五个市或县正式党部成立时，应由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召集全省代表大会，组织正式省党部。

（十）未成立区党部地方之区分部，直隶于市或县党部。

（十一）未成立市或县党部地方之区党部，直隶于临时省执行委员会。

（十二）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对于所属区域内设置各级党部，应开具计划，报告于所在地

之中央执委或执行部，得其批准，方能设置。

（十三）市或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应由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派员筹备组织之，同时报告于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

（十四）临时市或县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产生，应由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所派出之筹备员到各该市或县召集党员会议，推定临时市或县执行委员会委员，介绍于临时省执行委员会，请其指派。

（十五）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之名额，拟定如下：

（甲）临时省执行委员七人至九人。

（乙）临时市或县执行委员五人至七人。

（丙）区党部执行委员三人至五人。

（丁）区分部执行委员照章三人。

同时又派定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如下：

山东：王乐平　　直隶：李永声　于方舟

察哈尔：恩克巴图　　山西：苗培成　韩书麟

绥远：乌勒吉　　内蒙：白云梯　克兴额

湖南：夏　曦　　热河：陈镜远　韩麟符

福建：许卓然　　江苏：刘云昭　张曙时

湖北：刘伯垂　　安徽：李次宋　曹似冰

浙江：沈定一　　江西：赵　干　邓鹤鸣

其余未派各地，则由所在地之中央执行委员或执行部决定之。

筹备员派出后，各地皆先后从事于省临时执委会之产生。最先产生者为湖南广西二省。至广东则因原先已有党部组织，故免去临时省执行委员之组织，而从事于正式省党部之组织。其手续照章由中央组织部择省内各重要市镇及县份五个以上，从区分部组织起，以次组织区党部、市县党部，俟有五个县市党部成立，即行正式组织省党部。时广州特别市党部以系中央所在地关系，故其正式成立较各省市为先。综计自十三年大会后至民国十五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止，省党部正式成立者有广东、湖南、湖北、直隶、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内蒙、江西、江苏十一省。在筹备中者，为广西、福建、奉天、四川、浙江、甘肃、吉林、安徽等八省。特别市党部成立者，有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处。海外党部则截至民国十四年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止，总支部成立者，连前有加拿大、三藩市、檀香山、墨西哥、澳洲、暹罗、缅甸、南洋、法国、南非等十处。在组织中者，有古巴、菲律宾、安南、日本等四处。特别党部之成立者九处，陆军七处，海军二处，警察一处。

（选自台湾罗家伦：《革命文献》第8辑，1955年3月版）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①]

（一九二四年二月）

（一）在此次国民党改组以后，为求本党同志与国民党能圆满的合作，以督促国民党切实执行此次全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议定之章程及其他决议案；中央希望全国同志务须明了，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的使命。国民党虽亦曾倡导三民主义，亦曾与反动的军阀势力相抗争，但其内部组织纪律，颇不完密，故使中国的国民革命，不能应民众的需要而早日成功。本党为欲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于本届全国大会已经决议党员加入国民党，从种种方面，督促国民党实践其国民革命的工作。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在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加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他们的党员当中，自然不免有于心性习惯上，未能全改旧日的状态的人；但我们只徐为掖进，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以惹起他们的反感。即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二）对于国民党此次大会的圆满结果，我们同志不可过于乐观。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统认为他们是所谓"右派"，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无论国民党的旧党员与新党员，他们比较疏远我们，还曾经一二次反对我们的主张，他们不一定对我们有恶意，或者是不了解我们的原故，我们不要遽目为右派，把这样的党员目为属于统一的一个派别，因而嫌恶疑忌他们。因为这样，必致惹起他们的反感，促成他们的实际联合。这将不但使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且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些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使国民党不能免左右之分歧。我们应采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躯〔驱〕左为右。

（三）国民党开会时，我们的同志均应按期到会，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这可以表示我们对国民党忠诚的合作，亦可以因我们的努力，使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得以圆满的实践出来。但同志们必须注意的，对于国民党员我们仍应设法诱导他们到会或工作；即对国民党不努力的分子，于诱导无效之时，亦不可有嫌恶貌〔藐〕视的态度，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以引起他们的反感。

（四）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或工作详细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收良好之效果。教育本党同志在国

---

① 这个文件，原载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团中央出版的《团刊》第七期，是作为团中央扩大会之《关于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的附件刊印的。团中央扩大会的上述决议中说："对于C.P.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此项之决议案，完全接受其指导。"据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局在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底召开的。

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能尽所职，引起国民党员都能尽职，使其真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之目的才算达到。

（五）国民党此次议定之宣言书，为国民党精神之所寄托。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此宣言书，务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我们要使国民党真成为国民主义的党；不可听其为数党员仍如以前忽视旧有的党纲一样，使宣言书又成为一种具文，党的活动及中国的政治上不生关系。所以他们须常引起国民党党内党外的人，对于此宣言书的注意。

（六）我们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种机关内，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但我们必须注意下之三点：（1）加入之人，必须选择能干而且适宜于国民党某种工作的同志；使他的工作成效，可以引起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尊重与信任，同时亦可使国民党党务有进步。（2）能力较为薄弱，或不适宜于国民党某项工作的同志，不可轻于使之担任国民党各种职员，以引安置私人与包办的嫌疑，同时亦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3）在时机不相宜时，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以惹起国民党的反感，致妨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

（七）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

（八）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但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轻率加入多数不健全的分子，不使①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且使本党的组织日渐松懈紊乱。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不但”。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

（一九二四年五月）

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

此次召集扩大执行委员会，有三个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我们在国民党中和在国民党外，做种种复杂的工作，即在比我们强大的党，也很容为〔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何况是我们这毫无经验的党。因此，我们越发感觉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便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

第二个意义是：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

第三个意义是：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党及S．Y．在此项工作上都做了种种错误，不可不急于救正。

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是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召集的，全国同志对于他的一切议决案都要即刻努力执行；同时，如有疑议及实施方法，也可向中央局充分讨论。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国民党于第一次大会之后，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渐渐的形成起来，大半是因为我们党员积极的参加工作。然而在这种国民革命的运动里保存阶级斗争的成份却亦因此而更难了，京汉罢工失败后一年多以来，中国的产业工人，尤其是路工和矿工，已经重新倾向自己的阶级组织，要在比以前更扩大的基础上恢复工会。同时国民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并且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劳动平民的利益，将来当然不能一致；他们的阶级性每易趋于妥协，也很难必其能为中国民族完全独立奋斗到底。既如此，国民党内——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让步问题——便发现两派的力量。共产党自然在孙中山及现时愿意实行已通过之“宣言”里的政纲的一派方面。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

这并不是说我们立刻要求机械式的开除右派，也不是对于右派之人身的攻击与冲突；我们要求国民党内的批评自由，我们便能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我们自己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

[library stamp]

种种集会的时候。

同时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

为达这些目的起见，我们应当了解下列几项，以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方针：

一、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份（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他既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决不能同等的代表各部分的利益，只有反帝国主义和民权主义可以做大多数平民群众的斗争的共同政纲。可是也因为这一共同点（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参看《党报》第二期附录《三民主义之意义》），并不能十分联络党员，使他们永久觉得党是他们特殊利益之保护者。同时也因为这一共同点不限于一阶级的性质，虽能影响到中国极大多数的群众，却不容易吸收在这党的组织里。

国民党的质性既然是如此，所以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的有规划的宣传“宣言”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决不能先求国民党数量上的扩大，而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亦不能认机械式的组织与宣传鼓动是同等重要的。应当对于国民党证明：一个政党的扩大，只能在经常不断的普遍全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宣传及行动的过程里，再则，要不徒托空言，而实际上在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实行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实行赞助工人组织。我们如此的进行国民党工作，同时就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的最好方法。要达这一目的，必须我们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党的宣传部——每次不要放过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机会，使国民党真正形成代表那次大会（宣言）的国民党。无论怎么样好的组织系统不能代替这种宣传的。

当然，我们当赞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引进思想上接近国民党的分子，然而这不能作为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唯一主要工作；这种工作在国民党正在国内战争中之南方与国民党当取得同情以备响应南方解放运动之北方，亦不能有同样重要的分量——宣传更重要于组织。

二、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产业工人，尤其是路工及矿工，要他们赞助国民党左翼，我们的政策应当结合他们于经济的阶级组织（即工会）里，再指导他们去帮助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每逢国民党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政府有所行动或表示都加以赞助。这种赞助甚至于可以为国民党的军事利益起见而罢工。同时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右派思想在工人里的影响——这与我们反对其他小资产阶级及反手〔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一切党派是一样的。别一方面我们应当要求国民党赞助工会反对外国的及本国的资本家苛待工人。

三、为帮助国民党取得中部及北部人民的同情起见，我们应当使国民党抛弃反对北方政府为惟一要义的宣传政策——这种政策其结果往往客观上反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并且使南北意见及地方主义格外深入——我们应当使国民党的宣传政策注重反对帝国主义，而指斥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

四、应当使国民党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自己的军队及仇敌的军队都要注意；尤其要注意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的军队。

五、为扩大革命战线起见，必需使国民党注意去调查研究国民党势力与北部及中部的帝国主义报纸上所谓“土匪”的势力相结合及宣传的可能问题。

六、为使国民革命运动深入起见，为拥护广东政府起见，要使南方农民参加国内战争，我们应当要求国民党实行废除额外苛税并禁止大地主对于贫苦佃农之过分的剥削。此外还要武装沿战线的农民——直接与北方军队相接触的农民。第一种方法若能实行，这第二种方法便使农民无形之中直接参加南方的解放运动。

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

一、中国无产阶级至今还是全国人民中很少的成份。可是中国最近二十年来的工业化的速度，在欧洲大战时以及大战后头几年里很有些增进的现象——因此在几个大都市里及几种职业里产业的工人增多起来。虽然地方辽阔，交通不便，力量不能集中，而在数量上，单是纺织业，矿工，路工，航路上的工人，至少有六十万。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

二、产业无产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必定要和他的组织力同时生长，因此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因此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应当注意铁路工人、矿工及海员。

甲、造船业、铁路、河海运输及矿业里，外国资本的势力最大。组织这些工人，是反抗外国资本势力反抗帝国主义最真切有力的方法。

乙、将来反抗帝国主义斗争里，铁路、河海运输及煤业工人势力，必定有极重大的甚至于有决定胜负的意义。组织这些工人便是保证将来的胜利。

这些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产业无产阶级，聚集在大生产里有近代的高等技术，有共同的利益，同样受大资本家，尤其是极大的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各方面看来都是工会运动最好的材料——我们必需努力去在他们之间工作；这种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

三、组织之形式

甲、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努力去组织大工会，这种大工会的基本组织就是工会小组，这种小组应按照每个工厂内的各部分去组织（人数无定，如过多不便开会时，小组得分组十人团，但不能误认十人团为基本组织）。全厂各小组代表大会（按每十人举一代表，每小组不足十人时也得举一代表）以便是高一级机关。各厂委员会由各该厂小组代表大会选举组织之，至于每一企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全体之大会所选出之总会。我们的党应当特别注意下级的小组，这些小组的性质，足以决定全工会的战斗力。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吸引这一企业（工场，或铁路的制造厂）里尚未加入组织的工人，来出席这种小组的大会，——这是宣传工会组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军警压迫很重的地方，也必须教导工人去召集多数人的大会，就算集会几分钟，也是好的，只要趁工厂或官府方面还没有觉察，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干涉镇压的时候，就散会。为召集这种集会起见，应利用种种很明显的压迫事实——譬如工人被殴打，被无理的待遇，以及无理的开除——不管他是不是已经加入组织的工人，——都可以做这种集会的理由，在这种集会上，小组的干事会，应当预先预备议决案，这种议决案，在几分钟便可以说明，假使议决案能在大会通过，那就可以做更广泛的工会宣传和鼓动。这种工会小组，渐渐建筑基础，留意群众的心理，不要太冒险——使已有的成绩完全抛弃，应当让步的时候，亦可以让步，然而时时刻刻不断的利用种种小机会向前进行——如此，小组便能渐渐扩大，为着本工厂一切工人的屈辱而发起反抗，他的影响便不限于小组内的工人，而且普遍深入全工厂。

乙、不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应当先组织互助会俱乐部，合作社，普通教育学校或技术教育学校等。这种种机关里，必须先有了可能，才可以开始组织工会小组。工会小组的第一次胜利，在每一企业（矿坑，工场，铁路制造厂，轮船等）里，拥护本企业工人的利益，而能

得第一次的成功——那就必定有开展组织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

四、工人的经济组织——工会是独立的，这就是说：要做矿工海员，或铁路工会的会员，只要他是矿工，是海员，或是铁路工人就够了——只要他是一个生产企业里做工的。党籍问题，国籍问题，帮口问题，不应当对于加入工会或在工会里的地位发生影响（党及工会应在工人中打破地域和帮口观念）。工会的责任是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扩大他们的眼界，使日常的斗争问题，都和工人最切身的利益联结起来，譬如工资，工作时间（每日的时数，每星期或每月的日数），每星期的休息，人道的待遇等，这样日常的争斗，应发展而且能发展成为总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

只有这样，工会才能成真正的阶级组织，真正的阶级斗争的学校，亦只有这样，我们的党和工会运动才能有思想上的联结。至于党与工会的组织上的联结，那就应当经过工会里的共产党小组，这种党的小组，直接受党的某一机关指导。

五、国民党也和其余的政党一样，都是要想取得政权的——必定想影响北部及中部的铁路工人及矿工的工会运动，国民党这种工作的成败，要看我们党的行为怎样，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各国的先例很多，不仅止此，在中国的情状看来，更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力量减杀。

我们的党，对于国民党的最好的帮助，在工会运动方面并不是帮助他设立国民党的铁路工会及矿工工会，或者使已成的工会全体加入国民党，这可以使工会沉溺在国民党里而失去阶级的性质；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最好的帮助，却是先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于每次用得着的时候，指挥这些工会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

此外，国民党还有许多手工厂的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及工商业的职员，可以做很广泛的行动的基础。我们党的能力现在很有限，很不容易在这几种民众里有很大的工作；而且这许多民众里，大致都适宜于用国民党的宣传。一方面不妨碍阶级斗争，一方面帮助国民党组织店员及手工业工会，对于巩固及扩大国民革命运动很有意义。

关于这些工会的组织形式，大概可以说，手工业组织应当依职业为标准；店员可以以地域为标准——假使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店员联合会之下组织各种分部（烟草部，衣服部，鞋业部等）。

六、我们的党必须进行海员工会里的工作——这是运输业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经过国民党整理海员工会使成一有组织的群众工会。同时我们应当在海员里发展党的小组，只有共产党的工作有相当的成效时，海员工会方能成为无产阶级组织。

七、纺织业工人的组织不能再缓了。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产业工人，尤其集中在上海，我们的党在纺织工人里曾经进行组织，都失败了。当然是因为种种困难的情形，不能进行工会的工作，第一便是大多数是女工。然而纺织业内的屡次罢工，往往有很激烈很一致的行动，可见我们底工作的基础已经有了。

八、为执行这种工会运动里的职任起见，我们底党应当有下列的办法：——

（甲）中央委员会工农部内应特设一工会运动委员会，指导上述的各种运动，并负切实调查劳动状况之责任做成统计。

（乙）每一地方委员会之工农部，亦应特设一工会运动委员会专管工会运动，执行中央

工农部的命令。负工会运动责任的地方委员应当和当地各工会里的共产党小组发生经常的联结关系，供给他们以定期出版物，传单等，指挥他们。

（丙）因为中国地域很大，路工矿工散处各地所以必须特派巡行各路矿的人员，使中央机关熟悉一切消息，同时便做工会运动的指导员。地方工会运动委员和中央的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每月或每次工作的成绩须向中央报告。遇必要时中央得召集全国或某区域之工会运动委员和工会运动巡行指导员开工会运动讨论会，审查过去成绩，并规划以后进行的方法。

（丁）中央机关报里，工会运动也要占第一等的地位。

（戊）各地宣传部应当常常注意当地工会运动里的需要。

（己）我们的党应当竭力介绍同志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经过这种国民党的工人部影响到阶级斗争的发展而筑成统一的工人战线。

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

我们的青年运动，在过去的经验上看出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S．Y．的工作和党的工作未能分开。这个缺点之原因：（一）是同志们忽视了青年运动本身在社会改造上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在第三次党之大会以前未规定候补党员制度，各地方委员会对于倾向本党或办事有能力而意志尚未坚定者，虽年长亦只令加入S．Y．，以为候补察看地步，遂使S．Y．组织不明显，实在是党的错误。此种错误并及全国地方，在安源及长沙尤为显著。（三）是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敷分配，并且因上述第二原因有些地方只有S．Y．组织而无C．P．组织，S．Y．之中又有许多成年团员，遂不得不令S．Y．担任党的工作。其结果，一方面因为工作相同，使S．Y．日渐党化，于党的工作统一及直接指导上发生障碍，政治运动方面与工会运动方面都是如此（譬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组织）；一方面因为S．Y．容纳多数成年分子，缺乏青年情绪，不能代表青年本身利益，因此与青年群众隔离。

我们已看出这个缺点及其所必至之危机，不得不采行左列救济诸策：

一、S．Y．各地方应速吸收二十岁以内的青年，下届全国大会应修疋〔定〕年龄，至多不得过二十五岁。

二、已过S．Y．法定年龄的团员，应由C．P．地方执行委员会会同S．Y．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此项团员，于三个月内尽量加入C．P．退出S．Y．。

三、C．P．同志在S．Y．担任职务者，须经C．P．之认可，其既经担任S．Y．之工作，非特别需要时经C．P．中央或地方委员会之指派，不得兼任C．P．工作。

四、S．Y．应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例如在工人中做青年工人教育、宣传、娱乐、体育乃〔及〕其他关于青年工人本身利益之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工会及其他工人运动（在青年工人之中应注意去宣传阶级组织，已经有工会的地方可在工会中组织青年部，S．Y．并且应当为青年工人组织体育会及娱乐部等）。在农民中做青年农民教育娱乐等运动，而不担任组织农会及其他农民运动（因为工人农民的运动是C．P．的工作，不是S．Y．的工作）。学生多在青年时代，学生运动可由S．Y．专任之（至于一时的政治示威宣传，乃属一般的市民运动，各地方S．Y．应在C．P．指导之下参加之）。

五、在目前最短之过渡期间，如有特殊情由于事实上必需S．Y．兼任工会农会及其他

工人农民运动者，此项工作必须受C．P．之直接指导。

六、S．Y．应以青年本身运动为中心工作，参加政治运动次之，参加国民党组织工作更次之。

七、S．Y．现在工作大部分是学生运动，此后S．Y．必需渐次动员全体团员，做普通的平民教育运动，尤其注意乡村，以图扩大S．Y．与群众接触及宣传之机会，此项运动为S．Y．目前重要工作之一。

此外S．Y．因客观情形，既为共产主义的团体，不能集引学生及手工业的青年群众（他们因为自已的社会地位及心理不能集中到S．Y．旗帜之下），所以应以S．Y．为中心，就各地方情势，组织各种公开的普通青年团体，以便扩大青年运动，以便S．Y．得与各地的青年群众接触合作。至相当时期，更宜联合各地方各种青年团体，成一个全国的统一组织。

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

一、我们的党，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总职任及对于幼稚的产业无产阶级之训练和集合其群众的职任，要求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在宣传和鼓动方面是如此，在党务组织方面亦是如此。

我们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里工作，而这一政党的性质——根本上便有组织形式上的浮动性，对于我们自己的党也就有大影响，——因此我们自己的党更要有非常之明显的组织形式。

二、产业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北部及中部之铁路矿山，大工厂的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表示阶级的觉悟，——我们的党在这些工人里便有扩大自己的基础□前提。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中国人民普通都在发展民族的感情，然工人更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必一定要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及民权运动的斗争里，工人阶级虽然可以得着初步的权利，而不能得着阶级的解放。即以民族解放论，工人阶级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因此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愈发达，则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必愈扩大。民族解放运动中渗入此阶级的性质，这个运动才能格外深入，才能增加他的革命性质。我们的职任，便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同时这就是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的方法。假使上面的原则，我们的党不能充分了解，那就会失去我们党的基础，而且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亦没有正确的观察。

因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此次扩大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们的党及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如此，认为以前我们虽然没有阻滞工人进党，却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因为我们的党过分严守，闭关主义，便使许多工人同志留在S．Y．之中——其实照他们的年龄，已经不能在S．Y．了。为着使工人容易进党起见，所以照章只规定三个月的候补制度努力去征求铁路矿山工厂里的工人。应当立刻从S．

Y．之中把二十八岁以上的工人收入我们的党。

为履行种种职任起见，党的组织应当采取下列的形式及办法：

（甲）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管理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之兼职得互换之）。地方委员会对于在当地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负指导的责任——凡在国民党工作之同志都应由地委指派。为增进某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

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

（乙）小组的工作，除教育党员征求新党员外，还应当常常在工人群众里做宣传的工作。必须按照章程，凡有可能时从地域的组织进于产业的组织，学校及工商企业都在内。

中央的各部之中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部和工农部。为运动起见中央的各部得从任何机关里征调最有力的同志。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且指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种研究会不要纯粹由智识阶级分子组织。中央工农部应当添一两个工人办事，进行工会的宣传并指导各地方实行组织工会小组（基本队）——在上海以及其他城市无产阶级之中，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工作之处。

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再则政治宣传亦急于有全国的进行规划。所以中央必须特别设一个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以七人组织之，其中四人必需在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只对中央全体大会报告，遇有必要时，更可以向全国大会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应当是真正工作的集合体，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

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

一、第三次大会的国民运动议决案里曾经说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

中国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经济上有一种半封建半宗法的阶级关系，而政治上便是一种官僚军阀任意凌虐农民的景象，因此，农民经济破产得不堪言状，而农民变成失业游民的速度非常之快（民国三年有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农户，民国七年只剩了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户；民国三年只有荒地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亩，民国七年便增加到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亩）。

农民破产的速度既然如此之高，城市里的苦力工人便大大增加，竞争剧烈，工资低落；别一方面，军阀都利用他们来做炮灰（兵士），同时便造成掠夺乡民的独立的武装失业农民（所谓土匪）。

二、帝国主义是这种现象的罪魁——和其余一切中国劳动平民受苦的现象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应当对中国人民负责的。帝国主义经常的惹起中国政治上的纠纷破裂，贿买军阀，用财政经济上的压力扼制中国的生产力——交通、矿业、工业及输入输出的国际贸易关系都是如此，于是运输那些欧美没有销路货物到中国来，使中国的生产不能发展，尤其是农民的手工业受他的影响而崩坏。

三、我们的党知道这种种因素，使国内行政的分裂叫农民的利益范围不出一县，至多不过一省。所以应当指导农民对切身利害的地方性质问题的奋斗，同时我们亦就应当渐渐的做全国问题解释，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制度的必要。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的同意（农民会），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不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的主张（乡村自治会）。

四、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租。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工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五、国民党政府的领域之内，除上述的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借贷之苦。

六、为实行上述的种种宣传起见，应当有下列的办法：

（甲）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做总的政治宣传的时候，特别预备对农民的通告，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口号。应当开始选派宣传员到乡村里去。

（乙）地方机关应当常常注意地方范围内的农民问题，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宣传口号——无论那一种农民运动起事的时候，立刻应当响应，特别为这种问题发传单，派人到当地去指导。

（丙）要求国民党做经常的有规划的农民宣传，印送鼓动农民的图画（花纸画片）、幻灯等，广东应当出一种农民周报，沿战线□乡村里可以张贴“壁上新闻”。

七、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小的C.P.小组织，除此之外，必须印发关于兵士利益的出版物，最好是这种出版物上有我们队里的同志，记载军界生活的新闻消息。这种出版物，不必一定是定期的，再则应当时时向兵士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

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划的宣传，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在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要求国民党做这件事。

中央局报告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

一　组　织

大会后新增之组织为济南地方会，南京地方会，哈尔滨独立一组，杭州独立一组，成都独立一组；哈尔滨组因受压迫现只有四人，成都因政局变动，同志亦多涣散。解散之组织为水口山地方与常德地方。取消之区为湖北区及上海区、广东区；湖北区取消后，汉口武昌两

地方均直隶中央，惟武昌地方同志极其涣散，至今中央尚未接到地委改选报告；上海区取消后，上海南京两地方及杭州组均直隶中央；广东区本只广州一地方，亦无设区之必要。将成立之组为香港与青岛，可由中央委任广州济南地方就近指挥。

党内小组织问题，C.P及S.Y两大会前后，很引起纠纷，近数月已渐安定，自二月底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发通告以后，此种纠纷现象更完全消灭了。中局现敢保证所谓小组织的结合，确已无此事实，今后同志间绝不可妄启猜疑，致碍党之进行。

二 宣 传

宣传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应出三期，只出二期；《前锋》月刊应出十期，只出三期；《社会科学讲义》应出五期，只出三期；《向导》尚能按〔期〕出版。铁委之《工人周刊》亦未能按期出版。

北京政变时发表之时局主张小册，汉文印六千份，英文三百；去年双十节散发传单五千份；今年“五九”散发传单一万七千份。

关于工人农民兵士宣传的小册，因同志担任起草者均未送来，故至今未能印出。

党报告① 出过两期，每期五百份。

三 政治运动

自去年七月北京政变后，政局上形成直系与反直系两大势力；自十月曹锟贿选成功后，研究系一部分有反直倾向的即附曹锟，政学系一部分反直的也软化了，段系也有一部分与直系妥协了；只剩下奉张浙卢因地盘关系不便投降直系，大势上尚和广东政府联合在反直的阵地。在直系方面，因本系胜利及曹锟左右亲幸忌妒吴佩孚的缘故，也形成冯王齐联合和吴佩孚之对抗，即吴之旧部鄂萧豫张亦和吴极不融洽，吴佩孚新征服之四川湖南，内部尚多问题，军事上财政上均不能为吴之助，吴氏在山东之新企图，尚未能完全达到目的。在此形势之下，又加以北京政府财政之奇窘（军费政费共需一万二千八百万元，收入只七百万元，每年入不敷出者一万二千一百万元，每月约短少一千万元以上）。军人索饷之凶猛无情，直系首领曹锟当然没有久握政权之可能。直系倒后，或为吴佩孚拥段和奉浙以图南方之局面，此局面亦不为极短的时期，新的政争即随之而起，因吴与奉张终不能两立。

我们在目前反直的局面之下，固然对于联广东政府奉浙，表面上宜于缓攻；同时，应提醒国民党国民革命的宣传在奉浙京津尤急于加紧用力，不可误认奉浙真是友军。

我们在国民党的关系，孙中山及其他目前少数左倾分子（国民党中极其重要的人物），尚有意联络我们；其余大部分右倾即不主张和国际帝国主义反抗的分子，则极力明白〔的〕或暗的排挤我们；我们政策是：（甲）向目前的左倾分子宣传，使他们左倾观念坚固不至摇动；（乙）向国民党员中工人学生宣传，使之左化；（丙）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丁）在一般社会做反帝国主义之广遍的宣传，以迫全国民党全体左倾，此层更是根本政策。

我们政治的宣传，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三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到一九二三与一九二四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全国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已采用“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

① 原文如此。

最近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等处，已渐渐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发生。

四 劳动运动

自“二七”后，重要的产业工人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其未封闭的也只得取守势，自去年“五一”至今年“五一”三十六次罢工中，除水口矿夫及湘潭锰矿运工两个罢工外，其余大半是手工业工人小规模的罢工。

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的劳动运动议决案是集中我们的力量于铁路矿工海员三个运动，且由中局直接指导；路工方面已开始工作，矿工海员运动，因人才及经济之缺乏尚未能进行。

地方劳动运动，湖南广东尚能维持前状；已破坏的湖北工团联合会，此时已可开始整理；上海地方亦特设劳动运动委员会着手进行，开会时中央局亦派人参加计划；其详见各地方报告。

山东，在路矿工人运动均为重要，应加派同志前往工作。安源工人中之洪会及合作社两个危机，宜设法救济。

上海地方报告

（A）党内情形

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从全国大会到现在已改选了四次；从前是兼区的，自四月份起撤销了。现在上海地方内部情形，可大略分四项叙述如左：

（一）人数：上海党员中，有固定职业的，也有没有固定职业的；更或有因别的关系时去时来，所以因党员有一部分属于流动的，而总数遂时增时减。最近以前有党员五十六人，但现在确数只有四十七人，一方面新党员的增加率却也非常迟缓。现党员四十七人中，以职业分述之：学生十三人，工人八人，商人三人，教员、编辑或其他职业的有二十三人。

现在新党员一时实不见增加，其原因大概是（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惟第一组还很努力吸收同志，其余都消沉濡滞得很。

（二）小组：上海以所有党员，划分五组：第一组在上大有同志十六人；第二组在闸北有同志十人；第二组在西门方面有同志六人；第四组在法界有同志七人；第五组在虹口有同志五人。在最近一月来惟第一组开了三次会议，第二、三组只开过一次会议，第四、五组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地方委员因轮流参加各小组会议未编入小组。

（三）党费：合计本地方全数党员的党费每月可收一百三十元，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仅三十元。

（B）国民运动

关于国民运动可分三项报告：（一）在民校中之活动；（二）所组织的团体；（三）所参加之运动。

（一）在民校中之活动：执行部方面，如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青年妇女部有我们的同志在内办事，且有任要职者。区党部方面，闸北及南市两处都有我们同志在内主持。淞沪线则有S.Y.的同志主持。区分部方面，则有闸北各区及南市之大同、职业二区，公共租界之上大、中华书局，法租界之新建设杂志社，有的是我们同志所组织，有的有我们同志在内活动。

（二）所组织之团体：有闸北之市民外交协会，南市之市民对外协会及店员联合〔会〕。闸北市民外交协会，出对外旬刊一种。店员联合会今已有会员一百六十余人，不日即可正式开成立会。

（三）所参加之运动：加入国土维持会，参加"五一"、"五九"纪念会，发起"五四"、"五五"纪念会。

（C）工人运动

上海工人为全国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新式机器下的工人比别处特别多，照理自然上海的工人运动应该很可观；但是实际除了几种手工业工人有几个行会外，只有一大批的招牌工会，此外即有一二个工会组织，还是提倡什么劳资妥协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局面呢？上海的工商业发达是外国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展成功的，上海简直是国际共管地，所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最利害；同时上海的流氓也是比什么地方都多（拜老头子的青帮与红帮有十数万人），并且和帝国主义所设的捕房底巡捕侦探勾结起来，这些都是工人运动最大阻碍，上海工人比他处（广东、湖南等）更没有组织也是为此。

我们党在上海也算做过几次工人运动（书记部及上二届地方），但是所做的究竟是极少部分，同时我们所做的工人运动是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众外面的，所以做几次，失败几次，到现在还是等于零，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很大的错误。

现在的情形

一、邮差方面

邮差前年为要求加薪组织邮务工会（非我们组织），不久无形消灭，至去年六七月后由我们同志运动组织，经三四月，加入工会有七八十人，进行稍有成绩，但邮局方面也就注意起来，严重监视，同时侦查我们做运动的同志，在这样的时候，那个运动也就不得不停止了。一直到现在没有去活动过，现在邮差方面仅有S.Y.同志五六人，可做我们以后活动的起点。

二、机器工人方面

我们对于机器工人曾经组织过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还是前年书记部时组织起来的，做了一年多功夫，加入的人到有四五百了，但是这个组织很散漫，能召集开会及交费的只有数十人，我们知道这种利害不一致的职业组合要想组织怎样好，实在是不可能的。并且这个组织里面都是广东人，各种工业里的工人广东虽也有不少，但照工人总数看起来，毕竟还是很少数；那广东人因言语的关系，很难和别处工人接近。同时我们也没有人负责去训练他们，

所是〔以〕到现在不过加上四五个C．P．兼S．Y．同志，并且这四五人连开会和交费也还没有做到。

最近要进行的：

1． 教育方面

我们知道从前的工人运动，都没有使工人自己觉悟，所以这些运动都是外表的，在工人群众以外的，我们现在感觉这些运动，实际上是没有用处。但是照中国现在多数工人的知识程度，现在不能使他们觉悟，那要使他们觉悟，自然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现在我们先将民党办的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务力。①

已开办的：

（一）杨树浦　学生六七十人，预备分二教室，还可增加多人。此校都是新式大工业底工人。

（二）吴淞　学生四五十人，此校中华铁工厂工人最多，铁路工人也有几人，此外糖厂及杂工。

（三）南市西门内（此校非民党办）学生五六十人，多是手工业工人，有几个黄包车夫。

（四）上海大学约有二百多人，童工有五分之一。

要进行的：

（一）虹口　虹口住的广东工人很多，都在造船厂、船坞、工部局等处做工，所以工人夜校是很需要的。

（二）浦东　浦东有日华纱厂及英美烟厂，工人二万多人，此二厂工人曾由我们组织工会，后因罢工失败都消灭，且浦东码头工人也很多，所以也有办补习学校的必要。

2． 改造工团联合会

上海工团联合会虽是几个招牌工会所组成，于工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影响于工人的宣传和组织是很利害的；并且因上海地位的重要，还影响到全国，所以我们不得不竭力想法改组。上海地方已决定在二三月内，组织或恢复十个左右的工会加入改组。

上海处于全国最重要地位，工人至少总有四五十万，就是新式产业下工人，也有二三十万，而工人运动这样没有成绩，这是我们上海同志最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同时我们也要说明：我们同志做运动的经验原来是很幼稚，照目前的情形，就是上海同志个个能努力做事，对于各项工作亦实不够分配。上海是最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而工人群众又是这样庞大复杂，自然决不是少数没有经验的同志所能够做得起来的。我们希望中央能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同时我们上海也须有一部分同志来学着同做，这是我们上海地方急切的要求，而且是不得不如此的要求！

---

① 原文如此。

汉口地方报告

（一）概　况

自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取消，即改组汉口地方委员会，因汉阳、江岸、徐家棚三处工作均归汉地委管辖，故汉地委的事务，较武汉区委时代，并未减少，近因民党工作开始，并较以前事务更繁，又因地委负责各同志，均有通缉，对于公开活动上，很感困难。

（二）党内组织

汉口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以人数而论，计：

汉口两组共十四人；

徐家棚一组十二人；

江岸一组九人；

汉阳一组八人；

轮驳工会一组七人；

虽共有四十七人，而懂组织与党义的占最少数，同志们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党员应尽职负，并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此种弱点固然是同志间的幼稚病，但因为没有开大会的地方，不能使同志有互相观摩砥砺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三）劳动运动

汉口原以劳动运动为主要工作，在武汉区委时汉阳钢铁厂、江岸、徐家棚均组织有工会委员会，计江岸十余组共百余，汉阳约三百人，徐家棚约四五十人，惟江岸工会委员会分子，尽属小工，帮匠也很少，故在工人中能力很薄弱。高级工人其所以后有加入的原因，第一因安徽帮高级工匠反动分子，本地帮即有少数倾向我们的工匠，我们因环境压迫，不敢放心去和他们接洽，俟压力稍减时，还可设法进行。汉阳方面工匠较多，亦因压迫比较和缓，而汉冶萍总工会安源分会，每月拨八十元给汉阳作经常费，人力财力较江岸为好，故能力亦较优。此方工作以工人同志陈春和尽力极多。徐家棚工会委员会原有四十余人，亦以工匠为多数，负责分子，分两派，一派因李同志在徐工作关系对李感情颇好，人数较多，但观念不甚明了；一派因刘同志在徐工作关系，对刘感情颇好，比较观念明白而人数太少。故此间工作，此时极其停滞，前汉地委决议仍在徐办一所平民学校，请一个有力同志长驻徐埠，负专责进行，惟经费一途，尚无把握。汉口方面“二七”以前工会达二十余个，现在消灭的消灭，即没有消灭的，也不过名存实亡，现在工厂工人组织，只有桥口上的染织工人，较有希望。工会委员会，加入分子已达二十余人，以青年工人为多。他如英美烟草工人，数目虽达三千有奇，以女工童工占十分之八九，组织上很感困难。非工厂工人以人力车夫与运货工人为中枢，运货工人向无团结，人力车与此项工人有密切关系，车夫能够转移运货工人，故人力车夫非常重要。车夫数目

③

约近六千人，原组有车夫工会，为伯高同志主持，自“二七”后，组织破坏，月前由同志们召集十个码头代表会议，到了九个码头，只二十八人，重行改组车夫工会委员会，现已成立，进行上尚称顺利。

湘区报告

（一）党务

总括说来：这半年中，许多固有事业失败了，在失败中，我们的知识却因之增高了。如岳北农会之失败，自修大学及水口山俱乐部之解散，都由于行动过激烈，色彩太显露所致，客观方面固由于军阀势力之不可抗，主观方面，是由同志之不当及执行委员指导之不力；以前我们同志的知识多由书报得来，没有看清中国实际情形，而又色彩显露，致有些同志在社会全不能立脚，以后我们应该注意此两点，不然，怎样知道去改造社会及从何处下手改造社会呢？又以前本党工作几专作经济奋斗，工会之存在完全基于增加工资的运动上面，此后应同时趋重政治争斗。此关于大概的，还有几点，应该分别报告：

A、小组织问题：去年安源曾因小组织问题开区报告，谓有些同志，怀疑本党中尚有小组织存在，其实小组织在两年前，上海曾有此事，已经中局解散，现在并无何项小组织，同志中万不可互相猜疑，应该互相信任，更宜努力工作，从行动上证明自己是一个忠实的党员，不要闹无谓的意气。

B、组织系统与纪律问题：以前往往有别区未经本区同意即在本区行动，亦有本区各地方同志之调动、不报告区委，此实不懂本党之组织及纪律。现接中央通告，以后本区同志往他区及他区同志来本区与本区各地方同志之调动，均应先报告区委决定。

C、本区党员人数，安源增多，长沙略增，水口山已无形解散，党员应由长地方管辖。安源现有党员六十人，内有候补党员六人；长沙现有党员八十九人，内候补党员七人，在狱者一人，留党察看者一人，不明行止（水口山失败后之一部分）及与党无甚关者约二十人。

（二）政治

在此半年中，本区曾经赞助民主革命派之运动及国民革命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之宣传，亦尝组织政治运动委员会，但开会仅两次。本区同志已完全加入国民党；SY同志加入者，已十分之八。现在中国政治大部分在直系宰制之下，反直派如奉张、津段、浙庐[卢]均意存观望，孙中山所领导之军事势力，目下亦难发展，湖南现已在曹吴支配之下，而军人政客尚欲利用省宪以维持其假面具，目下局势，恐无多大变化，赵氏势力尚可维持。本党同志，惟有在国民党中努力工作，从民众中发展国民党之组织，及宣传国民党之党纲及政纲（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以矫正民众的错误观念（如和平、联省、宪法各主张），并引导民众做国民运动。我们之参加国民革命，因为适应中国目前实际情形之政策，同时亦含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因此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还要注重。又对于军阀，不必予以同等之攻

击，不可落于普遍否认的稚气，当以力求变更现状，为最近之目标，故目前有注全力反对直系之必要。

（三）劳动运动

A、劳动运动委员会，曾与SY共同组织，但因种种原故，末能按时开会。

B、手工业工会如缝纫、泥木，因财产为总管值年把持，会务毫无发展。

C、从前末加入工联之工会，现在已加入者，为石印工会。铅印工会，因劳工会关系，尚末加入，不过由工联会暗中主持。

D、辗谷工会，被政府封禁，并缉拿代表，已无形解散。

E、水口山工人俱乐部解散，开除工人二千余人，工人在狱者二人，被枪毙者二人。

F、茶居工会，因生活状况尚优，不能发展；黑铅炼厂因久经歇业，亦已停顿；造币厂俱乐部，现在设法恢复中。

G、粤汉路，仅在新河办工人子弟学校一所，工会因环境关系，只能维持现状。

H、人力车工会较好，工人对工会亦有信仰，但所收用费，因开支太大，所存无几。

I、纱厂自职工俱乐部因甲工系（职员）破坏停顿后，同志潜在活动甚努力，渐渐取得群众信仰。

J、铜官陶业工会，已开办学捐设学校一所。

K、工人教育，在长沙仅工联办有学校，工人教育之困难，在教员难得其人。每不能合工人心理。

（四）会　计

各月收入总数

十二年八	月	一八三·一　元
九	月	二二〇·八　元
十	月	一四四·二五元
十一、二月		一〇三·二　元
十三年一	月	六二·八　元
二	月	三八七·八　元
三	月	六二　　元
		共八一〇·一五元

各月支出总数

十二年八	月	二一〇·三五元
九	月	一八七·二三元
十	月	一八四·〇三元
十一、二月		一五一·七　元
十三年一	月	一一八·〇五元
二	月	六三·八　元
三	月	七四·二一元
		共九八九·〇七元

③

两抵不足　　一七八·九二元

存中央补助费一九　　　　元①

附：安源地方报告

（一）工会情形：工会各股，以文书股较涣散，工人赌风颇盛，总代表百②代表亦不能免，工会禁赌，极感困难。整顿出产问题，由〔于〕矿局职员不负责任，也感困难。工会对路矿两局，是取调和的态度，但亦不示弱，对路局多让步，对矿局暗中维持职员中（东洋派西洋派）两派之势力。工会对内，对上级代表的意见尊重，对下级代表的意见多不理，这是错误的。又工人犯事，每每由俱乐部罚工，因此，工人也不满意。

（二）合作社情形：以前组织不集中，各股各自为政，是无政府的状态，又股本不足，而营业范围太大，价格标准不适宜，每高出市价或比市价更低，价低者被商人贩卖渔利，价高者引起工人怀疑，失去主顾。又营业员多态度直率，也影响于销路。最大的错误，是服物股经理陈梅生欠公款千余元，事前合作社总经理及工人职员毫未发觉，现因此事，大失工人信仰，现在合作社组织已改，较以前有系统，但营业方法，尚待讨论改革。

（三）学校情形：办有六个学校，子弟学校比较好，工人补学班因教员难得适合于工人心理之人才，成绩转劣。以前仅有夜班，因此做夜工者须缺课，现在预备开办日班。又设女子职业学校一所，已在筹办中。

（四）党务：自去年八月后同学已由四十人增加到六十人，组织方面比较有进步，小组会议除俱乐部一组因工作太忙，难于按期开会外，其他各组，都能按时开会。月费去年八月以后亦能按时交纳；以前积欠，尚有未还清者。

（五）洪匪情形：安源洪匪颇发达，工人加入者，已一千余人，此事应由安源同志在工人各种会议中将土匪问题详细提出演讲，说明土匪之原因及其方法之错误与吾人对土匪之态度。即是以教育的方法，纠正工人入匪党的错误，工会并应作广告声明，如有工人犯抢劫者，工会不负保护责任；工会发觉，即捆送官厅究办。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

（甲）同志一律在本党指挥之下，做国民运动之工作。

1．速组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2．注意组织各重要县市党部。

3．湖南国民党，事实上系新造，须注意基础之稳固，故介绍同志须慎重；在最近时间内，有特别注意吸收有觉悟的及有组织和宣传能力之分子之必要。

4．一切社会运动，如劳动运动、农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外交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概统一于国民党之下；外交后援会，学生会，及平民教育运动，宜避免本党主义色彩将他扩大起来。

5．办一种出版物，为宣传机关。

6．国民党对外尚守秘密。

（乙）C.P.与国民党之关系：

---

① 收入和支出的总数同各月的数字不符。

② 原文如此。

1．C.P.在国民党中为秘密的组织。

2．C.P.同志在国民党中宜取得中心地位，但办事宜公诚，态度宜周到，免招包办操纵之嫌疑。

劳动运动进行计划：

一、经济斗争，只在相当时候举行。

二、已成立工会之工厂北[①]山都须设法创办工人补助[②]教育事业。

三、手工业工会，须特别注意补习教育运动，并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法联络，使得相当的助力。

四、凡有工人群众的地方，须设法创办工人补习教育以为组织工会之初步。

五、湖南劳动运动，宜趋重矿工方面：凡未成立工会之北[③]山，须有步骤的组织起来。……最好能办到公开的合法的组织。

六、凡新成立工会，如基础未定，不可遽令其加入工联；或由工联公开的帮助，免致牵动根本。

农人运动进行计划：

一、一切工作，都建筑于国民运动的意义之上。

二、运动之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与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不宜自主。即鼓吹佃农的经济斗争，致召中农之反抗。

三、利用旧组织，做平民教育活动……最好推广农村补习教育社的活动。

教育宣传进行计划：

一、小组会议之教育工作，根据《党报》第一号所载中央第一次会议关于教育方法之规定，其纲要如左：

甲、各小组之政治讲演（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各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

乙、各小组之组织原理讲演（以章程为材料）。

丙、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的劳动生活的讨论（以《工人周刊》为材料）。

二、地方执行委员会，每月须召集党员大会一次，讲演时事或主义及本党政策诸问题。

三、推行党之刊物。

四、对外宣传注意立于唯物史观上面之文化运动（如反对东方文化派；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反对基督教教义及其组织，宣传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及国民运动。

五、参加平民教育活动，以发展农工补习教育，同志宜多去担任平民学校的教员或编辑职务。

---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似应是“补习”。

③ 原文如此。

京区报告

一、党　务

北京区委，三月八日改组：守、和、昆、孟、鸿为委员。区委分工：守委长，和秘书。昆劳动运动，孟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鸿任会计。

北京地方情形比前略好之处，为内部精神之一致；同志皆努力工作：委员会能管理并指挥一切行动。至于组织及训练则还未至于完善。

北京现有党员三十二人（工人同志仅一人）；新加人候补十四人。

唐山现有党员八人（皆工人）；候补工①人（系交大学生）。石家庄有党员七人（工人）。

唐山石家庄皆早已成立地委。惟石家庄现因缺人主持，有等于无。唐山情形颇好。

天津有候补党员四人，党员一人，已成立一组，以树为组长。天津情形很好，S.Y.地方新成立，市民极活动，纱业工人亦不少，此地颇有发展希望。保定有候补及党员五人，已决定成立小组。此外，山西有候补党员一人，热河一人。全区合计有七十五人。工人占四分一强，余皆学生。

至于政治宣传：《向导》可销八百多份。区委新出一《政治生活》，第一期在京销三千份，重印两千份。现已出至第三期。影响还好。关于反对太戈尔的宣传，除《政治生活》外，又散了几千份传单。李义元案参与中央公园之集会并发散传单。"五一"在工刊上发了一个布告，在京只有一个小集会；但在民党印了四种传单。此外各种政治宣传问题，皆提交民党照办。

二、民党情形

市党部筹备委员会允执行部成立。清查党员千二百余人；现从新登记未完竣。执行部难产之经过，叠经报告，至最近才告成立。

北京小团体林立，然应付得宜，亦不甚成问题。

直隶临时省党部已成立，为我们同志主持，情形最好。河南我们无人。山西缺人主持。三特别区杭同志能主持。

两月中之政治宣传：中俄交涉决裂举行示威运动一次，"五一""五四""五七"等运动，关于各种政治问题，皆发了传单。

---

① 原文如此，"工人"似为"二人"之误。

山东地方报告

自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正式地方会后，党务及一切活动方面，均有发展希望，不意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突有吴案之变，引起当地重大反感，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幸此案已作结束（以军法判决四年十月徒刑），周围反感渐消，又因民校改组后，进行顺利，于无形中促起本党同志自动的加倍努力，竞争作工，原状已复，兹将一切情形次第报告如下：

1．本党情形：现住在济南的同志有八人（请假回家二人、病假一人、在狱一人均在内）住青岛的三人，溜〔淄〕川炭矿二人，张店一人，济宁一人、离济者二人。关于开会问题：常月会及小组会，因受吴案影响，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也就是没有房子的原因。关于党费问题：除复同志按月缴特别费三元外，余均四个月未交了。

2．民校情形：自全国大会后，即筹备改组，最近已成立了临时省党部及济南、青岛的两个临时市党部了。由市党部临时委员共同①省党部临时委员办理登记及组织各区分部的事情。现在济南方面划为五区，每区皆有四个区分〔部〕以上，人数至多者三十余人，至少二十人、十人、七八人不等，统计将近百人。至于工作情形，却是与组织并行的，最近的市民运动——如"五四"、"五七"皆有较好之成绩。并且在"五四"的那一天由各校学生提议恢复学生联合会，现已推定筹备九人（有民党七人）、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预计不久可正式成立。现在官府对民党，因熊炳琦位置不稳以及调换警厅之际，他们对于这些事，也就无暇顾及了。所以民党的活动——如集会散传单等事，差不多是一个半公开的形势。至于其他政党（如省议员），一因党派纷歧，组织散漫，一因捧高拥熊东西奔走，因为民党不干涉他们，他们也就不来为仇了。只有青岛有一部分人（其为首者为王静一）单独的反对王乐平个人。青岛方面民党虽有根基，而王乐平不在那里，急切极难发展。至于民校对于本党之态度，分新旧两派，旧的（所谓老资格者）现在对我们感情尚好。新的更是不成问题，简直可说是无所适从，因为我们的势力战胜故也。新加入的党员差不多皆拿我们来作标榜的。现在我们的同志（连SY在内），对于国民运动及学生运动所表现的东西，完全以全力纳入民校工作了。至于劳动运动，事实上属于我们自己去办，因为他们和门外汉差不多。现在我们在内努力的结果，很得一般人的信任。最近五月的纪念日——"五一"、"五四"、"五五"、"五七"，除"五五"纪念性质稍差外，余皆由民党名义发的传单，并且参与演说者，亦以国民党名义。最近的市民大会皆是民党主动，在市面上却没引起人们的反感，也就是民党在工作上下了工夫！

3．劳动运动（一）青岛方面：四月有铁总委员为四方工会被开除的四人善后事，赴青埠一次。决定留二人在青埠活动，并由铁总供给其生活费，余二人拟在别处找工作。但最近又接到该地报告云：该四人拟组一商店（工友集资），假此为活动机关。现在青岛一带如水道部、电灯部、港工……对于该四人极信仰，尤其是沧口至青岛一带之纱厂工友——二万余人，亦信仰其圣诞会及郭某之个人，所以亦有组织的希望。现在青岛恩同志为该四人的秘

① 原文如此，似缺字。

书，在该会代表会与铁总委员开会时通过的。按现在四方全场工友，自开除四人后，路局压迫日甚一日，以前在厂自由开会，现在如稍一偷闲，被监工人看见，即重罚不贷。现在该厂工作的比较，按路局方面报告，较以前增加两□之多。所以路局认为压迫手段是对的，愈加□迫了。在工友方面的精神，比较以前觉悟了许多，因为以前太骄傲了。（二）张店方面因受四方此次影响，不得不暂趋于消极，在这消极期间，未免有了错误的地方，铁总委员到该地审查后，来济南责成我负其指导错误之责。遂由我函指该会秘书尤超玄（已介绍为候补C.P.）到济，改正其错误如下：1、开会系统及组织皆不完备。2、该会对于青年工人太重用了（因为实际上的权不在青工手里）。3、反对工会空气太盛，须设法制服其反动分子。并限期速将此三种改正。现在已得该地报告，认为极大之错误了。（三）济南胶济车房——二百余人，亦因四方风潮，以致将成立之会而未成。现在内之重要分子，就是张店首先发起会①的人——赵秀实经路局拨在此地为司机领班，颇得人们的信仰，将来对于全路统一组织，一定是很得力的地方。（四）溜〔淄〕川炭矿，促成工会原因，已报告中央，现在该会已发展至千余人，会费皆能缴齐，其会长为顾炽——浙江人，是一个智识阶级——工业专门毕业，现充该矿画图员，对于我们感情却也很好，但其主张太右了。现在本党决定责成该地同志麟宪工人②在该矿扩充民校区分部。（五）济南理发会，进行颇顺利，关于一切市民运动皆参加，并且在济南方面发起了第一次的“五一”纪念会。会员已发展至二千余人，地面扩充七八县的范围。惟经济一层，因救恤费需用太多，经济无甚基础。（六）济南印刷工人，最近加入民校甚多——十四五人，其活动人物，为C.P.同志一人，S.Y.同志数人。五月一日假理发开一纪念会，开会时并提议组织一俱乐部，决定于七日开成立会，基本会员有六七十人。

4．学生运动（一）济南方面：因S.Y.沉寂了数月，只可以民校为学生运动中心，现在多数学生在民党中对我们信仰颇好，所以对于学生的事，皆纳入民校作了。（二）青岛方面：由恩同志负责，S.Y.学生同志发展至十七八人，因该地文化不甚发达，又因高洪恩新到青岛甚厉害，所以对五月的几个纪念日，也无甚大动作。（三）青州方面：有三个中等学校——十中、四师、甲种，学生精神尚活泼，该地民校之平民学会甚发达，会员有五十人。最近该地已成立了S.Y.支部了，现在已发展至十数人，最近可有二十余人之希望。该支部之同志已完全加入平民学会，一切活动皆以平民学会名义去作。现在他决定的工作：1、反对基督教；2、在学生会活动；3、到各通俗演讲所演讲，并按期轮流到乡间去演讲；4、在本校刊物作宣传的文章。中有两个行将毕业的学生，决意要作劳动运动，现在介绍他到张店工会参观过一次。（四）济宁方面：有两个中等学校——七中及中西中学（德国的教会学校）现由候补党员郭同志，在该地作民校活动，并组织平民学会分会，会员已有二十余人。

---

① 原文如此。
② 此处原文如此。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发言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琴华（中国）：同志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

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首先，我们谈一谈外国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然后，再谈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

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到极点。我来叙述几个最重大的事件。

一、张家口的卡门事件。美国商人卡门预先同美国驻张家口领事商妥，企图从该城私运价值六万美元的白银给中国投机商。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要对他进行搜查。卡门抗拒搜查并开了枪。中国士兵则开枪还击，因而卡门受了致命伤。于是，美国大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结果，北京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了五万美元，惩罚了几个官员。

二、汉口纺织工人案。在一家英国纺织厂中，因组织工会，有三百来名工人被解雇，三名工人代表被捕。被解雇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被英国军队驱散。冲突进一步扩大，有许多工人受伤。接着，英国军舰也上场了，威胁要轰击城市。结果，三十三名纺织工人被捕，其中三名领导者被英国驻汉口领事判处监禁五个月，其他人监禁两个月。

三、法国金法郎事件。由于义和团起义，中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相当于一亿五千四百七十万九千五百八十二海关两。因法国法郎贬值，法国政府要求中国用黄金，而不用纸币法郎交付欠款，这样便出了五千五百万海关两的差额。法国人已征得北京政府同意这样做。原来反对这样做的议会，因得到政府贿赂，现在也改变了立场。

四、旅顺口和大连。旅大的租借权，从沙皇俄国转给了日本。1923年已期满，但日本拒绝归还，因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一条规定了重行租借。

④

五、临城案。此案最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特性。去年，有一群土匪，为给北京政府制造外交上的麻烦，在临城袭击了列车，劫走了一百名中国人和二十名外国人。英、美、日、法、意等国大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情况特别紧张，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乘机取得对中国铁路、航运和财政的控制权。外交团要求：１、赔偿每个被劫持的外国人八千七百美元；２、组织由外国军官指挥的护路队；３、撤销山东督军、驻军司令、铁路警长等人的职务。这些要求激起了人民的抗议，但是总统曹锟为取得外国列强的承认，满足了这些要求。

六、棉花出口。外交团强迫中国政府撤销出口棉花的禁令。北京政府无视华商抗议，同意了这一要求。

七、烟草消费税。利用中国烟草在华制造香烟的英美烟草公司免交消费税，因而中国人民每年损失二亿美元。各省当局打算征收消费税，但北京政府因该公司抗议，禁止征收。

八、广州的关税。广州国民党政府，为使广州的关税收入不致落人北京政府的腰包，开始自行征税。为了对此事进行报复，英国派了二十艘军舰去广州，要求取消税收。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和人民的示威，这一要求未获满足。

九、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帝国主义列强已达成协议，建立由十一艘英舰、十艘日舰、八艘美舰、六艘法舰及两艘意舰组成的长江联合舰队。目前，列强仍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同意这一做法。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实。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北京政府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者也在千方百计地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汉同志签订了条约，帝国主义者们并未停止其挑拨离间的活动。

在帝国主义列强无耻行径不断出现的同时，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同志正在领导这一运动。起初，国民党人只力争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推翻国内的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党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翼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1924年1月国民党的改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代表大会，有二百名代表参加，其中我党同志占百分之二十。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是由于我党党员和左翼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通过的。“左翼”同“右翼”进行了顽强斗争，使后者不致反对我们。我党的一位同志发表了声明，阐明我们对真正的民族革命所抱的观点。孙中山也发言专门谈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奠定了建立集中组织的基础。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里，我党同志占八分之一，在候补委员中占十七分之七。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对内政策方面：

1．普遍选举制；

2．集会、出版、言论和信仰自由；

3．用外国列强交还租界地后的收入消除盗匪活动；

4．实行工人立法和保护工人组织；

5．改组农业体制，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6．交通运输国有化。

对外政策方面：

1．取消同外国签定的一切关于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及外人在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条约；

2. 不承认不负责任的北京政府所欠的外债。

代表大会之后，民族运动进入新阶段，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翼到处都在积极工作，在南方是开展合法工作，在北方则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南方的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

5月1日汉口举行了纪念施洋同志的大会，他在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被抢杀了。甘肃、四川、山东等省和天津市举行了游行。广州有一万多人参加游行，孙中山还发表了讲话。当北方政府在外交团的压力下拒绝同苏俄缔约时，国民党在北京组织了游行。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而且还宣布了戒严。这一切都证明国民党开始领导群众了。

但很快反动势力就抬头了。北方政府慑于国民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开始对其采取镇压手段。5月间，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破获，因此有五人被捕，其中两名是共产党员。他们后来被吴佩孚枪杀了。此后，北京很快地又有五人被捕，张国焘（我党北方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便是其中之一。被捕者囚禁在军事监狱，但未向他们提出任何控告。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不久前，国民党发表了反对反动派的宣言。我们的秘密工作在继续进行。

最后，我想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1]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诸同志：

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

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应作之事如左：

（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右派重要的错误是：

（A）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

（B）反对中俄协定，并且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

（C）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

（D）纵容江门、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

（E）排斥共产派。

（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项组织，必须个人加入，加入时，必填写入会愿书，万不可团体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数量之增多，而应注意质量之明确，当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此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但此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接到此通告，应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此项通告对外严守秘密。

委员长T.S.Chen[①]
秘　书T.T.Mao

① 签名是陈独秀、毛泽东。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

独　　秀

凡是一个大党，内中总难免含有若干派别，简单的分左右两派，复杂的还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这是主义及政策实施时自然的结果。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方在萌芽，此时不但不应各怀意见，且实际的政治运动未认真活动以前，也断然没真的左右派之意见发生，即有意见，也不过是私的感情冲突，决不是公的左右派政见之不同。但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实际运动丰富时，左右派政见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他们不同之点，所争者自然属于具体的政策；此等政策，此时我们还不能够预知，惟那时采用政策之主张所以不同，必然由于两方之出发点有一些不同的根本观念，此不同的观念，乃是左右派之真意义，这是我们可以预知的。

将来国民党左右派之不同的观念，即不同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采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采用妥协方法的右派；两方的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两方所采用的方法与具体政策，便自然不同了。左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忠诚的要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与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肯出于根本的妥协；右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急于党的胜利，甚至于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

这是将来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照这个意义，左派乃是真的国民党真的国民主义者，右派乃是抛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

怎样才是国民党的左派或右派，本应该是如此解释；有人以为国民党中相信社会主义的是左派，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是右派，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例如高一涵君前曾表示国民党若采用社会主义他才肯加入；又如国民党某君曾在广州支部演说国民党应采社会主义，否则便是官僚党；他们这些错误的见解，乃忘记了国民党不是社会党，忘记了国民党的使命和社会党的使命不同。社会党的使命是为阶级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的使命是各阶级合作为国民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固然也可以采用若干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他的使命究竟与社会党不同，所以决不能拿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国民党左右派的标准。而且社会党的右派（即反对革命的改良派），在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其价值远不及国民党的左派，尤其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因此，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肯加入国民党；但他们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因为真懂得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很明白国民党的分子及使命和社会党的分子及使命根本不同，不是可以随便瞎来的。

社会主义者在国民党中，理论上固然应该属于左派，但事实上将来是否左派，还是个问题。因为所谓国民党的左派，他的真意义乃是“始终采用革命方法，忠诚的彻国民主义，不肯妥协。”并不单是唱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高调，便算是左派。口唱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社

会主义，或什么无政府主义，而实际上不去做革命的工作，这种分子在国民党中是右派不是左派；因为负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他的左右派，应该以革命分子非革命分子为标准，不应该以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标准。

我们希望国民党对于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及一切社会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都有一个明瞭正确的认识；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命为国民党左派的人们，对于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及左派之使命，也要有一个明瞭正确的认识！

（选自《向导》第62期，1924年4月23日出版）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

独　　秀

在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中，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对此最重大的意义，实有了解的必要。可是现在尤其是将来实际动作时，都会竟不了解而陷于错误的观念，因此我们必得详细解释一下。

第一，就国民党的主义上讲：此时任何政党党纲，都论列到社会的经济政策，可是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前造端时即注意到民生问题，这是受了德法两国劳动运动的影响，而后进的中国国民党遂有此特色——和民族民权并列的民生主义。什么是民生主义？简单说，就是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生"计问题，不是说解决全民生计问题；因为全民中富有的部分，当然不劳国民党锦上添花为他们来主张民生主义，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乃为着劳动平民雪中送炭，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如何解决劳动平民的生计，国民政府之经济政策及农工立法，尚在将来，眼前急需的经济组织工会农会）及日常生活之改善，乃解决劳动平民生计之最小限度，国民党对于此类最小限度的劳动运动若不实行援助，则民生主义的理论及保护农工利益之党纲条文，便都是不兑现的支票。各种主义的党派，对于劳动运动之性质与内容及劳资间的关系，虽不同途，而于最小限度之经济组织及日常生活改善，则殊无二致。若并此最小限度而否认之，则已无劳动运动之可言，这是军阀阶级的主张，提倡民生主义的国民党当然不能如此。若恐怕参加此等最小限度之实际运动有赤化的嫌疑，这便和军阀官僚们把一切工会运动及罢工都当做社会主义或过激运动是同样的无常识了！

第二，就国民党的组织分子上讲：有人以为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若出力援助劳动阶级，岂不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合作的同情？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错，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正为他是合作的党，便不能只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应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应该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必如此，才有各阶级合作之可能。国民党若恐怕援助劳动阶级，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失了资产阶级之同情；但是不援助劳动阶级，不怕违背劳动阶级的利益，失了劳动阶级之同情吗？国民党若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利益，若只珍重资产阶级之同情，那便是一个单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不是什么各阶级合作的党了。要他合作，却不顾及他的利益，现代的劳动阶级未必还是这样可以愚弄的罢！国民党既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应该的；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有拥护之道，就是应该站在民族及民权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应该站在"反民生主义"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详言之即是：破坏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一是外人制我工商业死命的协定关税和外人在中国设厂制造，第二是军阀官僚之战争及厘金等苛税阻碍工商业；因此，国民党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惟有厉行民族主义反抗掠夺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者，和厉行民权主义反抗紊乱中国政治及财政的官僚军阀；若不努力于此等奋斗，转向穷苦的劳动平民，要他们多做点

工少拿点钱，以弥补资产阶级被外人及军阀官僚所掠夺的利益，此种“杀穷人起家”的办法，不但不合天理人情，而且在此半殖民地状况的中国，即尽杀穷人也不能起家，因为劳动平民无论如何牺牲，比起资产阶级所受外人之掠夺及军阀之损害，不过九牛之一毛。因此，我敢说：国民党若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简直没有理由；何况他是各阶级合作的党，不是单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更不是和绅士们相依为命的陈炯明。我曾在“国民党与资产阶级”一文中，说明国民党的革命是于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益的，劝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国民党，因此有班朋友们指责我，说我轻蔑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其实我在那篇文中并未如此说，因为我始终希望中国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此时他的组织分子上也实际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这班朋友们不愿意人轻蔑国民党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很对的；可是若同时恐怕违背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肯参加劳动运动，倒现出资产阶级政党的面目来，这却不对了。我们现在所用“各阶级合作”这个名词，应该要知道这名词有两个重要的解释：（一）是各阶级合作，不是各阶级合并，因为阶级是不能合并的；（二）是国民革命之政治的合作，不是劳资妥协之经济的合作，因劳资两阶级在经济上没有能够合作之共同点。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若不将这两个合作之意义解释清楚，在实际工作上必发生无穷的纠纷与困难。

第三，就国民党革命的战斗力上讲：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劳动阶级，越富于革命性；这些情形在各国都没有例外，在埃及印度爪哇菲律宾等国民革命运动中，劳资两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更是眼前的明证。中国又何独不然！由工人农民群众，而商联会与学生会，而总商会与教育会，这三层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总商会所代表的，又应该分资本家和财阀两派，中国此时财阀的力量更大过资本家，若新旧交通系，若京沪银行业者，若香港广州的富商，都属于财阀派；他们是依赖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军阀官僚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们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国民党，固然是各阶级合作的党，然而也应该看清财阀，资本家，小有产者，（学生小商小农小工业家等）工人农民这四个阶级当中，那个阶级能够供给他更多的革命战斗力。国民党若是看轻了工人农民；若是恐怕参加劳动运动得罪了财阀和资本家；若是觉得财阀和资本家不但比起劳动者是绅士，而且比小有产者更有力量；若是相信财阀和资本家能帮助国民党成功，一味交欢他们，因此便不敢和劳动阶级接近；如此，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力必然要衰弱下去，革命的色彩也必然要淡薄下去。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党，不用说，他的党纲，他的行动，都应该努力于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对内对外的战斗；但同时，万不可忘了更有革命战斗力的是更向下层的阶级，尤其是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更万不可牺牲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来维持资产阶级之利益；因为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中国资产阶级之解放运动，中国之国民之解放运动，是不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总观察上，在估量国民革命运动全战斗力上，都知道劳动运动有最重大的意义，不应该为任何次重大的意义而牺牲他。

（选自《向导》第71期，1924年6月18日出版）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

但　一

在共产党员经过长期辩论，决定了加入国民党以后，国民党内部于是发生了容受或者排斥共产党员的问题。为了这个问题，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有人提议禁止党员跨党，想以强迫脱离共产党的条件消极的阻难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到了现在，又有些人责难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占据了国民党的重要地位；为了排斥共产党甚至于印刷传单，秘密开会，凶殴党员，闹得象煞有价事的样子。

对于这一件事，我愿意发表以下的意见：

第一，国民倘党若认定了他自身对于国民革命的使命，倘若认定了他自身应当提携全国进步的民众以从事于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今天革命势力还很薄弱的时候，正应当多向各方面活动联络，本不应当有排斥共产党不使加入合作的道理。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交谊如何，今日诚无从断言，然而便令将来或者两方面有不能合作之一日，这究竟是将来的事，在国民革命未成功以前，便闹甚么分家问题，未免太早得很。

第二，国民党倘若定要排斥共产党人，亦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过至少国民党为了这样，更要自己认清楚自身的使命，更要加重些自己的担子。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为甚么革命？为谋广东军政界地盘的扩张而革命么？为拥戴孙中山先生个人而革命么？倘若是这样，那便与南北一般不顾民众利益的军阀有甚么区别？我们只知道三民主义是为全国民众谋利益的；孙中山先生与他所统率的民党，是为全国民众的利益而奋斗的。然而现在一般排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居然会说出共产党员要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不妥协，这是破坏国民党；然则自认国民党是对帝国主义妥协，对军阀妥协的政党么？果然如此，那便与头发党马蜂党有何区别？拿这样立脚点来排斥共产党，那便无异自己证明他们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甚么都闹不清楚了。

第三，国民党纵然要排斥共产党，亦只好就那些确实已经名隶共产党籍的人使他退出国民党，至于对于那些明明是纯粹国民党而略略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乃至那些明明是纯粹国民党而仅仅主张容纳共产党合作的人，没有因为排斥共产党的原故一并加以反对排斥的道理。然而现在那些主张排斥共产党的人，把一切反对他们的人都指为共产党，又立一些共产派准共产派的奇异名目，欲为一网打尽之意。因此，不但一般思想比较清醒进步的青年都被目为应排斥的共产党员，不但邵力子先生被指为甚么共产党的副委员长，便是与孙中山先生多年患难相从的汪精卫胡汉民先生等亦会被指为共产党。这显然可见所谓排斥共产党不过是他们威胁异己的一个武器，根本便是要扫灭国民党中一切比较进步的势力罢了。

第四，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他们的理由是很显然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甚么时代甚么产业状况之下都可以实现的。他们的大师马克思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学者，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大

生产业发达以后必然的趋势，然而亦只有大生产业发达以后才能够达到此境地。共产主义并不象一般唯心派的乌托邦论者，他们并不相信在中国未能打倒外资，发达自国产业以前有任何方法实现他们的主张；所以他们因为热心蕲求他们主张的实现，还是不能不希望外资的早早打倒，自国产业的早早发达，因此，他们认定了眼前最大的急务，是尽力与国民党合作，而且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势力于全中国民众。这中间虽然动机是与纯粹国民党不同，然而他们对国民革命期望心的真诚，恐怕不是那些靠国民党招牌以自营利益，自植势力的浪人政客等所可望其项背罢！

第五，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并不曾禁他们跨党，亦并不曾要求他们将党解散，那便他们这些议案、与纯粹国民党员在党内另有小组织的完全不同。而且便就国民党员所获得他们的议案印成小册子的而言，他们并没有一句话要引导国民党做不应当做的事情，他们无非告诫他们的党员要谦慎和平的与国民党员相合作，应多做切实工夫，少做无谓争执。象这样的话，亦可称为是破坏国民党的证据么？他们为促成革命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不能不尽力使国民党的内容更充实更进步，然而这样都居然会不见谅于少数国民党员，他们不但认这是破坏国民党，而且在他们在南方大学秘密开会时所发的传单，更在小册子原文以外自己加上一些煽惑一般国民党员的话头，又写上许多“注意”“大注意”，似乎表示共产党人要督促国民党实践国民革命的工作，要设法与国民党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通通是大逆不道的样子。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还是一句骗人的话呢？还是真有这个决心？倘若真有这个决心，会怕人家督促自己做这种工作吗？会以为人家有这种督促是侮蔑了自己吗？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

第六，共产党人现在需要与一种国民革命的势力相联合，他不能不注意到十余年为国民革命支柱奋斗的国民党，然而他不能笼统的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国民党的明达领袖，确实是真诚勇猛为他们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他们的言论行为都表示着他们坚忍不挠的精神；然而一谈到他们党的活动， 欲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 这样的原因是很易知的。有少数老资格的党员，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年龄一同老大了，所以他们失却了少年时的革命精神，不知不觉的倾向于苟且妥协的方面；而另外一般偶然归到南方势力下的政客官僚，他们本来做梦都不知道革命是一回甚么事情，在他们的脑中，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只是一个骗人幌子，实际只是与头发马蜂等党一样是争饭碗的东西。他们这样的人与这样的思想占据了国民党内部，于是实际上国民党几乎没有法子与那些私党分别了。然而这是不足以污损国民党的。孙中山先生等百年如一日的少年精神，曾经屡次为要刷新国民党内部而改组国民党，这一点令一般共产党人明白国民党终究有代表国民革命势力的可能，所以终究认定了有他们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完成孙中山先生等志愿的必要。他们加入国民党，是根据于他们的要促成国民革命；那便国民党只要一天还真有志于国民革命，在他们自身方面，终是要加入的。实在说，只要国民党一天不变成完全象头发马蜂等私党，共产党人终不肯放弃国民党方面的工作的。你便明白的排斥他们出去，他们为了促成国民革命，终究不免要秘密的参加进来，他们总要帮助国民党，督促国民党，早些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除非国民党真个不做国民革命的工作，把广州一隅自认为与奉张浙卢一例的事了，然后共产党才会死心，设法另谋创造国民革命的势力。

所以本于上列的各种理论，可知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他们的加入国民党而仍旧保持他们的独立活动，这是不足奇异的事情。为国民党计，倘若是真心要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呢，在今天没有惧怕，或者嫉忌共产党人的理由，共产党在今天，任便有甚么神通，他们只能做成国民革命，然而利用他们帮助与督促的力量，国民党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正可以早期完成，何至于因为他们的帮助与督促，反对有甚么亡党之痛呢？

然而在根本并不要革命的那一部分国民党员，他们的思想方式完全是两样的。

他们自己不作革命事业，人家要求帮助他们时，他们说这不是亡党了吗？于是不但共产党人来帮助他们，谓之为亡党；便是纯粹的然而进步的国民党员来了，亦谓为亡党。醒醒罢！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存在的；倘若国民党根本忘了国民革命的使命，这才是亡党呢！我们还是祝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万岁！

（选自《中国青年》第41期，1924年7月19日出版）

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广州通信）

伍　豪

一，广东政府，我们从广东政府实际工作上看出广东政府是在受南方军阀挟持，向帝国主义英吉利，洋行买办及一切反革命派常常表示退让，并且时时有压迫工人农民解放运动的事实出现。在这些南方军阀中要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等的军队次之；他们驻扎的地方多是广东富庶之区，而滇军各首领每年汇回云南款项据银行人说常不下千万。对于东江战争，驱湘军为前锋，胜则归功于已，败则卸过他人。北伐事起，阳示赞成，阴则借口陈炯明将图反攻，按兵不动好保持他们已占有的富庶防地。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动身北伐时下令废除一切苛捐，而饷源在握的各军长不但不能遵令取消，且更借北伐巧立名目加抽各种捐税。滇军军阀如是，粤军桂军湘军等军阀亦莫不如是。政府号令不得他们同意，虽令亦不能行。反之，他们的主张虽违政府号令，政府亦必须屈从，例如扣械事件的调停，粤滇两军阀均想借此与商人接近，见好商人，然后从中剥夺。结果因滇军力大，许崇智敌不过范石生廖行超，范廖遂以五十万将中山卖了。中山知被卖后，气愤不过，但他的左右却竭力怂恿他忍气吞声地接受范廖等私定和约。中山在表面上是接受了这个怂恿，然而心实未甘。故五十万的敲捐，中山曾宣言不要，百余吨枪械，中山几次传令缓发，范石生借故索枪，想从中渔利，中山亦曾令蒋介石扣留不发。中山这种敢为的勇气，国民党左派是极力赞助的，只惜包围中山左右的，大都皆是些不革命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因之中山彻底的主张遂常被他们阻挠，不得遂行其志。于是五十万的敲捐，终于由大本营秘书厅以领枪一支缴洋五十元的变通方式发表。枪械缓发范廖等竟指使商团代表通电痛骂政府无信，而范石生自己所要敲诈的枪械，亦终于听他强索而去。并且商团代表骂了政府后，愈骂愈起劲，外面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和陈炯明军阀内而利用李福林李朗如为他们保镳以实现商人政府的局势亦愈迫愈紧，第二次罢市的通牒遂于双十节前一日发出。政府在此时本已退至无可再退之境，然因不敢反抗李福林等的威迫和前此已曾因被迫允许还械的宿约，五千支枪械乃于双十节早晨由黄浦运回广州发还商团。商团看出政府软弱畏怯的破绽，当日便摆出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军阀合用的工具之气势，向徒手的市民巡行队肆行屠杀，尤其加倍地屠杀巡行队中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军官学生。趁火打劫的福军，——政府的军队，亦复加入摧残，为所欲为。屠杀后四日中的广州状况完全是一商团和军阀横行的反动局势。在这时候，国民党右中两派合作的广州政府已知他们的地位是快要被陈炯明和买办阶级受着英国帝国主义指挥而合作的商人政府袭取去了，再不进攻只有灭亡，但他们却又没有勇气去图进攻。然而革命的左派，领着革命的工农群众受着极大的摧残和压迫却万分忍耐不住了；他们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

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因为广州既为反革命势力所笼罩，号称革命的政府若再希图妥协苟安下去，不但所有的设施将益较从前为反动，国民革命亦将在广东完全破产，工农阶级的解放运动更会被摧残到底。不生则死，中山虽远在韶关亦看出了这个姑息养奸的反动局势除进攻外无别道，于是最后的决死战才由中山指定的革命委员会发号施令地动作起来。同时中山更觉悟到自他到韶关后的广州政府妥协自私完全违背党的宣言及他的意旨做事，故在愤怒中曾有否认非革命的广州政府之决定。不意进攻商团的战争一开，眼灵手快的滇军军阀立刻觉悟到商团得势陈炯明转瞬归来便会排斥客军的危险和枪械与其存商团手中莫如收为己有的妥当，唯利是图的李福林亦看出趁火打劫之利较受商团拥戴的为可靠而切实，于是阵势中便立地加增了两派刽子手。自然我们也承认滇军军阀和福军之攻打商团，甚至于乘机抢劫，广州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统都无法禁止的，不过事后任军阀自缴商团枪械之不足，犹复以每支枪外再缴百元军饷的敲捐号令开军阀敛钱之路，以广州新旧城归范军驻防，西关归廖军驻防，河南归福军驻防的分配，授滇军军阀以广州的实权，这不能不说是广州政府之自愿了。不仅如此，便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亦由某要人起草了一篇宣言，省长公署复发起了一个市民善后委员会，都百二十分地企图与市民中上层人物妥协而忘掉市民中下层的工农阶级与小商人的真正痛苦和正在受着反革命派压迫的情状。切实说来，他们只看到这个幸存的广州政府的地位问题，却忘记自己已完全处于滇军军阀特别是范石生（范的幕下有右派人为之计划一切）的指挥下了。

二，反对帝国主义　这样的广州政府我们本不愿因为中山发表了几篇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而忽略他们怠工和退让的实际情况，然而群众却常常因此受了蒙蔽。说起中山所以发表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宣言的缘故，要点是在中山看了帝国主义列强实与中国国民革命不能两立：白鹅潭的十六只外舰示威既已开其端，沙面苛例发表后各国领事态度更是目无广州政府，及至英领事因第一次罢市而下威吓的哀的美敦书，帝国主义的强横态度更表现得十分露骨。

尽管中山发表那样坚决的宣言尽管广州反帝国主义声浪那样高，然而事实上广州政府却伴着那篇宣言取消英国帝国主义走狗二陈的通缉令，并发还其家产，决定退还英国帝国主义工具商团的枪械，任买办商人所拥护的李福林为市长，任商务李朗如为公安局长；凡此种种简直是向英国帝国主义绝大的让步。然而英国帝国主义岂能因此便停止推翻中山政府的阴谋！援助陈炯明援助买办阶级和商团以建设他指挥下的商人政府，这是香港政府得意之笔。纵然商团一时溃散了，但四乡与商团同性质的民团仍在；纵然二陈及商团代表一时逃走了，但买办阶级依然存在；纵然陈炯明一时未能打入广州，但帝国主义可利用的军阀，原不只陈炯明一派。现时广州滇军军阀与买办阶级的复行勾结，李福林与民团的关系，又使英国帝国主义注意到这些可用的工具。且最近英国已由本国开来七只军舰，直泊广州，这不仅足以助长他的工具——军阀与买办阶级之声势，且直回应到九月初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工党政府的宣言。目下英工党政府塌台，保守党政府将要继起，是其对广东政府的推翻计策将更要努力进行无疑。

英国帝国主义向广东进攻愈甚，广东反革命与革命的阵势自也分化愈亟。不革命的右派国民党在其经济地位上说，在其个人利害上说，他们是永不会反对帝国主义的。但革命的左派却看得非常明显，广东政府若不向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进攻，终久会被英国帝国主义推翻的。故他们主张与帝国主义决裂非常坚决。在中山对于海关问题，也是主张以力取

之，只是见困于妥协派和右派的不革命空气，恐终难见诸实行。

三，反对军阀　至于反对军阀更是国民党所至难措辞的问题。明知奉张浙庐便是胜了，也未必有利于中山，更不会有利于革命派。但终因反直系联合的口号宣传许久，机会主义的色彩终舍不得除去，故于江浙战事方起，便大倡北伐，以谋响应。实则北伐之无望，与北伐之难能在中山看得极其明瞭，故以党的名义发表之北伐宣言，明明白白说出希望曹吴倒后，不再有军阀政治出现，此次倒军阀，实际上便是倒帝国主义。依此以例今日北方各军阀推倒曹吴的局势，国民党当然只有发挥根本铲除军阀制度及帝国主义的精神，左派一本中山宣言，如是主张。但党中的右派和机会主义者，却已离了革命的立场认为千载一时之机，想从军阀的分赃会议中得到革命的代价。所以现在国民党中的投机空气，几乎又与"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民国元年相彷佛。我们退一步言，将来军阀和帝国主义暗中主宰的元老会议，中山亦可加入发言，看看他们究竟的勾当；然这种加入的目的必须是为革命做宣传，是要在他们的会场上提出国民党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政纲，以鼓动全国人民之革命工作，以暴露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假面具，决不如投机派之所梦想，是要乘机分得一份政权而与一邱之貉的军阀及帝国主义者去合作。

四，结论　我们从上述的广东政治现象中，很明显地看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而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

假使国民党要使他的宣言完全实施起来，中派分子必须打破他们妥协的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免除不革命的耻辱和妥协的色彩，实行反对一切军阀，一切帝国主义。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将广东政府从军阀扶持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希望明达而革命的国民党人都要认定国民党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界限便是革命与反革命。

（选自《向导》第92期）

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孙 中 山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

今天是本学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象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至于世界上的革命，在我们以后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和中国毗连有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来立国，比中国还要大；在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当欧战期内，便发生革命，他们的革命，后过我们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的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的是彻底成功。我们拿两国的历史来比较：就对内一方面说，中国从前革命，是对外来的满洲人。满清皇帝的威权，到我们革命的时候，已经是很薄弱，政治也是很腐败，当那个时候，满清的国势，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国家。比较俄国对他们皇帝革命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俄皇是本国人，又是俄国的教主，在国内的威权是第一，当没有革命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势，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象这样比较，可以说，中国是对权势很薄弱的皇帝来革命，俄国是对权势很强盛的皇帝来革命。所以就对内这一方面讲，中国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是很艰难的。就对外一方面说，俄国革命之后，所遇到的障碍是很大的；中国革命之后，毫没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国人虽然有瓜分中国的言论，我们也怕到革命的时候，受列强的干涉；但是发生了革命之后，列强毫没有理会。俄国发生了革命之后，遇到外国人的障碍，不只是言论，并且实受兵力的干涉。各国军队侵进俄国境内的，有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国的军队，外国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来干涉俄国。象这样看来，我们革命，只在内对付一个很衰弱的政府；俄国革命，在内要对付一个威权很大的政府，在外还要对付全世界的列强。所以更就对外那一方面讲，中国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国革命也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如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因为知道了这个教训，所以有今天这个开学的日期。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就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中国当革命之

时，在广东奋斗的党员，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舍身奋斗的党员也是不少。因为有了那些先烈的奋斗，所以武昌一经起义，便有各省响应，推倒满清，成立民国；我们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后来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军阀，仍敢明目张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要有什么资格才叫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什么是叫做革命的基础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有了那一样的行为，才叫做革命的基础。至于现在广东的这些兵士，对先烈的那些行为，还是莫名其妙，而且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益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象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在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在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军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要将来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什么是革命的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从前的奋斗是什么情形呢？大多数都是凭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枪炸弹的，便以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义，总用很少的这种武器，去和清兵奋斗，当时全国清兵有多少呢？从前有旗下绿营、水师和巡防营，后来又有新兵，总共不下一百多万。譬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城的，便有李准所带的水师，张鸣岐所带的陆师，和燕塘的许多新兵，及满洲的驻防军，总计不下五六万人。当时革命党的人数不过是几百人，经过那次革命之后，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没有死的，当然是很多。当时做冲锋队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过三百人，所打的敌人，不止三万人。革命党只用三百人，便敢打三万多的敌人，这就是革命党的见识；革命党的见识，都是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人的。此刻在这地听话的，多是军事教员同军官学生，试问诸位教员，研究军事学，在战术中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有没有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来，无论古今中外，都没有这种战术。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便以为了不得，古时的兵法都说是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近时的兵法，用一个人打一个人，非守即退。象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当的战术。至于广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并且坐守广州的敌人，都有长枪大炮，进攻广州的革命党，只有手枪炸弹。战到结果，革命党死了七十二人，后人以为是失败；但是革命党攻进制台衙门，赶走两广总督，我们以战论战，当日广州城内之战，可以说是成功。至于后来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预约的援军不至。就是推到那次冲锋队的三百人，武器还是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并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事后将敌我的情形，过细比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并不是三万敌人能够打败三百个革命党，实在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计划不周全；如果在起义之先，计划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广州起义之后，又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结果是成功。推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革命党分到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的工程营中发难；城外的炮兵营，立时响应，便拉两门炮进城，遥攻总督衙门，赶走瑞澂，占领武昌。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下两万多人。革命党只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广州起义，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结果是失败；武昌起义，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结果是成功。都是以极少数的人打极多的人，在广州是失败，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奋斗，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奋斗，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我们继续来革命，按步就班，便不能说用少数不能胜多数。诸位教员有从外国学来的，有从保定学来的，从前各国在陆军学校所教授的学问，都是寻常的军事学；此刻学成的先生，再教授学生，一定也是从前所学的普通军事学。所以诸位学生在这个学校内所学的学问，大概都是极寻常和极有规矩的普通军事学。诸君专拿这种学问，可不可做革命军人呢？做革命军的学问，不是专从学问中求出来的，是从立志中发扬出来的。诸君在

求学的时代，当然要听先生的指教，服从长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明白多少。如果有绝顶聪明的人，或者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就是没有绝顶聪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学问，彻底了解，将来也有大用处。用诸君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的革命党比较：从前的革命党，都没有受过很多的军事教育，诸君现在这个学校之内，至少还有六个月的训练；从前的革命党，只有手枪，诸君现在都有很好的长枪；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以诸君这样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支枪，便可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象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陆海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们加入革命党，但是有许多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知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过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用一个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万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这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的呢？成功的时候，固然是有许多军事家的赞助，但是穷脉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由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推到当时一般有知识的军人，以为用极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个道理，便不赞成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很少。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于全国已经发生了革命之后，段祺瑞便结合一般军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才能够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革命党因为降格相从，容纳他们的意见，收罗这一般军人，以后才收军事上的顺利。所以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实在没有真正军事学识的军人。大家总要记得：革命是非常事业，不是寻常事业，非常事业，决不可以寻常的道理一概而论。诸君现在求学的时代，能够学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就是一生学到老，死记得满腹的学问，总是没有用处。我们现在到这地开办这个军官学校，北方的官僚军阀，老早便办得有保定军官学校和北京陆军大学。用我们这个学校和他们的学校比较，他们学校之成立的时间很久，人数很多，器械又完全；我们这个学校所处的种种地位，都是比他们的差得远。如果专就物质一方面来比较，又照常理论，我们怎么能够改造中国呢？不过北方的将领和兵士，集合在一处，成立军队，不是为升官发财，就是为吃饭穿衣，毫没有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志气；在从前满清的时候，是这一种将士，现在遗留到曹锟、吴佩孚的，也是这一种将士。我们没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党，从前既是能够消灭满清，将来富有军事学识的革命军，更是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不过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要能够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没有革命的精神，他们的人多械足，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消灭他们，恐怕反要被他们消灭。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

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了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立志要做革命军。立志做

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象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世界。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国亡种灭，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成革命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得救国救民的责任。既是有了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更是要同他们拚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本领，是靠什么为主呢？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象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象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个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我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便是一个后死的革命党。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以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明白了这种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是我们有胜无败。

这样以死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凭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实。象从前日本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做陈天华，他发扬了革命的精神，还没有到革命的时机，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英国又有一位留学生，叫做杨笃生，也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腐败，要以速死为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象陈天华、杨笃生，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革命党，就是热心血性的真革命党！他们都是由于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实在是可惜。但是由陈天华、杨笃生两个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视死如归，以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难得和很快乐的事；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自己主义上的敌人，受敌人枪炮的子弹而死，当然更以为死得其所了。从前的真革命党，因为都有这种乐死的性质，所以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所以敢于屡次发难来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这种先例，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这种成例。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了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在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平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

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有了这种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种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

（选自《孙中山选集》下卷）

〔附〕黄埔军官学校之创办

本党在改组期中有一重大之建设，即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之创办是。总理鉴于革命以来，虽不无为主义而奋斗之军队，然多系于将官之富革命性与否；下级军官与兵士实仅为无意识的服从。一旦将官意志移动，成为反革命或不革命，则部队立即为革命军之敌人。例如辛亥本党秘密运动新军为复清之举，得新军一时义愤，群起屋清；然事过境迁，二次革命之役，新军即不复为本党用矣。再如陈炯明所部，为吾党以全力培养而成者，洪兆麟所部曾全体宣誓入党者，一旦受人利诱，竟至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变。滇桂粤各军号称拥党逐陈者，然军队调动，总司令须商之军师长，军师长须商之旅团长，以致东江残敌，纵窜而不能平，财政之割据，即贤者亦不能免。用是夙夜忧虑，无日或释。为谋军事之彻底改革，乃于十二年秋，命蒋中正赴俄考察军事教育制度并观察苏俄当局对我之实际态度。十二月返国，遂决设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之志。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方派蒋中正、廖仲恺负责筹备；一方委托各省代表介绍革命青年前来应试。报考者三千余人，结果得本党最革命青年五百人，于是年五月五日入校，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总理亲致训词，以革命必先革心，及革命军人应有以一当百不怕死之决心，历举先烈杀身成仁、勇于牺牲、救国拯民之事绩，勖免诸生。总理又自任学校总理，以蒋中正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下分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及总教官各职科，以戴季陶、王柏龄、李济琛、何应钦、俞飞鹏等分任职务；以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邵元冲等兼任政治讲师，授以党义、党史及各国革命运动史。总理与廖党代表、蒋校长亦常以革命理论、人生哲学、精神讲话，亲自诲勉，终乃成为军队政治训练之楷模，蔚为党军政治工作之创业。方军校初创时，假革命之跋扈军人，心多自惴，及见校务日展，尤不自安，于是阴谋破坏，尤于财政一方，尽力制肘，满途荆棘，纵使校事无法进行。校长蒋中正且一度辞职，终以总理慰勉，忍耐主持；更以全校师生之一致努力，战胜恶劣之环境。是年商团军变，该校学生首次出马立功，声誉远播。自是革命精神，日益紧张，意志团结，日形坚固，校务亦日见发展。九月，第二期学生入校，同时成立教导第一团，以何应钦为团长。两月后，又成立教导第二团，以王柏龄为团长。十月第一期学生卒业，分发教导团服务。翌年一月，第三期学生又入校。计半年之间，卒业学生五百人，在学一千人，成立教导两团。而此教导两团，实为党军之桢干。盖其士兵系党中同志陈果夫等在上海秘密挑选，自始即有为革命牺牲之决心；中级将官系由军校教官选任；下级长官由队长选任；而排长、班长则以学生充之。团以下复设有各级党代表，由中央择教官学生之富有政治学识者充任

之，凡军队一兴一废，一举一动，均受各级党代表之监督，所讲真正的军队党化也，而党军之名，亦于斯得之。

（选自台湾罗家伦：《革命文献》第8辑）

〔附〕孙中山黄埔建军纪要

陈 适 吴宗泰 赖 刚
刘宗武 肖志雄 张云亮

一、黄埔军校的创办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列宁、斯大林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

一入黄埔军校大门，迎面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标语、对联。初期的校歌有“以血洒花、以校作家”之句；后来的校歌又有“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之句，总之校内到处充满着生气蓬勃的革命气氛。这就表明，它是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时期的产物，是共产党人直接参加创建军校所出现的革命景象。

孙中山想建立一个培养革命军事干部机构的愿望，是由来颇久的。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失败教训，已深感依靠军阀搞革命的非计，又鉴于列宁领导的革命军队对苏联十月革命的重大作用，使他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于一九二一年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介绍，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两人畅谈中国革命。当谈到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建立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军校时，孙中山倍感兴奋。至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革命，所谓“变生肘腋”，使孙中山触动很大。他回到上海，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商谈，并与苏联代表越飞进行会谈，都迫切提到建立革命军校及革命军队的问题，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列宁派人帮助。所以，一九二三年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时，建立军校的问题，便马上提到日程上来。同年秋冬间，在宣布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孙中山派出廖仲恺负责筹备工作。黄埔军校，遂由拟议而进入具体筹备和安排人事的阶段。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又正式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要求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创立军校。但于同年二月间，蒋介石突然不辞而行，溜回上海，后返浙江奉化原籍。孙中山乃于二月下旬，派廖仲恺兼代军校筹委会委员长，并着叶剑英协助办理筹备工作，马上开始招生。还有邓演达等，也陆续参加工作。后来，孙中山派许崇智到奉化劝告蒋介石回来。蒋重回广州的时候，已是四月间了。那时，一切均已筹备停当，新生陆续到达，至五月五日即正式举行新生入学典礼，开始上课。蒋介石坐享其成，仍由孙中山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

黄埔军校是在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办起来的。初时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孙中山曾有过集中各军所办讲武堂合办黄埔军校的想法。但当时广东省尚为大小军阀各据一方，阳奉阴违，所以进展缓慢，直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著名人物先后云集黄埔，东征胜利，广东统一，孙中山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初时军校经费是很困难的，只由廖仲恺临时设法筹集，并没有固定来源。孙中山先生曾吁请各军给予帮助。各军也曾以一万，以至二、三万元相助。据罗翼群的记忆，当时广东筹饷局也仅给以每月五千元的帮助。黄埔开办时枪支仅有三十支，只够守卫之用。后来，斯大斯继承列宁的政策，在经济、武装上给予支持，困难才稍告解决。

二、黄埔军校的基本情况

黄埔军校在长洲本岛先后办了七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毕业的有四期。第五、六期是大革命时期进校，至大革命失败后才毕业。第七期毕业已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了。当时，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来任教和当学生的，真是精英云集，龙蛇混杂。

孙中山任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组成校本部。廖仲恺遇刺牺牲后，由汪精卫继任党代表。在校本部之下各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有：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戴季陶、邵元冲最初也曾当主任)，后为邵力子与熊雄等；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正主任李济深，实际由邓演达负责），后为何应钦；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入伍生总队长为邓演达、张治中；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教育长初为胡谦，后为邓演达、方鼎英等。政治教官以共产党员为主，主要的有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兼政治部秘书)、高语罕、张秋人、于树德等。他们在校信誉最高，素为学生拥戴；军事教官主要的有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胡树森、徐培根、张元祜、沈应时等，他们多为蒋介石的浙江同乡。邓演达、严重等主要担任学生队的统率工作，亦为学生所拥护；戴季陶、邵元冲、周佛海等也号称教官，偶尔到校上课。

黄埔军校学生来源有下列各个方面：在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东，公开进行招收，但由于黄埔军校以不怕牺牲，矢志革命为号召，不少人视为畏途。所以，考生不少是通过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动员投考的。广东以外的各省则通过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地方组织，用秘密或半秘密方式招收来的。学生籍贯，几遍及全国。但以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为多，安徽、河南、陕西等省次之。其中广东和湖南的学生占最大比重，如第四期湖南学生达八百多人。蒋介石还派出陈果夫等回上海、浙江招生，故浙籍学生也不少。此外，驻广东各军附设的军事教育机构，包括军政部讲武堂、警卫军讲武堂、桂军军官学校和粤军、第五军军事学校等，后来都纷纷停办，学生拨归黄埔军校。由于黄埔军校招生具有上述特点，学生中多为劳动人民的子弟。如第四期学生中，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此外，越南、朝鲜、马来亚的革命青年，也有远道到黄埔军校参加学习的。

黄埔军校吸取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一反过去学习日本、欧洲军事学校纯以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除一般军事教育之外，并有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具体说来，在军事教育上，它与当时保定军校所教的课程，包括典、范、令及四大教程(由苏联顾问编订)等，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学习时间和内容都远不如保定。学习时间为六七个月至一年，属速成性质。政治课程设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

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政治讨论……。军事各科则学其主要部分。所以，它虽然号称以军事、政治并重为教育方针，实际上又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即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特别是这些政治课程，主要的都由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讲授。记得周恩来主讲国内外形势，恽代英主讲社会进化史，肖楚女主讲经济学概论，高语罕主讲政治学概论，于树德主讲政治形势。此外，不少苏联顾问讲述红军战史、战例等等。由于对学生进行了政治教育，使之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所以黄埔军校学生虽然军事训练不多，而两次东征却战绩辉煌。

黄埔军校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开始第一期新生入伍，并于六月十六日正式举行开学仪式。开学之日，孙中山亲临讲话，发表了著名的开学演说。自此，即进入具体的教育训练阶段，其中，各期学生及教学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期，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开始入学编队，总计正取生三百五十名，备取生一百二十名，合共四百七十名，合组学生总队，以邓演达为总队长（八月后由严重接任），下面分编第一、二、三、四队统为步兵科。至九月，四川省续送来学生二十名，军政部讲武堂拨来学生一百五十八名，合组为第六队（第五队是第二期学生队号）。至同年十一月八日，第一期宣布毕业，其中第六队则在第一次东征途中才宣布毕业。毕业生共六百四十五名。在校学习时间半年。毕业后除部分留下工作，部分派往海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任政治工作和教练工作外，全部派去黄埔教导团任基层干部，参加东征。

第二期，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月、十一月分批入学，学生四百五十名。先后编为五个队：分步兵一、二队及工兵队、炮兵队、辎重队。步兵第一队队长陈复，第二队队长郜子举；工兵队队长最初是王俊，后以李卓元接充；炮兵队队长是蔡中笏；辎重队队长姓梁，名字忘记了。以严重为总队长，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随黄埔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以实战为学习。六月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于同年九月六日宣布毕业。毕业学生合共四百四十九名。在学时间约一年，毕业后主要派往第一军工作。

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冬末开始入伍，学生一千二百多名，编为入伍生第一、二、三营。从第三期开始，设入伍生制，即新生入学先受三个月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及格，始编为正式学生。以张治中为总队长。六月平定刘、杨叛乱后，第三期入伍生经过考试转为正式学生，改编为三个大队，内分九个步兵队，一个骑兵队。在学期间，参加消灭滇、桂军叛乱及解决郑润琦等右派军队各役。至一九二六年一月宣布毕业，在学期间一年。另在第一次东征时，蒋介石在潮、梅收编部分陈炯明粤军下级干部，设立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平定滇、桂军时，俘获部分滇军下级干部，在广州设立训练班，均于同年六月毕业，列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待遇。故合共第三期毕业生一千二百三十三名。毕业后分派各军工作，不少在第一军担任军职。

第四期，新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一月，分七批入伍，设入伍生第一、二、三团。后陆续转入正式学生，改编为步兵军官团及步兵军官预备团两个团。另设炮兵、工兵、政治、经理四科。一九二六年五月，复改编为步兵军官团一、二两团，另炮兵、政治两个大队及工兵、经理两队。在学期间，参加惠州、虎门、黄埔等地警卫任务。二次东征攻克惠州后，由入伍生第二团负责驻守惠州。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前，选派一批学生分赴湘、鄂、豫、皖、苏、浙、闽等省组织工农群众，准备协助北伐军作战，一九二六年九月宣布毕业。

另潮州分校第二期学生同时宣告毕业，统称黄埔四期学生，故毕业生合共二千六百五十四名。

黄埔军校从一九二六年一月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以李济深为副校长。以后第五期学生二千六百多名，第六期学生四千八百多名，第七期学生三千二百多名。随着大革命失败，学校名称和性质都发生变化。第六期以后，分别在南京、广州招生训练，已非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本来面目了。

三、黄埔军校内部两种思想和势力的斗争

记得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演说中，曾给学校规定了明确任务，就是要学习列宁的成功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牺牲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从而建立起一支为革命三民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军。

环绕着这个政治任务，当时黄埔军校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和各个政治集团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首先，共产党员承认孙中山先生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革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政治原则基本相同，他们和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是孙中山先生上述指示的正确执行者。他们通过对学生的讲话，课堂中的讲课，日常的接触，大力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内容和意义，并通过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国及世界政治形势的讲授，去说明中国当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其中，周恩来所讲的当前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恽代英讲社会发展史，肖楚女讲经济学概论，经常吸引着全校学生。在启发学生政治自觉、成为反帝反封建战士这一点上，起了很大作用。廖仲恺、邓演达等通过政治讲话及日常接触，对培养学生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不做军阀政客争权夺利和升官发财工具等问题上，也作出很好的贡献。

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吴稚晖、周佛海等有时也到校讲政治课或所谓“精神讲话”。有的讲话总是诋毁三大政策，用旧三民主义去反对新三民主义。戴季陶的思想被称为“戴季陶主义”，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汪精卫讲话只凭一副“好姿态”，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头号汉奸。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政策和主张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者。

蒋介石在黄埔初期大喊拥护三大政策，还斥戴季陶是“总理的不肖之徒”；另一方面，他又对学生强调盲目的“服从”，宣传“忠孝仁爱”，并印发《曾胡治兵语录》，供师生学习。

黄埔军校的学生，多倾向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主张，倾向于廖仲恺、周恩来、恽代英、邓演达等真正革命派，而倾向于蒋介石者少。甚至在一九二五年初，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举行第二届执行委员选举时，蒋介石竟从原来执委的位置落选（仅得六十票，未能当选），当选的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还是廖仲恺出面推荐，才让蒋介石继续担任一个“监察委员”，给回他一点面子。

黄埔军校开学后不久，为了配合整个革命任务和贯彻学校的教育方针，由政治部领导学生组织了“血花剧社”，在校内外进行演出。这个剧社最初在进步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等推动下，演出过不少反帝反封建的戏剧。其中《还我自由》哑剧，曾以无情揭发帝国主义及买办、地主罪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动人情节，获得学校师生的欢迎，并在广州南关戏院公演，扩大了革命影响。由于触犯了反动派的利益，有一部分师生起来反对“血花剧社”，如杨引之等要抢夺“血花剧社”的领导权，改变剧社的演出内容。后来，终于霸占了这个剧社，并以一些无聊的演出去代替过去的反帝反封建内容。“血花剧社”从此

奄奄一息，即使偶有演出，学生也不愿去看，以示抵抗。

一九二四年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共同组织了“火星社”，目的是扩大革命影响。参加的有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陈作为等约一百人，另外还有部分校外进步学生。这个团体人数虽然不多，而且是不公开的，但由于它代表着当时的革命潮流，团结了学生中最进步的骨干分子，因此它在群众中有着异常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它的主张每每反映了广大学生的意见，它的号召经常得到大家的拥护，对推动黄埔学生走革命道路，起着很大的作用。蒋介石在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委选举中落选，就与“火星社”的政治影响有关。后来，该社在第二期学生毕业，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后，才自动解散。多数成员加入了共产党。

与“火星社”在黄埔军校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黄埔学生代表、共产党员王一飞，常川在广州组织群众运动，与驻广东的粤、湘、滇、桂军讲武堂的进步学生取得联系，扩大革命影响。先是在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抱着团结各军青年军人，坚决不做军阀、政客工具，为反帝反封建革命奋斗到底的宗旨，并编印了《青年军人》期刊广为发行。一九二五年二月，在共产党推动下，又扩大组成了著名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参加的有黄埔军校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学生，也有各军——包括第一、二、三、四、五、六军的进步军官。这个组织，是广东各军进步青年军人的大联合，对在军队中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被一些反动师生视为“赤化”机关，于是猖狂对抗。一九二四年冬，他们酝酿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这个会假孙中山之名，行对抗孙中山政策之实。它在酝酿期间，就以流氓式的手段，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向进步学生挑衅寻事，甚至盗窃共产党人的文件，制造无稽的流言蜚语，对共产党员进行打击。至一九二五年年底，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正式成立，就更加公开地对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进行攻击。他们经常在宿舍、饭堂、教室污蔑共产党，攻击苏联，歪曲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因而引起了进步学生的回击，形成规模颇大的辩论和争议，每每由于这些争论而动手打人，形成打架。自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公开挑动打架，在校内校外互相冲突的事情就时有发生。杨引之、潘佑强等都成为全校闻名，甚至广州闻名的打手。

但是，对革命的破坏活动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当一九二五年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的第一军成立时，坚持革命的人还是多数。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在第一军官佐中加入共产党的占十分之二，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只是一小部分，蒋介石没有办法，乃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后，同时宣布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并以“精诚团结”为名，宣布组织统一的“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那时，“黄埔同学会”成了他的嫡系组织，也是以后“复兴社”的前身。

四、黄埔军校的功绩及其演变

黄埔军校按照孙中山的预定计划，在培养一批革命军事干部的基础上，建立一支为革命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军队。早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的合作，都正确地执行了孙中山的指示，使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黄埔教导团，和北阀时的国民革命军，名扬中外，战功辉煌。

黄埔教导团是一九二四年底，在第一次东征前夕组织起来的。当时组成异常仓促，连行军锅灶都是连夜到广州购买的。组成不久，即出发东征。所以新兵训练，都是从基本战斗技术开始，甚至一面行军一面进行野外演习，制式教练根本没有进行。但它有一个新的特点，

即参照十月革命时苏联红军的制度，强调政治领导，团、营、连各级部队均设党代表，并赋予党代表与部队军事长官同等领导权力。当时，蒋介石对抓紧这个部队，的确煞费苦心。但他把着眼点放在带兵官的掌握上，在连长以上的带兵官中，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刘峙、顾祝同、沈应时、蒋鼎文、刘尧宸、王俊任营长；陈诚、郭俊等任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学生，多数任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特务长等职。惟独对于党代表职位，除团党代表一团缪斌，二团王登云外，其余营、连级党代表，多由黄埔一期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担任。如教官金佛庄、茅延桢，学生刘畴西、郑洞国、李奇中、章琰等多数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这样一来，共产党员实际掌握了教导团的政治领导工作。他们一开始就积极开展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启发新兵中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当时新兵成分多是青年工人、农民。所以教导团军事训练的时间虽少，但新兵们的政治觉悟都很高。再加上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及进步军官，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见义先登，使士兵们很快成为坚定而勇敢的战士。因此，黄埔教导团在第一次东征的各个战役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黄埔军校打出了军威。嗣后，以黄埔教导团和各期学生为基础，又先后扩编为党军、国民革命军，他们在平定杨、刘军阀叛乱，第二次东征，统一广东和出师北伐的历次战斗中，都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到北伐军横扫东南各省、进占长江以南的时候，黄埔军校已是驰誉天下了。

不幸的是，这支由孙中山先生苦心建立起来的革命军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革命，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竟被破坏。两党合作变成两党斗争，大革命失败了，以革命著称的黄埔军校从此改变颜色。

（选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中共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

——选派同志投考黄埔军校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各级同学们：

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收三千名人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①同学及民校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投考者须一律携带民校介绍证明，本校③及少校同学均须由各地委直接另给介绍书于本校广东区委（粤华路，省署东杨家祠，杨匏庵转）。程度须在高小以上，在名额未满以前本校及少校同学，均可望不至落选。惟各地派定人数，须在未出发以前报告中局，以便中央统计人数已否满额决定行止。投考期本月底截止，派送人务于月底到粤。

钟英白④

〔附〕回忆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活动情况

饶　来　杰（竞群）⑤

一、中国共产党在军校建立党组织的由来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深得广大工农和革命人民的拥护，从而使我国革命形势日趋高涨。为了改变和提高革命军队的素质，同年五月在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训具有革命政治思想，又富于军事知识的军官，分配到各军队中使之成为革命军事骨干，以加强国民革命军的作战能力。

黄埔军校初成立时，中共中央就从各省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中抽调一些青年党、

① 少校，共青团的代称。

② 民校，国民党的代称。

③ 本校，中国共产党的代称。

④ 钟英白，中共中央的代称。

⑤ 本文作者为中共驻黄埔军校特派员。

团员和革命群众投入第一期学生受训，以后二、三、四期也同样有许多中共党团员参加人伍。同时，中共中央应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要求，派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去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并选派一些富有教学才能的优秀党员担任军校政治部政治教官，因而在军校官生中就有了一些共产党员，根据中共党的组织原则，在所在部门和学生队中组成了中共党小组。当时在政治部担任政治教官的欧阳继修同志曾是中共在军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军校为了扩大培训军政人员范围，于一九二六年一月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将四期入伍生两千多人编为步兵科两个团，炮兵科、工兵科、经理科、政治科各一个大队，于三月一日正式开学受训。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由邵力子兼任，由于邵不能常川驻校，任命熊雄为副主任代行主任职责。政治部除增设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秘书聂荣臻外，分设总务、组织、宣传三科，由陈良、杨其纲、安体诚任科长，全部人员已增至七十余人。其中中共党员约居半数，连同军校其他部门、团队的中共党员共计已有一百数十人，因而急需加强党的组织工作。

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结束后，熊雄到中共广东区委向陈延年、周恩来汇报军校情况，要求加强军校党组织和领导力量，以适应军校新的形势。区委当即确定抽调我以区委特派员名义去黄埔军校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并成立以恽代英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党团”。于是我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初即去军校政治部报到，派我为军校图书室管理员。

二、中共军校党组织的任务与作用

中共军校党的核心组织——“党团”，是由区委指定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和我五人组成，由恽代英负责主持。熊雄是党在军校政治部的领导人，负责全校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制定全校政治教育计划，安排政治课程。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协助。政治部行政事务和办公厅日常工作处理由聂荣臻协助。陈赓负责团结军校青年军人工作，参与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同学会等社会团体有关各项活动。我则负责把军校各部门和团队的中共党员分别组成各基层小组，由小组长直接和我联系，沟通他们与区委军委党的组织关系，接受党的教育，遵照上级指示从事各项革命活动。

中共广东区委对中共军校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曾明确指出：“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军事政治骨干与后备力量。”中共军校党组织在恽代英主持下，由于各成员的互相协作，团结一致，对完成党在军校的上述任务发挥了其应有作用。

三、中共军校党组织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活动情况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右派反动气焰益形嚣张，蒋介石亦日益明显倒向右派，于五月间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所谓“整理党务案”令全会通过，由国民党中央向中共中央要求“中共跨党党员退出国民党或共产党，成为一党的党员。”这一违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破坏国共两党合作原议的要求，虽经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接受，但终于遭到广东区委及广大中共党员的抵制而未实现。为此，我曾去区委向陈延年请示在黄埔军校的党员应作何处置？他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一个都不要向所在单位国民党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我将这一指示转达给中共各基层小组，要

各个同志遵照上级指示同往常一样在各个岗位上努力工作与学习，仍以国民党党员身份从事国民革命有关政治宣传工作，维护着以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为基础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同志在广东区委主持中共军运工作期间，对于在各军事机关部队的中共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极为重视，经常在星期日召集他们到农民讲习所举行报告会，由他作有关军事运动和国内革命形势及其他政治报告，鼓励同志们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黄埔军校中共党员通过党组织联系，每次都很踊跃地利用休假日去广州参加这种报告会。事后反映，大都感到党的教育的温暖，认清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应有的使命。从而促使大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与右派斗争各项革命活动中，表现出极其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由于蒋介石日益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等右派集团勾结一起向革命左派势力进攻，迫使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兼军校党代表汪精卫愤而弃职出国后，军校官生闻讯极为愤懑。记得有一次当蒋介石集合军校官生在校本部讲话时，突然有一学生站出来。大声质问蒋校长“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使蒋十分尴尬，只得低声回答说“他已出国了”。事后政治部领导人熊雄得知这学生是中共党员，认为他这一行为不符合党当时“团结对敌”的指示，是极左个人狂热主义的表现，于革命不利，当面对他进行了批评，并要我转知各小组长对他这一错误行为在小组内进行一次全面教育。其后，又有一次蒋介石举行总理纪念周，散会后经过图书室门前曾进入阅览室，见到墙壁上悬挂有汪精卫与蒋介石并列的大型挂像即面露不快而回校本部。嗣经邓演达暗示熊雄转知政治部将汪的挂像取下，仅留蒋一人的挂像。由此可知当时蒋汪分裂及军校左右派斗争的情况。

黄埔军校党组织一向都是严格遵守广东区委每一时期所发政治宣传大纲，采取切实措施通过各成员负责领导进行。在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方面，关于每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随时通过当时负有盛名、为学生所信仰的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李合林等政治教官上政治课时结合讲述，使广大官生了解事件发生的真相。关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则不时邀请军政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来校作革命形势与任务等专题讲演。其中有一次曾邀请鲁迅先生来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讲演，以及组织宣传队和“血花剧社”，举行军民联欢会等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由政治部主编的《黄埔潮》、《黄埔日刊》则随时收集发表本校各官生有关革命言论及社会名人在校专题演讲词，转载当时军政领号人在报刊所发表的革命言论，对校内外进行广泛宣传，使全校官生及社会公众识破当时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阴谋诡计。从而使军校保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浓厚革命空气。

周恩来主持广东区委军运初期，指示黄埔军校一、二期学生陈赓、周逸群等把在广东各军事机关部队的青年军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团结青年军人的一个革命团体，由周逸群主持该会会务，在中共广东军委领导下团结各机关部队青年军人，并以联合会名义参加广州各界群众团体举行的各种革命活动，表达青年军人的革命意志。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曾会同全国总工会，省港工人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在广州举行各界市民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大示威游行，遭到沙面租界英帝国主义军警开枪射击，造成“六·二三”沙基大惨案。在游行中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立即传到全国各地，显示了这次工农兵学商团结反帝斗争的伟大力量，也是青年军人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

具体表现，对于推动全国国民革命运动具有深远意义。

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把孙中山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学说为国民党右派势力造舆论，来压制和反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经孙中山亲自讲解的三民主义新内容。其目的就是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为当时蓬蓬勃勃的群众革命运动设置障碍，阻挠国民革命向全国发展。它是一个坚持反动立场与革命群众团体对立的右派集团，黄埔军校的右派也多参加在内。军校中共党组织为了维护国民革命顺利发展，在军校各种活动中，领导中共党员联合军校各派革命势力不断与之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解散后，蒋介石又在军校组织黄埔同学会，予以大力支持，并亲自控制，暗示他们要随时注意共产党在各军事单位的活动情况，并向他汇报，借以维护其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军事领导地位。

军校改组后的国民党特别党部于五月成立，受军校党代表指挥及政治部指导。熊雄当选为这届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同年十一月特别党部改选，中共军校党组织根据区委指示"团结对敌"的新情况下，曾转知中共各小组，在各单位推选特别党部委员候选人中，尽量推举国民党人。熊雄亦示意政治部只推举国民党员陈良一人，军校其他部门也多系推举国民党员为候选人，只有军官第一团营长范荩是加入不久的中共党员。选举结果，这届特别党部委员仍是左派占绝对优势。这就体现出军校国民党左右两派势力的强弱及广大党员的愿望，也表达了中共党组织及其党员对此次特别党部改选光明磊落的态度。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军校四期学生毕业，除分配在后方各机关及留守部队外，大都派到各北伐军中随军出征。其中中共党员只有少数留在本校及后方各单位工作，大部分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其新近成立的北伐先遣部队由叶挺指挥领导的独立团随军出发。嗣后陈赓、恽代英、聂荣臻亦由中共军委指调先后离开军校去北伐前线各地工作。军校中共"党团"成员只留下熊雄和我二人承担中共在军校党政工作，而由熊负责主持。中共军委负责人周恩来自随北伐军离开广东后，军委即在广州原办公地点设立军委留守处，由黄锦辉负责原军委与各有关单位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关系，直接与各单位中共负责人发生联系，传达区委指示，了解有关单位党的组织情况和处理所提出的问题。此后中共军校党组织工作则由熊雄和我与黄锦辉联系。遵照上级"团结对敌"指示，领导军校全体中共党员在各个岗位上，为军校培养革命力量而努力，以争取北伐的早日胜利。熊雄在这期间主持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始终坚持贯彻党的指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对破坏两党合作的言行，在各种纪念会讲话时或在报刊上，不断的予以驳斥，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壮大军校革命力量的声势。

当上海、广州相继发生"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消息传到黄埔军校，我们遵照中共军委留守处转知上级指示："保持镇静，提高警惕"，力促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常态，不使发生任何事端。数日后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忽然召见熊雄说："这几天广州形势很紧张，你应即离开黄埔，我可派一汽艇送你出虎门去香港"。熊当即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表示不愿离开黄埔，"如要强命我去，请允许我在行前与在校官生讲一次话。"方鼎英乃勉强答应，次日上午由熊雄向部分官生作了要恪遵总理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等简短的话后，就到码头登上汽艇离开军校。

我当时在场送熊登上汽艇向虎门开驶后，随即搭上班轮去广州军委留守处向黄锦辉汇报。黄听了我汇报上述情况后，要我不要再回军校，留在广州和他共商军校中共党员转移事

宜，并派交通联络员通知杨其纲暂且主持军校中共党组织工作。数日后黄即要我搭轮去上海江浙区委报到，从而我就转到上海军委工作。事后得知熊雄所乘汽艇驶至珠江下游不远的江心，即借口机件失灵停下检修，当时在江面监视黄埔的中山舰便派人登上汽艇将熊雄逮捕，押解广州投入公安局监狱，秘密将熊雄杀害。回想在当时情况下，只要得到党的通知，他随时都可离开黄埔。事实证明方鼎英派艇送出虎门一举，显然是当时反动当局串通勾结的预谋。

熊雄同志秉性刚毅正直，为党为人民献身革命气壮山河，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与崇高气节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敬仰与怀念！

在熊雄之后尚有肖楚女、杨其纲、安体诚也先后遭到敌人杀害，为革命而壮烈牺牲。肖楚女是军校有名的政治教官，在事变前早已因病去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医治，亦遭反动当局秘密杀害。杨其纲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担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又是政治部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在我离开黄埔后曾由军委留守处指派主持中共军校党组织工作，当军校反动当局接管军校政治部、迫害中共党员时，即为反动当局秘密杀害。安体诚是政治部宣传科长，当反动当局接管政治部时已离开黄埔，而其后由广州搭轮至上海，下船时被反动分子发现，报由上海反动当局逮捕秘密杀害。这些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而牺牲，他们的革命事迹将永远流传后世，受到人们的崇敬。

中共黄埔军校的核心组织——“党团”，自一九二六年四月成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时，刚好一周年。在这一年中，它领导了军校中约一百五十名共产党员进行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上面所忆述的仅其中的片断，尚未能表达其全貌。

（选自《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附〕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起源与发展①

刘　天

最初，在黄埔军校设有一个直接支部（其余〔后〕改为特支），直属于广东区军委。其时广东区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所以黄埔支部就直接归周恩来指挥。周恩来是浙江人，在旅法支部的重心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相继回国以后，曾一度任旅法支部的宣传部长。但一般说来，他在到广东以前，在共产党实在没有什么地位。直至民国十六年，周恩来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实在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所以以全力经营黄埔支部，以黄埔的共产分子来作他事业的基础，形成所谓“赤黄埔系”。周恩来后来在共产党内地位的发展，全恃此为基础。

---

① 据刘天《赤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节选，另加题目。但作者立场反动，对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作了歪曲和污蔑，原文亦予以保留，供读者批判。

第一期时代的支部

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时候，学生数目不多，但因第一期学生是由各省秘密招来，所以CP分子所占的百分数颇不少。那时在区军委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的“黄埔支部”。第一个黄埔支部的书记是蒋先云，宣传干事是王逸常，组织干事是杨其纲，候补干事是许继慎与陈赓。总之，支部干事会的五个人，都是第一期同学。那时周恩来在CP方面，是广东区委兼军委书记，在公开工作方面，是军校政治部的代理主任，所以黄埔支部是直接在他指导之下。而所谓赤黄埔系的基础也完全是在第一期同学。上述支部干事会的五个人，当然是赤黄埔系的干部，其余如李之龙（中山舰事变主角，其后脱离共党）、刘仇西（即其后赤匪伪十军团总指挥，最近被俘，各报均误为刘畴西[①]）、黄锦辉、伍中豪、陈毅[②]、杨溥泉、卢德铭等，也都是第一期中的CP活动分子。

第二期时代的支部

黄埔CP之成分主要为学生，故支部之组织，亦常以学生之期数为组织单位。第一期同学毕业，第二期学业开始，因一期同学，于毕业后分派各处服务，故支部不能不改组，故第二期时代之支部，以杨其纲为书记，余洒度为组织干事，周恩来、周逸群为宣传干部，王逸常、麻植为候补干事。以上五人，杨、王为第一期，余、周、麻三人则二期也。其时赤黄埔系之势力，已渐形成。但除黄埔军校外，在外间之势力，尚未扩大也。

第三期时代的支部

殆二期毕业，三期开始，黄埔支部又加改组，仍以杨其纲任书记，曹素民任组织干事，段子中任宣传干事，焦启恺任候补干事。此四人中，除杨为第一期（时杨在军校政治部工作）外，其余均为第三期同学也。但此时赤黄埔系之势力，已由形成而扩大，除军校本身外，复向外发展，其最重要者，为第一军、海军局、政治训练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等。青年军人联合会，为赤黄埔系之机关。赤黄埔系势力之扩大，其主要原因，实由于军校本身势力之扩大，肃清杨刘，驱逐反侧，广东之革命的军事胜利，日益发展，第一二期毕业同学，除一部分留在校本部及各学生队中工作外，复有一部分分发在第一军等处，共党到处播种，故赤黄埔系之势力，乃日益发展焉。

三期时代的发展

第三期时代，黄埔支部仍由杨其纲负责，但事实上，杨其纲仅成一技术书记，支部干事会亦仅成一技术机关，支部大权，在鲁易、聂荣臻之手。鲁、聂均非黄埔同学出身，但为周恩来之亲信，其时鲁易由军校政治部秘书升为副主任，（按：鲁为湖南常德人，留法勤工俭学出身，其后，曾任洪湖伪苏维埃政府主席，廿一年被捕正法），聂荣臻则为军校政治部秘书兼组织科长（按：聂为四川绥定人，亦留法勤工俭学出身，现仍为匪区中重要人员），此两人即为军委所派在黄埔指导黄支（黄埔支部之简称）。盖其时周恩来本人，已辞去军校

---

① 刘畴西，也是刘仇西的名字。报刊所载不错。

② 陈毅不是黄埔第一期学生，而是武汉分校的教官。

政治部代理主任之职，任政治训练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黄埔方面已少去，但黄埔为其基础，故不肯稍为放松，而委其亲信鲁聂二人代为负责，但最高职权，固仍在周恩来手中也。其时赤黄埔系之势力，已由军校向外发展，最主要者为第一军，第一军军长由蒋校长兼任，中下级军官以黄埔同学为多，师团长亦多为黄埔教官，故黄埔共党之在一军者亦甚多，周恩来本人，自任军政治部主任，黄埔第一期中之CP活动分子，如黄锦辉、刘仇西、王逸常等，亦均在第一军中任政治工作，故一军支部之书记虽为熊雄，而主要成分皆为黄埔同学也。其次为海军局，因李之龙（第一期同学）任中山舰长兼代理海军局长，大权在握，故CP分子亦甚多也。再其次为政治训练部之政治训练班，因主任系周恩来，学生均系黄埔生，亦均系左倾之黄埔生也。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纯系赤黄埔系势力范围也。

黄埔支部之扩大

及第三期毕业，第四期入伍开学，因黄埔军校之人数增加，CP分子亦增多。其时不仅学生增多，且教职员中之CP分子，亦增加甚多，尤其是政治教官，盖黄埔军校虽开办时即设有政治部，但一向无政治教官，直至三期毕业，四期开始，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设政治科，故聘请政治教官极多，此种政治教官，什九系著名CP也，如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肖楚女、高语罕、安体诚、沈雁冰①、张秋人、韩麟符、陈启修等均是也。故军委方面，以为非普通支部所能容纳，乃将黄埔支部改为黄埔特别支部，另设黄埔党团，以为黄埔CP方面之最高指导机关。黄埔特支书记仍为杨其纲，党团书记则为熊雄（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党团干事为恽代英、安体诚、杨其纲等。

（《社会新闻》第10卷第7期1935年版）（选自《黄埔军校史料》）

〔附〕火星社的成立

黄　雍

黄埔军校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了一部分党员参加校务领导工作和一部分党员参加受训，但人数不多，难于适应当时工作发展的需要。这时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党在军队和军校中组织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而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又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加以团结教育。因此，由一部分共产党同学和一些同情党的同学效法列宁在一九〇〇年创办《火星报》的意义，组织火星社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为吸收党员作些准备工作。

火星社是当时黄埔军校内唯一的革命组织，成立的时间约在一九二四年底，其时周恩来同志已到校担任领导工作，第一期学生已将届毕业。它是由第二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即陈公培）、萧人鹄、吴振民、陈恭、谢直渠等倡议组织的。参

① 据《汉口民国日报》载：沈雁冰是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但未在黄埔本校任教官。

加这组织的人除当时在校一部分共产党员学生外，还吸收了一部分接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左派学生。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前后，参加火星社组织的人数，第二期学生有六十余人，第三期学生约三十人左右，军官佐中参加的人数甚少。

火星社成立不久，在一九二五年初，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特别党部进行改选（国民党在各军校皆设有特别党部）。火星社运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展开了竞选运动，结果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获得完全胜利。当选为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周逸群、王伯苍、吴明、陈作为、罗振声（不久脱党）、黄锦辉（候补执行委员，旋即加入共产党）等人，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蒋介石仅得六十票，没有当选，后来由党代表廖仲恺推荐，才得当了一名监察委员。

火星社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为全校民主创了一个先例，同时也震惊了蒋介石及校内反动派。后来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把这件事作为反共的借口，说成是“共产党借国民党名义扩张势力”。

同年九月，黄埔第二期学生毕业离校，火星社亦随之解散。参加组织的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均已先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火星社活动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但在对当时校内反动派（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选自《黄埔军校史料》）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宣言*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

列强帝国主义，以经济侵略为目的，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国因此便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

帝国主义利用各派军阀，以遂其他们侵略的野心，军阀间造成了战争，我国因此又成了兵匪军阀帝国主义共同捣乱的残局。

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因外国大量货物侵入，不能与之竞争，迫于不得不失业。同时农民因生活品价格日增，农产品仍沿旧价，迫得不能维持生活，以致失业。他们失业后，只有“兵”“匪”两条末路可走，稍有旧道德观念的，于是乎就来当兵。

当兵的目的，一面是赚钱养父母妻子，一面是要救国卫民，怎奈空受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用，造成了他们当军阀的资格，结果：

（一）军阀剥削国民脂膏，扣饷自肥，当兵的非独不能养父母妻子，甚且不能自养。

（二）军阀在外吹起“养兵卫国”的假牛皮，在军营内下起“服从为天职”的千斤锁，当兵的便成了军阀唯一的工具。

当兵的一日不觉悟，军阀及帝国主义一日不倒。打倒了袁世凯，又有段祺瑞，段祺瑞倒了，又有曹琨吴佩孚，曹吴倒了，段祺瑞又出台了，同时仍一样受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压迫。

军人自救，即所以救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团结即是力量！

联合即是幸福！

（原载《中国军人》创刊号，1925年2月20日）

〔附〕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①

王 柏 龄

开校三四个月，其一泻千里的进步，固足使人惊叹；而党部本身，受着这种刺激，也朝气蓬勃。

---

*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领导组织的革命军人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解散。

① 据王柏龄《黄埔创始的回忆》第三篇（丁）“孙文主义学会”节选，另加题目。

学生运动啦，工人运动啦，妇女运动啦，农民运动啦，海员运动啦，都一时风发云涌，不可一世。尤以学生运动，以中山大学为大本营。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产运动，也深入各个阶层。他们把持了中央党部一部，紧握新闻舆论机关。说他们的理论到实力，无不如火如荼，但是十足的买空卖空。年轻认识不清，意志不定的人，多加入了他们的秘密组织，在我们各组织中，发生其党团作用，弄得鱼目混珠，简直似乎为他作嫁。有心人，悬然忧之。如任此以往，不必一二年，共产党就可以偷天换日的，替代国党了。在上层阶级的同志，因为总理定的策略，不能不给面子与中共同志，其内心实在忧虑得很。但是下层同志，看见中坚同志都这样拍他的马屁，于是从卑劣的心理，求利的想头来加入呀，表好感呀，磕头呀，因为中共的人，也时时显点小神通给他们看，如向高级同志保荐啦，讲人情啦，倒是一说一个准。这种倾向，可真不〔得〕了，投机的，向来反对共产主义的，现在都是马克思信徒了。如我教授部内，汪精卫介绍为上尉无线电务员的缪斌，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他如周佛海等人更不必说了。连我自己也奇怪起来，深深的研究一下《资本论》。当时思想不安定的，后来环境逼迫的，我的副主任叶剑英等，开始发生了动摇。①

在这种大难危怯之下，如何是好呢？如何使党免于危险呢？绞脑筋，悲心志，忠实有远见的总理信徒倒还不少。大家在想办法，居然被我们想到了。就是以研究孙文主义为目的，来组织一个学会。既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们孙文主义。难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会来加入吗？如此我们就可以与他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断不会被他卖空买空，偷天换日的了。我们有了这基础，才说的上合乎环境以求自存，并不妨碍到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虽恨入骨髓，但是无法可以攻击。于是由贺衷寒、潘佑强等去向廖党代表说我们这个企图，要正式准许我们成立。廖党代表一听之下，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嬉着嘴说：“我正焦虑了许久，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居然被你们想着了。好！好！！就这样子进行罢，我为你们后盾。”（疑心廖先生卖党者听讲）。

大家听到廖先生意见后，俱喜之不尽，就按手续成立，就征求会员。武的呢，以黄埔军校为目标，文的呢，以中山大学为目标。尤其对广州香港的工人，远而至于上海、北直的青年，均征求他们入会。我呢，躲在学校里，做他们的后台。

（《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1939年版）（选自《黄埔军校史料》）

---

① 动摇，是作者对叶剑英的污蔑，它正反映了叶剑英是抵制和反对王柏龄的反共活动。

一九二五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之概况*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慕

本校政治部，在工作范围方面，经过两个时期：军校与党军混合时期及各自分立时期。在组织方面，也经过两个时期：前一期分做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工作；现在是在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两科，另有书记办理部内庶务。为便于叙述起见，以本部工作概况为主体，而附说本部组织的经过。

现在叙军校与党军混合时期的本部工作。

我们虽是叙述十四年的本部概况，为使读者更加明了起见，不妨很简地叙几句本校自开办以来政治部之工作。

本校第一期学生不到五百人，当时学校房屋舒阔，设备完全，有大的俱乐部图书室；学生下了堂便向这些地方拥。每星期都有总理、校长，廖党代表，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诸位先生讲演。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杨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到上海去了，因此中间有好几月政治部没有主任。但当时政治部只有两位担任纪录的书记，本无具体的组织，所以虽然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邵元冲先生继任主任，工作与前无异，唯举行了两次政治讨论。总理北上，邵先生随着去了；商团事变（十月十日）以后，蒋廖汪胡诸位先生都忙于应付时局问题，演讲也少了，这时政治部很闲淡。

十三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这时第一期学生刚毕业，第二期已早入校；教导团已成立两团。本部一面要担任兵士政治训练，一面要继续学生政治训练，乃不得不增加部员，加以组织，使工作易于进展。这时部内组织，分为指导，编纂，秘书三股，而教导团各连党代表，也统属于本部。十三年最后两月的政治工作，大概如下：（A）出版：《士兵之友》，《壁报》，每日用油印印出发给学生士兵。（B）举行第二期学生政治讨论。（C）制定学生，官长，士兵各种调查表。（D）规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E）统计学生成绩，及官长，学生，士兵调查事项。讲演一项，因教官缺乏，平均每星期仅一次。

在十三年之终与十四年一月之间，学生都迁住广州北郊，黄埔专住教导团。本部也随学生迁住广州，而留一小部分人员在黄埔经理教导团政治工作事。这时本部工作，多偏于学生方面，扩大图书室，增购书报，创立体育会，备办各种体育用具；政治讨论及政治问答，继续举行，每星期有一次或二次讲演。这样工作不久，遂有二月二日第一次东征的发生。

---

* 原题为《一年来本校政治部之概况》。

在未出发前，由本部内第二期学生中调来能说广州话，客话，潮州话之学生约二十人，组织宣传队；并预先印就告工人，农民，市民各种传单。而告敌军士兵传单，则于出发前由飞机散在石龙天空散放。一星期后我们到石龙时，犹见此种传单残纸。

二月二日，本部人员和宣传队员回到黄埔，当晚将应用之文具、宣传品、油印机等准备齐全，并每人领取驳壳枪一支，子弹百发。

二月三日本部全体人员由黄埔乘福安兵舰随校本部向虎门出发，当晚到太平。次日，宣传队出外向人民讲演，开联欢会，散传单，贴标语，带着一群小孩在路上唱国民革命歌，军民非常融洽。

自经太平后，队伍行进时，本军人员及宣传队在前面散传单，作简单之解释。军队驻扎时，即向当地社团交涉，开军民联欢大会，解释本军行动及本党主义，遍贴："不拉夫"，"不筹饷"，"不占民房"等简明标语。自太平以后，得人民报告，说龙冈淡水以下，人民受陈逆宣传，非常仇视革命政府军队。宣传队一面切实戒备，一面努力宣传，远在队伍之前，用总理相片及各种图书引动人民，好和他们谈话，使他们减除畏心。等队伍经过，他们都站在门前观望，毫不逃避，有时人民已逃上山，宣传队用传单画片招他们下来，叫他们不要怕！他们便真的不怕了。缺乏夫役的时候，也由宣传队向各村交涉雇夫。淡水之战，死伤多人，掩埋尸身，调查及安置伤者，都由本部派人监督办理。拿住了敌党，也由本部派人审问。各地党部，也由本部派人筹办。

自海丰以后，被陈逆封禁之各乡农会因本军到来乘机恢复，对于本军表示非常好感，因之本部工作，更形活跃。不独在各处召集盛大之联欢会，并派人到各乡宣传。三月五日大军到揭阳，七日本部即派人到汕头，召集联欢大会，满街遍贴标语。十二日棉湖战后，埋死救伤，在汕头筹备病院，皆由本部派人监督办理。

潮梅完全肃清，政治部随校本部驻兴宁，而在梅县，潮安，汕头，五华各地设分部，派一人或二人办事，一面担任向群众宣传，参加各种集会巡行，一面筹备各地党部。五月二十日回师广州，征讨杨刘，政治部复随队作同样宣传工作，汕头分部直到许总司令离汕时，始行撤退。

当东征时，第三期入伍生入校，后方政治部由包惠僧先生代理主任，并增加人员，从新组织，进行学生政治训练，出版了革命之声，壁报，恢复俱乐部，举办工人补习学校。

七月教导团改为党军，与学校分离，自此以后，学校与是队政治工作，也各自分立了。本校政治部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汪精卫先生和邵力子先生为正副主任。这时，第二期学生预备毕业，第三期入伍期满，已编为正式学生，每星期举行政治问答外，尚有汪精卫、胡汉民、邵力子、周恩来诸位先生讲演。

九月汪先生被任为本校党代表，不能兼顾本部事，遂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邵力子先生和鲁易先生为本部正副主任。邵先生因事赴上海，部务全由鲁副主任担任。从这时起，本部重行改组，依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之组织而加以扩大：正副主任之下设秘书，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两科，而以书记三人办理部内庶务。工作方面：则将壁报，由油印改为铅印，专载重要新闻，附以简短论文。另出黄埔潮半周刊，专载政治论文及时评。政治问答，政治讨论每星期举行一次，讲演则由汪精卫，鲍罗廷诸先生轮流担任。第四期入伍生历次入学政治考试，下级干部之政治讲演，皆由本部派人担任。最近复增购图书，翻印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编印本党重要宣言集及中国国民党史概论，已印就者有汪党代表讲演

集。此外廖党代表追悼会，双十节庆祝升平大会，苏俄八周革命纪念，廖党代表百日纪念；反段示威大巡行等群众运动，本部皆派人参加并散发传单。

当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团入校时，本部因他们不住在校内，对于分发出版物及举行政治问答，政治讨论，以及履历调查，都不方便；于是商准汪党代表每两连由本部派指导员一人驻队，担任指导，监督及调查学生政治工作。后来团指导员与各连排长发生纠纷，奉汪党代表命撤销指导员，另外厘订办法。所以入伍生第二团政治工作至今尚不能有所进行。第一团入伍生驻扎本校较近，比较便于工作，现已开始作政治问答政治讨论，出版物也能多少领受。

第三期学生最近几日就要毕业了，此后本部工作的对象，当然是第四期入伍生。现在本部预定对于第四期学生政治工作的计划，大概如下：（A）聘请常任政治教官三四人，担任定期讲演。（B）扩充壁报，黄埔潮半周刊内容，编辑小册子，翻印党的书籍。（C）严格的举行政治问答，政治讨论，及各种政治检查。（D）设置大的俱乐部、图书室。而以（E）派遣各队指导员为贯通本部一切政治工作之枢机。

（原载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黄埔潮》第24期，1926年1月1日）

一九二六年黄埔军校之政治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

熊　　雄

中国军队中之有政治工作，自本校始。从开办到十四年终，这一年多当中，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在革命过程中已有相当的表现，姑且不谈。现在且把十五年“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叙述出来，一方面聊供一般政治工作人员的参考，另一方面还要希望同志们的批评，俾今后之工作，有所改进。这个痴想，绝非个人的谦抑，实革命利益所在，自应如此。兹就工作经过情形，特分三个段落，叙述如下：

第一，从一月到二月的工作——

我自东征归来，一月六日即奉命为本校政治部主任。当时第三期学生尚未毕业，部中现象极形涣散，其组织，主任、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两科，职员不过二十余人；所有工作亦颇简单。对内工作：只出黄埔潮及壁报两种，共印五六千份；在学生中，为客观条件所限，尚无系统的政治教育，只有零碎的政治讨论会。到十五日以后，大部分学生已毕业出校，只留三百人组织军事政治训练班，加紧教育，预备校中的下级干部。对外工作：参加各种民众运动。至党与政府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机关公布后，本校改组工作，即从二月一日开始，旋由党与政府任命蒋中正、邓演达、严重、邵力子、熊雄、陈公博、冯宝森等七人为本校改组筹备委员。在二月整个工作中，除参加全校工作外，政治部组织上已有变更，由原有两科已增设一事务科，人员亦略有扩充，并聘政治教官五人，曾定官长一月的政治教育计划，考试学生七千余人，阅卷万余本，并将政治教育大纲制定，本校改组事宜，亦已告竣。

第二，从三月到十月的工作——

三月一日第四期新生即已入校开学。本校改组后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就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部依据这个原则，故对学生官长兵伕，乃有贯注全部的政治教育计划。在学生方面，因兵科不同，而决定实施军事与政治教育的进度，例如：步炮工各科，则以十分之七为学军事的时间，余为学政治的时间；政治科则反是；经理科亦可类推。本部组织亦随本校改组，略有变更，主任及秘书之下，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全部职员按编制已达七十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十余人，临时政治教官有十余人。至宣传科的工作，对于宣传品的发行，前在总政治部军人日报副刊出有黄埔周刊，在本校出有黄埔日刊，由六千份增至二万六千份之多，尚有革命画报每期刊行万份，此外出有丛书、讲义、各种纪念册及小册子等，综计八个月内，共出刊物已达千万份以上。发行地点已有三四千处，几普遍全中国各省，和东西

---

* 原题为《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

洋各大埠。至指导工作，在学生方面，曾开过政治讨论会十余次，政治问答及政治测验十余次，学生大多数都有很浓厚的兴趣，实际上自多裨益。指导来宾参观，八月内亦不下万余人，每次都有切实的宣传，能予来宾以较深的印象。在民众方面，每次群众大会，都领导学生参加，并有扩大的宣传，给学生以实习的机会。在沙河野营演习，曾组织政治科实习宣传队，及军民联欢大会等。至党务科工作，因校中党务，未有很大进展，故无足述，不过只有调查抚恤诸事。总务科工作，纯系关于本部务财事务诸端，亦无特别可纪之事。综合第四期八个月的工作，对于学生似看不出有若何成绩，从经费上来看，八个月总计不到十万元，以全校经费为比例，不过百分之一，本部人员以全校职员为比例，不过三十分之一。至在本岛工作，曾有平民教育调查及进行计划。北伐后为巩固后方计，曾与各机关同志有黄埔农工商学兵联合会之发起，对于民众运动，亦有相当之成功。

第三，从十一月到十二月的工作——

十一月十五以前，为第五期筹备时期。关于本部工作，曾将从前政治教育大纲，加以修正，并随本校设学生队的组织，而设各学生队的政治指导员。此外又因新俱乐部行将告成，规模宏大，除原定编制之管理员外，复增设服务员数人及音乐教育官二人，使之协同管理。原有图书馆之外，又拟设政治教官特别藏书室，并拟扩大书报流通处，俾便教官学生购阅。至各科内事务，与上期无甚变动，大都继续进行。在本期中曾制定校歌及黄埔怒潮与牺牲两歌。全部各种计划，至少拟较上期须扩大一倍，以供给实际的需要。并拟筹设校园，以为全校人员游息之所；建设总理室和革命博物馆，借资纪念观摩，以补教育之不逮。按照工作现状，预测将来，欲要得到良好的结果，在物质方面，自应予充分补充，在精神方面，更须有最善的努力。至一年来临时特别工作，亦有足述者：当北伐开始，雄曾与恽主任教官代英，受邓主任之任命，参加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三天，大会七天，北伐进行计划及北伐宣传队之组织咸多参与。第二军内本校所属第一军官补习班学员三百余人，曾派雄为毕业考试委员长，亦有一星期之工作。尚有本校附属军官政治研究班曾办两期，学员亦有一二百人之多。最近政治炮工各科奉命开赴武昌，亦有途中政治工作的规定，及宣传队与调查队之组织。上周接到总部来电，前方将送俘虏军官一千七百余人来校，正在筹设军官政治训练班。此外尚有兵夫教育委员会，以谋全校兵夫工人政治教育之普及，尚拟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以谋本岛附近平民教育之普及，现正与各机关筹办农村教员养成所，以利进行。至全校官长教育，自开学后，即聘请党中先进同志，每周来校特别讲演两次。此为本期工作之大概，至详细计划，自难一一纪述。

综观上述的三个段落，“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虽仓卒书成，没有很好的系统，然亦可以窥其一班。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固可认为有相当的进展，能予学生与民众一点帮助和影响；但缺点尚多，终须弥补。要在担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人们，如能深明相互的需要，贯彻协同的精神，补救发展，都非难事。！

（原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过去之一九二六年》，1927年1月）

SY一年来活动经过报告

——对少年国际的报告

（节录）

本团在去年下半年（第二次全国大会以后）之各地活动，已详见本年一月之报告（由中央代表士奇同志携赴海参威）。今再将本团从今年一月起至四月止之活动概述于左，必须与前次报告参看，才能明了本团在过去之一切工作。

……

全国劳动运动状况

广　州

广州的工业不发达，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电灯、电话与兵工厂等是工业人工，手工业甚多，（如油业，建筑，米业，驼载，搬运，茶酒店，）在表面看似乎工人都有组织，但多是空头招牌工会。许多工人加入国民党有的是盲目的，至多不过是友谊上同情的参加。还有些工人是由一工会号称全体加入，实际不过是互助社（国民党劳动运动机关）为运动选举投票使他们加入的。到现在改组以后，有些确是一部分感觉切身利害关系入党切实做国民革命工作的。计粤汉路与业余工社（三百余人）与兵工厂（三百五十余人）共加入五百余人，连职员也在内，此二处之工人虽加入而不甚觉悟，故此二区分部的执行委员均是处长和职员，而非工人份子。海员虽已成立工会，但海员群众多对工会淡漠，更论于政治运动矣。至于在其余手工业工会中做国民活动的多属旧党员乘机作个人活动，故工人了解国民革命之意义者甚少。在我们支配下的油业工会与建筑工会加入国民党者甚少，共约二百余人，此二团体实为我们做国民革命运动之根基也。

广州之工会组织无大发达。已有的海员，机工，轮渡，以及其他小手工业均日形涣散。唯粤汉之车务与机务二团体合为机科工团（现改为业余工社）锦纶土丝织造工人本分备为十八行，甚为涣散，经过一次请愿，渐趋一致。油业工会已在三处成立三俱乐部，准备改组，两个联合总机关如工联会与总工会之互相攻击渐趋和缓，此数者号为统一运动之趋势可视为好现象。

广州一年来之罢工，仅有二次。一、去年九月油业工人罢工，相持三月，因东行不履行条件，至十一月底终止，完全得胜。二、米业工潮在本年一月，经二月之久，要求加薪，得到部份胜利。

在广东工人中的教育宣传有四种刊物：一、理发月刊，无政府主义者主办，专尚空论。

兵工周刊由我们同志编辑。潮州之潮工周刊尚好。至香港所出之海员月刊与劳动周刊则完全不知所谓。

工人教育机关有兵工业之青年工人学校与工人子弟学校。油业工会之三俱乐部每周召集工人讲演一次，亦可视为教育机关。

香港

香港是外洋货物输入中国，中国原料输出欧洲所必由的口岸。经济主权据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手。埠内一切生活品直接间接归外国资本家和洋奴垄断，生活程度高，工人收入仅足糊口，尤以居住一层最感痛苦。

新式工业以机器，造船航业为最发达。各种手工业次之，织造工业及苦力又次之，运输工人为数亦不少。香港新式工人（海员在内）估十余万人。工金最优的要算机器工人与海员，每月工金约三四百元，其余小手工业(如木匠、泥水匠等)次之。此种工人不难一跃而为资本家，故不感觉痛苦，但多数感觉外力压迫。其次感痛苦的为运输工人，最苦的为店员及织造女工，此种工人每日工资在五角以下。

香港手工业工人都组织有工会，但不甚团结，船厂工人至今未有组织。海员工会涣散的很，渐变成工人间的官僚组织。香港工人以居外力压迫之下，故爱国心较内地工人为烈。颇倾向国民党，惜国民党以前不能组织他们成党，无心宣传，不善利用此革命之潜势力。

四川

四川尚无工业，唯有手工业。我们在成都的同志曾改组成都劳工联合会为各业（以机织帮，水丝帮）之联合机关，复在各帮中进行十人团之组织。

武昌

武昌有纺织工业工厂七八个，造币厂工人共一万五千余，此等工厂中童工与女工占与五分之四，余为男工。汉口亦有香烟厂与纱厂，童工与女工均占大多数。作工时间为十二小时至十八小时。工银童工最低的每日只有八分，一角。最高的每日只有五角。我们同志除在造币厂，麻布局及电话局各有数人外，其余纱厂的运动，完全没有插足进去。

上海

上海是中国工业的最大中心，以纺织业，造船业，铁工厂，香烟工厂为最多。但上海虽有三四十万新式工人，并无一真正工会组织，即有工人工会，除海员工会外，仅有一南洋烟草职工会。上海工会不发达的原因：（一）由于租界侦探密布，压迫很严。外人统治租界，由他们本国的经验，已熟知劳动运动之可畏，故预防其发生亦甚周密。（二）由于中古时代遗传下来之秘密组织（如青帮，红帮等）不可打破。此等组织包含巡捕，侦探，工人，流氓，内部阶级制度及纪律极严酷，遇有违反该帮规则的即处死刑。有许多工人寻得工作由于一帮的首领介绍，如欲组织工会，乃为脱离一帮羁绊之表示，此为首领所不容许者。且该帮杂有侦探，巡捕，对于不法行为亦可侦知。（三）由于纺织业技能简单，从各地投奔上海者很多失业的人，如有组织可以另得新工人。且年来中国棉贵纱贱，纱厂多有倒闭，工人更不敢有所行动。至于技能熟练之工人，则或在极严之监视下(如船厂工人)无组织工会之可能，

或以生活优裕，（如铁路工人）无组织工会之必要。故上海劳工运动，工人虽多较各地为退化。上海有许多冒牌工人的团体，如纺织工会，安徽驻沪劳工会，中国劳工联合会，均是折烂污的高等流氓组织而成。多是一二人顶着一个招牌，招摇撞骗。有时一人组几个工会，对时事打电报，逢纪念日开会。而且他们与侦探联络，租界外人亦知其为无工人之工会。此等假工会可以阻真正工会之发生，故亦任其存生。他们对真正的工会运动是尽力防碍的。虽然他们在报上开纪念会时如何热闹，然而我们的同志不敢与他们合作。因与他们一接洽，即有被侦探注意之危险也。我们在上海的劳工运动须与国民党合作，且已与国民党合作。近方在杨树浦及吴淞二地办两个工人补习学校以为入手之地步。一方亦对于各种工人之接洽与调查都由我们同志以国民党名义去做。上海除劳工运动外，尚有一商店店员联合会，为我们同志所组织，现有会员二百人左右，正在发展中。

我们的最重要的运动要算是北方的铁路运动了，北方及杨子江中部铁路工人，在C.P.指导之下，组织了一个铁路总工会。各铁路虽在二七失败之后，工会被封，活动分子被开除，但有一二工会仍是秘密的存着。工人间各有为C.P.组成小组教育训练的。在此时铁路工人，颇有感于团结与组织工会之必要。他们在此时固无工会运动，受职员压迫欺侮，回忆以前有工会时之受人尊敬，自然发生工会要求。不过此时北方军阀势盛，铁路工人难有公开结合。只有由铁路总工会不时派人到各站去巡视教育，助其组织。我们在铁路上只有三处有地方团。有二处工作完全缺乏指导。闻铁路上青年工人极多，我们如经济充足，则为振作全国劳动运动之命脉起见，实有派人久驻该地以执行青年工人教育及组织工作之必要。

安　源

安源在工会成立一周年之后，近颇注意青年之工人运动，并已于工中人中发起了一青年工人同乐会，训练一班青年工人作我们的同志。此可视为我们公开的青年运动之萌芽。

全国农民运动状况

广　东

广东农民受大地主，军阀及土匪三种痛苦甚深，故其自卫运动与组织，亦是为反抗此三种毒害。去年海丰农会因飓风为患吹倒房屋及水淹没田苗，乃向大地主要求减租，被陈炯明解散，捕去并监禁农民廿余人，以至该会进行停顿。但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等处，均因此恨陈军入骨，常以无枪弹故，不能反抗为恨。该地农民现虽不能反抗，然将来必有爆发之一日也。

为反抗兵匪骚扰，顺德曾发起组织农团，以青年农民工作余暇，为军事训练，担任保卫乡村。他不是一农村农民的机关，而是有勇气的农民的结合。现已成立者只有一村。邻近各村，尚心存观望。

除农团外，尚有民团之组织，系募壮丁编成队伍，由教警训练，保卫乡里。此种民团枪械很多，实力雄厚，但民团多劣绅所操纵，变成乡村中的军阀。有的尚能du御北军进攻广东，可利用以为革命助力。有一二处农村义勇团（即民团）有我们同志在其中教练。

四　川

四川各县，曾有抗捐团体之组织，且有九县之联盟联合行动者，皆民党人反抗敌军苛捐之行为。我们同志在此等团体中活动所得经验如下：

一当农村运动时、一种反抗行为在未胜时可援助，已失败及既胜利后，即不好插手。如在此时加入活动，易得帮助旧首领，不能培养民众力量。

福　建

福建惠安在今年一月曾发生过一次大惨剧。该地军阀王永彝，为抽收烟捐，竟布告勒令农民以其几分之几种鸦片烟。凡不种的，到烟浆收刈时，亦照已种例收税。农民种烟，本为赚钱，经种种苛捐，（下种时有捐，收割时有捐）不但无利，反遭奇祸，乃相戒不种。自此布告一出，农民甚为激昂，乡团结合推及数县，各村武装，互相守望，以备军阀来攻。其实军阀以农民抗命令，断难姑息，即调兵三团进攻惠北各乡。乡团组织本尚幼稚，且惑于调停之说，并未戒备，北军出其不意，遂如摧枯拉朽。王又下令，遇乡即洗剿，所到之处，逢人便杀，虽妇孺不免。山腰乡庄姓，死者千余人，附近之坝头乡，居民数万户，全告焚如，死不计其数，哭声震天，被毁者达十八九乡，死于火者数百人，死于枪者又约千人。在此次壮烈的农民反抗中，我们只有一件可惜的事，即是福建尚无地方团，我们同志无人参加此次运动。

湖　南

湖南岳北的农民运动，已见第二期团刊上篇一九二三年下年之各地状况中记载。北岳农民失败原因，在于农友们太无纪律，太骄傲，个人的放纵行为过于惹起地主的反感，致使他们请军队将农会解散，一时农民运动昙花一现即归销沉。现在湖南同志，专注意于民间的文化运动，以平民教育为工作，进行乡村教育。

江　西

农民运动，在江西有乐平的抗税运动，马家村前因蔡成勋预征丁漕，无力完纳。群起环请知事从缓催征，致触刘知事之怒，派兵捕杀农民五十余人，焚毁民房三百余栋。近闻马家村农民，自惨遭焚杀后，无家可归，加之附近该村之各埠，尚驻有重兵，严查该村农民之往来行动，致该村农民，虽欲回村支架茅屋暂行居住，亦不可得，遂致男妇老幼，相率而流难转从于他乡者，计达三千余人。月前曾派人赴南昌地方检查厅控诉而检厅因权力关系，不敢受理，嗣复拟公推族绅马骎（系第一届省议会议员）赴京请愿，而马骎又以北方政局败腐，决不能发生效力，不肯前往。于是一般农民，愤恨异常，竟于日前乘刘知事下乡之际，邀集数十人，各怀利刀，拦路行刺，奈短刀虽利，究敌不过无情之情枪，结果又被捕去十余人。现在官厅对家村之查拿，愈逼愈紧，而农民因流离失所，对于官厅之仇恨，亦愈结愈深，已一面集资派人赴沪等处，联合赣籍军政要人，共图雪恨方法，一面团集丁壮，从事于刺杀贼官之进行。刘知事见事已不可收拾为避自身危险计，目前已电省辞职，闻蔡成勋拟将其他调云。

⑥

陕 西

驻防陕西渭南之二十师四十旅，自旅长孙植孚令重其侄儿孙秉文充任县知事以来，百般苛敛，大施搜刮手段，该旅在正饷以外，每日向人民并索取麦子三十石，银洋三百元，时向人民要求车辆，拉牲畜。近因招收戚友，在渭讲武，无房可容，乃派兵下乡采伐树木。该兵士每遇树木，不论大小不问曲直，辄呼木工采伐，有赂以银元者，则转而之他，否则掠伐以后，强其送县，大烟茶膳，且要树主供给。前因河南土匪猖獗，急欲出关，又向人民索取开拔费二十万元，名曰借款，实无归还之望。此款收清未几，又以阳历年关难渡，复派出六万元，限八日交齐，令出之日，即派军出乡勒收，全邑顿现阴惨之象。统计每亩之田，出款已逾十三四元，兼之去岁民贫，无法支持，不得已发出鸡毛传单，一日夜即传遍全县，乃定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县人民，无大无小，各携农具，直奔县城而来，知事闻知，即协同团局，差局，教育局，商会……诸绅士，出城劝谕。当由人民要求一不支差，二不出款，知事一一承认。有田德全者，自居绅士，强作调人，甫说，（那末准其减轻数目），即被众人一拥上前将头打破，知事吓倒在地，忙向众人叩首，口呼一概豁免，几不成声。旋闻兵士开枪，打死人命，知事始匍匐入城，紧闭四门，只站在城楼向众农人说话。农人虽被死一人，受伤十余人，农众仍争先恐后，兵士无法，只得关门固守。不意闭门之际，适将某排长闭至门外，众农民群起追击，某排长行走敏捷，始免于难。后经知事百般劝谕，始于廿七日黎明散去。

中国的农民运动，就所上述各地情形，可见多是反抗军队及兵匪搔扰，与反抗苛税重征。中国农村进化原不均一，就湖南省言，湘西一带土地肥沃，人口较少，故农人生活较好。无土地之农人较少，雇请长工每年须一百串、一百五十串，待遇皆极优良。佃农亦被地主尊视，佃舍亦极廉。半途增加佃舍之资，可谓绝无之事。如衡阳一带土地较少，人口较多，无土地农人占大多数。地主对于佃农十分苛待，除付佃租外须送鸡鸭等物，每年须为佃东作工数次，约一月。地主可随时增加佃金，有欲佃田而觅到半年或一年。长工每年至多不过六十串至八十串，或有不须工资，仅稍给以旧衣吃饭，亦可雇得工人者。至于短工，在农作不忙之时，例规无有工资。贵阳州一带，工作皆为妇女担任。此三种情形见于一省，可见交通不发达，人民不迁徙，遂有此种之差别现象。据人说湖南极僻之县尚有不输入洋布者，更可见其尚未受资本主义之剥削与侵入。中国农村运动须视各地情形中国为小农国，很多地方，小农生活很安全，耕一二石田，遇丰年可以积蓄，生活可过，在他们不至发生土地问题，亦无经济争斗。中国雇工很少，他们反抗地主的很少，几乎没有所闻。在许多地方他们所苦的是过兵拉夫及苛捐，但此等痛苦，尚未至激发他们反抗的程度。中国农民运动之有意义的地方，是那些在经过战争很多的省份。他们受兵匪搔扰痛苦甚切，苛税重重，如湖南田赋附加税，每年均有增加，年有附加至三元四元者。株州一带，田赋预征至民国十八年，长沙各县亦征至民国十五年。农民之痛苦可以想见。且报载福建某地中收各捐至十余种者。此种官逼民反的事实，与农民身受之痛苦，大可为吾人在该地农村中宣传之资料也。

全国国民运动状况

四川　四川民党执政虽若干年，但旧革命党员已衰颓下去，现在四川之国民党全无党

员，只有政客。政客在失意时或担当党务，待至接近政权，则以造成政客之地方实力，竞争议会选举为务矣。四川之国民党包括三派势力，（熊，刘，但，）此三派分子瓜分国民党职务，各有组织，此等分子衰老已极，在四川各县办党所收党员都是谋位置的结合。他们不知群众运动如何物。当广东海关问题发生时，我们同志提议援助，不能得其赞成。亦不知分散国民党宣言。遇北军兵临成都城下时，我们同志提议召集国民大会，以工人为中心，亦未得头绪。即此数事，已可充分证明国民党之旧分子，根本不了解群众运动。北军入成都后，我们同志又提议：（一）注意向民间宣传，改良报纸，编辑消极的不反对北方，积极的宣传广东民党改组经过。（二）注重党员登记，分区开会训练教育等四项组党办法，又不见采纳。他们只希望利用挑拨刘湘与刘存厚分裂，再实行政客手段，重握政权，不愿以民众为基础，盖深恐民众得势，政客与军阀之势力均无从保存与发展也。自杨森据成都后，彼等或亟谋军事进行，利用政客家挑拨敌方，以谋扩据地盘，组党事或更无暇计及了。

由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我们可以看出旧国民党如军人与政客，即一种生活上的落伍者，希望他们革命，为如何不可靠的事，此种心理与目的及其残民手段，固与今日直系下之军阀与政客如出一辙。他们的革命为的是做官发财争地位，仍与群众利益相反，群众也不寄以同情，所以民党于失去成都、北军爪牙入后，成都人民亦不见有何同情于国民党与反抗北军的举动。

北京　国民党中有许多小团体，党员全为教员知识者及学生。这些学生加入本党，一部份目的是要求活动，在求生活，在争权位。一大部分是从相信国民革命，并不活动，只是挂名的党员。今年为组织北京执行部，各团体中竞争，倾轧，互相利用，造谣，合纵连横，以谋瓜分其中职务。这些团体无与群众接触做群众运动之勇气，无号召群众运动之能力，所争者一朝之地位。且各团体各有命令，各有利害，以至国民党执行部之权力反不如各团体内部之权力有效。纯学生的政党组织其缺点可于北京国民党中完全窥见。

上海　上海的党员有学生，有工人，失意军人及政客，有商人，有官僚，虽执行部努力上海地方之组织，但此等分子生活不同，问题各异，殊无凝聚力可言，区分部，区党部，多难成会。有些分子是向不到会的，因为他自视甚高，有些是要自己召若干人组织区分部，直隶执行部的，可见许多人都不明党的组织，而且有点个人主义，但是最近上海的国民党很知道去注意本地方问题，与接近群众，循此方向去做，将来可望进步。

广州　广东的国民党情形见S．Y．一年来之活动的报告，兹不赘述。

自去年国民党改组，我们加入国民党的理想，与计划，已有一部份实现了。这一年各地活动的经验有以下二点可述。第一，我们以前希望国民党成为一有纪律，权力集中，与集合全国革命分子的理想，是不能做到的。国民党中有包含各派其各派的利益，绝难一致，且小资产阶级素来惰性很深，只知空谈与唱高调，怯于行动，所以要使国民党步武俄国C.P.组织，在一统治知识阶级的政党为不可能。事实上凡是我们单独组织的国民党，其活动有数处反较有成绩。若是派别复杂，大半精力都用得对付内部，很难合作，其在民间的运动，会变成毫无成绩。第二，自有本年的国民党活动的经验，我们更深切的明白国民革命运动没有工人农人的参加，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以前我们是很注意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劳动运动没有进行。所以我们此次认定，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运动有一种可能的限度，我们须多独立致力于劳动运动与农民运动了。

（选自《团刊》第8号，1924年6月15日）

⑥

中国共产党妇女部
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节录）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1．一九一九年后的中国妇女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遂激起全国青年学生的反抗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发端于北京，未几即普遍于全国；同时相继而起的，北京有女学生联合会，天津有女界爱国同志会，上海、广东有女界联合会，湖北、湖南、江西也各有女界团体成立；除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专是女学生运动外，其他如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上海、广东女界联合会，都是合学生、毕业生、及一部分家庭妇女所联结。缘学生团体与女界团体而继起者，尚有工商各界联合会成立。

彼时女子团体虽然与男子分立，但凡一切运动，都是男女同力合作；如各地群众对官厅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各省代表进京请愿，无不有女子奋力参加；凡对军警压迫的奋斗，则群众大队，多是女子引路勇敢直前，所以各地都演出许多次流血惨剧，女子之被打而受重伤者，尤较男子为甚；商界罢市、工界罢工的运动，也多有女子负其责；并且北京两次代表被捕拘留，天津各团体领袖的被捕，三次都有女子同被拘囚，第一次拘留一星期，内有女子四人，第二次拘留两月余，内有女子两个，第三次在天津拘禁半年之久。三次之中被拘女子共有六人，实为中国社会中破天荒之举动！并且此六人中之一人，曾身经三次拘禁，仍然毫不退缩，依然猛勇奋斗。

彼时的群众运动，可谓之为爱国运动，也可谓之为浪漫的革命性，因彼时大众多不明了世界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只知人来欺压抢夺我们，则我们必须群起反抗以自卫；但促进觉悟分子的醒悟，能明了于帝国资本侵略的野心，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的要求，实则起缘于“五四”的学生运动，所以凡彼时作学生运动的领袖与中坚分子，以后遂多为我们C．P．与S．Y．的同志了。女子之中则被拘禁之六人已有三人加入C．P．与S．Y．中。一是刘清扬于一九二〇年在法国加入本国共产党，后留学德国年余，今已回国六个月，开始负中国妇女运动宣传之责。一是身被三次拘禁的郭隆贞，一是末次被拘半年的张若名，伊二人均于一九二三年加入旅欧中国S．Y．中服务。伊二人乃因运动最烈，被拘又久，遂被家庭所不能容而驱逐，彼时伊二人很想到莫斯科留学，但因不得介绍之途，遂不得已而去法国，至

今将近四年，其克苦求学的成绩，实较普通一般女留学生所不如①；至伊等出国路费与至今的生活费，仅由清扬个人负责代为设法捐募，拟在法国研究较有把握，便来莫斯科受实地训练，而后便归国服务，此二人实为中国将来妇女运动中有力分子，所以在此略言其详。

彼时女子参加运动的结果，多数已明②了解女子和男子有相等的能力可服务社会，既然能力相等，则社会于女子的待遇自然也应男女相同，所以中国专为压迫女子的旧道德，旧礼教，旧制度等，凡觉悟分子遂群起反抗破除，因此则各种刊物上和讲演场中，便都高呼女子解放，鼓吹女子奋斗；稍有知识的妇女，脑海中已充满了解放要求与革命思潮，遂得有今日中国妇女运动的勇猛：家庭革命，婚姻革命，教育革新，种种于女子切身问题，遂时时在激战之中，其奋斗胜利的少数人，遂得跳出家庭，跑入社会参加于群众运动。但一部分彻底觉悟的女子，虽得战胜一切，然终以人少力弱，不能作大规模运动，且大多数妇女的知识思想，与社会革命运动相差尚远，遂不得不有一时期单纯的妇女运动，以唤起多数妇女团结之后加以训练，好做参加社会群众革命的预备。故遂一方注重文字宣传，一方注重平民教育。

彼时的奋斗运动，以及对后起妇女运动的影响，其最大弊端乃是与劳动运动的隔绝，一切运动竟多漠视于劳工妇女运动；少数共产主义同志虽明了我们二万万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其基础实立于劳动群众；组织、团结、以及教育妇女劳工，实为我等重要的任务。但妇女劳动运动固然重要，然则开始负宣传运动及组织之责者，实不能不由知识阶级妇女担负之，因此遂又不得不先唤醒知识阶级的女子，能彻底觉悟到注重劳动妇女，而后方得大家协力工作，襄助劳动妇女的发展，方有进行的希望。

2．最近的妇女运动

A、**共产革命**——在受世界帝国主义侵略与本国蛮横军阀压迫之中国共产革命，其历史尚极幼稚，进行更格外艰难，且对少数初受过教育妇女的宣传，尤为困苦！所以在妇女运动之中同志尤为难得。中国共产党创始于一九二〇年③秋，至今在全国各地之女同志，尚且不过二十人，青年团女同志，也不过四十左右；仅此六十同志，且一因，中国地大路远，分散各地居处，其工作能力既小而又不易联合，再因，尚多被家庭束缚或生活问题所苦，尚不能人人以全力牺牲为党工作，所以其进行成绩，实非常之少！更兼至今尚无系统组织，而又不得党中的支配或指导工作，故此少数女同志，仅于各地尽个人力之所能，作文字宣传，或负平民教育之责任。

共产同志既感人少力弱之苦，且鉴于中国现状，实际上颇有国民革命之必要，更因有革命性与吾们宗旨相近的团体，也只有国民党，实有合作的必要，故经党中决议，凡我同志都应个人参加国民革命以利进行，女同志遂也都加入国民党妇女部之运动。国民党中主要工作，则在组织、宣传、平民教育、劳工教育等；吾党以少数同志，参加其中工作，凡有同志之地，第一则希望于组织上必握其主要地位，俾得自由行动，而能于宣传、运动中，概以吾党方针为标准以进行。吾党基础在群众，在劳动，故对劳工教育、平民教育，尤当格外努力以负其责。

---

① 此句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似缺一“白”字。
③ 原文如此。

B、**国民革命**——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大会之后，以其主张以革命为唯一手段，所以除共产同志青年团同志与之合作外，尚能得社会一般青年运动团体的同情，遂多勇跃加入国民运动。国民党的组织，于广东最高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外，全国内地有上海、北京、汉口三处为特别区设执行部，各统辖数省；各省有省党部，省党部下为县党部，县党部下为区党部，最下为区分部。各级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执行部及各特别区执行部中，设有独立的妇女部，但其独立，并非绝对的，如无分立必要之处，或也可与青年部合组；分立之时，则有部长、秘书、助理，以主持一切，合组之时则专有一助理，便掌理妇女部中之一切事宜；次则于省执行委员会中，有女执行委员一人，以下则县党部区分部等，各分别组织之。凡已有妇女部之区域，以下分别述之：

（1）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广东妇女部，成立于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之后。党员已有三百余人，区分部已成立五处，部长曾醒，是广州执信女学校校长；秘书廖冰筠，是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助理唐允恭，是广东妇女织袜工会会长，此三人掌理妇女部一切事务，但其中只有唐允恭善于活动，其他曾、廖二人则软弱无能，思想固旧，不能活动，所以妇女部中，很少有成绩。惟宣传部中何香凝（廖太太）是二十一年的老国民党，人最诚肯[①]热心，勤奋努力，颇同情于共产主义，但因其思想尚不彻底又忠于国民党，并且认为中国现时，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故不肯加人我党；伊个人设法捐募经费，已创办妇女劳工学校两间，及筹备创立贫民产科医院一处，约于七八月间开办成功；伊最怜惜劳苦工人，所以特别注意于妇女劳工教育，伊将要尽力之所能，仍拟继续发展创办妇女劳工学校若干处。

此外于妇女部包含的分子，尚有于一九二〇成立的女界联合会，及一九二〇年妇女织袜工会中之主要分子；织袜工会会长及职员等约五六十人已加入国民党中。女界联合会，原为广东妇女运动中有力的组织，先因要求女子参政而成立，后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发起人伍智梅女士，伊是广东市政厅市参事之一，又是宗教徒，但不太迷信；其发起宗旨有四大要点：1，联络女界，起发[②]其思想，唤醒其自觉；2，提倡女子职业，使女子有经济独立能力，而后引导其参加社会革命事业；3，鼓吹强迫教育，并多立各种专门大学，使女子得有充分知识能力，得服务于社会，庶不至常倚懒[③]男子，方得有男子有同等地位。4，注重私人道德，自重人格，使不受一切无理束缚与压制。成立之时曾有千余人，过去的工作，曾要求铁路职员的解放，须任用女子。筹捐帐[④]济东江灾荒，及抚恤慰劳军人，要求男女合校运动，争回县议会取消女子选举及被选举权运动，要求女子职业解放运动，举行星期日讲演，以开通妇女思想，增进其知识。其一切运动，结果均得胜利。现在已创办者有女子工读学校，学生九十多人，女佣学校，新近成立，学生约三十人。将来尚拟出刊报纸，及平民女学校十处。其中热心分子是伍智梅、唐允恭、沈慧莲、郑淑贞、李韵潇、张端仪诸女士。学校经费则由诸人负责捐募，一部分受政府津贴。女界联合会主要分子，虽加入国民党，但该会至今依然与国民党分立，但取合作态度，并不敌对，概因女界联合会认国民运动为政治运动上之一部分，至女子切身问题尚多须注意。此外广州尚有女权运动大同盟，其中都是学生，

---

① 原文如此，“肯”似应为“恳”。
② 原文如此，“起发”似应为“启发”。
③ 原文如此，似应为“赖”字。
④ 原文如此，似应为“赈”字。

与国民党完全分立毫不生①关系。广东本为国民革命发源地，故对一切运动上，都颇得自由易于进行，但其普通民族多有浪漫的自由性②，颇难受有纪律团体的训练；再则广东政府中，多是国民党员，故广东妇女团体，其主要分子，多是与政府有关系的太太小姐们的活动，因此，其活动上以及筹款等实较其他各省容易的多，所以他的成绩，也较别省为忧③；但在此若干人中，则我党女同志仅有S．Y．一人，其原因也实由此。

（2）上海执行部妇女部。上海妇女部与青年部合作，只有助理一人掌握一切事宜。助理向警予是我党同志，性能克苦耐劳，善于文字宣传及联络，伊曾留学法国约二年，归国后专为本党服务；该妇女部党员约六十人，有与上海大学男同志合办平民夜学校一处，学生约三百人，女子有八十，工人居多数。上海《妇女周报》为妇女问题研究会及《妇女评论》社所出版，此两会中也有该妇女部主要分子参加合作。上海为全国女工最多之处，对于女工的组织、联络、以及教育，深知为本妇女部唯一主要的责任，但因既缺少人才，更缺少经济，欲组织联络一时不得接近，欲创办妇女劳工学校，以得接近女工机会，而又困于经济。该妇女部除向警予外，尚有杨之华、张琴秋两同志襄助进行，杨之华是C．P．张琴秋是S．Y．；再有C．P．同志王一知，但伊不热心于职务。最近曾由该妇女部议定《运动决议案》，于进行策略颇为详尽完善，因鉴于中国妇女运动之幼稚，颇欲积极努力进行，以图发展。

其他上海尚有妇女问题研究会，《妇女评论》社等，乃为少数男女同志所组合，与该妇女部有密切关系。更有女权运动同盟与女子参政协会，也各有少数分子，加入国民党妇女部。上海因为最大商埠，为五方杂处的人民，又因受帝国资本主义之侵略为最甚！故该地居民多从④尚物质文明，奢侈无度，无彻底思想，性好活动，所以在上海作革命事业，能真正热心服务尽实力以牺牲之人，最为难得！其大多数参加运动之心性，乃为个人的风头性，更兼上海宗教的侵略势力甚大，也实为社会革命最大的耿阻，故于上海的运动，往往多空谈而少有实力。

（3）汉口执行部妇女部。汉口妇女部，方在开始组织，因未得实地调查，详情都不得知，故不能随便报告，惟俟日后调查清楚后再行补写。

（4）北京执行部妇女部。北京在黑暗政府高压之下，青年学生又多受资产阶级的投机教育，其被压迫能觉悟超而反抗者固然有人，但因进行不易时被耿阻；凡大群众运动，女子也多参加合作，但凡被压制不得公开自由的团体组织，软弱的女性便多退缩不前，因此北京妇女运动，也颇少实力的进行，妇女部虽成立，但尚在萌芽的组织之中，北京妇女部与青年部合组，女党员约有五十人；只妇女部秘书是我共产党同志缪伯英，此外尚有毛一鸣、杨子烈等同志襄助一切。组织成功后的计划，唯一则注重劳工或平民教育，次则宣传联络以图发展。

其中包含分子，则多大学或专门学校的学生，并有女子参政协会及女权运动同盟的少数会员。更有最近成立的妇女同志会的会员等。

（5）天津省党部妇女部。天津所谓省党部妇女部，尚极幼稚，党员仅十一人，尚未组织完善，故也无进行成绩。在此国民党妇女部未成立之先，原有的妇女运动，少数分子是一

---

① 原文如此。
② 此句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似应为“优”字。
④ 原文如此，似应为“崇”字。

九一九年学生运动中的产儿，人数虽少，而其作事毅力，颇得社会上新派的信仰，也颇为旧派及官厅所注意，并于社会上也颇有势力与地位。一九二三年有女星社成立，社员十四人，皆女子，社友三十余人，男女皆有，其中最热心负责人，是李峙山与邓颖超，因鉴于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要，又因被困于家庭妇女的无知无能，难以起来反抗其压力，遂有女星成人补习学校的设立，同时又出版《女星》旬刊，以讨论及批评女子种种切身问题；学校成绩甚好，《女星》旬刊颇得各地青年所欢迎。一九二三①冬同志刘清扬由德归国，因见国内妇女界的黑暗，与妇女运动的幼稚，极欲努力以图发展，但恐一时很难得普遍的影响，因此遂以为先宜从宣传鼓吹群众入手，而后方得唤起群众再进行组织，故与李、邓两友创办《妇女日报》，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出版，创办经费，仅凑到百元之数，连出数月，每月尚须亏累，但因其为女界运动的唇舌机关，仍不能不努力支持。今春国民党改组之后，该报同人议决与国民党协②手合作，以图妇女运动的扩充。伊等入党之时，颇得一部分同志的欢迎，但又为其他一部分人所嫉视，因此国民党妇女部之职务只为先入党者所把持，不但伊等之参加工作，所以天津妇女部颇少发展。但凡伊等个人于社会上的活动，依然进行不止。于此时期，同志刘又鼓吹天津S．Y．的成立，邓颖超遂入为S．Y．同志。先是于一九二一年李峙山曾于天津组织S．Y．团体，初组织成功之时，成绩甚好，但成立不久伊因病离津，此团体竟为少数人所破坏消灭，彼时伊曾费尽精神苦心，方得组织成功，后竟消灭，伊因痛心，遂不愿再入其他团体。但伊实为共产主义之同情者，绝不反对、且不久也必可加入我党中也。鲍落停③同志襄助国民党妇女部之进行甚为有力，曾奔走上海、广东、北京各地；三月鲍同志到天津得见天津女界甚为欢悦！且给伊等的指导教训，实增伊等无限勇敢精神，格外努力，并嘱天津《女星》旬刊与《妇女日报》合作，以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机关，合作之事已于五月一日实行。此后伊等又于六月一日，开办《女星》星期日补习学校，专为贫苦有志求学者及女工等所设立，并平民妇孺施诊所一处，专为贫苦人看病，概不收费，并也为与下层贫苦妇女得有接近宣传的机会。经费都由伊等自己设法捐募维持，困苦经营，殊为困难，我共产党与国民党中，也都无力接济。

天津妇女部人数，实较各地为少，其原因实由一九一九年学生运动之时，天津女界勇猛奋斗的精神，足冠全国，及至运动消沉，而各家庭及各学校之中，遂上加倍的压力束缚，以防止其活动，因此故天津于妇女运动之发展，尤难入手联络。天津工厂不多，女工实居少数，其有一二处有女工的工厂，则在较城市稍远之处，因此天津对于妇女劳工教育虽注重，也竟难以实行，因欲特去女工工厂附近去设立学校，此款实无从出；盖因凡我热心服务社会的同志，又多被个人生活所累，一面作小学教员，一面又负许多奔走之责，人数既少，故精神身体，颇有难以兼顾的困难。

（6）湖南省党部妇女部。湖南省文化开通较早，其青年人的思想故也较易于醒悟，C．P．与S．Y．同志，于湖南也较多于别处；C．P．与S．Y．女同志约有二十人，一九二三年长沙S．Y．妇女运动委员会有《女青年》月刊出版，出至第三期，现在平江仍有《启明旬刊》出版，长沙有女工学校一处，安源也将有妇女工人学校成立，尚在筹备之中。其他尚有妇女励志会及女权运动同盟等团体，其活动分子，多为我C．P．与S．Y．

---

① 原文如此，似缺一“年”字。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携”字。
③ 原文如此。

同志中人，即国民党妇女部，今方在进行组织之中，其权多操我们同志之手。但因尚未得实地详细调查，故仅能写其大略，以待后再详为调查。

以上则为各处国民党已成立妇女部之大概现状。各地组织虽尚未完善，少有进行的实事，但中国妇女运动，能有系统的组织，实方自今年春季为始，俟各地能组织完善，开始奋斗进行之时，将必有莫大之希望！并且除去已有组织各地，其他有组织可能而尚未实现之处颇多，一俟各地已有团体坚固成立之后，得分派善于鼓动及组织人才去各地宣传，必能更有无限发展的希望，此实为吾党同志重要的任务。

今将各地已成立的妇女劳工学校及平民学校及各种妇女出版物等，列表于后。

中国关于妇女运动设立学校医院一览表

名称	学生人数	所属团体	地方	经费来源
妇女劳工学校	一百五十人	国民党同志创办	广东省城	个人设法捐募
妇女劳工学校	三十人	同上	同上	同上
女子工读学校	九十多人	女界联合会创办	广东省城	会中设法捐募及政府津贴
女佣学校	三十人	同上	同上	会中捐募
平民夜学校	八十人	国民党立，C．P．S．Y．同志教授	上海	国民党津贴
女工学校	未详	S．Y．同志创办	湖南长沙	由S．Y．团体筹办
女工学校	未详	S．Y．同志创办	湖南安源	同上
女星成工人[①]补习学校	三十人	女星社	天津	设法捐募
女星星期日补习学校	未详	女星社	天[②]	同上

外有平民医院两处

名称	创办人	地方	经费	备考
国民党立贫民产科医院	何香凝	广东省城	个人负责捐募	不收诊费
平民妇孺施诊所	刘清扬	天津	个人负责捐募	不收诊费

中国关于妇女运动刊物一览表

名称	种类	宗旨	出版地	编辑者	备考
《妇女日报》	日刊每日出一张	汇集全国妇女动运者的意见及消息，作有系统的讨论，输入政治、经	中国直隶天津	刘清扬 李峙山 邓颖超	

① 原文如此，似为“成年工人”。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似缺一“人”字。

		济、社会的状况及妇女的一切问题和应有的常识，提倡女子参加社会活动。			
《女星周报》	周刊每星期一出版	讨论解决妇女一切问题，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促已觉悟的女子加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中国直隶天津	天津女星社	以前是旬刊，每逢五月出版；今年五月始改为周刊。
《妇女周报》	每星期三出版一张	提倡女子自觉，肃清两性旧污，策进男女道德，建设男女幸福。	中国上海	妇女问题研究会 妇女评论社	
《妇女杂志》	月刊每月一日出版一册	讨论解决妇女一切问题，策进男女道德，介绍欧美关于妇女运动的言论，输入女子应有的知识。	中国上海	商务印书馆内妇女杂志社	
北京及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特刊	无定期刊物	提倡女子自觉，指示妇女运动的途径，谋在法律上男女平等。	中国北京天津	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 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	北京只出至五期 天津只出至三期即未再出。
直隶《第二女师周刊》	周刊	研究学术及妇女问题	中国直隶保定	第二女师学生自治会	
《启明旬刊》	旬刊	研究学术讨论妇女问题	中国湖南平江	平江启明女校学友会	
《醒世周刊》	周刊	研究学术，讨论妇女问题，提倡反抗日本的侵略及军阀的压迫。	中国直隶天津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一部分学生	一九一九年出版，出版仅一年即停刊。
《妇女月报》	月刊	讨论各项妇女问题	浙江临海台属女子		

			师范		
《女青年》	月刊	新文化运动，要求女工参政及教育平等	长　沙	S.Y.妇女运动委员会出	一九二三年出版，至第三期后终止。

C、劳动妇女的生活及组织

数千年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中国，其妇女生活原来只专专倚懒①于男子，其最下等贫苦之家，女子方做些微的手工，如缝衣纺线等类事，以略帮助维持家庭生活；至乡间妇女无田园之家，则纺线织布之外，尚可到城市中为人佣工。因昔时生活简单程度低下，无产阶级虽也困苦，但尚较现时生活易于维持，故绝不似现在满目凄凉，贫苦人充满街衢如此之甚。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侵略日甚一日，中国农业手工业，遂日进月累的成了近代工业化，各大商埠幼稚的半独立的中国大工业以及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逐渐发达，机器工压倒手工，而又图女子易欺可少给工资，于是纱厂、丝厂、香烟厂等，遂成为女劳动群众。因此中国素不抛头露面、久困家庭的贫苦女子，遂多以工厂为栖身之所，不数年间，全国女工已不下四十万人。中国普通工人工作时间，每日须十小时，但在私立的小工厂中，则可随意苛待工人，增加工作，尤以对待女工童工为最甚，竟有十二小时十三小时以至十四小时之多。工资，则男子最高工资可得一元，而女子最高工资不能过七角，最低工资不足一角；最高工资，尚能维持简单刻苦生活，其中下的工资，不过仅能为最底②生活一部分的补助。至工厂之待遇，则受工头的责骂踢打为常事，也只能隐忍不能反抗；女工之离家近者，放工之后，尚可得休息游散的自由，其城市之大工厂而由四乡各县招来工人便须住于厂中，住厂规则，直③不如被圈牛马，实为永久监禁的囚徒；星期日既不放假，平常又不得自由出入，睡觉之时，则完全被锁于居室之中。即如今年二月间上海纱厂失火，全厂工人仅六百人，被烧死者，竟有三百之多，此三百多人，完全都是女子，其原因则女工被锁于内，虽失火而场④长以恐丢失货物，竟不肯开锁救人，遂以三百女子生命为儿戏，完全为厂中货物而牺牲，其男工则因未锁，都得逃出生命。此三百女工烧死之后，则夫哭其妻，母寻其女，子求其母者在尸场围绕，惨痛之声，使人不忍见闻，而政府对此，毫不过问；女工既因锁门而被烧，场⑤主实不能不负杀人之罪，但政府既不保护苦工，遂至死也白死，并无抚恤之款，仅给每人家属二十元钱，便了解⑥此种惨剧，此二十元钱实不足以买棺财⑦及装殓之费。此类工厂在上海尚少，在山东省

---

① 原文如此，似应是“赖”字。
② 原文如此，似应是“低”字。
③ 原文如此。
④⑤原文如此，恐系“厂”字之误。
⑥ 原文如此，似应为“结”字。
⑦ 原文如此，似应为“材”字。

城，曾有四五处小资产阶级以投机手段成立的工厂，每厂约有三四百女工，均严厉禁固①厂内，仅在每年过年过节放工之时，有二三次的出厂；平常时内人不许出，外人不得人，每日仅有两三次最粗劣汤菜，以维持生命，直较犯罪囚徒为尤苦！其原则因②当山东荒汗③之时，饥民遍于田野，其时以饥饿将死之人，虽得一汤之饱，便已十分知足，借此时则小资产阶级中人，遂收集灾民成立工厂，便永久虐待囚禁之，其将死而被救的灾民，故终不敢起而反抗。吾同志有欲人此等工厂工作借以鼓动宣传者，竟不得身人其中。

久被压制束缚于家庭倚人生活的中国女子，一旦出世而为工人，伊等虽受工厂种种苛待，一因伊等受家庭之压迫已成习惯，故对工厂之苛待，也遂不感其太苦；二因一旦脱离倚懒④家庭生活，能于自己卖力而谋得经济上的赢余，遂尚觉较前为知足；三因久受田野饥荒之灾，而不得居室温饱之穷，虽被禁固⑤虐待，而尚较饿死为愈。因此种种，所以此初出世的中国女劳动群众，虽倍受外国大资本家的侵略及本国小资本家的苛虐压榨，而伊等仍都在蒙昧之中，感恩知足，殊不以为苦，如此，若希望伊等能急起团结，反抗资本制度，则于中国萌芽的女工之中，实为难事。

近年来，帝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甚，中国生活程度日渐增高，而中国本国的小资产阶级，无力与外国大资本家抗争，遂于生活程度日高之时，不但不能为工人增加工资，而反格外苛待压榨工人。如增加工作时间，及减少工资等事，因此女工又渐渐被经济压迫之苦，遂渐有觉悟的希望，所以渐有女工的罢工风潮，反抗工厂苛待及要求加资等奋斗，遂也渐有组织团结的要求。上海已有丝纱女工协会，其所统辖约有女工八万余人，但因女工既都蒙昧无知，所以颇易为人所利用，即此丝纱女工协会，团结人数虽多，最可惜其指挥操纵之权，竟握于社会流氓之手内，但其中也有数女工领袖颇勇于奋斗，然终以意志薄弱，易于被人所利用，又以其流氓指挥操纵之势甚大，别人颇难与之接近，因此，女工协会并未加入职工会内。女工以上海为最多，次则无锡、杭州等地，其他城市女工则较为少数。再则广州女工也甚多，但其与各地工厂中之工作不同，因广州至今仍多手工业，其工人多散处各家庭及小规模的工厂中，更因广东女子颇能勤劳操作，凡男子所能作的苦工，女子也无不能，如街市各种拉货车、挑夫、瓦工、修道等事，女子都能担负工作；因此则广东工人之多，殊当注意！但因其多分居散处，组织故颇感困苦；然实行劳工教育，则实较有工厂之地容易的多，因其不受工厂约束，行动得以自由。于一九一八年时广东工人组织成绩甚好，后被战争所摧残，其工会遂多消减，至今犹存在者尚有一织袜女工会，合二百余最小规模工厂的工人约千余人而成立。但此等工厂，并不属于大资本家，乃仅由最小资产阶级的集资成立，此工会虽然存立，但罢工奋斗之事，实不常有，概因其压力既小，工资也能敷衍生活，故无反抗要求的必须。此工会领袖分子，多加入国民党内。

中国女劳动群众被资本家——尤其是外国资本家逼到走头无路。为保卫自己生存计不得已而起的阶级斗争，乃起于一九二二年的种种奋斗。今将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二三年的罢工表列于下：

---

① 原文如此。
② 此处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似应为“旱”字。
④ 原文如此，似应为为“赖”字。
⑤ 原文如此。

一九二二年中国劳动妇女罢工运动表[①]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中国无大规模的产业罢工，女工也然，今只有小规模罢工大略表列于下：

一九二三年中国劳动妇女罢工运动表

地点	厂名	人数	时期	原因	结果
健德	织袜女工	未详	四月	加资	胜利
上海	装订工人	千多人，(男女合)	五月	加资一成	胜利
浦东	日华纱厂	未详	五月	反抗厂规严厉	失败
无锡	丝厂工人	二千多人(男女合，女工多)	六月	加资	胜利

D、女权运动

中国女子参政的要求，起于一九一一年满清革命[②]之后，旋被袁世凯掌政和摧残民党，民党失败，此嫩芽的女子参政运动，也同归消灭。后则护法政府南下，广东女界遂又继起力争，结果得到女代议士，县议会选举、被选举权，及市政厅市参事等胜利；未几湖南省自治运动发生，少数知识妇女界的参政运动，结果得有女省议员一人，女省视学一人，女县议员十数人，及少数女子得供职于省议会等各行政机关。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其影响于女子的进步，遂不再仅限于狭义女子参政的要求，乃能觉悟到应当反抗一切女子的压迫及不平等待遇，而争回一切女子应有的权利。于一九二二年间，因北京恢复旧国会，大唱制宪的高调，于是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女生遂发起女子参政协会及女权运动同盟会等，群起运动。接着上海、天津、南京、湖北等处也都发生同样的组织。他们此次运动完全是以国会做对象。主要目的在于宪法上取得男女一切平等。所以上书请愿，不约而同的成为各地女子参政协会、女权运动同盟会普遍一致的行动。但参政派的意见谓政治问题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枢纽，故女权只须注重于参政一点。女权派虽然承认参政运动的重要，但谓仅此一点还嫌不够，故更有下列的纲领：

（1）参政权；

（2）财产与承继权；

（3）职业与工资平等权；

（4）婚姻自由权；

（5）教育平等权；

（6）制定保护女工法；

（7）禁止公娼、禁止卖买婢女，禁止缠足。

这两派文字上规定的范围虽有不同，然以他们成立后直到现在的实际行动看来则二而

---

① 原表缺。

② 原文如此。

一，但同情于女权运动者实为多数。并且上海、北京、天津各处女权运动同盟会尚作过几件可记载的事体：

（1）上书国会请愿。

（2）要求北京清华学校考送女生出洋。

（3）致书总邮务司招考女生。

（4）代丝厂女工呼吁致书丝茧总公所要求三条：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十四岁以下之幼童男女不得工作①；每星期须有一日之休息。

（5）推举代表参加万国女子参政协会。

（6）天津女权运动同盟曾出特刊至第三期。

各地参政协会与女权运动同盟团体的会员各有三四百人，女权运动同盟，总较多于参政协会；其组织取委员制：（1）平议委员会；（2）总务委员会；（3）宣传委员会；（4）经济委员会；于各委员会下设各股分任职务。现在各地团体之名虽然存在，但因不求实际的工作，会员遂多消减分散，不常聚会。只有上海女权运动，尚能实际存在，且颇注重于女工运动，其原因则又因上海女权运动中主要分子，多是宗教徒，其宗教徒之后身，自然有帝国资本主义侵略政策的接济，其外表虽接近女工帮助女工，而实则破坏我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解放人类之奋斗而已，我等实当格外留意。再则最近广东高级学校女生，又起而发起女权运动同盟，合数校学生，约有六百余人，其宗旨则非常狭义，不管社会的改造，只顾要求女子自身的解放，与广东国民运动，完全不发生关系，且有反对之用意。各地国民党妇女部，因宣传联合不能公开殊难②行；也有恢复女权运动同盟之意，特欲借此易于号招③群众，然后国民党员担负指导组织之责，便可尽训练与宣传之力。

总之，中国女权运动以及参政运动的迷信政治，以为女子得到政权，便能解决女子自身的一切问题，实则因伊等对政治观念薄弱，眼光窄狭，思想不能彻底，遂至不能明了世界大势，殊不知中国已被帝国主义之侵略成为半殖民地之政体，中国政界之男子，尚都为各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家的走狗，更何有政权之可言！不求根本改造，徒重逐末的空想，其运动之无补事实，可以断言；但在中国幼稚的妇女运动之时，此本为应有的过程，并且也颇适用于封建政治宗法社会的中国妇女，因为有了这种运动，才有使中国妇女开步走的可能，并一部分有活动生气的女子，已不易得，故此本党同志不可不特别注意于女权运动，参加其中与之合作，以尽指导宣传及唤醒之责。

E、基督教妇女运动

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英美妇女会，妇女节制会等，他们成立的历史比以上妇女团体为早，而人数也较多。他们常向妇女群众宣传育婴、卫生、节俭及禁止无益之嗜好（如烟、酒、牌）等家常道理。此外更用种种娱乐动人的方法，使群众喜与他们接近。他们一面成立有利于知识妇女的家务团和女子职业介绍部；一面以重要分子加入各妇女团体，或至各女校演讲，或登文各报发表他们对于各种妇女问题的意见，以吸收知识阶级妇女。他们对于一般知识妇

---

① 此句原文如此。

② 此处似缺一“进”字。

③ 原文如此。

女所不注意的劳动妇女尤其特别注意。他们所作出的成绩有下列各项：①两次派代表参与国际女子保工大会；二，上海中英美妇女会通过信请市政厅取缔童工办法三条：1、禁止十二岁以下幼童男女作夜工，2、督率教育委员会在各地工厂内创办工读学校，3、工厂须讲求工人卫生；三、上海妇女青年会领袖上海妇女七团体代丝厂女工呼吁；四、上海妇女节制会在杨树浦一带设工儿院。他们于劳动妇女要称②不遗余力的帮助。

如以上各种基督教妇女团体，可谓已普遍中国各地，并且他们所作的事业，他们所办的学校，实不能尽述出来；但吾们对他们要用一句话的批评，能对他们有根本的认识！就是凡他们一切的活动乃完全是帝国资本主义侵略最猛勇有力的假面具！吾们承认他们的成绩多进一步，便是吾们的运动失败一步，他们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便于吾们进行多加一层耿阻；他们一切人面兽心假仁慈的工作引诱人的③迷信他们，他们实在是为世界的资本家造就甘心忍受的奴隶！他们的势力已普遍于中国各界，与政府官僚以及学校无不有密切关系；教育界学校之内，都欢迎他们去学校宣传虚妄的神话，而竟闭门不纳吾们同志讲演科学的真理；他们为吾们造出无数反对党来反抗吾们破坏吾们的进行，使吾们不得有发展的机会。他们注重接济女工，他们注重兴办平民教育，他们都能随意而为，因为他们有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的成绩是很伟大的。固然他们的工作，在外表上未尝无益于一切的妇女，但吾们要是根本认识他们，实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一切工作都是愚民政策，完全于吾们有损无益！吾们实不能不视他们为仇敌！

在普遍全国的宗教势力之下，吾们对他究应持如何态度？此实为一重要问题：吾们为希望得到他们势力范围以内的群众，并希望善为他们活动奔走的人才能有所觉醒，所以有的地方又不能不取合作方略；彼如上海女工最多，而他们的活动也最有力，故我党同志有时须与之协手共进。他们注重平民教育，吾们也注重平民教育，而吾们实当参入④他们的学校监督他们教材，不准他们用教授愚民的书籍；如广东一个女青年会所立女学校的教科书，竟有“君王说话，与神相同”之种种胡言乱语，实遗害于青年无可言喻！至其他各地小姐太太式的团体、专为资产阶级妇女欢乐之地，我等大可远避。总之：我等对他们采合作方法，实为一时的不得已，但吾们必须根本认识他们！外表虽取合作态度，而内心必须存严厉的反抗精神！并要学他们那种无缝不入的手段，对于群众竞争宣传，吾们能进一步，便是他们的退⑤。再则除去他们的群众与个人，对他们的宗教团体，必须时下猛烈的攻击！！

5、将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希望

东方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的地位既被剥夺，而又受礼教风俗的束缚压迫，所以数千年来，只作家庭中侍奉男子的奴隶。且又因孔子曾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遂不给女子以知识的教育，以此则所有女子的知识能力完全被埋没不得发展，遂不得不甘心俯伏于男子范围之内以求得一生的衣食，故东方女子之放弃社会上一切应尽职务，并非生而⑥弱无能，实则由东方黑暗制度之摧残我女子、取消我女子人格，已经数千年的薰陶拘禁，遂至使

① 此处似应有一“一，”。
② 原文如此。
③④原文如此。
⑤ 原文如此，似缺一“步”字。
⑥ 此处一字不清。

我女子于一旦之间，竟难有伟大反抗之力。十八世纪西方妇女，已有解放运动，而我东方妇女仍在梦昧之中；所以西方妇①已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得到相当地位，在家庭中已能得到平等待遇及行动自由，而我东方妇女仍为家庭囚徒；至今二十世纪世界人类解放要求之呼声已高，我东方妇女才渐渐觉醒于人权的要求起而力争；但此少数觉悟妇女，方开始宣传呼唤团结，自然我们运动的力量尚极薄弱幼稚。然则东方妇女觉醒虽晚，而我们相信他能作到更进一步的奋斗，他能越过欧美式少数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而能携手世界无产阶级妇女求根本解决；其原因则我中国妇女已受尽数千年的剥夺，人人都是无产阶级，其感受痛苦已久，并非无革命思想， 其所不能者只因困于无力； 因此中国妇女多是隐忍奋②怒而生活，所以伊们果能彻底醒悟而欲奋斗之人，必能特别猛勇有战胜解脱一切束缚的精神！同志特落斯基曾说："东方妇女革命要求，实甚于西方妇女；且东方妇女解放也必较西方妇女为快。"我们深感特落斯基同志能知我东方妇女，且以我国过去的妇女运动之勇气，也颇可证明此言不误，我们更当不负特落斯基同志的原望，尤当奋勇努力！！

我中国地大人众，占东方最要③区域，寒温热三带的天然物产，实冠世界各国之美，因此遂为世界帝国主义野心家所注意群起侵蚀，于是竟成为分割的半殖民地；我国民族既居东方之大半，再不急起反抗此世界帝国之野心，实将为世界人类解放之大障碍而为文明进化之累。我国民族既负东方革命重大责任，而我国被东方旧制度礼教风俗所压迫束缚的半数女子，如不求奋斗解放，则直接既影响于东方社会革命，间接即为累于世界人类；并且东方妇女一切的自身问题，无不基于东方社会的旧制，故我东方妇女欲求根④解放，则非完全推翻旧社会不为功，故东方社会革命，我东方妇女实当负重要责任，急起奋勇工作。世界资本侵略日甚的中国，其小资产阶级及小农民，遂都渐渐堕⑤为无产阶级，而投入劳工群众；我国女子虽都是无产阶级，但其资产阶级的妻女自然得丰衣足食以自享福，他们都已习惯于那种服从生活，甘心愿作男子的玩物附属品，整日只知装饰玩耍，一事不问，吾们作妇女运动，吾们要宣传鼓吹，但对于这些人完全是无望的，吾们唯一的利器，唯一的生力军，其基础只在实地尝过无产阶级痛苦的家无所归工厂卖力的劳动妇女！他们为争自由争本身利益常常以几个几百的群众，用罢工手段一致与资本家积极作战，他们能忍饥挨饿牺牲工资或被革除都所不惜。我们能把这枝⑥勇敢奋斗的生力军，在各地都能有坚固的组织以预备作战，他们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也是反抗世界帝国主义掠夺的利器！并且我们不当与同一无产阶级革命的男子相隔绝，实宜取合作方法，且更与世界无产者发生密切关系。

中国妇女于政治观念，素即薄弱，故伊等颇少有先入为主的谬见：如欧洲之爱国社会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之流弊；但其责任则在开始负宣传训练之责的领袖！且伊等果能奋勇工作，得到劳动群众之助力；其虽有小资产阶级团体的产生，我们相信他们必无真实能力以为我敌。我们的运动既基于劳动妇女，既求无产阶级的根本解决⑦，我们自不能不与国际无

---

① 此处似缺一"女"字。
② 原文如此，似应是"愤"字。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似缺一"本"字。
⑤ 原文如此。
⑥ 原文如此。
⑦ 原文如此。

产阶级同志协手，我们更不能不受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妇女共产国际的教导与指挥！因为我国幼稚的妇女运动，实担负东方革命重大责任；我们的任务众多，故必有一定的策略以求进取，最近由中国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发出宣言及进行决议案等，实先由我共产党中央通过的议案，以为我全国同志取同一态度进行的方针，今将此宣言与决议案写于下列，尚望妇女共产国际诸同志指教一切。

宣言……………①

决议案………②③

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启

（按中央档案原稿刊印）

①② 原文缺。其他地方也未找到。

③ 本文标点模糊不清，编者作了一些改动。

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

（广州通信五月九日）

赤　农

工人阶级要斩断自己的锁链从现存社会制度之下完全解放出来，据几十年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和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十月革命的证明，并不是依赖非本阶级的力量和不根本推翻现存社会制度能够达到，而是要凭自己的力量，有不断的革命的积极行动。所谓不断的革命的积极行动，当然先要有阶级的觉悟，有阶级的组织。中国的工人阶级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还未壮大，目前虽然还不能讲实际根本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因受资本家，军阀，帝国主义者的严厉压迫和摧残，他的阶级觉悟比任何阶级都快，他知道要有阶级的组织比任何阶级都早。三年以前就有蓬蓬勃勃的第一期的工人运动发生，在这期的工人运动中曾经有不少的伟大的历史的事件：如一九二二年之香港海员罢工，一九二三年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最近因北方政局的变动，代曹吴而起的各派军阀，其残暴并不减于曹吴，他们相互间的冲突更日形剧烈，因此无暇注意障碍工人的行动，和不敢公然用强暴的手段破坏工人的行动，在客观的条件上已经有发展第二期工人运动的可能；在主观的条件上，自“二七”京汉工人被屠杀后，差不多全国的工会都被封禁，工人拚命争得来的各种权利都被取销，工人所受的虐待条件比“二七”以前还更苛刻，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的淫威还更厉害，因此工人阶级知道要有阶级的组织和团结觉悟程度比从前更加增高，这就是这次工潮澎涨使中国的工人运动进到第二期的原因。这期工人运动的成绩虽然我们还不能预先说定，但是这期的倾向是很好的，革命的，谋整个的阶级的组织的：此倾向一证于本年“二七”全国各铁路代表在郑州举行之盛大会议，再证于这次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最大的四个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议召集的。召集这此会议的主要意思在于讨论今后中国工人运动的策略和目前进行的具体方针及谋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这次会议五月一日在广州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有余。正式开会的日期先后共六天，会场的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工人阶级忿激的心理和再不承受现存社会制度的热情，没有一次在每个代表的演说中不痛快淋漓的表现出来。在正要召集这次大会和这次大会正在开会的时侯有许多北京上海的工贼在各报上登广告，说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召集的。阴谋破坏这次大会的工贼是军阀官僚；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向敌人积极进攻时期中必有的反动现象，毫无足怪，但有些与军阀官僚，资本家，帝国主义无关系的人，也致疑于这次大会系由“过激派，煽惑而

成”，他们不是丧心病狂，至少也是头脑混沌！那有工人切身受痛苦，而不发生阶级觉悟，谋阶级组织的事情？过激派煽动的本事虽大，难道五十四万有余有组织的工人，一百六十六个工会，都被过激派煽动？这是很显明必无的事情，当然不用详细的加以解释！

现在再说这次大会的经过这次大会的议决案共三十余个 其中最主要的为：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工农联合，铲除工贼，组织中国全国总工会，工人阶级与政治争斗，工人阶级与经济争斗等。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议案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读者诸君看此议案，不仅可知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有全国工人阶级大团结的觉悟，同时有世界的觉悟。他们深知现在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是整个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经济系统。在帝国主义之下，阶级争斗的形式更加简单。当这两个阶级争斗剧烈，资本主义根本发生动摇时，各国的资产阶级相互间纵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都联合一致来抵抗无产阶级，这是有许多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的。因此无产阶级要根本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非有全世界的团结不可。在这个议案里面，还很鲜明的反对亚姆斯德丹黄色职工国际破坏全世界职工运动之统一。

在工农联合的议案里面说明为甚么工农阶级要联合，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必须找他的同盟者，并列举历史上许多工人阶级革命因没有得到农民援助而失败的例做证；最后还具体的指明目前工农联合的形式。

在铲除工贼的议案里面，说明为甚么发现工贼，工贼对于工人阶级前途发展的障碍，并列举罪恶最著的工贼姓名如下：

王光辉、徐锡麟、郭寄生、童理璋、宾步程、李彤、杨德甫、张德惠、郭聘伯、张纛、刘伯勋、余友文、冯自由、马超俊、谌小岑、张恩荣、苗凤鸣、何东、黄焕廷。

至于铲除工贼之办法：（一）将工贼罪恶编成小册子，宣告全国各工会，使工人明白，对于工贼加以防御及攻击，务使工贼无立足之余地；（二）各工会均应组织工人自卫团，如工贼来破坏时以武力对待之。

再说到通过组织中国全国总工会，要算这次大会的积极的结果，在大会上不仅通过了中国全国总工会的章程，并且还正式选举了二十五个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会后，执行大会的议案，办理一切事件。当总工会的章程通过和执行委员会选出时，“全国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谋全国统一组织的热诚。

在工人阶级与政治争斗的议案里面，说明每个经济争斗同时就是政治争斗，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工人阶级不根本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不能完全解放自己。在这个议案的第二段中还说明为甚么工人阶级要参加目前的国民革命运动和为甚么须为这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力量，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自己的利益参加的。最后还指明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罢工自由，普选和加资减时运动是目前政治争斗的具体目标。

在经济争斗的议案里面，指明目前经济争斗的具体要求，要求的条件甚多不详述。

上面是这次大会的结果，结果既然如此，将来的成绩一定很可乐观，中国的工人运动从此另开一新纪元，缩短军阀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寿命，谅凡是赞成工人阶级利益的人所预祝的！

孙中山平定商团手令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航空局长陈友仁，甲车队长卢振柳，工团军团长施卜，农民自卫军主任罗绮园，讲武学校监督周贯虹，滇军干部学校校长周自得，兵工厂马超俊，警卫军司令吴铁城。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

（《中央陆军军事学校史稿》第二篇1936年版）

（选自《黄埔军校史料》）

⑥

孙中山关于平定商团事件[1]的函电（十三封）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一月）

仲恺兄鉴：

截辑那威[2]商船私运军械事，今晚着邓彦华率同江固舰来长洲之后，更约英国兵船来黄埔协助。如遇有事，可协商共同一致行动可也。

文　白

八月九日晚[3]

注：

① 商团事件是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军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

商团前身是广州商人的自卫组织，后逐渐发展成为商团。商团的领袖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和地主兼资本家陈恭绶。他们外受帝国主义的支持，内得广州陆军将领的默契，并与北洋政府及陈炯明、康有为等暗通声气，形成了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阵线。商团军的势力由广州市发展到南海、江门、佛山等地，武装齐全，声势浩大，对革命政府形成严重威胁。

1924年8月9日，革命政府扣留陈廉伯阴谋武装叛乱秘运广州的大量械弹（长短枪近万支。子弹三百余万发），陈廉伯以鼓动商人罢市和拒收中央银行纸币相要挟，孙中山先生下令通缉陈廉伯、陈恭绶，并调兵入省宣布广州戒严，准备武力镇压商团，当时驻广州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小泉）、第二师师长廖行超（品卓）反对武装镇压，主张调停，以便从中渔利。8月29日范、廖与商团签订所谓调停条件，且以"宣布独立"和调兵入省相要挟，胁迫孙中山接受商团条件。广州市工人代表会通电孙中山，表示"誓不承认"范、廖的调停条件，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并向大元帅府请愿，支持革命政府，要求明令讨伐商团，8月31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谴责范石生、廖行超"阳拥政府，阴护商团"的行径，声明绝对否认调停条件。

10月1日《向导周报》发表评论，主张对商团叛乱采取严厉措施。10月10日，广东各界群众在第一公园集会，纪念武昌起义，声讨商团反革命行径。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商团悍然开枪屠杀游行群众，构筑炮台，封锁市区，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先生遂组成革命委员会，负责处理商团问题，并调动军队于15日将商团军击败，平定了叛乱。

② 即挪威。

③ 写信年代为1924年。

着赵成梁[1]将扣留之械内，交李縻将军驳壳枪一百七十五支，手机关枪十八支，及两项足用之子弹，为甲车队之用。

孙　文

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注：

① 赵成梁，滇军师长。

小泉①、品卓②两兄鉴：

所拟各节，尚无碍难之处。今后办法，不独陈廉伯③之表示悔悟措辞如何，尤当察其诚意如何。如真有诚意服从政府，则何事不可通融办理？所以千头万绪，都在一诚字而已。故于开市之后，请两兄约同各签字之人到来面谈一切，以观其诚意之所在。如明开市，即请午后四点到来可也。此候毅安

孙　文

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注：

① 即范石生，1924年任滇军第二军军长。

② 即廖行超，滇军师长。

③ 陈廉伯，英汇丰银行买办，广东商团联防总部长，为商团事件之祸首。

小泉、品卓两兄鉴：

商团数来调和，每次皆以事故中变，此其故意延长时间，以待东江敌人反攻而为夹击之计，已无疑义。我等不可尚在梦中也。今日若尚无解决，则非死中求生不可。望两兄速决心与政府一致对商团为最后之忠告。明日须悉将商团缴枪，勒令商户开市。如有不从，则由有纪律之军队协同学生、工人将西关全市之米粮、布匹悉数征发，以为战时军用。如此，则吾军前后方可免饥寒之忧，乃可持久。此为战时必要之举，各国皆有先例，在我当仿而行之。能行则生，不能行则死，生死关头在此，成败利钝亦在此。望两兄速决而力行之，大局幸甚。此致

孙　文

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小泉、品卓二兄鉴：

此次民心之愤激，实因恨客军而起。我之对商民，以为筹备送客则可，用武逐客则不可。因此，遂为众怨之的。所幸工人、农团犹向政府，若两兄不能为政府立威信，则工人、农团将必有畏势而退缩，则人心尽去，而大局更危矣。政府万一不固，则滇军必无幸免之理。此实关于滇军生死之机，不独革命成败已也。铁城①枪毙其团副，此为分所当然。彼辈一时不就范，只有以法绳之而已。望兄等速决心，不能稍示游予。陈廉伯已助东江之敌以大款，不日当有大反攻。若吾人不先清内患，则前方危矣。如明日尚无解决，则吾人非与彼辈决一生死不可。此时正要由死中求生，不可一误再误。时间为敌人之利器，拙速乃吾党之生路。务望与绍基②及樊军③一致行动，速下万钧之威，不顾一切，死里求生乃可，否则追悔无及矣。勇决勇决，革命幸甚，中国前途幸甚。此致即候

毅安

孙　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午前二时

注：

① 即吴铁城，时为广东公安局长。

② 即杨希闵，滇军将领，1923年滇军改组后任第一军军长。

③ 樊军，指豫军樊钟秀部。

仲恺兄鉴：

如明日果有罢市反攻之事，则商团枪弹亦当与我货一齐运韶为革命之用，盖有械岂愁无人？运到我自有办法也。酌之。

孙　文

九月二日①

注：

① 写信年代为1924年。

仲恺兄鉴：

兹着陈兴汉①来帮手，尽将黄埔械弹运韶，以速为妙。

孙　文

十三年九月三日

注：

① 陈兴汉，1923年4月后管理粤汉铁路事宜。

仲恺兄鉴：

函电皆悉，今先答函。枪弹运韶决不瓜分各军，乃用来练我卫队之用。汝为亦不能给以一支，如有必要，只可将黄埔前时之枪给他可也。

孙　文

十月十一日①

注：

① 写信年代为1924年。

品卓兄鉴：

代电悉。兄既知商团之叵测，实大局之幸。查商团本多安分，不幸其中有一、二十人，甘为某国鹰犬，通番卖国，图倾覆革命政府。多数商人无知，为其愚弄而不觉。吾同志军人初亦失察，不奉行政府意旨，杀一警百，遂致养成其祸。今商团竟敢开枪屠杀庆祝革命纪念之学生与工人，残忍无法，举世所无。此可忍孰不可忍！对此野蛮举动，实非法律所能收效。今授全权于革命委员会，使之便宜行事，以戡定祸乱。望兄等革命旗帜下之军人，务要竭力拥护革命委员会，俾得命令厉行，斯反革命之祸可望消熄也。此致

小泉兄同此不另

孙　文①

注：

① 此函为1924年10月12日所写。

小泉、品卓两兄鉴：

济民兄来言，两兄近已尽悉商团之阴谋，毅然与政府一致，以图挽救，甚幸慰也。惟当

速发制人，先清内奸，方不致陷于夹击。敌计本北江先攻，东江后进，而后商团罢市内应。今则最后者最先发，其计已乱，粤局可无虞矣。惟近闻浙沪消息不佳，因此赣南之敌必为之胆壮。若我此时不先出击，不日彼必来攻，我复陷于夹击，则不能制人矣。现在北伐部队集中已毕，惟出发无费。济民兄言两兄尚可设法。此时万事皆备，只欠东风。所差少数，若两兄能即筹十万元，便可出发，则赣省必可收复。如此则浙沪虽失，我仍可摇动长江，为奉军之臂助。否则奉败，而西南亦必随之，理无幸免。此存亡所关，望两兄竭力筹此，以速为妙。此正千钧一发之时也。勉之，勉之。

孙　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如能办到，悉要毫洋，交粤汉局长运韶为荷

仲恺兄鉴：

据汝为兄言，如果将长短枪交回商团，当能得百万以为出发费。果尔当可取消今日各令。除益之之枪外，可悉数还之。如何？请与汝为酌夺可也。

孙　文

十月二十二日①

注：

① 写信年代为1924年。

着张民达①将商团各种子弹悉运到韶关，听候发落可也。

孙　文

十三、十、二十四

注：

① 张民达，广东梅县人，1885年11月9日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1922年10月后任许崇智部第九旅十八团团长。1925年3月在潮州殉难。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给予烈士称号。

仲恺兄鉴：

商人有愿筹北伐费而讨回枪械者。此事现交精①交涉，知得完满结果，当要给回一大部与服从政府之商团。故欲沽其一部分为练兵费一节，不可施行。此帮械如何发落？当俟精卫交涉后而定也。

孙　文

十一月二十一日②

注：

① 精，指汪精卫。

② 写信年代为1924年。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9期）

总理复上海各粤侨团体电

上海各粤侨团体均鉴：号电诵悉。关怀桑梓，仁言利溥，至堪钦佩；但其真相容有为诸君所未尽明者。查广州商团为陈廉伯党徒把持，勾通逆军，谋危政府，始则蒙运军械，继则以武力胁迫罢市。政府虽查获谋乱证据多种，犹复曲予优容，准予发还团械，冀消反侧。乃商团竟于领得大部分团械之时，枪杀国庆日徒手巡行之群众数十人，剖腹挖心，备极残忍，一面分队武装出巡，强迫开〔罢〕市；并潜引逆党土匪入西关，作种种军事布置，预备大举。政府万不获已，乃下解散商团之令，并令各军驰往镇压。乃商团以为陈军不久可至，竟先向我军攻击。政府忍无可忍，下令反攻，幸不数小时，乱事即告平静。讵商团于败窜之余，所引土匪放火劫掠，施其故伎，复残杀理发工人以数十计，是此次乱事商团实尸其咎。事后政府一面严饬各军，申明纪律，禁止骚乱；一面责成有司，妥筹善后。在省百数十万人民，共闻共见；惟报纸或以远道传闻失实，或有供奸人利用者。诸君明达，事实具在，当勿任彼无稽谰言肆其荧惑也。孙文。（民国十三年十月）

（选自《黄埔军校史料》）

〔附〕平定商团经过[①]

蒋　介　石

当时陈廉伯密购军械，总理早已知道，在两星期以前，即吩咐我注意来往商船及一切船只，查缉军火的私运。我接到了命令，就留意检查来往船只。果然两星期后拿〔挪〕威商船装了许多枪械来了。我命令禁止该船开往广州，令在黄埔停泊，将军火起存军官学校。那时做税务司的英国人种种阻挠，并拿出强硬的手段，说这些枪械是有护照的，要用海军来保存。我对他说：若是海军来保护，我就可以打海军。后来滇军也出来干涉，说这些枪械是滇军的，领有护照，政府不能扣留。先大元帅也曲予优容，到底将枪械交还商团。不想商团把军械弄到了手，就在广州市中密布侦探，监督各械〔机〕关的行动，演出种种轨外的行动。后来滇军无法，也加入攻击商团。然而我们要明白商团敢于谋叛，实在是滇桂军造成的。商团缴械以后，黄埔军校就利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那时滇军仍然极力设法，想破坏军官学校收用此种枪械，我们也绝不让步。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编《蒋校长演讲集》1926年版）

（选自《黄埔军校史料》）

① 据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大”军事报告书》节选，另加题目。

商团事件的教训

和　森

这次广州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夥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组织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在广州各机关之职员，领袖这次叛乱的是陈廉伯陈恭受诸买办；公开的袒护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武装调停"廉价拍卖革命政府的是范石生廖行超诸军阀：而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之间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

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香港广州的买办阶级，一面勾结雇佣军阀以把持广州兵政市政财政诸权利，这是自从设立广东政府以来公然不可讳言的事实。这次事变的罪魁陈廉伯不仅是汇丰银行的买办，而且是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广州市党部之职员：这次主张罢市反抗孙中山最力的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及西关各大商店的经理职员以及陈恭受等莫不尽是国民党右派的党员，至于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辈之属于右派更不待说。所以这次一面是英国帝国主义打击中国革命运动，一面是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

国民党右派之必然的趋于反革命，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外国帝国主义要根本破坏中国的革命，单从外部施以压迫还是不够，必须培养一支反革命的势力于革命党的内部，这支势力便是国民党的右派。

所以这次事变的教训：第一是证明国民党右派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第二是证明雇佣一些军阀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过早设立革命政府之失策：

全部政权的取得是革命党必要的目的：但在革命形势还没成熟以前——即本身在民众间的势力还没成熟以前，是不宜于亟亟掌理一部分的政权或建立偏安一隅的革命政府。不幸中山先生竟然采用了这种过早的政策，由是显然暴露下列各弊害：（一）广东政权之取得，并不由于革命势力之完成，但是由于利用根本与革命相反的军阀财阀的势力，所以广东政府不仅不是革命的工具，适足成为雇佣军阀交通系政客买办阶级以及升官发财的右派之狐城鼠社；（二）党员对于政权的争夺早已根本毁坏了革命的目标与精神；（三）雇佣军阀以养寇纵敌为长久敲诈军饷之法宝，军役不停，苛税繁重，因而引起人民对于革命之反感与不信任；（四）全力用于毫无结果的军事行动上面，党务以此在民众间的发展完全因而停止；（五）苟安于香港英国政府的炮舰政策之下，不仅不敢发展国民革命的宣传，而且时常要受内外勾结的威胁，如这次商团事件便是明证。

这种不幸的政策不仅可使革命完全破产，而且危及于中山先生个人之生命与人格。军阀的工作是拥兵敲钱，右派的工作是争权夺位，而老头子的工作却是打前敌当炮火！军阀是利用革命做买卖，反革命的右派是利用政权做生意，而老头子遂常常的被强迫而成为他们的商品！

我们为挽救革命的破产计，为爱惜中山先生个人计，都希望中山先生在受了这次奇耻大辱的教训后不仅要毅然决然与英国帝国主义宣战，而且要毅然决然抛弃以前不幸的错误政策，澄清党内右派反革命的法西斯蒂！

（选自《向导》第82期，1924年9月10日出版）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①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

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适当努力，只有是暴露其实在性质及关系于国民之前，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的战乱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奴服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一对时局宣言，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此项文件，现已在印制之中，不日即可寄发各地。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至活动态度，应一律依本通告及宣言所指示：此外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党纪律论。

委员长　T.S.Chen②

秘　书　T.T.Mao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签名是陈独秀、毛泽东。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①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们：

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说过。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兹特再行通告各负责同志，自后务于此点特别矫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

（一）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

（二）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

（三）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各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

（四）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五）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

（六）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的述明各项工作之全部。

委员长 T.S.Chen②

秘　书 T.T.Mao

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六日附及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签名是陈独秀、毛泽东。

中央通告第×××号[①]

——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展开活动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我们对于孙中山到北方出席军阀会议，不根本反对，只督促其在赴会前根据彼党政纲，发表政治主张，在会议中代表人民要求利益，此项政策，前函业已通知，各地谅已收到。此时孙中山已到上海，日内即赴津京，其宣言已在各报上发表。此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且语多抽象，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彼此次北去受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两面之包围，结果恐甚危险。兹中局议决，再发一次宣言，向中山提出政治的具体主张；同时，各地方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国民党宣言有此主张）促成会”，进行左列各事：

一、大致根据本党宣言所列的具体要求（得就各地方实际情形，稍加以增省），即时向孙中山要求提出军阀会议。

二、即时根据此等要求，设法在当地报纸上宣传，在街市上，在乡村中向民众游行演讲，促起大的示威运动。

三、国民会议及预备会如果实现时，此促成会即须负支配选举及监督会议的责任。

各人民团体，各应出若干代表，可按当地情形决定。所说人民团体，当不以国民党宣言所指几种为限。

国民党现拟派特别宣传员分赴各省，解释彼党此次宣言及办理国民会议之准备，彼等到时，倘是我们的同志，自无问题，即不是同志，亦须与之合作，惟不可为他们所支配。

---

① 这个文件是团中央转发的，可能是第二十二号，原件没有找到。时间是团中央转发的时间。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

——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①

同志们：

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因此党及S.Y.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此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如左：

（一）“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个名称无论如何各地必须一致，“促进会”、“后援会”等名称，务设法改正。

（二）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促成会，如广东有两个促成会，湖南促成会之外又有后援会，都绝对的必须合并。若因鄙视商界或国民党右派不肯忍耐和他们对于此项运动之合作，便是很大的错误。至于大商阶级所号召的什么“和平统一促成会”等组织，民众不但不应加入，且须极力加以攻击。

（三）促成会当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分，必须竭力邀请他们加入，万万不可使促成会仅仅是个C.与S.变相的团体。

（四）在促成会工作的C.及S.同志须合组一党团，直接受C.地委指挥。

（五）促成会对内对外的宣传，根本应该说人民自身要有一个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不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机都宣传国民会议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使民众过于待赖中山而轻视了自己。

（六）各地促成会及其所包含之团体，应立即分别通电指摘段祺瑞最近的反动政策，并宣告所有善后会议的议决案，人民均认为无效。

（七）向他处促成会鼓吹由上海促成会召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的必要；但实行时期须候C.中局审定。

（八）我们此时不但要集合已有的社会各团体于促成会，并且须乘此时机努力使与我们有关系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团体）内容充实起来，的确有些群众，不是空招牌的团体。并应乘机组织新团体，如教职员联合会，公私机关职员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

（九）各地促成会也应该注意地方争斗，鼓吹省长及县长民选。

C.P.
S.Y. 中央局 T.S.Chen ①
Y.N.Lin

---

① 年、月是编者判定的。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签名是陈独秀、林育南。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节录）

陈 独 秀

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三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贼卖国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加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情态，并且还有一部分领袖有求助于更险毒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倾向；此倾向，发展到华盛顿会议时，更恶化了全社

会。（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争地盘”的旧政策内，或更周旋于分赃的南北和平会议，并未看清中国革命之真关键——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国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势力，他们对于学生运动取了旁观态度，甚至有一二领袖还加以怀疑或非难；在北方的青年领袖们根本上没有革命性，不但临事脱逃，并且公然提出迴避革命的口号“读书求学不问政治”；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懦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四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争斗或民族争斗，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

自海员罢工至镇压商团反革命（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罢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三月五日），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

在此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英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由海员罢工胜利起，至京汉路工“二七”惨剧止，这一年中，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攻时期。由香港广东而上海而长沙而萍乡而武汉，沿京汉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关，罢工与工会运动，轰动全国，使军阀官僚资本家侧目而视。

工会运动中，比较有力的是铁路工人，京汉京绥正太粤汉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组织，京汉尤比较的完备，而军阀官僚对之也尤为嫉视。

当中国工会运动最高潮中（民国十一年西历一九二二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镇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远东被压迫的民族进攻了；同时，新兴的直系军阀正抱了武力统一的野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之非难，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工之惨剧乃起。

“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七”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同时向工人阶级进攻，各省（广东、湖南除外）工会或解散或改为秘密的小组，全国工潮一时遂低落下去。

广东虽无多产业工人，而一般劳动群众因为处在五六年来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统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会结社之自由，较之有强固组织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之大都市产业工人，反能发挥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国工潮低落之时，广东劳动群众不但固能守阵地，最近还能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得到了胜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实际上只是取缔华人，这本是对于中国全民族的耻辱；然而罢工抗议者只是被雇的工人与警察，商人毫无表示，而国民党右派党员，反有和英捕房勾结欺骗工人妥协者，幸而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并力持不妥协态度，香港海员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者终至让步。

广东商团乡团。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最近各县商乡团且联合在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指挥之下，阴谋推翻孙中山政府。他们曾勾结国民党右派军人以罢市要挟政府发还了私运的枪弹；他们自己说后面有英人援助；他们自己说奉了曹吴的命令；他们居然以武力拦阻国庆日游行庆祝的市民，杀伤了工人学生数十人；罢了市不算，还号召各属商乡团集中广州，对政府及工人取攻势；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联合各校学生及陆军学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和商团对抗；孙中山因民众之奋起，遂毅然排弃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以武力击散商团军，没收其枪械。

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中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选自《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

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

——对北洋军阀召开善后会议的对策[1]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

同志们：

现在军阀的善后会议条例已经公布，我们对付的态度，应由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进行及准备左列各事：

（一）通电说明无人民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之危险。

1.此善后会议是段祺瑞借此勾结各省失势的小军阀，结合己派的新势力和他派军阀对抗。此种新结合必酿成和他派军阀间的新战争，给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又一机会。

2.段祺瑞悍然不顾民意召集善后会议，乃希图在国民会议之前巩固其势力以对付国民，并以对付孙中山。

3.借此会议为他卖国的工具，如承认金佛郎案，继续参战借款，办理沧石借款。

（二）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之权利，并不能议决国民会议组织法。

（三）继续要求人民的预备会议，如段祺瑞不许或善后会议悍然决定上列诸问题时，即准备有力的抗议，如一定时间的（一日或二日）罢市、罢工、罢课及罢税的运动并示威运动。

（四）国民党代表及名流如果出席善后会议时，即电请他们主张另行召集人民代表的预备会议。

（五）函商各地促成会速在北京开全国会议，并请北京促成会担任筹备。各地和促成会同性质的组织，即令是大资产阶级号召的，也应邀其参加。

又，列宁周年纪念日（本月二十一日），各地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

C.P.中央局委员长T.S.Chen[2]
秘　书Leo Dschanlung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签名是陈独秀、罗章龙。

中央政治局对
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

（一）现时北方的政局段派势力已有日益扩张排斥其他反直系派之倾向；然段在此种困难时期，既欲召集善后会议，此种善后会议固然纯为军阀及接近军阀之所谓名流所组成且不得不请国民党人到会。中国社会团体大抵尚弱，劳动群众之组织尤甚，决无在现时即自行召集人民的会议以与段之善后会议对抗之可能，政治局根据此两方面之事实，认为共产党对于善后会议，当采取下列之策略：

（A）共产党在群众之前，当暴露段氏政策之真相，段氏之善后会议纯以团结安福系军阀以图继续军事行动摧残其反对派之军阀为目的；此种政策不但将使国内重现极反动之政局，且使帝国主义又有所以借口而施行干涉；同时，段氏且欲借善后会议以取得合法政府之资格而受帝国主义国家之承认。共产党当使民众向段政府要求，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此等代表的人数当占善后会议人数三分之二，此种参加即以阻止段氏计划为目的，并使段氏立即召集国民会议。

（B）因须选举人民代表，故当要求在北京召集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大会。

（C）凡尚无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处须立即组织（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区域），使民众咸认为真正人民的组织。

（D）预备一切，以便段氏拒绝人民要求召集其段氏式之善后会议时，群众能举行示威、抗议、罢工等表示反对。

（E）开始建议于各国民会议促成会请其选举代表到北京开联合大会，每一国民会议促成会派代表约自五人至十五人。

（二）政治局以为国民党领袖之消极抵抗政策——即既不公开反对善后会议，亦不参加——实为国民党改组前之旧病之遗毒。以前国民党之所以不能成为群众的党之原因，正在其不做政治宣传；故共产党当使国民党部及对国民党表同情之群众赞成上述之各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要求——即主张参加，批评善后会议，催开国民会议。

中 央 局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编者按：此件原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题目为编者所加。彭述之，东方大学学生。一九二四年七月代表中共旅莫支部回国参加了党的四次大会，当选为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任中央宣传部主任。五次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大"后被派往北方工作。彭述之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负责者之一，由于坚持右倾错误，一九二八年四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其党籍。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和陈独秀、刘仁静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即托陈取消派纲领，成了这个反党小派别的一员。

这封信记述了党的四次大会的一些情况，对研究"四大"有些参考价值，因此本刊将它原文发表。文中〔 〕号内的字是编者加的。

旅莫C.C.P.①全体同志：

述之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受旅莫C.C.P.支部大会之命回国赴C.C.P.第四次大会。现在C.C.P.大会已于本年元月十一日开始，同月二十二日闭幕，中间共经过十二日。兹将大会前的预备及会议经过的大概情形和决议案的要点略呈如左。

一、大会前之准备

在去年十二月初中央即指定人组织起草委员会，述之亦为起草委员之一。在起草委员会上对于各种草案都经过一番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其中尤以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各委员的见解颇不能一致。大概在我的意思还是保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莫支部大会上之观点（我回国后对此点曾在《党报》第五期上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之几个应有的根本观念》②），仲甫与我略同，吴廷康③则持异议。他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他亦承认我们的观点了。此外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所以在第三次大会后，仲甫、秋白同志等均有此等文字发表（如仲甫同志之《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国民革命》④及秋白之《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⑤，然而这是根本错误，所以对于此点我们特别注意。在十月间我曾为此点在《新青年》上专作一篇《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⑥，专在用客观的分析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⑦之必然的领导者。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两方都互相让步，

同时由客观事实证明，在莫斯科的许多争点已不成问题了。

二、大会之经过

大会的重要提案一共有：（一）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提案；（二）关于职工运动之提案；（三）关于农民运动之提案；（四）关于青年运动之提案；（五）关于妇女运动之提案；（六）关于组织问题之提案；（七）关于宣传工作之提案。此外有出席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之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以及大会对于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和对于中国劳动群众宣言[8]。前面所有的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所起草，在大会时再组织各种审查草案委员会。在审查草案委员会里，除民族革命运动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较有争论外[9]，其余委员会都很少讨论（述之除农民草案审查委员会外，其余委员会均得参加）。在大会中对于提案有争论的也只有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在民族革命运动问题所争之点有二：（一）有些同志以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即直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此说张申甫[10]主之（申甫非代表，以发言资格参加讨论）。（二）仍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第一点很明显的是申甫的错误，当时加以解释就完了。第二点上面已经说过了。在职工运动中的争点就是产业工人是否须加入国民党？在此点有几个同志还带有点左稚病，即是他们以为产业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国民党。其实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C.Y.[11]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不过此种企图终已失败。大会只承认目前应切实做各种民族的青年运动，如果发展到相当时期，认为必要时则可组织非政党性的全国组织。

至于各种议决案的内容，因为太多不能详叙，最重要的是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决议案，今附寄在内，其余的决议案尚待一星期寄上；有几种已译成俄文或英文，可向吴廷康同志处索阅。

此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如下：（1）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九人：仲甫、守常、和森、张国焘、平山、秋白、述之、李维汉、段德龙[12]。（2）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和波[13]、朱锦棠、邓培、张太雷。（3）中央局委员：仲甫、和森、秋白、国焘、述之。仲甫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国焘工农部主任，述之宣传部主任，秋白、和森宣传部委员。

三、各决议之要点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的要点是：（一）说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之目的及特性，由此就可以得到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之正确的地位。（二）说明我们在民族运动中之左右倾的经验并指明其客观的原因与其纠正的方法。（三）确定我们对于国民党之态度，即与国民党合作中之具体方案。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最重要之点是怎样能扩大我们的党。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之要点：职工运动与国民运〔动〕之关系，工厂小组和重要的工业区域之工作问题等。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很搜集了些有价值的经验，并且从广东的农民运动经验中，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运动方案。青年运动决议案〔要点〕在C.P.与C.Y.之正确关系，并指明C.Y.应怎样使其工作青年化；对于民族革命的青年的全国组织亦与以正确的答案。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是这次大会第一次的尝试，然而在这个决议案〔中〕已指出很多重要意思，对于各方面的宣传都与以具体的规划。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在能将中国目前一般的妇女运动与以客观的分析而定出对付的态度。以上不过随记忆所及略为指出之，将来全部决议案到后，望诸同志仔细研究，务求精细了解。

还有一层可报告者，就是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各地方的代表都表现一种很忠实而又很热心承受大会教训的样子。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我党的党员数目近两三月来增加速度很快，在大会上据各地的报告（有几处不完全）已有九百党员，如果切实统计起来约有一千党员，并且党员中工人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

我除参加C.P.大会之外，并由C.P.大会举我作C.P.大会代表参加C.Y.大会（S.Y.⑭现已改C.Y.）。在C.Y.大会上我亦极〔力〕拥护C.P.大会的精神使之实现于C.Y.大会，在各审查草案委员会我都极力参加。现在C.Y.大会已于一月三十闭幕。至C.Y.大会的详细情形，弼时当必报告，姑不赘。太雷与弼时均被选举，伯简亦被选为候补〔委〕员，乔年亦候补〔委〕员。太雷总书记，弼时担任组织。

同志们！我因为经过一个多月整天整夜的会议生活之后，现在已经病了，我不能很详细地报告你们，并且所报告的都语无伦次，望原谅我！！

同志们！我此次代表诸同志出席，我始终是紧抱着去年七月在M.лохоёка⑮大会上所给我的精神和提案，我始终是努力将由莫斯科所学得的认识得很粗浅的列宁主义到大会上去尝试。现在诸同志所给我的使命，我总算勉强使之实现了。我现在转望诸同志努力研究第四次大会的一切决议案，了解这一切决议案，望诸同志为大会努力，为吾党前途努力！！

敬祝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万岁！

述　之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号

① “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② 《党报》是党的秘密刊物，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创刊，现只存一、三、四期，故下面说到的彭文未见。

③ 吴廷康，又译作维经斯基或威丁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

④ 此文发表于《前锋》月刊第二号（1923年12月1日出版）。发表时改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⑤ 此文发表于《新青年》第二期（1923年12月20日出版）。发表时题目作《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该期目录上则作《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

⑥ 此文发表于《新青年》第四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发表时题目作《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⑦ “中”字原写作“口”，是编者改的。

⑧ 即《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

⑨ “较有争论外”原信作“外较有争论”，是编者改的。

⑩ “张申甫”应作“张申府”。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党的旅法支部的初期负责人。后脱党。

⑪ “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⑫ “段德龙”，应作“项德龙”（亦作“项德隆”），即项英。

⑬ “王和波”，应作“王荷波”。

⑭ “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⑮ 此系俄文，译不出意思，或为地名。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

〔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节录）

彭 述 之

（一）

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作国民革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打倒本国封建军阀的革命，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除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或患神经病者，谁也不能否认这个革命，除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或患神经病者，谁也应该来参加这个革命。因为国民革命是我们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一切人民之唯一出路。

由此，我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应该国民革命与否的问题，而是谁来领导这个国民革命即那一个阶级来领导国民革命使国民革命能够彻底，与怎样作国民革命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比较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如果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无从说起；因为一个革命，必定要在一个比较确定的更进步的阶级意识指导之下才能进行，才能有确定的方向，才不至走到混沌模糊的瀚海里去，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虽然是混合各阶级的力量而进行的；然而必得有个主要的进步的阶级作中坚、作领导者，才能使各阶级的意识比较集中，各阶级的力量集中，不致为某一反动阶级的私利所乱，才能引导革命的势力到目的地，彻底的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

在阶级分化较明显的国家里之革命，所谓革命的领导阶级本不成问题。如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当时的阶级分界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贵族僧侣的旧封建阶级，即统治阶级；他方面是新兴的第三阶级，即资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在这样情形之下推翻封建阶级的法兰西大革命，自然是资产阶级为领导者，也只有资产阶级能作领导者。英国十七世纪之资产阶级革命与德国一八四八年之革命都是如此。

在现时德、法、英、美所需要之革命，更是非常明显，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自然负担领导革命责任的只有无产阶级。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早先虽很有些争论，但经过二月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应直接起来领导这个革命（最重要的是领导农民阶级），在当时已是很明显的事实了。惟在半殖民地阶级尚未十分分化的中国里，对于现时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问题，放在我们面前，就未免有点混乱了。你说资产阶级吗？若按国民革命的性质，似乎应该是资产阶级来领导（因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可是由各方面事实证明，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不惟没有这样事实的表现，并且还没有这种志愿，有时甚至于相反。如此问题就发生了。你说是工人阶级吗？似乎无产阶级的本身很幼稚，而这个革命的性质又不是无产阶级的（因无产阶级除现时的国民革命之外还有其将来自己的阶级革命）。因此也成了问题。

但在经济的观点上，又只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可能性。所以我们此时应从客观的环境上，从客观事实的表现上，来观察中国，来分析中国现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真实势力，究竟谁能但负指导中国的国民革命，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二）

我们说过按照领导国民革命的本性，国民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现在我们看中国的资产阶级究竟是怎样？

先看银行资产阶级。……中国的大银行家最大多数是卖国的官僚，如新旧交通系。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并不是跟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创办银行也并不是因为工业的便利，而是为着政府要借外债。所以创办银行的人，多半是刮地皮之大官僚。这些官僚式的银行家，一方面借银行经营外债或内债；得到巨大的回扣和红利；他方面又借此可以作官，再继续不断地刮地皮。如此就形成中国之奇形怪状的银行资产阶级、财阀。……由此看来，我们希望中国的银行资产阶级来作国民革命，打倒与它们相依为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不是等于痴人说梦？并且它们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必然的反革命者。

再看商业资产阶级，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应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专替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销售洋货或替他们收买原料的，即买办阶级。一部分则为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如盐商、丝商、茶商……或所谓售卖国货之商人等。此种分法，本还是相对的，若彻底言之，中国所有的商业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差不多是外国资本家之买办。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因直接间接受了帝国主义之种种压迫，军阀之种种摧残，在其经济地位上确感觉到国民革命之需要。可是它势力太薄弱，另一方面它还没脱离宗法社会的关系，还是“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之软弱心理，所以它不敢出头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宣战。它至多只能跟着别的阶级跑。绝无领导别的阶级之可能，这是近年来土著商人对待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态度可以看出来的。买办的商业资产阶级，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势力，无论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在中国资产阶级队伍里头占绝对的优势。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场后的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之结果。很明显的，买办阶级的发生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买办阶级的长大，是由于帝国主义侵掠的进展，换言之，有了帝国主义的侵掠，才有买办阶级，有了帝国主义更猛烈、更广大的侵掠，才有买办阶级更发展的机会；更切贴点说，帝国主义要在中国销货、买原料，才有代它销货和买原料的买办阶级，帝国主义销货越多，买原料越多，那时，买办阶级也越发财，越有势力。现在我们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阶级的主人，你想买办阶级愿不愿意？何况帝国主义又天天用甘言巧语怂恿它呢。所以自从有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出现，买办阶级就老不耐烦，现在它更是毫不客气地替帝国主义充先锋来做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者了。……本来买办阶级帮助封建军阀也是自然倾向：因为（一）它的主人翁，帝国主义，是帮助军阀的；（二）它在有些地方不能不利用军阀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买办阶级绝不愿意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它并且还要拥护帝国主义与军阀，它将是反国民革命的法西斯蒂。

但是有人说：商人阶级中如华侨曾经作过不少的革命工作，曾经帮助亥辛革命的成功，不能一概抹杀。不错，华侨曾作过一些革命事业，但这是已往的历史材料。华侨在已往的历史上是革命的，可是在将来的历史上却是反革命的了，至少也不能说还能革命。这个理由甚简单，因为以前的华侨一方面受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需要一个自己的（阶级的）祖国来保护；他方面又积累一点原始资本想拿到本国来办工厂，同时又受了革命党人之排满宣传，所以它就来帮助革命了。但是华侨到了现在，一方面受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因为辛亥革命后华侨并没得什么，只觉空掷了无数金钱）；同时看见国内的无产阶级又稍稍抬起头来，

它不惟不来象辛亥前那样帮助革命，反而觉得前途大有危险。我们试看从国民党改组，一部分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之后，在广东造谣言，最反动的很多是华侨，他们天天造谣说国民党赤化。所以中山先生在本年八月国民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闭会那一天演说道："大家须明白，现在的华侨已经不是革命者了！"我以为这是中山先生深知华侨的一句话。

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比较独立，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比较的浅，利害冲突比较的大，对于军阀之连年战争，骚扰地方，制造土匪，勒捐重税，妨害它商品的销路与原料的来源（如纺纱业因战争而商品停滞，原料来源缺乏，以致歇业者不少）。在这种种情形之下，工业资产阶级在其客观的经济要求上，确有革命之必要。它恨不得赶出帝国主义，收回关税权，消灭军阀，建设它自己的政府。但是在事实上它的力量太薄弱。中国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其数量上太可怜。除了一部分纺织业的工业资产阶级外，我们数不出多少工业资本家。……同时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发达得太晚，它现在刚刚走上工业的道路，正在打算目前关于自己本身上的小算盘，那里有功夫有气魄来管这广大无垠的政治革命大问题。至于要它公然出头来领导国民革命，来与最凶猛可怕的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宣战，这自然是没有的事。所以工业资产阶级近年来在各种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心理（如对于万恶的军阀仅打一个废督裁兵的空电报，对于帝国主义之协定关税，则只到帝国主义所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去请愿帝国主义开恩……），完全由于它的经济基础薄弱之反映。

但是有人说："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的懦弱心理，自然不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它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这就是说中国此时资产阶级虽然懦弱，不敢起来革命，若等到了它发展成为一个大阶级时，换言之，等到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时，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起来革命，起来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了。这样的推论，未免有点机会主义罢。殊不知障碍中国产业发展的正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若帝国主义不推翻，军阀不打倒，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发展成为一个大阶级之可能吗？中国有发展成为一个大资本主义国之可能吗？这种很浅显的道理，我想谁也知道。并且这里还不要忘记了一种事实，就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时代，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很凶猛地向世界的资产阶级进攻了，不能容许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很平安地发展它的资本主义了。即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发展的可能，恐怕那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又要取而代之呢。所以现在无论那一国的资产阶级都有其后顾之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也是一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很愤恨其宗主国帝国主义之压迫，想起而革命，可是同时又望着站在背后的无产阶级，很狞狰地可怕。……中国的无产阶级如果起来（中国的国民运动愈提高，中国工农阶级的势力必然随之而扩大），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由上说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如财政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商业阶级是绝对反革命的，工业资产阶级因恐无产阶级袭其后的原故亦很有反革命之倾向），而革命希望的很少（仅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较大，但必有旁的阶级来指导）。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

（三）

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领导国民革命，但是谁能领导呢？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是工人阶

级，究竟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怎样？

先看工人阶级的数量。在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的中国里，自然工人的数量是很少的。可是在同一情形之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比较起来，它的数量却已是不少了。中国工人阶级底确实数目，现在还没有可靠的统计可考，有人说一百六十万或云一百八十万（专指产业工人言）。然而这样的数目不甚重要，我们所要说明的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对比，究竟谁强谁弱。在纯粹的工业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数量与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发展成为正比例，这就是说有多少工业，就有多少资本家，就有多少工人。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个比例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上边说过，因为中国的大产业，如运输业中之航海业甚至内河中之航业、纺织业、大矿业以及电气业……等，大部分操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即外国的资产阶级手里，这些资产阶级自然不属于中国。可是在这些企业下之工人，确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如几万海员，如开滦之煤矿工人以及在山东，奉天各地凡外国资本家所办矿山下之工人不下几十万，纺织业工人六十余万，这均是中国真正的工人阶级，而且是最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在另一方面如许多官办之企业，如交通部所属之铁路邮电等企业以及兵工厂、造船厂……等，在这些企业里只有工人，没有资本家，因为资本家是政府，即现在之军阀。在这些国家企业下之几十万工人阶级，若拿来与资产阶级比，亦完全是多余的。以上的说明，完全是事实，这很可证明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强过资产阶级数倍。

我们再来看看工人阶级之觉悟力，即革命的要求。我们已知道资产阶级之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近者与军阀有关系者如财政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甚至一部分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的。可是工人阶级却与此相反。在外国资本家企业与官办企业下之工人，革命性格外的发展，格外的仇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这个完全是物质上直接冲突的反映。因为他们直接受外国资本家之剥削与压迫，直接受封建军阀之剥削与压迫，他们天天看见狰狞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拿着鞭子向他们打，他们一举一动都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严重监督之下。大家想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不发生反动吗？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没有这样的感触？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教训？中国一班智识阶级——大学教授、学生、普通教职员、医生，服务于公私机关的职员……等，象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企业下所尝的这种“滋味”，他们能不能领会？我曾经同几个海员、唐山的煤矿工人和津浦铁路工人谈过几次话，我一提起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他们就咬牙切齿。他们历数外国人在海船上之怎样贱视中国海员，怎样不平等地待遇；津浦路上之英国管理员怎样地刻薄，唐山之英国人怎样利害，怎样地压制他们，管理铁路之官僚，怎样贪暴无耻，怎样地压迫工人；当工人罢工时或有什么要求时，外国人与中国官僚怎样共同阴谋对付，凡此种种都是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可惜我此地不能一一写出来。但是由此我们可知道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残酷的待遇，比中国任何阶级要迫切，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认识它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比任何阶级要明确，要深刻。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唯一客观条件、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且举几件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事实来看，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总同盟罢工，……他们当时那种奋斗精神，那种决战态度，那种持久毅力，是不是资产阶级所能望及？同年唐山煤矿工人与洋灰工人，亦五万人总同盟罢工，……中国工人阶级之奋斗，勇敢与牺牲的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亦于此可以表现出来。京汉铁路的罢工，当时工人竟以徒手而与武装的军阀决战，……这是不是中国人民直接反抗封建军阀之

破天荒的举动？……中国工人阶级在各方面对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表现，都是极明显而极坚决的。这完全是由于它那种天然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客观条件所规定。反过来说，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我们讨论中国的国民革命问题，绝不要忘记了中国不是一个与人世绝缘的孤岛，它始终不过是全世界许多需要革命的地方中之一个地方。这一层非常重要，如果忽略了，就绝对不能懂中国的国民革命，将于中国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的信仰。现在全世界已经到了一个整个的革命时期，并且联成了一条整个的革命战线。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在非洲亚洲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被压迫民族对宗主国帝国主义的革命，即所谓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是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当总指挥的就是已经无产阶级革命和国民革命成功了的苏俄。它把它从革命中所获的胜利，无论是物质的、是精神的，都尽力贡献于世界的革命者，……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容纳苏俄之贡献，能得世界无产阶级之帮助，能吸收世界革命之经验，仅在这一点上，已能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绝对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现在还有两个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疑问，应该解释一下。（一）有人谓中国工人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满头脑还是宗法社会的思想，一切行动还不能脱离宗法社会的习惯，还不能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不错，这是事实，可是绝不能因此遂谓中国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因为工人尽管有宗法社会的思想，有宗法社会的习惯，但是一到了物质的冲突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真正冲突时，那些平时的什么宗法社会思想和宗法社会习惯，都失了作用，它依旧是最勇猛的敢死军。这是我们上边所举出京汉路工人等的流血事实已证明了的。并且工人阶级经过凶猛奋斗一次，它的阶级觉悟也就发达一次，它那宗法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也就洗刷一次。经过几次凶猛奋斗之后，不惟宗法社会的思想与习惯不成问题，而且其革命性、其阶级觉悟更特别发展。譬如经济落后，宗法社会习惯最深的俄罗斯之工人阶级（如俄国工人以前笃信宗教就是一例），所以特别有革命性就是这个道理。何况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一样充满了宗法社会的思想与习惯，在这一点比起工人阶级来更是落后呢。（二）有人又谓中国工人在物质上不及资产阶级的雄厚；仿佛是应该随着资产阶级走的。这里我不明白，所谓物质基础，还是指如我上边所说之工人阶级的数量呢，还是指资产阶级钱多呢？如果是指数量上说，上边已答复了。如果是指钱多，那就未免滑稽了，那就只好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要革命了，因无产阶级生来就是没有钱的。然而俄罗斯的“穷”无产阶级却已革命成功了。可见“钱多”与“钱少”是没有问题呀！

（四）

国民革命乃是各阶级之合作的革命，除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智识阶级、各种苦力，甚至游民无产阶级。我们现在讨论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的问题，对于这些阶级的利益之趋向，就是这些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一方面接近，亦很可决定其领导者的地位。所以我们应把这些社会分子来分析一下。

占中国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群众，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农民群众不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何况中国的国民革命，农民本是直接的主人翁，即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得

农民的帮助，才有可能。但是农民因为经济地位的落后，阶级观念的守旧，无论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国民革命，始终只能作一个主要的辅助阶级，而不能作领导者．但是中国的农民，按他现时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容易与谁接近呢？辅助谁呢？这里非常的明显，就是谁能真正打倒军阀，谁能帮助它反抗地主的压迫，它就跟谁走、辅助谁．因为农民近年来因军阀连年战争，苛捐重税，逼迫到了绝路，所以农民此时之恨军阀已深入骨髓，我们只看惠州农民之反对陈炯明，湖南农民之反对赵恒惕以及陕西农民之暴动等，就可知道。……帮助农民反抗地主、反抗军阀的，只有工人阶级，这可以拿广东和湖南的事实来证明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的农民必然是跟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挥。

手工业者更容易与工人阶级接近，因为他在经经上与工人阶级已相差不远（手工业者中之帮手已近无产阶级，所差者不过一为用手工具生产，一为用机器生产而已），所以手工业者之辅助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导，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

小商人在其性质上，较近于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处处都受大商人的压迫、排挤，而对于工人阶级倒反两不相关。在反对抽重捐苛税的军阀和贱视中国人（自小商人看来是如此）的帝国主义，他们又是必得要参加的。这样，所以小商人是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指挥。

现在来看知识阶级。智识阶级本没有确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确定的阶级倾向。它是依附着社会各种有经济地位的阶级而存在，所以它不能成一整个的阶级，只是备各种阶级的使用。在资本社会里，智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附属于资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它常是反革命的，如现时西欧各资本国里之智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属反动派。可是在中国却不然，除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军阀所雇佣、资产阶级所役使以外，差不多都有几分浪漫的革命性，它们大概虽是资产阶级的心理，但它们实受帝国主义的侮辱（在智识阶级看来），受军阀的冷视（军阀不用它）与摧残（如学校学生和教职员之要求教育而被打被驱逐甚至被杀就是），所以它们也很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很赞成国民革命，并且有时还很激烈地参加革命。但是谁能够领导它呢？换言之，就是它要在那一个阶级的指导之下活动呢？这很难确答，但是我可以断定，如果有一部分的智识阶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深之智识阶级，即智识阶级之左派，它要成功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它必然要受工人阶级之领导，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底下去活动（关于中国智识阶级问题极复杂，容当专著论文讨论）。

苦力，即各种夫役，黄包车夫……等，它们在经济地位上，是极受压迫的人，光在这一点已很接近工人阶级了，自然是容易接受工人阶级的指挥。游民无产阶级，即青、红帮，一切土匪和兵士等，这些群众确是中国一个大难题，在国民革命上亦很难对付。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他们只要饭吃，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给谁服务，不管封建军阀，也不管帝国主义。……所以游民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的群众上不甚重要，可是也有相当的作用，因为它也是被压迫的，有时也有用得着它的地方，不过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意识指导之下，才可以免除许多危险，才有相当的革命意义。

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姑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暗示与领导的。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⑨

（五）

现在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客观的条件上，既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够作领导者，为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就不把这个革命，作成自己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因为：（一）中国工人阶级此时唯一的敌人并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二）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在中国革命历史进化的阶段上，中国工人阶级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第一步骤；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必经之路；（三）中国的各种社会阶级在国民革命的意义上现时是能够受工人阶级之领导的，可是如果拿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就很有些疑问了，恐怕有许多分子马上就会变成反革命者。中国工人阶级，在策略上，为的大敌在前，消灭共同的仇敌，也绝不能使阶级过早分化，分去革命的势力。有此三个原因，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只集中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于国民革命之一个焦点上，以期消灭当前之大敌——帝国主义与军阀。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它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推动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〇七年说：“无产阶级（指俄国的）的积极责任，是在推动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革命到底而为其领袖。”接着他又说：“要无产阶级抓住德谟克拉西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以与专制皇帝和背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奋斗，在这种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见《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关系》，《列宁全集》第八卷四一一页）这是列宁主张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当时对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态度。当时的俄罗斯与现在的中国很有相仿佛的地方。所以中国工人阶级此时一方面应该起来作国民革命的领袖，推动资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到底。要推动这个革命到底，也就须抓住一切小资产阶级（自然最重要的是农民，而手工业者、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亦很重要。）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反革命的一切买办的资产阶级奋斗，那时中国的国民革命才有达到目的之可能，中国的国民革命才不至于流产。

原载《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志的信*

（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

莫斯科东大的同志们：

我回国已经半年多了，但是还未曾和你们通一次的信，这固然是因为工作的太忙，但未免也太疏远了！

你们寄国内的信和报告以及笔记等，我大半都见着，我现在将C.P.四次大会、C.Y.三次大会和一年来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C.P.政治运动的经过，略为报告你们，或者供你们研究国内问题于万一，并且希望你们得着这封信后，原谅我从前没有通信的罪过！

C.P.大会开在一月十一至二十二日，有表决权代表十四人，代表党员九百零三人。

C.Y.大会开在一月二十六至三十日，有表决权代表十八人，代表团员约二千四百人。

两次大会所议决的议案，详大会决议案上（现正在印刷中，六、七日后可寄出），无庸我细述。我所要说的只是两个大会上所表现的精神。

大家都知道，国际五次大会的重要口号，是要各国的共产党都布尔什维克化。这次C.P.与C.Y.的大会，从他的到会代表一致的精神上，特别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及其他各项决议案的一致通过，对于上届执行委员会所拟的新执行委员会名单完全通过，没有一人更动；尤其是在C.Y.大会上对于更改S.Y.①名称的事，到会代表简直无一人发生疑问，一致的主张更改S.Y.为C.Y.。由此种种，我们可以相信C.P.与C.Y.是正在向着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面前进。

这两次大会上最有价值的议案就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现先将印出的单张附一份来），这个决议案纠正并补足了前两次大会之缺点，指出以后的道路，这个决议案，至少是我们最近几年的罗针。不过，要明白这个决议案，必须明了吾党过去一年的政治运动。我因为便于你们研究起见，将国内一年来的政局与吾们的政治运动经过报告你们（我的报告②是根据仲甫同志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③）。

---

* 此件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原信署名“红鸿”（亦作“洪鸿”），据考证是张伯简的化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前后，张伯简曾任党中央出版部书记。一九二五年一月，他出席了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青年团候补中央委员。在贺昌来到团中央工农部任职前，张伯简曾代理其职务。这封信就是在这期间写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⑨

① 在“C.Y.三次大会”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② 这个报告没有找到。

③ “仲甫”（陈独秀）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没有看到。

同志们！我回国以来简直无暇看书（有时连报都来不及看），增长我对于主义的认识．我很惶恐，我很希望你们应时常将学校的材料不断的供给我们，使我们不能抽空读外国书的国内同志，在你们的材料中得着一些增长主义的知识才是呀！

祝你们努力！进步！

你们的同志红 鸿

二月五日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

共产国际就孙中山逝世致中国人民大众书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工人、农民同志们以及中国全体劳动者！在你们民族悲哀的日子里，共产国际和你们一起痛悼中国人民革命政党的领袖孙中山的逝世。孙中山为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毕生从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正在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东方被压迫民族，都景仰他的名字。

同志们！孙中山一生的道路是一条反对中国人民压迫者的革命斗争道路。这条道路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为开端，继而是同妄图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反革命军阀作斗争，最后，在辛亥革命以后，又同瓜分你们国家的世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

东方现已走上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各国奴役殖民地的斗争道路，而孙中山就是东方的代表。孙中山是热爱祖国劳动人民、憎恨一切压迫形式的赤诚的战士。几十年前，他在年青时代，就已开始组织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同清王朝这个帝国主义掠夺的工具进行斗争。二十五年前，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中国人民遭到了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血腥镇压，孙中山就决心以自己的余生同帝国主义作毫不妥协的斗争。

推翻中国君主政权的辛亥革命是和孙中山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在流亡中，把一切敢于同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作斗争的优秀革命分子汇集起来，建立起革命的组织同盟会。

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者虽然进行了英勇斗争，辛亥革命终不免半途而废，中国人民没有得到好处，而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资本主义列强却坐收渔人之利。这种情况是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孙中山的革命团体也没有吸引农民参加推翻君主政权的斗争。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放下武器。他再次聚集各革命团体，组织了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并提出保卫革命的唯一成果、保卫共和国的任务。

中国南方的广东省，这个孙中山的故乡，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是革命的根据地，是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因此，它也就成了英、美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大炮和驱逐舰的轰击目标。

孙中山在他的晚年为中国人民建树的功勋，尤为卓著。近几年来，他不顾年迈，借鉴了伟大俄国革命的经验，懂得了政党的作用，学会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方法。

同志们，孙中山是战士，是中国革命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反对国内反动势力的坚定不移的人民领袖，对于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他有着真正伟大的意义。孙中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然而他十分理解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斗争同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休戚相关。

中国工人和农民同志们！在你们的领袖孙中山逝世的悲痛日子里，共产国际呼吁你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周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把这位

去世的国民党领袖几十年前所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

共产国际号召你们，要象你们的领袖那样，坚定不移地同蓄谋歪曲孙中山立场的人、同蓄谋让他的党向帝国主义者妥协的人作斗争。共产国际将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人民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将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支援中国劳动群众，而且坚信，国民革命的政党——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一定会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依靠人民群众，继续走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的斗争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逝世的领袖孙中山所坚持的道路。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万岁！

中国解放万岁！

劳动群众得以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载1925年3月14日《消息报》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中共中央为孙中山之死致唁中国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革命尚未成功，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遽尔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此哀耗，不胜悲悼！中国共产党对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临终之政治的遗嘱及其毕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之革命事业表示极深之敬意，并希望贵中央执行委员会承继此伟大的革命遗产，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到底！

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山先生的肉体虽然死了，中山主义——即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主义，和他手创的国民党，决不会如一般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们的预料，随着中山之死而濒于危殆。中国共产党相信伟大的集合体指导革命，比伟大的个人指导革命将更有力。中国共产党更相信今后的国民党必然仍为中山的革命主义所统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团结一致。这种内部的统一是中山死后防御敌人进攻的必要保证；然而这种统一必须不是违背中山主义或修改中山主义的统一，而是真正建立在中山革命主义之上的统一。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也必须这样的统一才是防御敌人进攻的真正担保和完成中山志愿的真正前提。

中国共产党敢以上述的敬意与信念致于贵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前，希望贵党于中山先生死后更增加勇气，忠实的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阶级热烈的愿与贵党协力奋斗到底，即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国际下的一切友党皆将与贵党以恳挚之同情和援助。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

——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的左派力量

（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①

中山死后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工作：1.是借追悼会做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紧的是根据中山遗言（已由上海书店汇印出来了）做反帝及废约宣传；2.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主张即下全体党员动员令，公开的征求党员。在此次征求党员运动中，我们的同志应特别努力，因为在中山死时由我们征收的党员，都可望与左派接近，乘此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此时我们在国民党中还是极少数，倘不能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不独第二次选举要失败，即平时亦无法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因此扩充左派党员之数量，是我们目前在国民党中工作内最紧要的政策；为实现此政策计，有必要时，亦可在工人区域发起国民党的组织；至于国民党右派有可能而且将要到工人区域去组织的地方，我们更须先去组织，占据机关，方不致使右派侵入。惟同时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工人群众中，须加紧宣传民族争斗虽然重要而不能代替阶级争斗的理由，并须宣传民族的党和阶级的党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众不至民族主义化。

各地同志对于上列二事——反帝，废约之宣传，及扩充左派——均须即时努力进行！

---

① 这个文件是团中央转发的，月、日是转发时间，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团中央转发的一段话如下："兹接大学第十九号讲义，转录如下，即希切实执行。"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

——关于加强对国民党工作[1]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

C.P．及C.Y．两中局兹拟定关于国民党工作最近应努力进行之事如左：

一、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颇有发展的趋势，我们的各地同志即应趁此趋势活动起来，并决定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

A．用国民党名义，令各区分部组织讲演队，每星期出外讲演，宣传国民革命。

B．刊物及演说，均劝人加入国民党。

C．印刷请填写姓名地址加入国民党的纸条子，附载当地国民党党部的通讯处，以便愿加入者之接洽。

D．各处县市党部应即速正式成立，并增加地方及人数；各省正式省党部至迟亦必在七月一号以前成立。

二、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

A．选我们的同志及民党左倾的分子，组织宣传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我们的同志做政治报告，并报告党内左右派的争执及右派的反动行为：如冯自由、彭养光、凌毅、马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俱乐部，投降段、张；李烈钧、石青阳、谢持、居正等勾结联治派唐继尧破坏广东政府；马素、劝家彦、周颂西到处宣传苏俄是红色帝国主义；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时，右派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的名义散放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上海全市党员大会电促广东将领反对唐继尧，石克士等竟通电否认等。

B．区分部开会，均令致函上级党部，派宣传委员出席。

三、各地同志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宣传时，应注意左列数点：

A．说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只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仇敌，小资产阶级分子无恐怖之必要，革命的国民党更无反对之理由，不要上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当，帮助他们反对共产党。

B．根据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演讲，攻击国家主义是要阻止阶级争斗，妨害下层阶级势力（革命的主力）之发展，及离间国际革命势力之联合，这两层都违背中山先生革命策略。

C．攻击国民党最流行的“家人父子的政党观”——这是最妨害民党分子认识主义和党的纪律的。

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本月十号在广州开全体会议。C.P.中央已决定意见七条，各地应即用电报或快邮向此次中委会议表示此意见中（一）（二）（四）等条的主张．

C.P. 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

C.Y. 中央总书记　张太雷

⑩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

——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①

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争斗，非常重要，必须在此种争斗上得到胜利，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才能得到胜利。学生青年在国民运动中占重要的地位。

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帝国主义者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尤其要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在民众中宣传。在组织上有时应联合国民党右派打倒国家主义派。

和国民党右派的争斗，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以巩固并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解释三民主义时，不可多涉理论，最重要的是用如何方法，如何力量，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要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争斗，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更进一步非到共产社会，民生主义不能算完满成功。各地民校的出版品，各地委的宣传部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切实管理之。

在组织上各地应迅速在学生中，在自由职业者中，在农民中，在手工业工人中，发展民校的区分部，但必须是左派的。右派领袖们已宣告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他们的用意不但要推翻北京之执行部的政治委员会及江苏省党部，而且要进而攻击国民政府，民校各级党部应即通电全国党部，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其理由是：（一）开会未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之通知召集，手续不合；（二）开会地点不在革命根据地，而在段政府之势力之下；（三）发启通知开会者有覃根〔振〕，石瑛，居正，石青阳，茅祖权等，未与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脱离关系。通电中并应说明此时革命工作南北俱在发展中，全国同志均应同心协力，努力工作，即有不同之意见，亦可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发表，以图解决，倘舍此不图，正当革命工作吃紧之时，竟站在广州中央最高党部以外，站在国民政府以外，标榜异议，迹近阻挠革命工作，而为全国同志所不取。同时亦应严促广州中央迅速定期召集第二次全国大会。

---

① 这个文件是团中央转发的，日期是转发时间，团中央转发的一段话如下：“兹转录大学第六十五号通告如下，”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

——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帐

超　麟

"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势不两立，无论这个国家主义是最'公平的'，'纯粹的'，圆滑的和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国际主义来抵制所有的国家主义。"——列宁

中国反共产主义势力之联合里头，近来又新添加了一支军队。这就是登报明白宣言反对共产主义的醒狮报派。这一支军队的作战方法和其余反共产主义各派势力所不同之点，在乎这一支军队知道有系统地提出所谓绝对的国家主义来抵制共产主义，而其余各派则只能无系统地临时摭拾所有学说——自三纲五常到无政府主义——来攻击他们，所谓"过激主义"。我们从第一期至第十八期醒狮周报的国家主义之宣传看来，觉得如果还以为这种宣传不过是留学生夹带来的舶来品之拍卖，那将是我们的错误。所以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就是说，指出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我不说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因为他们在中国还未拿这个党向中国人公开，还宣言"无偏无党"，虽然这个党在其策源地——法国——已经发展到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著名敌人——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对于中国民众有甚么意义，乃是我们的责任，而且现在也已经是时候了。

（一）中国目前的状况怎样会造成这一派国家主义？

醒狮派在中国宣传国家主义并不是象留学生带回一些外洋的奇巧物件给好奇的中国人见识见识。不是的。他们乃是预先调查过这种商品确实能在中国找到销场，才贩买过来。

果不其然！现在已经被他们卖出去十八期的醒狮周报了。这里便有一个问题要我们答覆，即国家主义何以能在目前的中国找到销场？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目前蓬蓬勃勃的民族革命运动虽然从五四排日时候出发，但中国被压迫民众在这个运动中有了明确的观念，知道中国的混乱是帝国主义利用军阀造成的，因此趋向于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这只是最近一二年来的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由原始自然的状态之所以能这样进化到觉悟的状态，其原因是五四小资产阶级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后，接着得了新兴的无产阶级之参加。无产阶级起来造成了最前进的共产党，明确地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走之路：无产阶级起来促成——国民党改组，使国民党趋向于走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正轨。由最近一年来事实的表现，特别是旧时参加民族运动之一部分势力变成反动之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真正的意义，同时又估定了以前几次民族运动，如戊戌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的价值。我们知道中国的被压迫民众起来做解放运动，决不是因为他民族轻蔑中国的文化，侵犯中国民族的尊严，如以前小资产阶级学者所解释及现在国家主义者所解释一样的，乃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将中国殖民地化了，使中国人生活在难堪的条件之下做纽约，伦敦大托辣斯业主的牛马，他方面帝

⑩

国主义，可以利用一部分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额外利润去收买本国工人贵族之一部分，以延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爆发。这个意义，最少，实际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人是应该明瞭的。但惟其如此，惟其民族革命运动的目标是在推翻帝国主义，所以一方面政治上落后的群众，保留旧时民族运动中的错误观念，或受国外的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之影响，彷佛以为反对帝国主义就是排斥一切外国人，排斥外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的无产阶级，他方面狡猾的帝国主义知道镇压民族运动不是仅仅一个暴力所能奏效，于是用尽种种造谣和行贿的方法，务必使这个运动自身抛弃国际主义——唯一的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的武器——的倾向，而政治上落后的群众乃不知不觉坠落在帝国主义牢笼中了。中国现在的国家主义就是这样地宣传起来的。政治上落后的群众又受帝国主义之宣传，自然对“共产主义怪物”发生恐怖，所以国家主义必然要反对共产主义。

（二）甚么是国家主义？

甚么是国家主义？我们的国家主义者之第一个理论家——因为他是以学院式文字引用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学理，发挥中国的国家主义给我们看的第一个人——李璜教授告诉我们说：“国家主义的发生，不过近百余年的事”。谢谢李璜教授！因为这样，他使我免得多费许多气力来说明国家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产品，换过来说，就是到了资产阶级社会里头，才有国家主义这个东西。

国家主义，无论其为侵略的或自卫的，都是这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别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争夺商品的，原料的，劳力的和投资的市场，而使用的一种政策。

这个定义不是从“辣罗斯字典”抄来的，是从各资本主义列强的立国看出来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长大起来，因本阶级经济利益要求，为发展民族经济而倾向于组织一个民族国家。意大利资产阶级反抗奥大利皇室，德意志资产阶级反抗拿破仑，革命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抵抗全欧的专制国家之进攻：这都是自卫的国家主义，不错。但资产阶级是为全民族的利益起来奋斗吗？不是的。实际上资产阶级推翻外力的压迫为的是创立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单独剥削自己的无产阶级，吸收自己的工农用劳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尚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说高倡“一般的”民族自由，否“一切的”民族压迫，但到了取得政权，驱逐旧统治之后，资产阶级即刻露出其面目来压迫别的弱小民族。拿破仑压迫西班牙意大利等，俾斯麦割据亚尔撒斯，劳兰，意大利资产阶级枪毙安那多里的土耳其人等：这些事实都可证明，所谓“自卫的”国家主义与侵略的国家主义初无二致，而且一切国家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保护自己阶级利益之一种政策，更使我们一目了然了。

以上所举只是初兴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实例。国家主义之发达是与二国间资产阶级利益冲突之进展为正比例的。帝国主义时代，此一国与彼一国的资产阶级中间利益之冲突更加激烈，已经爆发为世界大战；在这个时代，国家主义自然成了资产阶级最厉害的工具，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工具不但可以进攻别国资产阶级，而且可以紊乱本国无产阶级之觉悟，缓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怒潮。种种事实昭然在人耳目，无须再为引证。然而坚决地攻击一切国家主义更是我们的责任了。

最有趣味的，就是醒狮第十五，十六两期中，李璜“答客难”文中之“答共产主义者”。李璜先生拿自己见解写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来，随即拿资产阶级的学者比舍尔教授，热佛查尔教授，深尔干教授，里沙尔教授……和李璜教授，学说，把他的“马克思主义”攻击得体无完肤，然后断定说：即许马克思主义的公律能够成立，中国也不能

行共产主义，何况马克思主义公律还不能成立，你们怎样能用这个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来非难我这——自然是已经成立的——国家主义呢？李璜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无知”（L'ignorance）实在是太令人可怕。我不相信我在此文中用得着和他谈谈马克思主义的ABC。

（三）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为甚么根本是反动的？

十八期醒狮周报中，醒狮派国家主义根本反动性之縱现，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他们登载攻击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文章，他们称赞广州商团，骂中山顽强。他们攻击苏维埃俄罗斯，攻击各国共产党，非难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他们译登“德国，德国，于兹世界独绝”的帝国主义歌曲。他们要分别对付各个帝国主义，不愿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在思想上尤其是复古的。他们说甚么“精神生活”，说甚么日本美国文化不及我们万一等等“东方文化”“精神文明”之论调，其反动性实驾研究系及前清遗老而上之。此种实例可举的还有很多。我们不必多举，我们现在只说明为甚么他们是反动的。第一，他们是一群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东西洋留学生，南北各大学教授”——，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较易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第二，他是政治上落后的群众心理之反映，知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之民族革命运动已经起来，但只能跟着群众尾巴，不明白这个运动的真意义而反以错误的思想来解释这个运动，譬如曾琦一批人三年前是反对政治活动的，崇拜张謇，黄炎培的，现在也居然组织政党起来了，也居然反对郭秉文了。他们的危险也就在乎跟着群众走去，而时时以错误的观念摇动一部分落后的群众。

（五）谨防扒手！

中国被压迫民众得无产阶级前进分子指导，已经走上民族革命运动之正轨。但他们应注意：在他们尾巴后还有一部分人，跟着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但又时时教他们拒绝无产阶级国家之援助，教他们排斥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被压迫的民众们！没有世界无产阶级及其第一个国家之援助：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不会胜利的；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民族运动必定如以前几次运动之成为流产。国家主义者附和你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呼声是假的，断绝你们的外援与内应，使你们运动孤立失败，才是他们的真志愿！谨防扒手！

代英兄：寄这篇论文给你，请赐登中国青年。此文是醒狮周报第十八期出版那时做的，现在该报已出版至第二十四期了。由这最近六期看来，青年党的反动性排在我们面前愈加明显。他们正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不脱封建思想的智识阶级”。他们现在口头也说要革命，他们从前也参加过文化运动，但是评判某个派的行为不应只以其皮面上的表示为标准，我们应当看这个党派对于重大问题的立起点如何。断定青年党及其机关报“醒狮”的言论在中国民族革命中是反动的，我们只须根据这一次他们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号”就够了。在这一号里，我们不用举别的言论，只曾琦这一对挽联和一段按语，就把他们的反动性和盘托出了。他们说孙中山先生误信陈其美而与黄克强派（老国民党的右派）分裂是中山的失着，这与研究系说“中山精神一死于孙黄分裂之时”根本有何不同？最妙是他们说孙中山受了陈独秀的致命伤，因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以后，使孙中山失却了三派人的同情。那三派人呢？他们说得真对：（一）是海外华侨——即中山先生所说以后不能革命的华侨，（二）是国内“绅商阶级”，——大商买办阶级如陈廉伯，和逢迎军阀的绅士如郭秉文，研究系诸公；（三）是“爱国派青年”，——自然是提倡

"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赞美广州商团，反对共产主义这一派青年了。他们说得真对！因为国民党改组以适应今后革命要求自然是不敢希望这种海外华侨，这种"绅商阶级"这种法西士特的青年党之同情了！然而醒狮的反动性也就从这挽联中表现给那班不大明白青年党底细的人去看。

（选自《中国青年》第72期，1925年3月28日出版）

评醒狮派

代英

我对于醒狮派诸君，前后有三种不同的感想：

在余家菊，李璜二君“国家主义的教育”初次出版的时候，我只感觉他们有“唯心”的弊病：他们说到要拔救中国民族，不从打倒中国的经济压迫上着手，专门说些提倡教育，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这都是二三十年来经许多人鼓吹而没有功效的话。在那时候，我是尊重他们谋中国独立的意见的，但是我只可惜他们因为偏于“唯心”，所以找不着合当而有效力的途径。

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是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他们反对黄炎培，郭秉文，亦与我们一样，但我们是要引起民众的觉悟，使民众自己组织起来；他们的意思，却只是说这一派士大夫是太糟了，须得另外换一批好的士大夫来——或者便是换他们自己。士大夫之不能救国，是有他们的客观原因的，他们的生活并不十分痛苦，而且时时有机会“出卖”救国事业以自求荣利，所以他们在没有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民众站在背后，结果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然一一都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所以我虽不疑醒狮派诸君今日已是彼等一流，然而我对于他们不注意下层阶级群众，但欲继续彼等之覆辙，把自身供试验，终于不敢放心。

不过我那时还以为救中国民族，他们纵与我们不能一致，并非便不能同力合作。我们假定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然而中国革命既有各阶级合作的必要，则使他们能努力革命，至少亦是我们在向帝国主义作战时的伴侣，所以我以为我们在理论上互相争辩是可以的，但不应因此便以为不能合作了。

然而到近来从他们的言论，令我怀疑我自己这种意见。他们名为讲国家主义，其实对于帝国主义的罪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实况，似乎还没有多少精力顾到；他们最大的努力，处处看出只是一个反对共产主义。我们本不希望一般小资产阶级的人，都能信仰共产主义，不过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只是帝国主义或资本阶级的仇人，总还不至于受那些名为反抗强权讲求民生政策的醒狮派这样深恶痛绝。我们不必问苏俄是否强权，共产党是否卖国派；今日有眼睛的人都看见苏俄是最以平等待中国的国家，共产党人最坚苦奋勇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过他们的革命生活。我们便令承认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是对的，请问今日不努力攻击现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卖国军阀，却专来无理取闹的设想出苏俄怎样侵略中国，共产党怎样卖国的话，攻击苏俄与共产党，究竟有何道理？我们愿意与一切革命的党派合作，但我们希望他们革命，不愿看见他们把革命的事业放下，反转只顾和比较革命的人为难，象那些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一样。中国的共产党人，被一般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们诬赖造

谣，是已经很多的；不过稍知事理的人，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牺牲英勇的精神，他们的刻苦努力，为中国农工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亦应知道自己愧勉。他们在现在统治阶级之下，决不能到法庭去与那般走狗们起诉，要求恢复名誉，他们的出版物，亦且受段琪瑞以及上海工部局的严重防止传播，决不如醒狮周报在被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之能通行无阻，便在这一点，醒狮派诸君亦当反躬自省，不好随着流俗悠悠之口，被识者所耻笑！我勉励醒狮诸君节省些有用的时间精力，多向帝国主义，军阀下攻击，让我们看看你们革命的真面目；倘若只是象今日，因为不高兴那比较革命的共产党，却把革命正当的工作放轻，专门帮着无聊的流氓，来做这种反共产运动；诸君纵在本心并不欲帮助帝国主义与军阀，客观上却正合他们的需要——这怕便是醒狮周报之所以能不被邮局查禁的原故罢？现代评论都被查禁了，醒狮周报要象今天这样下去，我想还有一天被段琪瑞所嘉许而助其推销呢！

（选自《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出版）

〔附〕释国家主义（节录）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一月）

李　璜

（一）国家主义的真意义

请先言国家（La nation）。国家是甚么？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权；而此人民本其自爱的心情和其生活的条件，此土地也，不容人侵夺，此主权也，不容人干犯；有前人时时缔造的艰难，即有后人世世保守的责任，有一种特殊文化的贻留，即有一种相当感情的回顾；因而国家不独有其实质，又复具有其灵魂。

中国人有这样的国家观念没有呢？曰：有。就常识言之，中国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观念，又何必反对欧美人来在中国开发富源？同是世界的土地，让世界上的人来开发，又有甚么不好，而中国人无论何党何派，必一致起而反抗之，可见中国人未尝不知有国家。

然则中国人便能说都有了国家主义（Le nationalisme）吗？曰：未能。主义者有一定明瞭的意识，不徒恃盲目刺激的感情。社会学家曾在社会的趋向上面分出两种状态：一种是含混的状态（état liffus），一种是意识的状态（état conscient）。在含混的状态之下，趋向虽似乎一致，然而彼此善恶的判断既不一样的明确，彼此所标的对象便有远近之差，彼此所具的分两便有轻重之别，因而说法便多端，感情便散漫，而动作起来便减却了多少的力量。所以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便是要将这种含混状态的国家观念，加以明确的解释，诱进之使为意识状态的。

本来一种对于社会上的主张都是根于这种含混的社会心情，这种社会心情，又本乎这个社会的历史，换言之，即其自身的组织与其所处的境地。因此一种主义并不是少数人可以不问社会情形，随意杜撰，随意移植的；历史不同，境地两样，心情便异。徒有主张，不能共喻，不能相生，便不能同往。譬如在从前中国还不知有外国而以国为天下的时候，便来提倡国家主义，或是今日中国还没有大实业而未成资本制度的时候，便来提倡集产主义，都是

一样的违反了这个不可抗的事理。主张国家主义的中国人也无非是认定在社会的进化程途中间，此时具有这样的组织，处在这样境地的中国有国家主义的要求与必要，因又从而长养之罢了。这种主张是应乎时势而生，是一点不用勉强手段的。

然则国家主义的要求是些甚么？我们上面说过，国家主义并不是少数人的杜撰，则其产生与其意义，自有他的事实的根据和历史的背景。请略述之。

原来国家的存在虽已是很早的事，而国家主义的发生不过近百余年的事。这是因为拿破仑要想征服世界，已经将许多国家用兵力压制在他的威权之下。于是被压迫的国家便由于这种境地生出“国性”（La nati onalite）的问题。受拿破仑之威迫最甚者为德意志与西班牙，于是德意志与西班牙对于这个“国性”的要求也最烈。于是“国性”的学理便一时流行于政治界，全欧各国家随着这个学理而有趋于改造的现象。

“国性”乃是国家的人格。每个国家从其静的（Statique）组织成分而言，有其种族之不同，地理之不同；自其动的（Dynamique）组织成分而言，有其文化之殊特，信仰之特殊，于是每个国家所有的国民其生活的志愿便不能尽同于其他一个国家的国民。本着这个特殊的生活志愿，便发现殊特的生活状态。因此由内而外，皆认识得一个群体的自我（Le moicollectif）：这便是国家人格的构成与表现。每个国民在性情与行为上皆具有其国的国格。我们偶一接触英，法，德，日等国人，便分别出他们各国的人性情不同，思想两样。我们可以一一指出他们不同的特点来。这些特点便是国民的样范，（Lcs types nationaux）。法国国民有法国国民的样范，英国国民有英国国民的样范：未有一国国民的人格不表现出他的特别的样范。明白言之，这种每个国民人格的放大便是国家的人格，这种国家人格的缩小便是每个国民的人格。所以国家人格受了损失的时候，国民人格便立刻感觉得受了损失。全靠这小己与大群的情感意志相粘着，相影响之力，便成功国家的意识（La conscie ce natio naie）和国民的灵魂（ames dupeuple）。

国性问题及其学理便基于这个国家意识和国民灵魂，在拿破仑威力最盛时代，在被压迫的国家里，大事活动起来，对内唤起国民的精神，对外要求民族的独立，拿破仑虽挟雷霆万钧之力，而终莫可如何。但是这个国家意识，国性问题的显著，一半虽由于拿破仑压迫，一半还与当时文化的程度与交通的发达有关系，然后方才真正认识了彼此之不能苟同，彼此之不能受制。卢梭对于这一点最看得清楚：“一文化愈进步，社会意识愈明瞭，由回想的生活而方了然于彼此权界之义。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间方显出了自由的人格。野蛮人是随乎习性的生活，只知服从强力，施用强力，而不知主张其相当的权利的。”（见法国社会学年报第四卷第一四一页）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诸文明国家既已有了明瞭的国家的这个社会生活，而交通发达，一国内的人接触频繁，而与他国人接触亦频繁，因此既十分认识了本国人，更渐渐认识了别国人。于是黑格尔所谓的一国国民共有的“志愿的统系”（Le systēme de volontē）便自然发生。这种“志愿的统系”既成了一国国民的“智识的本体”（I′essence intelligible），所以万万受不得外国的无理压迫，而要全国共起，以谋抵抗。因为有了这回抵抗，志愿愈坚，团结愈紧。因此，拿破仑之压迫便恰恰足以助成国性的伸张，民族的独立。随着拿破仑之败，“国性”的要求便在历史事实上大大发展起来：最著的如一八一五年日耳曼联邦之成立，一八二七年希腊由各国承认而独立，一八五六年加富尔之再造意大利，一八六三年镰刀党之要求新波兰，皆本这个“国性”的主张。既然这种主张深合乎事理民情，而又有了德意等国的大成功，于是国家主义的思潮便势不可遏，传遍全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

都随之而起。十九世纪中间，以国家主义相号召相集合的政党，便不断的成立于各弱小国家中：爱尔兰国家主义党专以之对英伦而要求独立，捷克国家主义党专以之对奥国而要求独立；波兰国家主义党设于全欧而为独立的运动；土耳其青年党也同此意义。——这四个国家主义的政党在今次大战后都成了功：波兰，捷克，土耳其均已复国独立，爱尔兰虽未能完全独立，但已得着相当的自由，不过爱尔兰国家主义党不能满意，而尚在极力运动中。

法国在一八七〇年大败于普鲁士，受了城下之盟，于是国家主义的思潮便也张大起来。一起首便由他们教育家出来主张以国家为前提的教育方针，风行全国。后来因为得来非事件（I'affaire Dreyfus）发现了有人卖国，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国家主义的政党，出来专反对外国人在法国国内的势力；而尤其注意于犹太人的行为。后来虽发现得来非卖国事件不确，而此党仍旧成立，以至于一九一四年，欧战开了的时候，便由此党出来主张，不分党派，一致对德，于是有右党的以国家为前提的联合（Blo national）与共和派以国家为前提的合作（Carter nationaee democratique）。其宣言均以一致反抗德兵侵凌与保障法国领土主权为言。

战后德国因受凡尔赛条约之压迫及英法兵之久占其领土，感受痛苦甚深，于是以国家主义相号召的政党复盛于其国中，但分两派：一派以旧日军官为首领，力主报仇雪耻，法人呼之为急进国家主义党（Parti ultrnnationaliste）；一派以文学者及政治家为首领，以抵抗外力，重兴德国为务。这后一党要算是现在德国政治界最占势力的了。

国家主义的发生及其政党的成立略如上述。本着这些历史的事实和国家主义者共有的要求，而国家主义的定义遂如下式的发现于辞典字典中：

国家主义乃是对于其所属的国家而特有的一定的志愿（La Prēference determinoe Pour ce qui est propre a lanation a laquelle elle appartient）。

国家主义乃是被压迫的国性的政治上的要求（la revend ications Politiques des nationalites opprimees）。

国家主义乃是疾视一切所有不以国家的旧信仰为根本的学说（Qui consierecomme mauvaise toutedoctrine dont le fondement n'est pas la trabition nationale）。

国家主义乃是反乎国际主义而言（ils'oppose a l'internatinalisnrc）。——（以上定义皆见法国辞典Nouveau Larousse与Larousse uniiversel中）。

国家主义乃是一国国民对于其国所特有的一定志愿，国家主义乃是被压的国性的政治要求，此二要义已经在前面略为解释。至于国家主义何以疾视一切不以国家旧信仰为根本的学说？何以反乎国际主义而言？下节当释之甚详。我们还愿再在这里对于“国性”问题继续说几句话，因为集产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尔斯本他们的经济史观，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本他们调剂生产力的说法，都在否认这个“国性”的存在，我们不能不将他们的说法略为评判一下，以便两相对照更表现国家主义的真意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尔斯专是从经济方面着眼来解释社会现象的。他很足以表示出他们的意思的两个字，就是社会的信仰，组织法制等均是“空虚的间架”（Superstructure），惟有经济才是“实在的间架”（Inflastructure）；也是从生产力（Foi ces Productives）来的，这个力又是从平民阶级来的，因此他们只见着阶级的利益才是真的，国的利益乃是假的。主张和实行国家主义，无非是某一阶级欲藉此说以拥护他那个阶级的利益罢了。譬如马克思解释德国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七〇年的建国运动，便完全以为这是德国资本阶级主张他的

阶级利益的运动。他以为其所谓"国性"乃是一种"阶级的国性"(Nationalite de classe),这种资本阶级的国性的要求，是平民阶级对之不能生出感情，而所不愿意参加的(大意见Charles Andler的Commentaire du Manifeste communistcp.69)。

蒲鲁东虽然主张无政府主义而与马克思异其旗帜，但他也是特别注重经济生产力。他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认国性的成立在足以蹂躏生产力，防害生产力，他要想把这个国的范围除去，然后才能得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平均。因此他在书中特别加上一章，叫作《反对国性的原理》(Contre le Principe des natio nal tes)。他为拥护他那个超国界的生产力平均的说法，他简直承认维也纳条约宰割弱小都是对的。因为足以平均一部分生产力。他甚至说波兰既已表现无能力再生活下去，便该当让别人来开发以平均生产力，不该当再要求独立生活了。(见原书P.320,324)

克鲁泡特金要比蒲鲁东的主张温和一些。他在《一个反抗者的话》(Les Paroles aun revolte)上面说明，国与国争纯由经济使然。普法之战便是柏林银市与巴黎银市的战争。照他的意思，只要这个国与国的经济纷争一旦解除，则国与国间便不会再有战争了，于是也就无分国与国的界限的必要了。

马克思与蒲鲁东，他们俩对于取消"国性"的目的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俩皆纯从经济方面着眼却是一样的。我们一到眼，便可以觉着他们以经济史观、唯物观念来解释国性，否认国性的说法过于简单。所以他们的结论便都自然而然的走到偏激的地步：一个说国性是资本阶级的，平民对之不会生出什么感情，而且是他不该当要的。一个说国性原理根本不能成立而且有害，因此波兰便不该当再要求独立了。天下事那有这样简单的道理！最可怪者！马克思蒲鲁东都是根本主张自由与正谊的人：个人的自由正谊，阶级的自由正谊便千真万真，一个人与阶级受了压迫与侵凌便能生出"不平则鸣"的情感，而一个国家受了压迫与侵凌，便不能生出要求独立的情感。这未免有些不合逻辑的道理！因此关于"反对爱国情感"一义，就是马克思的门徒也觉不能始终主张。意大利一个信奉马克思学说的健者拉卜里约拉(Labriota)便在他那本论加尔仑马克思书中指出，一国家要求独立的需要与一阶级要求独立的需要是根于一样的情感的。他书中最明瞭的话是：如果反对爱国情感这一派(Antripatriotisme)一定要坚持到底，引申到头，他会一直的自家弄得否认了他本意所欲辩护的"阶级战争"。因为阶级独立的需要，其自身也是基于一种情感的事实。如果谁觉得国家要求独立这种情感，不合逻辑，那吗便该当觉得阶级的要求独立这种情感，也一样的不合逻辑。(见原书法文译本。P.211)

况且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国家所以能够成立的要素不独在经济所需的实质，特别在历史所付的灵魂。德罢朗特(De Barante)说得好：一个民族的"国性"的成立是基于他的过去的回忆的；这种回忆并且是全民族，无分阶级，都一样具有的。所以一遇外界激刺，便同时一齐感觉得不安：一个国家被侵凌了而全国国民都要起来抵抗，便全靠这个共同回忆而发的情感；绝不是只靠利益的观念。不然，何以马克思本人平时只知有阶级利益，不知有国家利益，而到了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要开的时候，当时德国国内空气特别紧张，他这些轻视情感的人也动了感情，发出第一个宣言，承认"德国有自卫之权，因为他被人侵犯了。"战争开了，空气平静一点，马克思才变了论调，发出第二个宣言，劝两国平民要停止战争。但是完全不生效力。德国工人既不断的打着马克思所谓"自卫"的旗子上前线去，而法国"巴黎工人国际联合会"也都到前线去打冲锋去了！(详见C.Guyau的Leme ssagedes sectionfra

ncaises de l'lnternatonal apres Seden马克思两个宣言文见Charles Longuet译本La Commune de Paris中)

马克思这个失败，不但足以证明国性的学理不单是为的经济利益，而且足以见得平民不只有争面包的问题。不然，为什么在巴黎工人国际联合会为主任干事平日那样主张得起劲，——马克思很夸奖他们，——而德兵一入法境他们便忍不住的要去效死呢？这就是因为工人对于国家还是一样的有共同的回忆：无论何人，他的人格绝不只受经济生活的支配，他有社会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感情的生活。则一国亡了，岂能说那一国内的平民便无所损失吗？至少他们精神上，感情上之不安与其他阶级的国民是一样的。

国家主义的真意既不只是建立在经济上，则纯从经济方面着眼绝不足以说明国性，纯从精神方面下手，绝不足以破坏国性。此所以共产主义自马克思以来日日欲将他们的“阶级战争”做到超国家的地位而至今未能！

（二）国家主义的真精神

我于前篇已略说过，国家主义乃是基于一国国民所共有的志愿，则国家主义的精神所在，已略可见。兹篇愿进而细细的阐明此特有的精神：

唯物史观的集产主义以为社会只受经济条件的支配，人生只重物质欲望的要求，换言之，只要大家肚皮一装饱，则万事如意，天下太平。无政府主义也对于他的理想偏于经济方面的解释，以为只要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地位，便算满足了人生的理想。集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都未免把人类看得太简单了，生活看得太机械了！人类不只是一个饥了要食，渴了要饮的机体，他还有喜怒哀乐爱恶这一些情感，明白言之，他不但有物质的生活，而且精神上的生活还更重要一些。孟子把这个意思说得最清楚。他道：“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所以我们常以为中国儒家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理不是讲唯物史观的人所能了解得到的。人生不是死板的，随着环境与习性得过且过便算了，他时时都有一种愿欲，一个要求。所谓“生之欲求”（Vouloir-Vivre）是继长增高，无时或已；而且精神上的欲求比物质上的欲求还急迫得多！一个人精神上无所系属或有所需要，往往虽有美食，不能下咽，虽有华屋，不能安寝；因此食前方丈，席丰履厚的人常常还羡慕坐树荫下吃黑面包的人之乐为不可及：人生苦乐的悬殊或大半在此而不在彼咧！

执此义以推理，然后举凡精神上的事物，伦理上的主张，便有了他的真实的根据地，而为经济史观的论调所不能动摇得到。试略举一个实证来说：

欧洲人的物质生活总比中国人丰富多了，欧洲一个工人每日的享用远过于中国的缙绅。以欧洲人比较中国人，真可谓特别有生之可乐，该当是特别惜死之可悲了！然而每逢国家有了外患，或被人凌辱，或被人侵犯，则欧洲人无论英、法、德、意，那一国的国民皆不能一日安于故常；很规律而且熨贴的一日三餐，很温柔而且美丽的少妻稚子，沙发椅何等的舒适，比雅乐何等的悦耳，皆一旦舍去而不顾，置身战壕，饱受炮弹，十人而九死，怀唯物思想的人看见这种情形必定很诧异道：何苦来！何苦来！无以为解释，则仍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推论此不过由于少数缙绅阶级欲保全其私利，或图谋其荣名而假执政的权威以驱众人于死域而已。是说在事实上不可通的地方，即是欧洲习于为国而死的国民皆系采的征兵制度，人人须当兵而上前线；战争一开，缙绅亦不能侥幸免死。死既不能免，私利又于何有？假使人生只重物欲如唯物主义者所言，则物质上最能满足之欧洲缙绅绝不打这样蠢的算盘。

即使少数将算盘偶然打错，多数又何以如此其信从之：前仆后继，父促其子，兄促其弟，“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诗人史家哀惋之辞，毫无所动于胸中，是何所为而然？是不能不说本国家主义而为牺牲者有精神上的要求的原故。

我们既不能不承认这种爱国精神的存在，于是更进而解析这种精神，说明这种精神。

解析精神上的事物，在一些哲学家眼里看得很神秘。他们以为凡属心理尤其是感情的现象，便不能解析而且难于说明。他们便付给一些神秘性在精神生活上面，使他变成好象不可捉摸的东西——便有时因此引起唯物思想的一种反感，而遂生出唯物方面的解释：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中间交替那一百年的哲学思想，便是神秘派惹起唯物派的反响，而唯物主义特别反精神主义（antispitualistn）以自张其军。

近今一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对于解析精神上的事物又另有其蹊径。他们应用生物学上的环境说，遗传说，感应说，将精神生活的来源大半归之于外界的陶熔和社会的影响。譬如说爱国，则近今一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大半说因为一个社会里众人都爱国，潮流所及所以一个人便不能不爱国。并且既有了国的生活，受着许多这种生活上的激刺，所以爱国心便随着这种国的生活为相对的发展。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这种说法当然比一些哲学家那种神秘态度高明多了。他们究竟给我们一个解答。而且这个解答。将我们生活实况的各方面都顾到了。不过他们不能使我们十分满意的便是这“爱”的源头他们终没有捉住。他们说众人都爱，所以一个人不能不受这种潮流。那吗，这种爱在他们看来，似乎有些被动和勉强的意思。说他被动和勉强本来未始不可：因为玄学上的“个人自由选择”（libre arbitre）一义本来是难通的事，不过爱的趋向虽不能不与外界生活生密切关系，而爱的本体（或称良能）终有他的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谈感情生活，在在不能离却人的天性说话。认识了天性上本有这种爱，则爱国，爱乡或爱人方有真实的源头，而不是虚浮的。于是方了然我们爱国并不是随声附和或有意铺张，是本乎天良而又缘于实际，有不得不然的意思。

孟子最能形容出人之天性，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他在前面更设证道：“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这一些话是本于孔子在《中庸》上所说的“天命之谓性”。性就是喜怒哀乐。我们每个人本着这羞恶是非喜怒哀乐的天性，所以一出世来便有爱和恶这两种相反的情感。——或者说有所爱便有所恶，有所恶便有所爱；甚至爱之便欲其生，恶之便欲其死，也是人之常情。

孩提之童何以便莫不知爱其亲者，因为他既本着赤子之心，而出世以来便受着他双亲的保育：卫护之，抚养之，使他能畅其所以生。但是一人不只靠父母的恩惠便可以长得成人，出世以来靠社会的恩惠也很多。并且社会愈进化，一个人依赖社会方面的帮助更重要而繁多：野蛮人不靠社会大家的帮助去抵抗食人的猛兽和嗜杀的邻居，一个或一家的野蛮人便早被猛兽食了或被其他部落的人残杀了去。所以野蛮人时时受着他们部落保护的恩惠便很爱护他们的部落：他们部落中的一个人被外人杀了，全部落的人都要为他报仇的。因为能够这样，他们全部落的生活才会繁荣，才不会为猛兽或残邻所随意蹂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常说“野蛮时代只知有部落，不知有个人”，这个话是真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个人就也随着部落早消灭了去了。部落进化便成功市府。上古希腊人那样爱护他们的市府：杀身保

有之，悉心粉饰之，今日只余一砖，一石，一歌，一事，还令许多文人游客发思古之幽情，咏叹之不置！市府进化而成功今日的国家。国家虽比部落和市府扩大得多，文明得多，但是其所以成功为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有了这个社会，个人的能力便不单弱，便不容易被外界摧残，可以相保共存，力图向上的发展；有了这个社会，个人的活动便有所依据，分功劳作，有相当的场合，有选择的范围；尤其是有了这个社会，便可以将先人的恩惠流传下去，个人的精神才有所依归。所以国家这个字在精神上言之又称为祖国（La Patrie），祖国这个祖字便是表示依恋之意，所谓安身立命之地是也。

试想一个国民自从呱呱堕地以来，受着国家的泽惠（Le Patrimoine）是如何的大！无论穿衣，吃饭，说话，睡觉，读书，一举一动，皆要靠国家所有的制度为之规定，文化为之导引，文物使之享受，信仰使之依归。这些都是祖宗历世屡代，经过若干的艰难，费了无穷的心血，然后才给出这种种方便与后人！因此，无论生在何种文明国家的国民，如果自谓有生以来未曾受着这个国家文明之赐，则真未免有些忘恩！主张马克思之说者动辄说："平民不有国家寸土，便不受着国家的泽惠，于是便不该当爱他的祖国。"我们要问，一国平民穿衣，吃饭，说话，作工等等能逃出其国的习俗么？这个习俗究竟与他有益与否？如果一个国民真不要受着他的国家的泽惠，则不该去应用通行一国的语言以表示他的意思，通用一国的工具以完满他的工作，他该当自己去发明；既不能单独发明，单独生存，而事事皆必与国家这个社会的习俗相融，则个人之为个人，焉能认为是赤裸裸的，而与社会无因缘，而鄙习俗为无用！要知这些习俗自其静的方面言之便是制度，自其动的方面言之便是文化，自其实质方面言之便是文物，自其精神方面言之便是信仰。制度，文物，文化，信仰种种皆是一国家的民族性的结晶。既生在一个国家里，便无法逃脱这个民族性，既无法逃脱这个民族性，则一个国民的精神在在都含有他祖国所积累，同族所共有的那种精神。因此我们所以在理论与事实方面都能够证得祖国的灵魂便是国民的灵魂。祖国一旦失了面子，国民精神便要立刻不安起来；祖国亡了，国民便要丧魂失魄，无所依归，万劫千磨，都非得国命重光，国魂恢复而他的精神才得安宁。请看犹太人亡了国几千年，宗庙已化为邱墟，而年年从欧美往东方哭祭于耶路沙冷荒烟乱草中的犹太人尚至今不已！又看满清驯服汉族至二百余年之久，到了末年，只要几个书生出来不惜头颅，登高一呼，而全国响应，不数月便推倒满清，这是何等的神速！这些往事都足以证出全国国民的精神自有一致的所在。本了这一致的精神，大家始有了共同的希望，本这种共同的希望，大家便有了共同的责任。这个责任便是：共同保守祖宗之业而光大之。

责任便是良心上的承诺，所以是伦理上的第一义。一切伦理皆本于这个承诺：当父母的人对于他的儿女能本这个承诺而去尽教养的责任便谓之慈亲，当儿女的人对于他的父母能本这个承诺而去尽供奉的责任便谓之孝子，当乡邑的居民能本这个承诺而对于他的乡里去尽保护的责任便谓之义士，当一国的国民能本这个承诺而对于他的祖国去尽保护的责任，便谓之爱国男儿。原来道德是甚么？能有所承诺，能尽其责任，而牺牲其一己之私利以为人或为社会耳！父母之慈，儿女之孝，义士之行，爱国之忱，皆在能牺牲与否而为其道德之标准：真能爱国者即是真能牺牲其一己之私利以为国家之公利，是为国民道德之极致。反之，自命清高，只顾一身干净，如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道德，便是国家主义的道德的仇敌。《战国策》上赵威后问齐使曰："乌林仲子尚存乎？其为人也，诸侯不得臣，众人不得友，何以至今不杀也？"陈仲子这一流人物看来好象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很好的人了。何以赵威后还要杀

他？因为假使众人都学陈仲子，一个社会便要解体，便要消灭！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全靠心理和生理的契合关系而生出互助，利他，种种行为以为社会的枢纽。陈仲子要勉强除去了这个关系，不但是不合情理，而且足以消灭社会自然的生机。并且他这种绝对的个人主义的办法也是很不能彻底的：陈仲子自以为弃兄之室弗居，弃母之食弗食，干净得了不得！其实他还是要靠他的老婆织麻布度日。井上的野李子只不过供得三咽，那有那样多的野李子来供给陈仲子一生咧！所以孟子讥诮得他最妙："充仲子之操，蚓而后可者也！"陈仲子要想真正自由，一介不与，一介不取，除非他不要吃饭，去变蚯蚓。

陈仲子这种精神是正与国家主义的精神相反的。陈仲子这种道德，在国家主义者眼中看来，是非道德性的（mmoral）。因为国家主义者深信"人为社会的动物"这个原理。既然人是社会的，则该当处处顾到人的道德是含有社会性的。质言之，忘却了社会的一种伦理主张，便失了他的道德的价值了。道德的一个主要目的，本来在使一个社会有个相同的路子，本一种同样的"价值判断论"而全社会的行为方才有个重心。因之，各自分离，足以破坏这个重心的伦理解释便为社会道德所不许。——其所以不取，还是因为他忽略了社会性，而不能圆满其理论与其行事的原故。——中国社会常常讲究私德，在私德的行为上本来还是含有社会性的，如象节俭、安分等都是与社会有益的，不过推而至极，如象上面所说陈仲子的那种办法，便不近情理了，便反有害社会了。中国有句俗话："各人打扫门前雪。"各人打扫门前雪本来是好的，但大家只管门前的雪，绝对不过问街中的雪，结果各人门前虽扫得干净，而街中间还是无路可走：可见这种绝对的只讲私德，就是在一件小事上也不能得圆满的结果的。

我们在说明国家主义的真精神以后，而要略将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在这里比较其得失，因为中国守着个人道德数千年，太固蔽了一些。国家主义的道德便是要将家族道德之义推而广之：爱己爱家的精神本来不错，不过在二十世纪的今日要其能安身立命，以保妻子，则非善推其恩以爱护国家不行。此所以国家主义的真精神为今日中国国民所必具也。

（三）国家主义的真趋向

我们抱着前面所说的那种明了意识，本着前面所说的那种根本精神，则国家主义的真趋向已不难引伸而出，就原则上言之，凡足以恢复或表现国家的人格，凡足以振起或团结国民的精神，凡足以发展或丰富国民的生计，则国家主义的政策当期不遗余力以趋赴之。就事实方面言之，国家主义的政策亦不过在安内攘外而已。

非安内不足以攘外，非攘外亦不足以安内，现在中国谈政治者已十分留意及之。但是内将如何去安，外将如何去攘，则说法多端，极不一致。在这异说纷纭中间，国家主义者愿明白地宣布他的意见：要以国家为出发点，则安内攘外，都才有个明白的根据，明白的对象。对人对已都才有个始终一致的态度，前后贯彻的精神。请在事实上略为说明之。

兹先言攘外：

攘之义，即屏之于门外之谓。齐桓公尊周室必攘夷狄。因夷狄侵入周室，非攘之则周室且不能安然存在，何能言尊。自尊者当不欺人，更当不受人欺。凡入我门来，我以礼遇之，处处让步，而客乃目无主人，得寸进尺，大逞其野心，未免欺人太甚。我如系自尊之主人，则必立屏之于门外。因此门内我有主权故也。本此自尊之心与此主权之界，则凡侵我者欺我者皆在所必攘，毫无疑义。中国人尽力与欧美日本人周旋已几十年了。始而讥我闭关，我则开关以纳之。纳入之后，客便不断的侵略主人。既已鸦片毒药害及我身体，又以天主耶稣害

及我精神。以兵凌，以利诱，其恶不胜枚举。我虽欲亲之，其奈此客实在不可亲！因为此客自来便认此主人为奴隶，身份与他不相等。我们虽想打亲家，“齐大非偶”，这个亲家实在打不成，还是照着子曰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我们要想免于侵略，只有求之在我，自坚其壁垒，自求其解决。国家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不愿依人为活的。亲日亲英既所深恶，亲美亲俄亦所不取。不但这种摇尾乞怜的态度有损国家的人格，并且乞怜一会，毫无效果，中国人也曾经上过当几来！总之，外交之义，是彼来我往，受施相报。善遇我者我亦善遇之，利我者我亦利之，仇我者我亦仇之：此人与人间之通义，何独于民族国家间而不如是。

有人要说“弱国无外交”。——中国许多媚洋人畏洋人的外交官失败了便以此话卸责。——我们要请他翻一翻十九世纪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欧洲的历史。一八一五年，战败了的法兰西还能有操纵维也纳会议的达列朗（Talleyrand）。一八五六年得统一的意大利全靠着有气魄有手腕的加富尔（Cavour）。大战失败之德人至死抵抗，而有今日法人之让步。四面被困的俄人拚命干去，而有今日列强的承认。谁言“弱国无外交”？其所以无外交，实在是无有手腕有气魄的外交人才，无富理想能牺牲的勇敢国民以与强者相抗而已。强者既有意凌我，安心害人，则除拚命抵抗以外，还有何种办法。始终舍不得拚命抵抗，故始终无外交之可言。受气让步已成习惯，自然东交民巷一声呵斥，便吓杀了政府中人。

别人又说：列强凌我，我固当抵抗之。但又有外人愿助我去其患者，则我们的态度又将如何？助我者我自然欢迎之，但是世未有徒赖人帮助而能终去其所患者。墙壁不修，主人疲病，夜有贼来，邻人为赶去之。这种邻人之助固可贵，但是如果主人终久疲病，墙壁终久不修，则盗贼将又来不已。邻人之助又焉能终久依靠！姑不问此种邻人之助中间有无野心，而一个大国岂有能依人为活之理，故所以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能力，全国拚命，在帝国主义中间，杀出一条活路来。

不过欧美人近来侵略人国，已不同于从前专以兵力从事了。他们已发明了经济政策，殖民政策，来特别吸取弱国的骨髓，使弱国精华尽竭，只余形骸，以免费兵力去占领。而只要握了关税权财政权以后，再派几个资本家去经营，几个传教士去欺弄，便好了。这种计划真是省事，不烦一兵，不遣一将，便能将象中国这么大一块领土的经济生活把持在手里。弄得中国人实业无法提倡，生计无法发展，穷饿不堪，争夺不已。十余年来内乱之源大半在此，经济权不能独立操纵，对外不能保护商业而与人竞争，对内不能发达国货而力求自给。因此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主张李斯特的国家经济。

李斯特（list）是国家经济（econornie nationale）的提倡者。德意志一八三四年的统一关税，实行保护政策，便是实现他二十余年所坚持的主张。他所主张的根本的意思是，“一国经济权不能独立操纵，便算不得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为德意志所要求的两条是：（一）国家要得着他自己所应有的经济自治权（autonomie economique），（二）国家要保护着他自己国内生产者的国内市场。前一条便是收回关税，后一条便是保护贸易。中国今日的经济政策尚有更重要于此者的吗？我们不首先向外国收回关税权，以调剂生产，奖励生产；不行保护政策，那能与外人言商业的竞争？洋货税轻价贱，自然把力弱本小的国内土货冲灭了。我们自家的实业品一天不能在国内占势力，便一天要被人剥夺。象今日这样门户大开，外货充满，简直可以使膏血尽竭，坐而待亡！因此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在首先向外人争回关税权，而实行保护贸易。以理争不行，则以力争。以力争不胜，亡也亡得痛快一点，免得暗受损

害，至死不悟，而一班自命学者的中国所谓名流先生尚在那里说："中国既成了欧美人的好商场，欧美人便不会侵略中国了。"他不知好商场便已经是侵略地了。

对外尚有多端——，如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国家教育权等，一时难于尽述，但其重要莫过于上面的两件事，即自主权与保护权之收回。中国人一日不争回此两种权利，便一日不能有来苏复兴之望。虽然，象今日这样藩篱尽撤，内争不已，焉能骤然得志于此。必先除我内患后修我内政，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养之后，欧美日本人当有所畏忌，而能向我让步。于是我们又说到安内上来。

内国之不安宁，而且自相残杀，在这二十世纪的国家中，要算是中国所独有的特殊现象了。中国何以独有此怪现象？偏于经济的解释者曰：生计问题使然而已。但是中国现在之乱，并非阶级战争，而纯为的是饭碗问题。一班好乱的伟人，奔走的政客，且皆是面团团的富家翁。偏于地理的解释者曰：幅员太广，难于统治故耳。要知中国幅员虽广，而乃在一大块土上。如谓地广便难统治，则大不列颠帝国殖民地遍全球，又将何法以统治之？并且中国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经受统治过数千年，何以至今乃不可收拾？于是我们不能不去用历史哲学的比较方法，以求解答。我们先用内比，以本国历史的前后相比较一下，何以从前安而今日不安？何以从前易于统一而今日不易？然后我们再用外比，以他国历史比较我国历史，去看出彼此的经历或有程度之相差，或有早迟之不同。比较而观，不难见他国亦曾经过中国这种现状，而他国用何法以出此现状，则大可注意矣。

在历史上，今日的强大国家皆有所谓他们的民意建国时代。如英吉利之法典运动，法兰西的大革命，德意志的联邦政府，皆是为脱离内国的专制暴力，抵抗外国的侵略行动，而一致的团结起来，稳固他们的国基。当其在未能团结以前，还不是有宗教之争（如法之望代战争(Gaerre do verdee)，藩王之战(如十五世纪日耳曼帝国)。其间也曾经过多少年。但他们怎样的去团结，而终能聚散沙于一盘呢？他们利用两种共同之点：即共同利益与共同志愿。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德意志之建国，全靠统一关税，法兰西的大革命也是由于要统一法律。关税法律一经不受外界威权的任意支配，则全国人的利害便日趋于共同。既然能共同其利害，则长相保守而勿失坠的共同志愿，也就格外坚固起来。请看德意志人本其民族民权之共同志愿以攻拿破仑，及外力既去，关税法律统一而德意志人民便相结不解，以至于今，在患难之中而联邦尚毫无有分裂的现象。再请读法兰西大革命时全国各省区代表在巴黎（Champs de Mars）的誓言！历史家都说，自有此誓言后，法国方才建立真正统一的国家。从前的统一皆帝王兵威征服之力，非全国民意的统一。威力一衰，势将瓦解。有此誓言，便表示出全民真正共同志愿的集合，而能始终相守不衰。（大意见米失勒Michelct法国史。）

中国全国国民今日已有这种志愿否？曰没有。其所以能偶然共同起一些反对列强的呼声，皆受一时的刺激使然，而且只限于少数人。甚则尚有政客武人，利用外力以倾异党，反能号召为乱于国中。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中国国民尚没有共同利害的十分感觉，所以没有很热烈的共同相保的志愿。国家主义的对内政策便是针对这两点下手做去：一方面固然要在国外国内的暴力之下收回经济权法律权而统一之，而一方面更要极力训练团结全国国民，滋长这个共同的志愿。国家主义便要全靠这个全民共同志愿，把中国建设起来，使各行省区域本自由意志，重兴联合一过，成为一个不但形式上统一，而且精神上统一的国家。因此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统一，乃是民意的统一，所主张的联治，乃是民意的联治，而最反对少数武力的统一与多数军阀的联治。更明白些说便是国家主义者主张全民政治，而反对独夫或一阶级的专制。

且在今日这种强邻思逞，国贼专横的时代，国家主义者更要极力团结全民之力以共抗恶魔。因此他主张“阶级合作”，而反对“阶级战争”。阶级战争之是非，我们在此姑不具论，而在处境如斯的中国内，国家主义者认为，主张阶级战争者，算是药不对症，于国事有损无益。因此国家主义者不但在此日驱除国内外暴力的时候，要主张各阶级合力同心去从事于革命运动，并且来日全民革命之后，也要一样主张各阶级合力同心去从事于建设工夫。因为国家主义者既以国为唯一的对象，则国家者全国人之国家，不是几个人或一阶级的人所能私有的。既不应私有，则国家的利益即是全国人的利益。不但当与全国人谋之，且当听全国人谋之。因此国家主义者的立国政体必须是全民共和，而不是独夫或一阶级专政的。

说到这里，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必定要问，国家主义便不问平民生活，便与社会主义无关了吗?国家主义既处处留意到全民幸福，岂有不顾虑到平民生活之理!并且一国内如果平民失业，社会不安，又那能说得上与强邻相抗呢？不过国家主义自有其对于平民生活的社会政策，而不同于一班的社会主义罢了。求之经济学史上面，则有德国学者讲师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Socialisrne d,Etat)，求之历史事实，则有俾斯麦克(Bismarck)的社会政策。请略述之。

最早提倡国家主义的德国哲学家非斯特（Eichte1762—1814）便主张以国家这个机体来实现社会的正谊。他所谓两种社会上的正谊，即是经济上的平等与精神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等，便是一国之内人人都得着相当的生活；精神上的平等，便是一国之内人人都受着相当的教育。他说，国家的第一个责任是在尽社会分工的能事，而使全国国民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国家的第二个责任是在尽化育全国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而使全国国民都能增其知识，展其个性。他做了《告德国国民书》(Discours a la nation allemande)。这本书，对于德意志国的统一影响很大，而且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导师。国家社会主义便是主张以国家的能力来调剂生产消费，保护工人农人。关于分配方面，他虽然仍赞成私产制度的重要，但特别注意劳力报酬当否，利益取得的公否，务使工资足以支持工人适当的生活，而同时并主张抽财产税以为设置救护工人的机关。华格楼尔(Wagner)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两件事：即以国家能力去用资产者的钱来抬高工人物质与精神的生活；去用抽税的方法以免财富集于少数之手。至于在生产方面，则由国家专以公利为标准，而来经营林，水，路，矿诸大实业，而以其他小实业俾国民自由经营，以便尽分功合作的能事。这种主张在德国立刻得着俾斯麦克的赞成，而实现之于其社会政策上面，由国家提倡企业，为工人设保险机关，使德国工业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德国工人生活亦较他国为抬高数倍。不独俾斯麦克行之，今日法内阁爱里友（Herriot）之社会政策，英首相马克都拉(Mac Donard)之工党政策，也是一面特别保护生产者，而一面抽财产税于资本家，且励行保护贸易而提倡国内实业.那一点不是根着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而以国家的权力来实现社会的正谊的。故国家主义的政治，是或在学说上，或在事实上，从来没有忘却平民生活的。

综上所言，国家主义所有对外政策，是仗着全民自家的力量，以期完全独立的自决，而不赞成依人为活的国际主义的解决。国家主义所有的对内政策为团结全民共有的志愿，以求真正民主的自治，而不赞成任何阶级的专制。至于普及全国国民教育，增进全国国民生活，国家主义者既欲强国而必须其国的份子各各健全，当然不能忽略了的。现在更简单的归纳国家主义的政治在两个形容辞之下，便是这种政治是“止国的”与“民主的”(National et republicaine)。

（原载《醒狮》第1、2、5号，1924年10月10日、18日、11月8日出版）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代　　英

此书系戴季陶先生所著，他自信这是相从孙先生十余年的成绩，他以为在今日国民党员中同时有老衰病和幼稚病两种，“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之统一无望。”所以他大发宏愿，著了这本小书，想统一国民党员的思想。

在这书中我相信戴先生注重建设人民的权力，尤其注重建设在政治上经济地位上立于被压迫地位的农工阶级的权力；说明不为三万万七千万最困苦的人民的生活，便没有救国的意义，便没有革命的意义。有智识能力不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民效力，就完全与过去二千年一切堕落了的儒者丝毫没有两样，这种侧重农工阶级利益与权力的态度，是很值得钦佩的。但谈到中国固有文化问题与发展阶级势力问题，我却疑惑戴先生引申孙先生的学说，未免有过当之处。

孙先生有时亦讲到中国固有文化，这是不错的；但若因此便说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便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创造文化，那便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没有存在于世界的权利，甚至于说便在全世界社会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民族亦只有化为真正的弱小民族，以至于灭亡，这些话未免太过火而不近情理了。戴先生痛心于一般人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排斥，他说，象这样下去，在思想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几乎变成中国的与非中国的区别，如果中国的一切真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还要做甚么革命呢？我觉得戴先生的思想很奇怪！为甚么不象戴先生一样赞美中国文化，便是认中国“一切”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呢？为什么那样便一定会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不能创造文化呢？固然我们要排斥“反科学的”中国文化，这亦犹如要排斥“反科学的”别国文化一样，我们认“中国的一切”亦不过与任何国的“一切”一样的有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犹如犹太文化埃及文化一样，当然有存在的意义，但这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

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若说必须先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配谈革命，请问非洲里孚人中间并不曾产生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呢？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赞羡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留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蛮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愿屈服于人家而虚矫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举起来。而且戴先生所谓中国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如戴先生所说，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然而戴先生却要咬定二千年来无人理会的所谓“正统”思想是中国的文化，我真不懂这有什么意思。

戴先生以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有纠正的必要，以为我们要促起全国国民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我颇觉他不能自圆其说。戴先生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宣战，只是把一个刚受孕的资本主义堕了胎罢了，堕胎何曾是容易的事呢？中国虽不能有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然而一则外国资本家移殖资本于中国境内，财政资本有汇丰花旗等银行，工业资本有内外棉纱厂英美烟公司等工厂，津汉青沪的工钱奴隶已数十万人，对此等资本主义不应宣战吗？再则中国资本家资力虽然薄弱，然心不在小，将来决不能很爽快的屈服于国民党节制资本的政策之下，对这种人不应当"预备"宣战吗？戴先生以为资产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真正站在利害敌对地位的不过百分之一，是没良心和知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其实站在利害敌对地位和没良心知识有何分别。即欧美资产阶级之反动，其酷待劳工又何尝不可说是没良心？其违背进化潮流何尝不可说是没知识？不过他们站在与劳工利害敌对的地位，使他们不易有良心有知识耳。戴先生知道要解决民生问题必定要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才是正确。但戴先生却又要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要各阶级的人抛弃他的阶级性，似乎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阶级性的发展亦是不好的。戴先生要治者阶级"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支配阶级的人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这若不是一个空想，自然是没有人反对的事情；但戴先生亦承认要农工阶级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那便可知无产阶级不应抛弃他自己的阶级性；而阻止无产阶级势力之扩大，绝对不是相信民生主义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了。戴先生又以为只有生活优裕的人才能得着革命的智识与觉悟，去"为"不觉悟的人革命。其实，倘若靠生活优裕的人去"为"人家革命，十余年的经验已证明是靠不住的了。

孙先生说要多数不知不觉的人实行革命，其实这些人决不是完全不知不觉，乃因受了革命的宣传从生活上得着觉悟；这种从生活上得着觉悟的人比那些从知识上得着觉悟的人要勇敢坚决得多。若真是愚民政策，想靠少数治者阶级的"士大夫"，来包办革命的事，而有意无意中似乎反对农工阶级势力的扩大与他们的阶级性的发展，这与戴先生自己所说要靠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正确之说根本矛盾，亦决不是孙先生的意思。

（选自《中国青年》第87期，1925年8月8日出版）

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抽　　玉（肖楚女）著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究竟如何？

△CP和CY究竟是寄生的么？

站在中国国民党地位上，对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工作上所起的左右之问题下批评的，怕是第一个要算戴季陶同志，才没有带着无赖的谩骂气习吧？

的确，戴先生煞是难得的，他竟然肯在他自己的人格尊严（?）上，也坦白地承认"CP和CY利用（？）中国国民党，他的目的很纯洁，心情很高尚，他所企图的，是在中国社会的急激的进化"。这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言论界接受外界批评以来，所不曾遇见过的唯一的"正直"。当然我们只有感激，只有替中国言论界庆幸的。而尤其令我们要对于戴先生代表中国国民感谢的，是经了他这一本《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不客气的批评之后，一切右派妖孽——从张继谢持起，马君武、马素、马超俊、冯自由，乃至极无聊赖的杨庶堪，和新起的候补官僚派邹德高之流——是再也不能假借什么"护党""哭党""反共产"之名而行他们那借党活动的反革命之实了！季陶同志是中国国民党最高干部的人物，得了他这一种痛切的X光线之澈照，或者中国国民党内部可以从此肃清污垢，荡涤尘秽——而使革命的孙文主义，大放万丈光芒了吧？

但是，戴先生批评共产党的话，有几点我们觉得不是事实，不合事理——而是戴先生说谎。戴先生说共产主义不适宜于现在的中国，因而遂指共产党不应该主张阶级斗争，贻害中国；而且直谓主张阶级斗争是突过了国民之需要。这一层简直是戴先生因为嫉妒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太能"干"了，督促得一般老党员太紧严了，有些不舒服，所以要故意这样说的。戴先生若不是象醒狮派曾琦那样糊涂的人，当然晓得"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而阶级斗争是历史进化必然的事实。戴先生如认"自欺"为可耻，即当切实承认共产党人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实在并没有在哪里主张过即时实行共产制：更没有在国民党中做过一点实施共产的政治设施。明明白白地除了照着中国国民党党纲，在那里高呼，在那里努力，做那"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组织农工群众，扩大国民革命之战线与势力，以为将来切实施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之预备以外，试问戴先生，共产党人还另外做了些什么强奸国民党，借国民党而推行共产主义的"共产"工作。难道国民党不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不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要去宣传组织农工群众么？难道共产党照着国民党党纲做还犯了法么？除非这些工作已被国民党声明放弃而仅为共产党党纲所独有，然后戴先生方可谓共产党人利用国民党，以突过国民需要之行动而贻害中国。然而戴先生竟无的放矢，造谣中伤，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想要以工业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达革命建设的目的"．硬指共产党在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所要做的事，为现在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即要做的事。淆惑观听，一至于此！

戴先生若不是头脑不清，便应该知道在今日之中国而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努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努力于吸收农工群众以入革命军，是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干的事。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性质？共产革命——社会革命与国民革命如何不同？这两件事如果连戴季陶都不晓得，那我就真要为中国之知识昏瞶而痛哭了！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今日之中国，因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活动与努力也是一样不适宜于今日之中国么？戴先生为什么要如此欺蔽读者！戴先生能够指出哪些事实，是共产党要实行共产？不但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并未要求实行共产，而只做那眼前所需要的半殖民地上之国民革命的工作。就是堂堂的中国共产党之机关报——向导，和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也要是在那里除了做些共产主义之学理上的研讨，以为将来的社会革命之种因外，并没有发表过什么立即实施共产的文字（在决定加入国民党努力国民革命之后）！戴先生不是瞎子，却要故意地谣言惑众！

是的！共产党人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而努力时，实在是偏于要把国民党弄得"民众化"，极力要制止国民党中的士大夫派（知识阶级）垄断国民党。这自然不免有时要用阶级的意识，去教育群众，从阶级上要求他们革命。然而这是"共产主义的"么？这正是实行努力于戴先生所指导于我们的——国民党的必要工作。戴先生告诉我们，说中国国民革命在历史上的背景上（就是中国国民革命之所以起来的原因，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受了西洋的"由工业革命而诞生的资本主义，同旧时代的军国主义相化合，变为近代特殊的帝国主义"之侵略。戴先生告诉我们这许多帝国主义"专门刮削殖民地人民的膏血"，"更以地球为范围，形成一个绝大的封建制，为争斗殖民地(即商品之销场)而拚死的决斗。在他们国内，操产业管理之权的少数资本家，一面在自由竞争原则下面，造成经济的封建制；一面在工银制度下面，压服着大多数的自由工人，掠夺工作的剩余价值。令大多数的工人，陷于极悲惨的地位，酿成极大的阶级斗争……"。现在的中国就正在一块这样的自由竞争之下的半殖民地中，让许多帝国主义者勾结军阀，在那里实行着甲必丹的"经济封建制"。而另一方面则到处布满了"大哈德门"的"用中国烟叶，以中国人工，在中国制造"的"资本移植"的掠夺剩余价值的侵略。只要是有一点近代国民经济之常识的人，谁也晓得中国现在所有的劳资两阶级之斗争，是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中所有的更为悲惨而酷烈。中国的劳资阶级，已经是成了一种亡国者与被亡国者的民族的阶级。中国民族，差不多整个的成了一个专替世界资本主义服劳的预备队——中国民族已经（世界劳动阶级）化了！全社会并不生产一点什么，专门只供给他人的原料和劳力，而坐着消费他人的制成品。压迫阶级，掠夺阶级，资产阶级，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国内的军阀、买办。被压迫被掠夺的阶级，便是一般的中国国民。要有哪个能够否认这种铁案的"现实"；然后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训练之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必要，才能说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努力是突过于国民之需要。

戴先生不是叫我们"认清楚中国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是要国民中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人觉醒了，团结成功一个伟大的组织，作国民革命的真正基础，然后才可以获得"么？不是说："也要是为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幸福而获得的国家独立，民族自由，才真正是独立，真正是自由"么？不是又叫我们要"一天到晚，用两只眼睛去看大多数农工阶级的疾苦，用两只耳朵去听农工阶级的呼声"么？不是叫我们要"更明白了解中国士大夫阶级，已经腐败到了极点，要想救中国，非把最诚实，坚忍，努力的农工阶级的人，唤醒转来，以他们为改革的中坚，然后中国的民族方可以言救么"？不是叫我们"把世界的革命潮流，细细

审查一下，认识现代革命，是工农阶级自己要求解放的革命”么？我们努力于民众的阶级教育，阶级意识之宣传，正是为了要求实现戴先生所指示于我们的这些道理；正是为了要把农工做成“改革的中坚”；正是为了顺着世界潮流，要叫农工阶级自己以要求解放而革命。为什么戴先生自己掌嘴，却说共产党人主张阶级斗争是突过了国民需要，是叫青年盲从，是贻害中国呢？或者戴先生以为唤醒农工革命，是不必要用阶级的生活利害之说，而只用“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尔须爱尔国家，尽尔智仁勇之伟大人格之力”；便可以了事吧？如果是这样，那就难怪戴先生要把一个死了不能自白的唯物的孙文主义，活捉了来硬栽在一个“金克木，水克火”式的东方的什么“仁”的基础之上了！我以为最好请戴先生现在不必坐在环龙路执行部内，貌袭唯物的政法知识，枉谈革命；且去上庐山白鹿洞学朱晦庵消暑讲道。候得每个农人每个工人都诵得一部大学一部中庸，然后再来以夫子之道，使他们荷其锄耰戟矜，戈铍长矛，揭竿而蜂起。戴先生说“CP，CY的朋友，只顾骂无政府主义者空想，而自己却比无政府空想更甚”。我现在却要说戴先生骂CP，CY空想，而自己却以梦幻的主观当作真实。我们是空想的，然而我们却不敢相信世上竟有这种可以不用阶级的生活利害之经济组织，而能使农工阶级成为“改革中坚”，去为了要求自身解放而革命的奇迹——只有不空想的戴季陶才敢信它。戴季陶应该知道天下的农人工人不比你戴季陶曾经受了几十年教育，了解高等的抽象概念。“国民”“民族”的大义说法，他们不会彻底领会（戴先生自己没有实地到民众中去做过工作，只专坐着室内作文，所以才有这种唯心的悬揣）。而况戴先生和戴先生的党所要求的革命，并不是单纯的“民族”而另有“民权”和“民生”的建设？戴先生若没有存一片欺骗农工阶级的坏心，若不想在此时以手段骗取农工革命的势力帮助革命，而到革命成功后便抛弃了他们，则戴先生就应当切实承认此时即有阶级的政治训练之必要；以便他们好预防着第二辛亥革命时，被士大夫派袭了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之故智而抛弃了他们。以便用了他们的势力去预防国民党——即那时的训政政府倾向于资产阶级化，官僚化；以便预防将来的“民权”不“民”；预防将来的革命党不诚意去实行那给资产阶级以切肤打击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戴先生！这果真是“只可以说是为满足自己的空想而不合国民的需要……和无政府的空想一样”么？这果真是“单是一味盲进，而且拚命阻止多数青年健全的进路”么？当果真是“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是国民革命；让一般国民看不出真象，认不清需要，共产的条件，既不会因空想而具备，国民革命又因此生出许多障碍；到困难发生时，只用一句‘排反革命’的话来掩护真实的主义思想问题”的那样卑劣么？除非戴先生硬诬定我在上面所说的那一切道理，一概是“共产”；不然，戴先生便是有意对于共产党友军造谣中伤；便是别蓄他谋，要借故排斥共产党籍的同志出党而打三番的戴式清一色！戴先生！有人说广东政府已在那里实行共产；英国帝国主义，研究系，北洋侦探，买办阶级，叛党的陈炯明，卖党的冯自由等都说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是共产党（他们是不是的，别人不知，戴季陶当然知道）；你也都认承么？邵元冲汪精卫被右派在北京围打，说他们主张共产，你也认为是事实么？我不料我所钦佩的戴季陶同志，竟然也象敌人诬陷国民党一样；来无中生有的诬陷共产党。我请季陶同志注意季陶自己所说的话：

> “便有飞天的本领，也要透过公共的意思，才能有效。不得公共承认，随便什么好意思，都不发生效力的”。

共产党不是三头六臂，更没有什么姜子牙的无上法宝，岂能在国民党内做那非公共承认

的共产党之工作。共产党所做的，哪一些不是国民党全体代表在第一次大会中所议决的议案？“党员在党内的活动，可以用三个字说，就是‘争决议’”。共产党籍的同志，和那些反革命的右派所起的纠纷，就只是因为共产派太把“争决议”做老火了！共产派事实都要监督促迫着同志们去实行党纲，严守纪律。右派同志不愿（他们不愿的原因，季陶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请看他原书）：所以共产派才要“排反革命”：所以共产派才说“我们只问革命不革命”；为什么共产派说了这样的话，便是要在暗中消除三民主义？假借三民主义的右派，不革命：我们排斥他——以“革命还是不革命”之尺作度量他们的标准，乃正是拥护三民主义。他如果在三民主义下面革命，他便是个实行三民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的人；否则他便无视了三民主义。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假三民主义之名以为活动，却只“命”而不“革”的人，一针见血，直攻其心，说“我们不问（你）主义如何，我们只要问（你）革命不革命”。这有哪些不对，不应该？戴先生褊心所在，必欲诬陷我们于青年之前，我敢告诉戴先生那是不行的，请看：

“以后本党一切政治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及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议案；无论何人概不得议决”。

“我全体同志应知……接授总理之遗教，即为纪律之基础。自今而后，我全体同志，必以至诚至敬，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心，奉本党之纪律，为无形之总理……”。

“如党员之行动及言论有不遵奉总理之遗教者，本党皆一律以纪律制裁之。且以后无论何的，决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

共产派在国民党中所努力的，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反抗掠夺世界大多数人类利益，阻碍人群进化世界大同之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的工作——就是张继谢持象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捉得了SY的印刷物上所刊着的那些“在国民党中尽力使国民党左倾，尽力防止国民党只注意军事行动而忽略向民众宣传的政策，尽力吸收农工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尽力使国民党亲俄”等他们所目为“阴谋”的事，乃正是总理的“遗教”，正是决不许以党员成分不同而摇动的“最高原则”。总理在尔左右，戴季陶先生，休妄想国民党右倾而戴氏化罢！

现在我们明白说罢！共产党为什么才加入国民党的呢？为了是要先成就民族的国民革命，以便完成那社会革命中最必要的产业发达而集中的条件。为了恐怕国民党仍然如从前那样的只顾民族忘了民权民生。为了防止国民党右倾官僚化。为了要使国民党成为群众的党，成为不专只为士大夫派所垄断，不专只为代表资产阶级，而变为兼重农工阶级利益的党。为了要驱逐“一般过惯了放任的政治生活，所以不愿再走到近代规律性较强的政治组织路上去，但喜无规律无组织内容空虚的革命党中的右派党员出党；以肃清中国国民党的神圣的纪律。为了要防止“今天是这几个联合起来反对那几个人，过几时又起一个分化，昨天的敌人，今天又做了朋友联合起来，打昨友今敌的人”的纷纷扰侵的军事革命现象，和党的浪漫，腐败，堕落（戴季陶先生虽然说了痛恶那些朝秦暮楚者的话，但是戴先生却始终不肯对于他向来所引为友生而正是此等人物的四川同乡石青阳，熊克武，吕超等明加攻击，亦徒见其虚伪无勇而已）。

张继谢持诚然是铁面御史，然而这样的共产党又有什么对不起国民党同志的处所？一个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是否忠实，只看他是否照着党纲在做好了，国民党并不是没有党纲的，现

成有一个标准在，何苦无事自扰，相惊怕有地发梦游病，是照着党纲在做，那么就是一个共产党，也只好承认他是一个忠实的同志。否则，即令不是共产党而是老同志——如冯自由，马素乃至现在就职法长的杨庶堪，又何能庇——只好请他滚出党门，屏诸四夷之外（我不知身居最高干部，口谈纪律的戴季陶，对于杨庶堪这种人如何竟不闻问）？有什么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可言？真正是无常识之至！使共产主义而可以立时实现，则共产党又何必要来加入国民革命之工作中？它何不去直接实现，加入国民党岂不是多事？使共产主义而不能立时实现，则虽假托国民党又何能为?戴先生不惜用了学者的偶像态度，精致地侮辱共产党，说CP是“寄生”。季陶！你为什么如此侮辱朋友，你不怕也侮辱了自己么？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即CP）在上海发起的时候，是哪些人，你还记得不记得？戴季陶，沈玄庐，陈独秀，李守常，谭平山，和一个俄国同志——一共六人。你后来因为被中山知道了：写了一封信来，大责备你“叛党”；还向着同志大哭一场，请求退出——说“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你真是一个“不盲进”而以自己之意志，发现国民之需要的人么？现在你转过头来骂陈独秀是纵横捭阖的“中国列宁”，说CP是寄生！CP果真是寄生么？它有它的堂堂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堂堂的言论机关，有堂堂的被你所羡称的“组织极严”的铁的纪律。它是寄生吗？是的，你也可以反问CP为什么不直接把CP、CY的招牌拿出来，为什么要秘密？然而我不知道这个秘密的CP一般人又是何从而知道的？它若没有显明的名义，世上人又何从而知有一个CP？为什么我们没有拿出招牌？戴先生应该知道CP在加入国民党之外，还依然保有它的完全的党的组织存在。它若没有招牌，它能从事于党务之活动吗？不过它因为政治上敌对阶级的压迫关系，还不能够象国民党那样托足租界，托足于三角同盟之下成立公开的执行部及一般的党部机关罢了！然而这种秘密性正是CP的光荣——且与加入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戴先生最侮辱人的话：是说CP寄生于国民党，假借国民党的经济力以为宣传。戴先生！你若有一点道德的责任心，就不该说出这种自欺陷人的话。

戴先生说CP、CY不该在国民党内吸收左倾的党员加入CP，说陈独秀操纵国民党。这未免太把国民党看轻而把陈独秀看得太神奇伟大了！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之教义，向国民党同志征求同意，这是和在国民党外，对于任何人的宣传一样的。它不过求一个信仰现所需要的这个三民主义的人，也信仰那为未来时代所需要而又足以促进现在所需要的国民革命之成功的那个共产主义罢了！它并没有叫国民党人放弃了三民主义去信仰共产主义，它不过是叫人们在信了三民主义之上再进一步兼着去信仰共产主义。这是等于说在实质上，增加了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实现过程中之一阶级；所以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相成而非相反的。因此共产党才来加入国民党。岂有对于自认为相合而又有加入之必要的三民主义，反去叫那些从三民主义加入到自己这里来的人抛弃它的道理？戴先生连这种浅理都不明白，岂不可惜！若说共产党不问是否它叫人放弃三民主义，而简直不应该拉国民党入共产党；那便是国民党不以同志不以友谊待CP，而视CP为专替国民党服务的奴隶了！试想在两个友军相往来时，能够说只许CP加入国民党，不许国民党加入CP么？而且使有一人他自己要自动的宣告脱离国民党而加入CP时，又怎么办呢？思想应该自由，只问他在党时是否遵循党纲；兼党跨党不足为病，只怕所跨所兼者：是两相水火互相冲突的团体。所以戴季陶请求退出CP时，CP一点也不留难，完全让他自由。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方既均以某种策略和政见相同，认为有互相提携，彼此兼跨之必要与可能，则不应再有不

许跨党的问题发生。戴先生想叫国共两党成为奥匈君合国的关系，却又只准匈牙利人入奥，而不准奥大利人入匈（在戴氏心目中，是以匈牙利待CP的），试问成何说法？

戴先生说广东有一个区党部的党员，写信叫他制止反共产的言论。戴先生遂认为是加入国民党的CP同志所为。我不相信世间上竟有如此昏闹的CP党人。CP内部的训练，极其严密，常常有政局的讨论，对于友军中某某人的思想也常常有通告，且常常警告党员意识自己所居的地位。决不会有此等发昏的信徒发生。自然我们不能怀疑戴先生在这小事上也说谎，然也保不定不是倾陷共产派的右派党人故意要的把戏。

戴先生说CP同志，在党内不许非CP同志得到做事受训练的机会。这话我想只要广州上海两地的同志一自反省，便知其完全是造谣。别的不说，只说这次五卅案中，该有多少非CP的国民党同志从事于奔走（就是戴先生自己也曾说这些大多数真实在作革命工作的同志，要比CP多许多倍）！据我所知，象南京市，一切代表学生会宣传奔走的工作就完全是靠着非CP的姚尔觉同志一人。南京的CP同志，不但一点没有想妨阻他，并且和他一点界限也没有。姚同志自己应该感觉得。我在这里要说句得罪人的话，戴先生且勿怪CP同志不许非CP同志得到工作，当先问一问非CP同志中那些未去工作的同志的热心，能力，毅力，牺牲精神，纪律习惯，究竟怎样？CP同志之所以不肯放轻自己的一点责任而遇事总要首先上前者，正因为要在党中造成一个勇于赴战的风纪，激起惰性，防止腐败，怕他们那班人不干而致贻误了事机的缘故。又譬如戴先生说遍次选举，CP同志几乎完全不让非CP同志当选——也是冤枉。最近如北京市党部选举，明明是右派和非CP同志竞争，明明是右派搗乱会场并殴打主席郭春涛君。事后右派登报却要说是共产党把持。这样的事，戴先生难道也承认么？郭春涛等之为非CP，我想不但郭君等自己知道，就是北京市所有的同志，亦莫不知道。然而右派却偏要如此搗乱，研究系等报纸乃故以为凭，扬大其波，这叫CP又有何法？戴先生意思又想排出CP同志不许为国民党最高干部服务，我想这也很可不必。戴先生既口口声声要把国民党民主主义化，为什么不把这种问题听之于人材主义的民主的公平选举。有什么理由可以排斥一个由下级党部选举而来的守党纲奉遗教的共产派同志之为干部职员？那便是以党员成分不同，而摇动了党的最高原则了，戴先生如不想叛党，我劝戴先生不必讲这种破坏纪律的话。

戴先生要CP在加入国民党之后，将CP的组织完全放弃，这是把CP加入国民党的方式看错了！并且不懂得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意义及CP历史的责任（可参看国民党革命与世界革命一书）。CP加入KMT（国民党），并不是整个的加入的；它是秉承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第三国际的命令，认中国现时这块半殖民地上的国民革命之工作，是全国各阶级共同需要的，须得要能和多阶级所组织的国民党去领导，而代表工农利益的CP在这目前一致的需要中应指导它的党员实际加入国民党中去扩大国民革命的运动。故CP加入国民党的同志，是部分的，并不是整个CP完全加入。那样的加入，是合并了；自然应该消灭组织。现在CP在加入KMT之外，仍然还有它自己的党和CY存在，还有它自然的主义工作要做宣传组织的运动，为什么便应该消灭了它的本体呢？它不过是认目前暂不施行社会革命；它并没有承认世界上可以永久不要社会革命；如何能要它放弃了共产主义而完全消没于KMT？

戴先生说CP的机关报上常常批评KMT的领袖人物，“故意造作谣言，想借此使一般青年发生不信任KMT的心理”。我很奇怪戴先生为什么不把CP所造的谣言一一列出？CP加入KMT的第一目的，便是要督促KMT不许他腐败。所以CP对于KMT重要人物的一言一动，

莫不注意批评，小有不合便不惜一点不客气地加以痛切的纠正。CP对于KMT的政策，是要制止它的军事行动，而把它拉到做宣传组织等基本工作方面去的。所以对于KMT的一般信任军事的革命行动，常常加以驳斥。这是因为CP在中国已往的经验及一般的革命原则上，觉得广东方面的军事运动耗财劳民，实际上不但与革命无益，徒为杨希闵范石生等造些抢劫人民的机会，和北方封建军阀一样的作恶，只足以授研究系等反动派以毁谤革命，指摘广东的口实；并且还实在惹得广东人民抱了满腹怨恨。CP反对军事运动，是要叫KMT集全力于建筑下层基本之农工青年运动。即戴先生的三叹息在民国二年时就应该做而未为一般同志所注意，以致让得陈独秀胡适之去出风头的“文字革命”（我很不了解：为什么一个这样知道文字革命之重要的戴先生，自己也不在当时出出风头，偏也要让把陈独秀去做？）CP批评人向来是赤裸的，并不象戴先生们富有虚伪的绅士气。自然有时不免用了锋利的笔，直攻肉搏。在戴先生以为是叫人不信任领袖；在CP则正是所以防止一个领袖腐败，矫正一个党的行为的正当方策。CP不单是如此对待KMT，便是它自己在内部开起批评会来，还要更加严厉。季陶没有受过这种训练，自然觉得难受。告诉你罢：就是你所讥谥的“中国列宁”在CP党内有一言说错了，也要受最下级最普通的党员，指着他的眼睛皮上斥责他；一样的要受党法制裁哩（戴先生说刻薄的“中国列宁”挑拨KMT暗潮，多数CP党员却不阻止他，纠正他。谢谢戴先生的挑拨，我们的独秀如真有什么背党违法的行为，我们自会处理，用不着戴先生如此暗示）！我们的党是以主义信仰而集合的，我们的党只靠主义与纪律维持它。我们用不着以虚伪的绅士习气保持领袖的偶像尊严。列宁托洛茨基所以不能变坏，袁世凯所以不能在布尔什维克中出现，所以不许它有刘揆一、冯自由、陈炯明、孙毓均之徒，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个党如果只靠领袖的偶像维持，而不问是非好歹简直不许党员批评，那便是一座沙上的宝塔，倒下来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党创造出来的政局，一定也容易腐败或为他党所攘夺。CP批评汉民精卫诸同志，乃至批评中山先生，及谭平山同志在“革命”上所为文，都只是这样一个动机，实在并没有存有季陶那样所揣度的卑鄙心思！季陶又说CP的人挑拨许崇智和蒋介石打仗，这不知有什么证据。CP正在痛斥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天天造谣，说许蒋的共产和反共产不睦（蒋介石之是否CP，季陶当然知道）；岂有自己还去挑拨的道理？季陶说是CP想从中谋利，请问这个利如何谋法，又有些什么利可谋？季陶必要如此在青年前诬陷CP，则何必不说商团之战，杨希闵刘震寰之战，都是CP挑拨的。这才真是无聊已极！

戴先生说CP不注意“民权”，单只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诉诸人民的愤怒。我请问最近全国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究竟是否也有CP同志参加努力，戴先生又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基本概念产生出来的；打倒军阀，是从我们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产生出来的；仿佛是CP所说的，这两个口号的来路与他不同，我请问，谁曾说过CP对于这两个口号的来源不是由于民族，民权，民生的要求？

戴先生说CP“要中国的青年们，不要以爱自己的历史爱自己的民族为出发点，作民族革命”。这是戴先生读CP的“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CP并不是不要人们爱自己的历史和民族，CP只是要人们在爱自己的历史和民族时，同时也爱他人；而不以爱自己为限罢了！如连自己的历史民族也不爱，则纯粹以爱他而牺牲的世界革命又何能成功？不过CP叫人无论是爱自己的、或他人的历史和民族时，应当分别一下自己和他人的历史中，

民族中，谁是友，谁是敌，而再施其爱罢了！譬如我们的张作霖和替工部局登“诚言”的申新两报便当不爱，而协助我们的英国工人，同情我们的日本海员则当爱。CP若不爱自己的民族，则CP又何必去反抗帝国主义，更何必加入KMT大呼民族独立？

戴先生说“某某同志，在他一年来的努力成绩上说，不但是中国国民党后起之秀，实在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材。假如没有CP的关系，一般同志，又何至于生出许多对他的反感”。这位同志是谁？既然是中国国民党后起之秀，而且又是中国不可多得之才，为什么却要因为有CP关系，就要反对他？我现在到底要问问戴季陶，在戴季陶所认识的KMT之中，究竟是不是已不需要CP参加了！最不是现在就要叫所有加入的CP党人一概退出？竟请直接了当地说，不必如此吃肉不吐骨头。难怪我前天在上海听见一位青年同志说：“听说戴季陶怀疑恽代英同志有CP嫌疑，现在打算设法把他调开上海执行部”。原来季陶是要如此这般（季陶曾数次向代英同志说他自己要独创一党。呜呼，总理之骨未寒，KMT却要因戴先生之知识的高傲而分家了）！戴先生，你这种态度，果然是在遵守你自己所说的“民主的原则”么？

戴先生说青年们以为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主张，是“太看左了”，他说“在中等阶级觉悟的时代，中等阶级对于贵族要求民权，等到他们既得到民权，当然没有再要求的必要了！近代实行普选的国家里面，无产阶级没有民权，所以他们要对于资产阶级来要求。等到既得民权之后，他们的目的本是在以民权为手段，建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所以只看见社会问题，而不看见民权问题了”！在这一段话中，明明白白承认资产阶级（即中等阶级）在得到了他们的民权之后，便认为满足，不管无产阶级需要什么，便把一切革命运动中止了，便要再等到无产阶级对着他们要求（革命）了！请问，这样的德谟克拉西（民权），不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工具是什么？为什么“太看左了”？戴先生话中的第二个意思，便是明明白白说无产阶级因为把民权看做了“手段”，而去另求他们所需要的政治，所以才看不见民权政治问题——弄得把民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话的反面，便是：你若只以获得民权为目的，而不去要求你所需要的无产阶级政治；那么，你便不会太把民权的看法看左了——而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主张了！诚然，诚然！凡是资产阶级的人，哪个不是以民权为目的，而把民权的看法看得不太左的呢？凡是无产阶级而以要求自己幸福为目的的人，又有哪个不如戴先生所剖析的而将民权的看法看得太左了呢？原来戴先生指摘青年看民权看得不对，看得太左：是因为自己的看法看得很“右”。原来戴先生是要青年们在革命中只以民权为目的而不去取进一步的观点，把民权看得太左！在这里，戴季陶无意地招了供了！在此时，骗取农工阶级的感情帮他革命，故意地说革命非农工不行，拍农工的马屁。等到革命成功，却是要丢却农工，让农工再来要求（革命）农工的“民权”。难怪戴先生反对阶级意识，反对阶级革命的教育；难怪就是那为中国国民党后起之秀而又为中国不可多得之才的同志，也要因有CP关系而生出许多对他的反感！中山！你的孙文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的生命，已经发生了危险了！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你该不至于舍弃了“跟从总理十余年”的党的著作者吧？

戴先生说“五卅事件以来，……十分觉得中国青年，在政治上的认识和经验，欠缺得很；认识了世界，却不认识中国；认识了中国又不认识中国应由之道”。我不知戴季陶个人究竟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若以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为正当之认识，则青年们对于五卅案，认识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块半殖民地，认识世界是资本主义商品争霸的帝国主义之世界；认识中国应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而得到解放，便一点也

没有错。然而季陶却要在搬出“学问”吓人之外，又搬出“经验”来吓人，真是“如数家珍”！大概又是中山曾经和季陶说过一种特别话——或是中山另有一种遗言，只有季陶一人听见，连“展堂精卫也未与闻，当时只有一人和我闻得，可惜死了——便是执信”吧？

亲爱的季陶同志！请你放心，在你所目为“纵横家的‘中国列宁’（你四年前同着发起CP的老朋友）统治下的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在并不幼稚，并不“和无政府主义一样的空想”；也并不荒唐。我们之间的问题，还是你自已同谭平山同志说的好：“要想新旧党员水乳交融，除非是组织成功一个单纯的团体”。我们诚恳地希望你在最高干部中，本着“民主的原则”，肃清右派！至于CP，CY它本不是“寄生”，你可不必忧当作蛀虫！

请读者参看戴先生原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可向上海法租界，白莱尼蒙马浪路，慈安里三弄二十八号，季陶办事处，索赠。

一九二五年，八，十在汉口

（选自《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

〔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节录）

戴季陶

大家都知道，孙先生是三民主义的创始者。先生曾自己下三民主义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在三民主义的讲演里面，开宗明义，就是说明这救国的道理。大家如果要研究三民主义的真义，第一就要看清楚三民主义的目的，是在救国。离开了救国的热诚，就没有三民主义。若说到救世界的问题，本也是三民主义终结的目的。但是在历史的关系上面，没有了我们的国家，便连我们也没有了，何有于世界。所以孙先生说：“我们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讲世界主义。”

我们知道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在救国，便晓得这三民主义，是孙先生思想之中具体的实际的部分。但是孙先生的思想当中，有没有作这具体的实际的主义之基础的最高概念呢？这一点是研究先生思想的人所最要注意的。要知道这一点，便要把孙先生的全部著作，作一个总研究，还要把先生的一生言行，作一个总观察，然后才可以看得出来。孙先生曾自己著了许多书，遗留了许多重要的讲演纪录，给我们国民。现在我且把几种最重要的书，分别叙述，然后再详论他全体的思想。

……

（四）《三民主义》。这就是孙先生一生伟大创作的本体了。前面已经叙述过，孙先生自身，说明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又说明必须要先达到救国的目的，才能够说得到人群进化，世界大同。现在我所讲的要点，不是在分析三民主义的自身，是在研究三民主义之理论的基础。本来先生创行三民主义，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所以开宗明义，就说“今天如果要救国，必须要信仰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便能发生出极大的势力。这种极大的势力，便

可以救中国。”民族主义的结语说："我们不单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就是要决定一种济弱扶倾的政策。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我们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才算是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先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在民权主义上，第一说明民权的定义；第二说明人类奋斗的历史；第三说明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念之错误；第四从社会的组织上，说明平等的真义；第五说明欧美民权发达的历史，和他们实际方法的幼稚；第六说明权能的分别，阐明先生自己的民权主义的主张。我们看他民权主义当中，有三个要点：一个是说明中国古代的民权思想，认为民权主义的意义，在中国二千多年前，已经有了萌芽，不过是只有了一种思想，而不能成为事实。第二个要点，就是认定近代物质文明的进步，虽是一日千里，但是在政治的理论上，却是进步很慢。……第三点就是从政治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上，区别权能。这确是先生的创见，为现代政治学上一个很重大的发明。从前许多学问家，都看到这一点，但是没有相当的解决方法。先生在这一点，引起政治学说上的一个大革命。在民生主义上，第一说明民生是历史的中心；第二说明解决民生问题，要拿事实做材料，才可以定出方法，单拿学理定方法，是靠不住的；第三便说明食、衣、住、行，各问题的事实，及其解决方法。可惜没有能够完成这一个讲演，先生便长逝了。……我们看先生讲民生问题，在许多地方，都非常注意到生育、养育、教育的问题，要图一般人民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男女老幼，各得其所。所以我认定先生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当中，除了食、衣、住、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育"的问题。有了食、衣、住、行、育了，更要一切人民，都能得到优美高尚的享乐。近代的政治施设，这一个"乐"字，是最要紧的。先生在很多地方，论到这一点。所以把各种归纳起来，可以说食、衣、住、行、育、乐六个生活需要均等普遍的满足，为先生民生主义的真义所在。先生一生的精神，全都是注在民生主义。我们就三民主义的关系上来说，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也可以说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基础。要达解决民生问题的目的，便要先排除障碍民生的恶势力；要排斥障碍民生的恶势力，第一便先要民族自身具备一种伟大的能力，把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来，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完全自由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完全是在这一点，所以就民生的真义说来，民族问题，实在是民生问题当中最大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普通的社会问题，是横的民生问题，这民族问题，就可以算是纵的民生问题了。民权主义是为甚么呢？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必定要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才是正确。所以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就非建设人民的权力不可，尤其非建设起在政治上、经济地位上，立于被压迫地位的农工阶级的权力不可。所以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是主张全体人民男女的普通直接民权。如此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先生所领袖的国民革命，最初的动因，最后的目的，都是在于民生。先生对于民生问题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就这四句话看，我们就可以晓得，民生主义，实在是先生全目的所在。二十多年来，先生每次讲演革命道理，必定是把民生主义，作为最重要的论点，一切问题的中心。……去年先生对一般国民党的党员说："我是为了实行民生主义而革命的，如果不要民生主义，就不是革命。”我们就这一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得出民生主义，实在是三民主义的本体。三民主义并不是三个部分，就本体上看，只有一个民生主义；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先生定民生主义的性质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又说："共产主义，是

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就此看来，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有几个要点：

一　民生主义，在目的上，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同，因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

二　民生主义，在性质上，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同，因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都是突破了国界，以全世界为实行主义的对象。

三　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哲学基础上，完全不同。共产主义，是很单纯的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为理论的基础；而民生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的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因之，在范围上，也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就是共产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限于经济生活的问题；而民生主义，在育与乐的两个部分，已经超出经济的生活之外。——先生所已定而未讲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养生送死两个问题，在先生的思想体系上，实在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　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实行的方法上，完全不同。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之直接的革命行动为实行方法，所以主张用阶级专政，打破阶级；民生主义，是以国民革命的形式，在政治的建设工作上，以国民的权力，达实行的目的，所以主张革命专政，以各阶级的革命势力，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以国家的权力，建设社会的共同经济组织，而渐进的消灭阶级。

…………

在思想方面，先生是最热烈的主张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要求全人类的真正解放，必须要以中国固有的仁爱思想为道德基础。把一切科学的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平和，而文明的进化，也才有真实的意义。在思想一方面，先生的民族主义，同时就是大同主义的基础。先生认为中国民族，应该为世界大同而尽力。而达目的的方法，第一步就是要恢复中国民族固有之道德文化，因为这一个道德的文化，是人类同胞精神的产物。要把这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恢复起来，以之救国，并且把来做统一全世界的基础，才是完成了中国人在全人类中的使命。“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先生把这一个思想，强调到最高潮的时候，就是先生对欧洲文化的基本思想来宣战。所以先生对于俄国革命的成功，也认为这是东方文化的胜利，认为是受三民主义的教训，而不认为三民主义之思想的基础，是由西方文化而来。……先生反对西方文化的意义，从这一点分析开来，我们更看得出，一方面是反对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由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开来的帝国主义．与为资本主义基础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对于欧洲纯粹以物质问题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也从人类生存的出发点，去纠正他的错误，而付与社会革命以民生哲学的伦理性，完成“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的目的。先生认为中国的道德，最发达最进步的。……所以中国民族的振兴，和民族道德、国家道德的恢复，的确是全世界大同的基础。……如果中国民族，能够勃然兴起，对于世界的感化和助力，岂是日本维新、俄国革命所能比得上的吗？中国的国民，一定要有这样的觉悟，才是真正彻底的觉悟；也要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才是世界第一伟大民族的责任。那些空想世界主义的，固然是不认识自已的民族；而一味跟着欧美已经凋落的帝国主义堕落，高唱国家主义的人，又是不认识世界。这两种都是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背驰的。……

明白了这一点，才可以晓得，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看，所以不同于共产主义的原故，并不是要妥协，要调合，也不是故意的排斥共产主义，而实在是三民主义本身，具备有更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基础。因为这一个思想基础不同，其所取的手段，也就完全不同。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的原故，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既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既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知难行易说，在革命运动上的意义，便是如此。并且就事实上看，我们中国数十年来的革命者，并不出于被支配的阶级，而大多数却出于支配阶级。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面，去了生活能够自如的人而外，实不易得到革命的智识。所以结果只是由知识上得到革命觉悟的人，为大多数不能觉悟的人去革命。所以中山先生又说，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先知先觉，一种是后知后觉，一种是不知不觉。先知先觉的是发明者，后知后觉是宣传者，不知不觉是实行者。革命是由先知先觉的人发明，后知后觉的人宣传，大多数不知不觉的人实行，才能成功的。并且革命的利益，全是为不知不觉的人的利益。如果先知先觉或后知后觉的人，要为自己的利益，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立刻就站到被革命的地位去了。因为革命的意义，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知行的目的，却都是要以仁爱为主。因为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人类的生性。在这一点，中山先生的思想，根本与加尔马克司及罗利亚等唯物的革命论者完全不同，而应用的方向，却完全相同。在现代这样以利己的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跋扈的世界中，我们的仁爱，要如何应用才是真的呢？就是处处要以爱最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和没有工作的失业者为目的。要能够爱他们，才是仁爱；不能够爱最大多数受痛苦的平民，就是不仁，不仁就是反革命。所以说，“既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又不能为农夫工人谋利益，在革命的中国国民党里，就可以纪律来制裁他。”这一个制裁的纪律，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产生出来，并不是从阶级的道德律产生出来，尤其不是从利益的道德律产生出来的。

就前面所述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要点来：

一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甚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复。我们就这一段话，就看得出先生的抱负，同时也就可以认得清楚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制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高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

二　先生所主张的国民革命，在事实上，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但是这一个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所谓“成物智也”。一方面是要被治者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也起来为自

己的利益而革命，所谓“成己仁也”。先生认为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当初俄国革命党人当中，许多都是贵族，有名的苦鲁巴金，还是一个极贵的公爵。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代，因革命而被放逐于西比利亚的贵妇人三千多人。即此一端，已可以晓得，革命的行动，并不单是要被压迫的阶级才有。爱人利他的仁心，更不是一定要同阶级才能够具备。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所以先生在这一点，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了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支配阶级的人，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回到平民的地位来。所以先生虽是主张各阶级的联合，但是这个联合，是为最受痛苦的人民而起，并且是要联合各阶级的革命分子，不是拉拢反革命的分子。所以先生常说：“革命是为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奋斗。”又说：“我的革命，是为民生主义而革命。”

讲到这一点，我就想把中国古代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作一个比较的批评，来结束我这篇讲演。同时可以在这一个比较批评上面，看出中国二千多年来，所以文化衰颓的原因。这两个伟大的思想家是甚么人呢？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老子。大家都晓得，自汉以来，孔子的思想，完全是统一中国的基本势力。自从欧洲文化输入中国以来，中国的思想界，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个大的变化，每次都是把孔子作为反对的目标。在革命的思想里面，总是极端反对孔子的势力占大多数；在反革命的思想里面，虽不尽是标榜尊崇孔子，但是至少总对孔子不加反对。就这一点，我们看出，只有中山先生这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不单不是反对孔子的人，并且他自己说，他的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是直接继承孔子的思想来发扬光大的。”这岂不是一个很奇异的现象么？我以为看明了尊崇孔子的人，都是反革命的，才可以看得出中国国民文化所以堕落的原因；看明了反孔子思想的，都是革命的，也就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思想所以不能成熟、不能恢复国民的创造力的原故。中山先生说：“中国国民的自信力消失了。”照现在这一个思想界的情形，正是证明中国国民自信力消失的真象。在一般反革命的，顽固保守的人，他们固然不晓得文化的意义是甚么，也不晓得孔子思想的本体是甚么。而在一般革命的青年，虽然从科学的智识里面，了解了多少文化的意义，但是并不能忠实地用科学方法，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固有思想的价值，一味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排斥。……中山先生的思想，就不是如此。他是绝对承认中国人有创造文化的能力，有组织国家的能力，有组织社会的能力。中国在历史上的贡献，已经成为世界现代世界文化的基础。中国人要能够恢复这一个创造文化的精神，然后才可以尽量的接受现代的欧洲文化，把欧洲文化供我的需要，完成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同时发展中国民族创造世界文化的能力，以中国固有的世界大同的精神，完成世界大同的事业。所以先生在所作方面，以求知的精神，尽量吸收现代的科学知识，应用科学的方法，并且认为“后来居上”是科学建设的原则。中国虽然是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只要把求知的精神恢复起来，对于现代的科学文明，迎头赶上去，一定是后来居上，不但是可以和欧美的文明国民并驾齐驱，并且还可以超过他们之上，恢复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先生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在创造的能力上，是很能认识他的真价值；而对于腐败了的中国民族习惯和思想，则尽量的排斥。更从思想的内容上看，就是把中国以发展民生为目的的正统思想，完全继承起来，发扬光大；而对于破坏中国社会道德和国家道德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则攻击不遗余力。我们要能够把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思想界的倾向，看得明白，然后才能够了解中山先生所以成

为孔子以后第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圣的意义。

…………

孔子虽没有做改制的工夫，然而他却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他这一个民生哲学的理论，就是二千数百年后，创造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所继承的理论。孔子的理论是甚么呢？我们可以从两部书看见他的系统。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他在《大学》上面，说明《大学》的系统是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晓得，孔子对于一切事物，是以客观的认识为基础的主知主义。意、心、身、家、国、天下，是格致的体，是所格之物；诚、正、修、齐、治、平，是格致的用，是所致的知。再就修、齐、治、平来看，我们可以晓得，孔子的思想，注意全在民生。……

孔子的主义是如此的。何以自汉朝以来，完全统一在孔子思想之下的中国，会衰颓腐败至于如此呢？我们且先把老子的思想讲一讲，再把历史的事实详细看清楚，就可了然中国的衰颓，是否孔子的责任了。老子的思想，是出于史官，他所讲的，是君人南面之术。这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都可以晓得的。他的思想的特征，就是把个人的精神，和宇宙的精神混为一气，把个人和世界来对立起来。除我的个体之外，就是世界，世界之内，就是我的个体，更不承认有第二个组织，介乎其中。把一切人类的关系，社会的组织，国家的组织，一概抹杀；把一切维持社会国家关系的道德责任，完全否认得干干净净，建设出一个纯个人主义的世界。但是这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在人与人相处的世界里面，如何可以行得通呢？所以他才又发明一个以忍耐退守、清净无为为宗旨的道德。以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的阴贼险狠的权术，作维持个人利益、窃取社会供养的手段。他的最后目的，是在个人的永久享乐福寿康宁。作皇帝的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最大的欲望，不过是永久保持他的享乐。但是要达到这一个目的，节欲却是万不能已的。所以老子的个人节欲主义，正是他个人主义的最高潮。后来他的思想，一面派生出个人浪漫享乐的庄周，一面派生出残酷寡恩的申韩。秦皇统一了六国之后，国家主义被始皇的专制打灭干净。于是老子个人主义的思想，更乘势猖獗起来。直到汉代，狡猾的帝王，表面上竖起尊孔的招牌，而内容却完全用老子的将取必与的方法，把孔子以智仁勇为基础的社会连带责任主义，打得粉碎。百家的思想，既完全压抑了下去，格致的主知主义，自然失了效用。绝对的尊孔，事实上就是老子愚民政策最巧妙的手段。且看没有一个尊孔的帝王，自己不迷信黄老，就可以晓得他们尊孔的目的所在了。自是而后，科学文化发展的可能性，既被以放任为专制极点的老子政策和普遍的个人主义，压伏干净，于是全国国民，无智愚贤不肖，都在四个趋向的当中：一个是离世独立的虚无主义，一个是权谋术数的纵横主义，一个是迷信运命神鬼的宿命主义，一个是烧炼采补的纵欲主义。这四个趋向，不是渊源于老子的个人主义，便是以老子的个人主义为依归。而且他们所宗的老子，只是把个人主义的颓败性，尽量发挥出来，并不是在学术思想的内容上，和老子有甚么关系。后来再加上印度传来的佛教，以绝灭为解脱，更把人类社会的活动能力和向上精神，消灭净尽。两千余年来，大家挂起尊孔的招牌，其实何尝是孔子的信徒，原来都是中了个人主义流毒的游魂浪鬼。……由孔子和老子两家思想，在中国国家的关系上比较看来，我们便可以晓得：阻碍中国国家势力发展，民族文化进步的，并非以发达民生为目的，以智仁勇为道德基础的，社会连带责任主义的孔子的政治思想；而是以极端放任为手段，极端专制为目的的老子个人主义的政治思想。我们并且

要晓得，孔子的政治思想，并不是他的特创，只是把尧舜以来至于文武周公的建国经纶，用学术的方法整理起来，付与一个伦理哲学的性质。这一个思想，正是孙先生所说“极精微开展的理论”。在三代千有余年的当中，中国的文化，所以成为世界文化史上最有价值的文化，完全是在这一个理论支配之下，发展起来。如果说中国汉代以后的衰微，是孔子思想的罪过，这正是把历史事实完全抹杀了的盲论。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承认中山先生这一个继承中国正统思想，复兴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觉悟，的确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创造史上的异彩。二千年来，许多咬文嚼字的腐儒，一切似是而非的尊孔的论辩，争道统的混战，在中山先生创国的青天白日朗照之下，完全失了存在的意义。……中国是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古国，但是中国国民的文化创造力，却是消失了二千年。中山先生的诞生，是中国国民文化创造史的新纪元。中华民国的创立，就是新国民文化创造的证据。要真实地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先要把中山先生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认清楚。

就上所述，把中山先生思想之哲学的基础，大约论完了。在这里我更有一个最紧要的话，对诸君讲一讲。就是中山先生这一个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抱负，伟大的努力，在时代的关系上面，是以甚么为目的？这一点前面已经再三讲明白了，为的是革命。中山先生生于革命，死于革命，先生一切思想抱负努力的价值，都是表现在革命的上面。……如果忘却了他的目的，无论思想如何高尚，便都无可取。所以中山先生的思想，是要在他四十年革命救国的努力上，在他以一诚贯彻智仁勇三德的全人格上，才显出他的崇高伟大仁慈来。我们立志继承他的思想的人，第一要立志继承他的事业，如果不能立志继承他的事业，只是空讲三民主义，甚至于只是空讲民生哲学，这不单是不能彻底明了先生的思想是甚么，在道德上，简直是先生的罪人。从前盲从先生革命而牺牲的革命志士，虽然完全不了解先生的思想是甚么，但是并不失其为革命的先烈，国民的模范。将来即使生出许多完全了解先生的思想的学者，如果有眼不看民生的疾苦，有耳不听民生的疾苦，有口不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民呼号，有智识能力不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民效用，这就完全与过去二千年当中一切堕落了的儒者，丝毫没有两样。无论甚么思想派别的革命者，都有绝对排斥堕落的思想家的权利的。即如马克斯的学说，在一般奉科学的社会主义，信仰唯物史观的共产主义者，完全把他当作社会革命的经典。但是我们平心的审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究竟价值在那里，就是在他的革命性。应用唯物史观，说明社会革命，很容易使劳动阶级的人，生出革命的觉悟来。所以唯物史观是否真理，乃是另一问题，但是在应用的上面，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哲学的地位，是因为他思想的自身具备有丰富的革命性。但是马克斯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中山先生的民生哲学，不但是可以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并且把一切的革命历史，都在这一个原则下面解释出来。所以国民革命下面的斗士，决定非信奉民生哲学不可。这一点尤其是国民党党员大家必须共同努力的。

你是甚么民族？

我是中国民族。

你信奉甚么主义？

我信奉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甚么？

是民生哲学。

民生哲学的应用是怎样？

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而革命。

民国十四年五月于广州起稿，同年六月于上海完稿。

…………

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

研究孙中山先生主义的人，应该先要知道九件事：第一，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第二，先生的知识，包含近代最新的科学，而其解决一切问题，必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第三，先生的三民主义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其全部著作，可总名之曰民生哲学。第四，先生一生努力，全在以革命的手段，救国救民，打破一切个人主义的迷梦，实现三民主义。第五，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因为民族的自信力不能恢复，则此弱而且大之古文化民族，其老衰病不可救，一切新活动，俱无从生；即发生亦不脱病理的状态，不能救民族的危亡。第六，三民主义之实行的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的努力，完成国民革命，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之基础。第七，三民主义之终结的目的，在对治全世界的由资本主义而发生之社会病；以全人类之共同努力，建设新共产社会，完成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就是要造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世界。第八，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目的相同，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先生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又说：“马克斯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这四句话是研究民生主义的人，最要注意的格言。第九，先生的全人格，以仁爱为其基本，一切表现，无不为仁爱。有过人之智，而其智惟用于知仁；有过人之勇，而其勇惟用于行仁。可知离却仁爱，绝无革命可言。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其他一切道德，皆不外由此派生，完成仁爱之用而已。

这九个要点，是一切研究者预先应该了解的。至于愿作先生信徒的人，更应该完全接受这九个条件。倘若离却他的系统，抛弃了他的民生哲学的伦理性，只是“我田引水式”的，任意利用一点，便说是孙文主义，这是根本错误。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之统一无望。他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演成国民的自杀，那就可痛极了。

……

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于广州

（原载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三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又见《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智书局一九二五年八月初版）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

——为号召和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支部同志们：

此次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号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号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左列二事：

（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如在上海杀伤纱厂工人，东京侮辱中国国旗，在北京、武昌指挥中国军阀摧残中国学生国耻纪念运动，在山东在上海侵夺中国渔业，霸占旅大等），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

（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并可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至少其已经自行停闭之上海纱厂永远不再开工。

中央总书记T.S.Chen②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签名是陈独秀。

上海总工会宣言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

全国被压迫的民众！

外国帝国主义压迫我国，横行无忌，视我如殖民地，视我们如亡国奴，最近残暴的行为，更日甚一日。日人纱厂无故惨杀工人，死一人，伤数十人，而增加码头捐①，印刷附律②，交易所注册③，取缔童工等，如毒矢利箭向我们全埠市民进攻；全埠学生首提抗议，五月三十日在公共租界讲演，又被帝国主义巡捕枪杀九人，重伤二十余人。

六月一日上海全埠罢市，帝国主义巡捕又开枪杀死和重伤学生、市民五十余人。

我们，上海全体工人，几十年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现在忍无可忍了！

我们于六月二日起，宣布总同盟罢工！

我们齐心奋斗坚持到底！

我们的条件是：

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

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

三、禁止殴打工人；

四、改良工厂卫生；

五、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

六、不得雇佣外国巡捕；

七、反对印刷附律。

我们，上海全埠工人，不达到以上七条件决不上工！谨此宣言。

——原载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上海《热血日报》，转录自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

---

① 上海租界码头捐开始于一八九八年，当时规定凡在租界码头装卸货物，由工部局征收千分之一的捐税，而到一九二四年，税率已增加到百分之三，这时，工部局又要增加到百分之五。

② 当时帝国主义者拟规定：凡在公共租界印刷或发行任何报纸、小册、传单、招贴等，都得向工部局注册，并将印刷人的姓名、地址印上，否则要处三百元以下的罚金，或三个月以下的监禁。

③ 当时上海的交易所都已按照中国政府的法律向中国政府注册，租界本无权干涉，而当时帝国主义者却提出要向工部局去注册、领照。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

独　　秀

前年临城事件，土匪掳去念几个外国商人，外国人对中国政府闹得天翻地覆，惩凶赔款罢免地方长官以谢罪外，还要要求直接管理中国铁路；现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大马路行凶，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连日枪杀中国学生工人商人及其他市民数十名，伤者数百，中国人将向外国政府要求什么呢？

被土匪掳去的外国商人即令是无罪的，而要求工作的工人，游行演讲的学生，过路观看的行人，都是没有武装的市民，有何罪状应该枪毙呢？

即令上海是英美领土，行政官厅公然下命令，向无罪状无武装的市民开枪轰击，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犯罪行为；况且租界毕竟还是中国领土，外人来此通商，根据何项条约，有何权利，可以任意开枪杀伤中国市民？大约英美日本等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是上帝赐给英美法日等国剥削与践踏的，如有不受剥削与践踏者，便违背了神意，便是过激党，便犯了罪，便应该枪毙。或者他们以为此次大马路的屠杀，也和在欧洲屠杀犹太人在美洲屠杀黑人一样，即令在人类的法律观点上说不过去，而在道德上是合神意的：因为除了神意以外，他们找不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可是不懂得这样扶强抑弱的神意的中国人，我们亲眼看见同胞的热血染遍了大英大马路，我们已经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

此次上海大马路的屠杀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是：

（一）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剥削与践踏是一致的，英国固然是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而附和日本人的什么大亚细亚主义，鼓吹什么美国是中国人之好友等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奸细。

（二）一切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剥削践踏，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决不是什么过激派所捏造的海外奇谈；商人学生工人一切市民大群众实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践踏：把持海关，在中国遍设工厂，不许禁止棉花出口，不许中国增收纸烟捐，封禁全国学生总会，以军火给军阀战争，动辄拘捕惩罚中国新闻记者，越界筑路，提出印刷律，增施码头捐，枪杀请求工作的工人；拘捕爱国演讲的学生，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一步加紧一步，逼着中国人不得不起来反抗，决不是由于什么过激派的煽动。此次上海学生与商人之奋起，都明明白白是自动的参加民族运动，若说是由于过激派之煽动，那便未免过于诬蔑学生商人，并且过于恭维过激派了。

（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之剥削践踏，和德俄奥等非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和平通商，这些事实已证明“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是同一意义的两个名词。此次大屠杀更使我们的确认清了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的敌人。

（四）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因欧战损失过巨，须长期的加紧剥削弱小民族以弥补，中国即是他们所要剥削者重要部分之一，他们向中国剥削日益加紧，他们恐怕中国人民觉悟反抗的心理亦日益加甚；年来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勃兴，帝国主义者张皇失措，一面利用中国军阀政府抑制人民，一面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不敢团结起来反抗他们，不敢做自由运动。可是他们这种恐吓手段，在此次大屠杀中，完全失了效力；因为不管过激不过激，赤化不赤化，帝国主义者枪杀了数十无罪的中国人是真的。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被"过激""赤化"等名词吓散了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我们应有决心：如果使我们能达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过激赤化也无妨；如果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剥削被践踏的境遇，什么文化秩序博爱亲善和平人道，都是废话！

（五）在此次屠杀中的我们认清了中国的工人与学生，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我们并可以知道各国的工人学生必能对此次中国民族被外国强盗——帝国主义者屠杀表示同情。

因此，我们的运动，是应该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不应该立脚反动的国家主义上，笼统的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

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痛苦中所得的教训，很可以使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向正确的路线上发展。

上海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势力集中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民族自由运动，亦应以上海为中心；不过同时我们也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使这个运动的中心——上海的学生工人商人更坚决的前进，尤其要监察大商阶级中途和帝国主义者妥协！

我们最终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本领事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

（四）收回全国租界

（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

我们要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争斗，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阻丧！

（选自《向导》第117期，1925年6月6日出版）

中共中央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最近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草案已经在报上发表出来了，——这种工会条例对于新兴的工人运动非常之危险。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懂得这一草案的政治上的作用！

现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奋起于全国，已经出于列强帝国主义者的意料之外。而中国工人的团结和奋斗的力量，尤其使帝国主义者恐慌，甚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害怕起来了。

北京政府最初还装腔做势，说什么容纳民意力争外交的话，想欺骗人民去承认他这所谓中央政府，而今他的工会条例草案却明明表显他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了。

各国历史上都有明显的公例：只要工业一发现，无产阶级逐渐增多起来，他们便要组织自己阶级的经济组织，就是工会。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等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

这是当然的事。不管是破产的农民或是小手工业者，只要一进工厂做工，他们很早就知道在工厂里要反抗资本家，没有团体是不行的。而且只要经过一两次罢工，工人便觉得团结之后的力量。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往往可以在很大工厂或产业里，得到胜利，工会的组织也就成为很大的力量，使资本家不能不尊敬他。——资本家本来是只看见实力的。

工人在罢人〔工〕时偶然的团结之后，常常就此进步而求永久的组织，成立工会。

工会的任务是很多的：力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礼拜日和年节的放假休息，改善一切劳动条件，保护童工女工。工会帮助失业的会员、有病的年老的会员。创办通俗及职业教育、俱乐部、寄宿舍，使工人能够得到娱乐和休息。当然，工会最重要的职任，便是团结工人的力量，反抗资本家的压迫。所以资本家总是反对工会。

资本家和政府最初总是绝对禁止工会，不准工人团结，用警察、巡捕、监狱、审判厅以及种种手段来压迫。工人开会——他们便来解散，甚至于开枪杀人；罢工便算犯罪，便算违背法律，破坏秩序。

可是等到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表现出来之后，他们知道单是一味禁止工会是不行的了；到这个时候，资本家的政府，便想用欺骗的方法，北京政府现在也是如此。表面上承认可以组织工会，可是限制得非常之严，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但不能发展而且还更受束缚。

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反抗剥削，要争劳动条件的改善，必定要有自由的工会，不受外界和官厅势力的压迫和干涉。工会应当代表工人自己的意志和要求。所以政府的限制，工人一定不能承认——政府只是帮助资产阶级，真是工人阶级的仇敌。

一切工人都可以加入工会，都可以发起工会。——决不能讲年龄、工作、年限等等资格。在那一工厂或那一职业做工，便可以组织这一工厂的工会或是这一职业的工会。随便十几个几十个工人都可以发起工会。工人开大会或代表会议，用不着官厅和警察来监督干涉。

工会成立完全是自由的，只要成立之后通知官厅注册就完了。工会的经费财政，由工人

自己选出来的机关管理，无论什么条例不应加以限制。

只有这样，工会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意思和要求，工会才能工人自己的组织[1]，去力争劳动的解放，推翻资本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表现出来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一天一天的增高起来了。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政府也已经觉到了，知道单是禁止是不行的了，知道一味的高压迫是危险的了。可是他们还不知道工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他们不知道工人阶级是不会受他们骗的。中国工人决不承认北京政府那样的工会条例。北京政府的背后站着外国的和中国的资本阶级。他们拟出那样的工会条例，是想用来束缚工人，使工人不能自由结合。中国工人要求极自由的工会，要求保障工人权利的工会条例！

不准干涉工人！将来的社会是工人的！

中国工人已经表显他们和帝国主义奋斗的力量，工人阶级担负了力争民族解放的重任。

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奋斗，当然要表现更大的力量，更坚决的决心，更勇敢的奋斗。

推翻违背工人利益的工会条例！

绝对自由的阶级工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

① 此句原文如此。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坚持罢工告工人兵士学生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①

工人、兵士、学生们：

沪港等处工人，为中华民国独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已经两个多月了。罢工工人不但力争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且奋斗打破帝国主义者束缚中国的种种条约。因为不平等条约实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而上海、汉口、广州、重庆以及最近的南京青岛等处惨杀事件，即由是酿成。上海方面，虽有驻沪奉军竭力威压，托言爱国须维持秩序，实际却摧残罢工运动与抵货运动；但是工人仍然坚持，丝毫没有畏惧退缩。

外国资本家向来以中国为其殖民地，认为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中国工人是他们任意蹂躏的奴隶，丝毫不准反抗的。在罢工开始的时候，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即以“暴动的奴隶”看待中国工人，采用最横暴的镇压政策。

迨至上海香港等处五十万工人，一致奋起反抗，组织之坚强，奋斗之勇猛，为前此所未有；举国沸腾，同情四起，尤以学生小商人等的赞助罢工最为热烈。如是帝国主义者乃大起恐慌，乃不得不与中国政府及资产阶级开始谈判，声言愿意和平解决。罢工运动日趋扩大，帝国主义者亦更觉得非为相当让步不可。事态的严重，使他们觉得现在已非从前可比，不能一味压迫中国工人，使他们生活在极无人道的状况里，替外国资本家挣钱。

帝国主义者这才明白，中国已有工业的无产阶级既能力争自己的阶级利益，又极努力于中国的解放，已成了全国解放运动的先锋；因此使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政府，不能不在国会中提起“中国问题”，不能不将两年来早已抛在脑后的华盛顿会议的决定，重新提起来。

可是，工人、学生、兵士们呵！除少数工贼买办，当此全国各界一致赞助罢工工人之际，而帝国主义者亦已不能不预备让步了；适于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竟遣其部将自告奋勇的来帮助英日帝国主义者。

奉军南下的时候，诡称保护国民利益，其实张作霖和帝国主义商量好了，奉军之来，即为压服罢工运动，恐吓学生和商人，替那些帝国主义者解围罢了。邢士廉初到上海之时，所以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为张作霖或邢士廉不愿下手，却是因为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非常之激昂，奋斗的决心非常之坚决，如果那时便直接压迫，民众必定要起来暴动而反抗奉军。

---

① 这个时间是《向导》第一二五期刊载的时间。

然而过了些时，奉军的压迫终于开始了，帝国主义便兴高彩烈起来。英人报纸天天鼓吹杀人压迫，邢士廉便天天封闭团体，逮讯工人学生——这可把英国人和张作霖之间的秘密关系，完全暴露出来。工人、学生、兵士们！邢士廉来到上海，华界马上就戒严，上海四处都布满了侦探汉奸，造作种种谣言来破坏工人及一般民众的团体。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罢工始终还是继续下去，工人群众深知他们已经得着的胜利——是非常之可贵的。工人阶级因有种种团结的能力，已经使帝国主义者都不能不让步，至少口头上已经不敢强硬，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引起全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各地都起响应，然而现在这一潮流，还不能立刻形成全国的反抗运动，——工人还必须有长期斗争的预备。而且军阀一天天的进逼，甚至于大资产阶级已经想中止罢工及抵货的运动——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

因此上海工人现时应当明白表示，对于自身的经济上及法律上的要求，当然继续以罢工方法力争；至于全国的总要求和工商学各界所提出的条件，工人当以全力赞助南北政府，使一致的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奋斗。

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因此，工人得以更进一步的团结组织，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分子，继续斗争——在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之下，达到完全解放中国及工人阶级的目的。

工人们！罢工仍须继续坚持，先求达到经济上法律上的要求，团结在工会里面。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

学生们！对于工人精神上及物质上援助，此时更须努力。工人的胜利便是学生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

兵士们！你们也是中国的国民，也和工人阶级一样的。你们从此不好反对工界同胞，不应听任何人的命令压迫工界同胞。工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是反抗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之胜利，所以亦就是你们的胜利。

工人兵士学生的胜利万岁！

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国民自由万岁！

工人学生兵士以及一切劳动平民联合万岁！

反抗帝国主义之继续斗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
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工人学生和兵士们！帝国主义者感觉中国民族解放革命怒潮之高涨对于他们万分危险，所以他们此次坚持着，绝不肯让步以求正当的解决。他们的政策：一面使交涉期限无期延长，坐待民众怒潮自趋疲惫；同时仍继续以自己的武力或利用军阀的武力直接制止全国各地运动。

南京英国和记公司的工人，经过了长期罢工奋斗，以有组织的力量，才迫得外国资本家承认罢工之要求。工人以为复工后外国资本家必能履行这些要求条件，殊不知万恶的外国资本家，不仅不履行前所承认之条件，反倒调遣英水兵上岸，在完全中国主权的领土上任意屠杀徒手工人。要求执行条约之男女老幼工人当场中弹而死者三人，伤者无数。这便是“文明的”帝国主义使用自己武力的例证！

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宗昌，受了日本指使，早已不止一次屠杀过罢工工人了。现在他又明目张胆地枪毙工人领袖李慰农和表同情于工人的《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并逮捕工人数十人解往济南，借此表功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便是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武力的例证！这班当帝国主义鹰犬帮着帝国主义屠杀人民的军阀乃是人民的公敌，人民应该起来象打倒帝国主义一样去打倒他们。

我们知道在此次外国资本家屠杀和记工人当中，南京军队不忍见此惨无人道的凶剧而起来保卫工人，抵抗外国资本家的屠杀。兵士们！你们这种行为是很可钦佩的；你们也是被压迫者，正和工人学生一样；你们的爱国热忱是不让人后的。你们的利益与工人学生的利益初无二致；在必要的时候，你们应该起来反抗卖国长官压迫爱国运动的暴行，而一齐参加爱国运动，争得共同的利益。——至少，你们亦不应该接受卖国长官命令，去压迫摧残那做爱国运动的民众机关。

工人学生和兵士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虽然用尽种种延宕的或屠杀的方法，镇压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然而我们确信今后的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决非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种种方法所能镇压下去。

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惟有团结自己的势力，联合全世界一切被压迫者向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攻！

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

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

中国民族解放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联合宣言[①]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

中国工人和学生的血流了不少了。自从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大屠杀之后，中国各地接接连连的屠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中国工人阶级为着争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可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却始终想用屠杀政策压倒这种解放运动。两个半月以来，被杀的受伤的已经有几百几千。——上海五卅屠杀之后，汉口广州等处又继续着惨杀，甚至于九龙也有不少中国工人被枪毙，他们不过因为不肯替英国人掘战壕，帮英国人预备打广州。

全中国的民众都已经因愤激而反抗，帝国主义者却还在预备更厉害的压迫，更残酷的屠杀。最近又有好几次大屠杀：第一是南京和记工人——他们罢工之后和记公司的老板已经答应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时候，这些外国资本家不但悔约不肯履行，并且开枪打人，又叫了英国水兵来帮着杀人。第二是青岛的纱厂工人——日资本家直接命令他们的奴才张宗昌枪毙《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将工人王伦斩首示众，并且四出拿人，捉去工人四五十。第三是天津的纱厂工人——日商裕大纱厂诳骗工人，假意答应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去上工，就开枪轰击，奉系军阀李景林也立刻帮忙，派出军队警察五六千人围攻工人，死伤数百，接着还逮捕工会及学生会的领袖，严刑拷打，惨无人道。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英国帝国主义者想用炮火政策镇服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想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贿买卖国军阀和工贼，一面压迫一面破坏，来强迫中国的人民仍旧做他们的驯服的奴隶牛马。他们永不用妄想罢！从此以后我们中国民众，工人学生一定永久不息的奋斗，反抗我们的仇敌。虽然我们的仇敌还在天天遣调海军上陆，天天命令军阀屠杀工人，天天贿买工贼破坏工会；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觉悟，已经奋起斗争，几十万几百万的中国工人，广州、上海、汉口、青岛、天津、开封等大都市里无产阶级，努力参加斗争的，也正一天天的增加呢！上海的五卅惨案激起汉口广州的工人，汉口广州的屠杀，又激起南京天津的工人……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日千里的发展。当然这种民众的力量同时亦便反抗帝国主义的奴才——张作霖手下的奉系军阀。“五卅”以来上海、汉口、广州、南京、青岛、天津等处被杀的人，固然已经有几百几千，可是全国各地因此而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人，又何止几百万几千万！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帝国主义者现在还在兴高彩烈，他们的机关报拚命的颂扬李景林，感谢张作霖，他们指使邢士廉——教他照天津李景林的模范镇服上海的工人。

工人们！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奴才奉系军阀真会照着天津的"模范"来压迫上海的工人。我们应当及早的预防，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所已经签订的条件，本来只是上海交涉员和日本领事的谈判，我们工人是不能满意的——可是他们自己签字的条件，也未必肯诚意的履行，亦许也是帝国主义者诳骗工人的。帝国主义者在南京、青岛、天津已经屡次悔约，屡次指使军阀压迫——难道在上海他们不会如此吗？我们工人应当准备自己的力量，应当准备对付他们的阴谋。工人应当一致团结，以全力拥护工会，工会组织应当特别严密，使我们团体，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等怎样压迫破坏，始终能够存在。而且工人还要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

学生们！努力的继续帮助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罢！军阀的压迫和残杀决不会吓退你们，只会使全国的革命运动格外发展。赶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举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向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奋斗。

兵士们！不要向工人和学生开枪，他们为全国的解放而奋斗，亦就是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你们赶快组织兵士的革命机关，反对那些使你们变成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现在矿工铁路工人还没有直接加入斗争哩！还有许多地方的工人阶级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加入运动哩！这种准备正在进行，假使全国一致的团结成功，我们的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几千几万倍哩！群众里面的这种力量正在一天天的积聚起来，准备着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决死的斗争。这是很长期的工作，要组织得好，要有耐久的战斗力，要有统一的政治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便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政见是：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然后中国工人和一般民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工人们！学生们！兵士们！帝国主义者固然还很厉害，他们有兵舰，有飞机，有机关枪，有种种杀人的利器；他们还有军阀，有工贼，有侦探，有种种破坏中国民众内部的工具。可是中国的民众，并用不着害怕。列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一天天的奋起反抗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中国民众和各国工人联合，便可以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万岁！

推翻列强帝国主义的强盗！

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奉系军阀！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领袖之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遇刺唁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广州传来廖仲恺先生被刺逝世的消息，使我们不胜悲痛。

廖仲恺先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健将，如今竟成了帝国主义者阴谋的牺牲品，这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本党敬代表中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表示极诚恳悲痛的唁意。

廖仲恺先生的死，正死在国民政府努力与英国帝国主义奋斗的时候，正死在国民政府努力整顿财政的时候，他被刺的原因，我们可以断定是帝国主义勾结反革命的军阀之阴谋。"五卅"以后，沙基惨案以后，沙面香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罢工和南方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已经使帝国主义者慄慄危惧，帝国主义者所赂使的杨刘等反革命的军阀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得以努力进行财政的统一以及其他利于民众的政策，不但使反革命的军阀丧失他们保庇烟赌鱼肉人民的利薮，并且使帝国主义者觉到中国国民政府巩固起来的危险。何况，廖仲恺先生被刺的那几天，正是香港的帝国主义者宣传对粤宣战"使亲善的华人政府代执广州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派的互相勾结而实行刺杀国民革命领袖的阴谋，实在再也用不着什么别的证据，已经明瞭到极点的了。当然更不用说，他们刺死廖仲恺先生的目的，决不单是要刺死他一个人而已，而是要推翻国民政府，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然而只要国民政府始终是拥护民族及民众利益的政府，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必定因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无耻的阴谋，而更加觉悟，更加积极的以全力来拥护这一政府。全国的革命民众都准备着赞助国民政府，赞助贵党，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

廖仲恺先生虽死，廖仲恺先生的革命精神没有死，赞助国民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决不会死！

廖仲恺先生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五，八，卅一

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

赤　农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廖仲恺遇刺，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其意义，也不只于死了一个寻常的伟人先生，因为他之死，足以表示中国此期革命运动的性质，至少也使中国南方革命运动发展史上划分一个阶段。

他之死，不但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是中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

他为什么死？为中国民族谋解放而死。死在什么人的手里？死在国民党中的右派——国民党中之反动军阀，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里。

为什么呢？须将廖仲恺遇刺之前的广州政局说一说。

严格说起来，本来广州革命政府的基础，并不纯粹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身上，还有各种反动军阀临时凑合的势力，依赖着革命政府而生存。这样的一个革命政府，地势上又因为与控制中国南部经济的香港政府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所以时常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的恐吓之下。当中山在时，尚且免不了被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扶植的商团事变，中山死后不久就发生刘杨战争。这许多事实，本来都有右派从中鼓动，大显了一番神通，但是此地我们要说明的是：广州革命政府的基础不稳。

刘杨剿灭后，广州革命政府，依历史的眼光，到了一新时期：因为剿灭了两个侵夺地盘，擅任官吏，霸占机关，私收赋税，私定苛捐杂税，开设杂赌，包办烟土，……使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所作为的强有力的军阀，使香港政府一时失了在广州内部的武装工具，使国民党的右派先生们一时敛迹。此时，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假若真能团结，有革命的决心，实在可以大所作为；在实际上，刘杨剿灭后建立了国民政府，改组了广东省政府，实行军财两政的统一，禁烟禁赌，确实也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自有国民党以来唯一盛举。但是这种利于民众的政策，与反动军阀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必须以严厉的手段处置或解散与刘杨类似的反动军队，才能实行；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一时不能下这样决心，所以自从实行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以来，到处发生障碍。在粤军中诚心悦意改组者只有李济琛和许济，其他如梁鸿楷李福林林树巍莫雄郑润琦杨坤如罗翼群等，不仅不愿改组，且公然表示反对，占据财政机关，包烟包赌，干涉民政，毫无顾忌。在李济琛一师确实有改组之可能，但因与其一部分部下不甚和睦，为改组事，时生龃龉，有妨碍工作进行。许济总算听话，但他的军队根基太坏，军官多不甚可靠，如不加以淘汰，前途希望仍甚少。这样看来，粤军大部分有五分之四，立于反革命地位以与革命政府相抗，其余之五分之一又多不甚可靠。在这样军队改组的重要时期里，所谓革命政府所在地的“主军”如此，此时国民政府所处的地位即可想见。至于谭延闿的湘军，因为回湘的欲望，军饷不足，只有向左的倾向，朱培德之滇军与湘军抱同

一态度。蒋介石的党军本由簇新的制度组织，无容改组；其余还有一些小军队如程潜之攻鄂军，何成浚之鄂军，陈青云之豫军，李明扬周贯虹之赣军等，全因觅食之难，饷源之缺，都希望早日改组成功，他们好有一个着落。综合这许多愿意改组的军队，固然不能说他们没有改组的诚意，但将整个的赞成改组与反对改组的两大倾向中看，还是不革命的右派占实际优势。

赞成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改组军队者；以廖仲恺为最力。廖仲恺深知革命政府建筑在各个反动的军阀上面，假若不趁刘杨剿灭后国民党所处的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不根本改组革命政府下所统率的军队，则革命政府的前途没有希望；假若不禁烟禁赌，得到民众的同情，革命政府实在危险；因此他以财政总长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政治委员会的委员等资格，雷厉风行的执行。因此大招右派的反革命军阀之忌，这就是廖仲恺被他们狙击的第一个原因。

右派的反动军阀自私自利甘心作反革命与刘镇寰杨希闵无二。所以凡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利于他们个人的行动，他们务必反对；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崛起，在在与他们割据地盘，独霸一方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凡属反革命的右派军队无不摧残农会，妨碍农民运动向前发展，这不仅郑润琦的第三师最近在广宁惨杀农民可以为例，花县东莞香山等处的事变，亦莫不如是。工人运动，表面上与他们关系较少，但最近省港罢工工人的伟大力量，足以使他们骇倒，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实行禁止粮食货品出口，与香港断绝营业关系，处处与割据式的反动军阀以实际上利害之打击。这些政策，这些运动，在他们看来，都以为属于共产派。总而言之，凡是与他们利害相冲突的政策，他们通以为过激。于是首当其冲为他们所属目的，便是廖仲恺；因为廖仲恺的行动和思想在国民党之领袖中。平心静气说实是一个左派，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廖于革命政府改组后，主持工农运动外，又加上改组军队，统一军财两政的新责任。这个实际上名义上与反革命的右派军阀的利害冲突，非常的显明。此外他们更记得推倒刘杨的时候，廖仲恺主谋之力居多。廖仲恺未死之前三四礼拜，所传党军解散不法军队的流言，他们更信廖仲恺又是主动之一。何况党军勇往直前的气慨和不怕死的战斗力，更为他们所忌。在他们看来，处此情状，非狙击廖仲恺不可。要消灭党军又非狙击蒋介石不可。此外许崇智，汪精卫也是要被他们狙击的主要分子。许之所以被狙击，因为他在政府中曾主张军队改组，予他手下五分之四的军队以不利，又加上积怨，不成为他们所要攻击的人物，甚至谓他庇护党军，摧残同类，实际上许氏与蒋介石之关系，正不必如戴季陶所说，须本报记者加以挑拨，他们可以自成水火，不过粤军中人因为利害的冲突，终承认为改组军队，黄浦党军是主谋，许氏投降黄浦。汪精卫所以要被狙击，因为他是改组政府后的一个中心人物，他对禁烟禁赌特别主张不遗余力，这当然要遭右派军阀之忌。于是右派军阀暗杀阴谋发生。汪许蒋廖都在拟杀之列，已被狙击者就是廖仲恺。在此地我们可以说右派反革命的军阀大联合，是廖仲恺死的第二个原因。

有了右派军阀的大联合，自然而然会联到右派失意的官僚，无聊的政客和卖国的买办，因为军阀与反革命的官僚，政客，买办总是一致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许多右派的官僚政客，得不到做官的欲望，并且还有许多被裁撤，如胡毅生，林直勉等都是赋闲，且胡毅生失了胡汉民执政时卖官鬻爵的大买卖，那有不惹动他们的无名火积极的鼓吹煽动起来！因此胡毅生等就在李福林等的军队里煽动，有许多靠革命吃饭的就在海外华侨宣传，说政府主张共产；买办商人周殿邦得了香港政府的大批金钱，在沙基设立了一个大的俱乐部，供给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等的挥霍，一方面又以金钱接济赵士觐胡毅生林直勉创办反对革命派以

反共产为口号的国民新闻，专门与政府为难。在这样的右派官僚政客和买办的活动情状之下，加上右派革命军人的大联合，自然要使广州的政治弄糟，处处与革命政府为难，广州的政局要急变，自然免不了的了。这种现象，还在八月初就看得非常之显明，而广州的革命群众在此时又有再不能忍受反动军阀的压迫和反革命的官僚、买办的造谣的表现。所以有八月十一日之广州大示威运动，要求政府解散不良的军队，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当时政府诸领袖有相当的决心，当然尤其是廖仲恺，这是廖仲恺死的第三个原因。

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都没有独立的力量，更加没有政治的知识，他们所以在社会上扰乱，做出许多滔天大祸出来都有帝国主义者在后面发纵指使。廖仲恺之被狙击，最近广州之政局严重，英国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实负勾结主使之责。刘杨打倒后，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广州一时失掉了强有力的武装工具，不幸又发生五卅惨杀后之全国大反帝国主义运动，香港政府非常之恐惧香港的中国工人罢工，多方破坏。结果，香港的中国工人为爱国的热情所冲动，为香港政府积年无情的压迫所驱使，差不多都返广州，大罢工了。此时香港几成一荒岛，香港政府第一次遇着了唯一的致命伤、空前未有的大对头——大罢工；因此香港政府想尽方法，以期消灭罢工。当罢工第三礼拜的时候，驻沙面的英国代理领事曾嘱日本领事探听罢工的目的和解决的条件，有要求解决罢工的表示。到后来知道国民政府之下的一部分反革命的军阀和官僚政客有捣乱的酝酿，因此积极的勾结他们，以期国民政府内部瓦解，达到解决罢工；同时又拚命供给洪兆麟，邓本殷等的枪械子弹，以期从东路，南路扑灭国民政府。

此外又在香港各处制造要求英国政府以武力干涉广州的空气，并发出大批的金钱宣传国民政府将实行共产，驱逐他们所谓广州及广东之布尔扎维克。香港政府的计划可谓精细周到，这也是他迫不得已的情形，因为现在香港与广州的问题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国民政府胜利则香港的势力不能肆无忌惮的伸张至广州，香港政府胜利，则国民政府将被消灭，且使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受一很大的打击。这种意义，国民政府的首领如汪精卫廖仲恺等当然非常之明白，所以积极的帮助省港罢工。省港罢工，在刘杨被打倒之后实成为广州政治的中心问题，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都在此问题上勾心斗角。但因为这个问题，又加上上面所说的许多情形廖仲恺于是就不免一死了。这是廖仲恺死的第四个原因。

在上面所说的许多情形看来，我们可以得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廖仲恺是被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军阀官僚政客和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刺死的。廖仲恺不因简单的个人而死、而为中国国民革命而死，死在帝国主义者，反动的军阀，无聊的政客，卖国的买办，互相勾结，想积极消灭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紧急时期，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二个结论是：现在广州的问题并不是共产与反共产的问题，而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所谓反共产这个口号，在反动的军阀，无聊的政客、卖国的买办一方面说，是他们想割据地盘，传达做官的欲望，和保障发展买办阶级的力量的假面具；在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说，是香港政府想维持和发展他在南方的势力，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利用中国人从中世纪所遗留下的宗法社会的软弱心理的大阴谋。第三个结论是：国民党的右派总是反革命的，右派不根本痛快的肃清，国民党不能负引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群众实行国民革命的任务。

现在再看廖仲恺死后之广州的政治情形。

廖仲恺死后，当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会时即组织一特别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负责办理廖案时之一切政治的和军事的最高责任。此外还组织一七人组织的特别

法庭，这当然是革命的组织，应有必有的。要犯除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赵士觐外，余都被拘留。参加此次暗杀的军队如杨锦隆，梁士锋林树巍等都已被解散，其他如梁鸿楷等的军队正在解散中，这当然是革命的行动。但是有意的无意的，自觉的不自觉的，参加此次暗杀的人实在太多，假若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廖案的人没有决心，不将他们最后的根本肃清、国民政府的前途还免不了危险，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凑合，弄成更凶险的事变。廖仲恺之死固然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但是国民党诸领袖假若乘此机会有肃清反革命的决心，未始不能使国民党开一新局面。即站在私人的感情一方面说，廖仲恺与国民党诸领袖共同奋斗几十年，不为他复仇，也无以慰他"在天之灵"！至于廖死后之各方面态度，右派当然非常的快意，胡汉民的态度当然最局促不安，因为有他的堂弟胡毅生参加主谋，据报载，他现在并软禁在长洲要塞司令部，有参加暗杀的嫌疑，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最愤慨的当然要算汪精卫蒋介石及工农群众。许崇智自然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这次右派的联合实在太显露了。至于大商人，普通是不高兴廖仲恺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政府现在是否危险？可以肯定的答覆：国民政府是不危险的，因为有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和比右派反革命军队数量较多的革命军队帮助国民政府，香港政府的阴谋此次无从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廖仲恺先生已经死了！国民党革命的诸领袖们！你们不要错过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很坚决的最后的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使国民政府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军队上面！错过这历史时期，广州就要发生第二次更凶险的事变！

国民党诸党员们！你们要更积极的前进，铁桶一般似的团结在革命旗帜之下，继续完成廖仲恺先生未竟之志！

广东的工农及全国的革命群众们！廖仲恺先生为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的力量而死，你们应当更加愤慨，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维持国民政府！

（选自《向导》第130期，1925年9月18日出版）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

（一九二五年十月）

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

（一）“五卅”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

“五卅”屠杀后的时局，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四个月来革命潮流的膨胀，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

此次运动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真正是一般民众的运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开始便有极广泛的城市群众的参加：无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学生、各地的商会，甚至于教会及教会学校里的中国智识阶级——他们本来是直接处于帝国主义机关的影响之下的。

各大商埠及沿铁路各大城市里的革命运动，已经直接影响到几千万的农民——尤其是在南部中部诸省，他们也开始反抗军阀及土豪劣绅的斗争。

此次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即在于能使国内一部分的军队倾向到民众运动这方面来，譬如国民军。在别一方面，奉系军阀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背景里，格外明显的表现自己的反革命的性质，明目张胆的帮助帝国主义。

这一特点当然更明显的证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变更，到现在还是继续着辛亥革命而发展，向着完成这一国民革命的道路上走去。

广东在这国民革命里占着特别的地位，革命政府以全力帮助的罢工排货运动的范围，在这次确是全国的。

广东现在的政权在国民党左派手里，当然，他在这革命战线之中占着最革命的先锋地位。南方的工人农民群众以全力督促这革命政府，去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革命派。然而这种中国人民的仇敌进攻得也最厉害，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在南方独占着压迫中国的霸权，并没有别人和他竞争。

仅仅因为中国北部及中部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国范围内列强之间的互相冲突，所以英国帝国主义者还不能扑灭中国南部的革命运动。

（二）工人阶级与国民革命运动

此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里，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才真明显的表现出来。香港及上海罢工的广大，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使民主主义的各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般人民，都团结在这工人阶级斗争的旗帜之下。极大多数的城市民众，都利于这反对英日的罢工运动胜利。这就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

别一方面，奉系军阀在上海、南京、青岛、天津等处残暴的压迫屠杀工人，尤其证明中

国的工人阶级是力争民权的急先锋，他们的运动在罢工潮流高涨的时候，确有变成全国总罢工的形势，引导城乡各阶级加入解放运动的一天天的多起来，对于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很有形成全国平民大暴动的危险。

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起斗争，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香港、上海的罢工，是全国工人阶级这种运动的主力军。最近一两个月工人群众起来力争改善经济地位，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承认工会——这种运动的广泛和力量是中国从来所没有过的。

这几个月来中国的经验，明显的证实中国资产阶级也和过去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可是处处只为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与资产阶级共同斗争的时候，同时对国内资本家要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国内资产阶级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

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化，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发展，已经一天天的明显出来，这种分化的结果，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可是几百万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为无产阶级斗争所引进这反帝国主义和力争平民政权的运动的，直到现在，还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格外集中积聚自己的力量，与城市里民主派的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引起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

（三）农民与国民革命运动

中国农民运动在南部及中部诸省也逐渐发展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现时已经要使一般工人农民知道：到了建设国民革命政府的时候，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

我们的党应当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组织农民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

可是我们的职任，不仅限于明白规定农民的要求和农民运动的前途，还要注意我们对于农民的指导的组织——我们自己的党在农民运动中之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四）军阀与革命的民众政权奋斗

最近的革命运动，当然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中国城市乡村的一般民众，都已经不能不参加政治斗争。不但是无产阶级，而且农民、城市小资产

阶级及智识阶级，也都积聚组织自己的力量来参加革命。甚至于一部分反奉系军队也转移到民众革命运动方面来。

同时别一方面，中国劳动平民的仇敌，中国平民政权的仇敌，也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以求保持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状况和横暴的军阀制度——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便是这主要的反动势力，是平民武装夺取政权时的最危险的反革命力量。

现时这一历史的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国内各派军队之间的斗争，不能处于旁观的地位。当这全国民众起来争中国解放和民众政权实现时候，中国军阀之间的互斗已经不仅是各派军阀争夺地盘的斗争了。

最近一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

所以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最近将来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要求战胜奉系军阀，必须国内一切革命势力有极大的结合，然后国民革命运动能得着新的发展道路，而要求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便成了当时的紧要问题了。

革命民众政权之建立和中国之统一，是全国各阶级共同的口号，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口号，可是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是战胜一切卖国军阀的结果。国内革命运动愈发展，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愈巩固，那么，国内军阀之分化愈速，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成熟得也愈快，国内军力卷入这一斗争的也愈多。

当然，那些利于中国处于被侵略地位的帝国主义者，想使中国变成纯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必定以全力帮助反对国民革命的军阀，竭力破坏国民革命方面军力，压迫国内的一切革命运动，然而他们这种政策只会更加激起民众的反抗和斗争；这种斗争里，革命力量的积聚更加伟大，而使推翻军阀后的革命更加容易发展和深入。

（五）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和国民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的列强政府，虽然都要压迫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可是他们不但遇见中国民众方面反抗的障碍，而且他们自己之间的在华利益既有剧烈的冲突，他们自己国内又有剧烈的阶级斗争。四个月来国民革命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出来：虽然各国帝国主义者极想联合一致的向中国劳动平民进攻，用武装的暴力压平一切民众运动，然而他们在事实上却始终做不到。

英国帝国主义最利于保存会审公堂、关税管理权等的对华特权，所以最公开的压迫中国民众，可是这种压迫的结果，只会使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特别注重于英国。日本的帝国主义政府，以前被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逼得不能不取消英日同盟——远东方面这几国的利益因此冲突得格外厉害起来，在这一次呢，他想利用中国排英的怒潮，把一切罪名推到英国身上去。

美国帝国主义者，在欧战终了时取得了在中国的经济侵略之特权，现在这一次更想利用民众运动的机会，削弱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进行自己的侵略计划，恢复华盛顿会议政策。

最近数月来的斗争，足见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潮愈高，帝国主义者愈觉得中国工人及一般民众力量的巩固；那么，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因为对于压迫中国民众运动的方法意见不一致，也就愈加厉害了。

帝国主义者现在对于中国某几种极小的让步，完全应当认为是最近四个月来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及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之结果。

只有继续和发展已经开始的斗争，能逼迫帝国主义者，使他们不得不对于以武力干涉中国或以其他方法进攻的问题，各自考虑起来。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尤其是日本与英国——对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极大的作用。英日最近失业者的增加，他们工人阶级重新开始经济斗争，工人群众的革命化（英国工会中少数革命派的增加，日本工会中革命派“劳动组合评议会”的组织，日本无产政党成立大会之筹备等）——都使帝国主义者有后顾之忧，不能轻易以武力干涉中国。

再则，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使他们不能使用武力对付中国的——便是苏联，因为苏联是利于中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建立革命平民政权的。可是，因此帝国主义者也格外了解日益发展的中国几千万劳动平民的革命运动之意义，觉得这种运动的危险。

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应当知道：虽然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互相有冲突，虽然他们国内阶级冲突日益激烈，虽然苏联能帮助革命的中国，然而帝国主义也还有以武力镇压中国的可能，而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乱。

（六）中国的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

中国革命运动所已得的胜利之一，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能和世界工人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最近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得到西方革命无产阶级的极广泛的响应，西方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屡次对于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以及一切民权派的民众，表示团结和援助的呼声。

中国民众的斗争开辟了反帝国主义的新战线，同时亦就增加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现在帝国主义已经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遣调海陆军来侵犯中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别一方面，这些帝国主义者对于苏联及自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十分进攻，也是因为中国、摩洛哥、叙利亚等处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最近的运动，使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比以前重要得多。

第二国际与亚摩斯德丹职工国际的首领，对于中国现在的运动，公开帮助各国的帝国主义者，这些国际事实上是国际资本的工具——到现在格外显露出来了。当然这一次的新证据——证明第二国际及亚摩斯德丹国际背叛东方被压迫民众的利益——更加要使资本主义国际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化，而脱离这些“失节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七）中国共产党之职任

（一）现在这一中国民众革命的时期，使中国共产党负着历史上有极大意义的职任。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成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现在这革命斗争的时期，不但指示出运动的前途和民众斗争的政纲，而且还要极明显的对民众解释：革命民众政权，中国统一，工农商学兵代表的国民会议，国

民革命军的组织等口号的意义。

（二）根据上述口号组织工人的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以集中积聚无产阶级力量——亦是中国共产党根本职任之一。同时，吸收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到自己党里来，也是最紧急的职任。结合觉悟的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到共产党旗帜之下，根据共产主义给他们以阶级斗争的智识，这是现时共产党很重要的工作。共产党假使不能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发展和巩固，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往前发展，简直无从设想。

（三）由直接反帝国主义的罢工运动到经济要求争工会组织的罢工运动，在最近期间，工人阶级之中表现有隐晦政治斗争的危险，同时又有减少工人经济要求以提高工人政治奋斗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应当知道这两种危险，足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在总的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里，没有对于斗争前途中的很明显的概念。要免除这两种危险，我们应当使群众多多的参加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如示威集会等口头的文字的宣传，同时又须扩大工人重要的经济奋斗，这是我们目前重要工作，对于党的发展尤其有重要的意义。

（四）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人阶级斗争，经过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许多次的压迫，丧失了许多勇敢分子，在工人群众当中造成了从来所没有的革命的心理。中国共产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不但在铁路上矿山里，而且在稍大些的工厂里也要进行这种工作，要组织青年工人的武装十人队百人队等，因此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

（五）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于他应当继续合作的政策，竭力推引这一党进行革命运动。最近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所代表的右派国民党思想的发现，可以说是四个月来民众的革命化的直接的结果。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

在政治上，力求公开我们的党也是达到这一目的重要方法之一。组织我们自己的同志发展巩固我们党的组织，一切运动及工作里有我们自己很明显的思想上的及策略上的主张——凡此一切都是打击国民党右派和公开结合左派的保证。

（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引导广大的学生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同时须设法使革命的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学生在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曾经有不少的革命作用，尤其在最近这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各大城市里的学生差不多都与工人阶级合作，站在前线上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参加。当现时革命潮流正在继续不断发展的时候，无疑义的，学生当然还有更大作用。但因为资产阶级在现时民族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一天一天分化显明已经反映到学生群众，学生中已经有一部分改良派的分子在国民党右派指导之下，他们不与帝国主义者积极奋斗而集中力量反对共产党及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切左派。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学生运动目前的责任，须设法得到学生群众的统一组

织，攻破学生中右派的改良政策，因为从普遍一方面说，学生应该整个的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左派，要得到学生群众的统一组织，须在学生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使右派的群众压迫他们的领袖与我们公开的谈判和合作。

为着引导学生群众加入民族革命运动，同时须注意学生群众的日常工作问题，在指导学生群众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去得到我们的信仰，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为他们提出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切身要求，如各高级学校得组织自治会。

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国内最近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中，有几十万上海、香港、广州的工人罢工参加，北部、中部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部分也因此而奋起争斗，使全国好几百万的工人都有了政治经济斗争的觉悟——这种时期是向来所没有过的，使中国共产党特别要注重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指导和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二）这次民族革命的高潮和幼稚的无产阶级加入这次运动的热烈，其结果当然使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增加许多倍——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的革命运动现时所处的时期，是革命潮流在群众中日益高潮的时期，这是绝无疑义的。

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三）可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指导并且组织革命的工人手工业者和智识阶级——不但在于吸收他们进我们的党，而且在于我们的党有正当的好的组织。必须从下至上，从支部至中央都有集中的组织积极的分子，下层组织与上层组织要有极明确的密切的相互关系。

党员既然增加，下次大会必须相当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妇女及分配科、出版科等，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他们相互之关系也要明确的规定。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①，他们都应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应当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事实上能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最近几个月的经验，有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中央的指导太少，工作人员的分配对于各地也太不平均。革命高潮之后，我们党的发展更为重要；所以尤其要注意北部，因为北部工人还没有尽量的参加此次运动。天津唐山两处的失败，尤其使我们不能不立刻在这一区域内加紧发展党的工作，因此，在北部应当巩固京区的组织，管理直隶、山西及东三省，北京地委单独组织，不由京区兼。

（四）区及地方委员会，一方面应当真正完全执行中央命令，关于一切政治上及策略上的问题，都请中央的指示；别方面，应当指导地方的工作（支部、党团、俱乐部、工人研究会等），派人到所属各处监督日常的党的工作。象上海这种地方我们的党现在扩大了不少，现在已经要在区委之下按区域分划几“部”，组织“部委员会”。这一组织上的新办法非常之

① 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中关于这个文件有以下一段话：“（一）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

必要，一则因为指导上方便，二则因为更容易扩大党的组织。

各支部的职任，尤其是在工厂里，便是从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势力，经常不断的吸收革命的工人。

（五）现在在群众中巩固我们党的势力是组织上最重要的问题。现时革命潮流高涨，单是群众愿意接受我们的提议，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在群众之中真有势力，真能指导。必须利用这个革命潮流：

甲、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重形式，工人农民候补期一月，智识分子三个月。

乙、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的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我们的支部和党团。

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尤其大产业工人，本是天然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何况在此革命时期。现时各地方负责同志大半都有一种错误观念，以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因此，大半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

粤区在这革命运动高涨，香港工人热烈斗争的时期，竟没有能利用机会巩固并发展我们的党。粤区虽能在思想上影响工农群众而不在组织上把这种势力巩固起来——吸收工农分子进党及在各种团体里组织我们的党团，这是一种错误。广东的同志只是各自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协会军队里工作；并没有能象一个强有力的党，有组织有指导的站在自己党的利益上去工作，去领导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的斗争。

（六）我们的同志，各级委员（中央和地方）向来各自在工会国民党学生群众中工作，或者各自专门指导某种工作，便仿佛对党内代表这各种运动，而不见在这各种工作里去实行党的总职任——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应当赶快改正。

这种习惯，可以说是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时一种现象。现在这种过渡时期应当在极短期间终了，应当使全党接近无产阶级、农民、智识分子的群众。

（七）现在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民权主义分子的联合战线问题，大部分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关系问题。所以在组织上我们应当在国民党有势力的地方（例如广东）特别注意形成我们党的组织，才能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巩固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

（八）最近各工业区军阀及资本家反动高压政策，一方面是经济斗争发展的不可免的结果，别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群众没有充分参加革命运动；这种反动既来，我们便要在某几处地方转入秘密工作。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回到以前的状况，这只在各部分工人阶级及智识分子中进行秘密工作。

我们应当预备秘密机关，同时竭全力去做公开的政治运动。我们应当牢牢的记着，在秘密工作里是不成为群众的党的。

（九）在党的组织与工作正在发展的时候，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与扩大深入青年工农与学生群众，对于党群众化及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有极大的意义与帮助，因此扩大会认为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与巩固及团员的教育与训练，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作。

过去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尚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有几处地方任意调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重要责任的同志而未得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意，是妨碍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发展的一错误，以后各地应注意纠正这种缺点，尽可能的不调用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同志，并极力按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内关于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关系决议，而整顿各地党与团的关系。

宣传问题议决案

（一）现时革命高潮之中，我们党的职任是吸收工人及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群众，巩固并且发展我们党的势力于全国工人阶级之中，开始在乡村农民中工作，建筑党的农民群众的基础。

必须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对于这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

要实行这种重大的职任，我们的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

（二）我们的鼓动应当使群众了解，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才能有力。所以应当用极通俗的言语文字。

可是不但言语文字要接近群众，鼓动的内容也要接近群众。群众中的鼓动，第一是要具体，根据于工农群众眼前的事实。因此共产主义者便应当不但指导和训练群众，而且要能考察群众的言论，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口头上文字上的宣传表现他们的心理。

在群众中为党而宣传，最好是指出党的成绩，指示〔出〕党已经为工人阶级及农民争到具体的利益。这种成绩，应当是取得群众的出发点。

（三）群众鼓动的第一种形式——便是某种“宣传动员”，这便是说集中全国各阶级（首先当然是党员及工人阶级）的注意于某一事件或问题。这种宣传动员必须要征调全党的力量及一切势力。所以这种宣传最好要预先定详细的计划。这可不是说，全党及各级组织便可因此而减少临时适应的力量，尤其是不可以使各地同志不会及时响应一切重大的运动风潮。

（四）群众鼓动的第二种形式——便是工人俱乐部。我们的党没有发生以前，工人俱乐部早已有很大的作用。现在还是要发展这种工作，利用这种俱乐部一切好的习惯，加以相当的变更，以适应我们党的职任。俱乐部中办种种“壁报”图画等，很可以使工作有很好的成绩，有时可以成为我们的宣传很有力的工具。俱乐部不但是一种宣传的地方，并且应当是工人团体生活的革命中心。

（五）对于党内的鼓动也要特别注意。这种鼓动应当使全体党员，从下至上都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这种工作是现时根本工作之一。工人支部便是实行这种工作的基本。

党的支部是实行党的职任的机关，正合我们整个儿的党是实行工人阶级争斗的机关一样。所以支部的鼓动工作，一刻都不应当离开这支部的实际环境，各支部的鼓动应当取材于各该支部日常生活中为党及工人阶级奋斗的问题。

（六）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不可分的一部分，共产党对于全体工人阶级的区别仅仅在于党是最有阶级觉悟的一部分，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他是站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地

位，无论如何不退缩的。党员自己的阶级觉悟应当不断的增高，这是党的胜利的唯一保证。每一党员不但自己应当能为党的政策而奋斗，而且应当会引导别人去奋斗，发展党的势力到群众中去。

群众的宣传（对于全党加以更深入的训练）便是实行上述两种职任的工作。

我们党的群众宣传的组织，便是支部的小组及俱乐部的自修研究会。尤其是人数多的支部应当分成若干小组以便进行工作。支部小组的职任，在于工人同志对于自己所参加的日常斗争、对于种种琐碎的事实，都能明了，都能知道这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反映。

因此这类小组的宣传，应当与支部的工作有联络。在组织上应当竭力改良小组的形式，使化成为有计划的组织。尤其是应当注意过去的经验，除去许多弊病和缺点。

俱乐部中的"自修研究会"一定要吸收非党员进来。这种研究会的宣传，尤其要很有趣味的很切实的。俱乐部研究工作会的宣传工作，大致是共同读报，解释时局及阶级斗争的略史等。当然，这种宣传，应当注意工人政治知识的程度和他们自己的需要。宣传也和鼓动一样，应当使听讲的人容易了解，否则宣传的目的便达不到。

（七）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毕业期限至多不过一月或一个半月。（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知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毕业期限不要过三个月。

党校内的教育方法，应当根据国内革命运动的经验，说明共产党在许多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在党校听讲的同志，不应当与群众隔离，党校里的学生应当同时在校外工作，在同志或同志间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校的学生得着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

（八）发展我们党的机关报，使他们通俗化。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文字上的宣传和鼓励的根本职任。同时还要收集整理种种材料，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编辑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做解决民族革命及阶级斗争中种种问题的理论上根据。因此，必须在中央设立相当的机关，指导和计划收集材料的工作。

只有这样竭力去执行我们党的工作，方能保证这些职任能真正实行。

职工运动议决案

自"五卅"民族运动低落以来，军阀及资产阶级乘势向工人阶级进攻，如天津、唐山、安源、上海均正在严重的压迫中，即比较自由的河南，总不免要受影响；在广东比较更自由一点，然而罢工工人一回到香港，也必然遇着压迫。

在这时期是中国工人运动很重要的时期。或者消沉下去，或者更要高涨起来？这是要看我们党的努力及环境的变化。

在客观上，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在五卅运动的奋斗中得着一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并且已经比"五卅"以前有了更深的阶级觉悟及群众的组织和行动，又加上已经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开始接触，是不会因被压迫而消沉的了，军阀间的明争暗斗也决没有长久统一政权压迫工人的可能。因此，我们的努力，因为民族运动之低落更须加紧工人群众的组织与宣传，积累

更雄厚的力量，准备更剧烈的争斗。

在此时期中，我们的职工运动，应该取左列的方针：

一、在此时期中所首要努力的是工会之发展及巩固，并力争工会公开上自由。

二、在工人群众中指明每个阶级争斗都是政治争斗，必须政治争斗得到一步胜利才能保障经济争斗得到一步胜利。以前的“二七”运动及现在的“五卅”运动，都是显例。每个的政治问题及政治争斗发生，工人阶级不可取消极的旁观态度，我们应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以取得工人阶级的利益。

三、工人运动不能离开政治争斗——全国的政治争斗，更不能苟安于保守局部的胜利与安全，作和平的幻想，忽视了全国的政治趋势与阶级争斗。

四、经济争斗是工会的日常生活，今后不但不能忽略此项争斗，并要增加争斗之深入的程度，即在政治争斗中亦不可忘了经济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争斗的奋进，才能增长政治争斗的力量。

五、中国的政治自由必须经过长期的争斗，所以中国的工人组织，我们固然在每个运动中都首先要求公开的组织之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的秘密组织之准备，决不可因一时的得着公开之自由，便忽略了秘密的训练及秘密的组织（秘密机关及指导者与交通人员）。尤其是要防御工贼暴力捣毁工会及工人领袖之“工人自卫团”须努力秘密进行，永久的存在及发展，一直到自卫军之成立。

六、在工人群众中指出，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收买工头工贼组织工会，或向工人宣传工会及共产党不利于工人，这都比军阀压迫工人阶级还要利害。

七、我们的党和工会，现在虽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可能，却不能不努力经过工会中的党团及工厂中的支部，相机做党的宣传，使工会与党日渐有事实的接近。凡在比较自由的地方（如广东）我们的党部宜向工人群众公开和工会直接交换意见。每工会成立，党即须尽力活动，组织党团及支部，加以严密的组织与训练，使工会行动在党的指导之下。

八、依照我们的力量，在工人运动中，我们宜选择活动范围，特别注重交通工人，大产业的工厂工人，矿工及市政工人，使我们活动能够深入群众。

九、我们在工人运动中宜特别注意下层群众，努力执行第四次大会工厂小组的议决案。我们要的是能争斗的群众组织，不是空招牌的工会或总工会。须特别注意工会下层群众中的宣传和切实工作——须尽可能的召集工厂工人的全体大会，各地方的工会代表大会等，须注重引起群众的建议与自动的力量。

十、在工人有组织的地方，必须帮助农民运动及组织。

十一、每次经济罢工的要求须注意提出女工及童工的利益。

十二、在广州在香港均须注重工会统一的运动，而在广东则须排去反动的领袖，在香港则可与反动性稍次的领袖合作。援助国民政府的革命工作，省港必须一致，惟在各种争斗中，必须使工人群众认识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不同的主张。在中部仍须设法维持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作不断的政治争斗，以保持工会之事实的存在，但须防止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侵入工会，尤其在上海。在北方重要的工作是铁路与矿工。北方工人帮助国民军，只能以反奉及帝国主义的战争为限。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

(一)

中国国民党自改组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孙中山死后，党内所有官僚买办阶级的分子，正式另立组织，即是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北京的俱乐部以冯自由、彭养光为领袖，宗旨在和军阀政府谋妥协，在北京发展势力；上海的俱乐部以章太炎、唐绍仪为领袖，宗旨在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军阀势力，在西南发展。这两个俱乐部对于北方军阀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政府则是一致的。他们不但希图发展自派的军事势力，推翻广州政府，并且希图发展己派的党部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抗，尤其是辛亥俱乐部已成为南方反革命势力的中心。

(二)

中国最近四个月来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动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

--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戴季陶等）在国民党内，假借“真正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及共产党。这一派人形成国民党的右派，一天天的明显出来；虽然他们竭力自别于买办军阀派的国民党俱乐部及辛亥俱乐部等类的分子，然而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客观上便同样的是帮助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

(三)

可是最近革命运动的发展，不仅使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更加深入，并且使国民党得以扩大，尤其是在南方真能成为群众的国民革命的政党了——有几万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的新党员加入。

(四)

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他的左派，使他进行发展革命运动的工作；同时呢，努力反对右派的口号及策略。全党党员都应当知道，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

(五)

实行这种策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尤其在国民党势力的所在地。我们的党应当积极的跑到政治舞台上去，到处实行我们自己的思想斗争和策略——这是达到我们目的的第二个方法。具体说起来，应该：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

（二）工农群众之获得；

（三）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四）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的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的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争斗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

（六）

以前在我们的同志中，在国民党党员中，分析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把国民党的领袖们都列到中派，这不但在理论上不正确，而且在策略上也不适当。第一个缺点是我们的同志不知不觉的忽略了自己的地位，而完全成了一个左派的国民党党员；第二个缺点是使国民党内左倾的分子误以为左派即共产党派之别名，凡未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人都以中派自居，把一切国民党应有的左倾政策，都看做共产党的政策，而不肯赞同；第三个缺点是使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如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目反动派为右派而以中派自居。并且在事实上从前的所谓右派已公然反动，已公然离开国民党了。从前的所谓中派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可是所谓左派，单是一时的论调左倾是不够的，必须是在行动上不违背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实际的政治主张上，不但和反动派不同，并且确与右派不同，尤其是与共产派亲密结合这一点，是这一时期中国民党左派之特征。在我们的宣传中，国民党左右派及反动派各依他们的政治主张分别于左表：

左　派	右　派	反 动 派
1.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到底	反对一派帝国主义且因工农奋进而与帝国主义妥协	勾结帝国主义
2.为革命而赞助工农运动	主张劳资妥协	摧残工农运动
3.为民主政治而反对军阀	为保育政治而反对军阀	勾结军阀
4.联络苏俄与共产党	联络苏俄排斥共产党	反对苏俄与共产党
5.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保存反动势力抵抗左派	自身即是反动势力

蒙古问题议决案

中国边境农工群众中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

我们的党应当注意内蒙古的特别情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文化上民族上的问题，都有相互的关系。

那地[①]的蒙古农民，受蒙古王公的统治，喇嘛教的愚弄和中国商业资本的剥削；中国农民也受中蒙大地主的压迫，虽然这些民众政治上文化上都很落后，可是全国革命运动的发

① 原文如此。

展，必定要把蒙古民众卷入政治争斗。现在蒙古的农民已经有渐渐觉悟的趋势。那里的租税非常之重，还有收买田地的投机，无限制的苛捐，中国农民已经常常起来反抗当地的官僚。

蒙古人民之中也有了民族觉悟，起来争自己民族的权利。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应当知道蒙古的王公及喇嘛想利用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以扩大他们在蒙古民众中的势力。所以我们现时最重要的责任，便是使蒙古人中先进的民权主义分子，尤其是蒙古的智识阶级，归到革命这方面来。

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大地主、王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等，同时却不应当掩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农工兵大同盟，要能联合内蒙古中蒙农民的斗争。

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

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这是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职任，可是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是中蒙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

中局报告议决案

扩大会议听了中局报告以后，对于中局自第四次大会以来的工作有下列的批评：

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全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从国民会议、追悼中山、“五卅”运动、刘杨之役以至最近反奉的宣传，均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是这些运动实际指导的中心。在每个政治运动中，中局不曾失去事前指导的机会，尤其是关于“五卅”运动，能够有发动并扩大的决心与努力，我们的党已由小团体逐渐走到成为群众的大党，这是扩大会议认为最满意的。

在组织方面，自第四次大会直到现在，仍然比从前无甚进步；今后中央组织部应增加负责人员，不由总书记兼任，以免事忙忽略了指导的职任，尤其是地方负组织责任的同志，务须一刻不懈的注意各地方在组织上的特殊困难，报告中央，对于中央所指令的调查报告，应该尽可能的答复。

在宣传方面，中央机关报——《向导》，虽然能够继续出版及发展销路，但《新青年》月刊只出过一期，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报》完全未出版一次，扩大会议不能不对于中央加以严重的责备。（1）对地方指导缺乏；（2）以后各地应答复各种报告。

党员数量上的发展，虽然比第四次大会时增加了两倍（一〇〇〇——三〇〇〇），在寻常状态中，我们很可乐观，但经过“五卅”这种大的运动，尤其在上海与广州，只能增加如此的数量，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京区报告议决案

⑭

扩大会议听了京区报告以后，对于京区的工作应指示左列几个缺点：

在几乎没有工业的北京市，现在竟有了三十一个工人同志，这是第四次大会后京区唯一的成功。惟北京是中国智识阶级之大本营，在北京实际的政治运动，我们不能不看清智识分

子是目前的最大动力，北京方面未能得着相当数量的智识分子党员，乃是一个缺点；尤其是唐山乃是北方第一个大工业区，至今我们只有三十九个党员，这是应该立即救正的缺点。

此次天津唐山罢工之失败，当然原因甚为复杂，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党在唐山天津的工作从来太未曾努力，因此未能乘五卅运动之初起，发动罢工，而发动在全国运动低落之时，致为军阀所乘。党的指挥不得力也是一个原因。

京区同志中，对于工人阶级与国民军的关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假定国民军是比较开明的军队，对他存了过量的希望与幻想，甚至依赖国民军领袖是工人之保护者；这是应当痛改的，以后应当根据本党的政策，决定工人阶级对于国民军的态度，且从事实际工作。

北方工作日见重要，以前的京区委兼地委，多注意北京市的工作，不但不顾及东三省和山西，即对于近在北京的天津、唐山两地方，也未曾有充分的指导；扩大会议后，北京市地委应立即组织，不由区委兼任，以使区委能够注意全区的工作。

粤区报告议决案

扩大会议听了亦农同志报告粤区的工作情形以后，而有左列的批评：

粤区同志的在实际工作上，如政治如军事如工农运动，都十分努力，而且都有了相当的成绩。可是努力这些工作的，只是一些共产党员，而且是很努力的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这是因为在宣传上，尤其是在地方的政治问题的宣传上，未能使群众明了共产党的政策和广东民众的利益究竟是怎样；民众只看见有些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工作，并未曾看见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影响到广东政治是怎样。更因为在组织上，区委及各支部都仅仅是一个名义，并没有组织，所有工作的指导者，不是党部而是某几个党员；并且负责任的同志对于迅速发展党的组织未充分注意，以至共产党在各种群众中不能具体表现，民众眼中的共产党，仿佛是一些戴着国民党面具的幻影。今后粤区第一重要的职责是：努力发展党员的数量及严整党的组织；中央也应加派得力同志在粤区帮助党的工作，尤其是组织工作。

湘区报告议决案

扩大会议听了湘区报告，发现湘区工作在组织方面之优点，同时亦发见在政治方面之缺点，并且是很危险的。这缺点之严重的表现，即在各种运动及工作中都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因此湘区既未曾作过地方的政治争斗，即在全国性质的运动将要引起地方政治争斗之时，亦即规避不前。

在五卅运动中，湘区工作亦作得不充分，仅仅在此机会中做了一种政治的宣传，而未发动在我们影响之下的各种势力到争斗上来。

安源万余路矿工人，在我们领导之下做了三年经济的斗争，未曾做过政治的工作，即五卅运动亦未参加；又工会成立三年，虽时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迄未有秘密组织的准备，以致此次高压来，一败涂地。

湘区国民党在我们指导之下，既发展成为群众的组织，然而究竟是否真正的左派势力，据湘区代表报告，还是没有保证。即此一点，可见我们只知把国民党组织做静的发展而未充分做政治宣传与争斗的工作。

总之，湘区种种政治工作的缺点，都基于上述之根本错误的倾向。以后湘区必须改正这种倾向，才能使我们成功布尔什维克化的群众党。

对于农民运动，湘区应开始工作。发展国民党的工作，亦应继续前进，惟应改正上述之缺点。

河南报告议决案

（一）从过去的工作来看，我们是已达到相当的成功，我们在很短的几个月期[1]已经把我们的组织扩大了。在郑州我们同志的大多数是工人，在全省党员的统计上工人成分占百分之五十四，在一切重要的城镇我们都有一点基础，职工运动方面我们也把全河南主要的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了，全省总工会下面所包含的五万多工人通在我党指导之下，农民运动我们开始工作的地方已经有十县，我们不仅有了相当的经验，并已经有了十五个村农协会，包含四千以上的会员，在国民党中我们是占着大多数势力，全省学生联合会完全受我们党的指挥，我们的出版物也推销的很广，在军队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我们不仅在几个地方有俱乐部的组织并能影响于他的政策。

（二）但在过去的工作中也做了不少的错误和缺点。第一，我们同志的数量虽增加了约十倍，但内部教育训练的工作非常缺乏，支部及地委的组织均极涣散，没有秘密工作的基础，各地的工作都只有个人的活动，临时的应付，一切责任全集中央特派员一人身上，缺乏党的有组织的指导和全部有系统的计划。第二，作职工运动的同志多缺乏经验而且时间也很短，所以工会的组织发展虽很快，但只结合了上部首领，尚没有打入群众中去，没有真正把工会的基础弄好，在指导每次的斗争中发现不少的错误，特别是焦作中原公司矿工罢工和郑州豫丰纱厂工人罢工的教训应当深深记着的。第三，是在应用政策上有两个危险倾向：一是过于注重政治的势力，甚至发生信赖现实政治势力的危险，二是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常现左稚病，使小资产阶级不敢接近我们。第四，是我们工作的局面虽弄得非常浩大，但无论在任何方面无党的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运动……等均不能把内容充实起来，是极易动摇崩溃的。

（三）以后我们的工作应当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委，整理各级党部的组织，并定出系统的计划来代替个人的指导个人的活动，及知[2]临时应付的工作，并发[3]注意建立秘密工作的基础及改变从前在应用政策上所发现的危险倾向。

山东报告议决案

扩大会听了山东工作报告颇为满意。山东工作开始甚晚而压迫又来得太速。然在此短期之中，相当的发展了党的势力，领导了万余纱厂工人铁路工人做了英勇的经济争斗，同时又做了政治争斗。在这一点上，扩大会证明我们山东幼稚的党部颇合于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纵然在罢工策略上有种种幼稚的错误。

⑭

① 原文如此。

②③ 原文如此。

在奉系军阀严重的压迫之下，山东职工运动入于秘密工作时期。在此时期中应继续进行党和工会的秘密组织。

山东农民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严重压迫业已革命化，我们应当立刻开始在农民中做政治宣传和农会组织的工作。

青年运动和国民党的工作，亦应充分注意。

湖北报告议决案

扩大会议听了湖北代表报告以后，决议于下：

（一）湖北工农及学生群众，因直接受帝国主义军阀及资本家地主的严重压迫，均已相继起而团结奋斗，故湖北的革命环境，日益进展，湖北党部组织及宣传工作有努力及尽量发展之必要与可能。

（二）湖北党部的国民运动颇能努力进行，在国民党中完全占于主持的地位，领导群众的政治运动，均有相当的成绩，但因我们人力及宣传方法之欠缺，尚未能深入群众而尽充分的领导之责任。

（三）职工运动在严重压迫之下不能顺利的进行，宣传及组织工作颇形稚弱，与工人群众亦少接触。尤其不能利用罢工及政治运动的机会，努力于恢复工会及深入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的工作。

（四）农民运动颇能利用旱灾的机会尽力进行，惟因人力及经验缺乏之故，尚无良好的成绩。

（五）宣传工作在群众运动中尚能乘时努力，但缺乏有计划的进行，出版物的编辑无专人负责，不能按期发行，且未能尽合群众的需要。

（六）党的组织在此革命潮流高涨之时未能扩大，此是最大缺点，且组织散漫，缺欠严明的纪律及训练，故党的主义及政策不能使全体同志充分的了解和执行，在群众中活动没有很好的指导。只有少数负责的同志努力进行，大多数同志都未参加，此亦党的极大缺点。

（七）此后湖北党部应更有计划的努力于政治宣传工作，以巩固其领导群众的地位。职工运动应用各种方法，胜过困难，努力于秘密组织的工作，为恢复工会之准备。农民运动应趁此时机，按照地方情形，致力于农民自身利益的宣传和组织。党的组织和训练，尤应大加整顿和发展，每个同志都应担负实际工作与群众接触，使党的组织及宣传深入群众。为要达到上述的要求，中央对于湖北区应注意积极指导，并派得力同志前往负主持训练及发展组织之责。

救济问题议决案①

（一）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斩断了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日常生活，减低了工人的工资以至贫困不堪。所谓“最后的一次战事”为世界自由而战的战事，反倒是加添了许多锁链、许多穷乏与劳动阶级，于是劳动阶级就更不能不起〔来〕革命了。

① 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中关于这个文件有以下一段话：“（二）附录之《救济问题议决案》应改为提案，因此案未经大会讨论决议，故列入附录。”

（二）帝国主义的屠户吞噬了不少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结果是这些地方都起来做独立解放的运动。

（三）十月革命的结果摇动了有产阶级的老根基，创生了被压迫阶级全世界弱小民族争得独立自由的新生命。

（四）革命的爆弹毁灭了陈旧的制度。芬兰、立陶宛、匈牙利、巴发利亚都组织过了苏维埃共和国。

（五）因为得着美国的资助，欧洲的资产阶级得以重行恢复他们的一切状况，革命高潮因之低降了，但是无产阶级却创造了一个世界的党——共产国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革命就在一面大红旗之下进行。

（六）为我们最后的斗争而战，牺牲者不在少数。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到一九二五年一月，有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五万工农同志被害（德国二万，芬兰三万五千，罗马尼亚八千，意大利五千，匈牙利三万，布加利亚二万多，立陶宛等三小国二万五千，印度、埃及、苏丹、米索波达米亚、叙利亚、中国、日本更不知道死了多少）。

除此以外拘禁在牢狱中，数在十万以上，都是被磨折到九死一生。

（七）被拘的同志现在还是一天比一天加多，资本家同时假借司法的名义，滥捕一切而杀害之。

被囚的同志自然应该受精神与物质的帮助，而他们的家族也得抚恤才是。

（八）所以这种救助的工作是应该做的，因为若是不好好的保育落入敌人之手的最好的战士，革命是不能进行的。世界各地的革命本营都组织了专管救济的一部赤十字会的工作。不过革命党是战斗的机关，他们的全力都用到实际的争斗去了，他们不能专注意救济的工作，而且这种工作日趋复杂，也非得有专部管理不可。

（九）所以组织一个扩大而非党的群众会以专办此事实为急要之图。而且若是只以一国之力做这种事情，实在力量太弱，必得国际赤色革命后防组织，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十）这种组织一方可以免除革命党从事救济之烦，一方又能让它专从事于革命工作，以吸收新的工农同志。

（十一）世界革命的前锋——俄国工人同志，也是第一次组织救助会的分子。在一九二二年的十一月，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及前次被俄皇拘囚的党员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国际赤色救济会。

（十二）在一九二五年七月这种组织有三十二个支部，附属机关遍于全球，会员之数过五百万。

在一九二三年救济政治犯与他们的家属费了银元一十三万九千，在一九二四年美金六十一万元，在本年上季四十万美金，此外赤色救济会，还做了不少反对非人道的待遇及于政治犯，如在美国、立陶宛三个小国、布国、罗国等，又反对第二国际的交换政治犯的提议，并且注意各国对于政治犯的审判。

（十三）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大会与各次扩大会议，因见组织国际救济会之必要，特规定国际的每一支部要在各该国内设立一个。

（十四）中国革命争斗一天比一天显著，自“五卅”运动以来无数的牺牲者铺平革命的道路，所以组织这个会的需要非常迫切，绝对不能再延。

（十五）这种会的目的在救济为人民奋斗的死者、伤者、被囚者，给与他们以物质与精

神的援助，帮助为参加工农群众活动之故而被逮捕的人，帮助政治犯得早日释放，将国际间同志、劳动群众对被捕者的同情，散布于他们。这个会应合法的存在。

（十六）每个党的同志应注意这个会是赤色革命的后防而不是慈善的机关，应该个个人参加进行，这个会既是公开而又非党的，应该由党指挥之，至少要派一个同志去参加，并且办事要集中化——在执行部指导之下工作。

十四附注：本会应由个人加入组织之每人缴纳低额月费，会用自筹，有一定预算（非常用款除外），在会会员应由党加以政治教育。

关于安地事件的决议①

安源俱乐部之溃败其原约如左述：

甲、客观方面的：

一、日本资本势力之包围。日本帝国主义十年以来，政治的经济的双管齐下，以谋夺汉冶萍为己有。三公司产业不过七千万，而目前欠日债已过六千万，故三公司实际上已成了日本的产业，因为恐怕中国国民尤其是三公〔司〕底下的工人反对，所以不敢公然夺取过去。今年以来，日本一方表示不肯继续贷借，一方则替三公司筹划如何压服工人。压服工人的唯一手段即停工，此事在大冶汉阳均已次第办到。惟安源方面因工人组织较强，不取〔敢〕贸然执行，但实际无日不在处心积虑中。

二、矿局管理萍矿之糟。主持萍〔矿〕的人多为官僚，管理方面不刚止没有科学化，简直可以说没有人注意，工人即能努力生产，然管理方面漏失既多，结果仍只有赔本，工人跟着吃亏。

三、自俱乐部成立后，职员和工头剥削工人，吞款受贿种种舞弊情实都不能继续了，于是他们相率从各种方面怠工，使萍矿更趋于坏，同时他们把这些责任完全推到工人身上。

四、自“五卅”高潮被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压落以来，在全国范围的反动潮流之下，资本家利用机会，凭借武力压迫工人运动，乃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安源自无从逃避这一刀。

乙、主观方面的：

一、安源第一次罢工胜利后，工人运动走进了和平道路，只知发展教育，改良经济生活，而忘了政治争斗。“五卅”运动之突起与坚持，完全证明了工人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袖。而安源工人在此次运动中，则完全失掉了领袖地位。这种只注意和平的经济生活改良而不注重政治争斗的错误，本党应完全负其责任。

二、安源俱乐部的组织，自下自②上完全是公开的，不刚止组织公开，连负大小责任的人都是公开的，在反动政局之下，这完全是不适于争斗所需要的组织，所以一经压迫，全体负责人——俱乐部的大小柱子，尽行赶散，不能立足，而无法复举反攻。

三、安源地委的疏忽。当盛颐滞留汉上时，安地派景中同志来区请示办法，区即决定

---

① 这个文件没有发文机关，根据团湖南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安源事件之决议》：“大会完全同意于C.P.扩大会之决议，附印于后”以及安源大破坏的时间和文字语气，可能是这次扩大会之文件，故收录于此。

② 原文如此。

“在不破坏萍矿产业的原则之下，可不择手段的与敌人决斗”的政策交景中带回去。但一直到事变发生之日，安地并无具体的准备，事变发生时，负责任的人又一跑了事，以致毫无抵抗的全般溃散。安地负责同志对此实犯了异常严重的错误。

右面为在客观主观方面分析安地失败之原因。同时〔安〕变发生时，区的决定只注意党的善后与失业的救济，而未立即鼓动反攻，致群众的对象由矿局而移至我们（不向矿局作最后争斗，而希望我们救济）亦为失策。

中央所定反攻政策，区未能充分执行，确有事实上难于执行的困难，即右述的主观方面的二、三两个因[①]。然安变发生，区未能将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互相勾结的残暴情形公开于一般被压迫民众，取得广大的声援，亦为失策。

因静原同志的被害，区迅速决定一种政策，使安源、醴陵、株洲、长沙、衡阳能举行广大的市民示威运动，不独使安源事件借此能公开于一般民众之前，且为后来争斗在民众中挺立一种同情的基础。敌人方面须即更加压迫，然一方面知道工人实际未完全涣散而表示害怕。这足证明对于每一种压迫之事，我们应当尽可能使之变为一种公开的群众的争斗。

今后安源状况，事实上当然在一种继续不断的争斗中。区对于安源工作宜注意指导；具体的进行计划，由区委决定之。

告农民书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我们人民自古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士是专门读书的人，他们是以知识擅长，可以称他们是知识阶级。商人是拿本钱做买卖，可以称他们是资本阶级。农工都是以劳力谋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劳动阶级。

从前只有读书的士人有知识，所以做官治民的都是士人。商人有钱即便有势：有钱可以在政府买得官做；有钱可以在城市雇工人开工厂做厂主，做资本家；有钱可以在乡间买田地雇佃户做地东。士人做官发了财，也要到乡间买置田地做起地东来。最苦的只有劳动阶级的工人和农民。

世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切东西，那一样不是农民和工人劳力做出来的？然而工人农民自己的吃穿用却是很苦，完全为厂主地东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

工人农民在全国人数中，差不多要占十分之九，若说人民应该享幸福，便不该把工人农民除外。在实际上，全国享幸福的人，只有少数资本家和地东，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工农劳动阶级，不但为厂主地东做牛马，而且还要受其他各方面的压迫，几乎不能活命，还说什么享幸福！现在单就农民说，你们所受各方面的逼迫，待我们一一讲来。

第一个逼迫农民的自然是地东。地东召佃耕田，只是供给他若干亩田地或者有几间茅屋，此外一无所有，所有耕牛犁锄稻麦种子、肥料以及一切收获前所需食用，都须佃户自备，此外立约承租时，还要交地东若干银钱做羁庄。地东丝毫不费气力，到收获时，便向佃

① 原文如此。

户收取租课：无论是照约收取额租或是临时分租，每亩地东所得约占收成之半，即少也要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如湖北汉川县）还要预收来年的租。非遇到水旱奇灾，佃户没得吃，地东的租课是不能减少的。佃户因为无力缴租或是因为缴了租后吃用无着，便不得不向自己的地东或别人的地东重利借贷，冬春借谷一担，秋收时便须归还两担，最客气的也要一担半。农民一经这样的盘剥，便永世不能翻身。现在许多军阀官僚到乡间去买置田地，这些地东也和别的地东一样是不耕不种的寄生阶级，土地由他们更集中了，集中的结果农业上并不能改良进步，只是使农村中佃农贫农增加，农业反而退步。地东绅董们所把持的民团局或团防局更是欺压农民的乡村军阀政府。

第二个逼迫农民的要算外国资本家。自古道男耕女织，自从外国资本家把他们的洋货潮水般的输入中国以来，乡间手工的纺纱织布生意，都被外洋机器制造的棉纱棉布夺去了。据海关报告，洋纱洋布入口，每年价值二三万万元，就是每年中国种棉纺纱织布的农民工人之损失。此外洋油、洋火、洋钉、洋针、洋肥皂、洋头绳等都一一运到乡间，成了农民的日用品；就是农民日用所需的本国货，如油盐纸张茶叶酱醋等，也因为厘金等捐税增加及别的洋货输入的影响，价钱日见高涨，尤其是盐税归外国人管理，因为偿还洋债，他们拚命增加盐税，盐价日渐高涨，农民生活因此更加困苦不堪了。更可恶的是法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天主教，英国美国资本家派人到中国传耶稣教，这些教士在乡村庇护教民欺压良懦，真是无法无天！

第三个逼迫农民的就是军阀。军阀们连年战争，一方面以筹饷为名增加各项间接税如厘金盐税等，使一切物价无不高涨，又复巧立各种名目直接勒捐，加之预征钱粮，增加田亩捐，强迫公债，逼得农民非典田卖地卖儿卖女无从活命。一方面军队经过的地方，抢掳焚烧，更是悲惨，往往整个的农村，都被这般野蛮的军队毁灭了。即在不受兵祸的地方，军阀们只顾筹款增兵，民间的水利农田，从来不暇过问，因此水旱灾荒遍于全国，最厉害的象淮河和洪泽湖一带，历年淹没田地，总在一二万万亩以上，直隶山东沿黄河一带。历年淹没田地一万万亩。其余若天津的白河，湖北的襄河，湖南的洞庭湖，都久未疏浚，河身淤塞，泄水蓄水都不灵，屡成水旱奇灾。这些地方农民的困苦便可想而知了。

第四个逼迫农民的是贪官和劣绅。各县征收的钱粮，除国家正项之外，另收陋规至少也在正项一倍以上，譬如地丁银一两，至少须缴纳银元三元以上，此项陋规，国家丝毫得不着，乃用“盈余”的名义归县官房班以及征收人员私分了。此外催钱粮的差役下乡，还要另外需索。印契税照地价收百分之九，也只有三分归国家，县官得三分，房班衙役共得三分。农民欠了钱粮欠了租课，都要到官办罪。乡间的劣绅多半是地东，他们往往勾结贪官鱼肉农民，农民得罪了他们，他们就挑拨农民到官兴讼，于中取利，或者因欠税欠租，借官势威吓农民，甚至诬告农民抗粮抗租，禀请县官派兵究办闹出大乱子来。劣绅们不仅借官势威吓农民，并且还要摊派亩捐，办理什么民团局或团防局作威作福，直接的欺压农民。至于乡村自治机关和各县议会选举，更是劣绅包办的了。

农民受上述种种逼迫，不但生活艰难，有些并且不能在农村安居，只得弃农改业了。各地乡间充满了没田地耕种的农民和有田种而吃穿不够的农民，再加上水、旱、兵灾便不得不去当兵随匪替军阀匪首充当炮灰，能跑到城市里做苦力的还算得法。

农民做了耕种粮食这种重要的工，又占了国民大多数，现在如此困苦流离，这不但是农民自身的不幸，并且是国家的损失和危险。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

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不向地东缴纳租课，此外，废止盐税和厘金，关系农民生计也非常之大。可是要达到废止盐税、厘金和实行"耕地农有"这些目的，那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来〕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因为军阀政府是断不肯把盐税和厘金废止的：至于"耕地农有"，更须革命的工农等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东的田地，归耕地的农民所有。为农民目前自救计，本党主张全国农民应该有左列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

（二）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通选举法直接选举之，不得由绅士包办；

（三）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

（四）由各乡村自治机关动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利借贷局；

（五）各乡村须禁止私人积谷居奇；

（六）反抗各种苛捐杂税及预征钱粮，应征之钱粮，无论地丁或糟米，均只按照实际市价缴纳，不得征收陋规；

（七）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须专设治河局，政府预算均须指定治河专款不移作别用；

（八）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

这些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但是要想达到这些要求，非农民自己大家结起团体来出力奋斗不可。

怎样的结团体呢？就是组织农民协会。或者有人以为农民一向这样涣散，恐怕不容易结成团体。其实不然。我们根据广东的经验，农民的团体是可以组织成功的。自从民国十二年七月本党第三次大会后，本党才起首在广东帮助农民组织团体，经过不到二年，农民组成了协会的，有二十多县，各处协会会员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万人，并有几千的武装自卫军和地东开了好几次战，这二十几县的农民协会代表，于今年五一劳动节（每年五月一日是全世界的劳动节），在广东省城成立了广东全省农民协会。适逢这一天（五月一日）全国各工会代表也在广东省城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劳动大会的二百七十八个代表和广东全省农民协会一百二十五个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喊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大家都十分亲密。在这些集会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可以组织协会和工人可以组织工会没有两样。第二，我们可以看出农人和工人同属一劳力谋生的劳动阶级，实有联合互助的必要；并且工人大半集中在大都会，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处，都站在政治争斗之重要地位，尤其是五卅运动以来的上海广州工人，都有了二十万人以上的工会组织，他们不断的经济争斗及政治争斗，使中外资本家都心惊胆裂，这更可以看出农民有了城市工人做有力的领导者。第三，我们可以看出一向被厂主地东当做牛马的工人农民，一向被绅士们看不起的工人农民，现在都结成团体，便渐渐有抬头之一日了。

或者有人以为广东农民有国民党政府的帮助，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他省恐怕不行。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广东国民党政府固然肯帮助农民，而同时广东各地方的地东商团勾结国民党中右派（国民党中官僚分子）的军队和县官，破坏农会，摧残农民的事，也不在少数，有时国民政府也无如之何，还是要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奋斗才行。现在除广东之外，湖南湖北的农民，也渐渐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了。可见没有政府帮助，农民也能够团结起来。

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逼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各省各县现有的协会都是地东绅士们所组织的，他们的利益和

真正农民的利益相反，非种地的真正农民自己另组织农民协会，决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本党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不用说应该帮助你们，就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革命分子）也必须帮助你们，因为他们的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你们参加是不会成功的。

农民协会应该怎样组织呢？各地的农民协会章程，按照各地情形，自然会有些小小的不同，至于主要的办法应一致如左：

一、农会会员以年满十六岁之佃农、雇农、自耕农及农村中手工业者体力劳动者为限。凡不耕地之地东，重利放债者，不耕地之宗教家如神甫、牧师、僧、道、尼、巫等，均不得为会员。

二、凡会员须缴纳入会费与月费若干。

三、各省协会须分为四级：

（甲）村农民协会以一村或合数村组织之，会员人数须在二十以上，由会员互选三人组织村执行委员会；

（乙）乡或区农民协会以本乡或区内三个以上村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乡或区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乡或区执行委员会；

（丙）县农民协会以本县内三个以上乡或区农民协会联合组织之，由全县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县执行委员会；

（丁）省农民协会以本省内五个以上县农民协会联合会组织之，由全省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全省执行委员会。

四、各村协会所收之会员费，百分之六十用于本村协会，百分之四十用于高级各协会。

五、非协会会员不得加入农民自卫军。

六、每年由省执行委员会召集全省会员代表大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县及乡或区会员代表大会，均每半年由该县及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若干人。全村会员大会，每月由村执行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改选新执行委员。

七、村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三次，乡或区执行委员会、县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二次，省执行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

八、各级执行委员均互推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一人为常务委员，驻会办事。

九、各级执行委员均得指定会员若干人组织特殊团体，办理自卫军、消费合作社、教育会、水利局、害虫检查会等公益事业。

十、各级执行委员会均得聘请非农民为顾问及各项技术人员，助理各种事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对反奉战争宣言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全中国的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反奉战争已经开始了！此次战争现在虽只在江浙范围，马上会蔓延到全部直系军阀及北方国民军对奉联合作战。从表面看来，此次战争自然是军阀间的循环报复战争，和以前的直皖、直奉几次战争相类，然而实际上此次战争的原因与性质不是这样简单。去年的直奉战争，交战者虽只是直系与奉皖两派军阀，而人民间因贿选而反直的空气，实与直方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而且南方的十余万国民政府的军队固然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反对奉军，北方四十万国民军，也同情于民众的爱国运动而反对奉军，帮助奉军的只有安福系和国外的帝国主义者。反奉运动是全国民众的，直系不过是导火线，江浙开战，尤其是导火线之导火线，决不是此次战争之具体内容。所以直系动兵的旗帜上，不得不染点民族运动的色彩，不得不自认是全国反奉大潮中之一个波动；这就是此次战争和前几次纯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之要点。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之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的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的参加战争，不应该把此次反奉战争看做纯军阀战争而自己站在旁观的地位，妄想军阀间的和平，其结果反使此次战争真成为直系复仇战争，失了民众反奉的意义。更应该集合全国所有反奉的力量，在帝国主义者助奉或助直的政策尚未确定以前，在直奉的关系尚未有新的变化以前，肃清奉系军阀的势力，确定革命的民主政府之局面，勿使倒奉后又形成别派军阀代兴，军阀专政的局面又重复巩固起来。现在的奉系军阀不但代表中国军阀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此次反奉战争虽搀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全国的民众反奉战争之目的，乃是从释放爱国运动中的政治犯，启封爱国机关，解除奉系及安福系的武装，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一直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通告第六十号

——声援广州政府和纪念十月革命宣传要点[①]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各级同学们：

现有二事各地方应努力宣传。

（一）广州国民政府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广州政府和香港政府久有对抗之势，“五卅”大罢工以来，广州国民政府更成了南方抵御英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柱石；因此全国爱国分子都有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之必要。国民政府之肃清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军政财政，废除苛税杂捐，禁止鸦片、赌博，这些都于工农及商民大有利益。现在帝国主义者段政府陈炯明派国民党的反动派及新右派（戴季陶等）攻击国民政府的空气甚浓厚，我们应向学生商人做反驳的宣传并电段政府撤退援助陈炯明的军舰永绩海筹等；尤其是各地国民党各级党部应向全国通电宣传，并宜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以壮其胆，此电望即速发出。

（二）苏俄与中国民族运动。十月革命纪念日快到了，各地应尽可能的召集公开的群众集会，此日的宣传，应说明以下诸点：（1）十月革命后苏俄如何帮助了近东远东的民族运动；（2）苏俄如何帮助中国民族运动；（3）中国民众应该接受苏俄的帮助，不必避讳；（4）醒狮派等的国家主义，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来破坏被压迫的国家和苏俄间之反帝联合战线；（5）十月革命的成功实在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开始，所以中国现在是处于世界革命的环境中，中国的解放必得与世界革命相联络。

又，各地的宣传工作及宣传的效果如何，均应随时向中央报告。

钟英[②]白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钟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兵士、小商人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现在反奉运动已从奉系军阀内部爆发出来了。这种爆发，一面看出全国反奉的高潮已压得奉系军阀不得不分化而溃裂，使反奉运动格外易于成功；一面可以看出民众未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及国民军之犹豫，使反奉运动不流血的成功，其结果在此次反奉运动中，不但有直系军阀势力，并且有奉系军阀势力，这些军阀势力之存在及民众缺乏积极行动，愈足增加国民军犹豫与妥协的倾向，而酿成军阀势力重新结合，军阀专政重新巩固的局面。

去年直系军阀崩溃，中国政治本来有从军阀的过渡到民主的之机会，乃因人民努力之不充分，致使段奉两系结托，重新巩固之军阀专政的局面，继续对外卖国，对内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

现在奉系军阀又崩溃了，今后的政权归诸人民呢，还是仍旧落在重新结合的军阀之手，现在已经到了紧急的难关了。要打破此难关，只有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并且要力使国民军站在人民方面，才能够解除一切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剥夺人民自由的军阀武装，实现革命的民主政府。

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政权在军阀之手，对外永远不会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关税自主，对内永远不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因为军阀政治的本性，是必须结托外国帝国主义者而剥夺人民之自由的。只有政权在人民自己手里，才能保障人民自己的自由，才能建设平民政治，扫除军阀官僚政治的毒焰，才能继续五卅运动，解除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八十余年之压迫与剥削。

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其速起：

武装起来！

打倒卖国段政府及一切反动势力！

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通告第六十六号

——开展群众示威运动打倒段祺瑞反动政府[1]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各级同学们：

奉军内变，时局将急转，冯、郭态度关系北方政局甚大，而此辈新起的军阀，还不能不多少接受民众运动的影响，因此目下各地民众的示威运动非常重要。北京的民众示威各地即须响应，吾校各地分校接到本校及少校合发之告民众书，应即翻印广布；同时即应努力召集群众大会，做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并即发散各项文电：一、通电攻击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应即解散，主张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施行平民政治，保障人民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二、致电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质问彼等何故始终不对卖国的奉天军阀及安福政府表示反对，并质问彼等今后的政治主张，站在人民方面，抑站在军阀方面，详言之就是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政权归诸人民，还是仍旧撇开人民由各派军阀协定把持政权；三、致电郭松林〔龄〕一面称赞他推倒奉张即是推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外的势力，一面警告他今后务一反张作霖所为，勿做日本侵略东三省之傀儡，勿拥护亲日卖国的段政府，勿蹂躏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各地国民党部均须单独致电冯玉祥质问其政治主张并促其推倒段政府，完全解除奉张余孽李景林，张宗昌，邢士廉之武装。

此时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已和从前的右派相等了，他们在北京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共派，实际上是要推翻广州的国民政府，浙江省党部拥护北京开会电竟公然说："广州中央陷入左倾趋媚客卿，迫走干部同志。"北京民众正在奋起示威驱段时而邹鲁等右派领袖居然包围冯玉祥鹿钟麟乞其镇压民众运动。因此我们急须助左反右，各地急须发起三民主义学会，此项学会不但是左派的宣传机关，同时就是左派的组织。在左右派势力并存的地方，我们即据三民主义学会和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抗；在左派势力盛大的地方即应极力阻止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之侵入，并即须不犹豫的开除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表现右倾的分子。

钟英[2]白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钟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第六十七号

——发动各地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1]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各级同学们：

民校的新右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沈定一张继等）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谢持居正覃政〔振〕石青阳石瑛茅祖权等）在北京西山开会，其所议决之开除共派中央〔委〕及候补委员党籍及惩戒汪精卫二案，最为荒谬，望各地民校党部一致发电痛驳，其理由：（一）根据广州中央感电，西山会议当然根本无效；（二）除公然叛党外，中央委员会不能开除中央委员，因为中央委员是全国大会所举；（三）共派跨党，是第一次全国大会所许，孙总理所许，反动派冯自由，当时在大会会场曾有“奉旨跨党”之讥，此时开除共派党籍，是明白违背大会及孙总理；（四）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并未声明理由，停止汪精卫在政府机关服务，更是显然破坏国民政府，为被惩办的反动军阀杨希闵刘镇寰梁鸿楷熊克武等复仇。各地民校党部所有拥护广州中央及反对北京西山会议之文电均望设法寄一份至本校中局，寄一份至上海沈雁冰同学转交中国国民周刊发表。

钟英[2]白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钟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北京民众反段运动与国民党右派破坏阴谋

（北京通信十二月十日）

罗　敬

自从关税会议开幕日，北京民众示威在新华门与警察冲突之后，一般人民十分愤慨。至十一月十日遂由全国学生总会（正值开完大会之后），广州外交代表团等数团体发起一个“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即于是日举行一次示威运动，北京总工会亦于是日举行升旗礼。自是之后，“筹备会”屡次集议，决定以后进行方针，议决发出通电，主张全国革命民众要与革命的武力结合并致哀的美敦书于段祺瑞政府，令其即日下野出京……。

但加入此“筹备会”之国民党右派团体，见革命空气太浓于己不利，遂开始阴谋破坏，结果终于联合少数团体退出“筹备会”。退出之后不久，政局突生变化，郭松龄倒戈及曾毓隽被捕表示段张势力已如日西落了；于是右派团体遂突然改变其态度，复又加入“筹备会”，并且主张比左派更激烈，提议当晚即去焚毁朱深等家室并驱逐段祺瑞。大众当时只决定于二十八日举行示威运动。国民党之政治委员会亦于当日决定：（一）二十八日开群众大会，（二）迫段祺瑞辞职，（三）组织“国民行政委员会”。

二十八日下午一时，所有群众即齐集于神武门前。到者以学生工人为最多。北京总工会领导多数工人臂缠红布参加此会，当时有少数流氓打出“北京工界联合会”旗帜亦来参加，结果被群众扯毁旗帜驱逐而散。主席宣布开会后，群众即整齐队伍向执政府进行，当时执政府已停止办公，群众遂转赴段氏私宅。至时，有国民军驻守宅外不能进内，直等至日落后，遂由总指挥朱家骅等宣布将段交与鹿钟麟看守，候明日国民大会中宣布段之死刑，当时并于段宅前通过建国大纲及其他决议案。群众自此出发即齐奔章士钊宅大打，李思浩朱深梁鸿志曾毓隽等宅各光顾一次而散。（但各宅早知风远飏空无一物）。

二十八日的运动，民众原定计划并未能达到。其原因乃国民军于段氏保护周至出之于群众意料之外。国民军何以取这种态度呢？

我们知道有二个原因：第一，国民党右派的告密，当日早晨邹鲁林森等亲至鹿钟麟处造谣，说此次运动纯系共产党指挥，说共产党即刻要在北京成立工农政府，赤化中国；第二，国民军首领的犹豫，冯玉祥到那时尚没有决心驱除奉系军阀的傀儡——段政府。

国民党右派破坏此次运动的阴谋是很明显的。除他们的首领林森邹鲁等向鹿钟麟造谣告密之外，他们并且在运动中施行种种破坏手段。他们故意惹起国民军和群众的冲突，他们故意说这次运动是共产党包办的，他们故意出力打毁安福阁员住宅，而于次日勾通各报说是共产党的暴动行为。

北京民众既然有二十八日的教训，故到二十九日的大会时，都已认识驱逐段祺瑞组织国民行政委员会等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在这日的示威中，右派又雇佣许多流氓撕破北京总工会的旗帜。焚烧晨报馆时，左派群众并未参加完全是右派的把戏：他们当晚送登的新闻反诬是共产党所为。

总而言之，北京这次的反段示威中，革命的民众虽然未曾得着积极的胜利，但已知道一个教训，即自称为纯粹三民主义信徒的国民党右派有意的无意的已成了民众敌人的工具，破坏民众运动了。

（选自《向导》第140期，1925年12月10日出版）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

独　　秀

一个党内分左右派，往往是不可免的事。但是左右乃比较之词，并不是绝对的，所以一个党里如果有了更左的一派，则以前的左派会比较的成了右派；或者右派脱离出了，以前的左派中右倾分子；也会形成新的右派。

中国国民党早已有过左右派分化及分裂的历史，我们已常常说过自去年正月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党内阶级的分化，随着中国社会运动之阶级分化，日渐明显；中山先生死后，党内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正式另立组织：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前者投降段政府，谋在北方发展势力；后者结合唐继尧赵恒惕陈炯明等，谋在西南发展势力；这两个俱乐部对于段政府之态度虽不一致，而反对共产派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破坏广州国民政府，则是一致的。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因为一个党中的左右派，虽然有政策的左右倾及行动缓急之不同，而根本目的必然相同，譬如国民党，即令是右派，其根本目的亦不能离开国民革命，国民党以前的右派既然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来破坏国民政府，已明明不但离开而是背叛了国民革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国民党，还算得什么国民党右派呢？右派毕竟还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之国民党啊！

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经脱离了国民党，那国民党中有没有新的右派呢？有的。自五卅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最伟大的社会势力，同时也就加速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直接的反映到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他们便竭力的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在具体事实所表现的就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极力和反动的总商会结合起来，反对工人及学生，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国民党党员，勾结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党，并反对国民党左派，甚至于反对国民政府。一个党，总不免有比较右倾的一部分，只要他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可是现在国民革命的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这都凡是忠于中国革命的人都不得不向他们加以不客气的警告。这一新右派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他们虽然竭力自别于代表官僚买办的反动派即以前的右派，其实他们当中仍然包含着不少以前的右派分子，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然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如谢持居正周颂西孙镜亚）等。

季陶先生对我说：他们并不反对阶级争斗，只是在国民党的立场不便鼓吹阶级争斗；然而事实上近几天的民国日报上反对阶级争斗之论调都非常之高。

他们暂为顾全中山先生遗嘱计，尚未公然反对苏俄，然而他们在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

上，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以维持苏俄”；又说“扫除任何属性的帝国主义”，所谓任何属性，不用说所谓“赤色帝国主义”也包含在内。

他们反对共产党更不用说了。他们说共产党只要民族主义，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唾弃而且加以攻击；其实共产党不但努力民权运动（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之要求），并且他的民生运动（工农解放）比任何党派的政纲都彻底。他们说共产党是反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其实不幸此时各处国民革命的工作几乎是共产派在包办。他们说共产党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其实共产党有他自己的各种机关报各种印刷品，宣传他们的主义与政策，从来不曾借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而且在事实上又何能够在国民党机关宣传共产主义？中山先生季陶先生都曾经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都不曾作此惊人之谈！他们口里虽说不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其实他们公然著书通电（例如最近广东孙文主义学会的通电及孙镜亚告国民党同志书等），捏造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无稽之谈，诬蔑得共产党人简直阴贼险狠不成人境；最近为广大问题，不但说共产党早已开除的陈公博是共产党人，并且硬指顾梦渔先生也是共产党人，借以证明共产党夺取广大的阴谋。他们口中虽说承认共产党和他们是政见略有不同的党（孙镜亚都说是：“貌为同舟，实类敌国”呵！），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其实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无论民族运动民权运动民生运动，他们都表示不和共产党合作，并且他们自己也不独作，他们虽然宣言反段，然而在上海的反段市民大会，他们竟不肯参加，在北京的反段国民大会，他们虽然参加了，而他们的首领邹鲁，都硬逼鹿锺麟下令压迫国民大会，说这次国民大会是赤化运动。

自讨伐杨刘以来，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借罗致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仿佛汪精卫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见他们致各级党部电，十二月八日上海民国日报论文，孙镜亚致汪精卫书等）。他们不但这样攻击汪精卫，并且在西山开会议决开除汪精卫党籍，不许他任国民政府职务；他们这样的举动，简直是有意动摇国民政府，为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魏邦平张国桢熊克武等复仇。邹鲁等在西山开会，表面上虽然是反对共产派，实际上另有破坏国民政府的阴谋，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

他们说共产党惯以反革命反动等罪名加诸异己者，可是按照上述的事实，他们应自问和冯自由邓家彦马素相去几何？即客气一百二十分，也不能不说是反动的倾向罢！

他们这反动倾向的根本，是不识中国的国民革命乃整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他们口中虽然不赞成国家主义，其实他们的根本思想和国家主义者一样，同是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因此，他们遂至对外反对苏俄，对内反对阶级争斗反对主张阶级争斗的共产党；因为左派联合苏俄及共产党，他们遂至反对左派；因为国民政府中最主要的分子是左派，他们遂致反对国民政府，他们的反对倾向就是这样相因而至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至于反动派，则在于联合战线外了，因为他们已经背叛了国民革命，站在敌人那边了。此时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也非常严重，这倾向若继续发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毕竟是一家眷属，则所谓“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

（选自《向导》第139期，1925年12月20日出版）

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

——十月北京扩大执委会决议案若干解释[①]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各级同学们：

十月在京之扩大会议各种议决案都非常重要，当时到会各代表均经携回油印的议决案，谅向同学们详细报告过了，迄今将及三个月，各项议决案已如何执行，望各地负责同学早日寄详细报告来此。现在议决案业已印好寄去，望各地编定号码分发各支部给同学们阅看，看后仍须缴回支部书记慎密收存，有特殊情形时，还须缴回地委收存，绝对不可疏忽落于校外人之手！

此次扩大会议各项议决之总的重要点有二：当此中国革命时期，一，应尽量扩大本校组织，使之群众化；一，应尽量扩充本校的政治宣传深入群众，使本校成为事实上公开的校；此二点望同学十分注意！

决议案中有印刷错误应改正者：（一）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二）附录之救济问题议决案应改为提案，因此案未经大会讨论决议故列入附录。

决议案有应解释者：（一）四二页（三）条，不担任民校的工作，此民校的工作系指党部的工作，非泛指工农运动等工作；（二）民党左右派的分析，系依据现状约略言之，且时有变化，不是死板的，各地此项宣传，应随时参考向报所述。

决议案中有各地即须执行者：（一）各地书记尽可能的不兼部务；（二）取消工农部，改组职工运动委员会及农民运动委员会，以与中局一致；（三）入校手续及候补期，即须实行改正，以除去组织发展之障碍；（四）职工运动议决案第九条所说"须尽可能的招集工厂工人的全体大会，各地方的工会代表会议等，须注重引起群众的建议与自动的力量"此事急须实行，因为若只注意参加大的民众示威及工厂小组，则没有了群众的工会，民众运动成了无组织的，所谓总工会、工团联合会，都成了空招牌；（五）各处罢工时，务提出女工及童工的利益；（六）关于宣传的决议案，工人俱乐部，普通及高级党校，照我们现在的力量都可办到，务要实行；其办法及教材，可直向中局宣传部商定。此次扩大会议全部议决案如何执行，望各地早日详报，万勿延忽！

钟英[②]白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钟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

——目前政局的分析与对策①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各级同学们：

最近北京的政局，已经显然表现出军阀统治的崩败：冯玉祥下野，段祺瑞不日要下台，奉张自郭松龄倒戈之后，军事力量上也受了巨大的打击，孙传芳、吴佩孚更没能力独自攫取政权，——于是北京方面的政治便显然现出极动摇的状况。这是“五卅”以来民众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结果。可是，人民方面如果没有继续的积极的有力运动，迅速的从军阀手中征〔争〕取政权，那就奉张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而扑灭了郭松龄、吴佩孚公然表示停止反奉，国民军受了这种奉直联合的恐吓而散乱自己的势力（冯玉祥下野，第二军内的直系分子抬头）——帝国主义者便不难帮助反动的奉直军联合而恢复军阀统治的新反动政局。

我们职任，应当赶紧联合国民党，学生、工人、小资产阶级等革命群众，督促右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商会等人民团体，起来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出兵，反对“五卅”重查结果的总运动里，引导他们进一步而力争国民会议预备会的召集；主张由广州国民政府联合国民军，人民团体代表及一切反奉势力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立刻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我们应当指出现在广州国民政府对外的省港罢工交涉，能有胜利的形势，正因为这一政府受农工商兵等一般民众的赞助，人民有结社集会罢工言论的自由，所以关税自主，“五卅”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中国解放运动中的问题，只有象广州一样的中央国民政府才能解决。再则我们应当指出，广州政府之下如今军政统一，财政统一，已经扫除一切反动军阀，苛捐杂税烟赌拉夫等的压迫政策和腐败现象完全消灭；亦是因为有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及一般民众实力的赞助，所以北部军阀统治的根本铲除和人民权利的保障，也只建立象广州一样的中央国民政府。这种宣传和运动是现在使民众革命化的必要方策。

我们宣传的口号是：1.国民军应与人民联合继续反对奉系军阀及一切卖国军阀；2.冯玉祥不应取消国民军名义，尤其不应取消极的态度；3.反对奉直反国民军之联合；4.反对护宪和法统；5.广州国民政府应与国民军及其他反奉势力，以及全国人民团体代表（商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工会等）共同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6.保障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罢工之绝对自由；7.释放一切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政治犯（山东，江西，湖南……），启封一切爱国团体，尤其是上海总工会。

我们运动的方式：1.各地各种团体应根据上述口号分别电致冯玉祥，国民军，广州国民政府及全国各团体；2.各地应由国民党（左派党部），学生会，工会等发起召集各团体联席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会议讨论这些时局问题，反对"五卅"重查结果和日本出兵；3.在民众之中，根据上述的口号及主张做极广泛的宣传。

钟英[①]白

① 钟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

——目前政局的分析与对策的补充①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各级同学们：

对于此次政局的分析与应付，在前第七十一号通告中已说过，兹更补说于下：

（一）目前政局是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影响直系有渐趋于日奉直联合之势。故最要紧的是人民和进步武力的联合战线。此时直奉妥协虽在进行，然尚未成功：国民一、二、三军表面上似不和，然实际上尚甚合作，均此时须极力鼓吹人民、国民军、国民政府一致反奉的联合战线。

（二）我们在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的实际进行上，我们应恢复去年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或重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或恢复或重织〔组〕须按各地情形便利为准），但无论恢复或重组，我们务须极力扩大其范围，务须与各种社会阶级的派别合作，极力免除不必要的分裂现象。

（三）在现时政治情形之下，对于实际能否解决政局，我们不必存过分的希望。我们的根本责任是在乘此机会宣传民众与组织民众，在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势力，扩大革命的势力。

钟英②白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钟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第七十四号

——反对日本和张作霖借中东路问题发动反苏运动[①]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各级同学们：

中东路事件本系发生于细故（路局要求张作霖运兵须履行军队免费的手续），现在张作霖正小题大做，一味强硬，始而以武力占领客车，既而逮捕站长，今则已逮捕中东路局长伊万洛夫下狱，甚至围困哈尔滨苏俄使馆，这还全是一种宣传的态度，总之这是目前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这还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一）日本帝国主义见近来中国民众反日空气大高，便想借此转移中国人之视线于苏俄。(二)日本帝国主义想借此展长其退兵时期。（三）想借此在国际间造成反苏俄的新进攻形势。同时奉张又素恨苏俄，此时也想逞一点对外的强硬态度，以博得一般苏俄的反动派之同情，以和缓反奉的空气。并且日本帝国主义看到苏俄此时不利于取强硬态度，即苏俄不能用武力抵抗，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便唆使奉张如此的强硬。日本帝国主义此种阴谋非常刻毒，尤其易引起反动派对于反苏俄的宣传与结合，而放松了目前最要紧的反日与反奉运动。所以我们现在须：（一）极力向群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与奉张之阴谋。（二）防止反动派的宣传，尤其须防止他们的种种示威行动。（三）在积极方面进行反日与反奉的宣传和行动。如万一不能阻止反动派召集反苏俄的会议时，我们便须在该会议上向群众提出反日与反奉的口号，极力提高反日奉的空气。

钟英[②]白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钟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国共产党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

（一九二五年二月）

工人们！

农人们！

一切被压迫劳苦的群众们！

现在陈贼炯明又厉兵秣马向广州革命政府进攻了。这是怎样一回事呢？第一，陈炯明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段祺瑞的走狗，段祺瑞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欲乘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北京病笃的危机，根本剿灭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所以又资助这个无耻的叛徒向广州进攻！第二，陈炯明是买办阶级和大地主的代理人，大地主见着近来佃农势力之发展，农民协会运动之扩张，早已坐卧不安企图反动，买办阶级自商团失败之后，更日夜筹划如何报复及如何一网打尽工农群众之毒举，所以他们乘孙中山病危的机会又协助这个无耻的叛徒向广州撕杀。

广州政府的本身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尤其在军事行动时期不能充分保护工农的利益，然而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领域不仅是中国革命运动之源泉，而且是工农群众比较能自由发展的唯一场所。我们工农是最革命的柱石，所以能始终为革命而牺牲的只有我们工农，能始终保卫革命的也只有我们工农。现在保卫这个革命老巢的责任又重新临到我们双肩之上，中国共产党特号召全国特别是全广东的工农群众来担负并完成这个伟大的责任。

工人们！农人们！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们！你们试回想东江农民及农会怎样遭陈炯明等军阀的蹂躏与压迫，你们试回想沙面注册事件是何等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侮辱，你们试回想买办阶级与商团对于工农是如何的惨杀欺压，你们试回想上月广宁各地的大地主是何等的横暴反动！有了他们便没有你们，有了你们便没有他们！他们在广东的总代理人便是陈炯明这个叛贼；他们目前剿灭革命、剿灭你们的毒计便是协助陈炯明向广州反攻。起来！你们立刻起来要求革命政府颁发全般武装，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及其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北方军阀、买办阶级及大地主呀！

⑮

东　征　纪　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春　涛

一　东征军出发

自香港沙面大罢工后，英国帝国主义乃勾结反革命派，暗杀廖仲恺，欲一举消灭广州政府以压服罢工。国民政府识其毒计，乃以迅速手段，肃清潜伏内部之反革命派，如魏邦平、梁鸿楷、郑润琦、莫雄、梁士锋、张国贞等。英国帝国主义知此计不行，乃更指挥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为东南北三路夹击之计。陈炯明、林虎、洪兆麟、刘志陆等乃大举侵入东江，熊克武压迫北江，邓本殷侵入南路。于是国民政府乃有向三路作战之举，现在先叙东江之战。

九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蒋中正为东征军总指挥。九月三十日，蒋总指挥通电就职。此时陈炯明军队，已进至海陆丰，海陆丰原有驻军及农民自卫军，以我方大军未集，乃回省城撤退。十月四日，政府复发觉熊克武勾通陈逆阴谋，将熊克武拘押黄埔。十月五日，东征军遂出发，国民政府发布告东征军将士文：

同志们！今年二三月间，你们很勇敢地把反革命的军阀陈炯明、林虎等打败了，现国民政府又要国民革命军到东江去打这个同一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次的东江战争，必是最后的一次；必须把敌人完全扑灭，然后不至于死灰复燃。国民革命军一定要尽这个责任，我国人民对于你们这种工作，一定是永远感激的。同志们！陈炯明现在住在香港，其余卖国卖人民的人们也在那里。这些胆小鬼，他们今年二三月间，看见你们的勇猛进攻而逃遁，现在又从他们藏匿的地方返到香港；但是就是在香港，他们也怕在街上抛头露面。因为怕热诚与爱国的同胞与他们为难，所以，这些卖国贼用帝国主义的警察来保护他们。这些帝国主义的警察，在上海、汉口、广州及其他中国城市屠杀中国的人民。同志们！陈炯明以前欺卖我们伟大的首领与导师孙中山先生，甚至于企图暗杀他；现在陈炯明已成为全国的罪人，他日益堕落，甚至跪在帝国主义者之前，乞求我国的敌人，给与金钱，以攻打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对他说，如果他前进攻打国民政府，他们就给钱与他。于是他就收拾去年被你们赶走的余孽，重新进攻无武装的和平的城市。同志们！陈炯明知道他不能在战场上打败你们的，他知道他的军队，是一群无组织无训练的军备缺乏而且饥饿的土匪，他知道他们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对手，他虽然知道这一切，但是他仍旧集合这群土匪来打仗。为什么他这样办呢？简单的理由，就是他须这样才可得中国敌人的金钱，一方面他的土匪军队，可以有几天劫掠我们穷苦的人民。同志们！你们所攻打的，并非军队；你们所攻打的，是一群卖国贼及土匪。所以你们的责任，是扑灭这些卖国贼及土匪，当他们是路上的盗贼一样的，因为他们抢掠穷苦无知的人民。同志们！把你们的枪与刺刀，使敌人知道国民革命军是不可小视的。因为国民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你们保护国民，而反对卖国贼及土匪，你们对人民是朋友，但是对仇敌不应姑

息。你们永远不会有打败的时候，你们只有胜利！战地的人民，正等你们救他们于敌人的压迫与蹂躏之下；在你们后面的人民，完全赞助你们，只愿意听见你们战地的消息，这便是胜利。同志们！自从国民革命军成立以来，并没有打过败仗，人民大家尊敬你们，因为你们救他们于抢掠的卖国的军阀压迫之下。同志们！国民政府确信国民革命军将给敌军以致命的打击了。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常务委员汪兆铭，谭延闿，古应芬。

东征军出发，因为不拉伕，广州市上，市民若不是看见总指挥、党代表的布告，简直不知道有此一回事。下面是十月五日广州市上市民聚观的布告：

照得军人天职，本是为民护国。不料陈刘诸逆，甘为祸国蟊贼。财政专事搜刮，小民脂膏尽绝。勒索数逾千万，用途全不明白。肆意戕害良民，信任无非奸慝。种种专横残暴，罪状难尽胪列。各军奉命东征，誓将余孽讨灭。幸毋自相惊扰，四民安居乐业。倘敢造谣生事，立按军法处决。合行布告周知，其各凛遵切切。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五日，总指挥蒋中正，党代表汪兆铭。又有安民布告张贴于军行所至之地：

陈贼炯明，丧心病狂。阴结英番，甘作虎伥。卖国殃民，逆迹昭彰。凡我国民，挞伐宜张。本军奉命，东征逆党。救我民众，卫尔梓桑。民族民权，民生主张。国民革命，农工学商。军行所至，纪律堂皇。劝我父老，切勿惊慌。总指挥蒋中正，党代表汪兆铭。

广东省政府亦发表了一篇宣言：

政府此次出兵东征，其第一义即为统一广东，完成人民日夕要求的廉洁政府；其第二义即扫除陈逆炯明，间接以推翻帝国主义，完成孙大元帅为求国家独立平等之遗言。陈逆炯明自乱粤以来，无日不奔走军阀，祸我粤民，亦无日不勾结帝国主义以谋颠覆国民革命：初则谄事曹吴，继则勾串安福，至于今日，更忘其廉耻，弃其人格，公然受帝国主义者之资助，而向其生斯长斯之广东反攻。以革命政府为保障人民之利益，与军阀官僚之权利不相容，则谋颠覆之。以汕头断绝香港运输，予帝国主义者以不利，则占据之。以罢工工人在汕实行经济绝交，足以制帝国主义者之死命，则解散之。以农民为中国革命之主力，有害于彼之反革命，则屠杀之。揣陈林洪叶诸逆之心，非吾粤完全受治于帝国主义之下不止，非国民革命根本覆败不止；此种丧心病狂之行动，尚得谓人？本政府为保持全民幸福，为实行国民革命，为天地留正气，为人群除妖孽，用是出师挞伐，张我戈矛，务于最短时期，殄灭残寇，以广东还诸人民，以全省置于民治，必使政无贪黩，野无萑苻，商民有振兴生产之机，农工得生活安全之所，一切苛捐杂税，必扫除之，一切贪官污吏，必歼灭之。用以宣言，以告全粤有众。古应芬、宋子文、许崇清、孙科、陈公博。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再看革命军告东江各界人民书：

各界人民诸君！我们常常听得：自从我们离开你们之后，你们在陈炯明压迫之下，无论是工农商学，都受尽摧残与剥削，言论不得自由，集会不得自由，结社不得自由，甚至组织救国救民的国民党部，都遭压迫；繁重不堪的苛捐杂税，向你们剥削，即你们的血汗榨干，都不顾恤。为此，我们义愤填膺，盼国民政府快下命令，让我们痛快来驱除这恶魔陈炯明。现在我们受命东征，得偿宿愿，何等畅快啊！各界人民诸君！你们一定能够认得国民革命军是与军阀的贼军不同的。国民革命军，是保护人民的。倘若你们要解除一切痛苦，非一心一德与国民革命军合作不可。要知国民革命军，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为自己的利益，非拥护他不可。人民要是拥护国民革命军，他的确有力量，能除人民的一切痛苦。请看今年二三月间，东江的战争，革命军得了民众的拥护，所以战无不克，敌无不催，就知道了。各界

人民诸君：你们要言论、聚会、结社都自由，苛税杂捐一切免除，非一心一德与国民革命军合作不可！你们要认得国民革命军，乃真正是你们自己的军队；你们有了他，你们才能脱离了反革命派陈炯明、林虎、洪兆麟、刘志陆等等的重重压迫和重重剥夺！国民革命军印。

再看告农民书：

我们最亲爱的东江农友们！我们今年春天，恰恰赶走了陈林军阀，正在谋真能解除你们痛苦的方法的时候，刘杨诸逆，便在我们后方造反，我们要想永久的作你们的保障者，只有暂时别离了你们，回军来巩固革命政府。因为没有革命政府，便没有革命军，便不能保障你们的利益。现在刘杨诸逆及广州一切反革命派，都次第削平了，我们深念着刘志陆辈在五华一带，是如何的摧残；李易标等在海陆丰一带，是如何剥削你们；及一般反革命者，如何勾结帝国主义者压迫你们；并念着你们在现在还没有绝大的组织和武装，去直接抵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不辞劳苦，来替你们作先锋打不平，要把你们从水深火热中再救出来，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我们仍旧守着今春我们原有的精神和纪律，专为着你们的利益而奋斗。农友们！我们最亲爱的东江农友，你们是世界上被压迫阶级里最大多数，同时你们也是世界上最需要革命的一个阶级，你们应该趁着这个时机，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结成工农兵的联合战线，然后才可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才可以打倒一切特权阶级。所以现在你们，一方面应自己组织武装，预备作我们的后援，一方面应该各尽所能的帮助我们。你们熟悉路径的，便应该作我们的向导；熟悉地形的，便应该替我们侦察；能知道敌情的，便应该作我们的间谍；精力强壮的，便应该助我们的输送！这都是为着你们自己的解放而工作的工作，这样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工农兵大联合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东江农民解放万岁！革命军胜利万岁！国民革命军印。

这回东征军的组织，系分中左右三个纵队。中路纵队（第一纵队）由博罗、惠州前进，纵队长何应钦，所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何应钦全师，第一军第二师王懋功部一团，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部全师，第一独立师吴铁城部全师，兵力约一万五千左右。右翼纵队（第二纵队）由平山、淡水向海陆丰前进，纵队长李济深，所部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计第十一师陈济棠全师，第一独立旅张发奎全旅，另有三个支队，计第一支部张和，第二支队余鹰扬，第三支队冯铁裴并归其统率，兵力约一万人。左翼纵队（第三纵队）由龙门、河源前进，纵队长程潜，所部为攻鄂军四团，豫军一团，赣军一团，湘军小部，兵力约六千，其计兵力在三万以上。所用夫役，均系雇请，所到不取民间一钱，实行“不拉夫”、“不筹饷”两个口号。

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其工作依照下列之战时政治宣传大纲：

甲、宣传队的组织

（一）本队于总队下，分三大支队，每支队下又分三分队，尚设一独立分队，直属于总队。各分队下，皆分为四小组。（二）每小组有组长一人，组员二人。分队设队长一人并兼为一小组组长。支队设队长一人，干事一人，宣传品管理员一人，队员四人。总队设总队长一人，副总队长一人，管理员二人，干事二人，书记一人，队员十二人。全部人员，共为一百

六十三人。（三）小组长受分队长指挥，与组员协同工作，负传达命令、监督组员工作之责。分队长受支队长指挥，其职责与小组长同。支队长当根据总队长命令，计划本支队一切工作，并于紧急时，自行处决一切事变，但事后必须呈报总队长核准。副队长辅助队长工作，遇必要时，将代行其职权。干事管理给养、财务、杂务及兵夫。队员四人，受队长指挥，分掌各项技术工作。总队长负计划并监督本队全部工作之责。副队长助理之，并得代行其职权。管理员二人，负责宣传品之收发，运输登记，及备办宣传应用物件。干事二人，经理给养、财务并管理勤务兵夫等一切杂务。书记一人，司文件收发，记录总队日记，收集报告。队员十二，则司理各项技术工作。（四）组长指挥并协同组员讲演，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及一切宣传工作。（五）总队长在可能场合，须召集支队长、分队长、小组长开联席会议。各支队长各分队长，在驻军四十八小时以上，亦须召集支队全体宣传员会议，讨论宣传工作之进行。（六）各支队每周向队长报告一次。各分队每周向支队报告二次。各小组每周向该支队报告三次。（七）本队组织，根据民主集中原则，下级机关，须绝对服从上级机关。

乙、宣传队的工作

本队工作范围，分三方面：（子）对本军的宣传工作。（丑）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寅）对民众的宣传工作。

（子）对本军宣传工作：（一）解释本军此次作战之意义，（肃清反革命，巩固革命政府，发展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作战，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二）解释本军实力之准备程度，以固军心（如说明粮饷之供给，子弹之补充，野战医院之设备，及民众之同情等实在情形，使兵士无顾忧），并酌量情形，指示我军应注意之点，使官兵不敢发生骄傲心理。（三）说明其弱点，敌军实力之比较。使兵士了解敌情，增高自信力。（四）激励兵士感情，鼓励兵士勇气。（五）引导兵士与民众发生密切之关系。（六）殷勤慰劳伤兵。（七）于行军宿营时，尽可能限度组织各种娱乐，如此不仅能使兵士忘却作战痛苦，并足以使敌军闻风羡慕，踊跃来降，更足使兵士与民众易于接近。

（丑）对敌军宣传工作：（一）宣传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分别，指示其出路。（二）宣传敌军官长与帝国主义勾结情形，鼓动其兵士的民族思想，使其趋向革命。（三）宣传敌军兵士被压迫苦况，及革命军人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快乐状况。宣传敌军俘虏，并殷勤安慰之，优待之。

（寅）对民众宣传工作：（一）解释此次出师的意义。（二）解释国民革命军的纪律是如何严明，及其所代表者是工农群众之利益。（三）宣传工农民众之痛苦，及其来源。（四）宣传反革命残杀人民，为害地方种种事实。（五）随处扶助并发展农工之组织，并尽力为之解决一切痛苦问题。（六）随处散发宣传印刷品（当以书报及画片为主，浅显传单为副），教导民众唱革命歌，呼叫革命口号。（七）尽可能限度召集军民联欢会，于会中极力优待民众，多设娱乐。（八）解说国民政府成立后，拥护人民利益之事实（废除苛捐杂税，严禁烟赌，扫除反革命军队）。

丙、宣传员应特别注意之点

（一）于行军休息时及宿营时，应不断利用时间，向兵士及民众作宣传工作。（二）当十分注意纠正兵士越轨行动，及一切足以引起民众反感的无意识的举动（如不要兵士任意毁坏民房家具及陈列品，甚至于窗纸亦须善为保存，方不致引起民众反感）。要善于以身作

则，诚恳指导，切莫因此反引起兵士的反感。（三）于饷械缺乏时，应多方设法，安慰军心（当善于顾着群众心理，以热烈的情感，鼓励其精神，引其入充满希望与快乐之途径，而忘却当前之痛苦与危险，切忌于兵士前表现惊恐焦急或恼怒之颜色），同时设法急向后方交涉，谋实际的补救方法。（四）当战败或军心摇动时，应力持镇静，对兵士晓以利害，鼓其勇气，身先士卒，须同时以挽危局，而谋补救。

丁、宣传队技术上应筹备之事项

（一）须于沿途的车站码头，及城乡各处公共场所，多贴标语及图画，或更佐以五彩纸扎，以便沿途引起兵士和民众的注意，使之感觉无限的快慰。（二）筹备宿营地时，当于通衢小巷、厕所、寝室、食堂等处，多贴向兵士宣传的标语和图画，使兵士触目惊心，常常记起自己的使命。（三）多备精美照片（孙中山、列宁、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的）及画片（须五彩革命寓意画），沿途分给人民，作宣传的媒介。（四）应随队携带军乐队、留声机等，于行军休息时、宿营时及演讲前后演奏。（五）应就各师各团兵士中，选出有游艺技术，或精习拳术的分子，列出名单，以便随时按名指派于军民联欢会中表演。（六）应携带照相机，沿途拍照战时情形，及兵民紧欢等照片，并赶快冲洗，沿途陈列于军民联欢会中，或以之赠送各界代表。

戊、宣传的口号

（一）肃清东江。（二）统一广东。（三）打倒香港政府的工具陈炯明、洪兆麟、林虎。（四）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五）为保护东江人民利益而战。（六）要求废除苛捐杂税，军民财政统一。（七）不拉伕，不筹饷。（八）恢复农民协会。（九）扩大国民革命的工作。（十）组织农民自卫军。（十一）国民革命军是人民的武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十二）三民主义万岁。（十三）廖部长精神不死。（十四）不怕死，不要钱，是革命军的特色。（十五）为人民利益而战，为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战，是革命军的责任。（十六）国民政府万岁。（十七）国民革命军万岁。（十八）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严禁烟赌。（十九）打倒陈炯明，广东得太平。

二　下惠州

东征军自十月五日由省城出发，六日到石龙，九日到博罗。守惠州的杨坤如从前曾投降过来，现在又反过去了。蒋总指挥乃定攻惠计划，以第一军所部任作战主干，东江宣抚使骆凤翔部为向导。十一日，第一纵队长何应钦偕团长刘尧宸赴距惠城三百米达之下角附近，详细侦察；旋历西湖沿岸高地，至飞鹅岭附近，与第三师师长谭曙卿谈晤后，即返博罗。经此侦察之结果，遂决定以惠州北门为我军主攻方面，西门为助攻方面，下角塔后方高地，及下角塔飞鹅岭等处为炮兵阵地，下角西崖庵附近，及西湖西岸高地为机关枪阵地。计划既定，当即下令各部队准备，定十三日总攻击。当时原定计划，拟并占领惠阳县城，以截杨坤如退路；但因渡河困难，遂不能达此目的。

十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军下攻惠总攻击令。我炮兵即开始发炮，猛射惠城北门。午后一时许，北门城楼已被击毁，城墙亦坍缺十数处。时何纵队长在下角塔高地督战，见我步兵攻城之机已至，即令某团迅速前进攻击。至三时，攻击西北门之前线步兵，已进迫城下；但城上之侧防机关，尚未为我炮击破坏，敌即由侧防内架设机关枪向城下射扫，我军死伤枕藉，不能进近城下。四时许，敌火为我炮火压迫，略见灭杀。何纵队长复严令刘尧宸率所部

迅速前进，限于本日攻入惠城。刘即遄赴前线，指挥前进；不意到达北门外百余米达处方以望远镜仰视城上时，即中弹阵亡。何纵队长得悉刘团长战死，遂亲赴下角西崖庵附近阵地，督率第四团进攻。嗣见伤亡过众，士气稍不振，遂即勒兵，定十四日再施攻击。

十四日黎明，何纵队长略事筹划后，即决定于本日午后三时，再行总攻击。西南两门由第二师担任攻击，北门由第二团与第三团担任攻击，第二团在左，第三团在右，两团攻击区域，以北门附近石桥至北门之线为界。当即下令各部队长，指示攻击方略：（一）各攻城部队，务于本日十二时到达距城最近之地；攻北门部队，须达到北门小桥之北岸。（二）每连携带竹梯六架，每架用六七人至十人。（三）各连之竹梯，于攻击开始前，须排成疏开队形。（四）午后三时，全线务必乘炮火骤停，同时前进，不许稍后。（五）炮兵应于下午二时开始猛击北门。（六）第一线与第二线之距离，务宜缩少。（七）攻入北门后，第二团须向城之北半部搜索前进；第三团须向城之南半部搜索前进。令下后，各部队均于十二时以前，遵令到达目的地，并准备完竣。午后二时，炮兵即开始向惠城北门一带，猛烈射击，每发必中，毁坏城门，较十三日尤甚。一弹恰中城上之一侧防机关，敌之机关枪声顿灭。至午后三时，我攻城部队，即按照攻城计划，攻击前进。各团机关枪亦开始向敌之侧防射击。此时彼我之步枪声，极为浓密。我兵屡次抬梯冲锋前进，俱为敌人射倒。然前仆后继，至三时五十分，我步兵即由竹梯攀登入城。杨坤如负伤率残部遁去。于是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有宋以来千年未曾攻破过的惠州，在三十小时内，倏然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

我军之下惠州，官兵死伤四百余人，于十月十六日，入城之全体官佐士兵，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追悼攻惠将士大会。当日，自总指挥以下官佐士兵，全体到会致祭，总指挥蒋介石，俄顾问罗加觉夫将军，师党代表周恩来均有演说：

蒋介石的演说："这次东征军死了许多同志，固然十分沉痛悲伤。但这次的死，是有无上光荣，有极大价值。我们应继续努力，使我们革命史上多添几页光耀的纪录，能够时时继续下去。这回阵亡将士，是为什么而死呢？是为革命而死，是为打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而死。以后我们要继续这种精神去打南京和北京，千万不要忘记了已死的同志。我们革命军，是为革命而死，为党而死，为主义而死。"

俄顾问罗加觉夫将军的演说："每一个革命党，不论他在什么地方，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听到这个惠州攻下的消息，一方面是痛快，一方面是悲哀。痛快的是什么？因为这样的坚城被我们在短少时间里攻下，赶走帝国主义走狗杨逆。悲哀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死了许多很奋勇猛进的同志。惠州是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从前围攻惠城已有数十次，而是每次人数都是很多的，却是没有一次能攻下，独我们革命军在短少时间内，用少数人员，便解决了两千年不能攻下的惠城．为的是什么？每个月都有事发生，到底为什么？我们上次在东江有许多牺牲，后来班师打杨刘又有许多牺牲，廖案发生又有许多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我们可简单的回答，就是孙大元帅遗下来的遗嘱，我们是时时想要达到，所以无论什么困难，我们都不顾了。"

师党代表周恩来的演说："孙总理之志愿，第一统一广东，第二统一中国，第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可说刚起首，才达到总理遗志的一点。我们要想现在有第一军的力量，已有这样的成绩；假使能够把各军都化成和第一军一样，那末，广东统一就在目前了，进一步就可统一中国。我们不是三师军队就够的，要把全中国的军队都化为革命军。所以在今天追悼会里，大家要决定志向，为孙总理信徒，努力奋斗，把其他军队化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

军队！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惠州下后，国民政府曾有犒劳将士命令：

顷据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报告，我军于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完全克复惠州，闻捷之余，至深欣慰。杨逆坤如，自十二年以来，凭借坚城，肆行叛乱，官兵攻剿，日久无功。今春潮梅既定，该逆为部下所逼，仓皇出走，前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曲予容纳，令镇守惠州。乃该逆已包藏祸心，仍与叛贼陈炯明等暗相勾结。此次东征军出发之际，数遣使晓喻，以同仇敌忾相勖，该逆竟敢公然抗命，并闭城阻挠我军前进。社鼠城狐，故智如昨。幸赖我军将士忠勇激发，数日之内，克此坚城。破逆贼数千年之老巢，去革命前途之大梗，慰先大元帅在天之灵，申国民革命军忠愤之气。从此东江底定，全省安宁，功在国家，嘉慰奚似。着财政部迅即筹拨三万元，交由东征军蒋总指挥犒赏将士。至于攻城之际，将士奋勇摧坚，功成身殒，诚不愧忠勇军人之模范，政府于褒扬功烈之余，至深恤恻，着该总指挥查明详情，据实呈报，听候抚恤。此令。

又有奖励有功将士的命令：

民国十二年来，逆贼陈炯明，抗命东江，其鹰犬杨坤如，凭借惠城，负隅怙恶。诸君奉命征讨，师久无功，逆贼益得自恣。以至数年以内，人民幸福，备受荼毒，国民革命之进行因以阻梗。兹者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受命东征，督率将士，立破坚城，尽除枭逆，雪兆民之愤，振志士之气，统一前途，已呈曙光。该总指挥忠勇激发，成此伟功，至深嘉尚。兹据呈请奖励有功将士前来，东征第一纵队长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劳苦功高，指挥有方，第三师代理师长谭曙卿，副师长兼第八团团长陆瑞荣身先士卒，摧坚破敌，诚不愧忠勇军人之模范，民国之干城。已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奖，以昭激劝。其余有功将士，着该总指挥次第查明呈报，候令行赏，以昭劳绩。此令。

又有恤刘尧宸命令：

故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刘尧宸，秉性忠贞，夙娴韬略。前任陆军学校教官，日以大义勖勉学生。今春东江战役，义勇奋发，力战受伤。追授今职，尤能以革命精神，陶冶部属。此次攻惠之役，该团官兵，奋勇特著。足征该故团长平日之训练有方，临战复身先士卒，冒险冲锋，竟于攻城之际，中弹殒命，追怀良将，痛惜殊深。兹据蒋总指挥中正电请给恤前来，刘尧宸着追赠陆军中将，特给一等恤金五千元，由财政部迅予筹给，以彰功烈而慰英灵。其余应得恤典，应由军事委员会查例妥议具复核办。此令。

三　占领海陆丰紫金老隆

惠州攻下后，中路第一纵队第一师何应钦部，于十月十七日由惠州出发，陆续将永湖，白云市，吉隆，平政各处之敌，驱逐尽净。十月二十日到达赤石。此时洪兆麟部二千余名，在东都岭、宋公岭一带扼要布防。中路纵队长何应钦、师党代表周恩来前往侦察后，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向宋公岭、羊蹄岭，而以主力向东都岭进击。十月二十二日午前五时，各部依照计划分途进攻，于午前九时占领梅陇，敌向海丰退却。第一师乘胜尾追，即日午后六时，占领海丰。敌军谢文炳部分向公平、陆丰方面退却。二十三日，除留第一师第二团暂驻海丰，扫清海丰附近及汕尾一带之残敌外，第一师大部分部队仍向公平追击。时敌据公平东北方一带高地顽强抵抗，经我第一师第二团猛烈攻击，遂向河田溃退，我军第一师于是日午后五时占领公平。讵向陆丰方面退却之谢文炳，闻我主力已向公平前进，海丰兵力单薄，乃于二十

四日午前三时，亲率所部与陆学文等部约共三千余人，利用黑夜，挑选冲锋队，向我海丰袭击。我第一师第三团，因汕尾等处肃清余敌派去了许多部队，留海丰部队仅有五连，乃能与敌肉搏鏖战五小时，毙敌百余，敌势不支，狼狈逃遁，为我军追至赤岸河边，俘虏二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乃乘机直追，于十月二十六日占领陆丰。同日，右翼纵队长李济深部队第四军则进至紫金；左翼纵队长程潜所部则进至老隆。

右翼纵队长李济深所部第四军第十一师陈济棠部队，奉命出征，由常平向谢岗镇隆一带进发，早已突出惠州以前，进驻永湖一带。惟因惠州未下，故蒋总指挥不许该队前进。十月十四日惠州城下。十七日始挥军前进。十八日午抵平山。原有驻平山杨坤如部数百人，已于先两日退走三多祝。二十日复进占三多祝。我第四军自进占平山、三多祝后，侦悉敌人洪兆麟、谢文炳、李云复队约三四千人，屯驻新庵一带，戒备颇严。第十一师陈济棠师长，遂于二十一日早，亲率所部向敌进攻。九时，进至双金下鄙一带山地，即与敌人接触，鏖战二小时，冲锋十余次，卒将敌军击退，尾追至埔心。我军方拟翌日向海陆丰方面追击，忽接探报，林虎所部近万已过紫金县，进至附近一带山岭，欲待我军过埔心后直趋平山、三多祝，截其归路。我军闻讯变计，弃洪部不追，第二纵队所率第四军全部，俱向北面山岭搜索前进。二十二日，张发奎旅进至热汤墟，与敌人遇。我军斯时仅有一千五百余人，甫一接触，敌即漫山遍野而来，计自下午二时起，战至夜深十二时止。时因争占山头，满夜冲击，死伤极众。张旅哨兵一连，几尽为所歼，幸该旅战斗力强，且所带手榴炸弹杀伤力极大，尚能使敌人寒心。黄昏后始得独立团及三十二团到援，然人数仍不及敌三分之一。敌见屡次冲锋，均不得手，士气稍衰。时我十一师已进至老隆墟，离战地不过三四十里。张旅长乃飞告十一师，请出敌人后方之羊古潭截击；不幸该信为敌人所获，遂被其全部逃脱。是役，我军死营长罗子良一名，连排长死伤十余，士兵死百余；虽众寡之势不敌，然各军官俱能督率所部奋勇冲锋，卒将敌军击退。我军乘胜猛追，遂于二十六日进占紫金县城。

左翼纵队长程潜，亦于惠州既下之后，奉蒋总指挥令，率攻鄂军出发。二十二日克复河源。二十四日，率攻鄂军一二三团前进，抵义和墟。二十五日抵蓝口墟。与敌李易标部鏖战，击退之，二十六日，复行追击，遂占有老隆。

综我军自攻下惠州之后，遂依原定计划，分中右左三路进攻。至十月二十二日，中路在海丰附近击破洪部谢文炳，右路在热汤墟击退林虎部队，左路在河源战胜李易标；二十六日，遂同时占有海丰、陆丰、紫金、老隆；凡入潮梅之要冲，皆为我军所据，潮梅已在掌握之内。

四　东江全平

我军三路既同日占领海陆丰、紫金、老隆，遂决定诱敌战策，包围敌军，断其归路，期于尽歼敌军，以免再贻后患。

第一纵队何纵队长，于十月二十六日占领陆丰时，我主力军已在河田附近，击退李云复、罗应平等部二千余人，乘胜占领河婆。时我军因未明第二纵队方面情况，且第三团尚未赶到。故暂屯河婆，按兵不进。旋我第三团于二十八日赶到。是时东路敌人于二十七日在塘湖附近与我第三师接触，第三师略受顿挫，暂守华阳。于是退保棉湖、鲤湖一带之洪兆麟所部，与林虎所部、黄任寰、李易标分三路转而图我。一路由黄任寰率四千余人，出罗甘坝；一路由李易标率五千余人，出上沙黄塘；一路由洪兆麟率三千余人，出井尾向河婆夹攻。二

十九日午后九时，黄任寰部到达华阳附近，与我第二团接触，激战终日；我官兵奋勇异常，迭次冲锋，毙敌无算。敌乃向罗甘坝退去。三十日，何总队长留第一团扎河婆防守，率其余部队向罗甘坝追击。适李易标部此时为我第二纵队跟踪追击，由上沙转逃至罗甘坝北方，遂被我第一纵队夹击，纷向双头溃退。到双头时，复被我截击部队包围，就地将其全部缴械。至是，敌之中路主力部队，遂尽歼灭。同日，洪兆麟闻我师移向罗甘坝追击，乃亲率李云复、谢文炳等部，向河婆袭击。我第一团拒战于九年樟林一带，自晨至午，经我军屡次猛烈冲锋，敌死伤枕藉，洪逆伤腿，遂分途溃去。我军见中路之敌，既经解决，而洪逆余部尚麇集棉湖、普宁一带，乃于三十一日率第二三团转向河婆集中，十一月一日进占鲤湖，二日进占普宁，三日进占揭阳，洪逆残部，纷向潮安窜去。同日，左翼攻鄂军亦进占梅县。

第三纵队长程潜所部攻鄂军，自十月二十六日抵老隆后，后方河源复为敌所得，程纵队长于河源失守后方隔绝时，即内察地势，外度敌情，决定孤军深入，锐意向前，以捣敌巢。二十八日早四时率军出发，晚十一时抵五华，日行百里。二十九日午后五时，敌军林烈、莫雄所部约三千余人，迫近五华城西十里地方。我军迎击，敌便占据雄牛磨捱等处高山，下阻溪流，凭高扫射。我军猛攻冲锋，激战六小时，卒击退之。三十日，敌遂遁去。三十一日，我军进攻兴宁。敌军熊略部约千余人，据守城西十里拥簪亭，五里亭一带，经我军分路围攻，敌即溃散。午后三时占领兴宁。十一月二日进攻梅县。三日，入驻梅县。于是梅县一带逆军尽肃清。同日，分队向大埔进击。

第二纵队长李济深所部，自二十六日占紫金后。敌军败集于横流渡。二十八日，第一支队司令张和等奉令跟追。是日，抵华阳。二十九日，攻夺梅林。时敌军全部由横流退守上砂、罗甘坝一带，希图反攻我在河婆之中路部队，我军遂尾衔追击。三十日，探悉敌在罗甘坝战败，向汤坑溃退，复改道向双头截击，与第一纵队夹攻。是役遂将敌军围困，林虎、刘志陆所部七八千人，悉数缴械就擒，为此次东江战争实际了结敌军主力之一役。于是张和司令等遂追击至瑠隍。

综我军在十一月三日，中路至揭阳，左翼至梅县，右翼至瑠隍。敌军残部乃分向闽赣溃逃。五日，大军进驻潮汕。七日，陈济棠部克复饶平。九日，程潜部进占大埔。东江境内遂无敌军。

五　追击闽边残敌

刘志陆、洪兆麟、林虎三部大部分就擒，小部分溃败，穷无所归，遂分向江西、福建逃窜。一路由蕉岭、平远窜江西，一路由汤坑、高陂、大埔窜闽边。蒋总指挥因令第一三纵队分两路入闽追敌，第一军全军驻防潮汕。截至最近一周消息，陈济棠师已进至平和，缴获敌军枪械颇众；洪兆麟溃兵已为张贞缴械；攻鄂军则进驻永定、上杭等处，林虎残卒，剿灭殆尽；至粤闽边境，系由独立第一师吴铁城部驻守黄岗、饶平，张和部驻守大埔云。

此次战役之成功，除党军之忠勇善战外，东江人民之拥护革命军，竭力帮助，实为一大原因。人民因党军之秋毫无犯，以与陈炯明军队比较，不由不激发其反对陈军之心；加以党军的政治宣传，到处召集人民与军队在一起开军民联欢大会，演说，发传单，贴标语，唱革命歌，高呼革命口号，使人民亲党军如亲其家人。当党军在闽边肃清残敌班师时，群众痛哭请留，谓党军去了，闽军及土匪军队即来，他们又要受从前一样的压迫。可见人民之欢迎革命军，实缘其自身痛苦可以借此得到解脱，苟能解脱其痛苦者，他们将以其伟大的势力始终

拥护解脱力量，以至于最后之成功。

（原载《政治周报》第三期，1925年12月20日）

注：春涛，系李春涛。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国共合作时，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政治周报》工作。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把陈炯明赶出潮汕、东江后，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命春涛为汕头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和《岭东民国日报》的社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春涛是“非党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革命贡献一切。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

（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

元旦，上午九时，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代表一百七十六人；于时各军队各炮台皆鸣礼炮致敬，飞机二架翱翔天空，散发纪念片。大会推汪精卫同志为主席。汪同志就位后，致开幕词如下：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诸君：去年五月十六日，本党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广州，议决在八月十五日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並议定组织法选举法通告海内外各党部。各地党部自从接到了这个通告以后，也早经按照组织法选举法把代表选举出来，本来在去年八月十五就可以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了，后来因为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各地交通不便，各处党部许多有函电来请求展期，一展再展，直到今年的元旦，才在这里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由今天回溯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天，到现在已经两年，照党章规定原本是每年开大会一次的，为什么弄到两年才开大会一次呢？这并不是党务的弛缓，实在因为时局和环境的关系，当本党初次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也曾经有过宣言，这是大家都见过的。我们想起今天在这里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心上一定都感触非常的悲痛，因为第一次大会时，我们还有总理站在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一切，我们事事都有他的指导，我们止知跟着总理向前奋斗，就断断没有错了，可是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不见我们的总理了，总理已经离却我们去了，我们现在能见着的，止有总理的遗像，能听着的，止有总理的遗嘱，这张遗嘱，就是总理最后告诉我们的话，要我们继续他的精神去做的了，回忆民国十三年这一年，我们也是在很痛苦很困难的环境中奋斗的，但是虽然痛苦困难，尚有总理同在，我们仍是很觉愉快的。自从去年三月十二日总理逝世后，我们遵依着他的遗嘱去努力，虽然未尝没有一点效果，但因为总理已经不在，我们在奋斗中，总抱着许多悲痛！所以今天我们晓得座中各位同志，从这第二次代表大会，一定也会想起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总理的说话。各位还记得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中间，恰是接到了俄国革命领袖列宁先生逝世的凶耗。总理为着这件事，觉得非常的哀痛。当时曾停会两天致哀，总理并且亲自出席演说，说明他哀痛列宁先生的感想。这个时候总理有几句话，很象是预兆一般的：他说：“列宁先生虽死，列宁的党不死，俄国的革命事业也是不死。我今天在这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要将本党的责任，交付于全体同志。将来我虽然死了，本党却还是不死的。”这天总理的说话，今天座中同志，料想许多都是在座亲耳听见的。当时各同志听了这番说话以后，心灵上都起了非常的震动。都想不到到了今年，总理的话果然是真的，一点都没有错的！他真是死了！

他真是离却我们去了！此后本党的死不死，就止有看现在没有死的同志是怎样了！如各位同志都是听从总理的话的，就应当想到，究有什么方法能够使本党不死，能够使中华民国也不死！我相信总理虽死，总理的主义不死的！（鼓掌）不特是不死而已，而且还是一天一天的往前扩充到全国民众的。（鼓掌）总理的主义，就是总理的生命。总理的主义是不死的；我们继续实行总理的主义，便是继续总理的生命。故此我们敢说总理实在不死！（鼓掌）总理在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他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样的！兄弟因此更想到去年本党的同志，因为遵照总理遗下我们的种种教训种种政策，固然是已经得了一点进步，但其中有一位同志是帮助总理改组本党最出力的，又是和蒋介石同志一同接受总理的命令，同心合力去创办党军的，廖仲恺先生，不幸也死了！

今天他也是和总理一起站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同志继续去奋斗，廖先生之死大家明白是因为努力辅助总理改组本党而死的，是因为努力创造黄埔军官学校而死的。我们现在要想怎么样继续廖先生的工作，便要令到改组本党这一件大事，不因为廖先生之死而停顿，便要令到廖先生苦心创造留下我们的党军，就是先和人民合作，后来再成为人民的军队，也不因廖先生之死而没有继续发展，这些说话兄弟固然觉得哀痛，但我相信这不是兄弟一个人的哀痛，乃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诸同志人人心中共有的哀痛，不过由兄弟代表大众说出来就是了。原来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应该把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各种经过情形报告的，但关于政治军事党务各项，几日以后当有更详细的报告。今天开会兄弟只有很简单的说话就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总理仍然在我们面前指导”。我们还是要继续总理的生命，要继续民国十四年我们努力奋斗的勇气，（鼓掌）我们还更要把民国十五年的乐观提起来，（鼓掌）因为我们对中国的前途是乐观的，我们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一定成功的。（鼓掌）总理已经找出了一条光明大路交给我们，这条大路，是用他四十年的心血和经验从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来的。他原本要带领我们同志一齐去走的，但不幸半途死了，我们曾经跟从他走上这条光明大路的，就止有继续总理的生命，仍然向着这唯一的光明大路猛向前进。（鼓掌）我相信座中各位同志，都是不愿意落后的，都是要猛向前进的。我们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要从此以后，团结同志做一体，继续向这条光明大路前进的，第一步是先求中国革命的成功，第二步是更求世界革命的成功，（鼓掌）我们要牢记总理的遗嘱，一方唤起民众，方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兄弟现在敢高呼：

总理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同日十时，在东较场阅兵；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同志为总指挥。……飞机散发“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其词如下：

中华民国十五年元旦，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广州。代表等敢代表本党全体同志，掬诚以告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伯姊曰：

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唯一之革命党。曩者本党以组织不备，训练未周，党员对于主义既乏深切之认识，对于党纲又鲜服从之诚意；于是全部指导革命责任，萃于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一身，虽有先总理四十年之勤劳，对内尚不能铲除封建军阀之专横，对外亦终不免受帝国主义之牵掣，先总理惄然忧之，于是有民国十三年一月中国国民党之改组。自是而后，本党始有深切著明之政纲，适合国民革命要求，顺应世界革命趋势之策略，与夫精密之组织，森严之纪律，由是而组织革命基础之工农群众，由是而组织保障革命实行革命之军校之党军。于是而第一次肃清东江，于是而戡定杨刘之乱，于是而解散东莞增城之反动军队，于是而捕获内应陈逆炯明之熊克武，于是而再平东江，于是而肃清南路，此则本党改组以来对内第一步之成功也。

夫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狼狈为奸，帝国主义者以之为侵略中国，扰乱本党国民革命之工具，又惧夫在本党指导之下之中国民众团结日固也，明目张胆，残杀我工人学生；五卅流血以后，继之者有九江汉口重庆之屠杀；沙基一役，尤为惨酷无人理，本党则领导民众，与彼帝国主义者苦斗，各地之罢课罢工罢市，帝国主义者亦因而震恐，而省港罢工，使香港损失万万元以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重大之打击，彼英帝国主义者炮火虽烈，卒不能不怙然有所慑伏，而有撤换港督，要求调停之举，此则本党对外政策适合国民革命需要之明征也。

先总理于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有言曰："此次改组，即把本党团结起来，使力量加大，便革命容易成功，以迎合全国国民的心理。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本党此次改组，就是本总理把个人负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使本党不要因为本总理个人而有所兴废，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今则本党党务，日益改进；革命基础，日益巩固。本总理在天之灵，固当稍慰。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之爪牙张作霖，方跖张于东省，专司卖国；顽钝无耻之段祺瑞，犹窃据夫政权；而直系军阀惨戮工人之事，日有所闻。国内政象，日益混沌。先总理之救国政策，尚未能实现其万一，此则本党同志所引为深愧，激励奋发者一也。迩者郭松龄倒戈，奉系内讧，一如前年直系之崩溃，北京反段示威运动，全国应之者如响，军阀之末日将至，民众之势力渐张，本党素以国民革命相号召，当此国民革命的客观件件已备，竟不能利用时机，以实现本党之政策，此则本党同志所谋充实内力，急起而直追者二也。党外横逆之来，党内纠纷之起，皆足以阻挠党务之进行，夫本党同志，号称数十万，海内外党部不下千数，果能服从党纲，诚心革命，何敌不克，何坚不摧，乃置革命工作于不顾，而惟私人意气是争，自辟町畦，授人以隙，内部反动之患，较甚于外力摧残，此则本党同志所栗栗危惧，亟谋整饬者三也。同人等既虑夫党基之动摇，又凛于前途之艰阻，用特标明四事，以作大会商榷之准则：

（一）继承总理所决定之政策；

（二）接受总理遗嘱；

（三）森严党的纪律使全体党员化；

（四）决定以后革命方略！

奉此周旋，弗敢失坠。全国父老兄弟诸姑伯姊，幸相与努力图之！

中华民国十五年元旦

……

是日大会又发“告革命军士”的传单，其词如下：

革命军士同志们：

今天大会开幕，同时举行阅兵的盛典，高唱国民革命歌，这不仅仅是表示我们的高兴，这是要检阅我们的革命势力，策划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一个重要集会。

一年以来，两次肃清东江，肃清内部一切乱叛军队，扫平南路，统一革命根据地的广东，这是革命军士同志们的努力，同时也是工农群众们识了本党，认识了革命军士同志们为本党主义而奋斗，出全力拥护革命军所收的效果。

现在省港罢工，逼得香港政府投降，帝国主义者的势力我们可以看见了；两次奉直战争，奉直两系先后解体，军阀的死亡我们可以预卜了。可是全国民众，还继续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之下，我们的责任正大呢！尤其是在目前军事时期，革命军士同志们站在极端的重要地位。

革命军士同志们！我们的武力要民众化，只有民众的武力才能够得到胜利的。

革命军士同志们！继续肃清东江，肃清内部叛乱军队，扫除南路的革命精神，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全国的工农群众都是我们的后盾！我们奔上前线去吧！杀开一条血路前进罢！

中华民国十五年元旦

元旦下午四时，国民政府欢宴第二次大会全体代表于中央党部大礼堂。是夕除大会代表一体到会外，国民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各要人均有出席；女宾有鲍罗庭夫人，汪精卫夫人，伍云梯夫人等。入席同志三百余人。席事，主席汪精卫同志致欢迎词，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同志代表大会各代表致答词；次请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鲍罗庭先生演说；次请邓演达同志报告游历欧洲各国经过。今将汪先生之欢迎词录于下方：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位同志。今天是大会开会的第一天，国民政府委员会同人薄备杯酒和各位叙会，恭祝各位同志的健康。

兄弟现在受国民政府委员会同人的嘱托，敬致欢迎词于各代表们。我想起民国的成立，到今天已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元旦之最可纪念者，只有民国元年的元旦。民国元年的元旦，是先总理就临时大总统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说是革命政府成立很好的一个纪念。自过了民国元年的元旦以后，由民国二年至民国五年，中间历受袁世凯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的惨害，没有什么可以纪念。由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四年的元旦，又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来压榨人民，人民受祸，日深一日，也是没有什么可以纪念。惟有到民国十五年的元旦，我们在这里开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兄弟敢说这个是同志们很可纪念的一个日子。（鼓掌）可是中国国民党很可纪念的一个日子。（鼓掌）也就是中华民国很也可纪念的一个日子。（鼓掌）我相信十五年的元旦，与元年的元旦，有同样可纪念的价值。（鼓掌）元年元旦，是总理成立革命政府的一个纪念日，十五年元旦是本党同志继续承总理遗志去统一全中国的一个纪念日。（鼓掌）我们因此想起自元年至十四年，中华民国没有做好，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也很明白可以看见。我们不能说民元的革命是没有成就，最少已经革去满清政府的命，已经革去数千年专制政府的命，已经把中华民国的招牌，高高挂起了。可是中华民国的基础却实在没有做好，因为当时对内则民众运动没有普遍，对外则打倒帝国主义的目标，

还没有完全决定，所以十四年来，国家不能做好，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因为对外没有鲜明的目标，使一般民众对于反抗帝国主义的观念，不能发生，更无从致中国于自由平等的地位。这实是中国革命未能成功的一个大原因。所以到民国十三年，总理虽然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也要着手改组本党，并且决定了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唤起民众，因为农工就是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所以更特别注意于农工运动。自从十三年至今，民众运动的思潮，一天高过一天，到现在差不多全国已经知道民众运动之必要。广东民众同时受总理的直接指导，更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这个民治的基础是总理已经亲手打好了。在十三年一年中，总理的实力，虽然未出广州，但这个策略，却已影响到全国。自从北上奋斗以后，全国的民众，更差不多都举起头来了。第二个策略，是对帝国主义，取无畏的精神去抵抗。因为这一层，致民国十三年帝国主义者加于我们的压迫，较从前更加露显，但因此却制造成民国十四年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高潮，使帝国主义者，都手忙脚乱起来了。这个对外的民族解放的基础，也是总理已经亲手做好了。由这两层观察，我们敢决十五年以后，中华民国的进步，与十五年以前一定是不同。（鼓掌）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对内对外的策略，各同志能够都遵照总理的遗嘱去做，是断没有不成功之理。（鼓掌）我们请回想到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这两年，因为同志仍然照总理的方针去努力，已经得有一点成绩，可见听从总理的话，是断没有错的。反之不听从总理的说话，也一定不免陷于错误。可是从前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有总理亲身的指导，我们不会有错误。现在经理既逝，一班同志，就要求第一次大会切实的指导了。这次大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决定民国十五年本党努力的方案。我们十五年努力的成绩，可说就全在这次所定方案之如何。所以国民政府同人，对于这回大会实有无限的希望，无限的颂祷。当今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已经明白规定是受党的指挥监督，实行总理以党治国的政策的，故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会之前，指导国民政府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既开大会，就全靠此次大会的指导了。国民政府同人，愿拿至诚恳至纯洁的心事，敬求大会各同志，把本党工作和国民的关系如何，那一点对，那一点不对，都切实的考量其得失，估定其价值，然后决定种种的方针。国民政府同人是一定不顾一切，实行大会议决的方案的。大会所议决的方案，无论如何艰难，如何困苦，一定切实执行，期不负各位的希望。今天开幕时候，我们恪诵总理的遗嘱，大家的趋向，是已经决定的。今天参观阅兵式，大家更可以看见广东民众对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热烈希望，但同时也就可以见得他们还是在一个痛苦的环境，是要我们努力奋斗去替他们解除的。我们能够解除全国人民的痛苦，也就是解除我们同志良心的痛苦了。故此兄弟可以说这民国十五年全国人民的幸福，实全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同志的努力，把一条光明大路指示给他们。兄弟现在谨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同人再颂各位的健康，请求各位的指教，并请求大家就此各举一觞。

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同志的答辞如下：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期，又是民国十五年元旦的大纪念日，国民政府委员会诸同志，为我们代表开盛大的宴会，并承汪主席致极恳切的欢迎词，这真是千载一时的盛会，同人等非常荣幸。兄弟受代表诸同志的委托，来致答词，虽不长于演说，也不能不说几句话。我们知道今天本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期，我们应该要知道本党现在所负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本党所负的责任，就是代表大会的责任。第二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责任，是在我们代表的身上，所以我们代表所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而尤其是

现今民国十五年，其责任更为重大。刚才汪主席说，国民的元旦，只有民国元年的元旦，和今年的元旦，才有纪念的价值。因为民国元年的元旦，是先总理就总统职，南京政府成立中华民国革命成功日子，今年的元旦，是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继往开来、含有无穷的希望的日子。这话很沈痛而涵有极深厚的意义。兄弟以为这两个元旦虽然有同等价值，同时也要知道他们的分别。为什么呢？因民国元年的革命，虽然成功，而民众还未觉醒，一般革命党人，只知道十八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主张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政治革命。拿百年前的旧方法，应付现在的新环境，当然是走不通的。当时我们总理以为要革命完全成功，必定要扫除革命障碍，根本改造 从政治革命，更进到社会革命。(拍掌)从前成立同盟会的时候，总理用他博大精深的理论，内察我国的国情，外观世界的趋势，就决定了拿三民主义来作我们革命党的唯一政策。他在南京就总统职以后，本想照他的政策进行，并极力演说民生主义的精义，但是一般苟且偷安的人，极力谋调和妥协，总理知道这般人没有国际头脑，没有世界知识，群众尚沈迷不悟，他的主张必无法实现，就毅然退位，把政权交出，让主张和平的人去谋和平改革。那知道民国十四年来，他们不但没有和平改革的希望，反使内忧外患，层出不穷，使人民越陷于水深火热的地位。总理自从退位以后，极力从宣传方面尽力。一面从事著述，发挥学理，一面训练党员，共同奋斗。十年以来，国民始稍稍认识三民主义。又加以俄国革命成功，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开了一个新纪元，带了国际性世界性的革命潮流，骤然增涨，中国的民众感受了这个潮流，就异常奋发。总理知道民众已有觉悟，国民革命的时机已熟极，谋改造本党，来实行他的政策。所以本党自前年改组以来，实得了一个新生命。（大拍掌）我们拿这两年本党的进步，和前十年来比较，真是有天渊之别。这固然是时势的要求，也是我们总理苦心孤诣的结果。我们甚希望总理引导我们，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在最短期间完成，不幸总理去年北上，因劳成病，竟舍我同志我民众而去。这不但是本党的不幸，是全国的不幸，并且是全世界的不幸。因为我们总理是领导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作世界革命的人。全国全世界忽然失了这个导师，他的损失自然是很大的。无论何人想到这一点，莫有不悲伤的。现在国内军阀——张作霖的内溃，国外帝国主义者——英国因我全国民众反抗的热烈，罢工的坚决，已表示屈服，假使先总理还在，见这样的情况，对于今天的元旦，是何等的欢慰，对于现在的时局，必定有极好的方略指导我们，可惜总理已经死了，没有人指导我们了。但是总理虽死，总理的精神不死。总理的精神为什么不死？就是总理的精神已经入注了我国全国民众，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所以不死。（大拍掌）我们总理将他宏大未竟之功，交给我们同志，要于最短期间努力完成，我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尤其是我们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总理逝世后第一次大会负有承先启后的责任，我们应该怎样努力！

民国十五年的元旦，有纪念的价值，我们以为：

第一是：继承总理的政策 凡政策没有深厚的理论和合于时势的要求是没有价值的，总理以四十年的经验博考古今参酌中外，集世界各种学说的大成而创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种种对于时局的政策，实合于我国的国情，合于世界趋势，我们当奉承总理政策，而努力奋斗；

第二是：接受总理的遗嘱 有政策没有实行的方法和步骤，也不能成功。总理临终的遗嘱实给我们实行政纲的方法。为国民革命世界革命计，根本上必定要团结民众，和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一致努力，才能有效。所以总理遗嘱，教我们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

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中国数十年来国内的纷争，都是帝国主义的直接间接造成的，所以总理又给我们一个具体方法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所以遗嘱叫我们必须于最近期间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开国民会议。我们对于总理的遗嘱应当敬谨接受的！

第三是：激励革命的精神　革命事业不是单靠政策可以成功的，必定要有革命的精神。革命党的精神是要坚苦卓绝不屈不挠，是要绝灭一切图利营私遇事利用的恶观念。我们革命党的光荣是总理四十年来的坚忍诚服和一般同志的高尚纯洁所得来的，但是民国以来也不每利用革命的招牌来作终南捷径的来犯一切罪过的，所以使革命党受了无限的诬谤，尤其是现在本党的反动派完全失去了革命的精神，简直成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是何等痛心的事！（大拍掌）我们惟有激励我们同志回复革命党的精神，拿总理的智仁勇来作模范来保全我们革命党的人格。

第四是：决定进行的方略　总理虽然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和方法，但是时局常常变化的，拿死方法来应付新环境，是不能适合的，所以我们应该随时势的变迁，决定进行的方略。现在国内的军阀正在崩溃的时代，国外的帝国主义者，自五卅惨案以后经全国民众热烈的反抗，已成了强弩之末，我们应该怎样应付这个时局，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这是我们同人应该努力，也是本党同志大家应该一齐努力的！

好在我们国民政府，得当局诸同志数月来的奋斗，历尽了无数艰难，拿不调和不妥协的精神，终究肃清了东江南路打倒了反革命的势力，使广东统一起来。革命的基础一经稳固，我国革命的成功，一定不远的。今天我们在广东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希望我国民政府继续努力，于最短期间能统一全国，建设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下次在北京开同样盛大的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大拍掌）敬借杯酒，并激励我同志努力，祝政府委员诸同志的健康。

鲍罗庭先生的演说词，也录如下：

“今天我很欣喜看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同志，也很高兴能与各位同志谈话；因为前次的代表大会时，没有和全体代表同志交谈过，我所常常接谈的，只是广东地一部分的同志。现在能与全国各地来的同志见面交谈，我觉得是很荣幸的。

我是在二年前来广东的，在未来之前，我不知道我究底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将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我到这里来，并不是我本来的志愿，但我终于来了！终于来的缘故，第一个原因，是你们的领袖和我们的领袖间有一种谅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的一种义务。但是我二年前来南方时：并不是直接到中国南方广东来，我是先到上海，所以我们的订约就在上海。其时孙逸仙博士正为了反革命的势力扩张而避在上海，还没有回去。实在我的来广东，是我实行条约的第一步。但是没有做第二步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领袖死了。现在你们的领袖也死了。那末我们要不要互相实行你我的义务呢？要不要实行同样的义务呢？是的！我们要实行！在你们的义务方面，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团结成一体去继续总理向有的辛苦！负一部分应尽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在联合起来反抗你们的仇敌！自然我们呢，也愿意实行我们一部分的责任，实行我们同样反抗仇敌的责任！不过在我们实行我们一部分责任的时候，就是我初来广东的时候，看见这里广州的情形，竟不堪设想，若是把他一切描写出来，或过于世界万恶集薮的地方，那是很不好的了！我们不能够把详细的情形说出来，不过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国民与主义之间有很大的隔膜！差不过国民是国民，主义是主义，国民与主义二者，没有关系似的。而且假革命的人，其行为与主义不相融合。差不多主义是孙博士的好主义，而行为确不是孙博士的好行为。凡是看见过这种情形的人，在良心上是不是觉得

行为与主义是可算相合的吗？老实说，是不可能的！是不会的！但是当时也有同志跟着孙博士去做，我呢，也要做我的工作，可是不能够！因为在这不可能的空气里，环境太恶劣了！其时孙博士看见了这种情形，已经发愁得很，因为主义与行为这二者是相离太远了。这两方面相离太远的缘故，实使他容易年老，至少也使他少活了几年！

我当时既经看见这种情形，那末我到底怎样办呢？主义是好的，但是行为是不对的！主义与人民完全没有关系！那末在这种事实的现状下怎么办呢？我走吗，我还是留下在工作？要是留下，事实上不能做工作。要是去，我违背我的义务和责任。那末到底我怎么办呢？同志们！我不是普通的一个新闻记者，走进总理的办事室里谈话时，满口恭维和赞成，走出了室外，就背后说他是一个理想家这一般人的样子。但是我们做的工作是同志替国家做工作，是不是对民众做工作？是的！对国家和对民众，是为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而做，决不是为一己而做。那末我应该脱了我的衣服，丢了我一切而去工作。走好呢，工作好呢，当然的是工作！孙逸仙博士委任我做政治顾问，我于是非常喜欣，我很愿意和他合作。我二年的工作，都是以他的主义和教训做材料，我只有这二种材料。我除了常常把主义和行为这二方面，想拉在一起外，没有其他的工作。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的。然而他现在死了，我们失了一个指导师！尤如一个小孩子失了一个教育的母亲一样。在他活的时候，差不多他的生命完全在革命上面，不但他发明革命的新途径，而且他能有权力来摧残这些阻碍革命的东西。他实在是有权威的人，是一个利害的领袖！如今他竟逝世了。他逝世后，我们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没有？我们遇到了种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才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位同志们所要讨论和决定的。实在我们也只有二条路：我们屈服了，还是猛进？是的，我们要一直前去，把一切的力量拿出来，我们不管他的障碍，我们应当去战胜那些障碍才是！

同志们我们所有的问题只是内部的问题，现在我们都明瞭了解的了。我们只知团结起来是对的，我知道大家都承认是对的！我们如果都认为对的，那就好了。纵或有些少问题，我们也可以讨论。不过在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内部有了冲突的时候，他便用种种话来骗我们，然而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者是一致的，是共同努力的。（鼓掌）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件事，我们也不应该有二种意见，使这个重要的工作在未成功前就先自己分裂而得不到实际的利益。我们决不可使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有了冲突而高兴。如果我们有分裂的现象，就是我们给帝国主义者的生命在中国多延长几年的寿命。（鼓掌）现在大家应当明瞭，我们应该赶快使自己的国家能独立自由。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应当去努力前进。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是继承总理的三民主义中的一部分，就是第一个民族主义。我们决不要看差了总理的工作是民生主义。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民生主义的时期。固然，三民主义是整个的，不能分开的；但是三民主义，同时也有系统的，步骤的，我们不要误会。因为民族自由了，国家独立了，民权民生才能实现。所以凡是我们革命的分子，就不应该有二种歧见，不但不应该，且亦不可有！我们决不要为了将来的信仰不同，而在第一步同一工作的时候就斗争。其实即使党中有聪敏的人，也说不出将来不同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就是我们总理也不料将来有不同的纠纷。他决定这种主义和策略的时候，也不料有什么不同地方。我们当合在一起，为民众而牺牲，决不能在现下定第三时期的同异。若是我们不能把意见统一，那帝国主义者就不怕我们了！

所以我们从今后让我们大家决定一致的，联合起来革命，不妥洽，不畏惧，向帝国主义者冲锋，切不要他们可以干涉我们的成功。（鼓掌）我希望在这一次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在关于这一点上全体一致的决心，求民族解放与独立，奋斗，国民革命的成功当指日可待。就此祝国民党的成功万岁！

邓演达同志的报告，详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阴谋，帝国主义各国间的自相冲突，及帝国主义各国内劳动运动的愤起；因词长，只好割爱不录了。

三

四日，上午十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第一次会议，到会代表一百八十九人；先由秘书处报告大会筹备经过后，即举定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邓泽如丁惟汾恩克巴图亨颐七人为主席团。

下午二时，继续开会，汪精卫同志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

代表大会各同志：今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向大会提出一个"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的议案，委托兄弟把接受总理遗嘱的经过报告一下。自去年一月二十六日，总理在北京协和医院受手术后，已发现是一个不治之症，当时在北京的各同志听见这个不幸的消息，大家都觉得此后各位同志身上，要负一个很严重的责任。所以那天晚上即开政治委员会会议，这个政治委员会，原本是总理在广州时所组织，总理自己做主席的，但当总理将入医院的那一日，知道病势不轻，不能躬亲庶务，而许多政治委员都不在北京，胡汉民廖仲恺诸同志在广州，戴季陶邵元冲同志在上海，只兄弟一人随在北京。当日总理特加委于右任吴稚晖李大钊李石曾陈友仁为政治委员。那天晚上，政治委员会诸人商量了许久，都以为应该趁总理未临危之前，求他有一个遗嘱，好交付同志遵守。大家对于这层意见，是经一致赞成的，但经过一个月这事还没有决定。因为大家对于总理的病，终还有一线的希望。虽然经医生说过是完全没有希望，但大家还觉得总理的精神强固，抵抗力总比较别人强，就令不能够完全痊愈，总可以抵抗久一点，或者能够延长一年半载，或两三年的生命，也未可定。如果对他照直说明，是不治之症，使总理心上预备逝世，会消灭他许多抵抗的精神。因此大家都决定非到最后的时间，不能够对他直说。由一月二十六日一直到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差不多天天都对医生说，如果觉得总理临危，须告诉我们，给我们进去说话，医生也是应答我们的。到二月二十四日的上半天，总理觉得很辛苦，已有些支持不住的样子。医生也告诉我们，如要问总理，就在这一两天问他了。过此以后，恐怕他就要离开我们的了。那时，我们万不得已，止有先取得孙夫人的同意，请他出了病房，然后孙哲生，孔庸之，宋子文三位同志，和兄弟四个人，一同进了病房。总理当时见了我们四个人进去，就叫我们进前，似乎有一点觉得自己是不起的意思。随即问我们到来有什么话要讲。大家都是还不敢直说的。兄弟当时很委婉的对总理说："当一月二十六日那天，先生进了病院，许多同志，都责备我们，要请先生留些说话给我们。先生的病好了，便无所谓。设使不好，我们还可以听先生的教训。我们知道先生是能够和病魔抵抗的，我们是愿意帮助先生抵抗这些病魔的。不过也想在你精神好些的时候请你留这说话给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可以受用。"总理当时回答的话是："我生是有话说的。我死便由你们去做，也不必我说了。"我们回答总理："还是愿意听先生的话。"总理说："我如果留下说话给你们，是于你们有许

多危险的。现在许多敌人正在围困着你们，我死之后，他们更向你们进攻。如果你们强硬对他们，是危险很大的。我看还是不说的好，好教你们能够对付环境容易一点，我要说出，你们便很难对付险恶的环境了。”兄弟回答他：“我们晓得大部分同志，都能够听先生的话。什么危险，什么生死问题，我们都不管。先生教训我们很久，也可以相信我们是不怕危险不怕敌人的。”先生听了这话以后；闭着眼，点着头，表示赞成我们的意思。我们更对先生说：“你要说什么话，随便就好，也不必太费心。”总理说：“我已经著有许多书了。”兄弟答：“是的，你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都要写上去的，但还想先生有些总括的话。”兄弟记得：去年一月一日，先生由天津进京时，吩咐过几句话，那时先生精神尚很好，他亲口授兄弟写下的，是他“四十年革命之目的，是在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这句话是用传单替代演说散给民众的。除这句话以外，先生此时还对我论明革命的方法，要特别注重两点：第一点是唤起民众；第二点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兄弟听了他这几句话，就马上把他记起来。因为时间紧急，又在他面前写起的缘故，所以所写的字，很是草率。写完之后，读给先生听过，他点头道，“好呀”！又预备了一张家事的遗嘱，一字字的由兄弟念过之后，总理也点头说好。我们原想即时就请总理签字的，但是孙夫人在房外正在哭声很哀，总理就说，“你且暂时收起来罢，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我们因此不敢再请总理，就把这张遗嘱折好，放在衣袋里。退了出来，随即到政治委员会报告，当时有各位委员在座，他们有些是早已在外面探望，都听见我的说话的，就请他们一齐签字，证明遗嘱。由兄弟存在身边，等到他急危时候，才拿出来给他签字。自从这天以后，再过了几天，先生的病已绝对没有希望的了。不过大家同志还是希望未绝，有一点可以延长先生生命的法子 都无不用到。所以天天都进人参汤。这个时候，总理天天是这样的过去，直到了三月十日的晚上，先生病状太不好了，没有法子，再支持了。到十一日早上何香凝同志对兄弟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但顶困难的，是有什么方法使孙夫人能忍耐些时呢？因为先生生平是最仁爱的，他若是见了夫人在旁边哭，他一定是不肯签字，致令夫人伤心的。因此，何香凝，宋子文两位同志都对夫人把这个意思说明；夫人那时也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特不愿意阻止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了。”何香凝同志得了孙夫人答之应后，就赶快叫兄弟把两张遗嘱都拿出来，就用孙哲生同志身上的墨水笔交给先生，先生当时因为手力很弱，有些颤动不能自持的样子，夫人就用手托着先生的手腕，给先生容易签字。先生所写的字虽然腕力很弱，但却是写得很清楚的。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以上都是十一日早上先生把遗嘱，遗书，签字的情形。到了那天下午，先生还有很长的话，对孙夫人，何香凝同志，和好几位同志说的。实际上原也和遗嘱一样，不过还没有先生的签字，故不能当作正式的遗嘱。至于他那天回答我们的话，兄弟已经报告于政治委员会的，不过因为没有签字，所以也不能当作正式的遗嘱。现在只能拿这一张先生亲笔签字的遗嘱，做教训全体党员的最后说话了。十一日晚上八点钟先生断断续续的，还说了许多话，或用中文或用英文频频说的，就是“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几句。

到是晚十二点钟，医生告诉我们，先生的脉已散，快就要去世了！你们要注意了！先生这时曾有一次似乎要说话样子，孙夫人听得是叫兄弟，便立即叫我近前，我按着他

的手，已是不能动弹了。到三月十二日早上，先生就果然弃我们去了！

我们便把遗嘱用镜镶好，放在先生的灵前，叫大家共见。

后来在北京料理丧事完后，把这张遗嘱送回广州，在一处严密谨慎的地方，深深藏着；如果各位同志想看看的，可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商量；如想摄影，也可以的。自从得了总理遗嘱之后，到去年五月十六日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通过接受总理遗嘱，发出郑重宣言。并且通过：各党部每次开会，都要恭诵总理遗嘱，这就是本党通过接受遗嘱经过，现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既经开会，我们应该向大会报告的，还想请求大会对于接受遗嘱这一件重大事情，有一个郑重的议决案。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共同提出议案的条文，是："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望各位同志加以通过。兄弟今天所说明的，只是总理遗嘱经过。至于遗嘱的意义，不必兄弟说明了。

汪精卫同志报告后，大会一致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所提出之"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的决议。

旋由主席团提出，择观音山从前观音庙旧址，即该山最高处，建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以垂永久。

五日上午十一时，全体代表到山上举行奠基典礼。

上午十时半，各代表齐集中央党部礼堂，由大会秘书处租定汽车三十余架，载代表们直到山麓，然后步行上山。十一时，行奠基礼。建碑地点定在山之最高处，基上置国旗党旗，各代表环向而立。先奏军乐，次汪主席读总理遗嘱，次全体向国旗党旗行三鞠躬礼，次由大会主席团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谭平山丁惟汾恩克巴图六人亲手举石安放奠基。次由汪主席演说建碑之理由与计划，大致谓：大会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主席团曾经向大会报告，觉得这个碑建在此地，实最合宜，此地前为观音像宝座所在，经测绘师测量实为此山中心点，最高峻最平正之处，所以选为建碑地址，观览全城，实觉无有更善于此者。去年孙哲生同志原拟将此山烂庙拆去，改为公园。由此下望，有红棉之处，即为前日之总统府，于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不幸为陈逆炯明叛军所毁者。由此步行下去，又为广州文化上名胜之地，如东坡精舍，学海堂，尤为著名。由此南望不远，即第一公园，将来将第一公园扩张直与此山相连，便成一极大公园。广州市政厅早具此意。至于此山之名，除观音山外，尚有称为粤秀山或禺山者，将来修建完妥，可更名为中山，公园可名为中山公园，以纪念孙先生。至此碑究应如何建筑，尚须聘工程师设计。主席团之意，大致主张碑宜高，表示庄严；色宜白，表示纯洁，更装置电炬，砌成青天白日党徽，使全城市民，于夜间遥望此山，皆可以见青天白日之辉光。此事将来大会或交国民政府办理，国民政府同人要赶快造成，预算大约两三月后，必可告成，以不负委大会托云。

"附注"按纪念碑自行奠基礼后，即由国民政府登报悬赏征求纪念碑建筑图案，限期一个月。期满后，国民政府特请美术家建筑家公同批评应征各卷，则无一满意；结果，延展期限，并定于山颠建碑，山麓建纪念堂，使堂与碑有联络，依此再征求计划图案了。

五日下午，全体代表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及廖仲恺先生。各代表乘汽车而去，沿途放鞭炮，祭后各作热烈悲壮之演说。

四日下午之大会中，又决议：（一）以诚意与苏俄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二）与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三）抗议日本出兵满洲；（四）勉冯玉祥岳峰诸将领及国民军，尚

为民众利益奋斗，勿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兹录大会致苏俄电，致国民军将士电，及慰勉海内外革命同志电录于下方。

（一）致苏俄电：

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暨全俄国民公鉴：今日本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一致决议谨以至诚之意与贵国携手合作，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贵国为世界革命先锋，向以扶助被压迫民族为职志，深望继续与以助力。本会更当率领全体同志努力奋勉，完成中国之国民革命，而促全世界革命之成功。谨祝中俄大联合万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致国民军将领电：

张垣冯焕章，天津孙禹行，开封岳维峻，暨国民军全体将士均鉴：慨自建国以来，兵祸连年，民无宁岁，推源其故，内之军阀专横，外之帝国主义侵略，实为厉阶。乃者反奉军与贵军以民众力量，著著胜利，实堪庆幸。本会现在集议，誓凛先总理遗训，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并望贵军以历来军阀覆亡为鉴，一本民意所归，共立建国伟业。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歌。

（三）慰勉海内外革命同志电：

海内外革命诸同志均鉴：本党为我国之自由平等，谋世界人类幸福，与一切恶势力奋斗。帝国主义者逞其压迫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又利用我国军阀及买办阶级为其工具，掠夺我民众，扰乱我和平。我革命同志不甘屈服，牺牲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或冲锋陷阵，或断脰绝顶，前仆后继，百折不回，因能唤起民众，使革命空气弥漫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为之惊心夺魄，其恶势力已渐崩溃，我国国民革命成功，指顾可期，此皆我海内外同志努力奋斗之效，本大会深表敬意！

全体一致，愿与诸同志继续努力，共同奋斗。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使革命早日成功！诸同志其勉旃！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麻。

四

六日，是为大会开议之第二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人数二百人，谭延闿主席。汪精卫同志报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所经过的政治状况，至有三小时之久，缕述先总理忍痛负重，建设军官学校，裁定商团之乱，削除刘杨，剿灭陈逆叛军，诛戳廖案刺客，解散反动军队，以及反抗英国帝国主义，扶助罢工，建设国民政府，统一广东计划；全体代表莫不倾耳动容，对于国民政府深表嘉许。汪同志之政治报告全文，已登本刊第五期，兹不附录。大会特函嘉勉国民政府，其词如下：

国民政府委员诸同志均鉴：慨自民国肇造以来，历十四年外受帝国主义之侵凌，内为封建军阀所割据，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本党承先总理之领导，以救国救民为志，以三民五权为政纲，扼于时势，百不遂一。先总理竟赍志以终，深为遗恨。我党治下之国民政府，成立于杨刘叛乱甫平之际，沙基惨案发生之时，内部之反侧未清，列强之压迫正烈，飘摇风雨，谣诼频兴；我政府排百难而树新猷，严禁烟赌，抚辑农工，扫除苛捐，刷新政事，援助罢工则开港筑路，驱除叛逆则伐罪弔民，半年以来，虽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联合进攻，极其凶猛，而卒能削平大难，克复名城，肃清东江南路，铲除反贼叛徒，唤起民众，固结人心，内寒贼子之心，外夺英人之魄；虽曰客观事实之要求，实亦

在举诸人之努力！大会深念贤劳，特为嘉勉。顾时事尚多艰难，责任日愈重大，尤望本不屈不挠之精神，作再接再厉之奋斗，使民国统一，指日可期，世界大同，于斯是赖。奠以党治国之基，作一劳永逸之计，不独本党之光荣，实亦人类之幸福，愿我同志共勉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又议决用大会名义送一纪念银鼎与政治顾问鲍罗庭，上刊“共同奋斗”四字。

同日下午二时，继续开会：出席代表一百九十六人，邓泽如主席。蒋介石同志报告军事，述组织党军，击破杨刘梁魏诸逆军，及协同其他革命军讨伐诸逆，戡定内乱的经过；蒋同志并详述国民政府下之武力与邻省兵力之比较和攻守之大计。报告毕，全场欢呼。某同志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并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蒋同志之报告全文，本期已载，兹不赘述。

五

七日，上午十时开议，出席代表，二百零六人，恩克巴图主席。谭平山同志作党务总报告，本期已载全文，兹不赘。

下午二时，继续开议，丁惟汾同志报告北方党务状况，刘尔嵩同志报告中央党部工人运动经过：工人运动报告，本期已载全文，兹不赘。主席团提出组织“提审案查委员会”，又提出“主席经亨颐同志尚未到，改请孙夫人宋庆龄同志担任”案，并皆通过。

大会又决议致电全国民众罢工工友及省港罢工工友，加以慰勉，两电原文如下：

（一）致全国民众罢工工友电

全国国民暨全国罢工工友均鉴！自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以来，帝国主义者续续在汉口，南京，天津，青岛，重庆，九江，芜湖各地屠杀我国民众，至为残酷！而尤以沙基机关枪之扫射，实为痛心！本党愤恨之余，确认我国国民革命，当从此开一新纪元。盖因此我国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者之凶残，表示了我国民众的力量，虽各地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工具，——军阀，买办阶级，及高等华人，压迫我民众，破坏我罢工：而广东省港澳罢工，终能坚持以至于今，使帝国主义者，终于慑服。此则全赖我罢工工友，坚苦卓绝之精神，及本党下国民政府之指导维护，始有今日之结果。因此：我国民众，咸知欲求革命成功，民族解放，并团结一致立于青天白旗帜之下，建设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终不能有成功之望。我党员，我工友，此次努力奋斗牺牲之精神，使大会同人，不能不深表感敬。同人等明知革命党人原为求民众解放而牺牲，即是为求自己解放而牺牲，本不愿受何人感敬。惟念半年以来，海内外各工友与帝国主义者苦斗，或粉身碎骨，或忍饿耐寒，或被禁于牢狱，或被逐于闾阎，方在艰难困苦之中，得一同情者，来相慰藉，其愉快当不可名状，又况帝国主义者之手段，愈出愈奇，我国民之反抗，当再接再厉。同人等敬代表本党，慰劳我海内外罢工工友，深愿以后仍本此奋斗之精神，与帝国主义者拼命，以求达到民族解放之目的。除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大会同人直接前往慰劳外：凡本党海内外各级党部，务即派员慰劳各地罢工工友，以感既往而励将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庚卯

（二）致省港罢工工友电

省港罢工委员会转罢工工友均鉴

罢工工友们，半年以来，你们牺牲了你们的生活根据，忍饥耐寒，和帝国主义奋

斗，你们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革命的急先锋！是人类无上的光荣！你们帮助国民政府肃清了东江南路，铲除了反革命的势力，统一了广东。现在帝国主义者受不过每天四百万的损失，已经慑服了，来向我们求和，固然是你们能够坚忍，能够团结的结果；但是假如莫有本党和本党的国民政府的帮助你们，恐怕也得不到最后的胜利？

试看上海，汉口，南京，天津，青岛，重庆，九江，芜湖，长沙，安源，各地的工友，也是同样热烈的罢工奋斗，可是终究被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军阀，工贼，买办阶级，所破坏，不但得不到一点结果，而且被他们杀害监禁。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工人，要求解放，要得到罢工的胜利，必定要能团结，而尤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府；不但只要一个统一广东的国民政府，还要继续努力以谋建设中国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方有全中国工人解放之可能。因此：本会对于工友们，既往之奋斗牺牲，认为有无上之光荣，深深的表以敬意！同时，尤望共勉于全国民族之解放，以达到中国真正的自由平等。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叩庚。

六

八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代表共一百九十九人，汪精卫主席。宋庆龄同志于昨晚抵粤，今日出席大会，即报告北上经过及回粤希望，其词略如下：

各位同志：我觉得很抱歉，因为种种的环境，不能早日来此，参与盛会。现在承汪先生和诸位好意，推为主席，私心自问，非常惭愧，也非常感谢。我这次回到广东来，觉得是非常安慰的。为因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这不但我个人安慰，而且亦安慰先生在天之灵。所以我觉得前途非常乐观，非常有希望。但是我还要希望各位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因为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忱的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

次，陈公博同志报告农民运动状况，本期已载该报告全文，兹不赘。次，何香凝同志报告廖仲恺同志死事经过，其词如下：

诸位同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廖先生还与会，这回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能和各位相见了；同志：廖先生之遇害，有两原因，一，是对内的，一，是对外的，现在我先说对内的：廖先生是要谋党的发展，政治的发展，革命的发展，所以在驱逐刘杨以后，便极力谋求军政统一，民政统一，财政统一，并积极扩大党军，这是正中了贪官污吏，无聊政客，不法军人的嫉忌，先便诬蔑廖先生是共产是赤化，得来还下了忍心将廖先生杀害。对外呢，便是帝国主义者，怀恨廖先生主张联俄，联合弱小民族及援助罢工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便愿以二百万金接济反革命派推倒广东革命政府，便先要除去廖先生，减少革命政府的势力，（这是凶手供出来的说话）诸位同志！杀廖先生的凶手是中国人啊；虽然凶手是中国人，并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系主动人。所以我恨帝国主义，我尤其是恨英国，不但是因他是杀害廖先生的主谋，还且恨他最阴狠狼毒，要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试看他霸占广东的口岸，天天向我们压迫，图破坏革命的成功。英国虽然不惜二百万金收买我们不良的同志来杀害廖先生，但是这二百万金倒变做我们的十倍的百倍的宣传费，促醒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弱小民族的觉悟知道帝

国主义的毒手段和真面目。

廖先生未遇害之前，知道有人谋不利于他的，因为汪精卫先生一星期以前，曾对他说过：香港帝国主义者要实行谋害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三人，那晚我们对廖先生说：何不添多一两个卫兵，他答我说："我们天天和人民接近，是防不胜防的，现在做中国人很好过吗？我自问无负于党，无负于国，无负于人，倘要暗杀，只好由他罢！革命党人说到牺牲，原是不成问题的。"同志！廖先生真是死了，生前固然是为党为国奋斗，我料他死也不能忘情于国于我同志。我敢说他临死时的心理，对于家庭并未有十分挂心，他最挂心者是国民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及国民党的同志不努力。廖先生不是对于家庭没有感情的，还是对于家庭有很浓厚的感情的，但终不如他对于党的国的感情之浓厚。我还记得国民党未改组之前，廖先生和越飞先生到过日本，回国后便提倡改组国民党，他多老是见得国民党非改组过，不会得到好的进步。那时很惹起许同志们反对，我曾把这个事问他，他便说："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假使我有三年的工夫，我敢决定国民革命一定成功。他们并不为党的前途打算，只为闹意气的反对，不必管他，我决要改组，不必计较这些利害的。"国民党已经改组了，廖先生原说过，给他三年的拚命努力，总可成功的。现在还不够一半的时候，当然还有许多未了的工作，和未实现的成绩，是在各位同志的肩膊上，虽然死了一廖仲恺，反激动我们成了许多的廖仲恺，帝国主义者要杀害我们是杀害不了的。

国民党改组以后，廖先生便注意提高农民工人的生活，但在杨刘时代，廖先生因为要维持黄埔军官学校，还极感困难，其他建设事业，越发无经费可言。但他曾说过，帝国主义者，抢去我们中国的金钱不少了，可以向他争些回来的。只有华侨和出口的丝业，我很想帮助岭南农科，再图蚕桑研究的进步；但现在政府经费全在恶军人的手里，只有付诸空想罢！

这是廖先生生前一件未了的意志。所以现在我便联合几个同志，创办一所"仲恺纪念公园及农工学校"除了教以普通知识外，还给他学生们一点改良蚕桑的学问，聊做完了廖先生一件心事罢！现在我将廖先生的遇害事实略略报告出来，还望各位发表良心上的主张。对于廖案人犯的结束，应该杀啊，还是应该赦啊，各位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见，说句公道话，我是不敢参加意见的。至于谋推倒国民政府的人犯，应该怎样从速判决，这不是我应该说的，我不敢过问。总之帝国主义者除主动杀害廖先生和陈秋霖先生，还亲手杀害我巡行沙基的群众。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不打倒，我们决不能成的国家，还要赶快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因为世界的弱小民族十二万万五千万，我中华民族是占弱小民族三分之一数。我们联合共产党是要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产党联合我们，是因为我中国人口占弱小民族三分之一数，因此我们与共产党必要合作，共同奋斗，打倒帝国主义，达到我们革命成功，进而世界大同。

下午二时，继续开会，谭平山主席。陈公博同志报告"青年运动经过"，甘乃光报告商民运动经过，何香凝报告妇女运动经过，毛泽东报告宣传工作；此三个报告，本期已载全文，兹不赘。

七

九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人数一百九十八人，主席谭延闿。刘重民报告上海政治状况及党务（从略），詹菊似报告海外党务，蔺语罕报告旅欧党务。海外党务已见本期所载"海外党务报告"，兹不赘。

下午二时，继续开会，出席人数一百七十人，主席丁惟汾。

主席报告：各种报告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已经由各代表介绍交由主席团决定如下：

甲，工人运动报告审查委员，黄平，刘重民，郭春涛，刘乐崧，刘伯垂。

乙，农民运动报告审查委员，陈公博，黄学增，易礼容，路友于，丁君羊。

丙，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

丁，宣传报告审查委员，邵力子，毛泽东，陈其瑗，朱季恂，范鸿劼。

戊，青年运动报告审查委员，陈公博，蔡川忱，侯绍裘，夏曦，李国暄。

己，商民运动报告审查委员，甘乃光，周明刚，杨章甫，李朗如，陈嘉任。

主席又报告：主席团为尊重海外代表意见起见，故海外党务报告审查委员会之组织，请由海外代表团推举委员，经大会通过。

范予遂报告山东党务。邓青阳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

八

十一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人数一百九十二人，主席邓泽如。郭春涛报告北京党务。于树德报告反动派近在北京设立伪执行部，及与日本公使馆发生关系。

丁惟汾报告北京执行部王法勤同志决不受反动派之勾引。同日下午二时，继续开会，出席人数一百八十八人，主席恩克巴图。冯品毅报告河南省党务。张晋报告东三省党务。董用威同志报告湖北省党务。这三个报告都有点长，尤以湖北报告为详尽，兹因篇幅所限，不备录。

九

十二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人数二百零三人，主席谭延闿。主席报告孙科同志昨已回粤，今日列席，请他报告建筑总理陵墓计划及筹备情形。孙科报告略如下：

总理陵墓之筹备，始于去年四月。其时由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委任张静江，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宋子文，林焕廷，陈去病等同志十二人，为总理葬事筹备委员，即设筹备处于上海，着手办理，并由筹备委员会指定余为家族代表。所有议决进行之事，均由委员会与家族代表商定后，始行办理，以资审慎。计进行程序，最先着手者，为圈地。圈地遵照总理遗嘱，陵墓须在南京城外紫金山。其地点经委员会暨家族等，迭次察勘，最后决定在金山南坡之中茅山，距明孝陵之东约三四里，形势甚佳。地点指定后，乃向北京内务部及江苏省署交涉圈地。委员会原意本拟要求将紫金山全部划定为纪念林园，以备造成一规模宏大之纪念森林，嗣以范围过广，恐不易成功，乃缩小圈地范围，西至孝陵，东至灵谷寺，南至锺阳路，北至山巅，计须圈地一万二千余亩。经函准北京内务部备案，并委托江苏陆军测量局担任测绘地图。此为去年六七月间，至八九月间，着手实行圈地时，江苏省长郑谦，忽以范围太大，恐引起地方人士反对为词，请于内部备案指定范围中，再行缩小，交涉结果，乃分两步办法：以经内部备案之界，为未来造

林地点，定为纪念森林界，现在所圈用之地，宜为陵园界，比原定范围，减为六千五百余亩。其地分为三种：一为官荒，完全属于国有，不须补价。二为公地，属于地方政府或团体所有，如江苏第一造林场，及义农会等皆是，亦不须补价，但柴草利益，仍归原机关所有。三为民地，须补价收买，其未经垦者，每亩只值三数元，已垦者十元至二十元。目前属于此项民地，尚未补价收买者，约一千二百亩，约价二万元。墓地圈定，筹备第二步，即为悬赏征求陵墓建筑图案。

绘图　征求图案，期限原定由去年六月起至八月底止，嗣复展期至九月十五截止。结果，应征图案三十余种，得奖金者三名，均中国人。首奖吕彦直，二千五百元，次奖范文照，一千五百元，三奖杨锡宗，一千元。现由委员会决定采用者，为首奖图案。式样采古制，以坚朴为主，墓与祭堂相连，墓为穹窿式，祭堂在墓之前，堂前为石阶，阶两旁有大空地，足站立五万人。陵墓形势，鸟瞰若木铎形。中外人士之评判者，咸推此图为第一，此次悬赏征求图案，在我国实为创举，有裨于我国艺术界不浅，故委员会特将征求经过，及所得图案，编刊专册，以备国人之览阅也。委员会于十月初聘定吕彦直为建筑师，约定以陵墓建筑价伸算百分之四为酬劳金，比常例略减。建筑师请以两月期间制备工程详图，故延至十二月初，始布告召求包工投标。

投票自十二月一日布告投票，至十二月十九日开票，应征者只得七家。最低价为三十九万三千两，最高价为六十万两．均超出建筑师原定预算．查其故，盖以此项建筑属于政府委托办理，且调查委员会尚无备款，恐不稳当，或将来难于领款，沪上营造家遂多不敢应征。而应征者开价均视普通工程为大，以浮开之数作为一种保险也。委员会廉得其情，乃迭与姚新记辛和记等直接交涉，要求减值，初以新义记取价三十九万四千两为最廉，颇拟允其承办．嗣查此确为新设字号，经验资本信用均差，乃转商诸其他姚新记，遂由原开价四十八万三十两，再次减至四十四万三千两，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签定承办合同，限于十四个月竣工。逾期每尺处罚五十两。付款则分十五期，于兴工后一个月始，每月付二万八千四百五十两。第十五期于完工后三个月付四万四千七百两。合约中并声明依照委员会议决，承办人与委员及筹备处职员，均不得授受扣用，及有其他贿赂式的交易，违者处罚．墓工合同既已签定，本月中当可兴工建造。故葬费拨款，不能不即行指定按月汇沪以免延误。余所以不俟兴工急行返粤者，即以此故也。

预算墓工承办价虽为四十四万三千两，但全部预算并不止此数。其详细预算，经委员会最近核定者，计如下列：（一）陵墓祭堂及石级工程四十四万三千两，（二）铜瓦铜门铜窗十三万两，（三）建筑师费二万二千九百二十两，（四）造像五万两，（五）头门三万两，（六）碑亭一万两，（七）三合土马路二万两，（八）卫灵室一万两，（九）石碑及雕刻一万两，（十）全部围墙五万两，（十一）圈购民地及种树一万五千两，（十二）筹备处一年经费一万两，合计八十万零九百二十两，伸算广东毫洋约共一百五十万元．较委员会成立时所拟定预算，实超出一倍。

当时预算全部经费，仅为大洋五十万元，约四十万两耳．但全部工程至速时期，仍须经过二年方能告竣．如政府能于两年内，每年筹拨四十万两，则此项计划，自可按步实施，不至延误也。

其他筹备事项，如修筑墓道马路，由中茅山坡南向直出，接连钟阳路，阔四丈，长六里，自十月兴工修筑，至去年十二月底，已全路竣工，所费仅七八千元，所以先修此

路者，系为利便运输建筑材料计。路面现铺石子，俟墓工完成时，将改造三合士路面，以资耐久。祭堂中拟建立十四尺高全身石雕刻真像一座。半年前曾从事访聘美术雕刻师着手造像。查北京有留法美术家王君，上海有雕刻师李君，暨赤克斯拉夫美术家高君，均愿担任造像。但所为模样，殊难毕肖。且高君索价十万元，造一石像。委员会以价昂，复恐不尽肖，磋商数月，卒未订约。最近议决仿悬赏征求陵墓图案例，悬赏三千元，征求远东各雕刻师应征造像，以示公开，而求完善。征求期限，定六个月，希望将来所得结果必佳。造像费：委员会现拟定为五万两，所有雕刻及石座均在内。墓与祭堂全部建筑，为垂久远计，俱以石材三合土及铜铁为之。所有木材及容易毁蚀之物均不用。故所费甚巨。至于陵墓必备之一切碑铭传记等文，委员会已推定吴稚晖，张静江，汪精卫胡展堂诸同志，担任拟撰。并推定谭组安，于右任，张静江诸同志担任书字。此事关系颇重要，亦同志们所欲知者，故并报告于此。

次，吴玉章报告四川省党务，刘伯垂报告汉口市党务，周启刚报告古巴及墨西哥党务。

下午二时继续开会，出席人数一百八十九人，主席汪精卫。王健报告澳洲党务，许甦魂报告缅甸党务，邓范生报告南洋荷属党务。

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惩办廖案要犯案。说明：仲恺同志为赞助总理改组本党之最得力者，于本党改组后，除努力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实力参加工农运动外，对于军政财政之统一及政府之改组，亦主张最力，因此死于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之手；所幸凶手之一部分业已捕获。此一部分之凶手，大会认为国民政府应即从速从严分别罪之轻重，尽先处决；其余凶手捕获后，亦即按照大会决定之原则处决，处决后应即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并通告全国。是否有当，尚希公决。

决议：由国民政府催促廖案审判委员会于三日内将处断廖案要博报犯办法及情形，报告大会。

又议决照提案审查委员会所提纪念廖仲恺同志办法原案通过。

又议决照提案审查委员会认可设机关保护华侨案原案通过。

又议决褒杨韦德烈士办法：由大会赠银二千元，以一千元为韦德烈士追悼会用，一千元抚恤其家族。

十

十三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人数一百九十七人，主席丁惟汾。袁同畴报告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党务，许鸿报告江西省党务，夏曦报告湖南省党务，宣中华报告浙江省党务，陈博报告日本总支部党务。

杨匏安报告廖案审判委员会近因委员出外探查此案，致不能开会，职务停顿，要求大会设法勖助；讨论后决议，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赶速将各犯供词，及搜得证据，报告大会，再付讨论。

下午二时，继续开会，出席人数二百十一人，主席谭延闿。

宣言草案，全文通过。

弹劾西山会议案，议决交审查委员会分别惩处。

通过吴玉章提出之本党对外政策进案，（一）与苏俄切实联合，（二）扶助弱小民族，（三）联络世界上的革命民众。其原文如下：

我们知道中国的问题，要放在世界问题中，才能解决。我们又知道世界的问题，要

世界各国被压迫阶级，自已联合组织起来，彼此互助才能解决。我们总理在民族主义演讲中说，“自俄国新变动发生之后，就我个人观察已往的大势，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的大战，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与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我们总理观察世界的大势是何等深刻，何等高明。所以他为本党定了对外的三个大政策：第一就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第二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第三就是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党。总括来说，就是团结一切被压迫民众，来和帝国主义者拚命。这种伟大的政策，应该如何进行，才能达到目的，是本党党员应当深为考虑，而尤其是我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总理遗教之时，所应当决定进行方略，以实行总理政策的。玉章以为本大会应决定以下三个进行方法：（一）与苏俄切实联合。俄国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成立了世界上一个最新的国家，他的政策和本党一样，是要联合世界上被压迫阶级，推翻一切强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所以总理为本党定下了联俄的政策，是想得到很好一个帮助，来谋我们中国民族的解放，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我们继承总理联俄的政策，应该更进一步，由本党政策与苏联政府作更密切的联合，切实进行本党的主义。（二）扶助弱小民族。联合弱小民族的口号，久已遍传各地，但是空空洞洞说联合两个字，是不中用的，必定要切实扶助，并且要使他们自已觉醒，自家奋斗，去图解放，才效有力。本党应于广东设一孙文大学，罗致弱小民族的革命分子加以训练，使有自动的能力，并且由侨寓各弱小民族地方的党人，努力于该地的联合运动并派专员负调查联络的责任。（三）联合世界上的革命民众。帝国主义者国内的民众，有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对抗堡垒，他们被压迫的民众，也是时时要革命的，他们常常表同情于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不过我们中国的情形他们是很隔膜，并且有帝国主义者的报纸，淆乱是非，妨害我们的联络。所以本党应该办各种各国文字的报纸，来作宣传，尤望我华侨诸同志，特别努力，一方面由本党派出专员，从事运动，积极进行，才能收联络的效果。以上所提三事，是否有当，请大会公决。提出者：吴玉章。连署者：陈公博，朱克靖，唐际盛，邓懋修，刘泳恺，路友于，陈其瑗，许甦魂。

大会又议决，对于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事，决定办法如下：（一）高要县，令国民政府火速派得力军队前往救护农民，解散匪团，缉拿祸首，召集流亡，抚恤死伤，赔偿损失；（二）中山南海两县，通缉凶手，解散通匪民团，抚恤死伤。大会又分电各县农民协会慰问。

十一

十四日，上午十时开会。主席汪精卫。出席人数，二百十七人。

是日有来宾四人到大会演说。安南革命同志王达人报告安南民族被压迫状况，及对于本党之希望；由李富春同志翻译。高明革命同志吕光，报告朝鲜民族被压迫状况，及对于本党之希望；由范鸿劼同志翻译，印度革命同志哥巴清报告印度民族对于本党之希望，由王志远同志翻译。

刘侯武同志报告安南党务。廖案检察委员会报告廖案情形。

大会又议决，由国民政府严令国民革命第五军及广州市公安局，限一月内缉获廖案要犯朱卓文。又加派林祖涵，王懋功，沈应时，卢兴源为廖案审判委员。

下午二时继续开会，出席人数二百〇九人；主席于惟汾。

凌棠报告印度党务，彭泽民报告南洋英属党务，郑受炳报告南洋英属党务，张伯荫报告菲律宾党务，关素人报告加拿大党务，林昌炽报告香澳党务。

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

十二

十五日上午十时开议，出席人数二百十一人，主席谭平山。

讨论工人运动决议案，决议加推蒋先云廖划平唐际盛张国国高语罕罗介夫等覆议。

下午二时继续开议，出席二百〇四人，主席谭平山，

通过修改总章案。并推定陈其瑗等五人为整理增修条文审查委员。

主席报告明日举行投票决选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

十六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一百二十六人，主席汪精卫。

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及青年运动决议案。

大会通过赠送广东大学校训，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十二字，以代旧有之“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字。

通过宣传提案及党务提案。

下午二时继续开会，出席二百五十三人，主席汪精卫。

韩麟符报告二特别区党务，李裕同志报告蒙古党务，许卓然报告福建党务。

主席报告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决选投票，推定詹大悲，杨匏安，韩麟符，韩克温，胡秉铎，乌天民为监票员；冯拜言，韦义光，甄邦翰，莫云龙为收发票员；许甦魂，杨阎公为开票员；梁寒操，张企留，胡宏让，刘醒华，裴文英，卓薛汉为记票员。

大会通过工人运动决议案。

十三

十八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二百十一人；主席汪精卫。

主席报告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决选结果：

（执行委员）汪精卫二四九票，蒋中正二四八票，谭延闿二四八票，胡汉民二四八票，谭平山二四六票，宋庆龄二四五票，陈公博二四二票，恩克巴图二三七票，于右任二三四票，程潜二三四票，朱培德二三一票，徐谦二二四票，顾孟余二二二票，经亨颐二一八票，宋文子二一一票，柏文蔚二〇一票，伍朝枢二〇〇票，何香凝二〇〇票，丁惟汾一九七票，林祖涵一九六票，戴季陶一九六票，李济琛一九六票，李大钊一九二票，于树德一九〇票，甘乃光一八八票，吴玉章一八六票，李烈钧一八四票，陈友仁一八四票，王法勤一七九票，杨匏安一七六票，恽代英一七二票，彭泽民一七〇票，朱季恂一六六票，刘守中一五九票，肖佛成一四九票，孙科一四一票，（候补执行委员）白云梯二零一票，毛泽东一七三票，许甦魂一七二票，周启刚一七〇票，夏曦一六八票，邓演达一六七票，韩麟符一六五票，路友于一六五票，黄实一六三票，董用威一六二票，屈武一六二票，邓颖超一五九票，王乐平一五八票，陈嘉佑一五八票，朱霁青一五七票，丁超一五五票，陈其瑗一五五票，何应钦一五一票，陈树人一四二票，褚民谊一四一票，缪斌一三三票，吴铁城一一一票，詹大悲八十四票，孙科五十八票，（监察委员）吴稚晖二二六票，张静江二二三票，蔡元培二〇四票，古应芬二〇三票，王宠惠一七九票，李石曾一七九票，邵力子一七三票，高语罕一六七票，柳亚子一五八票，陈果夫一五七票，陈璧君一五五票，邓泽如一三五票，（候补监察委员）黄绍雄一七六票，李宗仁一六七票，江浩一五九票，郭春涛一五八票，李福林一五三票，潘云超一

四九票，邓懋修一四八票，谢晋一三〇票，

农民运动决议案增推代表协同原案审查委员覆议。

修改总章，通过，

大会又决议：（一）鲍罗庭顾问辞职案，由大会致书继续聘任。（二）何香凝同志动议，请大会令国民政府将议决之依照党纲修改法律案，于半年内修改完竣案理由。谓敝代表等提议，请令政府依照党纲修改法律案，虽已通过，但恐修改期迁延过长，则妇女之希望难达到，谨请令饬国民政府从速修改，至迟是半年内将法律修改完竣。（决议）众无异议，通过。（三）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追认开除反动份子邓家彦杨希闵刘震寰等三人党籍案。（决议）开除党籍交国民政府惩办。（五）否认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案。（决议由大会将第二届中央执行监察各委员当选名单，通电全国，並声明二事；（一）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非本党的正式机关。（二）以前各地执行部一律取消。

下午二时至五时四十五分，继续开会。出席人数一百九十六人，主席汪精卫。议决(一)商民运动报告议决文通过。（二）中央宣传报告决议又通过。（三）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决议，通过，交国民政府办理。（四）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文案通过。

十九日上午十时开会。出席人数二百零二人，主席谭平山。主席团提出大会对于时局宣传大纲四项：（一）维持国民军名义，（二）反对恢复约法及曹琨时代所制宪法，（三）本党须领导国民军，及反奉天之各种势力，暨各种职业团体，以组织国民政府，此政府须召集国民会议之责任。（四）此次日本出兵满洲，事实上已使我国在满丧失主权，应联合各界一致反对。决议，通过。

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国民政府财政部财政提议案。决议，通过。

惩戒西山会议诸人及违犯纪律各党员两案，通过；原文见本期，兹不赘述。

大会又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海外党务决议案。

主席团提出散会时高呼之口号：（一）实行总理遗嘱，（二）实行三民主义，（三）实行本党政纲，（四）打倒帝国主义，（五）打倒军阀，（六）打倒一切反革命派，（七）集中革命势力以统一全国，（八）中国国民党万岁，（九）世界革命万岁！

十四

二十日，下午二时，二次大会举行闭幕礼。汪精卫主席。主席致闭幕词时，场中弧光电灯齐明，预备之活动影片摄影机向会场四面摄影，以留永久纪念。汪主席之闭会词，录如下：

> 各位同志，今天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日子，这次开会，从元旦到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时候了。这回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不同的是，这回没有总理在场的指导，这二十天里头，总理的精神是时时刻刻在上头指导我们的，（鼓掌）然而这回的代表大会，是真真的全国代表大会，（鼓掌）除了十八省的代表以外，东二省内蒙古三特别区域，通通都派出代表来出席，还有海外的代表，从国外回来，所以说这次大会，是真真实实的全国代表大会，（鼓掌）这一年来的进步，就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的惨淡经营的结果，也是同志们奋斗努力得来的。（鼓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十三年一月举行，到现在两年的工夫，已经有这种进步，因此可想将来第三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也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努力，定得更大的进步了。（鼓掌）
>
> 在这二十天当中我们由我们所讨论的种种提案实见着很好的精神表现出来？就是各位代表，都是一心一德，忠实诚笃的来实行总理的主义，即总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手定

最低限度的政纲，也是完全继续实行，所以第二次大会，对于第一次大会宣言内主义之解释及政纲没有修正。第二次大会的精神，就是在讨论实行第一次大会宣言内主义及政纲的方法。（鼓掌）

第二次大会所讨论可以分作两大部分，第一是接受各地党部的报告。就是把各地同志两年来的工作，一起审查，并做成决议案，这种决议案，就是指示党员工作的方针，告诉同志怎么去实行主义的方法。（鼓掌）

二，是讨论种种的提案。概括说来，我们所讨论的就是实行主义及党纲的方法。

三，我们革命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宣传与事实不能一致，尤其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感受最痛苦的，就是当时的事实，与我们的宣传，确实不能一致，不把事实来改变，是不能宣传的；但是想把事实改变，却又必先努力于宣传。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是我们觉得非常痛苦的事。但是我们觉得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痛苦中感觉得的愉快就是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宣传，许多都已变成事实。(鼓掌)固然我们现在所希望所讨论和所宣传，还未能和事实全然一致。但今后我们也惟有不断的努力，使我们的宣传成为事实，这就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责任。我们知道自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稍有使宣传成为事实的，是全国各处同志努力的结果，因此才有这回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既经闭会，以后我们便要拿原有的事实做基础，把一切现在还未成事实的种种政策，一一实现起来。（鼓掌）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统一全国。（鼓掌）我们最少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实行总理遗嘱中所说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两件事。（鼓掌）现在因为我们全体党员动员的结果，已经发现了帝国主义者的裂痕，军阀的崩溃现象。这种裂痕，这种崩溃现象是什么人把他裂开令他崩溃的呢？就是我们全体党员把他裂开令他崩溃的。（鼓掌）我们又看见世界很多弱小民族的抬头，中国许多民众和军人的觉悟，是什么人使他抬头，使他觉悟呢？也就是我们全体党员使他抬头，使他觉悟的。（鼓掌）我们要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至少要能够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都放在本党主义领导之下。（鼓掌）我们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至少要在武昌南京北京举行。今天是闭会日子，大家就要分别了，我们希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汉口北京相见。（大鼓掌）

汪主席致闭会词后，掌声如雷动。后有代表韩麟符高语罕劳先鞭王兆惠恽代英谭伯山等演说。后高呼口号，摄影而散。

十五

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十三日中，备受广东各界人民之热烈的欢迎，略举数者，则有四商会之欢迎，有省农民协会之欢迎，有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之欢迎，有广州学生联合会，岭南大学之欢迎，有新学生社及香港学生联合会之欢迎，有航空局，军事委员会之欢迎，有市政厅之欢迎，有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之欢迎。至于所接各方贺电，尤不胜缕飒。中国国民党二次全国大会之意义深重，即此亦可表见了。

（选自《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

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

1.国民党自孙中山死后，内部有冯自由、谢持、居正、马素等之反动，继之以戴季陶修改革命的中山主义之宣传，邹鲁、林森、叶楚伧、邵元冲等西山会议之发起与孙文主义学会之组织，莫不挑起党内左派、右派、反动派的重大纠纷，酿成党的严重恐慌，同时影响于革命政府的动摇，如滇唐侵略、刘杨之役、省港罢工、仲恺之死等，几乎颠覆了广州的革命政府。在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等，莫不欣然预计中山死后国民党必然分裂，广州政府必然崩坏。他们把国民党只看作是中山一人的国民党，把中国的革命只看作是中山一人的要求；他们不相信中山死后国民党革命政府还能存在，更不相信国民党革命政府还能转〔较〕中山在日更大发展。他们用尽一切的阴谋援助党中的反动派、右派向党捣乱，资助一切反动势力向革命政府进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他们以为是没有开的希望了，即令有可能也一定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不知要闹许多风潮。然而现在事实的证明，他们一切的期待一切的努力都失败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很好的开成。所以我们对于这次大会的成功，应努力宣传：

A．这个成功是表示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是证明中国的民族运动不因中山之死不因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阶级勾结党中右派、反动派捣乱而消灭。

B．这个大会，在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上是极有价值的。

C．这个大会，是整个的统一的大会，是唯一能代表全党的大会（海内外有组织的各地均派代表与会）。同时证明少数反动派、右派捣乱之无能为，证明他们的行为不是什么党的分裂，只是这班人背叛了国民革命被淘汰出去。

D．这个大会是真能接受中山的遗嘱、真能继承第一次大会的宣言和政纲的大会。

E．说明在这次大会中经过的好现象，右派、反动派并无力捣乱，而左派与共产派的关系非常之好，双方并没有什么意见，仍一致的协作。

F．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一切材料，特别是宣言及各种决案。我们宣传这次大会的成功就是宣传左派的成功，宣传大会的一切材料就是宣传左派的思想和政策。

2.我们现在对于国民党工作，应该懂得下列几个主要策略：

A.C.P.与国民党合作政策：仍当继续从前的政策，与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竭力赞助左派发展革命运动的工作，竭力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同时，又要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因为左派的发展是要以C.P.为核心的，离开了C.P.绝不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国民党左派。

B．左派与右派的联合战线：为对付目前的反动政局，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勾结直奉军阀

的联合进攻，为增强国民会议宣传的势力，我们应建筑一民众团体的联合战线，我们要在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中去减轻右派的反动力量，去拉住一部分较好右派首领，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众。实行这个策略须注意下列几点：

一、在现时中国大革命的高潮当中，没有确定的右派，因为确定的右派一定要成为反动派。现时右派的首领，多是很动摇的，常常徘徊于革命政策与反革命政策之间；尤其是右派下面的群众，性质更不固定。所以我们对于右派的政策，决不能笼统的把他看成与左派敌对的固定的组织，更不能逼他团成一气，把他看成整个的对象来攻击；我们要努力使他们逐渐分化，好的走到这方面来，坏的驱逐出国民革命战线之外。联合战线的政策便是由此产生。

二、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反对右派的口号、策略、努力宣传左派；一方面又要讲联合战线，这本是很冲突的事。过偏于前者的宣传，一定是减少行动势力；过偏于后者的联合，一定是破坏革命的行动。因此，必须应用得当：（A）联合战线不是注重形式的联合、机关的联合，而是注重增进行动的势力，不放过一切行动的机会可以取得的一切势力。（B）在思想政策的宣传上绝对不能让步，应努力痛斥右派的错误；在行动上则力求取得其合作（如对于反日出兵之示威运动，国民会议促成会之进行等等），以壮大运动的声势。

三、应设法抓住右派中比较左倾的领袖，应把他放入各级组织之内，使他在左派势力包围之下，不要让他站在组织以外；因为使他站在组织以外的结果：（A）可以影响一部分群众离开党，激起他们另自结合；（B）或成为反动派利用号召的工具。

四、在联合上部首领的工作当中，切不要忘记是要借此以打入下部的群众中去，是要借此以引起一切的行动，从行动中证明我们政策的正确，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众；倘若仅注意上部的形式的联合，则这种联合是无用的。

3.参加大会的代表回转本地后，应即依照民校第二次大会议决及本党政策，与该地区委或地委详细订出该地发展民校工作的计划，预备召集全省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应努力多找左派分子参加，并应选出一些左派分子在党部负责工作。

4.在宣传工作上，除上面所指出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成功，努力宣传这次大会的一切材料外，尚有应注意者数事：

A．要有计划的切实管理各地民校的出版物。

B．赴会代表应努力宣传广东政府的成绩，宣传广东政府的成绩也就是宣传左派的成绩，宣传左派政策的成功。

C．在解释三民主义中，应根据第一次第二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小册子。说明要用如何的方法如何的力量才可以实现三民主义，指出戴季陶思想之错误，国家主义之反动。

D．少说抽象的理论，多注重事实的宣传，如大会的经过，广东革命政府现状等，这都是可以实际打消右派、反动派的造谣的。

E．对于西山会议分子，大会虽已决定分别处罚，各地代表回后，仍可宣传他们的罪恶错误，并可作成决议或宣言，请求中央依照大会决议严格执行，令这班人在两月内有明白悔过的表示，否则请中央开除。

5.这次大会表示出国民党左派之胜利，我们以后更应努力扩大左派的群众，坚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也就是坚固国民革命的进行。同时，我们在这种扩大左派组织的工作中，须注意下列数事：

A．发展左派仍当以C.P.为核心，同时要扩大巩固C.P.的组织，因为离开了C.P.，一个国

的民党左派是不会形成的。

B．在许多地方，从前只作了利用国民党机关的工作，尚没有真正形成群众的左派组织，以后须努力充实。

C．应该在商人中、农人中、学生中、军队中、妇女中、各种群众组织中，去努力发展左派的区分部。

D．应该注意青年学生在国民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必须特别巩固左派在学生群众中的组织。

E．工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必须使之了解民族革命不可离开阶级斗争及民族革命的党和阶级的党之不同地方。

F．从现在到中山死后周年纪念（三月十二日），应该有系统的规划出扩大国民党左派应有的工作，要利用这一短期机会使左派的组织更为巩固。

6.此次全国大会已规定各地党部的经费按月发给，同时并说明关于经费使用的原则应该是多用于运动上而少用于机关上．倘若某个地方只说起许多机关安置有许多领薪水的人，而实际运动做得很少，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7.各地须在本月内，将该地发展民党工作计划并现时该地民党状况，作成报告图表，寄给中央，望勿迟延。

钟　英①

① 钟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特别会议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见本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56—57页。——编者）

中央地址问题

一、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的中心，中央须在何地才能执行党目前这一重要职任。

二、党在最近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同时须顾及北方上海已得到的民众运动工人运动的基础；中央所在地必须能顾及上面所指工作，才能尽党整个的使命。

三、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Ａ．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Ｂ．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Ｃ．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愈发展的群众大党。

四、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惟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万一不幸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

五、中央若在北京以四同志组织中央局；二同志在粤组临委，上海设交通局。

六、C.Y.中央与C.P.中央同住一地。

七、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

国民党工作问题

一、以往各地对于民党的工作，都只做了仅仅成立②民党机关的工作，而尚没有使这机关去集聚大群的民众，以后应极力注意改正。

二、当努力宣传二次大会的成功，宣传广东政府，极力发展左派的群众。

三、在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醒狮派等更反动的势力斗争中，对于右派采用联合战线的政策，去取得他下面左倾的分子，去分散右派下面的群众，去暴露右派首领的罪恶。

四、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的工作，当在各地用民党名义迅速发展农民运动。

---

①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附录的这个文件中“主”字为“重”字。

②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附录的这个文件中，“仅仅成立”四字为“利用”二字。

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

一、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在别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军阀，已逐渐崩坏，在崩坏的过程，逐渐分化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此种势力常表现反抗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如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国民军，奉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郭军——现时之魏益三部。因此中国C.P.的军□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二、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但是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

三、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军[①]，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

四、为执行以上的工作，C.P.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特殊的必要；并且在北方以往的军事工作都是临时应付，因此中央对北方军事工作应有个系统的计划。

广东问题

一、平山赴莫问题：——往返限定三月回粤。

二、K.M.T.中央要求与C.P.中央时开联席会问题：——不能称为联席会，不是许多中央委员参加，不把他的性质看得很严重，是决定政策的会议，只是随时遇有纠纷可互派代表商量解决的仲裁会议。

三特区工作问题

三特区目前应解决的一个急要问题，就是农工兵同盟会的工作问题，根据北方区报告所得的结论：

一、本来我们是想利用此种组织，去集聚西北散漫的农工兵群众，为西北民众运动的基础。但是过去工作同志的工作，是夸大而不切实，没有了解这是党的一种群众工作，而只注意是招集土匪的军事运动，发生很多的错误，只是替国民军招收了一大批土匪式的军队，自己的工作全没有基础。

---

① 原文如此。

二、三特区最主要的群众是农民，为组织农民可无须乎同盟会去号召，可用农民协会的旗帜，比较更明确与切实，现在应该结束同盟会的工作，转到农协的工作；绝不能够再去发展同盟会，只是利用同盟会已得的一点线索，去做农协及国民党工作。

三、农工兵同盟会中的蒙古群众，可加入内蒙古国民党或中国国民党，极力发展中国国民党工作，并须保持与内蒙古国民党友谊的关系。

四、北方区须派一得力同志去指导三特区工作。

五、以后三特区内蒙古国民党及农民运动工作凡有相关的问题，由国际所派蒙古代表与北方区会议决定。

河南问题

一、豫陕区委重新改组。

二、豫陕区目前应注意的工作：A.立刻建立党的秘密基础。B.立刻建立工会农会秘密组织，加紧注意农运工作。C.注意军事工作，为对付目前战争指定七人组织临时军委应付。

三、劳动学校暂时停办。

四、关于河南同志取消区委书记决议案。

中央特别会议，听了中央报告豫陕区几个同志排斥区委书记Z.F.同志的情形之后，——这种情形是经过中央长期的郑重的事实上的调查和考察的，认为：一，Z.F.同志在河南做区委书记的工作，固然非常努力，并且各方面都有成绩；可是因为中央所派的区委委员，有几个以不得已的原因而不能即刻到任，以致于区委的组织不健全，于是Z.F.同志执行职务的时候，往往在组织上手续上有疏忽或不适当的地方。二，Z.F.同志在指导工作的时候，有时对于同志的态度不大好，平常时候他的个人生活上又不免有些浪漫的不检点的地方，足以引起一部分同志对于他——负重大责任的区委书记发生猜疑，因此在工作上便生出不好的影响了。在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之后，Z.F.同志自己既没有看清事态的严重，当然也就不曾将详细情形报告中央，以便设法即时解决，而任其酝酿，因此Z.F.在这几点上，的确有疏忽和错误的地方。

但是这少数不满Z.F.的同志，在这种情状酝酿既久之后，竟趁Z.F.同志因为党的工作暂离河南的时候，召集所谓区委会议，贸然议决停止Z.F.职务，不等中央决定，对他的弹劾案也在这种非法越权的议决之后才提到中央，中央特别会议认为这些同志的行为，显然违背纪律，决定对他们下极严重的警告。这些同志都应当明白自己的极大的错误，中央审查他们对Z.F.的弹劾案中各条，认为Z.F.同志除上节所述之疏忽或错误外，别无甚么严重的错误，这已经在审查双方的报告和意见完全证明，他们自己也都承认本来决无受停止职务的处罚之理；况且这些同志擅自议决停止Z.F.同志的职务，完全破坏纪律，这却是严重的错误。

再这些同志之中尤其是C同志，他的行为既已放浪，并且不但不接受郑州地方书记M.同志的批评，反而在京汉路党团会议上公然乱说党中分裂两派，以此鼓动不明白事实的同志反对Z.F.和M.同志，这种行为和态度，几乎可以说是自绝于党，应受留党查看三月的处分。至于M.同志于正式以党的名义批评C.同志之外，还在私人谈话中随意说及，亦有不谨慎的过失。

凡此一切都是共产党所不能容许的，一般同志都应当明了注意，使党内不再发现这种现

象。

中央特别会议根据这一决议，特别委派中央候补委员W.X.P.同志和豫陕区委对于该区一般同志详为解释。

铁总问题

一、铁总党团与各地党部的关系问题，交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拟出详细明文规定。

二、指定U.同志为铁总党团书记。

五一节在广州召集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第一次革命军人代表大会问题

劳动与农民大会决定举行，革命军人代表大会因无可能不召集。

开办最高党校问题

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

应付目前北方战争的宣传问题

一、认定此次张吴胜利，国民军在北方失败，将来到一长期的反动，给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重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国民军若能守住北方，待至数月后广东政府北伐，必能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目前的战争，实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

二、过去全国对于反吴的宣传做得太少，特别是北方尚没有充分的在群众中的煽动，国民党须速成立一宣传委员会进行此项工作。

三、指定秋同志起草通告，特同志起草宣传大纲，口号是：反对卖国军阀，建立和平，召集国民会议，在这三个口号之下要求冯玉祥出山。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

——关于中央特别会议[①]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各级同学们：

最近中央局因下面两个顶严重的问题，在京召集特别会议，这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是：

1.仲甫同志因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同时，上海地面反动势力日愈严重，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右派、醒狮派、工贼，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中央局处在这困难情形之下应赶急设法对付。

2.现时的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国民政府、人民进攻。如果吴张势力战胜，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动的局面，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军作战，处于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也许因此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势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所以现在这个时期实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我们应迅速认定什么是我党目前在政治上第一的责任以及如何支持北方的危局，如何巩固广州国民革命的根据，皆是急待总合南北同志的报告而速决定的问题。

到会同志十二人，计中央委员七人，C.Y.代表一人，北方区重要同志二人，粤区重要同志二人，开会二天[②]，会议七次，自二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四号，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会议问题遂集中注意于目前的政局与我党主要的职任一案，会前中央及南北负责同志已有数日的非正式讨论，正式开会时反复辩论又经二日方始作最后的结论。

这个会议，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他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广东政府不幸而失败，则中国将经过一长期的反动，给中国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打击。北伐的号召不是什么护法护宪，而是真能解放农民的痛苦；中国的革命、工人固然占着领导的地位，然非更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不会成功。全国农民现已走到一个准备暴动的时期，所须要的就是我们去组织，所以我们说准备广东政府的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二天”似四天之误。

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在"关于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这决案中详细分析：1．"五卅"以后全国各阶级联合反帝运动战线之逐渐分化崩坏，工人阶级日陷于孤立隔离地位；2.要引导国民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是取得农民的援助，造成工农势力的大联合；3.从工作的经验来看，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能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政权推广及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第一等重要问题；4.现时是英日张吴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向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进攻，倘若得胜，必继续推翻广东政府，所以现时在北方应该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抵御这个反〔进〕攻，才能维持民众运动。在北方比较自由的基础才能为广州北伐的接应；5.广东政府只有北伐才能扩大中国的革命运动，能使自己免于孤立，所以这次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革命势力的往北方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

在这个决案内，特别指出广州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政府北伐关系之重要以及农民问题在现时之特别严重，这两点非常重要。不维持住北方国民军的局面，以接应广州政府之北伐，则广州政府必陷于孤立；不努力取得农民，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则工人亦将陷于孤立。然而各地同志在执行这决议案时，须注意勿生出下列之误解：1.只注意广州工人农民运动工作，而放弃其他工作；2.以为有了国民党国民军的政权，而后可以发展工农运动。这个决议案的真意义要使同志们对于广州政府农民运动国民党国民军政权之重要格外深切了解，在党分配他的力量时轻重缓急有所选择，但并不是叫我们只注意广州工作，农民运动工作。非有全国各地革命宣传的响应，则广东是孤立的；非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学生、商人之参加革命，则工农联合战线亦是孤立的。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所在之地方，固易发展工农运动，另一方面，也只有工农运动的发展，更能促进国民党国民军政权格外左倾。望各地同志于执行以上之决议案时十分注意。

关于中央地址问题，须视何地能更便利的执行党在最近将来之重要使命，能顾及党的全部工作，能建立党的中央完密强固的组织，会议决定，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决移北方，而于上海设交通处，广州设临委，如北方政局反动，则移粤与否尚须讨论。

此次会议，又决定于"五一"节日在广东召集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农民大会的意义更为重大，望各地已有农协组织之地，迅速发展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立刻准备代表和搜集到会讨论材料（北伐路线必经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为重要）。未有农协组织之地，亦用从速着手进行，并努力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一切材料，以供党决。

议事日程共有十一项：1.现时的政局与党的重要职任；2.中央地址问题；3.国民党问题；4.北方军事政治工作问题；5.广东问题；6.三特区工作问题；7.河南问题；8.铁总问题；9.五一节在广州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劳动代表大会问题；10.设立长期党校问题；11.反吴宣传问题。兹择关系比较重要而且普遍之两决议案附录如后：①

（本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55—56页，
文字不准确，故重印此件。——编者）

---

① "两个决议案"此处未录，见本期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之《现时政局与共产党主要职任决议案》和《国民党工作问题》。

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
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事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兵士、小商人及一切革命的民众！

一九二三年“二七”残杀京汉铁路工人的刽子手吴佩孚，现在又破坏全国的反奉战线，转而与全国共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等联合，进攻反奉战争的友军国民军了。这是反奉战争起后中国政局上最大的变动——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转而成了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势力的局面。此局面若继续下去，则在中国将被一黑暗的大反动统治着、英、美、日的代办吴佩孚和张作霖将镇压住这几年来，特别是“二七”以后，勃发而日益增长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而造成远东的黑暗局面，危害于日在发展的全世界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把吴佩孚此次联奉反攻国民军这一件事的危险，在全国革命民众面前指示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向是站在全国革命民众前面的：我们于每次政局变动时际，都很明显指示民众以政局的趋向及民众应有的努力。我们在反奉战争初兴时，即指明爱国的民众是反奉运动大潮中之主潮，民众应该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到奉系军阀因革命潮流的逼迫而成郭松龄之倒戈，我们亦已指明全国革命的民众应该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结果，因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和吴佩孚的暗中破坏反奉的联合战线，以致奉系军阀仍然得保其残喘而与吴佩孚联合起来。这也是因为在这几个月的战争中，革命民众未能积极行动之所致。现在的局面更加危险了。全国革命的民众此时正处在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决战的时机，若不急起向吴佩孚行总攻击，则任这局面发展下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受的打击将不堪设想了。

全国的革命民众！我们再不能迟疑了。我们应该积极的行动。向吴佩孚行总攻击！吴佩孚是奉系军阀之最后的拥护者。打倒吴佩孚——这不啻是严重打击奉系军阀的势力，这也即是扫除国际帝国主义压服中国民族一种有力的工具。我们应该一齐起来集中于这一步工作——打倒吴佩孚，援助国民军。国民军此时正在直接抵御吴、张反动联合的进攻，民众要肃清反动势力，必须援助这一支军队。而民众自身也应该迅速崛起，向反动的吴佩孚作大规模的示威，并集合在一种行动的组织之中，表现自己的势力，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督促国民军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在这状况底下，尤其是武汉的民众和河南的民众，更应该特别努力实行驱逐吴佩孚并努力参加反吴的战争。同时，我们即应进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于吴系政客一切护法护宪的主张，自然都是我们所应该根本反对的。

全中国一切革命的民众，快起来——

打倒吴张的联合！
打倒吴佩孚！
打倒张作霖！
打倒英日等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二十四日）

一、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潮流已渐由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近于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在别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军阀，已逐渐崩坏，在崩坏的过程，逐渐分化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此种势力常表现反抗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之反动军阀，如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国民军，奉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郭军——现时之魏益三部。因此中国C.P.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抵抗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军事工作，目前在C.P.里已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C.P.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二、现在北方的国民军，便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尤其是其中之更左派。但是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

三、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

四、为执行以上的工作，C.P.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尤其在北方更感觉有特殊的必要；并且在北方以往的军事工作都是临时应付，因此中央对北方军事工作应有个系统的计划。

（原载《校刊》第六期，1926年5月1日）

李大钊给冯玉祥的秘函

奉（张作霖）鲁（张宗昌）孙（孙传芳）三方的兵力如下：（一）保定一带有兵五万，后方为万福麟。（二）五原之兵，现调北京。有骑兵四旅，步兵一旅，山西接防。包头五原，有两步兵师，一骑兵师。（三）张家口有两旅。（四）北京有兵一万五千。总计奉军关内兵力，约有十万。至直、鲁军在南京浦口者有一万五千人。在泰安徐州者有九万人，尚有两骑兵旅。天津青岛亦有若干。孙（传芳）军分二部，总共三万五千人乃至四万人。安徽有三万人以上。奉军作战计划，将出兵河南。建议（冯）出长安会师郑州。

（选自《人物》1980年第4期）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我与冯玉祥同行到库伦已三日，因为许多事都在积极进行，不能立即得到结果，故今天才做报告。我在库伦所进行的事件之最大者撮举如下：

一、促冯电催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速派孙、东两大中国学生四十人(内派女同志十人)速到国民军中工作。此事冯完全同意于我，但是俄顾问主张只来二十余人，将就我在莫时所提出的名单，再加上几个女同志，这还是我同他力争的结果。他初先主张只来二十人，他的理由：一因莫地中国同志们均未成熟，不能多派人；二因国民军退守包头、丰镇，政治工作的范围较前缩小，其实都不是有力的理由。

二、建议于冯请求职工、农民、妇女三个国际各派一同志到国民军中作工、农、妇女等运动指导人才，并向第三国际请求转派英、法、德三国共产党党员各一人到国民军中作指导研究国际问题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他们本国的分析。前一项俄顾问完全同意已去电请求。后一项俄顾问只同意派一人指导国际问题的研究便够了，而我则以为一人研究国际问题，不如三人分门研究之较为深切。尤其要趁机会多参加外国同志到国民军中去，使国民军全部都渐次有世界革命的知识，进一步渐次国际化，同时足应付国民军政治工作之扩大。

三、建议于冯在国民军中办一政治画报，由苏联方面聘请美术家二人，由中国方面聘请我们的同志三人共同主持。又，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处就中选择二处出两个日报，作为国民军的机关报（冯在莫时曾向我提及过，我在此时促其实现。但不说明是国民军机关报，这是冯一再告诉我过的），其计划由冯电请独秀同志（另有信说明由苏联领事馆转）办理，以后一切均听其主持。关于前面所说由中国方面聘请我们的同志三人，必须把吴潮铭同志（去年由东大回国的）派来，余二人也要找比较高手且有政治头脑的。

四、聘请俄、德医生各三人，指明要共产党及财政顾问一人。

五、连日教冯及其重要官佐学习开会，共五次，都是我作主席。就中解决事件甚多，其最重要者为对外宣言。宣言共有七种：（1）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2）国民军对全国民众宣言；（3）国民军对全中国工农妇女的宣言；（4）国民军对全中国革命团体的宣言；（5）国民军对全中国军人的宣言；（6）对本军的宣言；（7）冯玉祥个人对全国民众的宣言。此外，还有忠告吴、张、阎、孙的忠告书（这是冯的意思）。因此组织一起草委员会及审查委员会，均有我参加其中。

六、与外蒙国民党中央接洽，讨论内蒙革命工作及国军对外蒙应取之态度，并介绍他与中英兄发生关系，与内蒙国民党接洽（内中有一同志叫作佛鼎，是蒙藏学院的学生，曾在北京加入C.Y.，很明了，有工作能力且极忠实，他不日即去内蒙工作，在国军区域以内，望钟英兄要加多力量注意内蒙工作），讨论在内蒙工作的方法及考察其现状。

（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

守常政治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此次西北国民军之退却，并不是原于战败，乃是原于西北军内部有张之江作奸细。在国民军未退南口之前，京畿一带有三万以上的军队，相约于十二日一致动作，解决吴佩孚，并截断奉鲁军后路。乃张之江故意弄错，致国军未能届时出来，功败垂成，反在张家口假装疯魔，痛哭流涕的说人家骗钱失信，至十四日他便大举撤兵了。我们看日本东京、大坂各大报所载，十日北京发的电通社电说，张家口方面主和派(非战派)的秘使赴奉，又张的秘书长某致某君函云，以后如有关于与广州接洽之事件，可迳函鹿，关于与奉天接洽之事件，可迳函张之江，便可知道这次撤兵的黑幕了。张之江于自觉的或非自觉的反革命外，还是一个最无能力的东西，所以撤兵之顷，弄得一塌糊涂，冲车失火，毁损甚巨。昨家兄接到包头方面电音说，这次国军退却，实为一大失败，丧失精锐兵士及器械无算，这不是因为战争失利，而是因为主帅之无谋。退至包头后，张之江命一部分入新疆，一部分入甘肃，一部分入陕西。包头情形不佳，唯一的希望在冯即日回包，还可重整旗鼓，否则万事将败于张之江之手矣。

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佳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不知此电能达否？近据某陕籍将领接到家信，似方振武、徐永昌军已过榆林，井岳秀被迫南下，计程国军此时已可抵西安。奉派报亦载有太原专电，谓国军已入陇南，占领天水等处。

于须在西伯利亚遇李鸣钟、刘骥等。觉彼等思想大变，颇有革命的倾向，嗣又在莫与奉谈，觉冯思想更进步。从前于、冯不甚相得，此次则融和无间矣。冯在莫归志不决，徐季龙乃电于往劝冯即归国革命。于抵莫与冯谈，冯即毅然归。于于十日行，冯于十七日离莫。闻于十九日尚在上乌金斯克与史任等相值，似此他们在听到国军退却讯后，必等候冯一同回库伦。闻冯已与于商定，由于带二三军残部并一部分国一军经陇南入陕。冯在乌拉山车中致家兄侍称同志，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措辞极其恳切，系亲笔写的。似此则国军退却之损失虽不在小，而经此一番折磨，一番淘汰，卷土重来时，必又多一层革命色彩矣。

武汉下后，对孙对奉似不宜同时宣战。近据四日顾孟余由广东来电，似革军对江西已下动员令，则对奉的折冲已不可缓。对奉的交涉，向由石曾，寅村去办，他们所接头的有三部分人：一系代表张学良的胡若愚等，二系代表张作霖的梁、叶、郑等，一系代表杨宇霆的郑谦等。综合这些日期接洽的结果，可以说是没有结果。他们先说老张已派人赴宴了，可是去了没有，去的是谁？均不可知。后又说要派一个姓梁的去，但至今尚未成行。最近梁、叶又表示奉方希望粤方先派代表，或打电与奉接洽（此事自然要等一等再说，特别是武汉下后的现在）。小张最热心与粤接洽，杨宇霆则主战，对孙对粤一个一个的打。至于张宗昌则力主援吴，名为援吴，实则要夺取保、大及河南地盘。现在英法两使均在奉，嗣又闻法使已往大连开会议，大要不外排俄与援吴二事。张、褚赴奉，亦系与奉张商援鄂取豫事。安福方面消

息，奉张已决出款百万，张宗昌已派定褚玉璞为援鄂总司令，王栋为总指挥，王已赶保，褚由奉归即起程。又闻张宗昌秘印小册多本，系宣布孙传芳罪状及其谋鲁阴谋等。柏烈武曾托人与张宗昌谈询对粤态度，张答我们与粤这些年宗旨不合，但究竟如何，须在奉决定。谈罢即匆匆赴奉去了。

日昨石曾、烈武、寅村等与家兄讨论，结果大家仍主张对奉继续接洽，可以与之相约，分东南地盘，军事解决后再商政治。

预测中国政局，将有南北分裂之势。家兄谓此为于革命进行上最理想的局面——一边是国民革命政府，一边是张作霖政府，任列强择其一，以与之交涉，任人民择其一，以与之合作。是白是赤，是暗是明，皎然并列，何等分明！

看钟兄致粤特委函，主政府仍留粤，不必迁武汉。弟以为此在武汉局面未固以前，自然应尔，但武汉局势稍固，把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但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三个利益：一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一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此策所关甚巨，幸锺兄详加讨论决定之。

（《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1]同志信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马二先生[2]此时谅已抵包，不知兄已晤见否？伊在此进步甚大，颇可乐观。与伊同行的有俄顾问桑古斯基及刘伯坚同志，刘系马二自己请求其回去者。于髯[3]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颇佳，于先马二起程一星期，想已先见之矣。于与马二接头之主题为国党与国军之关系。此间要人意见：（一）此时国军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季龙计划者）固不需要，即国军与国党之联委（于提者）亦不需要，二者关系之形式即为民党一二受命之中央委员与冯个人之接头。（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以上三个原则，系根据广东经验，望兄特别注意。初步工作，须处处应用此原则，至将来第二步工作之形式怎样，应看将来具体情形而定。冯要此间（孙、东两大[4]）为之准备工作人员四、五十名，此间要人及弟意见以为此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前去。弟意国军工作人才应注意下列来源：（一）在国军本身中养成大批工作人才。（二）择一部分在粤工作过的最好分子。这样才不至蹈粤覆辙。伯坚颇为冯信任；但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弟颇担心，望兄特别注意。桑顾问为人颇小心而客观，望兄与伊（桑）保持一种密切的接头，伯坚常在桑指导下当可不至损事也。

（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

---

① 即李大钊同志，守常是李大钊同志的号。
② 马二先生即冯玉祥先生。
③ 即于右任。
④ 指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

中共北方区对于三特区（即内蒙）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节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二）在西北军中党的工作

西北军现在不但组织上渐次统一，即在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尚未有下层的基础，但现在冯之左倾却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机会。按国民军现在的地位看来，我们自然不能轻视在国军内之工作。在国军中的政治工作及与民校关系，我们很同意于和森的意见。至于我们派同志去国军中工作更要慎重。现在冯虽饥不择食，我们固然不能使他失望，如果不慎重，派许多的较弱的分子去工作，不但使冯不信任，并必引起国军一班将领的恶感。因国民军的将领思想较广东军中将领更弱，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现在第一军中军友团的同志约有九十余人（该团乃西北军干部学校改组的，共约三百人），该团现正分配给各军中充下级军官或参谋。第三军中同志约有四十余人。此外在陕西井岳秀军中尚有同志三十余人，合共在西北军中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但是在组织方面都非常之涣散。现在这些同志都集中于五原，因此在该方非派得力同志去工作不可。过去我们在这些军中的同志，工作极不好，亟待重新整顿，并且在该方非建立得力指导机关不可。现在除要求中央速派平山及一飞同志去西北军中工作外，北方区现正指定同志，受短时间特别训练，准备去该方工作。

北方区因感觉过去三特别区工作之糟及现在西北军中工作之重要，特派××同志去西北一行，沿路巡视各地工作，并至五原与伯坚接头，考察该方实在情形及目前一切的纠纷问题（在军队中同志的）。至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具体详细计划，须俟××同志归来时，才能规定，因这样比较切实些。

（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1926年11月3日）

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一）冯玉祥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因为他的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

（二）不过我们重视西北工作，不是把西北军同全国隔离的来看。要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未来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要知道西北军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他只能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要知道国民军的内容，他所包含的成分，他一般的政治程度。我们必须十分的了解这些客观现象才能工作。

伯坚同志在工作上自然是十分努力，就是太主观了一点，没有虚心的去求懂以上所说的现象，而只是简单的执着莫斯科理论应用。所以，在伯坚同志信中发现如“西北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错误。我们在西北军中工作，以下几点是须明白的：

1.西北军经了很大的残败之后，他现时需要的是补充训练和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军结成很好的联盟，才能站在西北，为将来发展的基础。他在现时没有就积极对奉作战的可能，不能有马上回复去年状况的野心。

2.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是最贫瘠苦穷之地，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对回民），须对付得好。文化上亦非常落后。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是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比如对妇女问题，只是在提倡天足，妇女教育时，万万说不到就宣传什么社交公开，两性自由。

3.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他的部下很多还是非常落后。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很危险的。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若果相隔得太远不是部下对冯不信仰，便是冯部下痛恶我们工作同志，认为我们鼓惑冯如此做）。

（三）莫斯科所定冯军工作的三个原则，是非常之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粤工作两年所得的宝贵经验之应用。尤其是指出“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不要限制冯之职权”更为有见地。

军中党代表制度，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才可以说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国家行政对于党的决议，也尚不能奉若命令的执行。党并不能真正指

挥政府，指挥军队。国民政府境内的国民党部，大多数均尚只能做到代表民众利益与政府合作地步。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四）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现时工作人既少，可以不必各师旅团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而只是把这批政治宣传人组成宣传队，轮流至各师旅团讲演。

（五）在西北军中，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不良分子不惮开除，勿使败坏本党名义。当地党的组织与军中组织可以分开（此处是指两部分的群众可以不相接头，而指导机关自然要有亲密关系）。

总之，我们现在西北军工作方才开始，老冯又是抱有满腔的热望从事改革他的军队，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这是要十分小心的。

（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1.莫斯科所定三个原则（一、注重下层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重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固不需要，即国民军与国民党之联委亦不需要；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完全是对的。但广东方面已委冯为总党代表，又非由冯之请求，径委李石曾为政治总部主任及工作员二十人，此等均与第二原则不合；惟此系既定之事，不便推翻。今后补救之策，乃是除冯为总党代表之外，不可再增加什么各军、各师、各旅、团的党代表；李石曾如辞政治总部主任，继之者宜由冯自择自委，其日常工作，宜直接受冯之指导而不受广东之指导。

2.冯既为党总代表，又为国民政府委员，其下各军长、各师、旅、团长均应正式加入国民党，国民军与国民党之关系只此已足，不必再设党代表，也不必组织各级党部。

3.军中的政治宣传，宜注重中国的近代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痛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此外又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打倒满清、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尊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民权主义。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冯玉祥发表的意见（最近的）也应广为宣传。

4.在兵士及下级军官中，要宣传尊崇冯玉祥，使他们都服从冯，而不受反动的高级军官张之江等之影响。

5.我们不可强冯采用他还不真能了解的左倾政策。我们现在不是要冯更左倾，是要使冯部下渐渐左倾，是要使冯与其部下之思想不致相差太远；若两项相差太远，冯便不能有所作为。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使冯的部下能够了解冯，信服冯，使他们相当的愿意执行冯的政策。我们万万不可事事挟冯之威权，强迫其部下多数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如此不但使其部下怨恨我们，并且将使冯无法指挥其部下，变成僵局。

6.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要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嫉妒。如伯坚同志教他们学习开会，不使冯作主席而伯坚自作主席，这是非常的错误。

7.我们在每个社会工作，首先要懂得那个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是些什么社会成分，然后才能决定出适当的政策，使他们走上他们所能走的革命道路。此时在冯军中工作，首先要懂得冯军的实际状况和社会成分，还要懂得陕、甘、绥是怎样一种社会，只能施行何等程度的革命策略，万不可把在莫斯科所学的讲义囫囵整个的搬到甘、绥冯军中应用。伯坚同志脚还未踏到甘肃、绥远的土，平日或者还不知道甘肃、绥远是怎样的社会，在车路上便大胆的定起政治工作计划来：大调留莫孙、东两大学同志二十人（内含十个女同志）；请求职工、农民、妇女三个国际各派同志到国民军中工作；请国际派英、法、德三国C.P.各派同志到国民

军中研究国际问题。这些计划都不适合于甘、绥社会和冯军的需要，只是把在莫斯科所习见的各种工作部门的名词，机械的在甘、绥挂起招牌而已。孙、东大学同志都很幼稚，哪能挑出四十人？他们的常识恐怕还不及冯军中已有的人物，如何能够使人家接受他们的宣传？女同志尤其一个也不能派去，他们到那里无工可做，并且不能过那里的苦生活，若是闹起恋爱问题来，更是要令老冯和甘肃、绥远人民尽逐我们的同志不许在那里工作。此事非同小可，未派须停止，如已派去，只能留最丑、最朴素、最能够吃苦耐劳的一、二人，其余小姐学生的女同志一概设法送回北京。甘、绥有多少工人运动可做？怎值得职工国际派人去？妇女国际派人去又是做什么？各国C.P.为什么都要派人到中国冯玉祥军中研究国际问题？伯坚同志这些计划，简直是发疯！根本错误是空想，不考察实际情形。和森同志给守常同志信说："伯坚颇为冯信任；但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弟颇担心。"此话真不错。我们现在看见伯坚同志自库伦来的报告，我们比和森更担心。伯坚同志在冯军中工作，万不可贸然自居指导地位，自定计划，只能在桑古斯基同志指导之下，小心学习工作！

8.我们在冯军中工作同志，尽可能的不使他们知道是C.P.分子，使他们对C.P.怀疑与畏惧。各军军官中及第一军军友团中我们的组织，尤必须绝对秘密，其不能守秘密或腐败分子急须淘汰出去，万万不可姑容以致妨害我们在国民军中的工作。

9.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冯的政策如何，只能由国际、国民党和我们党的中央影响他，不可由冯军工作同志纠正他！

10.南口失败后，损失极大，此时重在与甘肃、绥远的民众合作，以巩固在甘、绥的政权，以从容恢复充实其战斗力及施行普遍下层的政治教育，不可怂恿其急于向外发展。因为现在没有和奉军继续作战的力量。只要他能够渐渐恢复战斗力，能够占住包头，便能威吓奉军使其不敢南下对付北伐军，这就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了极大的作用。

11.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为吴、张利用反对冯军。

12.冯军统治下（陕西、甘肃、绥远）的农民运动，我们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样重要。我们固然要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又要提出"军人和农民相好"的口号。我们勿怕冯玉祥利用农民群众，他如愿意做农民领袖，我们更应该促其成。

（原载《中央政治通迅》第十期）

守同志来信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侧闻鲁张颇以南方与鲁性质上冰炭不相容，终难谋妥协以言，似张曾以告杨度者。但彼既不得一新同盟者，则叛奉实有所不敢；不敢叛奉，则其一切举措，不能不一唯奉之决策是从。现在时局之推移，靳、田、魏、倒吴对奉之运动，已使京汉线上酝酿新变化，而杨宇霆眼看鲁张要把肥美的江苏独吞下咽，心殊不甘。且恐鲁张之长腿飞扬，易惹新战祸，故又放心不下，遂又拉孙传芳，使之再度南下，一以避党、奉两军之马上直接冲突，一以杜奉张之勃勃野心，眈眈虎视。这样一来，河南问题更形重要。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关于第一策，在北京方面只好令石曾常常与杨度接头，有机可乘，即照此进行。关于第二策，前接汉口来信，据云：靳、田、魏、寇等，派有代表到汉，连袂向总司令部接洽，当时由邓演达、王励斋出名招宴，他们当场声明：靳等如能赶走吴，通电声明服从国民政府，则可实行接济。他们的代表等谓，此次回去报告再答覆。最近吴有下野之说，似靳等已与南方已有一种协定，亦未可知。如中央以为此策可行，即请去函汉口推进此事，无论如何，总不使靳等归奉。据此间所接确报，靳已两派代派来津谒奉张，所上两函皆含有拒奉出兵河南之意味，其第二函已公然说出联唐的事来。于此应注意的是：（一）所谓“联唐反蒋”是否为一种辞令或事实；（二）靳二这种的态度是否故意作出来的，为靳大要总理，为自己要河南督办，此点须要谨防扒手。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但此时幸为严守秘密云云。其余关于晋阎对于国民军之态度，彼所告者，全与我们及自包头方面的消息若合符节，以此证其代表某或不吾欺。最近奉张压迫晋阎，令其合攻国民军。当时提条件凡三：（一)是否能将绥、包一带之冯部驱除净尽；（二）是否能向甘、陕进击冯军；（三）如一二两项办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之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覆电谓：一二两项均办不到，三则请雨帅自由施行，晋愿将京绥全线交给奉方。在此时顷，晋阎驻京代表复托人告我说，冯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令晋方为难，党对此有何善策？我即着人答他说：“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

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冯在包头知公为难，刻已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幸勿介意也云云。”其驻京代表说，据以电阎，阎复电云：本号（暗指山西）与田君（暗示国党）同行，早具决心，幸为转达。惟照(暗示焕字)章作法太差，令我为难。现已决由奉方单独解决，我军除留一军二旅留驻绥远外，悉数调回晋境。此外，还有由国军改编之晋军二万余人。”闻奉军近已进至平地泉，向晋索取晋北十三县，国军之未改编及已改编者均已退至包头布防，以国民军方面之人推测，奉军决不进击包头，因晋阎之态度奉方决不放心，故不敢深入于黄沙白草无人烟之原漠，以穷追国军也。昨有蒙古同志归自包头，沿途所见，知国军已由绥远退至包头，京绥路上之晋军，除一师余人驻绥者外，确皆调入晋境矣。西安之围已解，国军已进至潼关。冯、于间关系似无问题。于现在西安，实际上已为援陕军总司令，即入陕一军亦皆受其指挥。新疆之杨增新确已故去，国军对新似已有一部分人新。伯坚在冯处，已渐引起冯左右之妒嫉。闻伯坚临行曾对留守副司令张允恭说了一段话，隐含讽劝张对于革命理论应该多加研究，因现所具有者尚感不足，意谓CP人们来此工作不是为升官发财，乃是为革命云云。张答以：“请你不要注意我，我将来或者还可以入CP，你只注意冯就够了，因冯时有动摇之倾势，你说你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来，可是你的地位比谁都高，你须注意不可太出风头了。从前有个刘牧师，当时冯极宠信之，以致人人侧目，后来就是冯总司令亦不能拥护他了。”又闻冯近来对于政治工作之成绩颇露失望之色。因人材分散，不集中不够用，故无成绩，除画报外无成绩可观。在未接兄信以前，已致信伯坚，请其注意，并告以须令人材集中于最好之一师或一旅，俾冯及其部下将领得以睹其成效，俾知政治工作之确有成绩，吾党之政治工作者确能作出成绩。倘若人材够用，人材分配得当，现在成绩所以不能卓著的原因，全是因为人材不够用的缘故，并不是政治工作不生效，政治工作者不得力。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青年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全国被压迫的青年们！自五卅以来，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向中国民众进攻，更有组织，更有计划，更有实力，一方面散布反赤的宣传，以分离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一方面尽力援助直奉军阀扑灭接近民众的武力之国民军。

此种进攻到现时更为凶狠，国民军之一二三军已在英日吴张联合进攻之下完全失败了，而吴佩孚张作霖得有帝国主义充分之援助，虽濒于绝境的张作霖亦能赖日本之力，起死回生。他们正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准备攫取北京的政权，宰制中原。

现时的局面非常险恶，全国将陷于顶反动的局面，广东政府在这样大的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亦将不免于陷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生死存亡关头。

此次大沽事件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日本以四驱逐舰引导奉张军队袭击天津，国民军之制止通行乃是正当防御应取的手段，乃英日领导的使团，竟援引辛丑条约提出最后通牒于中国政府，限期撤消大沽口一切防御，是无异于解除国民军武装让反动势力为所欲为，且在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上亦并没有禁止对于入港外轮之检查，可见帝国主义者通牒之凶蛮无理。

北京民众特为此事开市民大会提出"反驳列强之通牒"、"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等口号，向执政府请愿严驳使团通牒，乃段卫队竟开枪击毙五十余人，重伤轻伤不下百人，段祺瑞章士钊等且预备以煽动群众大会之罪名逮捕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五人，以图卸其惨杀的责任于共产党。

段祺瑞之凶残与阴谋，乃为受帝国主义所授意，这次屠杀较五卅尤为严重，再加上现时政局之反动趋势我们更应以胜过五卅之努力来对付此事。

北京的革命的学生群众，已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流了他们的热血。他们的流血牺牲，正是唤起各地群众起来抵御目前的危机的信号。各地勇敢的学生及青年工人农民们，我们要了解压迫反动的局面转瞬即来，我们若不起而作坚决的抵抗，民族解放运动会陷于极困难的境地。

扩大这次运动到广大的城市及乡村的工人及农民群众中间；号召民众起来示威，讲演日本帝国主义与段祺瑞的罪恶，他们如何内应外合，摧残国民军，屠杀爱国民众；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准备着与吴佩孚，张作霖，英日帝国主义作一决死战争，这是我们目前的工作。一切有爱国思想的国民，不论他是商会，工会，学生会，都应当觉悟目前责任的重要，一切反段的政党，不论他是国家主义者，国民党右派，都应当不分党派，联合起来，抵制反动势力的进攻。倘若不进行打倒段祺瑞的工作，不积极的参加爱国运动，徒效段祺瑞的口吻，高

呼打倒共产党，甚至不与共产党合作，他们便是甘心阿附段祺瑞，客观上帮助段祺瑞的势力，为群众所不容。

打倒屠杀爱国民众的段祺瑞！

反对威吓中国的使团通牒！

取消辛丑条约！

抵制英日帝国主义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对民众的进攻！

全国被压迫的青年团结起来！援助北京被害学生！

继续死者之精神奋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载《中国青年》第118期，1920年4月3日）

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敬呈者，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影响及于全国，职部躬与斯役，兹将惨案经过，及职部应付，详陈如左：

（一）惨案之经过

十六日下午四时，英、美、法、日、意、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八国公使，以最后通牒致段政府，限四十四小时答复。内容系根据辛丑条约，反对国民军在天津、大沽间对奉军设防，如国民军于限期内，不能圆满答复，则各国当自行扫除天津、大沽间障碍。此项消息，由本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得悉最早，当于是日晚七时在职部召集教育宣传委员会（该会组织及工作性质详党务报告中恕不另赘），全体计六十余人，到会者有五十人，由顾孟余同志报告八国通牒内幕，及其作用：（一）辛丑条约，为我国国民所不承认。（二）上次李景林在天津附近设防，早将辛丑条约破坏，而各帝国主义默无一声，是已默认该条约无效。（三）辛丑条约订约国，其中美国国会始终并未批准，俄、德、奥三国亦未参与，则此通牒不过强拉八国署名，情同蒙混欺骗。至于八国通牒之作用，外乘国民军津浦军事已到沧州，山东急有攻下之势。同时在大沽方面军事，亦极顺利，八国不过听日本帝国主义计划，将杀死郭松龄之毒谋重展，此足证明不平等条约不但保证帝国主义在中国已掠夺的权利；同时更为延长中国内乱，为阻碍中国民众运动发展之武器，则不平等条约之必须立即废除，已由八国对大沽事件之横暴而证明。本党部号召民众，群起反抗，并作废除辛丑条约工作云云，次即讨论运动方法：（一）于十八日八国通牒限期未满以前，应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督促段政府严重驳回无理通牒，运动纲要既如上决定，职部乃派同志四出活动，当晚即联络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敢死队、国际工人后援会、北京济难会、中山主义实践社、国民新报社等团体，共同签名，登报发启。十七日下午一时即开各团体联席会议，此十六日经过情形也。

十七日上午，职部又派同志四出奔走，召集各团体参加本日下午之联席会，同时京中各报已登出八国通牒全文，人心极为愤慨。职部为浩大声势，也曾派专人与民治主义同志会、

* 这份记述了“三一八”惨案经过的报告是国民党北京市执行委员会写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陈毅同志当时和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参加了国民党北京市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他参加并领导“三一八”爱国群众运动的情况，在这个报告中有所反映。

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等反动团体接洽，说明此次运动之意义，应各派合作，彼等极为同意，并决定参加此次运动。是日下午一时到会团体，计百五十余，除五十余团体为平常热心民众运动者外，其余皆属不常参加民众运动之团体，如教会学校及各省旅京同乡会之类。当时公推丁维汾同志主席议决：(一)本会定名为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二）十八日午前十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举行大示威运动。（三）公推徐季龙、李石曾、顾孟余、黄昌谷、丁维汾、蒋梦麟、陈启修、林森、李大钊、于右任、学总会代表、工总会代表等十三人组织大会主席团。（四）将本日到会代表分两组，赴外交部、国务院包围，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五）两组代表应举出发言代表。当举出赴外交部发言代表三人，安醴诚、王一飞、陈公翊（皆本党同志）；赴国务院发言代表四人，当举出陈毅、陈日新、王布仁（皆本党同志）、辛焕文。两组代表，即于三时半分头出发。

（甲）赴国务院情形。代表六十七人，四时许抵国务院，当被卫队拦阻，不许入内，且气势汹汹，斥各代表站在大门旁边等候门者传达。是时已有小冲突。次由发言代表先入内，由一科长王某出见。四代表即先要求让各代表入内，觅一休息地点，免避风沙。该科长毫不理会，坚请代表说明来意，谓一切事情彼皆可转达。代表以其不能全权代表，故不愿详说，再四请其办下列两点：（一）速请段、贾来接见代表，容纳人民对外交意见。（二）速将各代表延入或觅一廊下休息，免与卫队发生冲突，该科长再三支吾，随即退去。历半时许始出，谓段执政、贾总理皆不在此，诸位的话，可以转达，诸位可先回去。四代表极为愤慨，声明不见到外交负责人员，誓不空回，并促其将各代表延入。该科长始允偕一代表出，斟酌办理。岂知当时各代表已被卫队用刺刀杀伤。杨伯伦（四川国民外交代表团代表）受伤极重，现尚未痊愈，其余轻者无算。至四代表入内不一刻，卫队即有一排之谱，上前解散代表队伍，坚令退出国务院大门。代表等坚不退出，遂遭枪杀。四代表即质问该科长，该科长默默而退。至七时许，复有卫队团长武九清出来道歉，并谓当严惩肇事卫队。（按此人即翌日屠杀群众之指挥官）四代表待至夜深十一时半，始由院秘书长邓汉祥来见。代表述明来意，及质问卫队行凶理由。该秘书长答复：人民意见，政府当尽量容纳。卫队行凶，应即惩办。对于受伤者，定派代表前往抚慰。四代表即慎重声明云：段政府如欲自新，不自绝于民众，则当驳回八国通牒，为自效于国民好机会，万勿自误与误国害民云云而退。

（乙）赴外交部情形。代表八十三人四时许抵外交部。当时外长颜惠庆尚未就职，次长曾宗鉴亦不在部，乃派代表往国务院及曾宅皆无结果。并闻国务院代表已演流血惨剧，众更愤激。至五时许，国民军外交处长唐悦良至外部，邀发言代表谈话，代表说明来意，并征询国民军对大沽事件之态度。唐表示对于民众热情，极表钦敬。且云愿找外次长来部晤谈。代表遂分一部分人回国民大会筹备处办公，一部分人坐候外部。至九时许，曾宗鉴偕贾德润（贾德耀之弟）到部。与发言代表接议。曾等含糊其辞，毫不负责。辩论至十二时许，代表要求非见贾德耀不可。贾德润乃通知贾德耀，彼云愿起床接谈，代表遂整队前往，抵贾宅时已一时有半。曾宗鉴已先在，乃由代表说明民众意旨：（一）驳回八国无理通牒。（二）大沽事件，应由日本方面负责。贾谓八国通牒之驳复已发出。代表索阅原稿，认为过于软弱敷衍，且声明北京民众，将于明日（十八日）午前十时，举行国民大会，游行示威，万望政府尊重民意，须根据大会决议，向八国公使提出抗议。贾云，明早阁议当先将诸代表所提出之最低限度二项，付之讨论，俟明日国民大会决议案送交国务院会同研究。代表又将赴国务院代表被府卫枪伤提出质问，贾极诧异，并即道歉，谓明日当惩凶及撤退行凶卫队，而易以国

民军。代表遂退，时已四句钟，以上为十七日夜经过之情形也。

十八日上午九时，北京警卫司令李鸣钟派李泰棻（前绥远教育厅厅长）来学总会道歉，谓日昨府卫枪伤代表为不当，今日当加保护。十时天安门国民大会，到会团体异常踊跃，群众约万余人。主席团到会者，有徐季龙、顾孟余、陈启修、黄昌谷、丁维汾、李大钊、学总会代表等八人。总指挥为王一飞、陈资一、陈日新三人。十时余开会，由徐季龙报告开会宗旨，顾孟余演说。次宣读昨日受伤最重之杨伯伦同志致大会群众书，中谓我为革命而死，死亦无憾，望大家继续努力。台下闻后一致高呼：坚持到底，誓死不屈。次由黄昌谷将国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牒原文，当众宣读。由徐季龙将大会提案宣读，一致通过。次又有提议，立即组织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亦通过。次呼口号，遂出发游行。大队至执政府，已一时半，军士荷枪环立府前，群众大队直入府院外大坪中，与军士相对成平行线，相距约二丈余。群众乃推定王乐平、丁维汾、安醴诚、陈公翊（同志）、谭季缄五人，携带大会决议案入见。卫队不允，群众乃高呼，非派代表入内不可。殊知此时，忽有兵士十余人在大队后面用力关铁门。幸群众人多，已将门塞满，不能关闭。群众知事不妙，而枪声即于是时大作。卫队开枪，约计半小时之久，此时群众四面逃窜。而埋伏卫队四面丛起，刀枪木棍，分途追杀，群众死伤者甚多。登时毙命死于国务院门前者二十八人，事后死于医院者，计十九人。惟现当有多人，在医院调治，实难料其能否痊愈。伤者计调查所得，有一百八十九人。死者内有同志十四人，伤者内有同志六十五人，此爱国群众被国贼段、章等屠杀之实状。此次牺牲之巨大，全系段贼等承受帝国主义之意旨，预定围杀爱国民众之毒狠计划，计有数要点可为确证：（一）此次纯系对外。（二）参加此次运动群众，纯系徒手。（三）群众并未与卫队冲突。（四）死者多在国务院大门外，枪弹多从背后穿入。（五）卫队环立院中，不是平常守卫状态，系作战形式。（六）事后是夜不许家属领尸，由警厅草草收殓，希图秘密葬埋。（七）群众逃逸时，卫队即乘势打劫银钱、手表、眼镜、围巾等财物。（八）群众逃出，在大街上雇车，皆被拒绝，云奉执政府令，不许擅拉。（九）死者衣物被劫剥一空。（十）燕京女学生头被砍落。（十一）死者多为剪发女生，及手执旗帜人民，显系预有射击标准。凡此足证明段贼用心之毒狠，及其预定计划，欲痛剿民众，以雪半年来之积恨。

（二）惨案后之段政府

惨案后，北京舆论沸然，虽略有反动言论，不过适足证明反动派进攻革命民众之联合战线。段政府于二十日发通缉徐季龙、李大钊、顾孟余、李石曾、易培基之伪令，谓民众为暴徒，为有意推翻政府种种诬妄邪说。然受舆论攻击，国贼等知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贾内阁复有一度辞职，其后复发表抚恤令。种种矛盾之点，不啻自画招供。北京地检厅致陆军部公文，尤将国贼行凶铁证，暴露无遗，其罪真不胜诛。

（三）惨案后之北京民众

惨案发生当晚，即有二百余团体，在北大第一院开联席会议，公推职部，广东外交代表团、中国济难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工会七团体，组织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专办惨案善后事宜，即于三月二十三日，在北大三院举行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由职部主席，到会群众约近千人。复于四月□日联合北京各校校长及死难烈士家

属，组织死难烈士公葬筹备处，现正在进行中，约计月内可告完成。对于公葬烈士，本党部先捐助一千元，作公葬费用。此外职部于办理丧亡之外，近与各团体组织反日诛段大同盟，以与四月七日由北京学生总会发起组织之北京各界"三一八"惨案诉讼委员会，同时积极进行，以谋段、贾、章等得伏法受诛。

（四）惨案后之国民军

事前李鸣钟派李泰棻到学总会道歉，并用公函在国民大会上申明：今后尽保护之责。然于惨案发生后，彼复出令禁止人民开会，复列席段卖国政府之国务院会议，同意于国贼之通缉民众领袖之乱命。国民军现已一反以前所为，为民众所唾弃，国民军实无以自解于民众。民众于惨案后，对于国民军之论调，要求国民军应表明态度，到底是拥护国贼，还是拥护民众，践誓死救国之旨。惜国民军当时甘为安福系所利用，不能有所作为。其后鹿钟麟虽于四月十日解散卫队，驱逐段祺瑞，入东交民巷。然不过履行国直议和条件，以与吴佩孚谋妥协。故使此次北京政变之价值，远不如往日之倒曹。国民军右倾之态度，已极鲜明。惟该军在中国国民革命全部意义上，仍有极大关系，本党无用切责太甚，使之愈右而趋于反动也。

（五）惨案后之反动派

反动派以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代表右派即民治主义同志会之化身）及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二团体为代表，彼等于十七日各团体联席会，毫不参加。而另集十余团体组织一废除辛丑条约大同盟，以与职部所召集之北京国民反对八国通牒大会相对立。十七日下午国务院门前之流血，及外交部深夜辩论之工作，彼等皆未参加。但十八日上午，彼等于各校遍贴广告，谓九时在北大集会，意欲分散群众。十时，各界在天安门集会时，彼等三十余人，去国务院见贾德耀：（一）说明彼等要求废除辛丑条约之意。（二）申明本日十时在天安门之国民大会，与彼等无干系，纯系共产党人所召集，因此乃促成国贼屠杀群众之决心。该反动派之罪恶，已深为民众所知悉。惨案后，彼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言论，专攻击徐季龙诸同志，谓群众首领，不负责任，遇事逃脱，立意为段贼减轻罪恶。此外，北京九校教职员联席会，亦宣言谓徐季龙等应负道义上之责任。外如《晨报》、《大同晚报》等，尤借此攻击徐季龙等，挑拨群众对于领袖的感情。殊知是日李大钊、丁维汾两同志，在惨杀时所受险状亦与群众无异，且为群众所共见。反动派之造谣与诬蔑，适足自露与卖国政府勾结之马足。

（六）惨案发生对于职部之影响

惨案发生后，国民军即表示脱离民众而与安福系勾结，即反动势力重降北京。职部为免却牺牲与保存组织起见，乃通知各同志，从事秘密工作，勿公开活动。职部于是夜将一切重要文件运出。十九日晨，即有警察前来监视。二十日后，有警察搜查一遍。职部见国民军的态度已不如前，知其不能代表民众，以扫除反动势力，乃将翠花胡同党部收束，另觅他处工作，然暗探密布，负责同志行动颇感困难。然丧事将告结束，专力于整顿党务，定不难恢复旧观也。

（七）惨案后职部之工作

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关于伤亡善后，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另派专人合同职部负

责，一面赴各医院慰问伤者，赠每人以鲜花及零用费拾元，并担任一切医药费。（二）关于死者方面，参加各校各团体之追悼会，并赠送挽联花圈及辅助追悼会会金。对于本党同志，特赠绸党旗一面，作盖棺之用。（三）关于党务方面，公开活动因环境恶劣而减少，复党内部组织尚欠完善，自应用全力整顿，因此职部最近工作则在内部训练及党之发展。盖在惨案发生之后，党外青年之革命情愤，多被激发，急思为先烈复仇，新党员之增加，不减平日，而党内同志之奋起者尤多。

（八）职部对惨案所得之教训

此次惨案，既为段卖国贼效忠帝国主义快复私仇之毒狠计划，则其发生为国民革命进程中不可免之一幕，即今不发生于三月十八，亦必发生于后日，卖国贼欲杀革命群众之心，无时或忘。革命民众亦不能因恐怖牺牲而停止工作，是惟出以热血与卖国贼奋斗。流血惨剧，不但为革命民众所不恐惧，且适足以促其努力扩大国民革命之战线。职部于此，自应统领所有同志奋勇前进。惟本党为国民革命中心，一切民众皆集于本党旗帜之下，本党实负有保育鼓励训练之责。此次北京惨案发生，事前职部不能觉察国贼奸谋，事后应付各方殊欠周到，自疚难支持，详陈如上，以凭钧会核察，详加指导，不胜盼祷之至，并附关于惨案文件数种，合并奉呈。

此呈

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北京《党声》杂志1926年5月1日第三期）

（选自《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

中山舰事件

（苏联大使馆档案摘录）

据蒋本人及他人之议论，因中山舰由广东向黄埔开驶。

我方委员（顾问？）原拟3月19日检阅中山舰，但18—19日夜，海军部接到电话将该舰开往黄埔。

代理海军部部长李之龙认为是蒋处所发命令，未能查真伪，即令该舰驶向黄埔。顾问立即下命令，该舰仍驶回，约于半夜之时该舰回城。翌晨李之龙及其他委员等均以蒋介石命令而被捕。

18日蒋闻中山舰始而驶黄埔继而返广州，泊军校前升火待发，认为有人欲杀蒋。而此谋者舍共产党员与顾问有关系者李之龙外别无他人，故先将该舰队各委员捕，20日早9时派军队将顾问东山住所包围，解除卫兵武器，同时城内之工人、机关、车站、中央银行等处亦被围，大萨岛亦有航空队监视。下午二时，第五团团长来此，顾问琪桑喀要其撤回。该团长回去不久撤退包围，发还军械，工人机关之围旋亦撤。惟其他各处之围二十二日始撤。

20日撤围后一小时宋君到，言蒋此举失当，李济琛、邓演达继至，对蒋亦有责言。后琪桑喀派鄂利金赴蒋处，蒋百方道歉，鄂利金顾问对蒋稍加责言。蒋言次日至伊万诺夫斯基处商讨一切。21日蒋未至伊（顾问）处，各军将领均到言蒋仍要求驱顾问及共产党人。

22日派顾问索洛维也夫找蒋谈，在政治部有汪精卫在场，会后蒋即赴黄埔，各将领认为蒋此举有重大意味，即非是排俄，亦必作再次排俄之准备，并谓蒋对此早已准备一月余也。

23日汪精卫忽然隐匿。24日政府为离去之顾问饯别。26日蒋见顾问后仍回黄埔。

事件发生之原因：

1.广东战争胜利后政府已巩固；

2.人民确信政府有实力；

3.政策正当人民相信；

4.反革命之政策均失败；

5.军队统辖于政府（统一军队军权）

6.军事机关及中央军委会已有统制之权力；

7.各机关积极工作使军权巩固；

8.建设训练已拟具办法。

总之政府军正成为强大之势，不但可消灭军阀，且不难统一全国。顾问缺点：

1.集中陆军权利过速（设总司令部、警察厅、军需处各机关）

2.对旧将领各机关过甚之监视（顾问常自居首位直接管理事务）；

3.帝国主义、农民、共产主义在军队中激烈宣传。

政策，在利用蒋介石组织国民军仍采原方略；

1.巩固军事机关自上而下之集中；

2.继续改良军队之组织制度；

3.整顿军队内部生活严定纪律；

4.提高军官程度、改善士兵性质；

5 集中军需，各军中设军需处；

6.各军增侦察通讯事务；

7.扩充各军政治宣传工作；

8.扩充航空及舰队。

中山舰事件后，斯切潘诺夫报告

蒋已发表罪己书，一面将各委员及共产党政治人员一律免职，要求侦查俄人之居留，并规定俄人之界限，并捕欧阳政请军委免其职，并激烈攻击上海右派集会。

地方委员会为表示出于自动起见，已将一军政治宣传人员及党员调回。

蒋不仅欲监视共党在军队之工作，且监视共党意向，但对顾问则表面和蔼可亲，对各军则拉弄曾自俄军械库内拨各军机枪及子弹。

政策：蒋仍继续革命，则当处处迎合其意，与之让步。

蒋如蒙蔽反对派继反共，则预备与之奋斗。

中共主席云：无论如何必须利用蒋介石。

蒋提议五月间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国民党对共产党地位现正加以考察。

中山舰事件后军事情况

各军队仍继续剿匪，二军在关德（译为关塔克）地方围攻某处险要已经一月未克，要求列穆（顾问）派飞机协助。南部亦有剿匪战争。

军队多数皆从事技术训练，为北伐准备。

唐生智倾向革命。

广西军队系三师共９０００人，亦可为北伐之用。

北伐根本上之障碍为经费困难，现正设法筹款，在２－３个月内或可北伐。

顾问之工作仍分为军事、政治两方面。政治方面，应巩固国民党之统一，尤须特别巩固左派而取消右派中之反革命分子，以削弱或攻击之；军事方面，巩固新建设之各军队各机关，使军队与政府及左派巩固联络，加强政治工作。

军队中，由一军及第二、第卅各师中将党员调回，此法一面迎合蒋，一面则一百党员去职，表明党强，将来仍可回一军。原则上共党在军队当完全公开，因而将各军党员全体名单送各军长官，先由黄埔学校实行。

少年军人同盟会（对抗孙文学会者）将自行解散，以使孙文学会亦自行解散。孙文学会右派首领吴铁城、伍朝枢积极破坏左派及工人运动。

中山舰事件前一军中共产党情形

黄埔各师师部内，五委员中有共产党员４人（军政治部长）；而各团中之委员16人中有共产党员５人，国民党员11人。

广州事变之研究

致　中

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之真相，我们现在虽然还未能详知其巨细始末，而大致已经明白了；此事关系中国革命运动影响颇大，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研究之方法，不应该从拿自己的主观做出发点，而是应该综合各项消息，依据事实证明那些消息是可靠的，那些消息显然是谣言，然后所得的结论方近于正确。

（一）关于广州事变之最可靠的消息

A　**蒋介石之呈文**

“为呈报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惟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B　**国民政府之布告**

“此次政府据报，以海军局代理局长欧阳琳，无故离职，舰队骤无统率，致中山舰发生不守纪律举动，政府为防患未然起见，特先将各嫌疑人拿办，现已处置妥当，一切如常，特此布告，俾各界明了真相，幸勿误听谣传，自贻纷扰。”

C　**国民政府饯送俄人时蒋介石代表邓演达之演词**

“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苏俄本属最好同志，今日诸位归国，某等敬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汪蒋两位先生，今后本党本政府之联俄亲俄政策，非特未有丝毫变更，当视前益加亲善及进步．”

D　**国民党宣言**

“依据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之策略奋斗，尤尊重第二次代表大会议决案，对共产党加入本党份子，丝毫不存歧视，对离间破坏者决严厉对待。”

E　**依文诺夫思基等对本报记者之谈话**

“广州二十日事变，黄埔军队于短时间包围罢工会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五十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他军中确有些反共分子，且云他并未发出包围俄人住宅及罢工会之命令。此时蒋氏似已了解

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的举动仍未停止，随时都会有事故发生，这真是中国革命之不幸。”

（二）各种显然不实的谣言

依据上述可靠消息，沪报所传“共产派反汪蒋。”“拘俄人多名。”“共产派谋倒蒋，推翻国民政府，改建工农政府。”“李之龙以组织工人政府相号召。”“汪已被软禁。”“蒋拘获罢工领袖及黄埔军官学校俄教练员数人，闻蒋决计悉逐广州俄人及共产党，汪精卫已离广州。”“李之龙已枪决。”“在罢工会搜获俄人接济共派大批枪械。”这些显然不实的谣言，似乎不必再加辩正了。依文诺夫思基等十余人乃俄国共产党派来中国调查政治及经济现状的，并非粤政府顾问，在粤适逢事变，他们于二十四日离粤回国，决没有各报所传什么被粤政府押解出境的事。蒋介石君上军事委员会的呈文，明明说：“事前未及报告”，可见上海新闻报所载“蒋介石………乃往见汪精卫，告以共产党之计划与举动，决用严厉手段处分共派，汪甚惊讶，颇主郑重，蒋不允，汪喟然，蒋曰，今日下午二时在造币厂开会，今时已至，请公偕往，汪本抱恙，至是不能不同去，少俟谭组安朱培德吴铁城……古湘芹等均到，蒋即报告共派异动事实，及处分共派办法，谓徵求各位同意，各人面面相觑，不敢发言，良久，谭组安始期期言曰，政府及公待共派已仁至义尽，而共派竟有此项异动，介公如此对待，诚不为过。但亲俄政策为先总理所决定，恐如此对待，有碍中俄邦交，故某以为宜分两层办理，最好不要牵涉俄人，蒋大声曰，此次若不如此处分，恐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各军，广东地盘，已非国民党所能有矣。众见蒋主持坚决，亦遂不持异议，故此会议结果，完全照蒋提议通过，蒋回后即发命令严密进行。”这一段通信完全是谣言了。申报通信说国民政府欢送依文诺夫思基等，赴席者有中央党部代表林祖涵甘乃光等……及政治部主任陈公博，而同时又说甘乃光陈公博（甘陈都非共派）被捕，其显自矛盾如此。各报多载海军局长斯米诺夫被捕或说他同陈公博谭平山逃匿香港，其实斯米诺夫早已离职归国，斯米诺夫离粤，由欧阳琳代理局长，此事各报早有记载。谭平山也早因事往北京，陈公博更不用说现还在国民政府任职。这类显然不实的谣言，竟充满了近十天的上海各报，使人不能不佩服国民党右派对于宣传工作之努力，只可惜用在这等地方。

（三）事变之主动者究竟是谁？

因此，我们所得关于广州事变之消息，可以说一大部分是谣言，一小部分是事实。制造这些事实和谣言的是谁？我们敢说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

申报通信说：“此次之事件，系为民党中之右派反赤运动。”

又说：“‘据外间传说，谓二十日之反赤举动，系左派侦知共产党曾接俄人大批军械，此项军械，曾由俄舰运至崖门，由中山舰接载，运至省城东堤东园内之罢工委员会储藏，当日搜查东园时，计搜出俄械步枪一万三千杆，子弹三十万发（申报记者原按：此系谣言确否未知），另由列宁舰载来俄官员六人，系担任发难时之指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既发见共产派之秘密，因预为戒备，嗣又查知共产派分子计划，其大本营在东园罢工委员会内，……约期发难，推倒现国民政府，而建设劳工政府。……迨俄械已得手，李则定于二十日派中山舰攻黄埔，讵事前为孙文主义学会中人侦知，遂于二十早先派兵来广州……”

时事新报通信说：“据最可靠消息，政变系孙文主义学会主动，拘捕党代表，包围罢工会，皆该会军人所为。”

民国日报通信说：“中山舰事件，悉由孙文主义学会同志豫为戒备，学会同志查知反动

派计划……”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致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同志书云：“诸君学养有素，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生，于短时间戡平叛党祸国之分子。”

商报通信说：“据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报告，共产党攫取政权之内容，乃和盘托出，蒋氏以形势急迫，……立即召集会议，决定策略……”

又说：“蒋受孙文主义学会派包围，被胁迫而下逮捕共党之令。”

东方通信社香港电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美国联合通信社说：“蒋介石借伍朝枢等诸名人助力，在广州变制成功。”

依以上所述，此次事变，无论是功是罪，都不能不归于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了。

（四）事变之中心问题

此次事变之中心问题，当然是因为中山舰开赴黄埔惹起了蒋介石之疑惧。

使李之龙调舰到黄埔的人又是谁呢？右派说这是共产派倒蒋倒国民政府的阴谋：然而共产派一向很推重蒋介石，“巩固国民政府”，他们在国民军失败后更提高这一口号，现在决无理由忽然倒行逆施起来。

李之龙方被共产党处以留党察看的处分，中山舰案初起，共产党颇疑心是李之龙受反动派运动所为，今竟指为共产党倒蒋阴谋，岂非世间不可思议之事！

李之龙既定计倒蒋，当不须有蒋令而行，蒋亦当然无此命令，此命令必为诱李调舰者所伪造无疑。且李之龙果已调舰倒蒋，何以还有暇在家高卧，这又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中山舰调动是此次事变之中心问题，此事如查得水落石出，或是共派的阴谋，或是他们颓陷共派的阴谋，也是彻底解决此事变之中心问题。

（五）结论

凡是中国人，都有拥护广州现在国民政府之义务，此次广州事变客观上实有使国民政府倾覆之可能；因此，事变之主动者，无论出于共派倒蒋之阴谋或出于右派倒共之阴谋，都应该受国民及国民政府严重的惩治，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应加以偏袒：这是我们的结论。

（选自《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出版）

中山舰事件前后（节录）

茅　盾

三月十七日上午从黄埔军校传来了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十八日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毛泽东问过海军局长李之龙。李回答：这是校长（蒋介石）的命令。本来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市内谣言很多。后来据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部队内也流传这个武装政变的谣言，而王柏龄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对部队的连长以上各级军官训话时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王柏龄师驻广州城内，他的训话由第二师的士兵传到全市，人心开始不安。毛泽东问过陈延年。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毛泽东这时预感到要出事了，他和我谈起这些事，皱着眉头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十九日深夜十一点半钟光景，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来到庙前西街三十八号，那时毛泽东和我都还没有睡，正在谈论广州的形势。毛泽东说：鲍罗廷回去了，加伦将军也回去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正说到这里，那位工友来了，见了毛泽东，就用广东腔的半生不熟的官话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李之龙新婚不久，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拉下，打了一顿，然后带走。毛泽东听说李之龙被捕，就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吩咐那个工友去找陈延年。工友去后，毛泽东默然沉思，显然是在考虑问题。我不敢打扰，也默坐相陪。杨开慧在楼上给小的孩子喂奶后早已睡熟了。

那个工友终于又来了，他说街上已戒严，但夜市未收，士兵们在赶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乱，所以他没有受到盘问。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问道，陈延年同志呢，见到没有？工友说，他在文远楼附近看见他带着他的秘书，据秘书说，是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宿舍。于是毛泽东不再多问那爱唠叨的工友，挥手叫他回去睡觉，对我说，他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我说："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离毛泽东的寓所不过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戒严的岗哨。但到军事顾问团宿舍时，却见士兵甚多，简直把宿舍包围起来了。毛泽东和我走到宿舍大门前就有两个士兵上前盘问。毛泽东坦然答道：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我说，"这是我的秘书。"士兵听说是中央委员，就陪笑道：请进去。我们进了大门，是个传达室，毛泽东叫我留在传达室，独自进里边的会议室。我在传达室先听得讲话的声音，象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呢？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

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日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毛泽东一气讲完，我就问结果如何？他叹口气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我又问：您料想结果如何？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选自《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附〕关于“中山舰事件”[①]

蒋　介　石

陈独秀同志给我的一封信，他是辩驳我对党代表宴会的时候所讲演的一篇话，他还声明，这封信是专为对于共产党有关系的事情而说。如果同共产党没有关系的，他就不来过问。对于这封信，我可以简括的讲几句话，可以很简单的拿一件事情来当作答复他的回信，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

我在党代表宴会席上的讲演，曾经再三声明。三月十八号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绝不承认三月十八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陈独秀同志以前同我的主张也完全相同，他曾于三月二十日以前给我一个电报和几封信，所论的意见大体相同，所以今天，我可以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他又来为高语罕辩护。高语罕在本校的言行，是不是与他所辩护及高之本人所声明

① 据蒋介石《总理纪念周训词》节选，另加题目。

的一样，这是不待我讲，各位就可明白的。高语罕在他油印给我的信，无异他自己招认他前后的言行相违，损失他自己的人格，我们革命党员说什么就做什么，自己错误了，就自己承认，不要抵赖。我决不敢冤枉人的。大家可以看看他这封信，究竟与他讲演的话是不是相同的？只要大家听过他的演讲，就可以明白了，就知道他这封信的话，完全是骗人的话，不是革命党员的态度，只这一件事，就可以证明陈独秀同志的信，对于事实没有详明，我实在不必多事答复。

我从来所讲的话，不单是不冤枉别人，并且有许多的话，我要保持别人的体面和人格起见，所以不能明言，我决不对朋友或同志攻击，排斥的。否则，就是失了我自己的人格；古人所谓"绝交不出恶言"，所以有许多话我不愿意讲的，对于别人人格有损失的话，尤其是绝对不敢讲的。此事并且当时我曾声明白：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如果我冤枉别人家来提高自己人格的——那样的人，绝不是革命党员，更不配做本校的校长！尤为本校长所深恶而痛绝的！

至于太雷的"要不要国民党"的文字，这我以为太雷是个国民党党员，是不应该讲这样的话。尤其他是跨党的党员，更不能发这些议论。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关于两党的事，总要使得精神团结，可以少讲一句伤感情的话，就少讲一句才好！比方我今天所讲的话，我实在不愿意讲，然而在我所处的地位，对于本校内部是不能不讲明的。象《要不要国民党》那篇文章里面的话，说"共产党脱离国民党仍旧可以独立存在"。这是无论什么人都承认的，何必多讲？如果共产党脱离了国民党就不能存在，这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至于说到共产党完全脱离了国民党之后，国民党就不能革命，不能存在！这些话！太雷是不能讲的。不应该讲的！他简直看得国民党没有一个党员了！比方本校已毕业未毕业的共有八千余学生，连教职员就有一万多党员，其中CP同志顶多是两千人，普通比起来，就是十分之二与十分之八之比，如果十分之二的CP党员退出国民党，而留下来十分之八的国民党党员就不能革命！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能讲的，谁都不能承认的。所以有许多地方，我们尽当责备人家，不晓得他自己早已讲错了！他那种犯纪律的话，实在是不许讲的。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或不是国民党员，这些问题，可以研究的，但亦不能讲这些话的。尤其是太雷，是一跨党分子，而讲这些话，徒然丧失我们两党恶感，引起两党恶感是不行的。共产党同志，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

本党所有的宣传机关和言论机关，可以讲到统统都属诸CP同志，就是我们的党报——《民国日报》、《国民新闻》，这样的机关报，也完全是交CP同志来办。要晓得，这完全信托CP同志能够同我们国民党合作到底。所以宣传上和言论上的机关，一切都由他处理，信托他、重任他，不去过问。这完全可以证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同志，毫没有存一些彼此之见。否则，国民党安能把这些重要的宣传机关，信托一个不相干的人，来污辱本党吗？不料今日《人民周刊》会复发生有这样的使两党生起恶感来的文章！这样的责任，本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应该负监督之责的。可是CP那方面，也应该有此责任，不能仅是加罪于一方面，大家总要互相体谅，两方面自觉错误，免去一分纠纷，就可以团结一分力量。

并且太雷那篇《要不要国民党》的中间，说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那末我前星期所讲的话——虽然不是完全要求校CP同志脱离共产党，却是要CP同志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如同太雷这样说，岂不是变了我这番话，亦是排斥CP同志吗？

我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呢？大家想想，一定晓得我决不是如此的。我们要讲事实，要团结合作，就要从事实上做起，要怎样才团结合作得起来。就要先研究怎样才能消除根本上的误会或冲突，不要现在种下了一个祸因，弄得我们同志将来自相残杀的。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尤其是我校长更不能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空空洞洞凭着理想，一口气讲出来，不顾前后左右有多少艰苦困难，这样子，不但不能团结，反要使之分裂破坏了！所以这种地方，在我们学生中ＣＰ的同志们，就要明白我上期所讲的话，所提出的主张，并没有是压迫ＣＰ同志来退出ＣＰ的。我完全是拿我个人的责任，在个人的地方要消除我们将来的自相残杀，冲突的种种恶因，这正是我想出解决纠纷的一个具体办法哩！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蒋校长演讲集》，1926年版）

中央通告第×××号

——介绍每个同志必读的小册子《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

（一九二六年四月）①

各级同学们：

自从去年“五卅”以来至现在，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各阶级联合战线的政策，着着成功，工人阶级日陷于孤立地位，所有四方八面向我们进攻的危机，已迫在我们眼前；我们要救济这个危机，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能够抵抗这反动势力的进攻，这乃是今后准备时期的工作原则，也就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工作原则。但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在宣传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始有可能。错误之最重要者如：（一）不注意地方问题；（二）宣传口号提得太高；（三）不懂联合战线政策之实际应用；（四）同志个人对外态度不好等。

中央特为此刊印一本小册子，总合我们数年来工作的经验，指出这些错误对于工作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名《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工作》。陷在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中的我们，只有依着这本小册子所指示的道路走去，方有活路，否则处处都是死路。望各区委、各地委、各支部接到此印刷品后，每个同志均发给一本，当令详细读过，其不识字者，支部应负责特别为之解释，必须使每个同志均了然于这小册子上所说的话，并须将本小册子宣传的影响，详细向中局报告。

〔附〕我们今后怎样工作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五卅”运动的高潮，到“三一八”屠杀告了一结束，也就是中国革命运动告了一段落。自“五卅”上海血案到“三一八”北京血案是一时期，北京血案后又是一时期。今后这一时期固然不是进攻时期，也不能说是退守时期，乃是一集聚有组织的群众革命力量并统一这个力量之时期；有了这个力量，才能够抵抗目前严重的反动势力之进攻，才能够进到比“五卅”运动更有广大的群众、群众更有组织更革命的一新时期。今后这一时期可称为“五卅”运动时期和未来的新时期间之准备时期。

我们已经不是开始工作，我们是继续工作，所以在过去工作中一切苦的经验，即实际工

① 这个文件刊载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校刊》第六期上，原文无作者和时间。根据内容和行文格式判断，可能是中央的一个通告，故收录于此。标题是编者所加，时间是编者判定的。

作中学的知识，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导师，在这准备时期工作中，须要把它一点一滴的都记在心头；这些经验与知识，任何马克思、列宁的书中，都未曾为我们具体的预备，是须要我们亲身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的。

落后的中国民族，当然还未能懂得民族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重要；可是在事实上，“五卅”运动确是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中之各阶级性之存在，当然是另一问题，而且永远是另一问题）向帝国主义进攻。然而帝国主义者却懂得这一联合战线之可怕，所以“五卅”运动一开始，他们马上便采用分离这联合战线之政策，如：以关税会议增加二五贿买军阀政府，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上海西商会容纳总商会要求的口惠，谎骗中国资产阶级，使他离开这一战线；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小资产阶级（学生及小商人），使之离开这一战线；最后则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压迫罢工，压迫工会，而“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低落下去。

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既为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所破坏，又加以奉系军阀之高压，中国的革命形式，遂由“五卅”运动一转为反奉运动。反奉运动中，虽然因为有国民军及直系军阀之加入，其声势颇大，而未有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充实这一运动，以致郭松龄败亡，国民军溃退，北京便生空前的大屠杀，反奉运动遂失败。同时，在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方面，遂由分离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而组成中国反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奉吴及一切反动派“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国民军进攻。国民军溃退，反动的奉吴军阀得了胜利，自然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反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成功；然而帝国主义者用心周到，他们以为单单组成和军阀反动派的联合战线，把大资产阶级放在外面，恐怕只能一时镇压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而不能使这一革命运动永远消沉下去，于是聪明的帝国主义者，最近更准备给大资产阶级以若干让步（如速结沪案，汉口、上海租界工部局增加华董，表示上海会审公堂可以交还等），把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也拉入他们的“反赤”联合战线，更进而利用大资产阶级，去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用改良手段即欺骗工人的手段，破坏工人革命的组织（如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惇对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说：“中国工人的罢工运动是有人鼓动领导有人利用的，我们何不亦利用之，别用一种方法，使其易于就范。”），至少也可以使中国工人及其政党陷于孤立地位，如此，才能够使中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即民族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不至于死灰复燃。

帝国主义者太聪明了，我们今后切不可太笨。在过去工作中，我们不会用心对付小资产阶级，迫得他们对我们发生怀疑与恐怖，五卅运动时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之破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聪明的帝国主义者破坏我们联合战线的政策及他们自己联合战线的政策，大部分均著著成功，尤其是最近，如北方的国民一军有参加北京惨杀案之重大嫌疑，如南方的广州事变，分明是敌人破坏我们联合战线的阴谋已达到我们的营垒内部，所有反动的势力四方八面向我们进攻的危机，已迫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救济这个危机，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这乃是今后准备时期中的工作原则，也就是民族革命运动中任何时期的工作原则。

如果我们的政策应付得不好，不能深入群众，不能获得群众，不能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便不能尽量利用各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之利害冲突，尽量的发展他们在客观上的革命要求，引导他们加入革命的战线；那末，不但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危险的地位，就是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都会因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威吓政策或欺骗的改良政策影响到

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消沉下去。

在过去我们未能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除去客观上的原因，我们主观上的原因也非常严重。我们在各地的宣传及活动都做得十分不好，不但未能深入群众，获得群众，而且有时故意的离开群众，说他们都是反动派都是反革命（这种情形在北京、武汉最甚）。我们今后要深入群众获得群众并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必须在宣传上及活动上极力矫正过去的错误如左各项。

（一）不注意当地的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而只有全国政治运动的总口号和全国的普泛的政治煽动。北京所出之刊物可用之湖南、湖北、广东……等地，湖北所出之刊物亦复相同。群众对于这种宣传感觉空远不能唤起他很深的注意，习久且生厌恶心理摈而不看，这是证明我们的宣传不能深入群众。我们要得到群众不可只注意很大的问题，尤其不可开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老套头，而是要注意许多地方政治人民生活，这些琐细问题，都是群众日常切身感觉到的。能够领导群众从事这些日常争斗，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训练群众的政治意识，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

比如上海的宣传，我们不仅做全国的政治运动，对于本地问题如：卷烟税风潮，闸北市政的纠纷，工部局越界筑路，米价高涨问题，……等，均须利用各种方法各种组织形式去参加领导。在其他各地，我们不仅研究全国的政治问题，特别注意研究本地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能引导当地民众日常的要求。只有在这样的宣传中可以扩大群众的联合战线，可以巩固我们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

领导这些日常争斗最好的公开组织就是国民党，所以以后各地对于国民党工作当更加紧注意。

就是全国政治运动的总口号，也应当利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种种问题，不断地向群众宣传，很详细地解释这些口号，使群众能把他们切身的日常生活的要求和这些总的政治要求——如国民会议之召集，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北伐等——切实的联结起来。以前我们宣传的缺点，遇着中央有关全国政治运动的口号，各地同志仅仅用各种团体的名义根据这些口号而号召表面的运动，却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央所指示的革命的总过程，因此也就没有在日常工作里不断的向群众解释这些政策的意义，甚至于用各团体名义号召这些运动时，连这些团体本身的群众，都还没有切实了解这些口号和政策，这是因平时没有有系统的经常不断的宣传之结果。这种缺点实在是因为我们没有会把全国的问题和各地方问题连结起来。

（二）第二个大的错误是：但凭主观的理论，不顾群众的心理，把口号提得过高，完全不懂斗争的战术，不知详细计算敌人的力量，不知怎样集聚一切反对敌人的力量向敌人进攻。要有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才能集聚这些反敌人的势力。若果口号提高了，色彩鲜浓了，使群众畏避，自己陷于孤立，甚或群众反被反动方面吸收过去，更是危险。自己以为很革命，其实破坏了革命，这种左稚的毛病，我们各地的同志做了不少的错误，以后应得十分的注意。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对于一切小军阀，如果能推他向进步的路上走，更不可向他提出过高的口号吓退了他。

（三）第三个错误是不懂得联合战线政策之实际应用：（1）不懂得联合战线必须是群众的，必须努力获得各派（反动派也在内）的群众，和他们的领袖联合是不够的；必须获得各团体之群众，获得各团体机关及职员是不够。过去我们在各团体中如工会、学生会、

农会及其他临时集会等等，每只看到一时工作的便利，只注意占据机关，多占职员，显出一种包办的形式，反因此使一部分群众脱离了这个团体，甚至于使这些团体分裂，分裂后我们即或仍占有大多数，亦属分散了革命的势力，况且未必能占大多数。所以我们要扩大及巩固群众的联合战线，统一革命的势力不使分裂，我们的同志在任何群众组织中都只是领导（事实上的政治领导），而不是包办，只是努力使群众愿与我们合作并接受我们的主张，而不是占据机关及多占职员。（2）不懂得联合战线必须有共同的要求与口号，若没有这一共同的要求与口号，组织上的统一必至于破裂无疑。联合战线这一政策，乃各派相互不提出自己的特有主张而提出各派共同的要求与口号才能够成立的；若我们固执自己的主张而不提出共同的要求与口号，这便是强要各派都向我们投降，而不是联合战线。联合战线之意义，不但是要他们让步向我们联合，我们也不得不让步向他们联合。我们向他们让步，自然是一个损失，然而如果我们有革命的计划，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为革命进行而让步，为扩大及巩固革命的群众势力而让步，这便是有价值的让步，不算是损失。（3）笼统的指整个的他派群众都是反动派都是反革命而不与之讲联合战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某一时期，我们甚至同右派、醒狮派、工贼下面的群众联合战线都要讲（如此次北京血案）。（4）联合战线不但要行之各阶级间，并且要行之工人阶级之本身，现时已有工人同志站在非同志的工人以外、工会会员站在工人群众以外的危险倾向，所以同志，与非同志工会会员与非会员，都有切实讲求整个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即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宗教工人群众联合战线之必要，非如此不足抵御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及工贼之联合进攻。（5）联合战线有各种形式，有经常的，有临时的，我们不可拘定一种形式。如济难会就是一个很好应用极广大的联合战线之组织，然而往往轻于表示我们的政治态度，过于显露党派的色彩，于这一联合战线之发展上尤有阻碍，也必须即加矫正。

（四）第四个错误，乃是同志个人对外态度不好，也给我们党的运动以很坏的影响。态度不好有二种：一是在群众中，外观上表现色彩太浓，有些同志，在各方面几乎要把C.P.的招牌挂在脸上，使群众一见便认识，或于非必要时把自己的党籍告诉非同志的朋友；其实C.P.的招牌绝不在脸上或口上，而应在实际活动上，而在每一次演说能痛快的说出群众所要说的话，每一种主张能切实合乎群众的要求，总之能使自身群众化，能实际领导群众，能获得群众的真实信仰。自然在某种环境或在宣传上有必要时，用不着隐蔽我们的面孔，但在一般场合，尤其是下层实际工作同志，在外表上色彩是愈灰色愈好。二是对社会一般人的态度太严峻了，换句话说就是太不客气了，因此社会上每有同情于我们的人，也嫌我们态度不好。我们的党，已经渐渐由少数人研究主义的团体，进步到一个群众的行动的政党，便不应再保留离开社会之别一世界的状态，而应该改变到打入社会的状态，因此我们每个同志为党之一员，同时亦为社会之一员，我们的社会还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社会，我们若以对无产阶级同志的态度对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便是一个错误。我们太严峻了，便不能和他们接近；我们太武断了，便不能使他们了解；我们太特别了，便使他们歧视；我们太操切了，更使他们骇怕。他们对于我们个人怀疑，往往遂至对于我们的党怀疑；反之，他们佩服我们个人，也会至佩服我们的党。在国民党工作中，对于国民党同志，这种个人态度更要特别注意。

此外，在各地宣传工作上，只注重形式而不落实际的毛病，亦须痛改。这种注重形式的毛病，不仅是对外宣传煽动不问群众的需要，只重主观的见解；即对内训练，亦只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不先客观的研究群众的意见，则所注入的理论，必不能深入群众之意识，

使他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打成一片。我们在党内党外的群众中，都要时刻留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领导群众的本领，只有在群众中虚心领受他们的指教才能够学得。必须有这种本领，才能领导群众争斗，才是领导群众争斗而不是下命令叫群众跟随我们争斗。

中央通告第九十七号

——北方政局与我们的对策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①

最近北方政局趋势已日渐明显，张吴的联合并未破裂，英日相互间的妥协，仍然继续其联合作战的目的，□□且以“反赤”为名消灭中国一切革命势力，其联合作战的计划大概是：

1.北京政府为直奉两派共同组织，不过这个政府一定是奉系的势力较大，因为吴佩孚在北方的兵力远不如张作霖，□知难而退，另谋别的出路。张作霖方面为对付实力未消的国民军起见，亦不敢抛弃与吴之联合，所以能形成一张吴妥协的北京政府。

2.张作霖向北发展对付国民军。

3.吴佩孚向南发展，先去方本仁、唐生智，及长江反吴势力，然后合闽、赣、湘、滇、香港及粤中陈炯明等遗孽，包围广东革命政府，谋一举而颠覆全国革命根据地。

4.英日主谋驱逐加拉罕离华，不惜破坏中俄协定，断绝中俄邦交。

帝国主义者这种阴毒险□的计划，已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反动时期（因为这个计划能调和帝国主义间、军阀间利害之冲突，而形成联合战线共同压迫中国革命运动）。吴佩孚向南发展计划，已经着着实现：（1）方本仁被吴利用方部下将方逐走。（2）又利用叶开鑫及湘中反唐军队围攻唐生智，并令江西派忠于方本仁之蒋镇臣由湘东出兵，既打击唐生智，又灭却江西邓如琢肘腋之患。（3）吴现令京汉局长劳之常以铁路南段附近地亩，向某银行贷款一千万元，又拟出售象鼻山矿以作南征饷源。吴攻唐之名义及计划虽然是为湘粤联合而发。唐生智若守不住湖南，则广东地位将陷于非常危险。因此各级党部应指挥所属团体有如下之工作：

1.对吴佩孚继续战争，反对吴佩孚“讨赤”出师之欺骗，要求和平。

2.宣传口号是：反对军阀战争！要求和平！召集国民会议！

3.在一般的宣传中，附带提出英日帝国主义驱逐加拉罕离华的阴谋，是在破坏中俄协定，□□□□中俄关系，灭除他们侵略的障碍。

4.尽力利用并发□□□□□的一切民众胜利，以打击吴之势力。

---

① 这个文件是据团中央转发的油印件刊印的，日期是转发时间。因油印得太模糊，许多字是揣测加上的，可能有加错的。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一号

——最近政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①

（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

最近政局发展的情形有如下之分析：

一、当反奉战争初起时，我们即看出结果若为国民军胜利，则民众革命的势力必得到一广大的发展；反之则帝国主义者必指挥直奉反动军阀造成一最黑暗的政治局面，要根本覆灭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势力，现在不幸因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分裂破坏，这个最反动的局面竟来到了，自国民军退出北京后，马上由北而南全国民众都加紧的受压迫。

二、但是在胜利之敌人的营垒中，为权利的分配，又已开始露出冲突的裂痕，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唯一重要的政象就是奉吴发生暗潮，此暗潮之焦点就是护法护宪之争执，及助长此争执之关系奉吴两方实际利害的内阁问题。奉不利于直之护宪造成直派的内阁，直因在北方军力单弱非从政治上进攻无由分得北京若干政权，遂演出现时北京之无政府的现象。

三、不仅吴张之间暗潮甚大，即张吴部下亦不统一，张作霖已不能代表整个的奉军，东三省内部有新旧之争，直鲁联军之张宗昌李景林暗斗极烈；吴佩孚本无多大实力，徒凭纵横捭阖手段，倚仗汉阳兵工厂的械弹，帝国主义的金钱，以形成今日之势力，但内容非常空虚，部下暗斗亦甚激烈，只要一处失败，便有全盘瓦解之虞，所以胜利后的张吴，将来的纠纷正多。

四、国民军退南口后，实力并未减灭，随时可以威吓北京政府，直吴在北方军事上虽远不及奉张，但随时有联国之可能，遂迫得奉张不得不对直吴让步；所以直奉军阀及其背后英日帝国主义者实际利害之冲突虽终不能免，然以政治的环境，又不利于即时决裂，不得不别谋暂时弥缝之一策，以和缓其急冲。其策为何？即继续军事行动，分讨南北二赤，使奉吴势力得分途发展，不至两力汇集于北方，随时皆可发生冲突；此策之见诸实行者，即直鲁联军进攻南口，吴佩孚进攻湖南，企图颠覆广东政府。

五、帝国主义者军阀这个互相妥协分工合作的政策实行，将来的效果如何呢？奉吴若真能分向南北发展，虽不能完全免除他们在北方之冲突，当能和缓其目前冲突的危机，不过吴欲完全覆灭国民政府，奉欲完全消灭国民军，事实上恐不可能，彼等在南北若得到相当的发展时，其相互关系自必重入危机，此时广州政府若有充分的准备，国民军在北方尚能保有若干实力，则直奉战争重开时，中国政局又必有一次新的大变动。（参看向报第一五二期《最近政局之观察》一文）

自然现时全国的政局，完全陷入于极反动的恐怖状态中，一切革命的进步的势力，处处遭受摧残，但是这种局面，恐难得到一长期的巩固。

第一、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侵略掠夺是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本性，他们相互间的冲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突虽能弥缝一时，终是不可避免，必然要到来的，国民军刚刚退出北京，而第四次直奉战争已经开始酝酿，军阀间权利地盘的冲突，已经闹得很凶，迟早终必爆发。

第二、因为这种极端的恐怖政策，不惟不能降低民众革命的热血，反将民众反抗的气焰日愈提高，“三一八”的屠杀，奉军在北方一带的暴行，使得每个极端和平妥协的人，亦不能忍受，甚至如王士珍熊希龄等亦垂涕而道，这都是只有驱使民众日愈走上革命道上的；山东河南一带不断的发生农民暴动（即红枪会运动），虽因无组织而暂归失败，但他的运动，却只有增高，并没有消灭。

第三、广东的国民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不能消灭，则随时可以威吓反动势力，可以促进军阀内部之分化和崩坏。

根据以上的理由，所以我们敢断定现时最反动的局面，欲得到一长期的巩固，比较困难。但若果我们只计算敌人的弱点而不计算自己的弱点，没有正确的应付策略，则此种长期的反动局面，亦并不是绝对不可能。

我们应该把工农运动、国民党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国民军，均算入反帝国主义方面的势力，在这许多部分的工作中，均有很大的不足。

第一、是现时的民众运动是分裂的，往往只是工农群众及一部分革命学生孤军作战，没有造成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因此力量自然薄弱，比如“三一八”的屠杀，事实之严重虽远过于“五卅”案，然因联合战线之破裂，反不能激起一个普遍全国的大运动，普通社会对此事仿佛冷淡，鼓不起他们参加的热心。

第二、是广州政府的基础并未十分巩固，从表面看广东全省固然统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粤开会表示左派在全国的胜利，然而其严重的危机也有为我们所必须知道的：

一、从三月二十日的事变可见左派内部尚有许多误会，几乎动摇国民党联俄联共的根本政策，几乎演出太平火并的悲剧！

二、右派反动派在粤仍潜伏着很大势力，三月二十日事变，及最近广州学生会内部的风潮，京沪右派分子之纷纷赴汕头，马超俊公然出面广州市上煽动兵工厂对政府罢工等事，均证明右派反动派活动之可怕。

三、广东的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等，他们的利益常与国民政府冲突，且有相当之武力（民团）与财力，足以抵抗政府，广东的土匪亦极凶悍，乌石山匪巢，举二军全力尚未攻下，东江罗浮之匪因山势太险，更无法消灭，这些反动势力，都可为陈炯明魏邦平等再起之根据。

四、上部机关自然是革命化了，但下部组织仍充满从前的贪官污吏，既不能推行革命政府的政策，反多丧失革命政府对民众的信用。

五、香港帝国主义者近在咫尺，随时可以资助反动势力直接的或间接的袭击广州政府，吴佩孚的挑拨阴谋，已深入我们的内部，而国民政府对于反吴亲己之武力，尚不知设法罗置。

北伐的军力与财政固须设法充实，而以上的危机若不能很小心的消弭，则前途危险正多，国民军的失败，唐生智的失败，国民政府均负有很大责任（吴佩孚攻豫攻湘时国民政府能积极援助决不至于失败），惩前毖后，我们又怎能十分乐观呢？

第三、是国民军虽其战斗力甲于全中国军队，而其现处地位亦有很多可虑地方：

一、十万大军居住塞外贫瘠之地，饷弹难□十分充裕，又受直奉联军大同、南口、热河

三面袭击，若直奉联军真能协力并攻，则应付须十分小心才能守住。

二、国民军将领之间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态度，必须有统一的行动策略，切勿再蹈二军覆辙，方能应付四围的敌人。

从以上的分析，所以我们虽知反动势力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敌人的内部裂痕正多，新的发展的局面很快又可到来，但是若果我们在民众中的工作，国民政府国民军□工□，应付失常，亦可造成比现在还要更反动的局面，固然革命运动不会因此消灭，帝国主义间军阀间的冲突不会从此除去，然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确实是受了很大的顿挫，又要多延若干岁月，多经若干痛苦，这是不可否认的。每个忠实的革命党员，试一回想郭松龄倒戈后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极胜利的局面落到极反动的局面，总应知道我们的错处是不能统一革命的势力，分裂了革命的战线，才演出今日的恶果；无论在民众运动方面，在国民政府国民军方面，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错误。

照现时大局的情形，自然不是一个革命势力积极进攻的时期，敌人内部的冲突固多，反动势力的统治固不十分巩固，然而革命的力量也尚待于整理和集聚，目前只要广州政府及北方国民军能守住现有的实力，等待直奉冲突之到来，已是很大的胜利。

我们现时的出路，已在《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工作》小册子中说得非常明白，“只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无一时无一事不努力深入群众，获得群众，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统□一切革命的势力，能够救济现时反动的危机，能够作将来新发展的准备。“如果我们的政策应付得不好，不能深入群众，不能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便不能尽量利用各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军阀等之利害冲突，尽量的发展他们在客观上的革命要求，引导他们加入革命战线，那么，不但工人阶级陷于孤立危险地位，就是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都会因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威吓政策或欺骗的改良政策，影响到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消沉下去”。

统一革命的势力，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原则，我们要真能应用此原则到事实上去，必须注意我们过去工作的缺点，使我们的口号能适合群众的要求，能集聚更广阔的群众，使我们的态度不为群众所畏避或惊奇，而乐与我们接近，使我们的行动不仅注意全国普泛的政治煽动，尤在能引导他们日常生活的要求。

在目前极反动的局面之下，加以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破裂，因此不能产生象“五卅”波动全国的大运动，不能用一种普泛的政治宣传把一切民众都组织起来，只有从一切小的斗争，部分的要求，地方的问题去打入民众。利用群众切身的日常生活要求，去说明总的政治要求；要在平时有这种系统的经常不断的宣传，要在这些工作中才能把群众集聚起来训练起来，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张时，使群众与我们一块。总之，我们现时的工作方法，是要注意地方的问题，零碎的问题，要从零碎的解决汇合到总的解决，要从地方的问题汇合到全国的问题，自然注意零碎的问题，地方的问题，而忘了总的政治的目标，必成为枝枝节节的改良运动。同时若只有总的政治要求，而没有这些部分争斗的工作，则这个大的运动也没有充实的内容，必□使全国的问题和各地方的运动能连结起来。

按照现时的政治情形，依照上说的工作方法，我们要求同志在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有以下之注意：

一、对于普通的国民运动市民运动：我们要在群众切身的日常生活问题去领导他们的要求，要利用这每个小的斗争中去取得群众，我们不仅注意工人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并要注

意一般市民的要求，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若果客观上是能给帝国主义军阀以打击的（如上海之华董问题，各省之抗税运动），我们亦应赞助他。我们要详细研究地方的政治、军事、财政等问题所及于市民生活的关系，要懂得各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会去领导他，使之皆成促进革命的势力。我们不要忽视一般的和平改良运动，在极端反动政局下的改良要求，亦具有革命的性质，若指导得好，更可使群众由改良的要求激进至革命的行动。在一般的宣传，最好是举出具体的事实来说，不要只空洞的高呼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等名词，令听者感觉太抽象，并且认为这是C.P.派的老论调，不愿意听，宣传的文字及说话总力求通俗，譬如我们宣传奉军之残暴，日本帝国主义援助奉军之种种事实时，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总要他听去不觉新奇容易接受。

过去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行动左稚，并且还未脱研究的小团体的习惯，不能称为政党，只可以说是一个学会，至多只做到游行示威发通电的工作，不能实际领导群众日常切身的要求，不能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主脑。现时这种游行示威发通电的工作，在极反动的政局之下，也不可能了，我们要改变活动的方法，注意小的问题，部分的问题，地方的问题，依群众日常切身的要求，努力促起罢工、抗租、罢市、罢课等实际行动，我们只有在这些实际行动中获得革命的群众，成为群众政治行动的主脑。

二、对于工人运动：我们不要希望现时奉张汉吴严重压迫之下能够有公开的工会活动，万一发现，必定是工贼的或妥协的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因为不如此则反动势力决不允其公开活动。所以我们对于各地工会之保持牌子问题，认为不甚必要，而特别注意于发展工会下层组织的秘密基础，建立工会运动中之党的核心，只要我们的职工运动有可靠的群众基础，则工会公开才有作用，否则公开亦是无用的。在现时严重压迫之下职工运动不能有很大的政治斗争，我们当注重部分的要求，零碎经济的要求，以促进工人的地位，扩大工人的组织，加紧工人的团结。

三、对于农民运动：取得农民，怎样引导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是本党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军阀连年不息的内乱，生计日窘，捐税日重，使得中国的农民已很快的走到要求武装暴动时期。近来国内的战争，已有农民参加，并显示出他伟大的作用（广东革命军讨平东江的胜利及河南国民二军的失败几乎完全是农民之赞否问题），尤其在自今以后农民对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作用，将愈增大，吴佩孚能利用河南的农民以驱走岳维峻，但并没有使农民的痛苦减轻分毫，反愈加重，则吴佩孚将来亦必为农民所逐，现时豫鲁两省红枪会之暴动，已是使张吴不能安枕了。

在湘粤两省农民运动比较可以公开的地方，我们当特别注意于农民的组织问题，勿使有不必要的暴动无组织的进行，但在湘粤以外之地，特别是直、鲁、豫、川等省，则当注意于无组织的农民暴动，因为在这些最反动地方的农民运动，当然不能事事照我们有计划有秩序的去进行，无组织的突然暴动事件，一定很多，每一次暴动无论其成败，都能给军阀以若干的打击，暴动刚一开始，我们便应速去指导他，要使此暴动能多得一点好的结果，能从这个无组织的暴动中，发生出组织来。

现时在全国一般的政治宣传，除注意上说之工作方法外，应提出下之口号：

一、制止“反赤”运动。

二、农民（民众）武装自卫。

三、统一革命势力。

四、巩固广州国民政府。

五、人民国民政府，国民军，联合起来消灭直奉卖国军阀。

六、召集国民会议。

七、革命民众的政权。

这些全国总的政治要求，必须与地方部分的要求连结，必须从一个地方许多具体的事实来引到这总的政治要求，才能使这总的政治要求有具体的内容，有拥护的群众。

斗争的总目标虽可统一，但在各地的进行上，须视其环境，更具体的分别指出其主要当为之事：

一、在北方的工作：A．当援助国民军使不为张吴所消灭，则对于将来北方的政变，尚可发生极大的作用。B．张吴攻打国民军压迫民众运动，皆号曰"讨赤"，我们当设法广遍的宣传赤与"反赤"之差别，不必替国民军讳言赤化，而积极的是认赤化，举出具体的赤与"反赤"事实对照宣传，在开始宣传时，可以不必拿出K.M.T.及C.P.的名义去说话，尽量利用一切灰色团体或秘密方法去散布并张贴此种印刷品。

二、在广东方面工作：A．当帮助国民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分子，巩固革命基础，统一革命势力。B．当使广东以外一切不与帝国主义军阀结缘之武力均结合于广东政府旗帜之下。同时，我们必须在工人中农民中革命的学生中，造成党的真实不拔的基础，并且努力获得小商人群众之同情。

三、江浙区上海一带的工作，须尽力赞助一般市民的要求，如华董问题、闸北自治问题等，虽属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但却可利用这些事件把民众组织起来，把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扩大，使工人阶级免去孤立地位。对于华董问题，我们可为这般资产阶级指出一条出路，即扩大华人纳税会的组织，使之造成一与西人纳税会议对抗之实际的市议会，令帝国主义不得不相当让步。在江浙区上海一带的宣传行动，均极力注意勿过左倾，总求能集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总之，现时的政局已到了一个极反动的时期，固然这个反动势力的统治并不十分巩固，敌人内部的裂痕正多，然而民众革命的力量亦很涣散，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内部的误会，忽略全国的政治，不能积极的有所动作；国民军三面受敌，应付不易；所以很难说到利用帝国主义军阀的冲突机会而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除非巩固广州国民政府，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势力，援助国民军守住北方，又能在一般民众的宣传中，扩大和巩固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则新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现时的工作原则是：

统一革命的势力。

取得群众，深入群众，扩大及巩固全国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注意部分的要求，地方的要求，从小的斗争汇合成总的革命势力。

巩固广州革命政府，维持国民军在北方的势力。

注意农民运动。

中央通告第一百零三号

——北方政局与我们的宣传活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①

各级同学们：

最近的政局尚在继续发展变化中。内阁问题，护法护宪问题，均密切关联直奉合作之命运。从今日的消息，颜阁已预备十三日就职，阁员分配奉仅得一内务，二张已拂袖出京，直奉的关系就从此决裂吆？不能遽然的断定，尚须视英日的关系，国民军与直奉双方的关系、国民政府援湘的实际行动、直奉军阀内部各自的冲突等等事实的发展如何，始能判定。因此现时我们虽可以决定说直奉终不免于冲突，但冲突发于何时及怎样适应当时情势而指出行动的口号，尚有待于经过一个时期的考虑；惟在最近很短的时期内——从现在至“五卅”——我们却有几件该做的工作：

一、是怎样把援助英国罢工问题及“五卅”周年运动联合在一块做广大的群众宣传。我们要借援助英国罢工问题举出许多具体的事实，指出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之联合性，打击国家主义派、戴季陶派“外不亲善”“仁爱性能”之错误思想。不仅口头宣传，并须设法有实际的行动（如募捐、英厂工人罢工等，但须注意这种罢工仅是一种政治的示威，当有一种表示，但又不可扩大），须使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的观念，深入于一般群众的意识，尤其是资产阶级及自由思想之大学教授等，应使得到一点觉悟。如果英国罢工能支持至“五卅”犹未终了，则“五卅”我们的表示当更激进一点。从现在起，我们即应宣传排货运动，一方面又努力募捐接济英国罢工工人及香港罢工工人；“五卅”周年纪念日到时，各地当尽力做罢市一天，罢工一天，罢□三天（自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并有游行、集会、演说等表示。这天应提出的总口号为：（1）废除不平等条约；（2）收回租界；（3）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此外，各地尚可斟酌当地情形加切合当地要求的口号。

二、对于现时政局我们提出下之口号努力宣传：A．反对英日张吴联合政府；B．反对贿选国会议员复职；C．人民自动召集“人民会议”解决国法问题。在一切排货、募捐的工作中，均可公开提到“反对英日张吴联合政府”的口号。

---

① 这个文件是团中央《通告一五五号》转发的，注有“（转录大学通告第一〇三号）”字样。日期是团中央转发的时间，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中央通告第一号

——反对吴佩孚战争中我们应如何工作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1　目前政局的形势

帝国主义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在军事上宣传上所造成的反赤胜利局面现已开始动摇了，具体的事实如：

1.英日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日渐增加，关税会议的破产即可证明，同时影响于借款无着，财政没有办法。

2.现时中央政府——杜内阁亦因内部的冲突已陷于难维持地位。

3.吴佩孚自田维勤部下发生反戈之事实后，已证明其完全不能向国民军作战（田部下反戈的军队已成为国民军的第一道防线，但田维勤军队与国民军直接对抗时部下尚不肯作战，何况现在对于反戈的田维勤军队，最近田维勤军队中又有新的反戈的事实发生，并闻田部下逼田反吴的消息。）

4.直鲁联军及奉军因田军实际上没有作战及谎报军情的结果，在南口战争中遭了很大的损失，加之毕庶登在青岛又有不稳消息，所以一方面痛恨吴佩孚，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军停止作战。

5.山西战事国民军已得到相当胜利，晋阎已与国民军议和（由李烈钧在太原直接与阎锡山订互相不侵犯的条约，雁门关以北之十三县划归国民军，以南归晋阎）。

6.刘镇华在陕西始终攻西安不下。

7.河南樊锺秀势力渐次扩大。

8.东三省灾荒及奉票之跌落，财政困难，无法救济，加以自郭松龄变后，实力大减，不易充实，已有对国民军妥协消息。

9.孙传芳已通电吴、张主和，此不啻请吴下野之表示。

10.唐生智已占长沙，迫岳州，江西之方本仁旧部，川黔之袁祖铭部队均输诚国民政府，北伐军大有长驱而下湘赣进窥武汉形势。

11.反赤宣传在民众中已渐生出反感，甚至如守旧报纸及醒狮报等均明白攻击反赤军之暴行而不愿与为伍。

以上这些事实不仅表现英日张吴间的冲突无可妥协，而且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势力已渐大崩坏，现在吴佩孚不但是没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成问题。孙传芳已准备代吴佩孚为新直系之领袖，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张作霖，一方面虽欲乘吴之败而伸张自己势力，造成青一色的奉系内阁，一方面亦预见到难免有一个冯蒋孙之三角联盟，请其出关不能不对于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津浦、京奉沿线特别布防。北伐军之胜利，已唤起了全国革命民众之注意，甚至影响到一部分小军阀均有输诚革命政府趋势，所以我们可以说全国反赤潮流现已到一低落时期，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

2　北伐的意义

北伐既成为现时全国革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究竟北伐在民族革命中占着什么位置，我们对于北伐应取什么态度呢？

在一六一期向报上我们已经指出，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民众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北伐之军事行动只是更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的局面，若果我们对北伐希望过高亦是错误。

现时一般民众对于北伐的确是存着许多幻想，存着许多等待倚望的心理，便是我们同志亦多有对北伐存过分的希望，把北伐看作革命的唯一出路者，这对于革命的前途是要发生不好影响的。我们并不是反对北伐是赞成北伐，尤其在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时吴既失势正是革命势力伸张之机会更须北伐。不过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1.令民众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而自己不努力工作；2.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3.为北伐而先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所以当具体指出现时广东政府出兵的性质，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

广东政府之出兵，第一步是为防御吴佩孚勾结香港帝国主义右派陈炯明及赵恒惕、叶开鑫等图谋覆灭广东政府，第二步是因吴佩孚地位之动摇，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故北伐的出兵就是反吴战争，就是制止反赤运动的战争，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北伐，才能使北伐更多具有革命的意义。

3　在此时期中我们总的政策口号

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已在一六三期向报上出一专号指出现时人民所受的痛苦，指出解放的出路，指出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提出我们的主张并各阶级民众共同争斗的政纲。原文说：“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市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斗争，由各地方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如此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由现在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将来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在这种困苦争斗时间，广州国民政府固然是这一争斗之拥护者，即对于一切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如国民军等，也应当要求其拥护这一争斗。但人民仅仅希图由这些拥护而达到成功，便是一个很大的

错误；至于希望军阀政府采纳民意召集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并执行国民会议之议决，那更是做梦。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对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收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决人民自己的痛苦。”

反吴战争中，本党应提出的政治口号，即是根据此次所发表的“对于时局主张”，使之变成全国民众的政治主张，并在各地方具体的实现起来。总括起来说，就是引导民众做推倒军阀政治，由民众管理政权的运动，在这运动中我们的工作是：

1.我们一方面应努力宣传扩大反吴战争的范围，同时应积极的提出广东政府之北伐或反吴战争之扩大是拥护“国民会议”之实现，不应空洞的模糊的宣传北伐，令民众发生坐待北伐之幻想。

2.指出人民不能仅仅希图由北伐之拥护而得到自身之解放，得到国民会议之成功，必须各阶级民众首先在各地方扩大自己的组织，并且联合起来，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以简单明了的口号：“反对军阀专政，人民团体参政”。由反对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影响北伐使更具有革命的意义，才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

3.我们对于现时反吴战争的北伐，及反吴战争范围之扩大，不能梦想他马上便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建立一国的人民政府，完全解除人民的痛苦。我们知道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必须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争斗。但是我们现在便应当努力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一般群众的政治行动，我们才能在此次北伐军事进展中，只希望得到以下的结果：

A.利用反吴及北伐的宣传在各乡各县各省引导当地民众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在这个争斗中形成各阶级联合的组织（如乡民会议、县民会议、国民会议等），并找到共同奋斗的政纲，使民众在民族革命争斗中更前进一步。

B.如果武汉为北伐军占领后，我们可以先□由各地人民团体自己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这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目前应即开始进行。

4.在各地方当努力造成各阶级民众联合的组织，这种组织或用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的形式，或用各团体联合代表大会的形式，为共同行动的机关，有共同行动的政纲，这个政纲一定是要能代表当地各种被压迫民众的要求的，这种各界联合团体，应当□成市民会议县民会议的过度机关，即对于地方政府成为当地人民的代议机关。

总之，北伐军事的前途，我们尚不能预言，可以为蒋冯孙的联盟支配全国的政局，使吴佩孚下野，使张作霖出关，造成比较进步的局面，亦可以是奉系与新直系（孙传芳）妥协而抗住北伐军不能下武汉，国民军不能出南口，我们只有更努力促进各地方民众积极起来做民众管理政权的争斗，可以威胁新直系左倾，可以使革命的前途更有希望。

4　在各地方我们具体不同的工作

在现时反吴战争中，我们总的政治口号自然是要求“国民会议”，要求民众管理政权，

并且这个宣传已经不是如以前仅是空洞的鼓动，而是要各地民众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逐渐形成各阶级联合的组织，议定共同行动的政纲，由一地方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民众的势力，民族革命的成功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困苦奋斗的。我们要从现在的斗争，更深厚革命的势力，惟这个工作在各地方实行时，因客观情形的不同，其进行步骤自然不是一律，特具体指明如下：

1.在广东，一方面应鼓动民众赞助北伐，同时应指出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的自由与利益。揭出香港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地主陈炯明、孙文主义学会右派等勾结捣乱的阴谋。广东政府只有在他能不牺牲工农的利益，可以保证北伐的胜利，可以巩固北伐的后防。广东区委现时应该利用已组织之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更引导他做地方政治，要求由工农商学代表大会而过渡到省民会议，虽不能说即由省民会议接受政权，然在第一步的宣传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同时自然要注意充实各界团体。

2.在北伐军已经占领的地方，如湖南应迅速扩大民众运动，要求人民的自由权利，我们的党当发表一湖南人民的总要求，组织各界人民团体的联席会议或委员会，对于省政府提出政治要求及主张，事实上要做到代议机关，执行革命的工作，指导湖南各阶级民众依此去斗争。当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的运动，要求废除过去军阀政府所加于人民的各种压迫，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权利。

3.在北伐军战事区域内如湖北、江西应引导当地民众做切实的地方政治争斗，应有地方政纲，号召各阶级联合的组织（省民会议、县民会议或各团体代表大会等），要求政权的民权主义化，很具体的反对一切苛税杂捐。这一运动的意义，一方面破坏当地的军阀政治，同时给北伐军做一种准备（在准备中甚至可与反吴的小军阀接洽，分裂军阀统治，惟此是秘密工作）。

4.在孙传芳统治下的地方，我们的宣传不仅逼孙与吴脱离关系，更当逼之向祸国殃民的奉张进攻，指斥他的和平运动是延长奉张在北方的统治，加重北方人民的痛苦。

5.在北方各地当号召民众积极的起来，响应北伐，惟不可造成等待北伐军解放的宣传。北方的民众要得到解放仍须自己积极的起来，从地方政治的直接争斗以汇合北伐革命的势力，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

张万和①

① 张万和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二号

——反对孙传芳致书蒋介石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今日（八月二十三日）上海各报皆载有孙传芳致蒋介石书，兹剪上一份以作参考。其主要意旨是劝蒋排除俄国人与过激派，“如以外国人指挥过激党则举国所疾虽欲避舍而不能，如去外国人，削除过激党，则不待用兵无可不商之国事”。又谓：“如易帜而来必尽东道之谊，否则将以讨赤御外相周旋。”

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

1.联俄联共政策是先总理生前决定，国民党大会通过，并非蒋介石所创，反对此政策即是反对先总理反对国民党。

2.反对帝国主义破坏军阀政治，必须结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国内革命的党派才能增厚革命的势力，所以联俄联共的政策是对的，是革命的政策，且并不因此而失却国民党之独立，正是以表现国民党之革命，孙而反对此政策，则孙亦在被革命之列。

在我校的机关报上宣传，则当用很犀利尖刻的文字，来反对右派及孙传芳，借此给右派一很大打击。要点是：

1.右派平日高唱反共反俄反对中山之联俄联共政策，现在孙传芳可与他们作同志（据我们所得消息右派确与孙勾结，孙之此信亦为右派分子手笔）。

2.孙传芳劝蒋勿用外人，但广东政府所用之外人，决不会效法上海外人之指挥孙者指挥蒋，决不会叫蒋效孙奉外人之命而杀刘华。

3.孙谓如去外人除过激派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可保证一切问题均可得中正适当解决，我们当抬出孙之丑史，劝孙勿说此大话，当新直系运动失败时，孙对吴恐慌万分，几十列车的军械运送保定，百万巨款效纳军前，放还盐税收入，派兵出发江西，战战兢兢唯恐吴之议其罪，今乃高视大言，谓自己能力可以解决一切实太不自量。

李承宣①

---

① 李承宣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五号

——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军的运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①

各级同学们：

英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现在被北伐革命军困在武汉，已陷于快要覆灭的境遇。吴佩孚之失败，就是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统治权的失败。不仅最近的将来的北京政府完全落在日人指挥的奉张之下英国无法参与，就是英国根深蒂固的长江势力也要受着打击，所以他要用尽方法来援助吴佩孚：

1.包围苏孙出兵援吴，每天路透社电总是伪造战报，淆乱社会视听。

2.香港政府援助陈炯明及右派反动派，密谋在粤捣乱。

3.派遣多数舰队驶赴汉口，希图防害北伐军的进攻。

据九月三日《大陆报》载，驻汉的英舰竟向北伐军射击。又据五日东方社汉口电，三日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各地同学应速起来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革命军"的口号，发表宣言，极力在民众中造起反英运动，以遏阻英帝国主义之阴谋。

李承宣②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② 李承宣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七号

——对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的政策[1]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

各级同学们：

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下，因为中派政权犹豫不定，所以工农商学各界之中左派空气日益高涨，而在全北伐范围内蒋亦渐渐不能做政治中心。恢复左派在党及政府之指导权实有历史的必要。所以十月一日国民党所召集之中央扩大会议，如在全国革命势力发展之情势中，其结果国民党左派必然要迎汪。我们的政策是赞助左派在广东在全国取得政治上的指导，所以应当实行下列的具体办法：

1.各省市党部务必使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十月一日的会议，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

2.我们同志在民党中，应向左派宣传“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便是必须汪蒋合作，使汪能主持国民党，若反汪并同时反对坚定的左派政策，不但是使北伐消失革命意义，而且可危及广东的根据地。

3.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

4.此次大会主要是要产生一个左派的政纲（对工农政策实施的政纲），为我们与左派合作的基础，为左派行动的标准，逼中派承认此政纲施政。至于汪可以由此次大会拥护出来否？须看当时国民政府的内外形势稳定与否，蒋介石能不因此离开北伐战线或反动否来定夺。若有以上危险是不宜急进的，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

5.扩大会开会时所在地之工农商学团体，可以做示威请愿运动，其他各地工农商学团体亦可发电去函表示对K.M.T.大会的要求和希望，以群众力量使大会左倾。

6.左派国民党部应当宣传革命军的胜利，在于坚决实行中山北伐之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自然在北伐军克服地方，应使人民团体所组织之市民会议省民会议等参加政治，然后全国人民才能认北伐的胜利是真正的民权的胜利。

总之，各地民党左派党部，应努力与民众接近，宣传中山北上宣言及第一次代表大会政纲。如此扩大左派的政治势力，然后在国民党中央十月一日的会议上左派的势力才有政治的社会的基础。

李承宣[2]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李承宣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钟字）第十八号

——关于当前工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各级同学们！

目前本党应集中全力进行下列各项工作。望各级党部于收到后即切实计划执行：

1.帮助北伐军保住其既得之胜利。

2.发展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民主政治运动：实现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提出工农商等被压迫民众的总要求，要求民选省政府，县政府，乡自治机关。

3.充实国民党左派的实力，恢复左派在广东的政权，实施左派的政纲。

4.本年内，湖南、湖北或其他北伐军国民军占领的省份，都必须召集全省农民大会，北方诸省及四川亦须努力发展农民运动——暴动或组织。

5.武汉各业工会须于本年内组织起来，以充实固有之工联。

6.在最近期内，北方各铁路之各大站及开滦五矿，都须有秘密工会的组织及我党的支部。

7.最近期内湖北、湖南都须召集全省工人大会，最好和全省农民大会同时召集。全国总工会即须在汉口召集全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全国工人经济上政治上要求的纲领；并须召请湖北、湖南工联多派代表出席此会，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8.进行奉系军队中之秘密组织及破坏工作。

9.进行保定系军队中之政治宣传工作。

10．发展我们党独立的政治宣传（最紧要的是2、11两项），力求普遍，更其是在广东、湖南、湖北。

11．发展全国反英宣传及排斥英货。

12．全党各支部都开始工作、活动起来。

13．各地党部，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运动中，在一切政治的宣传争斗中，都须善于运用联合战线的策略，使本党日渐群众化政治化，尤其是沪、粤、湘、鄂四区，务必去尽研究小团体的习惯。

14．北方区要开始地方（直隶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政治宣传与争斗。

15．沪、粤、湘、鄂四区都即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材。

16．上海以自治市的运动，发展各阶级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

以上十六项工作，限本年内须一一办到，明年正月中央应派人巡行各地方，即按照此工作计划，检验成绩。

李承宣①

① 李承宣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央通告（钟字）第二十号

——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各级同学们：

中局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与党的关系，有以下之新决定，望即依照执行：

1.军委主任应由该地党委员会之一委员任之，并参加党主席团会议，俾知全党生活。

2.军事特派员应与党书记发生密切关系，并商量工作；且应用他种名义（如组织部员）参加党主席团会议。

3.关于军队中党员组织，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

4.军队中同志的组织，应为纯粹按照军事系统的组织，如特派员干部小组等，直接归军委或中央军部管辖。

5.凡在军事范围内介绍入党的同志，除十分秘密只能在中央登记外，应向该地党组织部登记。即中央直接派往各地做军事工作的人员，亦须在所在地党部登记。关于工作则只对当地书记发生密切关系，而不应公开对党部报告。

6.决定同志做军事工作，应由党决定，并移交军委管理，然后再由军委分配其工作。

7.军队同志关于党纪律事件，由军事负责人员提交党部执行。

8.训练工作，应照准各地实在情形，本着党部每周训练大纲的精神，由军事负责人酌量在军队同志中进行。

9.离开或撤换军事工作的同志，应由军事负责人移交党部调遣。

10.以后在军队中活动去组织群众，在组织上可以支队为单位，依次递升；在名义上，可用民军、革命军、人民自卫军等。

李承宣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

——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的讲话

（一九二六年七月）

周恩来

国民革命军——我们要讲国民革命军，不得不回溯中国历史上的军队。讲到历史上的军队，要晓得从前社会的情形。当一百年前，中国完全是农业社会，在这几千年农业社会里，不是封建制度，就是郡县制度。在封建时期，诸侯军队是抽收农家的壮丁（征兵制）；郡县制度下的军队，是招募无业游民（募兵制）。所以，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治乱，不在君主的贤愚，概以经济的变迁为转移。每一朝代更替，时局扰攘，多由于社会上的失业游民太多，所以兵匪也多。八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潮流的震荡，工业上、经济上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社会上有经济不安的现象，因此发生了民族运动，如太平革命、义和团、同盟革命运动等。

近世中国军阀的起源，由于曾（曾国藩）、李（李鸿章），曾之湘军，李之淮军，完全是安徽湖南两省的人。他们俩以封建制度的地方军队，满他们士大夫的欲望。袁世凯、段祺瑞等以北洋军队的名目造成今日军阀割据之局。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曾、李、袁、段等军阀是一个系统。

封建制度的军阀，是依附农业社会而生存的，所以军阀必设法保持农业社会；但是现今的社会，受物质变动的影响，总不能永久保持其旧有的农业社会的状态。所以社会上经济益觉不安，民族运动也日益进步。

“五四”运动以来，民众益有很明显的彻底觉悟，革命潮流日益增加。

本来民众运动与军阀军队都是由经济不安的现象产生出来的，可是，近年民众已渐有觉悟，都趋于革命方面，所以发生了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都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下的民族运动的基础上，都是由于封建制度下经济不安的社会里崩溃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经济不安的民众，都集收于革命旗帜之下，不可让他走入军阀军队中。

军事政治工作——讲到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讲到军队的背景，要以社会经济不安为背景。

第一、军队中为什么要有政治工作。现在的军队，无论是北洋军或革命军，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里崩溃来的，他们一方面走入北洋军队，一方面走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

第二、在国民革命军里最近政治工作的目的。我们担任政治教育的人员一定要晓得革命军的使命。最近国民革命军唯一的使命就是反帝国主义。这个问题解决，就可消灭军阀及平息社会上一切不安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革命军里做政治工作，最要紧的是使广大的群众明

了帝国主义的罪恶，这是政治工作最近的目的。

第三、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范围。军队中政治工作范围极广，本是包括全军队的，但是在最近政治工作上要有如下的目的：（1）党化，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的缘故。（2）要使士兵了解本身生活的环境。现在士兵都是由于社会上经济不安的里面崩溃出来的。（3）要使官长士兵群众晓得时代的政治。革命都是由于政治上经济上不安的环境里发生出来的。所以，当现在社会经济不安的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

第四、革命军人的本身。革命军是建设的，军阀军队是破坏的，所以，我们革命军不是消灭敌军，扩张自己的军队，我们是为主义为党国而奋斗的。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对于民众、士兵、伤兵、俘虏，各种宣传都要用最经济的时间，做相当的教育及训练。能如是，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才能使军队去过的地方，人民不发生反革命的举动，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

第五、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设计。冯玉祥的军队有宗教运动，因此，他的军队格外的团结、朴实、耐苦、廉洁、守纪律。这是宗教运动的效果。可是他的目的是错误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军队，也有政治工作，广大的宣传目的是对的，可是他方法不对，所以结果（形成了）拿破仑第一帝制。最近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我们革命军里政治组织就是效法红军。

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所以我们要认识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就系统方面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要辅助各部处的工作，以进行政治教育实施的目的。就工作方面说，宣传队一方面向民众宣传，一方面训育士兵，得连长许可，可公开演讲，还不能公开演讲的时候，可觅士兵们作私人谈话。民众宣传要利用本地同志协助，方生奇效。

我们宣传员不独要守总政治部规定的统一的口号，统一的标语，一致的宣传传单，一致的小册子，就是宣传员个人的言语，也要受政治部规定的统一起来。以上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发生及军事政治工作的一个解释。希望同志们研究研究，以作将来宣传的材料。

（原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笔记簿》）

北伐向农民宣传大纲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

一、这回本党出师北伐，唯一目的，是铲除祸国殃民的军阀，中国什么频年撩乱？是因为军阀受帝国主义者的嗾使。帝国主义者欲使中国灭亡，利用以前强迫缔成的不平等条约，海关条约，使中国生产能力薄弱，我们农产品为了工业不能输送流通，及被帝国主义者的先进工业利用税率优先条约，尽量输送内地，掠夺土产，因而连带陷于一个落后地步。以致年来农业生产力，只有天天发生恐慌，不特农失其时，纵使得有余耕，然因为出品无多，终流于在失败境地，本党这回出师，是谋中国独立拯救农民的。

二、军阀下的农民惨状　帝国主义者利用我国祸国军阀，使之遗祸中国，造成一绝大反动局面，频年干戈相拚，所以在军阀铁蹄下，尤以农民受苦最惨，农民在帝国主义嗾使下的军阀，不特不能安耕乐业，而且我们的亲爱农友们，被他们以武力驱使而服役如当兵啦，当伕啦不止，还用政治力量去压迫农民，如预征钱粮，苛捐杂税如：江西邓如琢治下的农民已被水灾后，仍被他们征收新税除盐斤加价外，并新增十七种内地捐，又在内地举行征收邮包货税，使农产品受两重剥削；其次如东三省内地，自张作霖受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后，连年动兵，更且，公然联合吴贼佩孚，犯我境地，张贼近年以来，因动兵所用之军费，除出奉票为祸我东省农民外，东省十地，蕴藏多未开采，张贼如不甘受帝国主义利用，农业一途，我们农友可以偷生过活，自从张贼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后，除尽将东省富源抵押日人以供军费外加以军费浩繁，现处在张贼下的农民，日惟受奉票抵折赔累及大战后之农业荒凉，已救死不瞻了。河南一省农民，亦因受奉系小军阀张宗昌括削，寇英杰不特今年因旱魃为虐，农失其时，而且寇英杰纵兵扰民，加抽税项，使农民陷于绝境，现河南一省农民，多数起来反抗这种暴力，近且加入红枪会去，以为抵抗压迫者一种防御法，其余直隶农民因今年春耕失时，秋收无望，兵燹之后，继以旱涸，其已种之麦苗，非枯槁而死，即被褚玉璞军队喂尽，该省农民在此时期，真不知死所了。至吴佩孚蹂躏之下湖北农民，除吴佩孚溃决堤川，农民已恨入骨，即以此次重起，因为汲汲于作战为祸，对于内政不肯设施，以至襄水一带，被受水患，农民损失不下数千万，淹死男女一千余人，而新增苛税，鄂北之均县农民因该县官税改收洋钞，不用官票，曾因收集洋钞完纳租税不易因而自缢；最使农民受害的，莫如定期六月一日实行及验契借款一契三税以为生财之道，经引起湖北县议会力争反抗，其余长期牙帖，盐斤加价，丁漕改征，契税改现等事。其余各地军阀宰割下的农民，莫不预征钱粮，如奉三省征至十六年湖北征至十八年河南山东同时也征至十七年等苛政，无一而非吴贼祸国后所赐予我们农民。我们农民处在这祸国殃民军阀势力之下，农民在反动军阀势力下，只日惟有求死罢。本党这回出师，是直接解放我们农民辛苦，是把祸国殃民的吴张军打倒。我们应当一致起来赞助。

三、这回出兵北伐，是巩固国民政府革命大本营，吴佩孚嗾使走狗叶开钦，在湖南捣乱，意欲向我国民政府进攻，他们并不是痛恨国民政府的建设，乃是痛恨国民政府保护劳农

政策，他们压迫农民罪恶，恐他们蹂躏下的农民，有所比较而发生重大坚决的反抗，因此大肆造谣，什么“赤化”“过激”等口号，来涣散国民政府的革命力量，不过迭次失败，其计不售；现在他们乘推倒国民军出京后，竟大唱什么南讨南赤，北讨北赤等呓梦，嗾使走狗叶开钦出兵，他们直接想推倒国民政府使中国全民任其宰割，间接即是禁压农工利益，尤使广东农工群众，继续备苦他们的压迫如在他们治下湖北直隶河南一般。我们这回北伐，不特是巩固国民政府，而且是巩固拥护农工利益政策。农民应竭诚起来拥护这次北伐！

四、本党是为农民利益而奋斗，本党自改组后，即明定农民生活，并以全力助其发展，本党所在地之广东已得保障，广东农民，已得本党之助力，现已农民生活改善，已深认识本党政策是真正拥护农民利益，因此多数农民不特信仰愿意集中本党旗帜下去奋斗，并且努力地去帮助本党打倒反动派的助手，如肃清东江陈逆，歼定南路邓逆，镇压一般反动派，联合工友使罢工战线巩固，尤以驱逐反动派之杨刘等事实。因此广东的农民，是受国民政府保护的，凡在国民政府的农民，如有劣绅土豪贪官来欺侮，农民协会马上便可告诉政府下令解散。农民得有这个保障，所以广东省内各县的农村的农民，都有农民协会的组织，每县有县农协会每区有区农协会。他们无论有什甚事情，就把会来开，所以办平粜啦办公益啦，办选举啦，和其他一切事情，大家只有商量，便能够同心协力去做，农民有这样拥护本党的热诚，正因为本党确定有为农民谋利益的党纲。因此凡本党指导下的农民，已获相当的幸福，同时本党政府亦受农民相当的拥护。广东有组织的农友，六十四万余，广西八千余，河南二十七万余，四川六千余；湖南三万余，其余湖北山东直隶江西浙江江西热河察哈尔陕西等省的农民，已风云涌，自动的倾向本党主义这是本党能真正为农民谋幸福的效果。

五、我们农民怎样赞助北伐，我们农民既然感受北洋军阀的蹂躏，同时本党政府有这样替农民谋利益，这回北伐，是解放在军阀压迫下的农民，我们农民应当如何拥护北伐国民革命军？我们农民应当：

关于敌人方面：

一、断绝敌人的粮食；

二、组织武装团体牵动敌人后方战线；

三、侦探敌人行动；

四、截击敌人溃兵；

关于我军方面：

一、尽力代为输送；

二、充当向导前进；

三、尽量供给粮食；

四、维持后方秩序。

六、本党这回北伐，既然是肩负这样重大的意义，我们在北伐期间，大家应如何拥护，才使这回出师胜利？因此本党在北伐期中，自然比较平日，有点感觉痛苦，如负担税饷及筹款犒师。这一点小小痛苦，其代价绝不是如平常一般军阀霸占地盘般的无意义。因为这回出师北伐，是防御吴佩孚南下，是免除吴贼南下时所赐予农民的痛苦，假使这回我们大家不努力拥护北伐，给吴贼打下广东，不单止平日爱护你们的国民政府要倒，并且你们的痛苦，越发增加。所以这回北伐，我们如有感觉有点小小痛苦时，也要忍耐向真正敌人方面打倒，万不可只顾目前忘记后面！

七、我们对这回北伐，既然彻底明了，我们应该高呼口号：

一、以实力拥护国民革命军北伐！

二、所有革命农民起来参加北伐！

三、北伐是继续孙总理遗志！

四、北伐是巩固中国国民党扶植农工政策的策略！

五、农民拥护北伐即是拥护自身利益！

六、打倒压迫农民的军阀吴佩孚张作霖！

七、农民解放万岁！

八、拥护国民政府！

九、中国国民党万岁！

(选自《农民运动》第2期，1926年8月10日出版)

〔附〕出师计划之策定

初期预想敌人之实力　国民革命军与全国大小军阀之兵力，已详前一二两节中。两相比较，何啻以一敌十，故于应打倒之军阀中，不能不略分先后，以期次第铲除。在当日情况下，吴佩孚因缘时会再度登台，颇欲以一战声威震慑海内，而西南又为渠梦想所必得之地，亟欲攘湖南为己有，以便由湘寇粤，是直接欲加害于吾政府者，吴佩孚也。闽周荫人、赣邓如琢虽亦随时有侵犯我东北江之可能，然俱惟孙传芳之马首是瞻。此时孙方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暂时自认满足；且其人乘机伺隙，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鹬蚌之争；吾知其未必亟于谋我也。张作霖心雄力厚，其势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吾政府权衡轻重，决以打倒吴佩孚为先。此北伐初期所以有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之口号也。

吾党军既决意首先对吴作战矣，而细按吴氏对南实力：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部驻守汨罗北岸，平江、通城、岳州、澧州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枪三万余；陈家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拟此数；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指挥之湘军亦有二万；再益以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约可得枪十万。除谢沈等部溃败，余贼不堪一击；唐福山所部及湘军若干部分战斗力薄弱外，余俱可以一战。闽赣方面，虽无亟亟攻我之心，要不能不作相当之防御；尤以后方治安急待维持，绥靖部队务不可少；故统率入湘部队才三万八千枪耳。桂方虽与黔周西成正商妥协，暂图和缓；然对于妄大自尊之滇唐，不能不留全省兵力之半(九团)，以备缓急，外此则唐生智之前敌部队而已。以是而欲打倒号称百万众之军阀，人咸以为非愚则妄；然吾党本总理之遗训“革命军作战，当以一对百”，视之毫无畏色。

我军之作战大方针　本军作战大方针，于十五年七月一日军事委员会颁布集中计划训令中得窥其旨趣如下：（编者按：原训令文略，改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所载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部队动员令，令文见下。）

敌吴佩孚军之作战方针　吴佩孚作战方针，未能尽悉；然就其布置行动有可得而言者如

下：（一）仍思接近政府，把持中央。（二）对于国民军务图消灭，以泄反戈之恨。（三）对于党军北伐，初不甚重视。基于右述之三种心理，故吴氏甫得出山，即通电就讨贼联军总司令职，并拟由河南出师，与孙传芳会攻徐州，讨伐把持中央支配政治之奉张。其后张吴间互相谅解，成立妥协，吴氏遂移其讨贼之目标于国民军；实则吴氏固未尝不欲独占中央；徒以大败之余，元气凋丧，虽拥护者号称若干人，究可为用几何？此点在吴氏心中，未尝不深思熟计；与其一往直前，胜负尚不可知，何如暂分杯羹，慰情聊胜于无。况国民军为已深虽，权衡轻重，莫急于此，此于吴氏攻取南口时，吾人早知其用意之所在也。至我军出师，在吴氏亦以为历年北伐，俱假借革命者成反革命为之前驱，甚至犹有甘受军阀利用之不肖党员扰乱于后，师行未远，即中道弃损，今昔当不甚差殊。况唐生智已明令征讨（吴已下令讨唐），叶开鑫那足可戡乎，党军若果北来，更加以驻湘鄂间各直系旧军应付，殊有余裕，再由孙传芳转令闽赣以相当之兵，出潮梅南始，以扰乱后方，或出庾永莲萍，以抄袭侧背，党军必知难而退。讵知冯未及除，身已先败，此又吴氏之所不料也。

北伐部队集中计划　我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既已动员准备完毕，于七月一日送给以如左之集中训令（按：下即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部队动员令）：

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除第四第七两军先行出发，协同第八军相机前进外，兹特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各军前进集中计划、各项图表随令颁发，仰即遵照。此令。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中正。

附集中湖南计划

（一）敌人占踞湖南湘乡、湘潭、醴陵一带，正在待援中。赣南军队亦有敌意，宜加注意。湘西贺龙部，现正进攻常、澧。彭汉章部，亦到湘西麻阳。

（二）北伐军以先行肃清湖南境内敌人以便会师武汉为目的，拟集中兵力于永丰、衡山、攸县、茶陵之线。

（三）各军为前方应战及掩护主力集中起见，其任务如左：1.第四军于七月十五日以前，先行集中安仁附近，如无别情，俟第三军先头部队到达郴州、安仁间，再移向攸县集中。2.第七军于七月六日以前集中永丰附近。3.第四第七两军集中完毕时，敌若来犯，应协同第八军反攻，努力击破敌人，相机进占长沙，另待后命。4.第八军仍在衡山附近集中，俟第四第七两军集中完毕，如敌来犯，应协同该两军力图击破，进取长沙；若敌人于我第四第七两军未集中完毕间，而以优势兵力压迫该军时，应以保全实力为主，暂退衡州，诱敌深入，俟第四第七两军实行会战时，协同反攻，努力歼灭之。5.第二军向桂阳、酃县前进时，其任务：一方面为威胁赣南敌军；一方面掩护我军主力集中。若未到酃县以前被敌攻击时，应努力将敌击破，速向酃县集中。6.第五军第十六师之四十五团，集中桂阳，监视赣南敌军，保持第二军后方之联络；其余两团另有任务。7.第三军集中茶陵，第六军集中安仁，监视江西方面敌人，并策应正面。8.第一军集中衡州，为各方之策应。

（四）兵站：1.兵站总监部在韶关。2.第四第八两军兵站监部在耒阳。3.第一第三两军兵站监部在郴州。5.第六军兵站监部在永兴。4.第二军兵站监部在桂阳；第五军之一团，归第二军代办。6.第七军兵站监部，如情况所许，务位置于衡州。

（五）总司令部现驻广州；各军集中完毕后，进驻韶关。

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中正

（选自台湾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12辑，1955年版）

〔附〕加伦的战略思想

早在加伦回广州之前就已最终作出了进行北伐的决定。1926年4月，由蒋介石（他那时的头衔是步兵和炮兵总监）、总政治部和作战部主任、以及总参谋长李济深所组成的委员会就开始工作了。在委员会里我们一些顾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到5月进军计划的两种方案已经拟订好了。最初的方案预定北伐分为三个阶段。

在计划前言中指出，一些最大的军阀集团是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控制之下的”：张作霖在日本势力控制下，吴佩孚是英国控制的，孙传芳是美国控制的，唐继尧是法国控制的。

第一个计划规定了进军湖北，占领湖南和江西。部分军队开往江西，以便占领赣州——吉安一线，向该省主要城市南昌挺进，进而在武昌与其他部队会师。应派三个军（六个师）攻入江西，四个军（八个师）打湖南。

计划制订者的意图是要达到如下目的：一、集中国民革命军的武装力量，做到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并保证从其他各省给予必要的支援；二、与北方的国民军，与江西的方本仁，与湖南的唐生智达成协议；三、联合孙传芳，并联合四川和贵州，从而削弱敌军力量。

我们看到，在第一个计划中为一些正确的主张打下了基础，但是它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势必同时对吴佩孚和孙传芳作战。应当不使孙传芳转入进攻江西才好。而闽粤边界方面对孙传芳进攻的威胁是没有防范的。后来证明这个失算有多么危险。

因此，加伦返回后的首要任务是证明对主要的敌人必须各个击破。

1926年7月5日，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在一份报告中阐明这个问题说：“计划规定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两省。准备派出大约十五个师出征，留在广东的就不过六个师了。进攻湖南和江西的兵力几乎是平均分配的，根据该作战计划第三军和第四军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应向湖南推进。

“从我来以后的最初日子起，我一直把修改这个计划、把战争局限在湖南省作为一项任务。经过多次会商，6月23日我终于使他们同意修改计划，放弃立刻向江西进军。”

必须解释一下，加伦竟不得不为坚持这个合理的作战计划而进行激烈的争执，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加伦的宗旨是要使革命武装力量尽速取得胜利，而中国指挥人员的上层分子却是从狭隘的利己主义出发的。

在湖南唐生智将军果然脱离了吴佩孚并与国民革命军缔结了协定，他坚决反对谭延闿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的湖南部队进入本省，他已经自认为是该省的督办了。他与“保定帮”的第四军军长和第七军军长保持着联系，并通过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保定帮”打算单独占领湖南后对抗蒋介石，对抗他要成为拿破仑的利己主义企图。

谭延闿力求占领江西作为丢失湖南的补偿。

蒋介石也打算绕过“保定帮”，经过江西及其省会南昌到长江，到他的同盟者东边，并闯进上海，去与那里的资产阶级接上关系，等等。

加伦懂得，“三月派”在军事上的削弱最终是对革命有利的。“保定帮”“左”的花言巧语和漂亮空话也可能被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利用来在他们的地区发展群众运动。应该表现出某种策略上的灵活性，以便减轻那种掠夺性的野心，这一点无疑是做到了。

上层将领们找到了妥协的办法。国民政府主席的位置给了谭延闿作为补偿，又于1926年6月9日任命蒋介石为北伐总司令对他进行奉承。

北伐的新计划是李济深根据加伦的主张拟订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在6月23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这个计划。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打下武汉，占领“帝国主义走狗——吴佩孚的巢穴”。然后与国民军汇合。为了保障右翼不受孙传芳的攻击，有一路部队留作主力的预备队。7月13日部队应按命令在指定地点集结。

1926年（民国十五年，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7月1日军事委员会签署的命令中说：“为继承孙大元帅的遗嘱，我军以民族革命利益、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宗旨，消灭军阀和反革命分子。肃清湖南省后，应将国民革命军的所有部队集结在武昌、汉口地区，并与友军国民军联合。届时便能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

（选自《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叶挺同志参战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九日）

独立团于五月二十日奉命由广东入湘，当时全团人数有二千一百余名，步枪一千三百余支，水机关枪三支及手枪四十余支。五月三〔十〕日第一次在安仁渌田之役虽将敌击退，但损失步枪三十余支，被俘士兵十余名，伤亡三十余名。经此役后即进据攸县，曾成立补充兵一连，以补各连缺额。在攸县驻防一月，四军后援部队始达到，即于六月十日进攻泗汾，进占醴陵。此役阵亡连长两员，重伤排长一员（均同志），士兵三十余名，获步枪一百八十余支，营退炮一门、子弹数万。此役第一营在敌强袭渡河，并与谢文炳增援部队千人相对抗，卒将敌击溃，官兵勇敢精神颇为友军所赞叹。在醴陵驻防约十日即移驻浏阳，至七月十九日始攻击平江，获敌枪三百四十余支，水机关枪一支，迫击炮两门，俘敌官兵四百余名，此役阵亡士兵三十余人，伤连长一员。入平江后，翌日即向通城追击，抵粤汉路中伙铺车站时，截获敌退兵孙建业部一团，缴步枪一百五十余支，水机关枪一门，俘敌团长一名及官兵四百余人。八月二十六日我军追敌至汀泗桥，独团为预备队，后仅第一营加入作战，获敌营退炮一门，迫击炮一门。二十七日敌几全军覆灭，独团追击，首先占领咸宁，此地甚险要，经过六里长之铁道，两旁均为水淹，冒险前进，毫无顾虑，颇得友军赞许。此时吴佩孚及嘉谟适由武汉赶来，拟死守武胜桥，以三团生力军在密林内占据第一线阵地，第二线间有大部队伍，吴逆亲临阵地督战。独团及三十五团（十二师）奉命为第一线攻击步部队，于昏黑迫近敌阵地，因地形极复杂，是夜三十五团与敌相搏，死亡甚多。独团阵亡连长一员，及翌日拂晓，我团因所据阵地甚危险，不得不向敌突击，即将敌击退，遂退出至敌第二线阵地，猝遇敌大军压迫，友军救援来到，独团受损害最大，后我军援队加入，即将吴逆击退。独团即暂在原地休息，以他军担任追击，此役重伤营长一员，连长一员，排长四员，士兵一百余名，总计伤在一百五十人以上。

九月五日独团奉命为攻城部队，以第一营为奋勇队，拟以竹梯攀登城垣，天未明全营迫近城下，受敌猛烈射击，加之以手榴弹及大炮之威力，不二十分钟全营几为敌覆灭，第二营加上亦受大害，至天明乃不得不撤退。此役阵亡营长一员，连长三员，排长四员，士兵六十余人，伤连长一员，排长二员，士兵八十余人，损失步枪四十余支。现城尚未攻破，阵亡官兵均曝尸城下，无法收取，亦云惨矣。

总计独团历次战役伤亡官兵在四百人以上，逃亡病死亦逾二百名，故实力减损甚大，现作战步枪约八百余支，余均运返后方。

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补充缺额，扩充尚在其次。

总计历次战役获枪约七百余支，可成立补充兵两营，现拟招新兵一千名，但需巨款接济，否则将束手无策。

补充下级干部在此地已渐次进行，惟将来如扩多两营时，则须粤沪再派人来也。

（选自《北伐战争》）

北伐战况报告[1]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蒋 先 云

这次北伐在军事上，可以分作两个时期：一为讨吴时期；一为讨孙时期。

我们军队此次在前方的布置，左路与中路讨伐吴佩孚，右路讨伐孙传芳。在战略上说，先专讨吴，后再讨孙。故初与吴战的时候，不但不与孙传芳决裂，还与他虚与委蛇，使他不同时向我们进攻。故自七月二十七日，校长出发，到九月中便把吴佩孚打倒了。这次讨吴的成功，在大的范围说，是由于得到民众的援助。在湘经过的一、四、七、八各军纪律甚好，故于平江、株州等役，民众每每扰乱敌之后方，间接给我军以莫大的援助。此等处，吴佩孚原不及料，平日只是讥诮我们说大话，无实力。到此始给他个利害，他已认识清楚了。讨吴之后接着讨孙，这个意义，就是出师北伐的本意。北伐的意义是要打倒吴佩孚之后，永不使有第二吴佩孚继起。

“五卅”以来，民众势力异常发展，真能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其最恐惧者，即我们新兴的武力。故他们一方极力援助讨赤，一方设法缓和张吴间的冲突，使其一致向我们进攻。湖北既下，外人恐慌益甚，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便预备了一千万给孙，助其抵拒革命军，但实际孙传芳只得到六百万，便已失败了。故余剩的四百万，已停止拨付。

孙传芳原先以主力屯驻赣北的用意，是静待我们的胜败，而施其狡计。假若吴佩孚败了，他便率师入鄂，代吴占驻武汉。假若我们败了，一方由赣西出湖南，堵截后路；一方由赣南攻取我们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吴虽胜，以为不过占有湖南，一时决难与彼争江西或广东。其用心可谓至险[2]。

孙传芳素性狡猾，其取得闽、浙、苏等省地盘，均是以巧取胜，未费多大力量。故于我攻吴时，他一面袖手旁观，表示不参加任何方面，一面却暗中布置甚力，以备时机到来，施其狡计。故当时我方一面亦虚与委蛇，一面亦充分准备。现在我们得萍乡、袁州一带并攻近南昌时，孙传芳便限我二十四小时退后，不料此时他又得到张宗昌进兵徐州的消息，二十四小时还未到，他又有表示和缓的电报到了，我们当然不受他的骗，还是积极的进攻。以二、三军攻赣西，一军攻修水一带。当校长还未到岳州，一军六军、一师在南昌失败，损失甚巨。当时因交通阻塞，指挥不统一，待三军到高安，一师业已退却。校长以二军、二师归鲁副军长指挥，向南浔铁路进攻——孙传芳之主力军即在此。[3]

当第一次南昌失败时，损失甚巨，影响全局，故必后退数十里，以图补充整顿。此时孙传芳的走狗报纸，便说我们如何败退，其实交通不便，消息不灵，本有急图整顿之必要。进攻德安时，两得两失，我们自己援军还不知道，故在火车上指挥，又极利便敏捷，故作战不仅仅需要军事人材，即交通人材亦不可少。本校此次增无线电科，亦即此意。校长布置完好

---

① 据《纪念周中蒋先云同志演说词》节选，另加题目。

② 在此删去一百二十余字。

③ 在此删去三百余字。

之后，即下总攻击令，第七军于十一月二日占领德安，冲破敌人后方阵线，一方面北攻九江，南攻涂家埠。攻破九江之后，孙传芳、卢香亭逃回南京。涂家埠攻下之后，便直下南昌，生擒敌人军长三人，旅长、团长无算，缴械约两万余。这次战争之激烈，是民国十五年来所没有的，因为双方都是主力，孙败不但不能保守江西，江浙都要动摇，假如是我败，也不只湖北、湖南成了问题，就是广东也很危险，所以彼此都拿出全副力量，拼个你死我活！这次战胜之后，我们想黄埔同学一定要说，我们自从去年两次克复东江到现在，都是勇猛无敌，战无不胜，其实在外人看起来，我们同学却发生了许多毛病——骄傲、疏懒、不守纪律，军事训练也不如人，受人的藐视①。

连日报载奉鲁联军南下，说得多么热闹。表面看来，似乎是孙张已经联合，向我军进攻，其实是各有用意，互相利用！张宗昌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张作霖很是嫉视，奉军内部，因为权利的冲突，已将瓦解，所以应孙传芳的请求，出兵南下，最大的目的，就是占领江苏，把地盘重新分配，和缓内部的冲突。孙传芳自九江败后，嫡系军队完全消灭，自己知道江苏难保，所以决请鲁军南下，使奉军和革命军打，自己好退守浙江，休养实力，预备卷土重来。这次孙传芳到天津，奉张待他很好，一面把军队急下浦口，但是到了浦口，却又要孙传芳任前锋，换一句话，就是说我奉军已经到江苏了，你孙传芳应该赶快搬出去。奉军要占江苏地盘的心思，完全暴露。至苏皖内部情形，陈仪、周凤歧早有拒奉的决心，陈调元与我军常有接洽，不允鲁张假道，且天津会议，吴佩孚很不赞成，奉系军阀内部又常冲突。总括起来说，他们想做他的"讨赤"事业，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的，不过是想仰承帝国主义的鼻息，来延长他们最后的命运！我们第一次北伐的成绩，已经打倒了孙吴，我们最后的敌人，就是奉张，第二次北伐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我们最后的敌人②。

从前校长要筹备组织黄埔同学会，其意义是要团结我们革命的力量，但是有些同学误解了黄埔同学的意义，什么事都来请求，引起了内部的纠纷，同学会也不知道如何去引导同学，每用一种公文，引起同学的不满意，大家要知道，同学会不是对外的，也不是保障同学的利益来造成一个黄埔系的，同学会是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要把黄埔造成革命力量的中心。我们要把同学会由黄埔扩充到全国，成为革命的中心力量。以革命和不革命为标准，是革命的，俄国人都要联合，不革命的，就是同学也要打倒。同学们作文说话，多不负责任，致引起外人的谣言，自己打架不要紧，使上海各报——尤其是商报说得不象样子，俨然我们革命的力量成了一盘散沙了！我们要认清楚同学会没有多大力量，不要遇事要求，同时学会里面的人，也不要遇事拿命令来说，致引起一班同学的反抗！我们以后应该在革命的利益上着想，不要各人自由拿出意见主张，引起种种纠纷，要一致的听从校长主持。就是校长未见到的地方，要补充意见，也还要依法定手续，由党部提议，或者打电报商量，否则对于革命前途，有莫大的损失！校长有一次因为这事，曾专电辞职，电稿被我收了，劝他不必如此，以后各同学应改弦易张，不要再象从前的那种样子。

兄弟今天所讲的，一方是我个人的话，一方是校长的意思，总括起来可以分做三点来说：

第一点是在这次北伐我们所得的教训，我们前几期毕业的武装同志，在战线上只有冲锋陷阵的精神，无平时修养的精神，勇敢牺牲固然是好，但是没有修养，岂不是冤枉送死？我们在后方未毕业的同志，应该保存这冲锋陷阵的精神，要注意修养。

① 在此删去一百余字。

② 在此删去八十多字。

第二点是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我们自从北伐以来，军事上节节胜利，各同志不免有骄傲和轻敌的心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打倒了吴佩孚、孙传芳，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敌人张作霖。张作霖的军队虽然不大利害，而他的背后却有各帝国主义者帮助，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够骄傲轻敌，并且还要从事修养，补充实力。有了充分的准备，才能打倒我们最后的敌人。

第三点是我们应该团结精神。校长在前方非常焦劳，对后方非常担心，望各同志不要时起纠纷，要无条件的团结起来，努力去做国民革命的工作。

（1926年12月9日《黄埔日刊》）

（选自《黄埔军校史料》）

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发表）

（一）加同志报告

一、十一月五日孙传芳嫡系军队被我军打败，十一月九日又把从铁路退往湖边受我们南北包围的残余军队完全缴械。在那天，计缴得枪四万支，炮数十门及许多机关枪，尚有许多武器被敌人沉没湖中。孙军从江西退逃者：从九江——警卫团及孟昭月一团；从涂家埠有三四千人；战前由赣东退出刘宝悌、谢文炳等四五千人（无战斗力的），邓如琢的张旅因与夏超有关系故退往东南。此外周凤歧一师没有参加作战，从九江退去，据我们的消息，现在退往浙江去了。九江南昌现约有四万人以上的俘虏。

鄂东的战争，唐生智没有弄好。敌人王普、陈调元退往安徽，我军既未得俘虏，又未得战利品。不过在十月十五江西的作战中陈调元损失很多。

二、最近被我们围困的江西军队，虽然和方本仁有关系，方要想从这些军队改变为自己的军队，但是结果总把这些军队解除了武装并且没有把方本仁加入江西政府。

三、最近几次作战当中牺牲最大的是广东的几军，第七军和贺耀祖师很狡猾，只是积极的追击溃退的敌人，因此他们得大部分的战利品。我们的损失很大，仅在江西作战死伤将近一万五千人，如果计算这次出兵以来死伤，当在二万五千以上，病疾与逃亡的还未在内。广东各军中，中下级军官损失很大，约占百分之七十，而团长则占半数。

四、虽然最近亦多少有点补充，现在广东各军的数目如下：

第一与第六军各二千人；第三军约三千人；第四军旧的有战斗力的三千五百人，新的二千五百人，第二军约六千人（战斗力少）。

此外与国民党国民政府发生关系，其实是求得个人利益及增多其地位的计有唐生智的第八军，共计六师三十六团，约二万五千至三万枪，其中有一万五千人比较的有战斗力，其它以一、二、三、四各师为主力军；第七军的七千人，现在九江不愿再往前作战；贺耀祖约八千人，战斗力弱；第十五军约五千至六千人，战斗力弱；第九与第十军数目不详，不过自从往鄂西去失败，甚至放弃常德以北，这两军战斗力很薄弱的；第十四军的约五千人，战斗力弱，不过现在他和国民革命军嫡系比较的接近。

总计起来，国民革命军的嫡系连十四军在内不过二万五千，加上在福建的第一军八千人，总共约三万三千支枪。

至于第二项的军队，约有五万五千至六万支枪，福建尚有第十七军（五千人）不算在内。

五、江西胜利以后，孙传芳在江西、安徽的情形现在尚不明了，不过据报告所得材料，

忠于孙传芳的军队尚有孟昭月一师，卫队两团或者连陈仪一旅共有一万二千人，此外尚有很多的武器为孙传芳所支配的，其余陈仪尚有两旅态度不明，白宝山约有一万人，陈调元、王普的军队及自鄂东退往安徽的刘凤图，他们通通都有战斗力，共计约有一万五千支枪，此外安徽还有□□□旅，□□□旅，通共约一万人。最近这些安徽军队对孙传芳怎样，现在尚难明了，不过对于柏烈武也只有少许的军队与他有关系。至于陈调元，他虽不反对孙传芳，也比〔必〕定与张宗昌比较的接近，我们的进攻很可以使这几省内部的爆发快一点。

六、据日本人供给唐的消息，据云：河南快将进攻湖北。据我个人（加）的观察，河南现在的混乱状况，况且现在孙传芳新败，则进攻湖北势不可能，不过要使鄂北绝对没有危险，非肃清鄂西不可。

七、孙传芳在江西失败后，鄂西敌军的动作及杨森之向武汉尚未见停止，惟最近敌人的几师，渐渐离开其好的阵地，而杨森已派代表来声明愿接受二十军军长职，参加肃清鄂西战事，这样可见当江西局面尚未定时及十军、九军失利时的鄂西危险，现在已不如前情形了，不过要保全鄂北的安全，当肃清鄂西敌人的几师。袁祖铭仍旧态度不明，浙江的情形我不知道。

八、目前七军与唐之间曾有误会时，陈铭枢也有与唐脱离的趋势，或者以为保定系将分裂，但唐来九江后，他与七军的误会大概已去，他又极力向贺耀祖表示好感，在九江他俩时常会面，大概他俩的关系已经弄好。日本人和唐已经有了关系，并且贺耀祖也和日本人发生了关系，大概唐也参加的。江西的胜利，唐很感得，并且很怕对他现有的地位加以限制，所以他要找他可接近的人，这就是他到九江来最大的原因。

九、现在应当解决北伐军的范围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毫无各种消息，也没得到广东的指示，广东同从前一样毫无消息，只有从政府给总司令的电报中可以看出鲍罗廷的主张。照这个电报的意见，主张北伐军继续占安徽、江苏（上海在内）及浙江，今天由汉转来中央的意见，也是如此。我个人意见，照国民革命军嫡系军队的现状及客观的环境，如果现在继续向安徽、江苏前进，这事现在不是时候，并且危险。这个问题，总司令曾于十一月八日与我商量过，那时我向他提议：

1.武力的占领福建，以第十四军及第二军的一师帮助何应钦。

2.半武力的占领浙江。以夏超的军队及周凤歧的一师为主（与周凤歧的谈判就是照这个意见，周曾表示愿意与夏超合作反对孙传芳，并且把他的一师人从皖南回浙）。如果这两部分的能力还不够，我们再从第一军派五团人帮助他们，现已下了命令，这五团人集中浙江边界。

3.九军、十军、八军之力万不得已时，则用四军赶快肃清鄂西的敌人。

4.请袁祖铭参加肃清鄂西的战，如果他推辞，就预备把他缴械。

5.预备缴刘××的械亦或者连贺××①的军队，这两人之中，至少需解决一人，以抬高国民革命军嫡系的威信，以限制漫无限制的数量上的增加及要求。此中连唐也是一个（也是漫无限制增长的一人），不过解决二人要在最近一个半月之内，迟则困难。

6.江苏不能去。

7.往安徽去只在很好的环境中才有可能。所谓很好的环境，就是占安徽只要第七军及贺耀祖师就够了，而不必牵用国民革命军嫡系的军队。如果七军与贺耀祖师到安徽去，这也很

① 贺××、刘××、原文如此。

好，但是他们现在没有这个意思。

8.关于江苏、安徽问题，最好能造成江苏、安徽能为我们之间的缓冲地，可是没有孙传芳的参加，如果这样做不到，孙传芳还能在这几省站住，那末，和他讲和共同反对奉张。

十、各军现在防地的分配：第三军南昌一带；第二军赣东，樟树在内；第一军的一师驻德安；六军驻赣西，高安，奉新，或萍乡在内，吉安总司令预备练兵的地方；第七军驻九江，贺耀祖驻湖口一带；第四军完全回武昌。

十一、恐怕上海所预备的第二次暴动，没有结果的罢？

（二）飞同志报告（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江西的胜利——此间集合了一、二、三、四、六、七各军及贺师之后，即于本月一日动员总攻击；二日占德安；三日占马回岭（要地之一）；四日占乐化芦坑；五日占涂家埠（最重要地，详见肃清江西军事计划书中）、九江；七日占牛行车站（南浔路南站之第一站）；八日即占南昌，江西战事遂告结束。蒋即于次日（九日）入城，开会欢宴团长以上军官，方本仁、赖世璜等亦到，席中乃大说特说的："明年今日誓必痛饮于北庭"等豪语矣！

敌人在累次作战中，均很坚强的顽抗。此次因马回岭、德安、涂家埠几要地失陷，使敌首尾不连，援兵无所用，及九江一失，则敌军全无斗志，只图逃窜，于是敌之全线遂溃败。当国民军到南昌城下时（南昌最后解决），城中尚有郑俊彦、唐福山、张凤岐、侯恩金等残部约三、四千人，他们一方面紧闭城门不向我渡河部队射击，一方面城上遍插降旗，声明愿受国民革命十一军（即方本仁军）收编，而方本仁亦到城下，意欲活动，得此现成东西！但是这边一则因各军将士之愤激，坚持已经打到"此刻，这里"没有这种便宜事，必须缴械，才可言和；二则各军均已云集城中，破此残敌，势如反掌之易，何必再造方本仁力量，故决计一面准许放路逃生，一面派兵兜剿，至于留在城中者，则缴械出城。于是这次缴械逼敌之结果（南昌以北阵地不算在内），俘虏约四万多人，枪也在四万以上，大炮机关枪亦很多，敌将唐福山、张凤岐、侯本全、岳思宾、刘士林、李彦青均捉到，一部分人捆游街市，唐、张则捆在督署石狮子前，上写"纵兵殃民，军阀走狗"唐、张等名字，南昌居民，因受这些军阀焚掠杀戮之害甚深，围观环骂，咸欲生啖他们的肉！

南昌遭灾，比武昌厉害，城边一带街市咸被烧毁！战时城内居民循环不断的迭蒙北兵光顾，一丝一缕，均有他们代为收存的价值！所以连我同学的服被，目下天气已寒，实成大问题。北兵平日任意杀人，以杀为取乐，为儿戏，尤以学生装、平顶头、女学生等，北兵一见，即有性命之忧！故国民军进城时，南昌城中只有"和尚"，平时居民要往街中或要食粮，必须找一北佬（北兵）同往，或托他代为设法去买（他自然其中有利可取），然后乃可买到东西。如果往街中，他只要找个红十字缀一缀，冒充红十字会人员，不然，你的狗命就要有去无回！南昌元气恐非一时所能恢复罢！

自然，不但南昌如此遭灾，赣西（高安、奉新等处），赣东南（如饶州、樟树、清江、梅州等处）这些地方本来很贫苦的（农民和小商业、小手工业而已），加以北兵假名卫赣防南军，已经在这些地方公开的秘密的掠夺了好几月！国民革命军入赣，亦转战二月，故这些地方的农作，都不收获，人民亦都逃亡（逃往山中居多），这种损毁，均是非一时所可能！

现在再回转来，谈谈我军胜利方面，江西战事，以二、三、六各军为主力，后又调一军之二师加入，计时约二阅月，进攻三次，才有今日之结果。第一次，九月十八至二十二日，

六军及一军孤军先占南昌，失败而退；第二次，十月十一、十二、十三日，二、三、六各军围攻南昌，惟因内部团结不好，和七军关系也不好（不知七军已占德安的消息），又是前后受敌（由梅州反攻我们），故又无结果，且受大损失（敌之炮火）而退；至这次，会合四、七军独二师及二、三、六各军等，才勉强把这顽敌击溃。然亦云伟矣！

敌人方面占许多优势：1.有长江鄱阳湖之水上交通，有南浔路之陆路交通，关于运输、援兵、粮食、枪械、子弹较我方敏捷万倍（我军运输很困难，子弹米粮常有不济时，且常过丛山峻岭，一架机关枪，或一架山炮，就须分作多数部分，由多数人来抬它，且我军不拉夫，雇夫为难，人力感缺少，故运输很感迟缓）；2.敌军较国民革命军较多；3.敌取守势，到处利用天然地势，建筑很好的欧洲式的工事，自九江以迄南昌一带，均有永固的防御之□，欧人见者，亦感称为难得；4.军旅精齐又充足；5.军粮军饷军装均足，敌人均穿棉衣裤，身体〔上〕往往有一百元二百元至少几十元的钱（自然是掠夺的居多），（我军至今尚有穿单衣或无帽子者）。但是孙军虽有这些优点，而其结果仍不免于失败！此种原因固然很复杂，很多，但择其要者而言：（A）敌军内部意见复杂，指挥不统一，我方有时虽然也感这样的痛苦，但他们比我们还要不如！比如，孙传芳免邓如琢职，委郑俊彦为总司令，但卢香亭何尝不以浙总司令自居，为何要替你老郑出力呢？诸如此类，谁也不愿替谁牺牲（虽然结果终要牺牲的），作战能力及持久性就减了不少。（B）我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人如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只〔至〕少，我军兵士是知"国民革命"、"打倒军阀"、"解放人民"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例外的自然难免），有进无退，这是很普遍的口号！但反观敌人，就觉得敌兵士是甚无目的，问他为什么打仗，打哪个？均不知道！孙传芳虽然也有政治部一类东西装点，提出标语："铲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设共和国"、"拥护民众"，兵士证章上写："兵以卫民，民以卫国，为国为民，兵以恩存"，以及累次通告或告示中所用的"……照赤化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创行……"这些究竟有谁懂得？于兵士何关？何能使兵士不逃而作战吗〔呢〕？！（C）民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处与孙军为难，而使孙军到旱地来就觉得运输粮食等困难，民众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引路、当侦探、组输送队）。

江西战事，最重的负担，始终是二、三、六各军，损失亦以这几军为最大；一军之二师，虽亦参战，亦蒙大损失，但非独当一面之军（初时第一师归六军，第二师归二军，最后次作战，第二师为总预备队，后即加入追击部队），四军这次参加作战，其作用很大，惟马回岭、德安一带作战，因贺耀祖不照原定计划，不照顾他（四军）左翼，而只拚命地往九江去，所以四军曾受敌之包围，经过很大的危险。虽然作战之艰苦，是上述这几军，但战利品却是七军及贺师得的最多！其余各军，多少亦得一些而已（因敌人缴械者实在太多）。（残敌数目已见嘉兄电，不再。）

二、今后北伐军的行动问题——入赣各军，经三次血战，损失非常之大，尤以下级干部为最多牺牲，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团长则半数，士兵约一万五千人，非有相当期间的休养补充，目下很难再有所动作，一般兵士的心理，也不愿再继续作战，兹把各军实力表列下：

现有：第一军——二〇〇〇人，第二军——六〇〇〇人，第三军——三〇〇〇人，第四军——旧三五〇〇人新二五〇〇人，第六军——二〇〇〇人。各军驻地如下：第一军之一师——德安，第二军——赣东（樟树在内，军部在饶州），第三军——南昌一带，第六军——赣西（高安、奉新、萍乡），第七军——九江，独第二师——湖口马当一带，总司令

练兵处——吉安，第四军——回武昌。这种驻地的分配都半是合于自然的环境的，比如，三军累次在南昌一带作战，南昌解决，自然当以三军居首位，六军本欲占九江，及事实上已为七军先占，于是乃要求在赣西一带休养，蒋自然只好准他！

至于北伐军继续东下否？这个问题，第一、入赣各军实无力且无勇气再继续前进，至于其他较疏远的国民革命军，更不能任此重任；第二、在全国的政治环境看来，江苏、安徽亦不能让我们直接用武力去取，故决定：

1.武力取福建，使赖军及二军之一师入闽；

2.使夏超、周凤歧回浙，另以兵力助之，现已动员（半武力的取）；

3.安徽、江苏最好能造成“无孙”的缓冲地，万一不能，则与孙言和，一致对奉；

4.赶快肃清鄂西湘西（袁）；

5.解决贺、刘；

6.安徽或者令七军和贺师去，但他们现不愿去。

……飞深觉得：（一）江西一入国民政府之手，我党工作骤然扩大范围，且需十分紧张，但此决非江西现在的江西党部能力所能够应付，故人员十分不足，尤须得力人员；（二）现负工作人员，不知何故总不能提起精神来，比方，我去几次，他们总是闲若无事似的，不能起劲，真要命！（三）同学一般幼稚，尤以民校工作者为甚，现负责者是做过知事的同志！这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因民校现在我党影响之下，如果做的不好，适足以给进攻者有话说，况且进攻的又很多！……

（选自《北伐战争》）

目前的军事状况与政治工作任务*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李　富　春

一、最近的军事状况　我军自广州出发，至今已逾三月，行军占了两个月，作战也有了一个月。军事上的胜利，可说已得到了十分的成功，中央——四、七、八军，及左翼——九、十两军，已把湖北完全肃清了。中央军现已出武胜关，到了河南境地与樊钟秀部联络，九、十军已进到沙市，鄂西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第二军、第三军和十四军，及第五军之四十六团已把赣南赣东次第肃清，其余残部，除一部分向浙闽边界逃窜外，余均集中南昌南浔铁路一带，我们应当很迅速的把这方面的敌人完全消灭，才算在江西的军事上得到了真正的胜利。

在以前我们的战略，首重打倒吴佩孚，故我们的宣传大纲也只说打倒吴佩孚，并没有提出打倒孙传芳的口号，但政治问题是与军事上的进展互相变动的。我们出兵湖北是打倒吴佩孚，现在吴佩孚打倒了，就不能不向江西进展。江西是五省联盟的范围，我们出兵江西无异是同孙传芳作战，所以孙亦不惜以五省兵力来援赣。但无论他怎样出死力来对付，我们在军事上是可以操必胜之卷的。现在福建方面，何军长进占永定的时候，已把周荫人的部队消灭了一大半，进占松口，又把他残余的二旅人完全消灭了，李凤祥现已就我方军长职共同平闽。在浙江方面，夏超定于十六日宣告独立，十七日进占上海兵工厂，十八日就我方十八军军长职，当即派陈仪一师出兵安徽，同时又派兵夹攻福建。可见孙传芳的五省联盟，已完全解体，闽浙两省已归我革命军所有了。我们在广州出发的时候，只有八军兵力，不过三、四个月，就增至十八军之多，军事上的胜利，真是进展得快呵！

但我们在这时候，还是不可忽略。吴孙虽然失败了，还有数万在河南，现在孙传芳想联络吴佩孚在河南的残部反攻武胜关，同时吴佩孚也想收集在河南的部队，以与我军拼一死战。我们知道，孙吴以前虽因利害上的冲突，不能一致行动，但他们的后台老板却是英帝国主义者，此刻他们失了败，英帝国主义者为维持他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起见，自必援助，设法把他们合作起来，共同抵抗革命军。现在吴佩孚的计划，一方面是勾结四川杨森进攻鄂西，孙传芳的作战计划，是放弃闽赣，保守苏浙皖三省，以徐图进展。但是他的计划，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一般小军阀之依附大军阀，只在保全个人的权利，一旦其所依赖的军阀失势，他们不独不能为之出死打仗，而且有“落井下石”的举动发生。吴佩孚在河南的残部——固然意见不一，不能受他的驱使，即四川的杨森，也是完全靠不住的。杨森是一个大滑头，他以前之依附吴佩孚，是完全在维持他个人的地盘，后来见着吴佩孚势力动摇了，又派人向国民政府接洽，想要保全他在四川的地位。至若孙传芳的计划，闽赣两省，已为我军克复，用不着他来放弃；浙已独立，苏又为奉张所久垂涎，亟欲得而甘心的，孙传芳自己也

* 原题为“李副党代表在本部部务会议的政治报告”。“本部”指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

很知道，故张宗昌向他假道援鄂的时候，他就向我方求和，现在见势头更坏，又派人到总司令部求和了。安徽陈调元所部，原已派了一部分到南浔路来作战，后因陈仪出兵安徽，又把兵调回去了。即此可见孙传芳已是手忙脚乱，到了日暮穷途的时候了。我们应当拿出很迅速的手段，把孙吴的势力完全消灭，免使他们得到英帝国主义者的势力的援助，重新联结起来，再图苟延残喘，以为患中国。攻下南昌，在政治上的作用，是同武昌一样的，故我们对于南昌的敌人，应当在最短时间内完全消灭，才算尽了我们革命军人的责任。有人说，军事胜利太容易，政治问题更难解决。这种见解，在狭义方面说是对的。我们革命的基础是要建筑在民众上面，是要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在克复的各省，无论哪一军，是否真正的觉悟？我们对于民众组织的工作，是有希望的，是有机会可以训练民众的。民众组织起来了，军阀自然不会再能作恶了。

二、我军的缺点　我军自出发至今，就好的方面说：我们沿途行军的纪律很好，确能与民众合作，到处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就是我们所担负肃清赣东赣南的任务，也已得到了相当的成功。但是我们的缺点还是不少：（一）以作战来论，除着袁州、新喻两役，其余在抚州以及在南昌作战，觉得我们尚缺乏奋斗的精神；（二）在行军的时候，大家虽然能够遵守纪律，切实与人民合作，但近来大家对于纪律，就看得松懈了，与人民合作的程度，就要差一点了；（三）我们出发的时候，军长曾谆谆告谕我们，要我们对于各地的民财两政，不要妄加干涉。我们对于这个教训，大家原是很能遵守的，尤其是副军长至今尚是遵守不懈的，但到最近各师已渐渐疏懈了；（四）政治工作，未曾做到实际上去，士兵常有见着政治工作人员而高叫“卖膏药者”的事实发生。这个，固然在带兵长官对于士兵的督责有所疏怠，而政治工作没有做到好处，也是不能辞其咎的。

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打倒军阀一层，还未做到，孙吴的势力，并未完全消灭，奉张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军阀，他的势力，尚在继长增高。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将民众组织起来，将军队整理起来，预备同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们万不可因打了胜仗而起骄怠之心，尤其是我们在广东受过几年革命教育的军队，大家要很振奋的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不可一刻忽略的。

三、我军在江西作战的任务　现在江西作战的军队，有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十四军及第二军，兵力是很雄厚的。但我们第二军的任务，是在进攻南昌，南昌一破，政治上的作用是很大的，是可以影响到全盘政局的，如湖北武昌一下，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动军阀，莫不见而生畏。我军已担负了这个进攻南昌的责任，就要大家同心一致，拿出我们在袁州、新喻作战的精神出来，很迅速地把南昌攻下。我们要攻下了南昌，才算尽了我们在江西作战的任务，才对得起我们攻下武昌的友军。我们更要将我们的好处扩大，把我们的短处痛除，拿出我们很勇敢牺牲的精神出来，一鼓攻下南昌呵！

四、政治工作人员应注意之点　还有几点要希望政治工作同志特别注意的：(一)政治工作人员要将工作做到实际上去；（二）要使本军全体官兵懂得我们攻下南昌的责任；（三）遇见官兵有忤慢政治工作，侮慢本党侮辱主义的言论发生，就应很不客气的告知带兵长官纠正他们的错误。凡侮慢政治工作侮慢党的，都是革命军的坏类！

此外，在党的方面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须报告的，就是十月在广东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各省及海外的各级党部，都已要求请汪精卫同志出来担任工作。大家知道，汪同志是一个很忠实、能干的党员，是总理的一个真正信徒，他对于广东政府，是很有伟大的建设的。

如果他出来任事，对于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很有裨益的。我们应当大家一致的推请他出来，为党国服务，以期早日完成我们的国民革命。

（原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北伐讲演集》，1926年12月）

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

大会听了中央党部代表的政治报告之后，决议如下：

一、在国民政府未成立之前，广东虽名为革命政府根据地，但事实上内有刘、杨等反动军阀及一般反革命派所掣肘，成为肘腋之患，东、南两道尚在陈逆余孽盘踞之中，成为分割之势，内则有北方奉、直军阀之勾结，外有英、美帝国主义之利用，革命政府遂陷于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势力里应外合四面包围之中。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于军事上之措施，如反革命分子之肃清，东江南路之收复，已使广东重新统一起来，使国民革命的根据地日益巩固及发展。这固然由于革命军队之训练与养成，而广东人民对于革命之觉悟与团结，共起拥护革命势力，诚为重要原因之一。

二、自"五卅"运动后，全国国民革命势力已日益发展，特别是工人阶级已在事实上取得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但同时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对于革命势力之摧残与压迫，亦日益加甚；特别是对于工人运动，如在军阀势力下各处爱国运动之受压迫，上海对外罢工之惨被摧残，上海总工会之被解散，以及工人领袖之无辜被杀，便是实证。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以武力消灭奉、直军阀中之新起的革命势力(郭松龄)，更促成了各个帝国主义与最反动的军阀之联合战线，北方的政局遂反动；已能接近民众拥护革命之国民军，遂处于反动势力四面包围之中。国民政府于此时期，一方面须从事于广东内部之建设，使广东真正统一起来，使国民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同时，须从速出师北伐，扫荡北方一切反动军阀之势力，以援助北方孤立无助之国民军，以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三、省港罢工为"五卅"运动后最能持久、最有力量的反帝国主义的表示。他一方面给香港帝国主义以绝大之打击，一方面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了广东，巩固了革命的基础。工人与政府合作的功效，形成了东方民族革命的新形势。罢工迄今，已及十月，香港帝国主义者每天损失四百万，总计损失已至十一万二千二百万元，经济状况，陷于不可维持的地位，同时在广东方面，则商场日益发达，开从前之未有，这是省港罢工所得到的第二点成效。现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受此种种打击，已经不敢藐视广东民众，转向北方利用走狗吴佩孚、孙传芳等以捣乱。省港罢工工友与广东工友愿助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使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大而巩固，彻底铲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恶势力，以完成中华民国自由独立之地位。我们的口号是：

拥护国民政府！

请愿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拥护省港罢工!

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编《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决议案》,

(转录自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

中央通告第二号

——关于省港罢工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省港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屠杀革命民众的罢工，是中国革命运动进程中有名的政治罢工，是“五卅”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全国中之坚持最久使帝国主义受绝大的打击的罢工。

省港罢工坚持有了一年之久，在积极方面，统一了广东，建设了广州国民政府，巩固了南方革命的根据地，扫除了广东内部的最反动的军阀力量。在消极方面，减轻了大英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信，至使香港政府受了很大很大的实际经济的损失。

省港罢工尽了许多任务，建立了许多伟大的功绩，早已到了结束的时期了。勇敢而进步的省港罢工工友们，也很明了到省港罢工是政治的罢工，政治的罢工与经济的罢工性质不同，故在去年十一月间，已能够接受我们的政策，愿意牺牲政治的条件和经济的一部分而取得胜利的解决罢工。但是，香港政府宁可忍受经济上绝大的损失，——每天一百八十万，这是香港政府自己说的，其实还不止此数——而千方百计想恢复大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坠之威信；宁可帮助陈炯明和培植国民党右派孙科、伍朝枢等的政治势力，推翻左派的国民政府，造成大英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反动政府，拿政治的武力的方式以破坏罢工，而不愿意和国民政府交涉，尤不屑与省港罢工代表直接谈判解决罢工。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广州国民政府是左派执政的时期。当时的政府，尚知道省港罢工而为全民族而奋斗的，故一面极力帮助省港罢工，一面想与香港政府磋商有利的解决罢工。农工商学各界尤一致拥护罢工胜利，二月初间曾热烈的举行过一次援助罢工周，即香港的中小商人，也知道香港政府的无理，愿意私人凑足三百万补助罢工工人，解决罢工。香港政府因慑于民众拥护罢工之热烈不得不派人到广州与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也不禁止香港商人之凑资补助罢工工人。这是过去一年中解决罢工最有利的时期。

香港政府始终无诚意解决罢工，始终想保持大英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信，始终想扶起陈炯明、邓本殷、林虎等小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取得广东政权以破坏罢工。在省港罢工刚开始发动时期，香港政府即嗾使杨希闵、刘震寰等与陈炯明结合，谋叛国民政府，继而收买国民党右派，收买凶手，刺死帮助罢工最力的廖仲恺，继而运动许崇智部下梁鸿楷、莫雄、张国贞等想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继而又以金钱枪械资助陈炯明、林虎等第二次占据东江。邓本殷、魏邦平等在南路起事，熊克武在北江响应。从东江、北江、南路合兵包围广州。幸而这种计划都失败了，广州政府的危机，都安然过去了，而省港罢工得以勉强维持。可是，以前各段的危机虽然过去，而三月二十的事变，又突然爆发。三月二十的事变是国民党中派右派联合向左派与我们进攻的表现，结果左派政权转移到中派手里，且当事变中间，也曾派有

武装军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监视工人行动。

三月二十事变以后，自然，广东全个政治局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此时武装中派专政，右派乘机向革命势力进攻，香港政府又得了一个破坏罢工的最好机会。香港政府此时撤退派遣往广州谈判解决罢工的代表，禁止香港中小商人筹资补助罢工工人的行动，同时以一千万元贿赂及一万万元借款收买国民党右派，且帮助他们攘夺广东政权，依然复用从前破坏罢工的手段而更加厉害，更加猛进，这是从三月二十至五月十五中间的过程，这是省港罢工最危险的时期。

五月十五国民党全体委员会议，我们采用了必要的退让政策。固然，在采用这个退让政策中间，有许多的理由和原因，然维持省港罢工，使之得到有利的解决，是许多理由和原因中之最重大的理由和原因。我们退让的结果，中派和右派分离了，右派攘夺政权的空想打破了，香港政府的阴谋又不能实现了，这又到解决罢工有利的时期了，所以我们为罢工工人的利益设想，为使历史上有名的省港罢工不致被香港政府破坏，就是使省港罢工不致失败，香港政府得不到胜利。我们在这个时期，极力主张胜利的解决罢工，就是在不牺牲工人的经济利益之下，满足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的解决罢工。

罢工工人也明了有利的解决罢工的时期又到了。国民政府也相当容纳我们的提议了，于是撤换外交部长，迫走胡汉民而以陈友仁继任，派出政府代表三人直接向香港政府要求派出同样的政府全权代表，谈判解决罢工，这已是我们一个让步，香港政府始终虽没有解决罢工的诚意，而表面上亦派出代表三人：一是香港政务司，一是华民政务司，一是驻广州沙面的英国领事。

双方正式代表在七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了，香港政府代表想离开罢工问题而提出交涉排斥英货问题之解决。他们说：罢工已成为过去的事件，目前只是解决排货问题。这足以证明香港政府确无解决罢工诚意的表现。他们何以离开罢工问题而专谈排货问题？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对于排货问题一定不敢接受的，他们又想利用国民政府现在出师北伐，需款甚急，可以金钱收买或商量借款，幸而当时右派已受了打击，否则就会成为事实了。在我们方面，一面坚持罢工并未成为过去事件，一面表示愿意接受谈判排货问题。香港政府狡赖不过，故得继续谈判，而双方意见相差太远，谈判破裂自是不可避免之事。

总结起来，香港政府一直到现在，始终无诚意解决罢工，他始终想利用反动势力以破坏罢工，这是很明显的事实，这是省港罢工延迟至一年之久而尚不得有相当的解决一个总原因。但是香港政府除了施用上面所用的手段和阴谋去破坏罢工之外，为什么尚没有更进一步采用更剧烈的武装力量直接破坏罢工？这是我们要说明的，香港政府不采用这种手段，不是相信国民政府有抵抗香港政府的能力，也不是以香港的力量敌不过广东，尤不是国际间的道德和什么人道主义。就是因为省港罢工是为全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假使采用更剧烈的手段，虽然或者可以一时破坏省港罢工，和压服广东的革命运动，而反会促起全国民众的共奋，将会引起全国排英的大运动。在狡猾阴诈的英国外交家，不会采用这种愚笨的政策。

省港罢工至今尚不得到有利的解决，由于香港政府无诚意，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国民政府始终不肯负责解决罢工，也是一个原因。省港罢工在广东建立许多伟大的功绩，就是国民政府差不多也是省港罢工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在理，国民政府如果真有诚意拥护省港罢工，和有决心为罢工工人设想，肯牺牲一点作有利的解决罢工，那不问香港政府有无诚意和能否接受要求条件，都应该以政府的力量，筹备款项，补助罢工工人和兴办各种企业以安

插工人，这样办法不独使香港政府受了绝大的打击，而且在国民政府也可以日趋于稳固，这是国民政府应有的责任，可是国民政府始终没有这样的决心，而且简直没有这样的计划。

在现在南方的政局来观察，国民党内右派一时的慑伏，广东内部尚不致有十分动摇，而且北伐军的进行有相当的进展，长沙攻下，这都是解决罢工比较我方有利的条件，这个时机，再不可错过了。而且广东政局底下，尚有许多危机潜伏，中派动摇不定，本是可左可右的，又时常挟持省港罢工以迫我们让步；右派时常与香港政府勾结，借解决罢工以取得政权，当然更不用说的。就是一般民众对于省港罢工的援助已不象从前的热烈了。其中中小商人又因罢工期间太久，受了些损失，因而有怨望罢工的了，这都是香港政府破坏罢工的后备机会，时时可以利用的。现在的情形是：香港已经雇到了十分之七的工人补充罢工工人的缺口，实际上他所怕的是封锁及排货。但是封锁对于中国商人也感困难而不满了。所以香港并不急于要解决，我们知道延长封锁——罢工——既不能使香港屈服，又足以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因此我们对外的口号应当是：一方面从速结束罢工安顿罢工工人，别方面加紧香港封锁，排斥英货，迫使即日解决沙基惨杀案问题。

我们现在要有决心和有很好的政策去结束罢工了，但我们的目的，要工人得到有相当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不使香港得到政治的胜利。

我们欲达到我们的目的，除督促粤区努力于联合各界一致拥护罢工并设法催促国民政府负责为有利的解决罢工外，我们各地党部应极力进行下项工作。

（一）联合各地工农商学各界一致举行排英大运动，并宣布香港政府破坏省港罢工及延宕罢工解决的阴谋。

（二）通电鼓励省港罢工工人，并责备广州国民政府应该对于省港罢工为有利的解决——就是假使香港政府不愿意解决罢工，也应当由国民政府筹备巨款补助罢工工人并安置他。

以上两项具体的办法，在运动中间，尤当注意解省港罢工，是为全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使此次省港罢工而失败，则大英帝国主义的气焰，更加高涨，对于各地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民众将更受摧残和屠杀而益肆无忌惮了。

张万和①

① 张万和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国共产党致粤港罢工工人书

（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

罢工工友诸君：

你们的奋斗，已经支持一年零两个月了。你们是为全民族的生存奋斗，为全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五卅”以来，普遍全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因武力摧残而暂时归于消沉，惟有粤港罢工一直支持到现在，而获得很大的成绩。

粤港罢工系继上海罢工之后而发生，最能表示全中国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并指示工人阶级是反帝国主义最有力量和最有组织的群众。粤港工人罢工的结果，曾经赞助国民党肃清了广东内部的反动势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并统一了广东全省。香港对广东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势力及其本身的经济地位，都被削弱。罢工工友自身亦已获得最可宝贵的奋斗经验，组织的力量因而日见加厚。这些成绩虽然是罢工工人受了很大的牺牲换来的，可是很值得的。

香港帝国主义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对头，而且是广东全省人民以至全中华民族的仇敌。香港本来是中国的土地，因为鸦片战争而割让于英，是历史上有名的贩卖鸦片的口岸。一直到现在，香港还是贩卖鸦片、军火和人口的港口，土匪海盗的巢穴，反革命派的营寨。总之，危害中国南部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发源地，就是香港。香港人口共计六十万人，外人仅占二万，其余都是中国同胞，其中除少数走狗买办、土匪海盗、反革命派以外，都是操工商业的善良人民。可是这五十几万同胞，在政治上受少数外人的统治，经济上供养这少数外人，简直受尽亡国奴的痛苦。罢工工人之抵制香港，即是为全国人民报仇雪耻。

香港既然是中国南部的经济枢纽和交通咽喉，帝国主义者又根据这优越地位，制造种种谣言，以图混淆听闻。他们最厉害的谣言之一种，就是说工商业的种种损失，都是罢工的结果。这样挑拨中国人反对中国人。其实中国南部人民历年来生命财产的损失，都应由香港负责。这次因罢工而发生之工商业损失，亦由于香港之无诚意解决罢工。罢工工人只是忍受极大痛苦为全民族争得政治上和经济上许多权利。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奴隶中国人民，养我国民的独立精神，同时培植本国工业和国货在广东市场的发展，香港不肯从早解决罢工，足见香港政府丝毫不顾香港商人的损失，反而想因破坏罢工的结果，维持他鱼肉中国人民的地位。稍微有点良心的爱国人民，都应十二分的赞助罢工工人，反对香港帝国主义。罢工工人在此长期奋斗中，都是受了不少的牺牲。冬天没有衣服被褥御寒，夏天居住又不足免病，每日罢工工人只能自己有饭吃，妻子儿女都饱受饥饿之苦，一般反革命派民贼奸细之流，不是包人落港，就是包运米粮和仇货，以图破坏罢工，甚至少数国民党右派领袖，还想摧残罢工，拍卖广东，以图换得香港的贿赂。这种人不但是罢工工人的仇敌，且是全民族的败类。

本党是为工人阶级及全体贫苦民众利益奋斗的党，在粤港罢工中间，始终与罢工工人手

握着手的一致奋斗，并始终以罢工工人的利益为前提。

亲爱的罢工工友！罢工已早到了解决的时期了。罢工工人屡次表示愿意牺牲政治条件和一部份经济条件要求解决罢工，而香港置之不理，最近国民政府与英国帝国主义者之谈判中，英代表又谓罢工已成过去，对于沙基案和粤港罢工都不肯让步，因使会议停顿。罢工工人和全国民众处此情势之下，一面应由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募集巨款救济罢工工人，本党亦自当本此目的为罢工工人奋斗到底。总之全国民众和罢工工人应注意的有二：一、须使罢工工人不至为全国民众而感受经济上极大痛苦；二、中英谈判须得相当的胜利。亲爱的罢工工友！为达到上项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固我们的团结，振发我们的精神才行！

谨祝

粤港全体罢工工人万岁！

罢工工人的最后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全国农民大会代表诸同志们：

中国农民的数量，不但在全中国人口比例上居最大多数，在全世界各国农民人数比例表中，亦居第一位。可是中国农民所受的困苦，也居第一位。因为中国农民兼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兵匪六种蹂躏，是别国农民所未曾同时苦受的。

被人指为睡觉的中国农民，现在已经开始醒悟、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并且准备自己的武装，向六种蹂躏者反抗了。

中国农民运动要注意两件事：

（一）中国完全在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宰割之下，非到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革命得着胜利，农民所受六种蹂躏者所给之困苦是不能免除的，因此农民运动必须与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同时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到农民大群众参加，也不会成功。

（二）工人是现代革命运动中之最急进的先锋，且城市工人又站在政治上重要地位；因此农民运动有与工人运动结合之必要，而且革命的工人阶级有领导这些运动之必要。

本党是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责，是领导中国农民工人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斗争；同时，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代表中国农民工人利益而争斗。因此，在此次大会提出“全国农民工人大团结”的口号，以贡献于大会，并祝大会之成功。

全国农民大会万岁！

中国农民运动万岁！

中国农工大团结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

（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

两年前革命政府曾向农民作第一次宣言，不久又曾有第二次之宣言，今国民政府更以诚恳之态度，对农民作第三次之宣言。当总理在生之时，国民党及革命政府已提出其重要目的，在领导中国全体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参加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致中国于自由平等，盖深知我国欲求弭内讧御外侮铲除一切之敌人，非与我受痛苦被压迫之民众联合不可也。以是之故，革命政府曾于第一次宣言中勉励农民使扩大其力量，革命政府欲使农民改善其生活状况，于是与以组织各级农会及武装自卫之权。

自第一次宣言后，农民组织颇有进步，然政府施行此种之政策，结果非仅使农民阶级独享其利，实使全国民众溥受其益，而尤以革命政府所得之援助为多。自农民组织团体之后，对于政府社会有绝大之援助，其重要者，即反对一般反动及贪利之军阀是也；东江之役，政府讨陈下令各县农会纷纷起而援助东征军，或断绝陈逆与香港之交通，或阻碍其党羽之行动，故政府能于最短期间肃清逆党，在南路战事中所得农民之援助，亦不亚于东江杨刘之役，各县农民复一致崛起援助政府讨平叛逆；廖部长被刺后，各县农民及其他阶级民众，纷纷通电誓为廖部长复仇，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东莞及宝安农军更以实力协助革命军队，驱逐郑润琦及林树巍之反革命势力。

农民之援助政府，略如上述，试观广东今日之能实行统一，及国民革命基础之日臻巩固，亦可知其取效之宏伟矣。农民之参加国民革命，不仅此也；彼等并曾极力援助吾人反抗帝国主义之斗争，拥护香港罢工即其明证；盖农民对于香港罢工，除召集各种会议予罢工工人以精神上之援助外，并实行参预对香港帝国主义者经济绝交之行动也。因农民曾实行参加国民解放运动，遂成为革命主要势力之一，且农民曾在反对军阀斗争中，屡显其能，且曾屡次为此种斗争而牺牲其性命，此足为其有政治觉悟及愿效忠于国民政府之表示；农民与政府既能如此密切合作，则政府政策之适当可得一完满之新证明。而吾人国民革命之毕竟成功，与孙总理主义之终，当实现亦可获一保证矣。然农民虽曾尽力予国民政府以伟大之援助，并不惜牺牲为吾国自由及独立奋斗，而彼等所受之痛苦，与艰难则仍一切如故，未尝稍减。农民除受尽由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及残酷地主与其他压迫阶级之经济压迫所生之痛苦外，生活程度之高涨，高额之田租，反动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构成之战事，复时降祸灾于农民之家庭，而农民苦况遂不堪问矣；现今广东之势力，日渐扩张，此种情形，对于农民之担负，亦有绝大关系焉。农人以政府之协助，获得组织农民协会最微之权利，于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对于农民协会，仇视甚深，有势不两立之概。陈，邓，杨，刘，诸叛逆虽经讨灭；而反动官僚，及小军阀遍布全省，每思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既失之地位，利用土匪杀戮农民，欲以消灭农会之组织，以致各属土匪围攻村乡事时有所闻，乡民缺乏自卫能力，往往为匪所害，

反动派等不但欲破坏农民之组织，以灭少国民政府之势力，且直欲根本打破人民与政府之合作；故政府特于此第三次宣言中，明白表示政府自始至终，实行已往之宣言，尽力保护农民之利益，协助其组织之发展。于此宣言之中，国民政府敢决然再宣告于民众曰，国民政府当永远领导民众与人民之公敌奋斗，务求革命成功而后已；迨国民革命成功，国民政府势力扩张之后，国民政府当竭力为农民改良其经济状况，当遵先总理之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务使农民能自由使用田土，同时政府当援助农民奋斗，使其能减低借贷之利率；及免除不合法之盘剥，政府复当援助农民反对贪官污吏，参加乡村统治权，以改善农民之政治状况。国家之贫富，视乎农民之贫富而定，故一切不平等之事件，影响于农民者，当清除之。农民亦当继续奋斗，援助政府肃清内外敌人，此时政府当联合各阶级如农民，工人，商民，及智识界，共同奋斗，以期得到最后之成功，贯彻先总理之三民主义。

国民政府万岁！

国民政府与人民联合万万岁！

（原载《犁头周报》16期）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五日）①

一、正在发展的中国民众革命斗争，不仅是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求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要求建立完全民主制国家的斗争，即是说要推翻城市和乡村中封建官僚（军阀土豪）的政权，并在平民民主政权上统一全中国。

二、解放的斗争已到了这一阶段，即有许多新的行省已来受国民党的影响，巩固国民党的军事胜利问题和扩大国民党影响以为创立民主政权基础问题，已提出于议事日程。此时适应于这一革命阶段的农民政纲问题，对于本党是有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政纲不仅在农民过渡的要求的意义上面，而且在整个农民运动的最近的任务和目的的意义上面。

根据广东、湖南、湖北及其他诸省农民运动的经验，现在已经能确信地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

他方面，范围日大一日的农民运动再向前发展下去，将推动国民党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去反对那剥削农民、〔奴〕役农民的一切封建强盗的形式，这个便就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成功的保证。

三、中国共产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但在平民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却以为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国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乃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若于此时提出此口号，则将引起农民内部的内讧。

四、经过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实现城市中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应用在乡村来，应该在这种意义之下，即联合小农、中农、大农和佃户以对抗地主劣绅。引导这些农民分子到斗争中来，不仅不妨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益，而且是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础。自然，在乡村反对军阀、地主、劣绅的联合战线内部的阶级冲突，不仅不能因国民政府的农业改良政策而消灭，而且全国军阀政权推翻以后，这种冲突必然更要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不断地展开农民口号，以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于下一阶段，同时又适应于这一阶段的总的政治的任务。

国民革命这一阶段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各种社会成分各省籍的军事领袖指导下的革命军。革命军的胜利促成革命的发展，但其自身亦是全国发展的解放斗争的结果。这种胜利必然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幼想，使群众独立参加斗争的决心和准备软弱下去。在农村中，因许多

① 这个文件原附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局报告》的农民运动部分中。根据上述报告的说明，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所拟出，准备提交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审查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的。

历史条件的关系，劣绅阶级（地主包含在内）乃是事实上的政权，农民阶级改善其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的斗争，就变成反对劣绅政权的斗争。他方面，农民群众要求革命军和国民党改善其地位的希望所以不能实现，不仅因为国民党没有决心和革命，不愿站在农民方面，而且因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于劣绅地主时常表现软弱。这种情形使农民不得不直接为夺取乡村政权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应该指导这运动，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之任务于农民协会——革命运动先锋队面前。只有依靠在乡村□农民政权之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其地位，并展开反对中国民众敌人□斗争。

五、根据上面所说以及本党中央过去二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本党中央特提出如下之政纲草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至五日远东局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准备赴共产国际扩大会的联席会议所拟的中国共产党农民政纲：

（一）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并要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

（二）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

（三）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所指挥。

（四）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

（五）保证佃户在其所耕种地上有无限期租佃的权利，并由农会合同革命政权的代表规定租课额。

（六）禁止一切欺压迫的契约，包农①转租契约亦包含在内。

（七）取消以前关于租佃的欺压的契约和欠账，禁止重利盘剥。

（八）规定整个一定的农业税，取消苛捐杂税，废除陋规。

（九）国家经过农村革命政权机关之手以帮助农民和农村经济。

---

① 原文如此。

目前农运计划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局议决）

（一）农运进行应依下列标准规定发展地方之次序：

1. 集会、结社自由较多的地方；

2. 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地方；

3. 沿铁路沿江河交通便利的地方；

4. 农民经济上有特别之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之处。

（二）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

（三）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如：

湖南——应注重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个府属。

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三县。

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之一线。

河南——应注重京汉、陇海、道清三路沿线。

陕西——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

四川——以重庆、成都两处为中心，注重其附近各县。

广西——注重从百邑〔色〕经南宁至梧州之一线，目前特别注重范石生势力下之恩隆、奉议、恩阳、百色等县与已发展之东兰县联络。

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注重滇粤路沿线。

福建——以永定为中心注重闽南各县。

浙江——注重宁波、绍兴二属。

江苏——注重崇明、江阴、丹阳、无锡、泰兴、铜山、睢宁等县。

山东——注重胶济、津浦两路沿线。

安徽——注重皖北以寿县、合肥为中心。

直隶——注重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四路沿线。

直隶与京兆特别区应划分为两个农运区域在国民党系统下，直隶农运归直隶省党部管辖，以天津为中心。京兆农运归北京特别市党部管辖，以北京近郊为中心。

（四）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

（五）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

（六）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中央致粤区的信

——制订左派政纲，促成汪、蒋合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①]

现时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的空气异常浓厚，不仅在一切民众运动中，就是在所有军队中，甚至蒋之根据黄埔军校学生，亦不满现状而提出迎汪口号。群众的情绪虽如此，但就目前国民政府内外的形势说，是不是容许这个运动之实现而不发生危险呢？蒋介石是不是能不反对这个运动呢？我们对付这个问题究应采取什么态度？实为当前应决的问题。本月十六日中局与远东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有以下的结论：

一、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各县知事及驻防军与劣绅土豪民团勾结，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反动工贼，袒护反动右派学生，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压抑一切民众的自由，因此使得广东的民众已不相信国民政府是能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甚至敌视国民政府。他们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我们对于这种现象若不急图补救，则民众会发生无组织的暴动。若我们只顾避免与中派的冲突，勉强拉住群众，然群众为切身利害所迫终是拉不住的；我们违反群众利益的这样做，不仅在群众中失去信仰，甚至为群众暴动所牺牲。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不必变更现在中派政权，在这个中派政权之下我们亦可发展民众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愈发展民众运动，则民众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为救广东，使我们不能不决定对于中派政权的态度，不能不决定因群众对于现状不满而提起的迎汪反蒋口号的态度。这个决定是不能游移的。

二、我们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在选择这三个办法中我们有二事须注意的，即：（1）对于把K．M．T．看成只能有一纯粹左派政权的观念，应根本打消。所谓恢复左派的指导权，并不是纯用左派的人，是有左派的政纲，指导权在左派手中，可以容许中派甚至右派参加工作。（2）所谓左派，不是单看人的问题，是要有一对工农政策实施的左派政纲。

三、这三个办法，第一办法太危险。因为：（1）是在现时北伐的内外形势中，一旦去蒋，将使国民政府发生极坏影响；（2）是军事上继蒋而起之李济琛、唐生智亦不可靠；他们因现时反蒋，故行动较蒋左，恐蒋去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因为蒋在前方不能自理后方事，若不去掉张静江、叶楚伧等一般中派分子，则虽有左派政策，亦不能行，因为所谓左派政纲，就是打击这般人的行动的。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

---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汪、蒋合作）。不过蒋现时是绝对反对汪出不肯与汪合作的。他的理由是汪出来后将为一般小军阀所拥戴以打他，分散了革命势力。实际上是与汪争首领问题。然而除这三个办法之外，我们又再找不出其他办法。

四、我们现时仍是希望实现第二办法。我们可以向蒋表示，汪出并不是要倒蒋，并提出保证条件：（一）决不报仇；（二）决不取消整理党务案。但若蒋始终坚持不允，我们坚持要做，可以生出以下的影响：（一）逼起蒋纯走到反动方面去，在目前帝国主义者、军阀、右派群以反俄反共耸动蒋介石时，也许他会糊涂的受他们的影响，作出更蠢的事以打击左派。（二）或者是蒋离开了北伐战线。现时汪、蒋分裂未免太早，所以我们须找一退步，便是采第三办法，由蒋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领袖。若采第三办法，我们对于现时民众拥汪的空气，汪、蒋合作口号的宣传，仍当不废，才足以胁蒋左倾，并须极力在民众中宣传左派政纲，使蒋不得不对民众让步。万一蒋不能执行左派政纲，逼起我们为救广东而不能不倒蒋时，因先有了左派政纲的宣传，去蒋亦较容易。

五、左派群众以至李济琛等，对于十月一日K．M．T．将召集的扩大会议，拥汪出来呼声极高。我们当宣传汪、蒋合作，至于此次大会就把汪拥出来否，须看当时国民政府内外的情势如何定夺。如国民政府形势尚在动摇，则汪出来引起的纠纷愈增加动摇分量，便不宜即出，必须局面较稳定后方可出来。我们并预备下第二办法走不通时的退步，采第三办法。此次扩大会议，主要是希望通过一个左派的政纲为国民政府以后施政的标准，我们现时应预备这个政纲并宣传这个政纲（此政纲特委已拟就）。

六、根据以上的结论，中局决定训令粤区注意以下工作：

１．在十月一日的扩大会前，对于迎汪复职问题，当一面切实进行宣传汪、蒋合作，一面注意内外环境的形势，勿授蒋以隙，被蒋借口打击左派。

２．对于此次扩大会议，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

３．这个左派政纲在扩大会前应立刻向民众宣传。一方是对中派示威，一方是暂时安慰民众，给民众一点希望。在扩大会开会时，粤省工会、农会、商人、学生均可以做请愿示威等工作；外省工、农、商、学团体亦可去函电表示民众对于K．M．T．大会的希望和要求，以群众力量迫大会左倾。

扩大会各省出席代表，我们亦当通知各省本校组织，尽量选用最靠得住的左派分子出席，不得已时才用C．P．分子。

* * *　　* * *　　* * *

除对于汪蒋问题外，中局对于粤区工作尚请注意以下数事：

１．应把所有能力都集中在农民运动上，去做反对土豪劣绅工作。

２．政治上要求召集省民会议，民选政权，反对贪官污吏。

３．须加紧与左派合作。若粤区同志说没有左派，当速造成一个左派。

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的意见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①

广东的国民党左派及工、农、商、学群众，甚至黄埔学生，均不满于中派把持政权下的现状而想有所改变。积极的办法就是迎汪回来，左派正准备在第三次大会上或即在最近召集一临时代表大会实现此计划。乃中派忽宣布十月一日召集中委及各地省部联席会议的决议。此次大会讨论的重要问题，据公布者为：

1．省政府之组织问题；

2．中央政府迁移问题；

3．请汪复职问题；

4．催开国民大会问题。

中派召集此次大会的用意，据我们的观察乃在蒋欲迁移中央政府，抬高党的威权（照现时党、军、政三权集中于总司令手的局面，此种办法即是所以抬高蒋之威权），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等。中派为欲使此计划之进行上不生阻碍可以包办，所以决定开会日期非常迫促（九月十号左右决定，距开会日期只二十日），远地代表通知且来不及，遑言赴会。

我们除一面通知各地迅速选派代表前往外，一面并电请展期至双十节开会。各地代表都尽可能的全选左派去参加。

我们对于K．M．T．此次扩大会的意见认为：

1．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因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张静江曾说国民政府迁武汉后张继等均可请其加入）。表面上我们可以说国民政府不能放在前线上：若武昌、修水战事未了我们更可说："此问题须待军事结束后才能讨论。"

2．应产生一左派政纲为左派行动的标准，为左派与我们合作的条件，逼中派照此施政。

3．迎汪回来，表面上宣传汪蒋合作，但汪之就出与否须斟酌当时内外情势决定。

4．改造广东省政府，可以组一个汪、李（济琛）、孙（科）合作的政府，去掉古应芬，肃清贪官污吏派。此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所以赞成汪回，就是为要救广东这块革命的基础，汪除任国民政府职外，事实上须拿到广东政府实权。

5．当极力主张：国民政府当注重各省自治权，各省组织自治政府，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因为所谓绝对的集中统一，在目前全国的交通上、小军阀的变化过程上是做不到的；

---

① 这个文件，原载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原文未署作者，也没有时间，从内容及其与前后文件的联系以及中央九月二十七日给湘区信开始的一段话看，是中央发的，故收录于此。

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自治政府可以容许民众参加政治，可以减少军事独裁倾向。

左派顾孟馀、何香凝等对于此次大会十分注意，顾自任运动北方左派代表出席，派吴玉章来沪运动长江一带左派代表出席，并决定两项宣传原则：

1．说明本党现状及三月二十日事变真象。

2．口号是：（一）巩固本党左派与C．P．谅解合作；（二）恢复党权，拥汪复职。

我们以为第一项太利害了，若把三月二十日真象说明，则蒋完全是反叛，现时尚不宜如此尽情揭露，可以含浑一点。

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

自七月间扩大会议后，全国重大的政治事变，就是北方国民军之失败与南方北伐军之胜利。这两部分军事力量，虽不能说是民众的力量，然而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比较接近民众能予民众以相当自由的武力。因此他的失败和成功，不仅影响于军阀政治势力之消长，不仅改变了军阀间和帝国主义间利害的关系，并且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前途有极大的影响。

武汉下后，国民政府所管辖之地，几占中国之半（包括国民军在内），全国革命空气非常高涨。自然现在的胜利，还只是一种军事的胜利，这种胜利能够保持否，我们亦无把握。不过目前这种军事胜利，可以促进军阀政治之崩坏，可以扩大民众运动之范围，我们并不迷信他就会成功一种革命，然而现时的情况，却不能不承认是一新的进步的时期。兹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关系及我党在这种局面之下的发展情形，分述如次。

国民军之失败与今后之出路

自四月间国民军退守南口后，据形胜之要塞，设坚固之防御，随时可以威胁北京政府，一面又进兵大同，谋取山西，以求南下出路。直奉晋联军合计不下四十万之众，围攻国民军至五月之久，并不能有何进展。南口方面，奉联军一再冲锋，牺牲极大，已有退兵议和之说。直系联军方面，将怀二心，士无斗志，此种军队多属收编从前国民二、三军旧部而成，决难驱之与国民军作战，故初有靳云鹗新直系反吴之企图，继又有陈鼎甲等倒戈之事实。延至八月十二日前，京畿附近直奉联军约三万余人，均已商量就绪，与国民一军约定在十二日晚间由国民军冲出为信，截断奉联军归路，一举而歼灭之。岂知事至当时，国方无一兵之出动（由于张之江之破坏），而此计划根本失败，京津反戈军队，并被解散。此计划失败不过二日，奉联军累月猛攻之南口，突然陷落，真是一方面失败于功在垂成，一方面成功于失败之顷，致北方民众，更入水深火热之境地。

南口既失以后，国民军匆遽撤兵，损失甚巨，余众不过七八万人，合二、三、五各军不过十二、三万人，集中包头、甘肃一带。国民军此次失败的直接原因固多，如1．多伦与沽源失守；2．延庆守军空虚被奉军暗袭；3．南口要隘龙虎台先陷落；4．子弹缺乏；5．战线太长；6．联军数量多于国军数量三倍。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统帅张之江庸懦无

能，无中心政治思想，时时破坏进取战略，谋与直奉妥协（如大同、天镇不肯猛攻，八月十二日之变不发命令）。此后国民军非另换强有力之将领，宣明政治主张，则纵有很好爱民能战的军队，亦不能救其失败（国民军兵士纪律之好，战斗力之强，与人民感情之洽，在全国各军之上）。最近冯玉祥已统率其国民军全体正式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南方之国民政府与北方之国民军，现时在形式上已打成一片。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之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暂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攻奉军。

北伐军之进展与吴佩孚势力之粉碎

此次国民政府之出兵，初本在援助唐生智守住湖南，防御吴佩孚之南侵。后因北方有新直系之酝酿攻南口，直军有不稳消息，吴佩孚不得不匆匆北上，以南方军事委之赵恒惕、李倬章、陈嘉谟、叶开鑫、董政国等，指挥既不统一，士卒因欠饷过久，毫无斗志（已欠三月不发饷），虽有十万之众，已形如散沙，故北伐军一至，遂如摧枯拉朽，自岳州总攻击令下后，不过两周，遂进占武汉。吴佩孚匆匆由北归来，亲自指挥，然险隘尽失，士不用命，汀泗桥发愤一击，仍不能守，重诛将领多人，亦不能固结军心，北来后援军队或者观望不进，或因车辆缺乏运输不及，于是吴在湘鄂之十余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此时吴所有地，已只河南一省。河南境内，尚有樊钟秀之扰乱，豫籍反吴军人之活动，田维勤、魏益三等军队，亦不能十分听吴指挥。吴势至此，可谓粉碎，今后直系实际首领，将转移为孙传芳，而战事中心，亦将移至江西方面矣。

奉直关系之变化

在南口未下前，北京之政权，虽曰直奉合作，然事实上全在吴佩孚指挥之下。吴所统兵士，又多系国民二、三军旧部，随时可以发生异动，足以为奉军后顾之忧。因此直奉间暗潮非常激烈，特以大敌当前，双方均只好迁就隐忍。及直军田部陈旅倒戈事件发生，吴佩孚在军事政治的设施上，遂不得不稍稍向奉联让步。南口为奉联军攻下后，此时奉联军凭借战胜之威，气焰万丈，于是要求改组内阁，要求三区地盘概归奉联，要求直军让出保大，种种条件，应时而起。吴佩孚利用奉联内部并不统一，奉联军既时显然有二大势力，一是奉张，一是鲁张，而奉张部下各军长间，如于珍与高维岳为察哈尔地盘亦有意见，吴因弄其挑拨离间之术，直接保张宗昌为上将军，更激动奉张之愤恨，双方冲突，已达极度。惟日本帝国主义深知当时奉直关系若一旦破裂，则北方动摇之直系军队，随时可重与国民军结合，反攻奉军。吴佩孚长江势力既未失败，则英帝国主义亦决不容亲日之奉系独握北京政权，因强迫奉系仍与直保存合作关系，维持直系之杜内阁。

湘鄂战事的变化，使直奉间许多难解决的纠纷均能很顺利的解决。如保大移交问题，吴佩孚因鄂事吃紧，调北方之兵援鄂，自然不得不让出保大。内阁问题，在吴既失败后，便自然要改组。奉系现时确是很胜利的局面，然奉系今日，已不是整个的奉张与鲁张之冲突，奉张、鲁张各自内部亦有冲突，正未容彼等过分乐观也。

孙传芳之态度

孙传芳过去虽唱五省保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口号，但实际派遣亲信得力部队四万人入赣。他的目的，并非援吴，乃欲乘北伐军与吴佩孚久战疲敝，以生力军从侧面进击北伐军，从容收取湘鄂两省，且收容吴之残余势力，继吴而为直系之领袖。此时孙传芳军与北伐军在湖北、江西边界交战，此战若北伐军败，则不但武汉不能保，广东且有为闽军夺取之危险；若孙军败，则浙江之夏超，安徽之陈调元、王普，江苏之白宝山、邓俊彦等，都有叛孙而倾向国民政府之可能。

北方政局与两张在现时战事中之地位

国民军及吴佩孚之失败，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低落，是奉张及日本帝国主义所庆幸满意的。不过奉派内部纠纷，亦正扩大，鲁张已非奉张所能统制。南口下后之地盘酬庸问题，张宗昌不能分得三区一部，即褚玉璞位置亦几乎动摇，非常不满，不过此时尚非决裂时候。

奉派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目前之时局，是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与孙、吴、英维持反赤合作；一是与国民政府秘约共倒直系。国民政府现时的力量，不能打倒北方奉派，亦无力取得北方，双方目前利害，并不冲突，故这个妥协，是有可能的。惟无论奉派援吴或和粤，均必出兵攫取一部地盘，盖奉派此时正需取得新地盘，以位置其部将及多额兵队也。援吴必取河南、湖北，和粤必取安徽、江苏，恐为不可免之事。孙传芳若与奉派之关系弄得好，则让河南于张。而孙无北顾之忧，合双方之兵力，以对付国民政府，则国民政府难免于退出武汉，甚至广东亦不能守。国民政府若与奉派之关系弄得好，则奉军沿津浦南下，可以牵制孙与北伐军之作战力量。奉张、鲁张现时均有代表到粤，且闻有京汉、津浦两路出兵，奉张取河南鲁张取江苏之说，前途变化如何，尚在酝酿之中。

时局变化中帝国主义之态度

南口下后，奉张遂代表日本帝国主义逐走苏联大使加拉罕。吴佩孚失败后，使英国在华之政治经济势力均大为低落，于是极力运动列强对华取共同干涉行动，但美、法均拒绝英之要求。日本为此次政变中的最大胜利者，一面对英示其惘惜之意，一面拒绝英之请求。故英国此时，在国际上已难得到别国的帮助，除一面尽力帮助孙传芳等一切反国民政府之军事行动外，并直接动作以谋颠覆国民政府。具体的事实如：

1．九月五日东方社汉口电："三日吴军之军舰五艘悬挂英国旗欲突破金口。"是直明目张胆的庇护吴军向北伐军进攻。

2．九月五日香港政府突派英舰两艘，驶泊广州省港轮船码头，水兵登岸驱除罢工纠察队，并捕去七人，阻止华人出入码头，干涉江面小船往来，粤政府抗议无效。此种举动，显然是意在牵制北伐军之后方，希图以武力倾覆国民政府。

3．八月二十九日英舰万龙号在万县入口后，不受检查，欲以武力出口。杨森派兵四十五名，乘划船往阻，被撞沉没，因将后到之英舰万县、万通二号扣留，要求赔偿。乃英领事

竟调炮舰四艘，载兵赴万县，硬索二舰，用大炮向万县城轰击，城中房屋大半为大炮所毁，死伤人民不可胜计。

又报载英国巡洋舰开里斯福号、开斯托号、韦特芳资号不日又将载兵来华，并许海军官长以便宜行事之权；其向我中国民众进攻的事实，已昭然若揭。

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对于最近政局的变化，当然是志得意满。因为国民军与吴佩孚之失败，只是助成奉系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统治，降低英国在华势力，是于日本有利的。

美国帝国主义，因为他过去完全受制于英日，所以他现在处处破坏英日帝国主义的进行，具体的事实如：

1．破坏关税会议之成功；

2．抗议新公债；

3．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发生正式关系。

又派人至广州视察，在新闻纸上对于广州政府备极颂扬。如国民政府能相当发展，美国似有首先承认及举办借款之可能。

武汉下后国民政府诸问题

1．目前斗争的形势

目前武汉的军事胜利，自然说不上是一个革命，更说不上革命成功。但这个军事的胜利，却提高了全国革命的空气，扩大了民众运动的范围，促进了军阀政治之崩坏。许多小军阀，均有倾向国民政府的表示，虽明知他是投机的，然亦要有这浓厚的革命声势，才能有他投机的可能。

现时斗争的形势是很明显的，国民政府代表一种革命势力，吴佩孚、孙传芳代表英国帝国主义反动的势力，奉联军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国民政府与孙、吴之战，亦即所谓赤与反赤之战，向英帝国主义争取长江流域的统治。至于北京政权，全落于日本奉联之手，国民政府与苏孙一时俱无力过问，奉联虽亦反赤一类，但目前与国民政府尚少实际利害的冲突，除非国民军已得陕西，国民政府，国民军均要取河南时，双方始立于直接冲突地位。

2．军事问题

在岳州未下以前，据加伦同志的估计，以现时国民政府北伐的兵力，破岳州取武汉可以有把握，惟武汉下后，还是向北发展进取河南，抑回兵取江西，则当考虑。取江西，必与孙传芳冲突，同时英帝国主义为维持其长江势力，亦必出死力帮助孙传芳，这是取江西的顾虑。如果放弃江西，一直进攻吴佩孚，先联络樊钟秀取得河南，再同国民军联络，抛弃长江下游，只向内地发展，这样做固然有这样做的好处，但是战线太长，江西、福建都可以从侧面进攻，很有后顾之忧，对于军事上也有不利的地方。最后的决定，还是下武汉后即取江西。

我们中央对于此问题是很持重的。对于苏孙不主轻于开衅，极力避免冲突；对于河南亦不主张长驱直入。国民政府得武汉后，只求守住武胜关以南，从容统一西南诸省，以准备攻奉之军力；对于苏孙则采用拆台手段。国民政府不能取长江下游（因与英帝国主义冲突太利害，国民政府之能力尚不足以支持英之进攻），只是使长江下游不成统一的集中的力量，分

散于各小军阀手中，则既可减轻英国利用的效率，又不能很大的危害国民政府。但是现时江西战事既开，此希望已是不可能了。此时吴佩孚之残部犹未尽驱出武胜关以外，国民政府之战线，自花园、广水以至潮汕、香港，非常辽阔。设不能与奉张、鲁张妥协，令张不助吴、孙。且出兵津浦以索〔牵〕制孙传芳，则未来战事之胜负，殊难预测。直系之势力，英帝国主义之势力，均残存此一角，其必出死力以相争，又可想见也。

3．政治问题

最主要的有两件事：一是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地点问题：我们的意见，国民政府欲统一西南诸省，不得不略采联邦形式。因为在现时军人割据惯例未消泯以前，若坚持严格的统一过急，只有逼迫这些人远离国民政府。只要求这种军人对民众的政策不十分反动，而且足以促进革命之向前发展，逐渐扶起人民团体参加政治，我们均可承认他的包办，而不必勉强用国民政府统一观念来干涉他。国民政府不可迁移武汉，仍当在广州，于各部之上应有一政务的组织。我们并须使蒋觉悟他把军权、政权、党权集于总司令一人身上之危险。他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应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李、唐及其他各方面之反感，蒋之地位固易动摇，国民政府亦受极坏影响。二是北伐的政纲：北伐出师的宣言只是“统一中国”四个大字，十分空阔。最近才发表新的宣言，提出：（1）扩〔廓〕清军阀；（2）召集国民会议；（3）废除不平等条约三口号。我们希望更能有切合农民要求的具体政纲，但这恐不可望。武汉下后，我们的责任，就在努力实现召集国民会议，在汉口开会，姑无论这个国民会议不能就接受政权，然而在宣传上、在训练革命群众取得政权上，是有极大的作用。在已归国民政府统辖之各省，亦可由人民团体发表人民的总要求，召集省民会议，以减轻军事独裁倾向。

4．外交政策

在这次政治变动中，英帝国主义处处陷于失败孤立地位，已激成他疯狂的直接行动。自然这种行动只有愈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使排货范围更为扩大。不过国民政府之外交政策，更须十分小心，不可有过分的急进举动，因为现时国民政府的实力，尚不能单独与英抗。我们应该一方面使英国的工人、英国的各派政党不至一致赞成其保守党内阁武力干涉中国政策；一方面和缓对日、美的冲突，使他们不至与英国一致采取共同干涉的策略；并极力避免与英军事的冲突及国际共同干涉的借口，尤其是在广东与汉口。

5．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问题

长沙下后，第八军唐生智兵力扩充至六师之众，实际有二十八团，照粤军编制，可称十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四、七两军以学派关系（同属保定系），均亲近唐。而蒋介石所统入湘之第一军（即黄埔军）二师，沿途骚扰，时有逃亡，军纪败坏不堪。蒋入长沙后，见军事政治全在唐生智手，民众力量全在C．P．手，遂向我们及俄同志表示请维持一军，维持黄埔，维持蒋之总司令威信，招致已经退出一军之C．P．分子回去工作。但另一方面，仍放任右派之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民众中向我们进攻。又拉拢九军、十军，收编贺耀祖师以制唐生智。唐生智过去虽无革命历史，现在亦无比蒋更反动的事实，且比蒋还好一点（自然不能说永久可靠）。二、三、六军实力远不及蒋、唐，以利害关系又自成

一种结合，他们不满八军，也不满蒋，自身打算向江西发展。

我们现在对付这各派冲突的政策是：一、从革命的全局看，若果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但在现时的军人，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二、所以我们对于唐势力之强大，不在如何限制他，而在包围他不反动，维持蒋能与之对抗。三、对于蒋之维持，也不是简单的，必须蒋能执行下之条件而后可：1．将党权、政权速交与汪；2．清洗军中反动分子。此二事若不能办到，则照蒋现时众叛亲离的形势看去，我们亦无法维持其不倒。

白色恐怖与民众革命情绪之高涨

反赤军所在地，其军队无不纪律废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强行不兑现的军用票，勒征苛捐杂税，一般人民苦不堪言。凡直接受战祸区域往往村落为墟，间接受战祸影响各地，亦百业凋弊，生活腾贵。反之在所谓赤军统治下的民众（指国民军与国民政府领地），反能保有相当的自由和相当的安居乐业。于是“反赤”一名词，在社会的宣传渐失其作用，民众以其身所经历，觉赤不觉畏，且有欢迎赤的倾向，甚至反动的醒狮派，亦以张宗昌等之反赤为反赤派之羞。

北方各省，现完全陷没在反赤军铁蹄之下，民众自由已摧残尽净。工会、农会、国民党等，或被解散，或被逼入地底作工，报纸言论，稍不检点，即遭封闭，记者辄被杀戮。

虽然政治压迫愈凶猛，则民众反抗力量亦随以扩大。河南、山东一带，不断的农民红枪会暴动，虽被张宗昌、寇英杰的炮火焚杀一时镇压下去，然绝不能根本消灭其反抗也。一般大商人、小商人等受捐税及军用票之亏，革命情绪亦至浓厚，最近上海商人对北伐军均有一种好感。两月以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书竟销至二万余册，可见民众之倾向革命。

在北京、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西、江苏各地，我同志之被捕及被杀者，在二十人以上。各地军警，搜索甚严，邮件检查更勤，故一切宣传物多不易发出。

国民党内的变化

1．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现状

国民党自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已成了中派蒋介石个人专政的局面。蒋因欲完成和巩固他个人专政的地位，故对于右派亦不能不施以打击，如逮捕吴铁城，驱逐伍朝枢等。然对于我们仍不绝的进攻，对于左派仍有所怀疑，故右派时得乘着机会结合中派使之右倾，与我们为难。五月十五日的中央会议，直接限制C．P．之活动，同时取消了左派汪精卫在党中的领袖地位，而易以中派之张静江为中央主席。七月四日的中央会议，蒋又直接取消了张静江而自作主席。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蒋之中派分子，系以浙江人及黄埔系组成，现时党中、军中、政府机关以至广东大学握重权者，多此两系分子，大遭各派各军之忌。

在这样声势煊赫的中派政权之下，左派唯一的首领汪精卫又远适异国，不知踪迹，于是一般左派领袖，一部分根本动摇，行动右倾；一部分不满现状，而又无法以解决现状，彷徨无主。至于群众方面，则左派的群众，反日渐扩大。

先说右倾的左派领袖顾孟馀，在左派中是怀疑C.P.最深的一个人。丁维汾更糊涂万分，最近居然在会议中主张不要写叫"打倒帝国主义"，以免防〔妨〕碍北伐工作，自做中央青年部长后，便实行他之所谓"左派"理论："只要抓住学生运动，其余一切民众运动便不成问题了。"他的部下王乐平，与之狼狈为奸，极力和我们为难，并运动北方青年，想破坏我们在北方的势力。左派对工农运动的态度，现在即根据武装的戴季陶（蒋）要管理左派甚至C.P.的原则，带着"北伐时期"的大帽子，在"北伐"这个名词之下，实行他们的自杀政策——讨厌工农运动；否认现在工农群众对政治及经济的正当要求。他们谈起来总是说：农会不好，工人要求太高等等，不合实际的鬼话，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右派及反革命派的活动有怎样的危险。陈公博居然与孙科联名提议解散工人代表会（工人的工会）及广东总工会（东家的工会），由政府办一个什么总工会来统一职工运动。在他们组织的组织委员会与宣传委员会联席会上，居然通过这样的决议："在工农运动中打倒左倾的流氓派及右倾的反动派"。

何香凝、宋子文、甘乃光、陈友仁等还保持真正左派的面目，他们不满于现状，要求有所改变。但他们无方法，不知怎样去进行，并且自己无组织无理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要C.P.为之领导。

在群众方面，则左倾分子日渐增多，蒋介石视为他的基本势力之黄埔军校中，自C.P.分子退出K.M.T.后，迫起一般左倾的分子，要起来自负责任，直接与右派斗争；现时黄埔中左派分子几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右派的势力渐渐打落下去。他们与我们的关系非常之好，虽然他们没有显明的反蒋，但迎汪的空气非常浓厚，这已经使蒋及中派诸人十分不安。在工人方面，蒋介石袒护工贼陈森和非工人组织的总工会，已经使工人群众不相信蒋。在农人方面，因蒋军何应钦军及各地驻防军之勾结民团压迫农会，已不能使他们信认〔任〕国民政府、信认〔任〕现时中派的政权是能拥护他们利益的。在商人方面，小商人革命化自不必说，大商人代表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简玉琴，即反对目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与军事独裁勾结下的政局，极欢迎我党机关报《向导》、《人民周刊》的言论之一人。所以现时在广东左派的群众是有了，惜无有力的领袖，故政治态度常常动摇不定，虽有我们供给主张，亦无人出来主持号召。

国民党中央党部自我们同志退出后，大权握于中派张静江、叶楚伧之手，除与我们为难外，并无其他工作，不能与群众接近，日愈远离群众。左派的邓演达睹此现象虽不满意，然亦徒唤奈何，无法整顿。各省党部自五月十五中央会议整理党务案发表后，自然生出一些纠纷，从前"投机的右派思想左派组织"①之分子，当然鲜明起来向我们进攻，但影响尚不十分大。另一方面，却逼起我们愈发努力扩大左派，扶起左派，参加工作，自负责任。

广东有实力的右派李济琛是不满意蒋的（李在表面上虽常利用《向导》的话向蒋进攻，但他和古应芬关系不断，对于农民运动也有点怀疑②，他部下更是压迫农民，所以他不是左

---

①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刊载的本文件此句为"投机的右派的思想左派的组织"。

②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刊载的这个文件，这句为"但他根本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反对的"。

派，只等左倾的右派）。①上海的右派（西山会议派）仍以赤化攻击蒋，所以蒋现在群众中、在党中、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均陷于各方面攻击地位。另一方面拥汪复职的声浪一天一天的高涨，这便是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之现状。

2．我们对于K．M．T．的政策

在此次本党中央扩大会上已有很详细的〔议〕决案并具体实行办法。主要的意思就是：1．要建立我们独立的政治宣传，巩固我们的社会力量；2．积极发展左派的实力，使左派能够实际管理党务，直接参与反对右派之斗争；3．使K．M．T．的组织更宽大些，能包容整个的革命团体加入，使K．M．T．更能成为群众的大党；4．对右派不断的暴〔露〕其妥协及卖国卖民的罪恶，这是使右派失去社会地位、隔离中派与右派结合的方法；这种攻击是与左派共同动作，才能免去使此斗争成为C．P．派与非C．P．派争之嫌。

现时蒋介石独裁的局面大不利于K．M．T．之发展，然而在反对广东内外反革命势力之斗争里，我们还是要赞助他；我们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为赞助他的根本条件。我们极力促成迎汪复职的运动，但决不是梦想回复三月二十日前局面，决不是倒蒋。我们的口号是“汪蒋合作”。我们的态度是虽不退出K．M．T．但不代替K．M．T．。

3．迎汪运动

现时广东内外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不仅在一切民众运动中，就是在所有军队中，甚至蒋之根据黄埔军校学生，亦不满现状，而提出迎汪口号。群众的情绪，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左派领袖，亦正积极的进行迎汪复职运动。我们对于这种现象，若不急图补救，则民众会发生无组织的暴动，若只顾避免与中派的冲突，勉强拉住群众，然群众终是拉不住的。

蒋介石近亦自觉自己地位之危险，非常恐慌不安，既不愿汪之出，惧汪出后为实力派所拥以倒己，又无法统一各部分军队绝对受己指挥，无法消灭群众之不满，无法巩固自己的势力，近日乃向我们同志表示请我们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派人请仲甫同志及伍廷康同志赴汉，请C．P．勿赞成汪回。

在现时的情况之下，我们自然绝对不赞成“迎汪倒蒋”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将动摇了北伐的全局，而且蒋倒后，继起的军事领袖未见高过于蒋，愈滋纠纷。但我们亦不能赞成不变更现状，使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中派包庇下之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所断送。事实上民众及实力派的反蒋运动，亦非我们消极所能阻止。因此我们向蒋介石是这样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K．M．T．于蒋有三种好处：1．是武汉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更能增加国民政府力量；2．新起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般人，他们与蒋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3．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至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断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又我们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之下赞同汪出：1．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我们还可再进一步的指出今后权力的分配给蒋、汪和唐生智等避免冲突的一条出路：

---

①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刊载的这个文件此句为“所以他不是左派，不是中派，而是右派”。

第一，为消灭党内外左派群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为使党的工作更能有力的进行，须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党权交与汪精卫。

第二，为避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利之冲突，为满足各地方民众自治的要求，须将各地方的军队及财政与中央划分，建立省民自治政府，使当地的民众能尽量参加地方政治，使当地军事领袖不至因蒋为中央军事领袖而虑其自身地位之动摇。

第三，我们当引导蒋注意准备更远大的全部革命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当使蒋知道，过去的黄埔军队，在此次北伐中是失败了，以后须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必须扩充至十师以上的力量，以备应付未来与奉系之斗争。

照以上的办法，既迎合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及各小军阀间的权力或者不至冲突。以蒋现在所处之地位，或能接受我们这个忠告和主张。左派迎汪的宣传，仍听其充分的做，使蒋受这宣传的影响，更能左倾一点。

4．《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的影响

仲甫同志在《向导》报上发表《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主要意思是：１．北伐只是一种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２．须防止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利益。

这篇文章传到广东后，民党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馀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时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包同志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接受黄埔同学这个控告后，开会讨论，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结束此案。在群众方面，工人、农人、商人中我们的宣传均发生很大效力。

5．联席会议停顿之原因

我们的代表是八月二十左右就到了广州，在广州约停留两周以上，当时因社会及各方面反蒋空气甚浓、中派疑我们与李济琛、顾孟徐等联成一气，有所顾忌，且惧我们在联席会上提出许多国民政府压迫农民的事实和他们麻烦，遂不肯即开。顾孟徐初颇欲代蒋与我们开会，强迫我们作一些不应当的让步，但自拥汪复职运动发生后，亦不敢尝试；在我们方面，当然亦不急于早开，遂决定延期下去。

6．民党扩大会议召集之内幕

国民党已通告于十月一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会（每省二人）之联席会议决定对时局方针。

在左派的计划，是想借这个大会拥汪复职。在中派的计划即蒋的计划，因见唐生智等部势力之强大，已非他自己所能节制，想提高党的威权，且想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一面借此以范围唐等，一面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

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

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是：一、北伐的意义是南方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这种军事行动只是促进军阀政治之破坏，开展民众运动之局面，我们不能引导民众对于北伐存过高的希望，有坐待北伐军来解放的幻想。二、北伐当中须防投机的军人政客权位欲的活动，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与利益。

北伐中我们的政治号召是：“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国民会议就是国民革命时代民众之联合战线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这一运动必须在空间上有普遍的发展，由通都大邑努力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兵士、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必须在时间上有长期的斗争，由各地公团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才算完成国民会议这一运动的意义。

我们不梦想此次北伐军事胜利就是一种革命，就能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只是在从这个运动中引导当地民众起来参加地方政治斗争，把民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渐渐形成民众在政治上的势力。

根据以上的态度和口号，所以我们不应当空洞的向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宣传北伐，指望北伐，而是宣传北伐中我们应做些什么，不说北伐军如何如何好，而说北伐军应该如何如何。在把北伐军与军阀军队相提并论时，我们不讳言这是赤与反赤之战，具体的指明赤是什么，反赤是什么，人民应该站在赤的方面去攻击反赤。

在广东方面，我们指出北伐当中，后方民众运动尤重于前方之军事进行，指出强派公债、预征钱粮、卖党鬻爵及孙文主义学会勾结逆党与土豪劣绅，驻军勾结民团种种压迫农民的事实，均足动摇广东基础，政府又严厉镇压人民之集会自由（东江徐、何公然布告禁止农民集会自由，总司令部布告北伐期间禁止罢工），实属自杀政策。我们一方面极力为农民找一出路，不任令农民自然暴动或受陈炯明煽动以妨碍北伐；；一面亦不坐视政府之苛取重压，引导农民作正当的斗争。在总司令的军事独裁局面之下，只有我们尚能站在民众方面，代表民众的利益说话，所以不仅农人、工人群众信赖我们，就是一般小商人及民族色彩的大商人均信赖我们。粤区所发表的告民众书，真能代表各级民众的要求，把他们集合在“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去作争取参加地方政权的运动。总之中派的北伐是意在他们的政权扩大，我们对于北伐是要求民权运动的扩大。

在湖南、湖北等省，当北伐军未占领时，我们一面宣传赤与反赤之不同，一面领导当地民众作反对苛捐杂税争取自由等反对当地军阀政治的地方政治斗争。只有这样做，才能对于北伐更多实际的帮助，才能保障北伐军占领后的政策可以左倾（因民众自身已有组织且有斗争的力量）。此次北伐军能迅速的荡平吴军，得力于两湖农民援助之力非常之多，尤其是湖南农会的参战更勇烈。凡战事区域，我们所组织的农会均号召农民起来实际参加战争，因参战而牺牲的农民虽尚未得确实统计，然大致不在少数。农民既有此伟大功绩，北伐军将领对于民众自由亦不得不相当尊重，所以民众现在在两湖的政治地位完全是凭自身的力量争取得的。

北伐军占领湘、鄂后，我们便乘此机会愈加迅速的扩大民众运动，发表当地民众对于政治的总要求，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要求废除过去军阀政府所加于人民的各种压迫，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权利。在这次运动中，我们不但要为工人、农民的利益而奋斗，并应为商人的痛苦而奋斗，才能结成很广大的民众联合战线；在政治上应力倡民权与自治，反对军事独裁。

总之，我们对于北伐的态度并不幻想他就是一种革命，并不炫骇于目前的胜利而忽视了他所包含的危险；我们知道武汉下后的国民政府的现状还在严重的恐布〔怖〕当中。第一、中派领袖对于北伐目的只在争取地盘，内部暗潮甚烈；第二、英国正极力拉拢日本，促成张、孙的合作以对付国民政府。从前英、日、张、吴合作成功，国民军不得不退出北京，现时若英、日、孙、张合作成功，恐广东亦不能守。然而中派诸人方正欣喜于目前之胜利，骄张之气，漠视一切，虽有俄顾问之忠告亦听若无闻，前途如何殊难预言。我们应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善意的忠告他们，一面更切实的做下层群众基础工作，俾一旦环境变动仍能坚固的存在。

党在各方面工作发展情形

1. 党的组织情形

在本年七月扩大会议时，统计全党人数为一一二五七(各地报告仍是五月份的统计)，此时在国内的党员至少在一万三千以上。因交通不便关系，各地报告月份参差不齐，尚不能目为目前精确之实数。兹将现时统计与扩大会议时统计比照列表如次：

	扩大会时统计	现时统计
湘区	一六八六	二六九九（八月份）
北方区	一七〇〇	
粤区	四二〇〇	四五五八（六月份）
沪区	二二四一	二二二三（八月份）
豫陕区	三〇五	
鄂区	四二八	一〇〇〇（八月份）
鲁地方	五〇〇	五一五（七月份）
赣地方	一〇五	
川地方	四二	一二〇（八月份）
安徽	二七	三三（六月份）
福建	二三	
总数	一一二五七	一三二八一[①]

从上表看，可知京、粤、豫、赣、皖、闽各区域犹是扩大会时的报告，尚非现在实况。两月来有报告而发展最快者，当推湘、鄂、川三省，湘省在两月中增加一千人，鄂区增加一倍，川省增加二倍。湘、鄂发展的原因，完全由北伐之影响，川省亦因北伐军进至武汉，一

① 原数如此。

般投机的小军阀均望风来归，对于民众运动不敢十分压迫，且常常表示许多好感，所以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

目前各地工作，以粤、湘、鄂三省区最为重要。粤区有两年多的工作经验，负责同志亦甚得力，最近又特派任卓宣主管宣传部，张太雷编辑《人民周刊》，区委已较健全，故指挥工作尚不费力。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只有鄂区组织太不健全，不能号召群众，不足以应付目前变动的局面。中局已决调彭泽湘同志往作书记，项英、育南亦已赴鄂，分任工人及中校工作；此外尚拟派一中央委员前往视察，并再增得力同志若干人去担任工人、农民及国民党工作。

北方区、豫陕区、山东、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均在反赤军势力统治之下，压迫十分利害，这些地方的监狱中都关有我们的同志。因搜索很严紧，所以宣传品及信件的交遁均受着很大的妨害，《向导》几乎全不能寄到。山东、安徽等地，且因邮局检查出信件将我同志拘去枪毙。职工运动及一般的民众运动在这样严重高压的环境之下，亦不能有什么动作。同时我党在这些地方的工作除北方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作用外，余均在政治上无地位，在市民群众中无信仰（只有在工人、学生中有我们的影响），处处都表现还是研究的小团体状况，而不是一个群众化、政治化的党。在粤、沪、湘则已走入民众中去，湖北亦正在开始接触民众。

江西地委原本很弱，不能了解当地政治状况，不知如何计划进行，党与群众几乎尚无关系。最近因北伐出兵江西，江西问题日愈重要，所以现已调刘峻山同志往作书记。

安徽、福建的组织尚小，作用不大。沪区虽亦在反赤势力统治之下，但因上海社会比较复杂，压迫之来尚有法可以对付，一切工作均尚能经常进行，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基础，并已开始商民运动，参加地方政治斗争，惟在最近日厂罢工中表现出党的下级组织还在十分涣散，支部不起作用，同志对党认识不明了，应速加以整顿；尤其是对于罢工失败的一万七千日纱厂工人中，要加紧工作，设法维持他们对于上总及党的信仰。

在反动势力统治各地的工作，很难有显著的发展，只是在使我们的组织更加严紧，使我们的政治宣传更能深入于各部分群众的意识（赤与反赤之差别）。在粤、湘、鄂三区的工作，现时是最好发展的机会。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同志及一部分K.M.T.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种局面。

“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在各地或者还不十分了解，或者是没有执行，所以尚少成绩。支部若不能健全工作起来，则我们各地还不能算有党的组织，我们的基础还是动摇的很。党内工作者的坏倾向如雇佣劳动化与贪官污吏化的分子，自扩大会议后各地均已注意清洗，尚须继续切力注意。

中央组织部尚无专人切实负责工作，中央局诸同志在扩大会后，特、秋两同志赴粤参加联席会议，仲甫同志病人医院，几不能开会，虽仲甫同志在病中仍管理一切工作，但总有许多事情因而停顿。工委、农委的工作方在开始整顿中。现时中央局因人少的关系，除开对于各地政治上的指导外，在组织上尚不能细密的工作。各地方党部普遍困难的现象是：1.缺乏得力工作者；2.经费十分艰难。因为这两个问题，常常使我们坐视一切机会之逸去而莫可若何。关于缺乏工作者的补救是各地办训练班及党校；关于经费缺少的补救，除极力节省

及选择工作外尚无别的方法。

2．职工运动

两月来全国职工运动可注意的有几件事：1．是解决省港罢工问题；2．是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广东总工会的斗争；3．是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4．是大连的罢工；5．铁路工作方法的改变。

关于省港罢工问题，七月间的谈判因香港代表态度极强硬，条件又苛刻。1．不承认罢工是一个严重问题（以为罢工已过去）；2．不承认沙基惨案；3．黄埔筑港只允许成四等港；且提出粤汉、广九接轧〔轨〕为条件，遂致决裂。现时英国人仍以罢工问题向广东进攻。K．M．T．中派、右派均反对罢工委员会，只有左派宋子文在财政上尚能按月照拨罢工委员会经费三十万。武汉战争中若提解决罢工，则只有助长反动派及中派声势。不过对于封锁问题，事实上表示让步，在内地厉行排货而撤消海口检查，同时要求谈判解决罢工。

关于广州工人代表会与总工会的冲突。总工会只有二十几个团体，是东家的组织。工代会有一百三十几个团体，是工人的组织。国民党中派袒护总工会的首领陈森，袒护总工会，大为工人群众所不满，现时总工会在群众中已无多大力量。

关于上海日厂罢工问题，起因于日本纱厂主利用这纱市疲乏的机会，借整理生产为名向工人进攻，开除各厂工人领袖，工人反抗，则以歇业作抵制。我们决定的策略是：一、在工人方面自行让步，提高生产（自“五卅”以后工人对于工作实际是很怠工），不扩大罢工；二、在社会上利用种种反日问题，扩大反日空气，并发布工人的诉苦书以和缓日厂主的压迫。但这个策略并不能执行得很好，终于受厂家的逼迫扩大延长了这个罢工，现在已逾三星期，群众是非常消极，因此失败了。

关于大连日本纱厂三千多人的罢工，同志被捕者数人，支持两月之久，因政治环境压迫太利害，终于失败。然在大连能发生这样一个运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路工运动，已依照扩大会的议决将发展群众组织的工作，取消从前特派员制度，全交由各地党部负责进行，铁总只注意上部号召宣传工作。

3．农民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更有一日千里之势，现刻有工作者已有四十余县。在此次战争中，农民实际参加战争极为勇烈，故农民在政治上已自然取得一种地位。唐生智欲将农民协会拿在他手上去，但此计划终不能实现。右派、中派亦正极力进攻。现时最感困难的就是缺乏农运经费，不能很畅利的发展，有被中派袭击之可能。湖北之农运过去虽无大成绩，然北伐军下武汉后，必有猛进的发展。

广东农民运动的危机是：1．各县长多明目张胆的向农会进攻，他们的攻击口号是“农会就是土匪”、“干涉行政”、“扰乱治安”；2．驻防军与土豪民团勾结，借剿匪为名，枪杀农协会员；3．土匪民团及反动派极力摧残破坏农会组织。政府对于这种现象既没有诚意救济，且苛派公债，干涉农会自由，故农民非常愤激。我们只有一面引导农民作正当的要求外，并使他的行动不妨害北伐工作。农会会员既①已发展至一百万员，农民训练班亦正积极

①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号刊载的这个文件中“既”字是“现”字。

筹备开办，一万余农民自卫军也正在设法施行军事政治训练，无论如何困难，这两件事均要做到。

4．学生运动

最近在广州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共到代表五七人，C．P．占三四人，国民党左派十余人，右派五、六人，国家主义者无一人。我们虽占着多数，但在开会中极力避免学生运动的分裂，处处委屈求全的与他们合作，对于左派关系弄得很好，所以虽有丁惟汾、顾孟馀在上之操纵，右派分子在会内之捣乱，均算安全渡过。学总常委的选举完全为我们同志。此次大会主要的议决案：1．是统一全国学生运动；2．是争取学生本身利益；3．是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目前要做的工作

目前本党应集中全力进行下列工作：

1．帮助北伐军保持其既得之胜利。

2．发展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民主政治运动：实现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提出工、农、商等被压民众的总要求；要求民选省政府、县政府、乡自治机关。

3．充实国民党左派的实力，恢复左派在广东的政权，实施左派的政纲。

4．本年内湖南、湖北或其他北伐军、国民军占领的省份，都必须召集全省农民大会，北方诸省及四川亦须努力发展农民运动——暴动或组织。

5．武汉各业工会须于本年内组织起来，以充实固有之工联。

6．在最近期内，北方各铁路之各大站及开滦五矿，都须有秘密工会的组织及我党的支部。

7．最近期内湖北、湖南都须召集全省工人大会，最好和全省农民大会同时召集；全国总工会即须在汉口召集全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全国工人经济上、政治上要求的纲领，并须召请湖北、湖南工联多派代表出席此会，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8．进行奉系军队中之秘密组织及破坏工作。

9．进行保定系军队中之政治宣传工作。

10．发展我们党独立的政〔治〕宣传（最紧要的是2、11两项），力求普遍，更其是在广东、湖南、湖北。

11．发展全国反英宣传及排斥英货。

12．全党各支部都开始工作活动起来。

13．各地党部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运动中，在一切的政治宣传争斗中，都须善于运用联合战线的策略，使本党日渐群众化、政治化，尤其是沪、粤、湘、鄂四区，务必去尽研究小团体的习惯。

14．北方区要开始地方的（直隶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政治宣传与争斗。

15．沪、粤、湘、鄂四区都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材。

16．上海以自治市的运动发展各阶级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

以上十六项工作，限本年内须一一办到，明年正月中央应派人巡行各地方，即按照此工作计划，检验成绩。

中央给广东信

——汪、蒋问题最后的决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①

对于汪、蒋问题，在九月十七日给粤委信已分析得很详细，并指出中局对于此问题所取的政策。

蒋介石曾派胡公冕同志来上海见仲甫同志，请C．P．勿赞成汪回，其措辞是：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仲甫同志是这样的回答他：我们赞成汪回，于K．M．T．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力量；第二，是新起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般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所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又详细说明我们在以下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回：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又请吴廷康同志赴鄂，盖自知地位之危险，仍望我们能援助他。吴同志已决定日内动身前往。在昨晚中局与吴同志会议，更具体的决定汪蒋之间、蒋唐之间权力应如何分配，才能避免他们相互间的冲突，给他们各一出路：

第一，为消灭党内外左派群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为使党的工作更能有力的进行，须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将党权交与汪精卫。

第二，为避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利之冲突，为满足各地方民众自治的要求，须将地方的军队及财政与中央划分，建立省民自治政府，使当地的民众能尽量参加地方政治，使当地军事领袖不至因蒋为中央军事领袖而虑其自身地位之动摇。

第三，我们当引导蒋注意准备更远大的全部革命军事工作，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当使蒋知道过去的黄埔军队在此次北伐中是失败了，以后须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必须扩充至十师以上的力量以备应付未来与奉系的争斗，使他抛弃目前和汪的争持。

照以上的办法，既适合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汪、蒋及各小军阀间的权力或者不至冲突。以蒋现在所处之地位，或能接受我们这个忠告和主张。左派迎汪的宣传仍听其充分的做，使蒋更能受这宣传的影响左倾一点。前函所云第三办法暂时不可提起，且亦事实所难能。吴同志及特立同志均订日内赴汉口。

---

①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中央给粤区的信

——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①

汪精卫回粤固然非常重要，而实现时期必须万分谨慎。此时前敌情形殊未能乐观，民中开会时前敌如无胜利，确信蒋又不同意，尚不能决定迎汪，此问题只好推到第三次全国大会；倘蒋同意汪回则当然不成问题。蒋意如何，日内吴廷康同志必有电到粤也。蒋个人此时确日向左倾，前敌战况又不佳，不顾蒋之意硬迎汪回殊太危险。且汪回第一要义是救济广东，如能实去古应芬势力，改造一汪派为中心的省政府，再要求蒋严饬其党徒不妨碍左派在广东的政策，则汪虽缓回，似亦无大碍。“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这可算是前述三个办法外之第四办法，不得已时或只可走此道路。总之，民中迎汪决定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至要！

---

① 这个文件没有作者和时间，根据粤区十月二十一日答中央十月四日的信判断，可能就是中央十月三日致粤区的信，故收录于此。标题是编者所加。

中央对于广东市民运动议决案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①

广东的市民运动可以用现在农工商学联合会为基础，广州工农商学联合会不但要赞助国民革命的总斗争，还应当经常的做广州市民运动的机关。

现在农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本是工人、农民、教育界、学生、商人的联合战线，这一联合战线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买办、劣绅和贪官污吏。但是这联合战线中的各阶级各有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这一组织必然只能是一种联席会议的形式。况且现在因为策略上的关系，这一联合会中仍旧须容纳总商会的买办分子，自然更加应当使这联合会的执行机关没有集权的力量，要增加左派商人的势力，方能保证这一联合战线有革命的意义。

因此，我们应当设法使农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除现有的执行委员会外，有一农工商学代表联席会议的组织，做他们的评议机关。这种代表会议，应由各界的群众选举代表组织，人数可以相当的增多，每遇一次总的政治问题或市民问题，便召集代表会议，各界代表都提出主张讨论，然后交执行委员会去执行。如此，这一联合会才不致于容易被右派分子或买办、劣绅等所利用。

农工商学联合会的市民运动的工作，最初一时期应该以反对贪官污吏为最重要的责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等应当注意日常地方行政的弊窦，揭发贪官污吏、劣绅、买办等右派的黑幕，各自收集事实及证据，提出联席的代表会议，联合一致的反对这些贪官污吏、劣绅、买办——向政府请愿撤换他们，或以其他方法抵制他们。总之，联合会应当时常提出共同要求而进行共同的斗争。

再则，工会、农民协会等可以时时提出关于市政、省政的要求，关于地方公益的计划于联席会议，而且现在便应当开始人民管理市政、省政及人民团体选举的市民会议、省民会议之宣传——尤其是在工人、农民之中。农工商学联合会实际上应当是市民会议、省民会议的过渡形式。

至于直接实行要求地方政权交与民选机关，则须经过农工商学联合会的工作及民权运动的宣传较有准备之后，到各地左派群众团体巩固而有力的时候。

地方的民权运动（市民运动）之联合战线里，固然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组织必须自己充实群众的力量，实际上取得领导地位；然而同时必须中小商人群众有较巩固的组织及势力，然后工农方能联合他们以反对大商买办及土豪劣绅。所以商民协会的组织非常重要。商民协会运动的目的有二：1、组织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参加革命的斗争；2、削弱大商、买办、土豪的势力，就是夺取他影响之下的群众。广州及各县现在的商民协会，客观上可以

---

① 此文及附件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有极大发展的前途，广东买办阶级（总商会）的政治势力已逐渐低落，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在中小资阶群众中，发展并恐〔巩〕固革命势力。至于各县大商土豪阶级（商会）的势力现在大致还保存着，正须亟亟组织中小商人和他们对抗。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应当：1、努力使广州的商民协会群众化，并且要有日常的斗争，指导他们为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奋斗；2、各地的商民协会也要努力的发展，分裂旧式的商会，不断的攻击商会的首领，而吸收其会中较左倾的分子；3、工农等团体应善于运用策略，联络商民协会而反对总商会及商会中之反动领袖、买办、土豪等分子；4、努力在商民协会的群众中发展左派国民党的思想，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彻底的民权主义，并且商民协会受左派国民党的指导；5、我们对于商民协会的指导，当然是经过国民党，并且使商民协会成为同情于我们党的团体。

〔附〕广东区对于工农商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

（一）最初成立时的情形

1. 我们的策略与商人的态度

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在成立时不过仅是建立在那次提的取消火油专卖等七条决议案上。当时党的政策并未看他成一个远久的组织，并未当他是代表社会民众势力的永存团体；但因为去请愿等事要他，故暂时成立这个团体，他的工作便专是来执行那七条议决案的，七条议决案做完了，农工商学联合会也就完了的。因此对于这会的组织很缺乏，工作范围也定死了，除了做那七条议决案外不能过问其他事项。这是以前我们对于此会的策略及情形。

不过一般商人的希望倒不止这一点，我们可举出两点证明：（1）简琴石那时很想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弄成各界一个有力的团体，在各县组织分会。他这个意见最初就同我说，我答复他要迟一点，他也就没有提出。（2）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接到很〔多〕公函，要求解决各种问题，各地商人提出很〔多〕很多，会中商界分子很想讨论，但因章程限定了无法讨论，而商人是急欲讨论的，可见商人的希望不同于我们，要高些。我还记得当时党怕他们提出很怪的问题难得做好，故以事已过去可解散了，即不解散亦搁置不管。这是讲以前我们对于农工商学联合会的态度及商人对于此会的希望。

2. 组　织

这个会是以下七个团体组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教育会，广州总商会，商民协会，原定四个商会每个派出三个代表作委员，外自由职业者代表二人，商界一共是十四个委员，农会、工会、教育会，亦各派代表三人，共九人，后因工、农、学一共只九人，三界不如一界之多，才改为工、农、学各派五人，共十五人，多过商人方面一人。委员会组织一个主席团，每个团体一个主席，自由职业者亦推定一个主席，总共主席团是八人。分工很简单，仅总务及宣传两部，总务部主任是简琴石，副马伯年、宣传正主任就我，副梁培

基。初成起每星期委员开会两次（星期三及星期五），庆祝以后只开一次，现在事又多起来了，恐怕要加多一次，仍然象以前那样每星期两次了。

3. 工　作

我们提出七条议案，不过是有红花有绿叶，其实最重要的只是取消火油专卖，组织劳资仲裁机关，及解决省港罢工，这就可以说是红花，其余都不〔是〕主要的，只是拿来做个配角，这就是七条议决案里面的绿叶了。这几条取消火油专卖是做到了，这点商人大概是满意的，但亦还未能十分满意，因为仍加上了两块特税；并且也有事实的表现，就是加这个特税便有提出改为北伐特税，北伐成功了就取消，可见还稍有不满意的；后来经点解释，也就没有问题了。至于组织劳资仲裁机关，因为我们提出来工人不接受，所以就马马虎虎下去了。最近有个仲裁法出来，也不过是马马虎虎做一下子罢了。关于解决省港罢工，商人是很努力的，商会曾派代表到香港去接接头，但没有结果回来，现在当然不行，不用说了。其余做配角的几项，都没有注意了。在商人方面，对于此会实在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庆祝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那天商人很多参加，水陆并进，可说是民国以来所没有过的庆祝，于此可见其热度。庆祝以后便冷落了，因为我们冷淡了，他们也就没有事做。

（二）目前的情形

自从庆祝以后，既没有新的事做，农工商学联合会可以说就是在办官差，或者还可说是在办工差，总司令部要做个什么，预祝北伐成功呀，祝捷呀，都找到农工商学联合会。还有就是做援助罢工的事。最近情形又有点变动了。在商人方面有这样的感觉：以前的七条决议已成为过去了，现在要有个新的要求，但是自己却叫不出名目来，不象我们能够取个名目叫做政纲；还有就是感觉此会太空了，只是高悬在空中，底下并没有东西，但他们也想不到实际办法，也不如我们知道要召集个代表大会。我们最近的政策，要提出一个政纲和代表大会，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机已到了。

1. 内部的情形

商人方面，总商会的三个代表，马伯平是日本台湾银行的买办，有点鬼诈的本领。商联会的林严生也是个买办，入过日本籍的，是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右派，以前是常常到会的，但很不轻于发表意见。余厚庵老实点。市商会比较要好些，只是梁培基有点能力，但很糊涂。商协会黄旭星是个地皮资本家，也只随声附和。许坚心是一个大混蛋。简琴石不是那个商会的，他自己便是称自由职业者。教育会方面，陈信明有勇筹，特别热心于黄埔开埠，但也糊涂。陈其瑷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左派。黎樾廷是同志。袁晴晖是个小孩，没有什么能力。金曾澄是右派，但没有力量。工农两方面都是我们自己的，可以不用说。

从前商界有冲突，就是反对简琴石。在总商会是消极的反对，小商人如商民协会便是很明确的反对，其余也是消极的不满意。这大概都因简以前的历史不大光明，在商人中的信用不好，他活动起来，商人都觉得很吃醋，特别是在庆祝成立的时候很不好，因为简那时对于商人的策略很不好，以为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多事，一方同工农领袖都很拉拢，所以便看不起商人，骂商人。后来我们暗示他不能这样，又改变了些。我们便常是在他们中间，象教训他

们的样子，他们争执起来，我们便是应当怎样，作最后的决定，我们的话算是最有力量的，就是现在也是信用最好的。我们可以举出事实：前日庆祝武汉攻下大会，要农工商学联合会举出一个主席，本来这个人一定是商界才对的，但他们力要推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推我去就一定是简琴石去的。再有这次英舰占据西堤码头骚扰事发生，四商会那天正开会讨论铺底捐，我同兆徵走去，他们便马上讨论对付英舰的问题，我们提出四个办法，都一点不改的全文通过。就是他们的宣言，表面上是推由总商会起草，实则还是我们同志帮他作了。最近简琴石的政策已变了一下，较以前的情形便好一点。

2. 现在的问题

（1）领袖问题——拿简一个人做领袖是不行的，我又是外江老，到会还要带翻译，很不象样的，当然不能作此会的领袖。将来我们的计划把总商会的正会长胡颂棠抬出来做个领袖，马伯平是不成功的。（2）成分问题——现在组织的七个团体还不够的，将来学联会、工代会都应该加入作组织员。广东同志应作这个工作。

包同志有个意见，就是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弄成有力的团体。从前的计划就是要起草个政纲，并举定××、××与我起草，但直到现在仍未作好，目前又很需要这个团体，要使成为很有力量的民众组织，并且要把这个团体普遍的在革命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起来。

3. 现在决定的工作

第一，要召集个全省各县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大会，广东有九十四县，打一百县算，每县代表十人共一千代表，好象廖未死前所预备之人民大会一样。代表包括商界、农人、工人、学生、教师、军队、自由职业者等类人。第二，在广州开会两星期，代表无薪俸，但要弄点钱来交给代表来往旅费，及开会期中之膳宿费。第三，会议日程还没有定，大概依照政府所有各部定一议事日程。第四，每一个议事日程有一个报告，每个报告内容都包含这三个：（a）过去的成绩；（b）为什么成绩少？（c）现在还要做些什么及怎样去做。每一个报告要有讨论和决议。第五，每个报告都要编成个小册子，先预算好；内容不能太空了，要多搜集统计，并要有个图；如财政问题，一定要有统计，开路、筑港等都要图，建筑道路、增加农村的利益，有多少肥料、实业等，都要有统计才行。同时还要搜集关于各种问题的表册在开会时悬挂。第六，准备议案及各种小册子等，由联合委员会下分组各项特委员会办理。

关于这个代表大会，鲍同志可以提出国民党补助材料及经费。只是代表的派出还有问题，如果有分会，自然不成问题；农民是统一的，也没有问题；但工会便有问题，商会更不用说是很难选出的，因为许多地方都是有几个商会的，到底如何选出呢？这还没有决定，将来于各县大概再有决定的；但选举一定要完全由人民自己选，不能有县长参加。

4. 问　　题

总合起来，问题有下面的四个：

1. 领袖问题。2. 组织成分的补充问题。3. 政纲问题。4. 怎样准备代表大会？

(三) 结　论

1. 领袖问题

现在已要扩大农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及工作，那就应有几个能得群众信仰的领袖作此会的中心，一切问题可先经这几个领袖商量，得个一致的意见才提出，那就很容易办了。目前会中还没有几个这样领袖，所以我们要在每一方面都要抬出一个领袖来，才能使各方面都起来活动，而农工商学联合会方不致成为单方面的，往下冷落。

在商人方面，现在的简琴石虽然是一个领袖，还是不能完全代表商人，因为他没有加入商会，没有群众，并且过去曾有错误，商人对他都不满。现在代表商人势力之大者为总商会，因此在商人方面除简琴石外，并提总商会副会长胡颂棠出来做个领袖。在教育会方面则使陈其瑗出来；农会方面由谭植棠同志加进去成个领袖；工会在我们手上，暂不定人，这是没有问题的。

2. 成分补充问题

以前农、工、商、学组织的团体太少了（仅七个），广州地方的还有几个重要人民团体尚未加入，现在决定工人代表会、机器工人、全省学联会应该加入组织，由我们在中活动，使自动的请求加入。目前可以对学生让步，即时允许省学会加入，但只能派三个代表参加。这点我要解释，因为学界方面教育会已派了五个代表了，所以学联只能派三人，以后教育会应减派代表与学联相等。工会其他暂不加入代表，由全国总工会、工代会、机器工会各分几人组织共同的代表团以整个名义加入。农会如市、乡农民应当参加此会，但也不能单独以市、乡协会加入；市、乡应请于省农会派出代表合省农会组织代表团加入。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共定五人，可以允许自由职业的团体如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加入，但代表人数照比例减少。

委员会委员因事实上不能由大会选出，当由各团体举出其应占委员席数，共同组织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3. 政纲问题

初起我们仅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当作个临时机关，只提七条案件，现在要做个省民会议的样子了。以后对于各种运动都可发动，如召集市民大会、请愿运动等。可是我们要知道，第一，这是对政府的，而不能在这中间提出部分的问题——商人与工人的问题；农民和地主的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便会马上起分化的。第二，我们在这会里，并不怕右派分子加入，他们加入最多只能消极的捣乱，而我们只向政府提出人民的要求，对于那一方面有关的事我们都不要提出，有提出的也怠工，只由有关系的团体自己去解决。我们是积极的提出共同利益的要求，不是特殊的那一方面的。

我们现在要作农工商学联合会运动，应当有个共同的政纲，才能号召各界参加这个运动。这个政纲大体可分这几部分：

Ⅰ. 关于财政问题的；——苛捐杂税等。

Ⅱ. 关于民政问题的；——土匪贪官污吏。

Ⅲ．关于建设问题的；——发展实业开筑公路等。

Ⅳ．市政问题；

Ⅴ．教育问题；

Ⅵ．关于农工问题的；

Ⅶ．关于外交问题的；——要切实而多于商民、市民有利益的，如土地不租外人等。

这里我们应注意的，工农自身的问题，当由工会、农会自己办，提出农工商学联合会便会减少农会、工会的独立性。但是，有些工、农的要求而于一般社会有关的如救济失业、制定劳动法等，可以农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请求政府办，亦不能由联合会去办。

关于全部政纲的起草，由下列五人组织委员会办理……以××同志为主席。

委员会工作一星期，从各方搜集材料开会讨论，一星期完成政纲并请包〔鲍〕同志指导。有了政纲后，一方面要从事宣传，一方面可找简琴石、陈其瑗等重要分子商量一下。

4．准备代表大会工作问题

代表大会的选出要先作一个调查，决定每县应派代表出席的团体，由农工商学联合会邀请其派代表几人出席才没有弊病。

代表大会的工作自然是很难做，但亦尽我们的力量做出个规模来，我们应找几个得力同志参加工作。关于各种材料要找政府机关帮忙。在大会前找国民新闻相〔商〕量，特辟一栏，登载农工商学联合会的消息。

现在决组织一委员会准备代表大会工作。每一委员负责搜集所担负工作的材料作一详细报告，在大会以前编成小册。

中共中央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告民众书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英国帝国主义在"五卅"中惨杀上海、汉口、广州等处的爱国同胞的空前惨案，还未了结，现在又陡起杀心，在万县大屠杀而特屠杀，这是何等的严重问题啊！

英国帝国主义这次在万县既利用不平等条约任意航行内河，不按航规，横冲直撞，致撞沉民船数次，沉毙人命数十，地方官提出抗议一味横蛮不理，反而用十二生的之大炮野战炮硫磺弹尽量施行轰击，伤毙人民至五千之众，焚毁房屋至数千间，损失财产至千余万，整个的万县城差不多成了腥血涂染的断瓦残垣；这不仅比"五卅"时的屠杀情形更凶恶惨酷十倍，简直是近百年来世界史上未有之惨案奇闻（除向敌人正式宣战外，没有如此用大炮肆行轰击者）。这种野蛮毒辣的行为，在帝国主义对于非洲南洋之野人尚不敢遽施，今英国帝国主义竟一再施之于中国，他简直视中国为屠场，视中国人为非人类，不过是他任意屠杀的对象罢了！

这次屠杀的起因，表面看是由英船撞沉官船，与杨森冲突的结果，其实英国帝国主义早就在准备一个大屠杀，故屡次挑衅乘机待发。当北伐军兴师之初，英兵便在梧州上岸捕人，这是挑衅的第一次；当北伐军到武汉，英舰公然援助吴军炮击北伐军，这是第二次；九月四日在广州英舰派兵上岸，占领码头，逮捕工人纠察队，截获民船，强行驾驶货船进口，这是第三次；在万县便是第四次。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五卅"时虽然屠杀了数百中国人，却引起了全中国民众空前的反英运动，英国帝国主义在各方面都受了严重的打击，尤其在广东，昔日繁盛逼人的香港几成了荒岛，现在北伐军又攻入武汉，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伸入了长江流域，英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吴佩孚根本毁坏，英国帝国主义在长江的势力将根本摇动，因此，他便不顾一切，横行无忌尽量地使用他的炮舰政策来施行大屠杀了。

英国帝国主义现在不但用各种方法扰害北伐军的后方，拼命帮助败亡之吴佩孚，并且正在援助孙传芳，助孙军费一千万元，子弹二千万，公然加害于北伐军，希图延长北洋军阀的统治，延长中国的内乱，以遂其在中国任意侵略之野心。

现在英国帝国主义一面援助孙传芳加害北伐军，一面在国际间提倡共同干涉中国，同时，复调兵遣舰，地中海之舰队近已来华，准备更大更凶毒之屠杀。

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你们应该起来注意呀，我们今天不知明天英国帝国主义要轰击那一个城市，不知谁又是英国帝国主义枪口里的炮灰，真是死的恐怖充满了全中国人的周围呵！但是我们要指出，万县这样的屠杀惨案，靠什么政府交涉，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因为

现时的北方政府以至四川地方政府，都是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工具，段祺瑞政府对于五卅惨案交涉之失败便是显例。现在只有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使用一切方法对付这个强盗的英国帝国主义，便是只有更广大运用五卅运动的经验，再形成第二个更广大的反英的五卅运动，以民众的力量与英国实行经济绝交，根本铲除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之经济命脉，同时一致拥护北伐军的胜利。只有如此，才能免除英国帝国主义强盗之第二第三次……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愿以全力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此种凶横残酷的强盗行为。

全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起来！

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之炮舰政策！

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延长中国内乱！

全中国人民起来排斥英货！

撤退英国驻华海陆军！

撤废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为万县五千死难同胞复仇！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C同志关于K.M.T.问题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①

关于K．M．T．问题，第一要提出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是不是过去了？有些外国同志颇有此见解，中国同志中亦有人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或快要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快就到来了。这种见解明明不对。因为中国三分之二地方还是在直系、奉系军阀统治之下。从国际关系说，还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连广东国民政府，亦不得不带些半殖民地的妥协性，在经济上，全国金融、财政、海关、交通机关及大的工业（尤其是煤铁），都还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所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已过去或快完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是才开始。假定我们见解是对的，中国还需要民族革命，可是第二个问题便是〔是〕否需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有些同志以为这个民族革命也可以由C．P．来做，不一定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说这样话的人，表面上虽然很左，但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一是因为若没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我们便不能直接拿住城市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不能够完全拿住农民；二是因为C．P．的政权在现时世界政况上不能够站得住（最近日本清浦子爵即曾经问北京民党政委广东是否C．P．政府）。所以现时还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再有一种见解是承认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但是否要在K．M．T．之外另造一个民族党？本党许多同志在过去都有此意见。现在看起来，这个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须懂得全中国社会情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能力，都在一条水平线上下相差无几，不要这个K．M．T．再造一个K．M．T．，仍旧是半斤等于八两，并且还没有现在的K．M．T．有很长的革命历史。在实际经验上，我们看见许多人有此另〔组〕新党的企图，但皆不能成功。如新中国党及国家主义派，均有企图在K．M．T．之外组织一个民族党的野心，然一已完全失败，一已渐渐衰落下去。所以从理论上与事实上观察，要另组一民族革命的党皆不可能。

现时中国社会情形，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党不容易有第二个，连大资产阶级的党亦不易发生。因买办阶级的力量还很大而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K．M．T．来。尤其是北伐军胜利后，资产阶级更倾向K．M．T．，只有买办阶级仍旧留在研究和交通系内。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民族革命只要一个民族党，因为C．P．参加现在的民族革命是显然的事实；我们也不是说除K．M．T．外不应有第二个民族党，我们是说现在中国只有K．M．T．是个民族革命的党，并且事实上很难发生第二个民族党。

照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说：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在这时代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和我们合作，K．M．T．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K．M．T．的内容是怎样

---

① 这个文件曾编入油印的《国民党问题讨论集》第三集，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局报告农民运动部分引用本文一段话的说明判断，这是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至五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呢？其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在第一次大会改组时，分开左右两派，当时之右派冯自由、马素等，代表地主、买办、军阀，反对共产分子加入，反对K．M．T．改组，现时这部份右派已出了K．M．T．。第二次大会前后，发生了新的右派，即戴、蒋等。此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若资产阶级加入K．M．T．，则右派将更强壮起来。惟现时他的力量，并不及老右派大，仅恃蒋的武力强握党权与政权。此新右派确是反对老右派的，这一右派势将日愈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要发展，代表他的K．M．T．右派也要发展），即或他的领袖将来不是戴或蒋。

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大致我们可以这样说，并非我们附会。在此状况下我党很明白的还应该留在K.M.T.中，与左派结密切联盟，才能够帮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势力之侵入，并阻止新右派右倾妥协。去年今年两次扩大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对的。

自三月二十事变以来，因由左派分出戴、蒋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余左派领袖都表现十分摇动。于是粤区有些同志遂怀疑K．M．T．，怀疑K．M．T．能不能革命？K．M．T．是否站得住？我党对K．M．T．的政策是不是对的？

不仅广东、北方区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为K．M．T．不革命了，还是要C．P．来。事实上有许多也足以使我们怀疑。三月二十日后，左派几乎粉碎了，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C．P．意见，C．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M．T．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C．P．包办，C．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以上是广东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办，左派领袖柳亚子，我们费了多少气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来负责，一切工作皆是C．P．办。这种现象，使得上海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C．P．支配的上总合作，而觉K．M．T．没有什么用；广东的资产阶级，也有时对C．P．比K．M．T．更为重视。在北京方面，K．M．T．工作，无论左派右派均极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同志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左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余，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区初取放任态度，一切议案，都让左派自已起草，一是免得说我们包办，二是借以考察左派的能力与理论。但开会一星期后，议论纷纭，无一点成绩，C．P．分子不得不出面包办，其结果，议决案及选举均依照我们的意见通过。当大会初开时，我们同志很少说话，对于小问题，同志间发表的意见故有出入，右派以为C．P．也不一致，但到最后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我们的预计实现，于是各派都对C．P．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

戴季陶近来的意见是，K．M．T．不行了，革命还是C．P．。谭延闿及其部下说K．M.T.没有力量，还是C．P．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样的意见。

我举出这些事实，并非是证明K．M．T．已无用而须C．P．单独来革命；这些事实只可证明两件事；（1）C．P．与左派联盟是可以的；（2）左派虽不愿意我们包办，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与领导，这个责任，还是我们一时不能放弃的。我们若是放弃这个责任，甚至于退出K．M．T．，便是完全让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

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K．M．T．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们联盟的对象？我们可以肯定说是有的。不但K．M．T．中和K．M．T．外，都有左派的极大群

众，并且左派的组织已在日益发展之途中。单看广州的事实：（一）黄埔军校中，自我们同志一百六十余人退出后，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中[①]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他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二)民中农民部长甘乃光，已着手做广东及全国农运，常找左派青年秘密开会，又著一小册子，企图造成左派的理论，说K．M．T．当以农民为基础，其书闻已销行至五万部。粤区同志已注意这许多事实，已来信说："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已承认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这个原则是对的。惟粤区同志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实际问题，即是：我们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帮助怎样的一个左派？粤区同志的答复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依据这个政纲，发展各地方群众的左派党部和群众的人民联合会，使C．P．和左派群众间有一正确关系，以推进革命，而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粤区同志说："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这个意见一半是不对的。我们帮助左派，不用说第一重要是要拿左派群众充实其党部；可是如果忽视了左派领袖问题，丢开了领袖，使领袖仍旧和群众隔离着，也是一个错误。无群众的领袖固然无用，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群众的趋向固然能够影响领袖，而领袖的趋向影响全党也非常之大，任何阶级的政党都是这样。K．M．T．左派领袖还很复杂与动摇，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还时时感觉困难，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的策略不适当，致促成三月二十日事变，便是很明显的一例。现时K．M．T．左派有三个缺点：第一是左派没有具体的政纲；第二是左派领袖无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领袖与群众隔离。我们要帮助左派的就是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纲；使左派领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领袖有群众。粤区同志何以这样只注意左派群众而忽视左派领袖？在他们的历年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他们以为若说K．M．T．有左派，那么只有左派群众，而没有左派领袖，那左派领袖的思想与行动时常动摇，很少靠得住，实无所谓左派。粤区同志听见汪精卫曾说："农民若只顾阶级争斗，我们便不要他们。"又听见廖仲恺曾说："广宁事件是农会的人受了老鲍及C．P．影响。"又看见戴季陶、蒋介石、丁惟汾都变成了新右派，连顾孟余也说农民协会里有土匪，连甘乃光对花县惨案也不曾在政治会议为花县农民说句话。这些事实使粤区同志怀疑K．M．T．真有什么左派，他们说："K．M．T．左派还是知道自己利益紧要些。"又说"K．M．T．左派利用农民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已经达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视农运了。"我们若因此忽视了K．M．T．左派领袖，说他们不是真正左派，这个见解非常危险。粤区同志主张"我们C．P．与左派的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对的，然不可因此遂怀疑除群众外真没有所谓左派领袖。新的左派领袖未产出以前，在我们和K．M．T．合作的关系上，对于现在的左派领袖是不可忽视的。粤区同志怀疑K．M．T．左派领袖，其错误是在对左派估价太高，几与C．P．无甚分别。K．M．T．左派和右派及C．P．之不同，是右派摧残农工利益，C．P．为工农的利益奋斗；而左派则利用工农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奋斗。我们若以C．P．的观点视K．M．T．左派，责他们也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则中国便不必有C．P．存在，同时K．M．T．左派也只好变成一个工农党，无法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只能在革命联

① 原文如此。

合的需要上赞助工农而决不能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

我们也知道中国国民革命有相当的成功，政权若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对于工人的要求如减时、加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他们和我们的政纲或者没有多大冲突；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维持和左派联盟而失去农民。这时候世界的革命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新时期，中国的政党也许有新的阶级分化。这个也许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和K．M．T．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和K．M．T．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K．M．T．左派，使此联盟不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在农运的立脚地不能相同。

现在我的结论是：据最近的经验，我们现在对K．M．T．政策，和上二次扩大会议所决定的并不须有什么改变；惟足唤起我们的注意者，乃是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我们须有一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政纲；我们并须拿我们的农民政纲影响K．M．T．左派，尤其要拿广大的农民群众充实左派的力量，推进左派，使他们的领袖也不得不采用有利于农民的政纲，以避免我们和K．M．T．左派联盟因农民问题而分裂。

〔附〕粤区对于左派问题之讨论

（一九二六年十月）①

党团对于左派问题，曾经两次讨论，并由B同志作两次报告，党团公同决定认为：B同志所谓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的左派，只有在为民众本身利益的日常生活奋斗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势力，现在这种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等语，根本上说起来是十分正确的。惟就其语气，不免过于忽视眼前上层的左派之作用，于实际工作上有许多难行之处。党团最后一次会议，全体同志对于左派问题，贡献下列之意见于中央，望中央斟酌为一最后之决定，通告各地以为民校工作之标准：

1．现在上层的左派（以下称准左派，以无〔与〕真正的左派分别），只是民校中一部分不能与中、右派合作的分子，为防御右派进攻以保持地位的组织。他们并不是站在左派政纲上的。所以他们的分子摇动不能坚固站稳左派的立足点，软弱不能勇敢上前为左派主张奋斗。他们彼此间又不能谅解一致。但这种左派不能说是我们勉强做成的，是因为他们在性情上或利害上不能与右派合作，故在某一时某一事表现他们与右派不同被我们认为左派。

2．这种准左派的软弱、摇动、不一致是不必过分悲观的，在没有群众的时候，在上层自然只能有这样的左派，而他们刚刚组织的时候，更只能有这样的东西。但这种准左派对于

① 年月是编者判定的。

国民革命是有相当作用的，民校改组后左、右派之分化，促进国民革命之发展不少。因为准左派与右派争斗事实上不能不接近我们，而且不能不在主张上与右派立异，而且有时为着要得群众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较站在民众方面。所以这种准左派虽有许多弱点，我们对付这种准左派一定要特别看待一点，不能与中、右派视同一律。譬如这种准左派与右派争斗之时，我们一定要与以相当的专〔尊〕重或援助；这种准左派有了错误主张与行动时，只能与以友谊的纠正，不能与右派一律攻击。

3．这种准左派的组织，将来虽免不了要发生一些变节的分子或内部的纠纷等，但我们应当帮助这种组织，在凡有为反抗右派必要的地方都应当使有这种组织，且介绍之与广州可靠的左派联络。这种准左派，我们应领导之使去做群众的工作，与将要起来的群众的真正左派相接近；这可以鼓励准左派中间有些人更稳固的左倾，以至于在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真正左派的领袖。假令将来在他们中间产生不出真正左派的领袖来（亦许会有的事），眼前与他们合作，亦是有利的；因为有了他们为友军，至少可以助长左倾的空气，打击右派的空气，使我们做群众的真正左派的工作可以得着许多帮助或便利。

4．民校内部左、右派之争斗，须使此准左派上前，我们只以表〔决〕权等方法帮助他们，我们不应多说话，干涉人家的家事。民校左、右派分子权位上的争斗以①应取上述的态度，但政治上左倾②的罪恶我们应指出攻击他。我们要站在领导左派的地位，不应当专以此种责任诿之于此等准左派身上，此等无群众的准左派，亦每每无负此责任的力量与勇气。

5．同时我们要注意此等准左派的组织，只应限于有对付右派（专指在党部中作祟的右派而言）工作上必要的地方，凡无此必要的地方不可预先组织，因此等准左派的组织，无论如何是有些排拒我们的性质的（即以此右派③组织不愿一切有C．P．嫌疑者参加可以为例）。左〔在〕右派进攻的地方，他们为对付右派，不能不与我们亲密的联合，我们亦需要他们减少我们与右派的直接争斗；若并无对〔付〕右派之必要的地方，我们并不急需此种准左派之组织。比较真左倾的准左派分子亦无需要组织起来的要求，有此要求的只有比较右倾厌恶C．P．的人（这种人实际是懒惰、软弱而褊狭、嫉妒的右倾分子或戴季陶派，不可认他们的要求为左派的要求）。假如预先组织这种准左派，他们一定专门发挥那种厌恶C．P．的精神，实际成为中派或右派的组织。我们切不可拘泥于普通〔遍〕组织此等准左派，在当地无对付右派的工作的，即为对付中央右派之工作，只应使我们的人与准左派分子无界限的合作，不可将他们离开而独立组织起来。

6．我们应当纠正从前过于看重这种准左派、过于看清〔轻〕中派、右派的弊病，他们中间确实并非我们理想的鸿沟，在实际工作上准左派之表现每不敢或不愿与中派、右派有什么不同。若要想将革命的责任真正的放在这种准左派的身上，一定是要大上其当的。为了这种准左派的原因，完全得罪所谓中派、右派分子，比较准左派得罪他们更利害，这亦是上当的事，在不致于使我们与准左派恶化之范围内，我们对中派、右派分子应与准左派分子一律看待，我们有时亦可以得着他们的帮助的。

7．真正能够负担国民革命的责任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说一般被压迫的学生、商

---

① “以”似为“亦”之误。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右倾”。

③ 原文如此，似应为“左派”。

人、农民、市民、手工业工人。这种真正的左派，决不是专门在上层联络几个民校的领袖，在房子里接洽磋商所能做得出的，一定要在为一般民众利益的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才能造得出来。国民革命的工作现在急于需要这种真正的左派。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努力提携准左派去领导民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我们所需要的普通的左派的组织，不应是指的准左派分子的组织，应当是指的真正左派的群众的组织。

8．真正左派的群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争斗中需要领袖，准左派分子常常不敢来做领袖，只有我们同志容易做他们的领袖。因为我们同志是有党的群众在背后的，准左派则只是他个人，所以无论任何同志都容易比准左派更有胆量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他们奋斗。既然左派的群众多半为我们所领导而不为准左派分子所领导，他们虽是真正K．M．T．的左派，但人家乃至准左派自己，都会认他们自己是C．P．的群众，而不认他们民校的左派；我们要使他们被认为民校的左派，必须使准左派分子常与他们生关系。准左派分子能接近这般群众，有时亦可以更勇敢坚决的左倾。

9．准左派分子不一定是真正的左派分子，他们的思想有时根本上右倾或戴季陶式的；在真正的左派群众起来之时，他们固然可以有一部分人更左倾，亦许有一部分人（甚至于全部分人）反退后落伍，象戴季陶在“五卅”时代一样，所以准左派的革命地位是没有把握的。不过无论如何，为眼前防御、打击中派、右派，做左派群众工作易做，而易被人认为民校的左派，我们一定要在今天为准左派分子做工，使他们暂时做民校左派的影子。

10．对于准左派，我们应在表面上尊重他的独立地位。因为准左派要求这种地位，不愿居于C．P．附庸地位。但实际上我们要取得领导他们的地位，不然则此等准左派更易右倾或松散。对于真正的左派群众与准左派的结合，我们亦应在表面上尊重他的独立，但实际上我们要有领导左派群众的实权，使我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可以影响准左派分子。若我们真正的希望将此左派完全由准左派分子领导，脱离我们的影响，准左派分子亦许反转会给右倾的影响于这样左派群众。——总而言之，我们说国民革命必须民校左派来领导这些表面的话，若大〔太〕看呆板了，我们实际取不得领导之权，是于国民革命有危险的。

㉕

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局与

远东局讨论所得的意见）①

一、北伐军东下问题

1．首先，我们从全国的政治上观察，从革命的前途上观察，从解决北伐军内部的纠纷而为之找一出路上着想，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盖因孙之势力不消灭，则他随时可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甚至勾结北伐军内部如唐生智等，使北伐军内部发生冲突（以保定系的关系去勾结煽动）。并且在全国革命的战线上有三种力量并存，亦令民众难于取舍（大概一般人的心理多是觉得“反赤”的奉张太要不得，一面又觉广东太红了，若果在这两者中另有一种力量存在，他是很可得着一部分人的，尤其是资产阶级）。假使在这个争斗中只有两种力量，一方是代表反动势力的黑奉，一方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赤粤，民众的选择更较容易，而革命的进展更较为迅速，故原则我们是不能容许于黑奉、赤粤之外再有一鼎足的第三势力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灭孙传芳？消灭孙传芳有两个方法：一是用北伐军的力量，一是让奉军来灭他。最好是用北伐军的力量，如果北伐军自己力量不够消灭孙传芳，宁可让奉军南下灭孙，而不可容孙存在。在奉军之中，又当把奉张与鲁张分开来说，现时他们的冲突很利害，我们可让江苏地盘给鲁张而不可让给奉张。其理由是：一、鲁张军队较奉张军队更反动一点，更腐败一点，战斗能力有限，将来较易破灭；二、可以更促进奉张与鲁张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于南方有利的。

北伐军纵让奉军取江苏，而自己军队仍须前进取浙江。一、因孙传芳已知南京不归粤必归奉，他打算将闽、赣所有残兵均集中浙江以为最后负隅，而奉系的实力亦不敢南进到浙，若北伐军不能速取浙，则孙仍可据浙联奉以抗粤。二、为免除北伐军内部的地盘冲突，亦须赞成蒋东下，不得江苏亦须得浙江，蒋以后有了浙、闽、赣三省，也可成为一个局面，不必再回汉口与唐生智冲突，回广东与汪精卫冲突。

2．上面既已从政治上说明北伐军必须前进、孙传芳必须消灭的理由，现在再从客观的力量上估计一下，北伐军是否有这样可能。

第一是孙传芳的力量。现在他的嫡系军队谢鸿勋师、杨震东旅早已溃散；卢香亭师在德安、吴城已无退却之路。此外有战斗力的只有杨赓和旅（原为杨化昭部），也在南昌、九江间不易退却，可望退走的只有郑俊彦师（原为卢永祥部），亦未始终为孙力战，其余军队即能退亦无甚战斗力了。此时孙氏可靠军队只有孟昭月一旅、冯绍闵一旅，这绝不能守住江苏。其闽、赣残部即能集中浙江，非以让江苏为条件结合鲁张，已无力和北伐军一战。

①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第二是奉系内部现有种种的困难，如：（一）奉鲁的冲突；（二）奉日间为奉票的纠纷；（三）经济的恐慌；（四）西北军的再起。凡此均足以阻其放胆南下而无所顾忌。鲁张兵力至多能拿到江苏，不能再更前进。

第三是北伐军方面。据我们所知，东下的实力有：唐生智一五,○○○；一军约三,○○○；二军约四，○○○；三军约四,○○○；四军约六,○○○；六军约二，○○○；七军约四,○○○；贺军约三,○○○；补充师约二,○○○□□□□□□□□□以上，足以消灭孙传芳残败之众。而且这许多军队和许多将领，仅仅得一江西，亦患僧多粥少，其势非再前进不可。倘使国民政府对于非孙嫡系军队如陈仪、陈调元、周凤歧、王普、白宝山、李宝章等（兵数至少有四万）关系弄得好，是可完全扑灭孙之势力，或者还可以拒绝奉军南下，即退一步，蒋介石以浙人关系，对于浙军更易结合，至少可想法拿住浙江。唐生智军若乘胜东下，占住安徽之南部及中部也是可能的。

第四再看帝国主义方面的态度。有关系的只有英、日二国，日本一方面不主张奉张冒险向南发展，一方面极力运动南方承认奉张在北方的统治权；英国既忌南方胜利，复虑南方势力终不能推翻，不得不转取联络政策。近自北方顾内阁废比约，帝国主义者并不感觉南赤格外可怕。

3．根据以上的分析，从主观方面，我们应该完全消灭孙的势力；从客观方面，北伐军亦有消灭孙的力量的可能。我们应该改变从前江西下后不再东下的政策，更应抛弃和平解决孙传芳的政策而为前进政策；所以可得以下的结论：

一，从全国政治情形上看，应完全消灭孙的势力。

二，北伐军肃清江西后仍应前进，至于前进至浙江、安徽为止，抑直到江苏，则应视北伐军的实力及奉军南下的迟速而定。

三，关于我们主观政治上的见解，电征莫斯科意见再作最后确定。至于军事行动，当由加伦同志斟酌实际情形决定。

二、关于湖北政权问题

1．湖北设立政治委员分会问题。从前伍同志曾提议以顾孟余、徐谦、邓演达三人组织非正式的政委分会，特立同志来信主张加入唐生智、董必武二人。若只上三人的正式委员会，顾好弄小手段，必难容于唐；徐是无用的老好人，邓现在与鄂各方关系不好，这三人的委员会决不能指导湖北政治。但若加入唐，蒋又不愿意，此问题很难解决。我们以为湖北省政府与党的关系，尚未能实现这次民党联席会议所决定的第二形式，即由民中特务委员助该地省党部管理省政府的形式，还只能是省党部与省政府合作，因此我们主张湖北政治委员会分会可不设立。若徐谦到鄂，只能是以中央委员资格去指导省党部党的工作，我们还须尽力使徐、唐之间不生误会与冲突。

2．湖北省政府委员名单。特立同志来信提出十一人，我们以为九人已足，可除去徐谦、陈公博。其余九人如下：

唐生智　邓演达　刘佐龙　王法勤　陈铭枢　蒋作宾　詹大悲　李汉俊　邓寿全

倘必须十一人，亦宜另择二湖北人，因原来名单十一人中湖北只四人，太少不妥当。

3．湖北省政府设七厅，其名单亦应改正如下：

主席兼军事唐生智；财政刘文岛（最好能换一人）；民政蒋作宾（特立同志原提的是王

法勤；我们觉得民政需要一个湖北人）；司法张国恩；教育李汉俊；建设王法勤（特立同志原提邓演达，我们以为邓在鄂难以占脚，蒋如另有发展，邓仍以去蒋处为宜）；商务詹大悲。

以上数事，均望粤中根据中央意见对外提出。

三、江西政权问题

1．若蒋不离开江西，则江西政权当然归蒋；但须加入二、六两军的人，因二、六两军在此次战役中牺牲特大，他们的思想也左倾些。

2．蒋若赴江、浙，则江西当交给二、六军，非此不能令老谭安心。

3．报上颇宣传李烈钧有得江西地盘消息，这不仅引起二、六军的反感，而且李之思想太右，如果真有此事，我们应该极力反对，使其不能成为事实。

四、汪精卫复职问题

中央前日已有信致粤方，谓蒋既有电表示，大会又已通过迎汪复职，战争情形又好，故汪应即回；蒋、张诚意迎汪与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的地位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任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有暗斗，而不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若汪不回，则蒋反得所借口，说汪自己不愿回来，不是他阻止汪回。此次会议，对于这个意见也是同意的。

又近日上海报载：广州接受蒋之提议，将政府及中央党部均迁移至武昌，此亦系蒋实际阻止汪回之策，此事必须反对！政府及中央党部若迁武昌，不但汪不能回，并且左派诸分子势必相随赴鄂，所谓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等计划，因此都〔成〕泡影。

附一：湘区书记报告

——江西战事、湘鄂政治情况与党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①

蒋介石自离鄂入赣，见得自己军事上的弱点，很想在政治上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到安源时，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上抄下来的。这都可看出他很想从政治上取得地位。但他虽如此做，仍然没有决心排除其部下的孙会分子，因为我们没有得着这样的报告。至于在军事上，他是很倒霉的。武汉之役，以四、七、八军数万劲旅当吴佩孚残破之敌，本不足一战，然而中途调唐军渡江攻两汉结怨于唐，结果两汉被唐冒险攻下，武昌则困围几及四十天，仍然是由八军加入作战攻破。一、二、三、六军战斗力本远不及四、七、八军，敌人则有孙部卢、谢、郑诸劲旅，已属不幸；

①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加以初入赣时仅二、六两军作战较力而又意见不一致，朱培德顾惜自己实力，三军因循不前，常有动员令下后二军已达到某地将敌人击溃三军始追至者。当入赣后指挥上虽较好，但孙部有力援军已到，南昌屡得屡失，一、六两军损失及半。本月初在德安等地激战后，双方吃力过巨，现在似已在停顿中。顷得加伦报告，九月十九日占领南昌，二十二日败退，一、六军损失及半，原因是（1）程欲先得南昌，不欲敌势先入，又不知调度，致为敌所乘；（2）朱忌程不予助；（3）前敌不统一。当时前线军心异常摇动，孙军弃程攻朱，朱亦欲退，加兄极力应战而有七军德安附近之胜，朱军二日之胜，军心大振。但加兄自谓仍无把握，已决九日总攻击，蒋单独所下令结果尚未分晓（南昌之败，王柏龄及缪斌逃走不知下落，蒋亲斩一团长革一团长记之大过云）。又孙迭次求和，其条件为彼此停战，一致对奉。蒋予以条件为（1）承认国民政府或预备实行与之合作；（2）召集国民会议，五省须行选举；（3）民校公开，释放被捕党员；（4）江西之苏、浙兵退出，闽边之动员取消。现尚无具体结果。孙代表为葛湛侯、徐培根，蒋百里为实际主干。惟唐以为鄂西、豫境敌思蠢动，中外探敌又一致协以谋我，故函欲与孙妥协言和，刘（大概是文岛）并云江西可令百里率二师往驻。故唐主张（1）先撤武穴之孙兵回皖；（2）停战。邓、唐以此电蒋，故蒋提出上面之条件。此为九月二十五日左右事。

对奉谈判蒋认为只可做军事协约，不能是政治的。故关于政治的如统一政府、总统等不提，而提出了开国民会议；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也让该会去解决。奉代表认为奉方或者可以接受云。

唐生智现有兵力四十团，一、二、三、四各师及夏师尽调入鄂，省方仅直辖之熊震、王锡焘二旅（各二团）又三团及教导师一师，常德已收回归教导师填防。前赵恒惕时代第二师尽被贺耀祖及唐部第一师收编。唐在鄂情形谅百里兄有报告。唐对湘民众态度未变，对日本关系渐深，对蒋不满且不听命（闻蒋十电索汉阳兵工厂军械唐未肯），对鄂志在取得财政及兵工厂以为扩充八军之饷源械源，而于国民政府及民党中央各取得一席以增高政治上的地位，本人则仍返湘（此事已由雷孟强、蔓伯电中央）。最近对孙代表又先与接洽，故蒋对之甚为注意。闻蒋答复他从加兄意："要巩固革命中心地，必先肃清两湖，团结内部，不使孙、张能合以谋我。……应助樊站住河南，使一军由秦回河南并联络我军。……将来河南归一军及樊负责灭寇，两湖残部归中央军肃清，由唐负责整理之右翼军及一军侧对东南。……"云云。此明明使把两湖交唐，唐当满意。

蒋对汪回据八日加兄信说尚无具体结果。据九日一飞兄信则云："经加伦同志直说已经同意，公勉回时此事已不成问题"云云。蒋一面在扩大会议之前发表"告国民"采用C.P主张，一面又赞成汪回。广东方面古已辞职，似此蒋之实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

对全国政局：（一）目前须集全力于赣战，北伐军如不增援，何能〔与〕孙相持。现在武昌已下，应由唐出兵二师实际入赣作战。（1）决由民众团体电请唐出兵；（2）唐电请省部助筹军饷，此时当然不能拒绝，一面省部亦去电促唐出师；（二）无论汪回与否，现在左倾之局势是渐形成。此左倾之局势之形成，约有二因：一是北伐期间民众势力之涨大，且能实际影响北伐之胜利；一是各军事领袖间之均势局面促其左倾。此种局势之对我们实比三月二十日以前更为有利。我们的政策和工作应当是：（1）我们在民众方面的组织、宣传和政治的工作，比在军事方面、国民党内、政府方面的工作尤为重。（2）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湘、鄂、粤并须尽可能的半公开起来，特别是党在工农中的独立的宣传和政治主张。

（3）湘、鄂、赣、粤四省民众势力的政治上的联合行动的促进，以此四省民众势力的扩大与联合，影响国民政府的政治倾向。（4）中局屡次来信未注重赣省，实为失策。目下应注重赣省的发展：初级的工农人力，湘局应略为供给，指导人员及办党人才由中局供给。（5）目下应预召集农民大会，至少应设筹备处于武汉。（5）广东省政权应交左派；湘、鄂尚谈不到，但亦须尽可能防止右派。（7）国民政府政权交左派领导的左、中两派，只要在政治上国民革命一点相同，财政、军事之统一不必苛求。（8）注意汪（如汪回）、蒋、唐、李、冯（如冯到豫）间之适当关系。（9）切实的具体的执行使"左派在组织上政治上形成起来"的工作，我们可不拒绝左派到工农群众中工作。（10）在取得豫、闽、赣之后国民政府应建都武昌。（11）在军事方面，今后革命军新的武力的创造有必要至少准备十万，但须免去以个人为中心（如黄埔以蒋为中心）之毛病，我们应积极参加；对现有之军队，应注意整理，普及政治训练，特别是下级干部，取各军平均发展原则。（12）中央在赣战停后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

湖南目前政府方面的问题。一、是省政府内部之纠纷。湖南全省收入每年只千四百万弱，而政费经、临两项需九百余万，军费经常千八百万，作战费千万，总差二千六七百万，唐之必取得鄂省财源这也是一个原因。现在政府方面之解决，一是开征十五年田赋（前政府提征概不作抵），二是决定湖南月支军饷六十万，，以三十万解鄂，三十万借省防用。

至内部纠纷则为雷、刘之倒邓运动。雷、刘皆省执行委员，在执行委员会中李荣植等颇赞成之。其倒邓动机多为权利与感情之冲突，极少站在民众利益上说话，不仅毫无政策，也不量力。我们的主张是赞成省政府改组（民扩大会有增厅之说），增设实业厅、工农厅属之，仍维持邓之地位。民厅冯天柱久占必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妥协，应改任建设，而以财刘改任民厅，财厅由唐自派一人；教周可去，以雷或朱剑凡任之。此种改组，唐、邓必可同意，于我们是有利的。对雷等协商已有必要，结果另告。

政府人员惟唐、邓有脑筋。邓有整顿及开展实业才，目前在工农方面确敢干（锡矿山问题之解决是他之力居多），唐无论如何少不得他，无论他有何别的用意，目前总是于我们有利的，我们如果倒他，确太愚拙。他对袁既亦未袒护。不过我们要使雷等明了政策是一件要紧的工作，我们决邀雷、凌（炳）、李（荣植）谈话，问题为国民党工作、工农运动、政府纠纷三问题。政府问题他们必提，民校工作与工农运动则由我们提出，表示我们的态度，告诉他们左派怎样工作。（凌颇有理论懂些政策是真左派）下文如何待告。

湘南军事，王、彭不合，贺、彭不合，贺、杨（其昌）亦不合。贺实力不比王小，公安是贺部血战克取。后王至要贺攻藕池，王守公安，敌人来攻王不支而退。彭更向常德退，被八军周截阻始回，贺亦不得不退。现各军集中津市防守，王极力拉贺，彭则拉杨。我们的政策是：（1）在此作战时期应使王之军事指挥有效；（2）升贺为九军副军长；（3）我们同时调解各部感情；（4）饷械接济暂不偏于一方。王之拉贺意在抗袁、倒彭，彭则对袁尚恭顺，此时不应倒彭，同时亦宜设法使王、贺不结合倒彭、倒袁，在原则上可以他们都坏，但在目前不宜。

省民会议已在筹备中，工农、商、学大联合拟使之成为市民运动的一种代表形式，其工作意义与方法区大会另有决议。

工人运动方面，劳工会已打下来了。邓首先批准惩谌、封会，后唐亦电交建设厅办。我们现在只要政府在劳工会上贴一封条，对王、谌当然不便追究。水口山工会尚好，惟蒋先云

前此过山胡闹，致工人信蒋不信工会；后由工会将红利、夹薪等问题解决，工人信仰已好一点，现在急待找一地委书记去。锡矿山工会已成立，要求条件完全解决，月有教育经费千二百元，决办五个学校。工人尚有三万人，对工会信仰异常之好，该地亟待派一主持工会或主持地委之人去。袁选[①]时在京无事，实以调往该处为宜。纱厂现归省有，尚未开工。安源正在进行开半工。全省工人大会决十二月一日召集，建设厅月拨总工会款二千元，各县总工会已有由县公署拨给者。

农运有工作者六十五县，其中四十五〔县〕是我们有把握的，会员约三十万至四十万，同志不甚多，大概不出七百人，已决迅速发展。全省农民大会定十二月一日召集，湘区农运现在已走到争斗时期，衡阳减租运动有相当胜利，各地与土豪劣绅之冲突尚均能胜利。我们当集全力领导农民争斗，经过一次争斗，农运便可说巩固了。省农民部月准农运费四千余元，建设厅月拨省农三千元，各县署另拨给县协月100至300不等。建设厅另批准湖田□亩项下二万元，分十个月发给作补助教育会（决以之办各县农民训练班）。近拟办一农民讲习所，建设厅已答应出钱。

区代表大会十月一日开幕，十三日闭幕。到会代表二十七人，每日早八时起到晚九时止，开会情形尚好。农民问题讨论了约五天，大会决议要点是：（1）党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宣传运用到各种决议案中；（2）工农政纲、商民要求之确定；（3）扩大会议民校政策在湖南之适用；（4）农民运动由协会运动时期至斗争时期之各种实际问题之政策；（5）党的发展；（6）省民会议工作及其政纲。

附二：湘区报告（一）

——对长江下游各省策略及蒋、唐、汪关系问题等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②]

兹将嘉同志致彭礼同志的信摘要如左：

1．唐、孙有结合的可能，如江西方面失败，则蒋百里督赣，唐、孙必然妥协，现在决要唐攻武穴使与孙破脸。目前不能占安徽，但必得福建才能固长江势力。取得赣、闽后事实上不能太发展，力量来不及，要使苏成缓冲地。前拟四军驻武昌，现决调前敌。

2．前次战败，由于将领忙〔怕〕死又不能合作，现在休息。总攻击定二十五至二十九之间，候贺耀祖及四军到前敌。现开〔闻〕敌有内变，如确系则即攻，否则照预定计划。

3．设法使唐、蒋不冲突。

4．蒋迎汪电二十二日已发。加同志初与谈未遂，后又与蒋谈三小时尚不说话，听加同志说而已。第二日蒋发电，但未交加同志过目（平日各电必须告加兄）。

5．二十六日蒋自动下总攻击令，未商加；加知之力阻始罢；不然一切不顾事实，十分

---

① 原文如此，“选”字似系“达”字之误。

②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危险。但此事各军官已知，使蒋失信仰。但为挽救大局计亦顾不得，候江西完全取得再让他去自弄自动。

6．蒋最近态度：要自动，不愿听人被动。

7．现已集中，十一月一日有激战，目的在包围敌人。十一月三日有战息报告，但恐军官不肯牺牲，不顾全大局。东方情形又不能顾及，唐亦不允出兵东方耳。

8．浙夏有代表到，对他不希望太高。如鲜明统治在国民政府下，马上即可发生对奉战争。我们应尽可能使浙、苏成缓冲地域，现使浙、苏、皖内部变化，在孙失败时竖反孙旗。

兄对长江问题之意见已转给加兄。又此间前数日曾由民众团体及省部分别电唐出兵攻赣，得唐复电谓："卓见至佩，已令四、八两军会攻矣"。

附三：湘区报告（二）

——对唐生智及湖南政治的对策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①

1．唐近来不重视国民党而欲直接与我们来往。这次政府改组的酝酿，唐实有欲借我们力量以造成他的青一色之意。这次邓从鄂回向我们报告人选之准备，不仅教周、财刘落选，并且拉进了赵洪（赵子威与之关系甚深）、袁雪安。我们当时表示：C．P．对政府组织但希望能拥护民众利益，继续革命工作，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们当然不可转入实际的漩涡，但对于袁、赵等坏蛋断然不得不予以打击（已设法促民众方面攻袁），对有可能入政府之左派及准左派如雷、刘等必助其加入；同时对于他们幼稚的办法（如坚持倒邓及刘则如故等），亦须使之明了是"不徒无益"。我们对邓、唐极力避免谈判整个的政府组织问题（前此计划未向人表示），谈他某方面事实时则加以批评，暗示赞成或反对某人。我们一方要与邓、唐发生直接关系，一方要表示尊重国民党（某些问题他们与我们商量时我们表示须与省党部商量）。

2．我们对左派已与之谈到党的工作及对政府问题，尚能表示接受，并计划了省部办"党校"拿在左派手里，由C．P．替他们到各级党部找左倾分子的名单给他们。当谈话时已告诉了他们一些左派的理论、政策及工作方法，表示要他们在商人中、工人中、农民中去工作，他们都表示满意。

3．政府之张翼鹏等对农运已发生怀疑，各地土豪劣绅群起向农协进攻。但各级党部尚有站在反土豪劣绅的方面，而县政府则多坏蛋，每每引起党部及民众团体之反攻，其中当然不免有幼稚的行为（华容民众打死土豪，资兴县部驱逐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长游街等），然民党自省部以下各级党部大体都能拥护工农倒是一种事实。我们对工农的政纲已付印，决携此与左派凌、李及准左派雷、刘等深谈工农运动以坚其"左"的信心；对政府亦决以此与邓等谈明白。政府与省部将开联席会议，所谈问题大概有三：县政府与县党部；农民问题；排

① 此件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斥英货问题。我们的应付及结果下次再报告。

4．同志陈清河今年六月间受民校湘南特别委员会之命，赴道县等考察党务，忽然失迹。我们初以陈同志行动浪漫，或系自杀，旋经派人查访系被该县党部常务谋杀（反共产）。此事民省党部组织秘密委员会，现与政府秘密派兵前往逮捕（暂不能宣布）。

附四：关于湘区C.P.与K.M.T.关系的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月湘区代表大会决议）①

一、七月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对于民党问题的意见是：（1）我们的党应当更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取得革命化的一般民众的政治影响。（2）积极组织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设法使左派知道吸收革命的社会团体入党以充实其基础，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领导地位。所以现时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

二、湘区C．P．与国民党关系的政策的经过分三个时期：民国十二年冬到今年三月赵政府倒台时止为第一时期，自倒赵后到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为第二时期，第二次大会以后为第三时期。第一时期我们对于国民党是采完全包办政策的，这个包办有他的历史的意义：（1）湖南先有C．P．后有国民党，国民党是由C．P．做起来的；（2）在严重的压迫的环境之下，C．P．不包办便无人来办；（3）湖南社会阶级没有显然的分化，反映到国民党内也是一样，所以C．P．包办得下。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政策是对的，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因受社会阶级分化的影响而起了分化，大会的政策是适应这个要求而定的，但那时在湖南就还不感觉得立即执行的需要。第二时期就不然了，政治环境改变了，社会已起了分化，国民党已有政权，“三月二十日”事变影响到湖南，国民党的内部也有了分化的萌芽。这个时候，客观上要求我们执行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政策，在省党部内，在湖南特别委员会，我们都找了一些纯国民党员参加工作。唐生智克复长沙后，我们更渐次退到在野党的地位，把国民党重要的工作交给左派，而注意社会力量的培植，以树立自己党的独立的基础。这个改变是对的，已经有事实上的证明，但对扶植左派发展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少。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时，北伐军已取得武汉，革命的工作已达到一个新的时期，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在第二次中央扩大会中所决定的更加合于客观之需要了，我们党在湖南之工作，便是完全执行这次的决议：从国民党第二大会中工作，执行委员会人选及一切其他方面的工作以至于今。

三、过去的缺点：（1）国民党在我们手里包办了，我们所有的主张都经过国民党，在民众中没有独立的主张，因此民众分不清C．P．与国民党，我们在民众中还没有能够建立独立的信仰来。（2）国民党在组织上还没有充分的群众化，没有能深入小资产阶级的群

① 年、月是编者判定的。

众。（３）一方我们在国民党内既然代替了左派，一方国民党组织上又没有深深打入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因此国民党左派不能在组织上政治上形成起来。

四、现时我们的工作是：

１．努力实现我们党的独立政治宣传，尤其在工农群众中要随时随地公开的宣传我们所发表的政纲，要使群众知道什么是Ｃ．Ｐ．的主张，大家起来接受并拥护之，我们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才能建筑起来。对一般政治问题，对一般民众，我们有主张时，概用我们党的名义发表。总之，现在要站在国民党前面，站在一切民众的前面，以我们的主张公开的领导他们。

２．我们要在工作上、在组织上、在政治上扶助左派，使他们能够站起来。在工作上我们要使左派在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建立他们的新社会力量。在组织上要使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为左派的内容，要使左派懂得吸收整个的社会团体到国民党内以充实他们的基础。在政治上要使左派随时随处采用左的政纲，实行拥护工农利益。

３．应使国民党左派明了：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现在必须引进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于国民党，所以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而宽大些。例如国民党下级党部至少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使与群众接近，不必太侧重于死板的章程而自己来束缚自己。革命的社会团体尤其是工会、农会、学生会应当可以整个的加入，这样才可以使国民党成为极大的群众的党。

４．我们在国民党内应扶助左派，与左派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和他们共同应付中派，公开的反对右派。总之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替代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对右派则应从上至下的反对之。

５．因为国民党左派还未能站起来，我们对县市党部的工农委员还有担任之必要，但须不妨害我们独立的工作。至常务、财务、组织等委员，务要设法交给左派或找好一点的分子担任。

６．我们同志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应当随时随地代表民众的要求向国民党内提出（以叙述民众要求的口吻），使国民党的机关不得不接受而促其左倾。

７．对中派的理论（即戴季陶主义）如造成中心思想，取消Ｃ．Ｐ．，管理Ｃ．Ｐ．，管理民众团体，此种要使国民党变为纯资产阶级的理论，应加以批评，说明革命之实际及联络战线之必要。

８．国民党虽是政府党，现时对于政府决不可幻想居于指挥支配的地位，只能以左派的政策监督指导促其左倾。Ｃ．Ｐ．是在野党，更应彻头彻尾的以在野党的资格代表民众利益向政府发表主张，或领导民众向政府要求实施左倾的政策，屈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分子，决不可非公开的转入实际的漩涡。

９．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上无必要时，可以不加入国民党，工农同志尽可能不以个人资格加入（最好以团体加入），内部负责同志（如地委或特支的书记，组织、宣传等负责同志及普通支部书记等），应尽可能不加入国民党，至少应不兼国民党工作，专任本校工作。

附五：颜昌颐报告湘鄂情形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①

一、特立与邓演达的谈话：邓提出国民政府与总司令关系问题，颇不满于现状。总司令权力超于国民政府之上，主张汪回主持政务，蒋专管军事。邓又谓将来湖北及西北皆须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以唐、冯为主席，才能减轻唐、冯对蒋的不满。蒋介石与李济琛间冲突，一方蒋须取消黄埔同学会，一方李须受国民政府指挥。邓又说我们要拉拢唐必须做以下工作：（1）中央政府及党要强固。（2）湖南民众运动要发展。（3）湖北民众运动要发展（特立同志增一项：国民政府须设法拉住冯玉祥以对唐）。

二、特立对邓的批评：邓以前完全是蒋的人，近来与左派多接近，渐渐不信任蒋；而蒋因自己无得人故尚离不了邓。特立主张维持邓在政治上之地位，待军事结束后要邓主持黄埔训练及接洽西北工作。

三、特立对唐生智的意见：唐不信任党及政府领袖，惟对汪较好；轻视国民党无力量；但他一面又想在党及政府中占一地位。我们须包围他多给他些左派的影响，扶蒋抑唐政策绝不可用，而表面亦不可露出拥唐倒蒋痕迹。

四、特立同志及鄂区对于湖北党及政府人选的见〔意〕见，如中央同意即可电粤主张：

A、省政府以十一委员组织之，名单如下：

唐生智　邓演达　刘佐龙　王法勤　陈铭枢　蒋作宾　徐　谦　詹大悲　李汉俊　邓寿荃　陈公博

B、政府设七厅：

财政刘文岛　民政王法勤　教育李汉俊　商务詹大悲　建设邓演达　军务刘佐龙　司法王国恩

C、湖北政治委员会分会须加入唐生智、董必武二人。

D、政治委员会以徐谦为主席，省政府以唐生智为主席。

五、特立对于K．M．T．问题意见：（1）现时应特别宣传此次民中扩大会议决案。（2）汪回问题蒋虽有电表示，但此问题仍成左、中冲突的中心问题，左派不能让步，必须左派在粤拿住政权才能说与中派合作。（3）国民党现时没有力量拿住湘、鄂的政权。

六、特立对于目前几个实际工作的意见：A．在广东须从各方面巩固左派的势力，广东仍是国民政府的根据地，现时在粤作工之得力同志不惟不能轻易调出，且须增加。B．目前军运最主要的工作是设法拉拢唐、冯，至于土匪军队的联络，不甚重要，可介绍给民校去做。C．湘、鄂、赣民校当特别加紧宣传组织工作。D．黄埔军校不可放弃，当常放在左派手中。E．各军中工作当特别注重一、二、三、四、六、八及西北军，其余可松一点。F．目前对外政策完全同意中央意见。

七、川、豫、赣方面消息：朱德来电，杨森在一礼拜内可以显明表示态度，当我由鄂动

①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身时已接到杨就二十军长消息，蒋、唐、邓均派有代表至杨处。

特立同志谓四川问题非常纠纷，我们须派得力同志前往工作。

河南有几部分军队可受运动，是王法勤在进行此事。

江西方面，据一飞来信，民众运动非常容易工作，惜该地无我们组织，望由湘、鄂调人往做。

八、鄂区工作情形：（1）各方面工作均极紧张，且渐有秩序，同志增加极快，现有一五〇〇——一六〇〇人，惟甚感工作人材缺乏之苦。（2）各地均将开设训练班，工人运动训练班有百余人，已经开办。（3）十月革命节拟在武汉作大规模的宣传。（4）鄂区对外宣传现办一《民众周刊》，已经出版。（5）工人运动在各方面均已开始组织，较好的为江岸工会。现时武汉有组织的工人约十二、三万。（6）农民运动只黄冈、埔圻、黄梅等处较有成绩，已组织的人数约达六万。各县K．M．T．工作同志近多偏于农运，对于其他方面工作又有放弃之势。（7）学生运动因各校均未开课，没有学生，没有什么工作。（8）湖北国民党工作极坏，最近拟请中央办一国民党党务干部学校，造就一批办党人材。（9）国民党近拟在鄂办一《国民日报》以郭沫若为主笔，宛希俨同志参加。（10）右派在鄂潜势力很大，惟他们只钻营作官，在民众运动中影响甚小。（11）邓演达在政务委员会提出各县可组织二百人的农民自卫军，已通过，我们很可据此作工。

九、党校进行：湘区、鄂区各选四十人，湘区的人已经选出，预备十号开课，惟教员、教材均甚缺乏，现时是特立同志多负责任。还有一个问题是湘区所选出学习的人皆预备能作地委书记、委员工作者，而鄂区所选学习的人，程度甚差，或须分为两班上课。

十、湖南政府内部的冲突：建设厅长邓寿荃为唐最信任之人，且甚有能力，为左派刘长峙、雷铸寰所反对。邓现时对我们态度极好，在工农运动中均极帮忙，且要找C．P．负责人谈话，表示想加入C．P．。唐生智对于邓与刘、雷的冲突之缓和办法是把邓之建设厅事项分为三厅管理，即于建设厅之外，再增设实业、工农二厅，并拟以夏曦为工农厅长。

刘、雷等因我们不助他倒邓，又见邓与工农运动者直接接头，而对于左派工人部长凌炳全不睬理（对于农民部我们同志易礼容仍事事接头），更为愤懑，甚至疑此次政府改组亦为C．P．阴谋，一时造成很浓厚的怀疑C．P．空气。于是湘区乃由××、××、××①三同志出面约左派领袖谈话，说明我们一切行动均立在民众利益上说话，绝无勾结邓来倒左派阴谋。此次谈话结果还好，他们还能谅解。

十一、湘区工作情形：湘区每星期可增加同志百人，农人有组织者已达四十余万，工人有组织者达十四万，而长沙即占十二万，多为手工业工人。工人纠察队在长沙已有三百人，预备扩大到五百人，均使受点军事训练。

农民在此次参加北伐战役中得了许多武器和作战经验，自农民协会成立后，他们均需要武装组织，推倒从前压迫他们的团防局。

十二、湘西方面军事情形：湘西方面有九军彭汉章、十军王天培及贺龙三部。贺龙名虽隶于彭实不受彭指挥，比较最有战斗力的当以贺龙部为好，他有兵二万余人，有枪一万多支，能用者七千多支，其部下皆能受贺指挥。贺兵虽多土匪而现在的纪律却较王、彭部为好，不乱拉夫，不乱筹饷。王、彭各有兵三师，彭部只杨其昌一师较有战斗力；王天培部亦

① 原文如此。

只一师能战。最近鄂西战事，彭部一战即溃退。彭既极力拉拢杨其昌以对付贺龙、王天培又想拉拢贺龙，来解决彭汉章。王对唐生智较好，对国民政府诸人皆不满意。王对部下感情亦很坏。

贺龙近颇感于自己之孤立，饷械之无着，拟离开九军另找出路。近派其秘书长严仁山出来活动，严到长沙由××①同志与之接洽，探其语气，拟劝之投蒋，贺与唐过去关系不好，亦只有投蒋可望得饷械之接济。

湘西北伐宣传队完全在贺处，贺前在常德设一政治讲习已由我们同志为之开办。后又拟设一军事训练班，我们不赞成，复要设一学兵营，以周逸群同志为营长，亦不赞成，拟介绍他找邓演达要人去办。

附六：武汉通讯

——国民政府迁汉及湖北省政府组织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②

江西克复后我们所得的政治消息如下：

1．蒋介石主张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迁到武汉。

2．蒋介石主张组织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军委主席蒋自任，以汪精卫代理。

3．唐生智有辞总指挥意，主张取消总司令，组织军事委员会，并主张国民政府迁移武汉。

我们以为蒋此种主张的用意：第一，是感觉以个人为中心的总司令制目前很难统制各将领，欲借党的力量来统治；第二，蒋回到武汉的方法欲用党的力量，即用常务主席的力量；第三，欲汪在蒋之下面。因为他要汪代理军委主席即是表示自己要当中央主席来指挥一切，同时利用汪来笼络各军事首领。

唐生智的用意，大概是在江西得到了蒋方面的消息欲趁此取消军事的狄克推多③局面，而自己来与所谓左派合作，在左的方面与蒋对抗。

我们的意见以为，国民政府太无力量，如即刻迁到武汉：第一，即是表现其软弱，失其作用；第二，是促进蒋、唐的冲突；第三，是与北方接触太近，难以应付北方的政局；第四，是张静江等跑到武汉一定使湘、鄂、赣三省政治发生不好的影响。因此我们主张顶好是不迁来。但是我们看客观的情形，蒋、唐既主张，李济琛亦有主张迁到武汉的可能，恐无法令其不迁移；但必设法使其延缓时日，在此时日好作些预备工作。

所谓预备工作：第一，是划分国家与地方的军政、财政；第二，是迅速成立省政府；第三，是使此省政府左倾，发布左的政纲；第四，是造成民众拥护左政纲的浓厚空气。如此可以逼蒋与唐均向左倾，可以对右派给一下马威，使他们有所顾虑。

---

① 原文如此。

②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③ “狄克推多”意译为“独裁官”。

对于军事委员会，我们的意见以为取消军事狄克推多制是有利的。现在的形式总司令无所不管，总政治部无所不管（总政治部对省党部用指令），总司令成了皇帝，总政治部成了军机大臣，还有甚么党与政府可言呢。因之这个东西不要，是目前及将来均有利的。

军事委员会的地位到底又如何呢？我们主张必定在政府之下各部之上成一特别委员会。

关于湖北省政府问题，唐对泽湘表示：第一点决不兼厅；第二点必定要有几个左派首领加入做重心，自己不必做主席。我们的意见也以左派首领加入是有必要，我们对于中央所拟名单蒋作宾为民政，蒋本人不见得顶好，同时部下坏人太多，如管民政恐怕有成一个保护贪官污吏的机关的可能。同样的，湖北人现在活动的正如唐所批评，求其作几件事说几句漂亮话或有可能，求其廉洁恐是难事。因此，我们主张不用湖北人任民政，而用一与湖北贪官污吏无关系之王法勤或者有作用些。

我们对于名单又从新拟了一个，主张十一人，因为如果只九人中派又要捣鬼使右派加入。

委员：唐生智　徐　谦　王法勤　刘佐龙　陈铭枢　蒋作宾　詹大悲
　　　李汉俊　邓寿荃　张国恩　邓演达

徐谦为主席不兼厅。

厅长：军事——胡宗铎；财政——刘文岛；民政——王法勤；
　　　司法——张国恩；建设——孔庚（此厅与工农运动有关以孔庚为宜）；
　　　教育——李汉俊；商务——詹大悲。

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讨论对付目前时局问题之结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①

一、关于军事方面：

江西为国民政府占领，孙传芳退保江、浙后，奉系军阀野心更为提高。惟奉张与鲁张之见解不同，鲁张一意南下，而奉张则甚注意西北军之再起，反不甚注意北伐军之前进。盖奉张知道北伐军久战而疲，一时不能与奉引起冲突，同时北伐军得江西后亦足以自保，不易反攻。而冯玉祥势力在西北不消灭，则随时可以破坏奉张之一切大野心企图，故彼有从张家口及河南进攻西北军之意。因此C.P.对于目前的时局，认为国民政府对奉的政策，应视奉系对冯的态度而决定。如果奉张要立即消灭国民军，则北伐军须用种种的方法以解除国民军之困难，如下的策略：

1．当力图与晋阎联合，保证阎在山西之地盘不受动摇；

2．不反对鲁张得江苏；

3．速进兵浙江消灭孙传芳所有势力；

4．冯玉祥不可以其主力军队调到南方，应集合其主力部队于包头，一面防御奉张进攻，一面威骇奉军不敢长驱南下；

5．如北伐军入豫，则已经入陕一军之一部当入河南，但国民二军决不能入河南。北伐军不入豫则一军不可入豫（河南是要的，惟此时还不能有行动，须看与晋阎、鲁张谈判的程②决定步骤）。

二、关于政治方面的：

现时国民政府对内对外的外交，较九江未下时更为重要：

1．当继续与日本派来之代表交涉（青浦代表及佐分利），并派代表赴日；

2．对于英国，当坚持与英保守党政府争斗的态度，不可有示弱表示。对于英国社会人士及工人群众，则应得其谅解，应由社会团体派遣代表团赴英宣传中国国民革命的要求，此项代表团在未出发前须与K.M.T.及国〔民〕政府接洽好；

3．对于国内军阀的外交政策，最主要是要用各种的方法，切实进行奉天势力的工作。

三、关于民众运动方面：

现在民众运动的力量并不及军事势力发展之快，可以使军事、政治容易腐化右倾。因此，

---

①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② 原文如此。

我们为要保护北伐已得的胜利，为要巩固党及政府的基础，须集合所有力量去从事组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并警告国民政府注意此事，要能如此才可以保证已得的胜利，且作未来发展之准备。

附一：湖南(十月份)民校运动报告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①

一、民校省党部情形：省党部改组织，除本校同志参加十二人外，余多系左倾分子。所以现在省党部在主张上，还能左倾，接受我们的主张。但非本校同学之二十人，各自在社会兼职很多，多不能实际工作，深入群众，且无政治头脑及能力。因此省党部成为一纯粹事务机关，仅赖些秘书干事撑持门面，其中有些分子，渐现右倾的倾向。现在约略分为四部：一、议会部分，即从前之省议员，如凌炳、李荣植、李毓尧、吴鸿骞、雷铸寰、董维键等，这部分比较左倾。财政厅刘岳峙亦在此部分内。二、北京北大部分，如廖维藩、李燮治、易克嶷等，亦比较左倾，但与仇亦山接近。三、谢晓峰近颇反共，仇亦山颇有中派气味，武高之、鲁子源尚左倾。邱筱阶本与覃理鸣有关系，但近来态度颇好。此外唐生智、彭国钧、刘况、向寅亮、彭泽源等不在省，此数人亦比较左倾。其中雷铸寰态度较左，地位亦高（湖南大学校长），与唐甚有友谊，议会派亦有拥之为左派首领之意。但此人之缺点，思想无统系，缺乏政治手腕。仇亦山以中派自居，现任市政总办，甚欲在教育界为领袖，亦参加民众运动，思想手腕均强，但做官心甚热。我们现在拟对于仇稍打击，对议会中之左倾分子，凌、雷、李三人，已与之以C.P.资格谈话，劝告他们须站起来以左派领导国民党工作。他们很感觉在民众中没有力量，凌、李等更感觉与唐不接近，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最近凌炳、董维键等曾经辞职。凌因对工人运动无办法，觉得尽在C.P.领导之总工会手里。董因力不胜任，且找不到秘书（他所要找的尽是C.P.同志，均不能去）。以上系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派系之分别。

我们工作之缺点：是未能与左派多谈话多接近，因此他们还不了解我们的态度及思想政策上受我们的影响。他们现在对C.P.只是因C.P.有势力（有民众而且与唐接近），取了敬畏的态度；而对党务则取了消极的态度。如雷孟强、刘岳峙等对农民运动，则取了怀疑态度（并不反对只是现在觉得太乱干了），现在已感到这缺点。和他们谈话数次，表明下列各点：（1）C.P.绝对欢迎左派到民众中去尤其是工农中。（2）C.P.现在并不抛弃国民革命工作，但C.P.是要把国民党交给左派而不能自己代替左派。（3）C.P.是政党，政治上各方面当然接头（如唐生智、邓寿荃）；但C.P.这种工作，是为国民革命，为国民党，为国民政府。（4）希望左派造就其下级干部，整顿县党部。（5）希望左派对唐须接近，不要妄想指挥他。经此解说，左派渐有活动意味。

我们还有一个缺点，对议会派以外之分子，亦未多联络，且未曾督促其实际工作。因此亦无从判别其左倾右倾之态度，而更不能影响他们。现已注意及此。

① 此文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二、省党部之工作：反英与打倒土豪劣绅工作，尚能应付。组织部工作尚好。宣传部甚弱。农民、妇女、青年，我们同志主持工作尚好。工人部无工作，部长凌炳消极。我们在工人运动上亦太未尊重其地位。现已改正。

三、各县党部情形：各县党部，最近组织方面甚发达，在政策上亦尚能站在反土豪劣绅的方面。农、工运多归我们主持，常务组织则已渐交给左派或较好的分子。县党部之缺点：则（1）有少数县党部为土豪劣绅所包办；（2）有一部分县党部虽然反对旧的土豪劣绅，但县党部的职员亦渐变成新的劣绅了；（3）因经费有着并与政治势力接近，县党部亦逐渐腐化；（4）好的县党部有太左稚之失，如过分的得罪防军、县知事，过分的反对土豪劣绅，动辄加人以反革命。□反动分子日趋于联合；（5）有些县党部已发生左、右派的冲突，左派及我们同志有肃清党内反动分子之倾向。我们现在之策略：（一）督促民校速造成一批左派干部人才派往各县工作；（二）通告我们同志须注重联合战线之策略，不可借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开罪中立或较坏之人及与官厅处处为难。应对敌人取"拆台"的政策，而不是"扫射"的政策。

四、右派分子之活动：湘省右派因为唐少关系，蒋之态度已变，因此老民党与孙文主义学会派，尚不能充分公开活动。但暗中活动则有之，现在益阳、岳阳等处，已发现右派之组织，发现者则请官厅取消，通缉其职员，现正从事调查，设法对付。现林支宇、周震麟等回湘，老民党必有一番作用。已注意。

五、传闻中之左派组织：据岳阳、长沙有同志报告，谓左派有一全国有系统之组织，以谭组庵、何香凝等为首领，湘省亦有此组织，已派人调查。

六、民校运动之组织：前届区委有国民运动委员会，现改为民校运动委员会，成立才半个月，委员七人××①任书记。在半个月内，已发通告三次，通讯十八次，开会二次。省党部有一党团，近开会颇少，诸事多在民委会议决。

七、长沙市之民校：市党部较各地为健全，亦渐能在商民中发生关系。但市部办得国校组织太严格，此是我们同志之错误。

八、有些地方同志还未能注意公开本校之主张，仅建立国民党的信仰。如水口山工人有四百余人加入民校，C.P.仅十余人。工人对于俱乐部之恢复及争红之胜利，均以为是国民党之力。铜官矿案解决之影响，亦同此情形。似此有些同志还未能了解党的政策。

附二：湖南农民运动新趋势及我们对左派政策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湘区报告）②

一、近来农民运动之发展，反动势力亦随之勃起。反动势力之成分为西山会议分子，赵、叶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坏的团防局。此等分子到处与农民为敌，前并利用江西前线失利之消息，造谣煽惑更加猖獗。他们不仅硬的进攻，有些且很聪明的利用破坏挑拨的手

① 原文如此。

②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段，如混入农协或假造农协，利用农协名义向政府捣乱，捣毁税收机关。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一）是农运必然的结果；（二）一部分是孙（传芳）勾结所致；（三）是前线紧急，后防空虚；（四）是政府对反动分子不欲断然的手段（与（三）亦稍有关系，实是错误）；（五）我们在各地工作的同志，做出许多幼稚的事情，足以促成反动势力团结，而致自已陷于孤立，亦是重要的原因。民校对此问题之态度，省部虽是左的（但没有政策且亦非如何积极的），各县、市党部，亦尚能卫护农民（但一部分仍是我们的关系）；政府虽承认反动势力之事实，然对农民仍不免表示怀疑。如果让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一方面农民完全拿在我们手里，国民党极少参与进去；一方面反动势力日益发展，而政府□取怀疑态度，没有肃清反动势力之志，则现时K.M.T.站在农民利益一方面之局面必不能长久维持。K.M.T.一取旁观或消极态度，则农民中“三月二十日”必有实现之可能，因此我们的政策应当是：（1）在农运中与K.M.T.左派合作，促左派分子加入，并使之积极向反动势力进攻；（2）当此各方面反动势力及局面扩大之时，对K.M.T.作更大的让步，对不大反动的右派，亦可与之在某些问题上妥协。（3）由K.M.T.促政府决心肃清反动势力（当然不是笼统的）；（4）由K.M.T.与省政府合组纠纷裁判委员会，同时尽可能将农运实情宣布于社会。每种宣传均用很好的努力（5）对政府某些问题让步（如开征田赋等），而设法逼其肃清反动势力；（6）对团防局之不作恶者，至少使之中立，作恶者择尤进攻，停止整个的改造团防运动；（7）利用机会对民众力量作最大的检阅（如十月革命、庆祝南浔克复，十月革命之检阅已获最大的成功，许多游移分子都赞赏C.P.的力量；南浔庆祝会中将由各地请愿政府肃清反动势力等条件）；（8）极力矫正同志幼稚的毛病；（9）在农民中用更大的力量，取得我们党的政治的领导权，发展党的组织。详情另由农委报告。

二、扶助左派发展之经过：我们已与左派谈过两次话，我们方面除×××、×××外××①亦参加了。与他们谈的话，开始是关于理论与政策的多，我们本要借此试探他们的态度，后来他们表示接受，我们便希望他们参加群众工作（工农在内）。他们感觉（1）没有人才；（2）与下级党部无关系。我们便主张他们办党校，我们帮他们找学生，他们很赞成，现已准备，他们现较从前积极多了，并想亲自出巡。我们认这些现象都好，我们必须使他们有到群众中去的机会，他们才会积极，才会更与我们合作。农民问题如不能得到民校拥护是很危险的，但他们对政治（可说是政府）方面的策略始终是不甚明白而常常笨干，注意了小的而忽视了大的，这当然只能慢慢的来。

三、十月革命纪念凡有我们组织的县份都举行了。长沙是由区委公开发起的，发起时的现象就很好，大会的那天比以前任何一次群众运动要多，农民到了五千（甚至有些要人看了之后说农民协会真有农民），群众大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我们四十余个支部以支部名义贴标语，各县亦然。这次大检阅可以说是成功了。在政府方面，当然是不免忌刻的，我们以后自然要好好的利用这一次的成功。

四、高级党校办在武昌，此间去了四十人左右。

① ×号均原文如此。

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

——江西政府组织问题与国民党工作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日）①

一、参加江西政府组织问题

此政府中有我们同志四人。据孟冰同志报告：其委员资格是以各军军长及政治部主任资格取得，而不是个人取得，兼之现时江西政府组织还在混乱时代，稍一退让，右派即乘机而入。故你们的意见是暂不退出，观望形势，以后再决定态度。

我们认为，委员资格既系因政治部主任地位相因而及，政府之组织又未确定，则一时不退出是可以的；但必须明白的表示：（1）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作政府委员；（2）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需换人。同时我们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

二、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

从孟冰同志的报告，我们看出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如王环心、涂振农以该县支部书记而去任县长；师古隆之任九江县长且为九江地委所决定；负民校工作者均想跑到政府机关去活动。比较好的愿意做群众工作的人，亦是专门想利用政治势力去发展工作。他们幻想北伐军的胜利与国民革命的关得②太高，仿佛政府是人民的了，人民是自由了，更忘记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试问我们得到了这一小部分的政权，能占据二、三个县长位置，可以实现我们党的政策吗？谁也知道这是绝对不能的，这只有我们在群众中失去说话的地位，失去群众的信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蠢事呢?!不从教育宣传去组织群众，而只图利用政治势力发展工作，则这个工作也是没有基础的，经不得斗争的，不会为我们所有的。

赣地对于以上严重的错误倾向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

三、对K．M．T．工作

过去我们江西的同志拚命占据K．M．T．的位置（省党部九人我们竟占了八人），并不想占着这些位置能否做点工作，能否就可抵制别人的进攻。最近工作的经验江西同志应该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② 原文如此。

明白了，工作做不起走[1]，且无力抵制别人的进攻。一方面K．M．T．工作不能发展，是K．M．T．的损失；一方面尽倾我党的全力去从事K．M．T．工作，既不讨好，又失了自己。

本来省党部是照理可以指导省政府的，至少亦要能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影响省政府。然而江西的省党部，在当权者的眼中看去，既无群众，又是一群小孩子在闹，怎能在政治上有点地位呢？这个局面是再不能敷衍了，我们现在应取的政策是：

1．放出改选空气，迅速办完登记，预备改选。

2．极力包围右派中好的分子如王恒、许苏中等，拉在我们方面来，勿使为右派拿去做工具。

3．下届的选举绝对不让一个右派加入（王、许在江西不能算是右派，只要我们的包围工作做得好），尤其是不要让段锡朋加入（且须遇事打击他），尽量选左派分子进去。我们至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如果没有这许多左派分子，当找有社会地位的正派老先生加入，虽然他老成无用，但占住位置抵制右派加入也是很好的。

---

① 原文如此。

中央致粤区信

——关于国民政府迁汉后应付粤局的策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①

目前上海几个日报载有苏兆征等五人被总司令部逮捕消息，这两天没有继续说此事，我们以为或者是一个谣言。然而我们并不因为这是一个谣言而减轻我们对于粤局严重的感觉：日前特立同志来信说李济琛有电致蒋，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屡次接粤区委报告李济琛和农民关系之恶化，尤其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政治报告，更可见粤局日趋严重了。

鲍罗庭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如云广东民众亦已起来，可以独立，国民政府也无庸在此干涉一省的事。我们认为这是鲍的意见而不是粤区的意见。因为粤区政治报告中明明指出国民政府迁移后广东新时期的危险随之到来），关于迁移后所影响于前方后方的各种实际问题都没有弄好，贸然主张马上迁移，还发出一篇必需迁移的大议论。倘因政府迁移而在前方或后方发生不幸的事变（都有可能），便是鲍又做了一件大错，和他从前主张"以黄埔为中心"、主张"我们退出K．M．T．"、主张"需要蒋专政"是同样的大错。

鲍的大错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多说也无益。现在的问题，是赶快怎样救济国民政府迁移后粤局之危险。

粤区政治报告中对于救济此危险的政策，有一个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这个错误也是由于鲍的政治指导之错误而来。从前鲍估量左派力量高到应有他们的"三月二十日"，现在估量左派力量低到等于另〔零〕。其前后错误矛盾一至于此，粤区委竟盲从他的错误而且危险的见解，说："至于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又说"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是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的。所以C．P．今后应当渐渐完全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占了国民党的什么部去作委员，到那时亦是无用的，在这种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分明是我们和李济琛的冲突，至多是和右派冲突，而定说是整个的和政府、和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预先把自己划定在孤立地位，是何等错误而危险的见解？！这种错误而危险的见解，是由于鲍否认左派存在的观念而来。若当真左派的存在是中央的幻想，那么我们还留在K．M．T．做什么？！照鲍的见解之结论只有退出，其错误与危险和苏联C．P．中反对派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主张退出英俄委员会是同样理论的来源——杜洛斯基主义（杜氏曾主张中国C．P．退出民校，为苏联C．P．中央否认）。他们这种见解好象很左，其实非常之右，因为他们这样左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的政策正是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欢迎的。所以布哈林说在主张退出黄色工会、退出英俄委员会之外，或者又有第三个错误主张，即是中国C．P．退出K．M．T．。

我们对于鲍的这种错误而且危险的见解若不加以痛切的纠正，其所生的恶影响将至破坏中国革命运动的进行。中央见了前次粤区批评左派领袖的信和民中会议的党团报告中关于左派的讨论，我们已见到鲍的错误见解将发生极大的恶影响，拟在汉口会议中有以纠正，通告全国各级党部；不料这个恶影响已经在粤区发现出来了。

据于树德同志所报告甘乃光的情形，不完全和粤区所见相同。此外还有陈树人、何香凝、宋子文，何以能够武断他们必定与李济琛一致？！并且还有左派的军事势力与民众势力，怎样可以说是整个的C．P．与K．M．T．的冲突？！

中央现在坚决的要粤区立刻抛弃鲍的错误见解，并执行左列各项策略，以应付广东新的变局。

一、切实与左派领袖合作，给他们以群众，要求和他们开一极秘密的联席会议，讨论应付新变局之具体方法。

二、即速进行联络省城各种左倾的军事势力，准备必不得已时的冲突；惟冲突时必须用左派出面。

三、加紧李济琛军中的工作——公开的及秘密的。

四、由各方面尽可能的谋与李济琛联络，以减其右倾之速度。

五、尽力设法使前军将领影响李济琛。

六、巩固工、农、商、学的联合组织。

七、设法让李济琛与商人冲突。

八、目前在工农运动中避免小的冲突（工人纠察队直接封闭商店的举动须极力制止），准备到绝对不可避免时一个有组织的大冲突。

九、加紧党的秘密组织，加增党的机关及交通的秘密性。

十、准备必要时简单的解决方法。

此外，中央自然也要通告各省党部，用民众团体名义向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向K．M．T．中央和广东省党部表示：国民政府迁移后，省政府理应遵照最近政纲，严饬军队及地方官保护工农运动，而不得借故摧残以动摇革命根据地。

最重要的根本问题，是要粤区同志绝对抛弃盲从鲍否认左派之错误的见解，必须认识左派领袖的确存在；必须与左派领袖合作；必须联合左派以制李济琛之反动。不可由我们直接领导民众和李济琛冲突，更万万不可有“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是极错误的观念，这是极荒谬的企图。

附一：粤区政治报告（一）

——汪复职问题，对唐策略，国民政府迁移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①

汪先生复职问题，当即照中央所指示的办法做去；但汪究竟回来不回来是一个事实问

① 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题，非我们C．P．的主观所能决定也。联席会议时左派硬不起来，情形非常之坏；如果只有我们孤军奋斗，不能得到好结果，反而在事实上证明不是左派要汪回而是C．P．要。至于现在左派是否真心要汪回，我们无从知道；但是《国民新闻》最近的社论已自称为“在朝”矣；只要可以造成自己一派的势力，只要自己可以卖身当奴才，要不要汪精卫似乎不大成问题。联席会议后何香凝曾经忽然失迹，不知所往；昨日回来尚未闻有何佳音。

对唐生智问题，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自有其策略，C．P．的广东党部不能代其负责。至于粤区自己，没有丝毫抑制唐之观念与事实；如果有之，无论是否负责同志，区委当即照中央训令努力纠正之。

关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移去武昌问题，政治会议所讨论之理由另详粤区政治报告中。粤区委对此只认迁去后广东工农群众与李济琛有直接冲突之可能，我们作工将格外困难，应当格外小心而已。中央意见当即电达包同志。我们想，如前方有何困难，迁去后反不利于推进革命运动，当然还是留在广东巩固所谓革命基础也。

附二：粤区政治报告（二）

——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①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Ⅰ．国民政府迁移武昌

国民党在十月十五日所开联席会议上，关于国民政府发展问题，决定其地点仍在广东。理由是：（一）国民政府的地点，应拿他最主要的工作来决定；并指出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在巩固省的基础，什么地方最容易实现此种工作，国民政府就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当然就在广东了（二）国民政府在广东离张作霖较远，不会与张冲突；而到武昌则与张较近，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于国民政府是不利的。要留在广东重要原因还是第二个。因为国民政府经过了这一次战争，应当要巩固内部，而没有力量再与张作霖冲突。现在又变更了这个决定，要搬到武昌去了。这个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蒋介石的来电，请中央党部搬到武昌，国民政府仍留在广东。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才行。上星期政治会议讨论的结果，已决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都搬到武昌，候江西战争结束后即可实行。现在南昌、九江已下（缴械共计四万，俘虏亦三千余人），江西已不成问题，“迁都”亦必实现，十一月十六日有些人已动身到湖北去了。

这次要搬中央党部到武昌的理由，就是根据前次不搬的理由。

第一，国民政府现在不会与张作霖冲突了。张作霖同日本帝国主义冲突很厉害。张作霖同日本之冲突是由于下列两个原因：（一）日本帝国主义要张作霖不再用兵关内而巩固现有地盘，张学良等反对，说对关内用兵是不得不用。（二）日本要张作霖不规定奉票价格而设法整顿，张回答此问题复杂，不能够解决，日本得到这个回答大不满意。奉系军阀新生出来的

① 副标题是编者所加。

张学良一派，现在与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很利害，所以日本提出这两个问题来压迫他。但是这个回答却是更令日本人不满意而十分厌恶张作霖。本来张作霖所统治的东三省早就不啻是日本的地方了，东三省的一切都是为日本控制的，张作霖作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亦凡事受日本的压迫。吴、孙败后，英国帝国主义就勾结奉张，张亦想借此抵抗日本，这样一来就更弄得坏了，日本更积极的压迫张，张遂处于极困难的地位，因为他无论如何是不敢与日本翻脸的。

因为这个问题，最近日本曾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清浦子爵（曾做过日本内阁）亲自出马到北京活动，国民党的李石曾、易培基等开会。清浦提出三个问题：（一）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好的关系；（二）国民党能不能脱离与苏俄的关系；（三）张作霖要与国民政府联合，国民政府能否容纳。国民党接到这个报告后，政治会议就决定这样回答他的三个问题：（一）国民政府可以而且愿意与日本建立好的关系；但是这完全要看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态度而定，即日本应赞成国民党，应反对军阀的主张。（二）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本党”是独立的政党，因此他有权采行某种能够达到其政治目的之外交政策，不受第三者的干涉；“本党”之联俄即因俄国能以平等的友谊关系对中国，“本党”施行此种政策乃为达到其自己所欲达之目的。（三）对第三问题就说国民政府已直接与张作霖交涉。这个回答还没有到北京，他们已经开始了谈判，谈判中亦仅提出第一个问题及问这方面能否派代表到日本商合作事。在这个谈判中，清浦说了很多张作霖的军队怎样坏的话，谓他已成为全国的敌人，但假使他能与国民党接近则可望倾向于好。谈判后李石曾要他到广东一行，他以路远谢绝而表示可到汉口，并愿国民政府方面派代表到汉共同商量。这个真的原因就是到汉口可同唐生智勾结一下，而到广东则表示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太明显了。这次的交涉，表示了日本现时的外交政策，是想拉国民政府的势力以压倒英帝国主义统治长江的势力。这种态度更可见之于《每日新闻》（在日本有很大势力，代表重工业的报纸）的论调——他的社论中证明现在中国的潮流是英国的势力要倒下去了；同时则赞成国民政府的主张，称道其发展。

在这个情形之下，张作霖处于个很困难的境地，日本的动作是很使他害怕的。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没有力量可与国民政府冲突了。所以，国民政府此时很可安全的搬到武昌没有什么妨害。

其次就是张作霖内部之有问题。从奉系生长出来的张宗昌同奉张是有冲突的。吴佩孚失败后，奉方就有援吴的声浪，张宗昌很想借此占领江苏的地盘，所以他极力想南下；但是杨宇霆、张学良都阻止他到江苏。张宗昌借口山东地盘养不活他三十余万军队，一定要争到江苏来；但杨宇霆、张学良都没有地盘，也争要到江苏，而逼张宗昌去打河南。因此暗中发生冲突，彼此都要夺肥沃的江苏。国民党就利用这种争执的两方活动，答应杨宇霆、张学良亦可南下，同时亦敷衍张宗昌。现在他们还提出要求国民党打个电给杨宇霆，请他下南京，他就可借此带兵南下。于此可见他们内部冲突的利害。从这两个事实看来，在联席会议时所决定不搬的第二个理由已不存在，而变成国民政府可以搬去的理由了。

第二，在联席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巩固省的基础。这可以有两个解释：其一是这种工作要在最进步的地方作起来，就容易实现；其次也可说要在最糟最重要的地方作起。现在武汉是最糟的，但是武汉是全国一个中心，又是重要的，不可放弃他，所以需要把国民政府拿去压一压，有几个大人物到武汉去或者还可以做一点事，使武汉的现象转变好一点。因为国民政府还有点威信，他还可以到武汉去镇压一下。并且照现在的情形看

来，国民政府又有向全国发长〔展〕的可能，以前所谓巩固省的基础已不是现在第一件事情了。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完全失败，政局遂转入一个新形式〔势〕，要以武汉为中心而进行一个第二次新的北伐了，这个北伐真的就要向北打了。

Ⅱ．广东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治之新形势

广东省现在已到了个地方工作的时期了，上层政治已不能有什么作用了。上层政治的搅动，必要在情形复杂争斗很多的地方，才能有那里局势之下发展；但是这些东西在广东都成为过去的了。过去国民政府在广东的许多斗争中可以有作用．现在则已形成一个势力之统治，政治的现象成为单纯的，上层政治就用不着了。同时广东民众亦已起来，可以独立，国民政府已无庸在此干涉一省的事，而要到武汉的适中地点去指导全国。到湖北的复杂情形下也能够搅弄事情出来，在湖北现在才是需要这一个上层政治机关去的。

因为国民政府已决定实行搬到武汉去，于是省政府改组也被逼出来。新省政府已由国民政府任命下列十一人为委员：陈树人、李济琛、孙科、陈孚木、甘乃光、何香凝、许崇清、周佩箴、宋子文、李禄超、徐权伯；分设九厅（陈树人任民政厅，宋子文任财政厅，孙科建设厅，许崇清教育厅，徐权伯司法厅，李济琛军事厅，陈孚木农工厅，李禄超任实业厅，周佩箴土地厅）。在此组织中有一点可注意的，即是并没有省政府主席而只有常务会议的主席（常务委员五人：陈树人、孙科、宋子文、李济琛、甘乃光），这个目的就是在不造成一个首领。不过事实上军事权完全在李济琛手上，结果也必然成为一个首领了。现在甘乃光、陈孚木都在李影响之下的，就是孙科也只想自己得一个好的位置。再则省政府改组，决定组织四师省军，这将来当然是成为李济琛的势力而造成他在广东的霸王地位。

李济琛这人我们应知道他一下，李所说的话完全是代表地主的，对工人的事他不大说话，而关于农民的事他的态度比任何人坚决。譬如这次南路惨案，他坚说农会有土匪是有证据的。甘乃光说县长有此不好，主张把县长调开；而李说那是最好的县长，决不能调开。农、工、商、学开代表大会他也反对。他的手段很辣而很有把握的。至于左派呢，也没有这回事；我们以前说称的左派，现在都转移到李济琛的重心上去了。甘乃光我们以前说他是最好的左派，现在也倾向于李了。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利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虽然他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表现在我们面前已可看见，各路都发生惨杀农民运动人员、压迫工人的事。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是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方面与政府对抗的。所以C．P．以后应当渐渐完全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占了国民党的什么部去作委员，到那时也是无用的。在这种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

在这种新时期中，第一步要发生的冲突就是农民与政府的冲突，尤其是农民与军队的冲突，最容易爆发。城市的工人目前还不会发生问题，因为工人有集中的势力居住在城市，如果要压迫还有点惧怕工人联合的反抗；并且他们也要利用工人，不敢闹大的乱子。最迫切的就是乡村的农民，现在乡村中所起的冲突还只是小的问题，一部分的冲突，民团与农会的冲突，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农民与军队的冲突，都是开始了；这种种冲突就是将来绝大冲突的开始。其次还有一个冲突的因子，就是在乡村最容易与地方军队冲突。在乡村的地方军队发生了冲突时是没有什么客气的，他要打就打、要杀就杀的；而军队的首领在城市的，他对这

种冲突是不会负责出来解决的。总之，在这个民众与政府、军队冲突的争斗中，农民站在最主要的地位，这样农民运动当然走到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Ⅲ．我们在这个时期中所要的政策

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中我们党应该采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与我们合作。自然我们有时仍要拿群众运动的力量去压迫他，但是也不能过甚。在我们尚无很大的势力以前去与新的军阀冲突，那一下被他的压迫打倒了，我们便无再运动的可能。如果民众的势力发展与新军阀的势力相等时，我们亦不能轻作很大的斗争，因为冲突的结果必是两个势力都碰坏。这不是说我们此时就不要斗争了，我们仍然要斗争，如在潮安、汕头我们的工友同志被打死了，我们就举行大罢工。但是在此时我们作这种斗争要特别小心，即是说我们现在还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而不是即刻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此时我们仍要把民众与新军阀的关系弄得好点，而在这种关系下去强固民众的势力。

现在已经要到民众与政府对抗的时期，我们要使工农的势力不孤立，就要拉拢学生与商人，要学生、商人都不反对我们而与我们一致的反对政府。因为这个时期的政府，固然不会能代表资产阶级，不会使商人满意，所以此时还可以拉拢商人。但因此我们的口号就要低一点，乃能适合学生、商人的口味。特别是商人应注意，因为商人在经济上十分重要，如果他站在政府一方面，我们就危险；站在工农群众一方面，就是一个相反的情势。所以现在为了我们整个的工作，有时应当妥协一下，对于广东劳资的冲突，现时就要小心的工作。广东的工业不能维持其成本，一来是因为工业不发达，二来是管理不好。政府的工作因为管理不良（职员扒钱太多等），都弄得要倒闭的样子，我们应设法使这扒钱的弊端减少点，而以增高工人的生活。对于私人工业则要很小心的，要使工人的要求能够适合以工业利润所能供给的限度，即不要工厂因工人的要求过度而关门，把工人与商人的关系弄得太恶劣了，结果在整个工人阶级与政府对抗的形势上陷于孤立，或竟使商人结合在政府方面来压迫工人。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要打倒资本家而所〔以〕与政府对抗，所以我们不能敌人树得太多了。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后的敌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与他们站在绝对的冲突地位以孤立我们自己的势力。

关于工人的问题比较还是容易解决的，最重要的、最困难的还是乡村斗争中的农民问题。现在农民问题很难以对付，因为在农村简直不能有一点要求，只要成立了农会马上就要发生冲突。照现在的政治环境，在我们还没有很大力量的时候，当然不能轻起冲突。但是我们绝不能说不要发生冲突。除非我们不作农民运动。只要我们到农村去，要去把农民组织起来，就要发生斗争的。农民运动不比工人运动，他是在乡村的，农民散处着，没有象城市工人的集中。而统治乡村的封建势力——地主及土豪劣绅的势力又到了动摇时期，他们必要维持其乡村皇帝的位置而不容一点反对他的势力在乡村增长，所以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发生剧烈的斗争。不过现时虽然不免要时时发生冲突，但要整个的爆发一个大斗争，还须有了全省极强固的统一组织，有了足以保证斗争胜利的力量，才能够行动。我们应该尽力避去无味的斗争，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斗争）；同时亦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才能做一个大暴动以反对政府，这样的暴动我们才有胜利希望。

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这次的战争，其牵动的范围之广阔，是从来内战不曾有过的。全中国除云南、新疆外，几乎没有一省不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战争的性质，简言之即赤与反赤之战。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其相互之利害虽不同，而其标揭反赤摧残民众自由则无二致。所谓赤的方面，即国民政府影响下之各省。此种红色的势力，已由广东一省而渐渐奄有长江流域，若把西北军加算进去，则我们可以说，现归国民政府的已有十个省区，即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福建、绥远、甘肃。将归国民政府的有浙江、云南、陕西三省。退一步言，国民政府亦有得安徽南部及上海之可能，是国民政府之势力已得了全中国之大半。反赤势力所统治的地方（把苏、皖加入在内）也不过十一省区。这种进步的军事力量之可惊的发展，在中国的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的意义。

当十一月五日以前江西犹未攻下时，北伐军的前途尚在十分暗淡，不幸战而失败则不仅退出江西，即已得之湘、鄂恐均不守。然而现在这一层危险是已经过去了，此后的问题只是与奉鲁军分取孙传芳地盘之多少问题，而不虞有全部溃灭的影响。奉鲁军此刻即与国民政府发生战事或者不会有，一则北伐军是量力而进（对于浙、皖问题）；二则奉鲁军也不敢过于南下（伸入浙江）。日前奉对粤提出条件曾有浙、闽、赣归国民政府之表示，是北伐军取浙江当不至与奉鲁军冲突。肃清孙传芳势力取得浙江虽然尚有一些时间，但孙之败亡已成不可挽救。国民政府此次北伐的战争至此将暂告一段落，下次对奉作战，双方均尚须有相当时间之准备，而不是目前就会引起的。在全国这样一个大的变动中，我们最近所经过的事实及应付策略特撮要如下：

一、奉系军阀之野心及其内部之暗潮

自南口国民军陷落后，奉系军阀不仅在北方政治上、军事上占着极大的优势，对于长江方面北伐军与吴、孙的战争也立于极有利的地位。吴、孙自然不敢与奉军冲突，即北伐军亦尚未至与奉军冲突时代，而有利于与奉作暂时的妥协以对孙、吴。吴、孙之败，在全国反赤之声势上说自然受了很大的打击，但从奉系个别的利害上说又确是于他很有利的，因吴佩孚失败，北京政府可以全为奉系所操纵，保大可收回，甚至河南亦将为奉系所有，孙传芳失败，奉系亦可从容取得苏、皖以报去年之耻。所以奉系对于长江战事的态度是：一方标示与直系合作讨赤，坚决吴、孙对南方作战的决心；一方又暗中与国民政府往还。希图借国民政府的力量消灭吴、孙而彼得从容收渔人之利。观于奉张向国民政府所提出之合作条件，可以窥

其野心。其条件中最主要的有三件事：

1．西南十省（粤、桂、川、黔、湘、鄂、闽、赣、浙、滇）可以归粤，而苏、皖必须归奉。

2．南北将领联络拥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

3．川、滇归粤，蒋自由解决；而冯、吴则由奉方自由解决。

得苏、皖，作总统，消灭冯玉祥，这是奉张的如意算盘。奉张欲利用其现时军事上、政治上之优势以求达此目的，但事实上进行亦不容易。国民政府对于苏、皖两省尚可放弃，而后两事断不能容受。在奉系领域之下，奉张或为帝王，或为总统，国民政府暂时亦可放任，但若欲取消国民政府以拥张为总统，则为绝对不许之事。让奉张消灭冯玉祥以自损其在北方之应援，更为国民政府不会承受之事。再则奉系内部及周围亦尚有种种之困难，足以阻挠其此种野心计划。

第一是奉系内部的冲突——自郭松龄败后，奉系内部已不是整个一致的。张宗昌自为一派，已非奉张所能约制；奉军嫡系又分旧派吴俊升，新派杨宇霆、张学良两大势力，暗斗极烈。南口之胜，全赖吴部克多伦之功，然吴部将穆春既不得赏反被拘囚，其怨望可知。新派杨宇霆与张学良又不和，杨纯粹亲日，张想独立形成一种势力，颇与法、美勾结。

第二是奉、鲁间的冲突——南口之役，鲁张将领寸土未得；北京王琦、李寿金之军警权又见夺于奉系之于珍；褚玉璞之直隶督办亦日为张学良所侵逼；苏、皖问题奉系杨宇霆等又欲计调张宗昌军队于京汉线上而乘机自取；"海圻"赴奉修理竟为奉所扣留；张宗昌欲与北伐军谈判对付孙传芳，奉方则责其通赤；张宗昌在北京逮捕赤党而奉方则责令释放。奉、鲁间这些冲突迟早终要爆发的。

第三是奉、日间近来的参商——张作霖固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近来日本投机商人在奉勾结本地奸商对于奉票之捣把，以二、三角一元之奉票强迫奉张照额面付现，获利数千万元，激起奉张枪毙捣把中国商人，遂使奉、日关系发生一些冲突，虽不能根本动摇，但在目前是起了一些障害。

第四是财政的困难——自去年以来，奉省财政即已陷于非常拮据状态。文治派首领王永江为减轻军备以舒财政，曾以去就相争。现时奉票之低落亦尚无术挽救。

第五是吴、孙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又有英国帝国主义在后援助，安福仍在活动，均足以使奉系企图受许多牵制。

第六是国际上的困难——英国现时一面急与国民政府妥协，一面尽力赞助直系在北京之政权，为顾阁计划废除比约之计，向日本示威（因为比约可废，暗示日约亦可废）。同时英使不肯递正式国书，预备将来若造成清一色日本支配之奉系政权的拆台地步，遂使得奉张不敢急取北京政权。

第七是冯玉祥西北之再起——可以随时威吓奉军不敢疏南口之防，不敢存长驱南下而无顾忌的野心。

奉张在以上的困难情形之下，虽有野心亦无办法，所以此次入关与奉系将领天津会议的结果，不得不放弃苏、皖以予张宗昌，不得不暂时停止即做大总统统一中国的好梦。他看得国民军在西北之发展较之北伐军之前进尤为重要，因把对南方河南的军事行动委之张宗昌，北京政权在南北军事未得充分把握以前亦暂不积极进取（其实北京政府之精华固早已在奉军之手，此处所言政权是指奉张更进一步作元首言）。现时拟集中注意消灭国民军在西北之存

在，刻奉张正汲汲逼迫晋阎与其合力进行此计划。

我们认为国民政府对奉策略应该采取以下的原则：

一、在吴、孙的势力未完全消灭以前，国民政府与奉系尚不能有很直接的冲突，而且不宜即引起冲突，当敷衍之以使专力消灭孙传芳，得使革命的战线更□得简单。如国民政府无力灭孙，虽让苏、皖于奉方而能使孙之力量消灭亦当为之。

二、吴、孙势力消灭后，国民政府一时亦不能即与奉方开战。奉方若提出统一政府问题、总统问题，均可诿之于由国民会议解决。事实上奉张就自为总统亦可听之，在这长时间的国民会议筹备过程中，即是双方积极作战的准备时期。

三、奉、鲁的冲突对于国民政府是极有利的，应当使他这种冲突更为扩大。比如苏、皖问题宁让之于鲁军不让之于奉军，一因张宗昌军队更腐败些、更反动些，战斗力有限，将来容易消灭；二因鲁张势力越发展，则其与奉张之冲突越加深、加速。

四、国民政府应极力维持冯玉祥在西北存在，现时可以威胁奉军不敢南下，将来的北伐战争亦非有国民军之炮兵、骑兵参加（此皆南方兵队之不能有者）不能取胜。以冯玉祥现在之环境，又必须与阎锡山联合，然后合陕、甘、绥、晋四个省区才更有力量制止奉军不敢轻犯。

二、吴佩孚与孙传芳最后之挣扎及北伐军东下问题

吴佩孚自败退河南后，虽日日言反攻，因部下将领暗潮甚烈，且军心涣散，饷弹无着，号令不统一，故迄未能前进一步。河南现时军队之多和派别之复杂，为各省冠，张治公、寇英杰、田维勤、靳云鹗、魏益三、米振标各有相当实力，各不相下，吴佩孚的地位便维持在这种均势之上。这许多军队均已没有什么战斗力，向北向南均无发展之可能。刘镇华部败出潼关则入陕之路又绝，其中不少国民二军旧部均与国民政府或奉方有相当默契。奉方借援鄂之名，已尽驱保大之吴军离开直境，且以重兵沿京汉线南下，大有即欲取得河南之势。信阳南面又有樊钟秀之攻击、吴势至此可谓穷蹙已极，虽曹锟曾亲自赴河南劝勉诸将一致合作，然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吴现尚欲从政治上支持其将灭的生命，令顾维钧毅然宣布对比废约，一以博国人之好感，使奉天不便于废约外交期中急倒顾内阁；一以为对日对奉要求之条件，盖比约既废将及于日，日约张绝不敢动，于是比又可要求援例不承认，直系乃得于此问题之操纵中取得一点地位，企图暂维现状。

孙传芳在江西的战线事，其初因善利用南浔路及长江之交通，故虽经南军几次的猛烈袭击，均尚立于有利地位。南军方面，在军略上、在政策上均有许多错误，如蒋介石不愿八军东下，不许四军东下，致使南军战斗力减弱，作战又注意攻城而不先击破敌人在南浔路之主力军，故牺牲极大，北伐军几有覆灭趋势，幸而挽救得快，尚能转败为胜。孙军方面初虽获胜，但主力军队已损失一半，且无援兵开上补充，陈调元、周凤歧等部又不肯积极作战，南军方面突然增上第四军之六千人，贺耀祖之四千人，唐生智之一万五千人，故孙遂不免于最后之失败。福建方面亦因曹、杜两旅之倒戈竟至全局不可收拾。江西败后，孙之主力军已完全击溃，五省地盘只剩下苏、浙、皖三省，其初犹欲守住这三省再图恢复，一面联合吴佩孚由河南出兵相助，一面勾结奉张泥阻鲁张南下，同时在南京设立军官学校，造就下级干部人才，孙预计三个月后可以恢复其力量。后来天津会议奉天决定鲁张以援赣为名出兵苏、皖，令孙守浙、沪，孙氏留恋三省之计划乃归泡影。

取得江西、福建后之北伐军，是否还要继续东下进窥苏、浙、皖三省，当时乃是时局中一个严重的问题。照我们那时的意见是：从全国政治上观察，从革命的前途上观察，从解决北伐军内部的纠纷而为之找一出路上着想，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盖因孙之势力不消灭则他随时可以勾结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甚至勾结北伐军内部如唐生智等，使北伐军内部发生冲突（以保定系的关系去勾结煽动）。并且，在全国革命的战线上有三种力量并存，亦令民众难于取舍（大概一般人的心理多是觉得反赤的奉太要不得，一面又觉得广东太红了，若果在两者中间另有一种力量存在，他是很可引诱一部分人拥护他，尤其是资产阶级）。假使在这个争斗中只有两种力量，一方是代表反动势力的黑奉，一方是代表进步势力的赤粤，民众的选择要较容易，而革命的进展更为迅速，故原则上是我们不能于容许于黑奉、赤粤之外再有鼎足的第三势力存在。问题是如何消灭孙传芳，消灭孙传芳有两个方法：一是用北伐军的力量，一是让奉军来灭他，最好是用北伐军的力量。如果北伐军自己力量不够消灭孙传芳，宁可让奉军南下灭孙而不可容孙存在。在奉军之中又当把奉张与鲁张分开来说。现时他们的冲突很利害，我们可让江苏地盘给鲁张而不可让给奉张，其理由是：（一）鲁张军队较奉张军队更腐败些，更反动些，战斗力有限，将来较易破灭；（二）可更促进奉张与鲁张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于南方有利的。北伐军纵让鲁张取江苏，而自己军队仍须前进取浙江，因孙传芳已知南京不归粤必归奉，他打算将闽、赣所有残兵均集中浙江以为最后负隅，而奉系的实力也不敢南进至浙，若北伐军不能取江浙，则孙仍可据浙联奉以抗粤。又为免除北伐军内部地盘的冲突，亦须赞成蒋东下，不得江苏亦须得浙江，蒋以后有了浙、闽、赣三省，也可成为一个局面，不必再回汉口与唐生智冲突，回广东与汪精卫冲突。

天津会议决定鲁张南下取苏、皖，孙传芳部下又不赞成孙屈服。孙无法只得潜行赴天津面谒奉张决定自己的地位，其结果苏、皖必归鲁张，只以浙、沪给孙传芳。实际上浙系军队已有集中浙江据为己有，必不容孙染指，孙在东南势力已完全溃灭，同时奉鲁军南下说甚盛，在豫、皖、苏，吴、孙的旧部都发生恐怖与动摇。因此我们以为革命军事计划应较前变更如下：

一、北伐军现在宜停止向皖、浙前进，集中兵力于鄂、赣二省，严定防守鄂、赣计划，以备奉鲁军之进攻。

二、对皖可帮助安徽自治军占皖南，以为国、奉间之缓冲；对浙速急运动浙军（周凤岐等）以自治名义占住浙江，并声援上海自治运动；对苏则运动孙军旧部及苏军离孙反奉，赞助苏人自治运动。

三、对河南宜急速联络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占据豫南以阻奉军，俟北伐军和国民军准备都充足再合力进取。

四、北伐军宜速派有力代表会同国民军代表向晋阎谈判，要求和他缔结军事的防守同盟，以牵制奉军之南下。

五、北伐军应乘奉鲁军收拾河南、江苏期间，在湘、鄂、赣整理及充实军力，如补充兵额、服装、枪弹及加紧训练等，以备将来向河南开始反奉战争。

三、孙传芳失败中之上海自治市运动

当十月中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屡次失利，主力军已丧去大半，南昌被围不解，陈调元、

周凤歧部都有不战而退趋势，福建周荫人又节节失利，夏超突然于十月十五日宣布独立，据此情形，孙传芳的势力实已陷于分崩离析状况，上海地方空虚，一个相当的武装暴动实可以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当时上海的资产阶级、工人及国民党左派，均共同联合从事这个运动。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一个能为他所指挥的政权，不过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实力都极幼稚，又加以租界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所以时时动摇与畏缩。他们一面想利用工人罢工助他们取得政权，一面又不愿工人有武装的组织和暴动。工人派（即我们）虽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因自己的组织和战斗力也不很强，依全国的政治环境亦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所以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现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尽量减少军阀的统治势力，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自治市政府。在这样政权下我们所希望得到的是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相当的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十月二十三日晚的暴动便是为此目的而努力，但不幸竟失败了，且牺牲了我们二个最忠实的奚佐尧（化名李左人）、陶静轩同志。这次失败的原因，一是失去了暴动的时机，不能与夏超之动作相衔接，直待夏超败亡时方才发动，敌人内部已渐一致且已防备妥当，自然不易成功；二则我们虽知资产阶级之怯懦畏缩，仍不免有过于信赖他之处，对于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亦估量太过，失却了自己主动地位；三则技术之准备太不充分。但是我们从这次暴动中也学会了不少经验，我们的党第一次在上海作武装暴动之尝试（自然这次暴动大部分还是军事投机而不是普通的群众武装暴动），使我们对于党应该是时时可以准备武装暴动之组织的原则更深一层的认识，在革命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十月二十三日晚的失败，并不能使上海市自治运动的进行终止，因为敌人的统治并未巩固，民众的势力也未遭大失败，所以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的消息传来，而这个运动的声浪又高涨起来。不过这次运动的进行和上次已有多少的改变了。第一是上次参加这个运动的只有工人派、国民党左派、商人派与反赤为敌的力量。而这次运动则反赤的小军阀、政客、士绅分子亦乘机渗入，他们知道孙传芳大势已去，上海不归国民政府即归张宗昌，均想利用自治之名各遂其私，即孙传芳初亦欲使此自治运动在他支配之下，拒绝鲁军及北伐军到上海。第二是上次动作的形式是注重军事的暴动，而此次则须侧重群众之奋起。我们对于这次运动仍保持与前一贯的政策——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市自治政府，并不幻想就成功一个平民政权，只能〔要〕能够得到工会事实上可以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便值得我们努力参加。

四、冯玉祥势力在西北之再起与我们表示对国民军的希望

国民军（单指第一军）的确是中国最良好、最有纪律、最能作战的军队。过去因其将领之愚庸，政治上措施荒谬，故一退南口，再退包头，几至全军毁灭不可收拾。幸冯玉祥由莫遄返，收罗亡散改编训练，士气始渐结。然而南口之败，士卒军需之损失几去大半，欲求恢复旧观，须经相当时期。国民军现时所处境遇较之前有三区时更为艰难，仅仅甘肃一省及绥远一部分收入，要养活这七、八万军队实不容易。然而令我们对于国民军前途尚存着无限希望的，便是冯玉祥现时之觉悟及其对于军队改造所具之决心。冯自入俄后，深受世界革命空气之熏染，憬然悟其从前所行之未能轨入革命正途。北京之退出，南口之失败，更给彼以许多惨刻的教训。所以正当国民军大败之余，竟匆匆回来支持难局，抵包头后即发表就任总司

令通电及回国宣言，说明他从前虽有革命倾向，作过几件革命的事实，但对于革命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每不能有彻底的行动。现在他认清了中国苦痛祸乱的来源，知道革命的方法并且加入了革命的党派，接受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并促其实现。冯玉祥不仅在口头上有革命的表示，在行动上也表现革命的精神，立刻将他部下落后的重要将领均送往莫京学习，凡不能实践彼之新的改造计划者以军棍相督责。在西北之国民党及C．P．分子，彼皆网罗为之作军中政治宣传工作。对于工农组织亦特别尊重，一反从前张之江时代疏远甚至摧残工人的行为。经此一番振作，使形将消灭的国民军，又重赋与一个极有希望的新生命。与冯玉祥同时回国者尚有陕西之于右任，得冯之助率二、三、五军入陕。绥远之商震，太原之阎锡山，此时皆渐与冯表示好感，陕、甘、绥、晋四省有联合抗奉之可能。奉张因此惊震失措，急求所以消灭西北军再起之法，一面严词诘责晋阎，一面于对粤条件中提出国民政府须允许奉张自由消灭冯玉祥，因为冯之存在使奉系一切野心皆受打击不小，国民政府必须尽量维持冯军能在北方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持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为未来对奉的北伐战争说，若没国民军之骑兵和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冯玉祥之革命言行较其他革命军将领更来得稳定，所以我们对于西北工作当十分重视。

在西北军工作刚才开始之时，我们是十分的小心。我们记起广州所曾有过的经验（如（1）注重下层基础的政治工作，不注重上层组织；（2）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3）不限制冯之职权等），而应用于国民军内，对于冯氏过于急进的军棍政策易以感化主义。国民军现时尚不能说到对外很大的发展，目前最急要的事是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之关系更弄确实，先稳固了基础可以守住，再定前进方向。我们于读了冯玉祥回国宣言后，已在“向报”一七七期发表对于国民军再起之六种希望：

1．须善于保持其有纪律、不扰民之荣誉，并晋及到二、三、五军去。

2．一、二、三、五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不可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

3．希望国民军成为保护农民之军队，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

4．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注意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晓得为什么而战。

5．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6．尽可能的完陇海铁路，在军事上、商业上、文化上都非常必要。

五、帝国主义者最近对华态度

吴佩孚、孙传芳之失败，国民政府势力之发展，当然是英帝国主义者所难过的。最初他曾企图于间接的利用孙、吴反对中国革命势力外，更直接的用炮舰政策向中国民众屠杀，开始在万县杀死了五千余市民，广州方面亦有英舰驶抵广州码头，水兵上陆驱散罢工纠察队。但这个政策一方激起全中国民众的反感，使反英运动更加深加大；一方也引起他国内的政潮（自由党、工党对保守党的攻击）；同时又见着国民政府对英的外交态度也并不十分危险可怕，国民政府的势力日见扩大，事实上不要简单否认所可对付的，遂急转直下的与国民政府

7

妥协，对于国民政府的海关增收附税不坚持反对；一面在北方仍想分取北京政府一部之指导权，不使直系内阁完全失势。张作霖虽有造成清一色奉系政府之野心，日本政府亦未尝不祷祝此计划之实现，但深虑英国拆台，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故不敢轻动。顾维钧之撤废比约，英公使之不递国书，均明白的是向日本示威。日本看出张作霖的种种弱点，不欲其任意发展，一面阻止其直接垄断北京政权以免遭英国之忌，一面欲其拉拢南方国民政府以巩固张作霖在北方的地位。日本现时的利害尚少与国民政府冲突，亦正在企图与国民政府发生相当关系，最近清浦子爵来华并派其随员僧易培基赴汉口活动，便是为此努力。总之国民政府现时已有中国之一半，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承认他与不承认他，总是一种势力存在着，不能不与他接触，所以英国舆论亦有鼓吹不要只注意北京政府，可以承认事实上的政府之意。国民政府此刻的外交当然不能象在广东一省时之简单，当按照全部斗争的形势审慎的进行，除与苏联保持极亲密的关系外，并须积极取得国际上承认，须与日本及美国均发生正式关系以对付英国。

六、国民政府内部状况

1．发展中之困难与危机——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已得了中国的一半，革命军胜利的声浪震撼全国，虽妇人孺子亦能举蒋介石之名并附会以许多神话。向日丑诋北伐军之反赤宣传，在一般民众中已不生影响，国民政府势力所及下的群众，均已纷纷起来。这次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关系是很重要，在国际上亦有意义，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态度都不能不随着北伐军之胜利而有点改变了。

但是，我们在喜幸的当中，也须知道这次的胜利半属侥幸，前途之危机正非常之多。我们的政策应用得好，固然可以加速中国革命之发展，应用不好则反动势力仍可抬起头来。比如两月以来的江西战争，因将领不能和衷共济，故迭遭破败，设后来无四军、八军之出动，或至全部溃灭。现时北伐军将领间之关系并不能十分融洽，最显著的如蒋、唐的冲突，汪、蒋的冲突，各方面地位权利之分配等皆成问题，措施稍不注意，危险立可发生。再则军事的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相应，不足以保证军事力量不致右倾，这更是应当十分注意的。

2．江西战争之波折——入赣军队本为一、二、三、六各军，其战斗力远不及四、七、八军之强，而所遇之敌则胜过于吴佩孚。盖吴部无能战的主力军，以至号令不统一，士卒不用命，容易攻破。孙部则有嫡系能战军队二师一旅为主力军，对之作战实不容易。但北伐军因得江西本省军队之响应及民众之援助，仍能席卷赣西、赣南直迫南昌，九月十九日六军及一军之一师遂占领南昌。惟此时二军远在樟树，三军第七师虽到生米街（离南昌三十里）不肯继进，一军之一师师长王柏龄又十分怕死，敌未来已先慌退却，于是南昌复于九月二十三日失弃，六军军长程潜个人逃命至四天之久，六军损失最重。自此以后，将领间感情十分不好，蒋亲到前敌后，虽能勉强于十月十一、二等日再会攻南昌，然各将领对蒋感情亦极不佳（蒋因过去对各军待遇不平，又组织黄埔同学会，显然歧视各军。此次出兵，一军之纪律与战斗力较之他军特别的坏，故为诸将所不满）。蒋之作战方略又复错误，第一是不注意先击破敌之主力而一意围城，敌可以很少军队牵制蒋很多队伍，更利用南浔铁路之交通，策应十分方便，而蒋则虽得城而不能守。第二是蒋拒绝第八军东下，使唐生智不能染指江西，又不调驻武昌之第四军增援，尚欲与唐争领湖北，以致江西战事久攻不下。蒋之计划既错，而前

敌诸将又各有怀抱，不肯再损实力，一般兵士寒衣未发，瑟缩可怜，军心涣散，几陷于危险地步。

此时我们深知赣战若败，不仅是蒋介石个人的失败，湘、鄂全局均受影响，一般动摇的小军阀亦将鲜明态度来反对北伐军，湘、鄂必不能守，因此极力向各方面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孙若不灭则暂时纵有所获亦靠不住。一面劝唐出兵，一面劝蒋要四、八军东下参加赣战。这个运动最后总算做到，孙传芳因此遂不免在江西失败。然而蒋之能有今日之胜已不可谓非万分侥幸。

3．北伐军将领间的关系与我们所取的态度——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中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其对于各军之压迫与歧视态度，当时各军固无如之何，然自入湘以后，情形顿变：

第一是蒋在粤时，不听我们之劝迅速出兵攻长沙，只顾做对付C．P．工夫，及唐占了长沙，声势骤大，并拼命扩充实力，等到蒋到湘时，唐的力量已超过各派之上，蒋对之遂感自己之危险。

第二是蒋的第一军自经三月二十日的破坏后，已名存实亡（蒋之自杀政策）。入湘部队其纪律之坏，战斗力之弱，甲于各军，遂使蒋之声名一落千丈。

第三是蒋以黄埔为中心之思想与举动，大遭各军之反感。白崇禧公开反对，以为凡是革命的力量均应联合起来，甚至黄埔内部左派分子（占全校学生百分之九十）亦不以组织“黄埔同学会”为然，弄成众叛亲离形势。

蒋在这种情形之下遂发生一些恐惧，设法拉拢二、三、六军，预许朱培德以江西地盘，二、六军因旧的仇怨不满意唐更甚于蒋，所以稍接近蒋，对于四、七、八军则视为保定一系，颇存歧视。除此以外，更对湘西之袁、王、彭、贺，湖北之刘佐龙，四川之杨森，亦设法网罗，壮已声势。攻武汉之役，蒋自已拼命往前敌，图先得武昌以扬眉吐气，而使唐生智攻汉阳，但结果是唐先下阳、夏，武昌围城四十余日而后破，湘、鄂两省实权均落于唐手，蒋乃愤而转赴江西，别图发展。不意江西战事之棘手，远过前几次湘、鄂战事，若以后无四、八军之东下增援，则蒋或至一败涂地。

现时北伐基本各军中，以唐之第八军实力最雄厚，合一、二、三、六军之总合始能及八军，湘、鄂实权均在唐手。蒋对唐的政策是十分的坏，同时影响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的政策亦不好，蒋处处想以总司令权力限制唐生智，但他并没有计及事实能否做得通（如初到长沙时即拟以总司令部支配湘中民政、财政，彼赴江西前敌，要陈公博、邓演达留汉口与唐争湖北政权）和有些什么坏影响（如不让四、八军东下援赣，几至破坏全局）。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政策随处表现不信任和抑制态度，非怪唐说“K．M．T．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K．M．T．”，又说“K．M．T．都是一般小孩子胡闹”，“K．M．T．没有力量”。唐自然不满意蒋，但他现在并不站在右派方面反蒋，而是由左反蒋，他对于K．M．T．领袖特别尊重汪精卫，他尚未妨害民众的自由。

我们对于以上的现象感觉十分危险。虽然过去蒋介石有种种的错误，然在他的艰难环境中我们并没有存一点喜幸坐视的心理，仍处处从革命全局的利益上打算，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他，不使他江西的战事失败，不使他离开了北伐革命的战线，不使他失去军事上的地位。比如汪精卫复职问题，虽成为前方将领后方民众一致的呼声，明知蒋无力反对，然而我们还是主张须先得蒋有一表示方发动，不可因此而使蒋离开北伐战线。江西久战不下，我们力赞四、八军东下增援。北伐战事结束后，表示仍维持他相当的地位，再办规模较大的黄埔军校

为第二次北伐反奉之准备。不过若蒋仍阴怀嫉刻，孤行己意，毫不觉悟，则我们纵愿助蒋亦将无所措手。比如蒋现时表面虽已极力亲近C．P．，对民众宣言演说非常革命，但并没有听着他远离孙文主义学会右派分子，排除部下贪官污吏的浙江人（蒋部下的贪污远出一般腐败官僚之上）。他的军队仍不免腐化而无战斗力，我们如何能扶植起来。这般腐化的军队，任意摧残民众自由，如何应钦在东江之所为，我们又何能牺牲民众以扶助老蒋。再则蒋对唐及各军态度若仍保存其阴很〔狠〕嫉刻偏见，决难为各军所容，将来也会发生军事的逐蒋举动。所以我们虽毫无倒蒋之意，愿意助蒋，而蒋能否长在革命战线上，就看他自己觉悟与努力了。

唐生智过去虽无革命历史，现在的表现的确很左倾。蒋及国民政府应该承认唐的势力，不应再用抑制而事实上又无力抑制他，徒然逼起他的反感。国民政府的组织现在还说不到如何绝对的统一与集中，国民革命中也决不是只能有一个革命独裁者（蒋本人此种见解极重），若果勉强的做去，不是逼起唐与右派接近，便是逼起唐由左反蒋。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北洋军阀已渐渐明了此中消息，乘机向唐活动，这是国民政府及蒋应该警惕的。我们对唐的态度是取包围的办法，而不取抑制的办法。我们用明了的同志和他亲密的接触，改变他的观念；发展民众的势力，影响他的左倾；引导他与苏联接近，使他认识世界革命的援助。

其他各军领袖，均望他们能捐去成见，顾全大局，集中革命的势力，然后可以对付目前的敌人。自然，他们相互间势力的分配亦要有相当的办法，这是军事革命时期不可免的现象。

4．汪蒋问题——蒋最初是极力反对汪回，后来见前方将领以至后方民众甚至黄埔军校学生均一致主张汪回，复表示如汪回则我即下野。我们一方为巩固国民革命基础的广东着想，赞成汪回；一方为北伐前线的战事着想，勿使蒋受汪回之影响而离开北伐战线，多方使蒋明了汪不回时，蒋个人的危险，国民政府前途的危险。我们赞成汪回并非倒蒋，而是汪、蒋合作，且更具体决定须待蒋有迎汪表示，北伐战事顺利时方要汪回。最后蒋算是发出了迎汪电报，在此次民中联席会上通过了迎汪复职，但蒋一派人仍故作种种困难，使汪不易回来。我们的意见是：汪之复职，蒋既有电表示，大会又已通过，战争情形又好，故汪应即回。蒋、张（静江）诚意迎汪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汪回左派始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始能建立。至于汪回地位问题（这是左派以为汪难回的问题），他不必与蒋争党的名义上的主席，已经有很多的要职，即令一职不就，只要他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了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有暗斗，而不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若汪不回，则蒋反得所借口，说汪自己不愿回来，不是他阻止汪回。

5．左派势力之发展与民中联席会议经过——自蒋出发后，广东政权虽是中派的，而左派的力量却一天一天的高涨。不仅在工人中、农人中、商人中、学生中如此，甚至黄埔军校内部，百分之九十几变成左派而反对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中派分子），要求汪精卫回来，这是群众不满意于广东政治上、军事上之腐化的自然趋势。民中联席会议之召集，便是由左派运动迎汪发生，于十月十五日开会，到会代表大多数是左派分子。其重要的决定是：迎汪复职；开除了西山会议分子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继、张知本八人；又开除了在北京做官的王宠惠和在广东反动的沈鸿慈二人；通过了一个目前行动的政纲，这个政纲较前两次大会所标揭者更为具体、切实而左倾。我们希望以此政纲为中心，把

一切左派的分子团结起来。这个政纲也可以说是我们与左派合作的根据。左派领袖们在此次大会中已企图由思想的倾向渐渐形成一种形式的组织，并特别规定了他们的政纲四条，在此四条政纲之下，团结各省左倾分子，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和中派、右派竞争。其政纲四条是：（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

左派现时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一般左派领袖分子均常常发生自己没有理论、没有群众、没有力量的恐惧，所以行动起来特别表现摇摆倾向，在与我们的合作中自然要发生些障碍，就是一面感觉非合作不可，一面又怀疑自己，恐惧我们。左派新进领袖甘乃光很努力作组织左派工作，很努力使他所影响的左派青年到群众中间活动。甘并且给左派一个理论，主张以农民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国民党的工作应当从下层作起。听说他那本小册子已销行了五万本。

我们此时对K．M．T．的政策，是不要包办一切工作，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住，要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均容许左派参加。我们无须过虑左派参加群众运动便会夺去我们群众，只可虑左派得不着群众，这些群众到右派去。我们更为左派找到了一个切实具体的政纲，作左派团结行动的标准，运动汪精卫回来使左派有中心领袖，希望在这些努力中造成左派的力量。

广东表面虽还是中派政权（新右派政权），而左派势力已日愈上涨，不仅在群众中左派的工、农、商、学组织较右派势力强大，就是在政治上代表土豪劣绅的古应芬之民政厅长，已易为汪精卫系的陈树人。何应钦因有事福建，东江空虚，亦不能不改变从前仇视工农态度而要工农维护后防，于是右派根据的东江又渐渐为左派势力所统治。

蒋介石、张静江所领导的中派即新右派鉴于左派之发展，尤其鉴于此次在联席会议所受打击，急急利用所据中央党部之组织部、青年部、秘书处等机关及主席特权（左派则据有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海外部等），向各省发展己派的势力，打击左派的势力，并利用党员重新登记的机会吸收西山会议派的群众以为己助，以备在第三次全国大会和左派与C派之联合竞争。

6．国民政府本身问题——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即有迁武昌之说。此事非常不妥，第一是湖北左派群众的基础还非常薄弱，不能影响政府，国民政府移武昌后的政策必较粤更右。第二是这个迁移的计划很明显的是中派想一方使汪难回，一方借以抑制唐生智。若不在事前将汪、蒋、唐三人的关系弄好，马上就把政府迁去，会因此引起严重的纠纷。第三是所有左派领袖均离广东，让民众组织直接与李济琛军事力量冲突而无转圜余地，其结果是国民政府的迁移将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得十分谨慎，万一无法阻止，亦须有尽力防止弊害：第一，汪精卫须速回，并使蒋承认汪回主持党及政府工作之必要，这不仅可以巩固左派势力，防止政府右倾，并且可以为各将领间之缓冲，使实力派不至过于碰头。第二，国民政府迁移前，须尽力发展民众的组织及国民〔党〕左派势力，加右倾势力以打击，以减少政府迁来后受他们的影响。第三，蒋、唐的关系要弄好，蒋要停止唯一首领之幻想，确定唐在政府中一定地位。第四，巩固左派在广东省政府的政权。以上四件事如果都有了办法，国民政府当然可以迁移到武昌。

7．如何应付目前的局面——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国民革命的势力虽然发展了，但内部的危险和艰难却仍很严重，外部的敌人势力仍很强大，因此我们的政策是：

第一、努力发展国民政府势力所到地方的民众运动，使之能与军事势力的发展相应，能影响军事势力左倾。

第二、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政治上应暂时避免和奉天冲突，应完全消灭孙传芳势力，应速与阎锡山联合防阻奉军向国民军进攻，国民政府应尽力赞助国民军能守住西北。

第三、努力使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相互间之冲突减少，集中力量作二次反奉战争的准备。这些冲突之解除主要是蒋：（１）放弃唯一首领专政之企图，不反对汪回复职；（２）取消以黄埔为中心的观念及黄埔同学会之组织；（３）排除其部下右派贪污分子。

第四、使汪精卫能够迅速回来，使左派能有中心领袖，使国民政府能有中心人物（蒋现时虽是国民政府中心，但不为各方面所满意），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均比较的强健有力。

第五、努力帮助Ｋ．Ｍ．Ｔ．左派努力发展，使左派渐渐能够有群众，有力量，可以站得住，使他们不恐惧Ｃ．Ｐ．而与之合作。

第六、国民政府的组织还不能做到绝对的集中统一，应多量容许各地方的自治权。

第七、广东仍旧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在现时北伐的发展中，不惟不能轻视广东，更须注意使广东政权成为左派所领导的政权，并且愈加强固起来。

第八、国民政府既拥有全中国之半，当努力取得国际上地位，他的外交政策除与苏联亲善外，并与日、美等国发生相当关系，以对付英国。

第九、国民政府应援助他所统治下的农民对于地主劣绅之争斗，并应援助东南各省自治运动。

第十、急须加紧西北及东北的军事工作，以加速接近第二次反奉战争时期。

中央特别会议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政治报告

陈独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此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主要点还是关于国民党问题。因为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我们有重新讨论之必要。国民党问题不是很简单的，是牵连许多别的政治问题的，所以国民党问题，可说就是全般政治问题。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个整个的民族革命问题。

我们先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

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但同时反赤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也随着形成起来。他们的目标便是讨灭南赤、北赤，结果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失败，如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杀，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破裂之表现。

自三月二十至七月四日为"反赤"运动最盛时期，自七月四日国民军退出南口，反赤的联合战线开始分裂，不能继续。奉系军阀在北方得势，不但奉、直发生利害冲突，英、日两帝国主义亦因此在北方失了势力之均衡。并且奉系内部、直系内部也有冲突。如奉系新旧派之争，直系吴、靳之争等，这都是不可调解的利害冲突。军阀内部、帝国主义间都如此冲突，反赤联合战线遂完全破裂，同时赤的联合战线，自北伐以来又渐渐恢复以至扩大，自工农以至资产阶级绅士，甚至一些小军阀，均有联合于此战线之势。如江苏绅士说："赤化并不可怕，只有'绿化'真可怕（指绿林的奉系军而言）"。上海大商人主张联合工商界以解决上海问题；苏、浙、皖的绅士、商人组织三省联合会；上海的工商学各团体组织市民公会，共同反抗奉鲁军南下。但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往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兹分述如下：

（一）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军事的胜利和民众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者不能不认识南方的革命势力已不可以强力去消灭，惟有用软的方法去和缓。即最顽强的英国在天津会议

后，亦不得不暂时停止以前“打”的政策，代以“拉”的政策，即是帝国主义者开始对国民政府表示让步，将来或可提出比“五卅”更多的让步，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条件：（1）保留大部分不平等条约；（2）离开苏俄；（3）禁止工潮等。用这些条件拉着国民政府向右走。同时，帝国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复想拉着大商买办阶级为他压服工潮的工具，公开的在汉口英文报□报上劝中国商人应与外国资本家合作对付工潮。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一个危险倾向。

（二）国民党之右倾——国民党中的一般游移分子，自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尤其是在武汉工潮中，他们以为武汉、江西取得之后，行动便当和平些，不然已得的胜利恐怕就会保不住。同时又以为北伐的胜利，民众势力都握在C.P.手里，如果民众势力太发展了，这是C.P.势力的发展，因此更加以限制。他们这种右倾的表现，不是现在始，在十月联席会议前就如此。联席会议的结果，表面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现在大部分政治、军事势力握在右派手里，在后方李济琛日事压迫工农运动，甚至纵容部下杀戮农民运动者，他不但主张限制工农运动，即对工农商学联合会的运动他也反对。至于前方的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表示很右，最近表示“乡村农运可做，城市工运则当停止”。右派对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虽尚未公开的阻止，但实际上急欲缓和工农运动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国民政府。他们不想以革命的争斗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而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这本是国民党的传统政策。丁维汾说：“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柏烈武说：“列强有承认国民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这是赤的联合战线之第二个危险倾向。

（三）商人的恐慌——北伐胜利后工人组织勃起，经济罢工遂一发而不可遏止，尤其是久受压迫〔的〕武汉工人，这样不但引起大商人的恐慌，尤其是一般中、小商人因手工业工人店员之罢工，更是无法应付。中、小商人素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大商人三层剥削，现在更加上工人店员罢工，经济濒于破产，因此他们自然很容易站到大商买办那边也反对工人，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三个危险倾向。

（四）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我们同志中“左”稚的现象约有数种：（1）看不起国民党。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思想，尤以粤区同志为甚，有人曾说：“国民党自三月二十以后，已经死了，五月十五日以后，已经臭了，我们还把这臭死尸抱在怀里做什么？”可是北伐军事的胜利所给北方军阀及民众运动勃兴之影响，仍然证明国民党还不是一个臭死尸。（2）包办国民党。许多好的国民党分子说：“我们不反对C.P.赤的政策，所反对的是C.P.处处把持国民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同志包办的反响。这种包办不一定是有意的，但包办的结果，一方面没有国民党，一方面也没有C.P.了。（3）包办民众运动。我们不但要包办国民党，并且要包办一切民众运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前在国民党内包办，现在更在国民党外包办。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没有一个有力的左派和我们合作向右派争斗，其结果自然只有我们单独的领导群众和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直接冲突，在形式上直是C.P.和K.M.T.冲突。在现时，这种冲突正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而非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所需要的。（4）否认左派存在。这种完全否认左派的思想，特别粤区的同志最厉害。他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至于

左派呢，亦没有这回事”。还有鲍同志以为，真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这两条出路都要不得，我们的出路只有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鲍同志这种错误见解的原因：一是所定左派的标准太高；二是忽略了中国目前争斗的问题。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土〔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中谁完全赞成这两个运动的就是左派，否则便是右派。因为国民党的左派必须是民主主义者，若只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而不赞成反对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人，便是封建主义者，当然是右派，这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重要人物中还非常之多。解决土地问题，当然是对地主土豪最后的打击。可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宣传上自然可以由目前争斗的这些问题，引申到根本的土地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做争斗口号，便是停止争斗。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自然是没有左派。减租减息等目前的争斗，在农民群众中，比解决土地问题更是迫切的要求，赞助这些要求的国民党左派之已经存在，比希望有一个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更合于事实。因为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5）误解党的独立。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有些同志这样解释党之独立，所以往往幻想组织工、农、商、学一切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包办一切民众运动而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北京、湖北的同志都有这种思想，尤其是在广东的同志，他们更加上否认左派之存在，自然会发生“我们当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与政府对抗……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这种错误观念。这种离开国民党的“左”倾错〔误〕，和以前不想发展党的组织，几乎沉没在国民党中的右倾错误，对于党是同样的危险。（6）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在长沙、在武汉，我们都没有经过国民党把手工业工人、店员和中小商人的关系弄好。尤其在武汉，有些手工业工人、店员的过高要求，逼得中、小商人和总商会合作反对工会。至于未能制止纠察队对于商人之胁迫和侮辱，更是万分不应该继续的现象。这是赤的联合战线第四个危险倾向。

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此时破裂之可能性已异常严重，我们急应努力进行以下各项挽救的策略：

（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帝国主义之新政策和商人之恐慌还在其次。我们固然不幻想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能够相近而至于零，我们必须注意联合战线之巩固的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

（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的统一争斗，即推翻都市中封建的军阀政权，推翻乡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政权之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平等的争斗。在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每次得到一点军事胜利，便马上向敌人妥协而右倾，而失败，现在的右倾大部分也是为了要与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势力）谋妥协。要挽救其现在的右倾，惟有继续争斗，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人争斗，才

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

（三）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有些同志主张国民党的军事势力应该集中，这是一个幻想。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国民党的军事势力集中与反动局面之促进必成为正比例。军事势力越集中，反动越大；集中越快，反动来的也越快；集中在谁手中，谁就先反动。这乃是国民党之党的威权不能制裁军事首领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的必然运命。

㉘

（四）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以前的宣传都集中在民族主义一方面，这种简单的宣传运动，每会为军事独裁者所利用。现在为抑制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向前进展及向右反动，必须开始作民主政治的宣传和运动。抽象的宣传民主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指出必须实现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才是民主主义的政治之具体的表现。更须切实说明凡是民主主义的政府，必须向左站在民众方面，给民众以充分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而不能向右站在帝国主义、大商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方面压迫工农运动。尤须珍重说明，此时的农民运动，正是帮着民主主义的政府向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进攻，正是为〔民〕主主义的政府扫除其敌人，巩固政府的基础，而不是加害于政府。民主主义的政府不应该援助他自己的敌人（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绅），压迫他自己的帮手（农民）。

（五）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的势力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学生、小商人）的群众中发展左派的国民党组织，竭力援助左派达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胜利。这一政策我们从今天起即须开始工作。右派早已着手活动，派人到各地集合他们的势力，甚至于拉拢西山会议的分子、工贼及一切反动分子入党做他们的群众，以备第三次全国大会与左派竞争。第三次全国大会如果胜利从于右派，则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及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必更有大的变动，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军事首领不任政府的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须在政府管理之下，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与形式。

（七）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我们此时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非常困难。因为各地手工业工人及店员对于厂主店东之罢工，乃是小资产阶级当中的利益冲突，两方面都是民族的联合战线中所需要的，我们势不能偏袒那一方面，而又不能中立，我们只得采取下列政策：在消极方面，努力向店员工人解释，不便向厂主店东提出他们经济力限制以上的过高要求，更不可轻取罢工手段，尤其在日常生活品的商店（如米店、柴炭店、油盐杂货店等）；在积极方面，加紧联合战线的必要之宣传，工人援助商人对于苛税苛捐及市民自治的争斗，谋全市面的经济枯竭和金融恐慌之救济。只有这些方法，才多少可以和缓小资产阶级间的冲突，以巩固联合战线。

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

仲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之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各种危险倾向，都是事实。中央会议并感觉这些危险倾向对于革命前途非常严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

仲甫同志在报告中所述各项挽救的策略，大致是对的。内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重新提出"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口号，督促国民党国民政府继续对外对内在城市在乡村中反封建势力的争斗，在城市在乡村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运动。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要不继续更向右；一方面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纠正同志们关于我们党独立之误解，纠正同志们否认左派存在之错误，一切群众运动尽可能的与左派合作，使左派获得他们的群众（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此次中央会议后，各地方党部马上便须召集各种形式的党员会议，酌加各地实际情形详细解释此次中央会议所决定的各项策略，并议定其实行方法，这乃是目前刻不容缓事。

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

我们党内对于国民党左派有三种意见：（一）中央以为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区别。有许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绅土豪等封建势力的利益与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想者，仍然徘徊于买办地主与工农群众的利益之间，有时还偏向前者，他们对于民族运动固然调子唱得还高，他们始终公开的或不公开的主张军事独裁而不赞成民众政权，在民主革命的意义上这般人也只能属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义上代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思想而反对封建势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为国民党中这两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二）在广东的同志多否认国民党有什么左派，他们的意思是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左派，只有在为民众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奋斗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势力，现在这种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们又说"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将来或形成左派，现在没有左派"。他们以为现在既然没有真正左派，我们若因为帮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当的事。（三）十月民中联席会议党团的意见，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粤区同志的中间，他们否认现在的国民党有真正的左派，和粤区同志的意见一样；可是同时他们却承认有所谓"准左派"，他们说："过于忽视眼前上层的左派作用，于实际工作上有许多难行之处。""这种准左派的软弱摇动不一致，是不必过分悲观的，在没有群众的时候，在上层自然只能有这种左派，而他们刚一组织的时候，更只能有这样的东西；但这种准左派对于国民革命是有相当作用的。民校改组后左右派之分化，促进国民革命之发展不少，因为准左派与右派斗争，事实上不能不接近我们，而且不能在主张上与右派一致，而且有时为着要得群众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较的站在民众方面"。他们这些见解，确有点与粤区同志不同。但他所说："真正能够负担国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说一般被压迫的学生、商人、农民、市民、手工业工人。"这一类的话，又完全和粤区同志的意见一样而却未曾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他们这些错误观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现在不能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因为土地还未成问题，目前的农民问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税杂捐，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导农民从这些要求的实际争斗到研究室中的土地问题，便是停止争斗；若希望马上就有一个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比希望现在的左派

能够实际赞助农民目前争斗更为幻想。我们对于国民党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现有分子中那些比较左倾些，而不是一个固定标准，高悬在空中的未来派。若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会的左派和国民党的左派之区别，更为可笑。

我们要记得从兴中会到现在的国民党，他们的进化是有时间性的，所谓左右乃比较之词，并没有固定的界说，社会的左右派和一个政党内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国民党左派，现在又还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不必象黄麻子、张小泉、陆瑞荐一样严格的去分别什么真正左派与准左派。

为什么说他们不算真正左派呢？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纲么？十月联席会议后已经有了。因为他们还未形成有确定政策的一派吗？那末根本批评起来，整个的国民党还未形成一个有确定政策的政党。因为他们时常摇动不一致么？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永远是动摇不能一致的。因为他们没有中心领袖么？汪精卫还未死。因为他们没有武力么？（据毛润之同志报告，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这更是笑话。而且实际情形并不象表面那样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群众吗？不是他们没有群众，只是群众和领袖离着。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倾向而不是一个团体吗？他们也和右派一样有领袖有群众，而且比右派有更多的群众，汪精卫一回便会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团体。因为左派现有的政纲已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么？这显然不是事实，农会组织减租减息武装反抗土豪劣绅等左派的政纲，正是农民群众迫切的要求。因为他们只是口头上的左倾，在行动上不能动起来贯彻主张么？这固然是现有左派的弱点，然而也不能说他们始终没有左倾的行动，即令仅仅是言论上的思想上的左倾，已经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上，在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关系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承认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实，并且是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重要关键。我们当然不可迷信现在已经有一个强固负责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们和右派间的缓冲，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随着右派压迫工农群众；一是由我们领导群众直接和右派冲突，既然没有左右派的分别，我们和右派冲突时，便表现出来是C.P.和整个的国民党冲突。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动派都愿意我们走这两条路。粤区同志现时所走的就是这第二条路，他们否认左派之存在，恐怕因为特别帮助他们得罪右派而上当，自然不必特别和他们亲密合作，他们感觉得我们走开了，也恐怕上了我们的当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边去来对付我们，这是客观上必然的结果。这种否认左派的谬误理论，已在广东收了恶结果，粤区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别的地方党部若不即早防闲，会酿成莫可挽救的极大损失。

因此中央会议坚决的反对同志中否认国民党现在的左派之谬见；坚决的主张国民党中确有左派存在，虽然他们软弱动摇不一致；坚决的主张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不是独占）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

至于怎样帮助他们，应有上中下三层的帮助方法。第一，对于帮助他们的上层领袖，是断断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若只有左派群众而无领袖，则仍然是C.P.的群众，而不是国民党的群众，群众和右派冲突的时候将仍然形成C.P.和国民党的冲突，而不能明白表现出来是左

派和右派的冲突。我们帮助左派领袖和他们合作的条件，他们固然须要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三个革命政策，我们也须要顾及他们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对他们有所让步，尤其是在农工运动的实际争斗中，不可幻想他们能够和我们取同样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让步，毕竟比对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们有力量，我们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冲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们要在社会下层中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党内的左派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左派领袖必须有了群众在手中，他们自身才有力量站起来和右派对抗，才能够减轻他们觉得C.P.马上就会夺他们的江山的忌妒与疑惧。并且有了左派群众，尤其是党内的左派群众，才能够推动左派领袖左倾，减少其软弱与摇动。第三，我们要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领袖和下层左派群众间之链锁。即是帮助左派设立党校、宣传员、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以养成他们接近群众组织群众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领袖与群众的隔离。我们对于左派这上中下三层帮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将来的左派必然比现在更有力量，和我们联合抵抗右派。

至于怎样帮助左派结合，我们应取下列方针：（一）我们不赞成左派的结合有独立的政纲与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没有显然冲突的地方或右派没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数比较可靠的左派领袖之结合，我们帮助这些领袖抓住整个的党部，在中央左派领袖领导之下执行左派政策，不必进行左派党员群众的结合。（三）在左右派冲突的地方，则宜用学校讲习所新闻社学会研究会俱乐部等形式，结合左派党员群众的许多小团体于左派领袖指导之下，不宜有整个的结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组织；惟可由左派领袖时常召集这些小团体的代表开联席会议，C.P.亦可正式派代表参加此联席会议，C.P.分子不必公开的加入这些小团体。

现在左派的结合已经有了几种组织，一种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联席会议后结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联席会议的各省代表，散会后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员，他们有了联共联俄，反对西山会议派，拥护孙中山、廖仲恺的工农政策，拥护汪精卫为领袖，这四条政纲，而尚没有组织的名称和章程。又有一种是黄埔学生发起的“左社”，他们有独立的章程，对于社员以外的人须守秘密，而没有独立的政纲，十月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最近政纲，即是他们的政纲。这个“左社”已在湖南、湖北开始发展，加入了许多不得志的政客，带了浓厚的地方性，在湖南的“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们不能承认这个“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结合，我们对于各地方尚未反共的“左社”分子，应警告他们不便有独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个的组织，不必乱拉非左派分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对于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应联合未加入“左社”的左派分子加以打击。

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

A、乡村政权问题

乡村政权问题即是农民政权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绅政权问题。这种政治运动，在实际运用上，我们重在实际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而不必叫出农民政权的口号，以免除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发生恐慌。

B、乡村联合战线问题

乡村中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如自动的组织起来，我们当然不宜加以阻止，只能拿农民协会和他们结成联合战线；其未组织者则不应促成之，尽可能的将他们的分子吸收在农民协会中，使农协成为统一乡村运动的唯一中心。

C、乡村中宗法社会思想问题

破除宗法社会思想（尤其是族长把持族租和阻止妇女加入农协）是非常必要的，惟我们可用国民党党部去做宣传，不必由农协去做，以免发生农协内部的冲突。

D、农民武装问题

乡村中的武装必须统一在农民手中，这是应当注意的原则。实施的方法，如团防局长民选，或由乡民会议接收地主的武器，或由农协自备武器，或由农民群众夺取民团的武装，应按照实际可能情况行之。

E、农民协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

民众团体整个的加入国民党，好的结果可使国民党的组织宽松些，群众化些；坏的结果，是使政党与民众组织分不清。此次中央会议主张将上次扩大会议的办法稍加修正，在国民党未废除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以前，且不用整个的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农协所辖区域内，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农协会员尽量加入，而不和协会外的分子混合。此等区分部，仍须隶属于当地区党部。如此国民党可在农协中发展，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

F、乡村中食粮问题

只可强制大地主存留一部分米粮，作为荒月平粜之用，而不可无限制的禁阻米粮出口，致阻滞农村经济之自然流通，且引起农民间有余谷者与无谷者之冲突。

G

湖南农运议决案中，应除去调民团集中县城的提议，应改生产合作社的口号为贩卖合作社，应增加反抗贪官污吏苛税苛捐的说明，农民教育的取材过高应改正。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当冲的危险。

H

江西方面应注意战区灾民救济工作，以引起南浔一带之农民运动。应即办一短期训练班，以养成急于应用的农运人才。

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

A、宣传问题

（a）独立宣传问题。独立宣传不是只使民众空喊几声共产党万岁，而是要使民众了解

共产党的政策。目前在武汉方面工潮盛行，他人误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作煽动的宣传，应作解释的宣传。独立宣传常易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宣传时须得特别小心。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应取积极的建议态度。不可取消极的攻击论调。

（b）对内宣传问题。目前三省新的党员骤然增加，（尤其是湖北）设使我们不给以好的宣传、训练，结果必使新党员对党失信仰而离开党。对内训练的方法：于各地开办低级训练班，常用党员大会作政治报告，以后随时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在工作中训练工作的同志。

（c）出版物问题。在国民政府范围内，我们党的刊物应带政治性而不宜多带鼓动性。凡主持非党的出版物者，应时常站在他本身的地位上说话，不可站在C．P．地位上立论。至于最近江西同志拚命宣传鲍顾问甚至宣传第三国际如何帮助中国革命，更是非常错误。各省之出版物应多带地方性，大的政治问题文章不宜多做。

（d）党的刊物发行问题。在好的环境下我们应尽量设法推销我们的刊物。

（e）应在三省中多翻印国民党第一、二次大会的宣言及最近联席会议议决案。

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讲演集亦宜多量发行之，尤其是汪精卫的讲演集。

B、组织问题

（a）此时我们党的组织问题，固然要努力数量上的发展，更要整顿支部，使各支部都能够自动的工作起来，活动起来。尤其在武汉必须使各工会各工厂都有我们的强大的支部，必须训练这些支部成为各工会各工厂一切工作运动的中心。武汉的街道支部亦急须建立并发展起来。

（b）三省的工作同志及中坚分子之数量的质量的统计表，应即速造成报告中央。

（c）湖南女党员太少急须努力增加。

（d）湖北区委应兼汉口地委。书记特立，组织泽楷、德龙，宣传以忱、潭秋，职工立三，农运陆沉，民运必武，军事云臻，秘书慰真。

（e）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书记富春，组织峻山，职工贺果，农运印倜，编辑汪群，军事传烈。

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1]

A、我们上次扩大会议，决定以社会团体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此时应该稍加修正。因为以团体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必不许可；在我们的观点，也有民众组织和国民党组织混淆之弊。在国民党区党部、区分部这些组织未废以前，暂时且不用团体名义加入，只在各社会团体中组织单独的区分部，团体员以个人名义尽量的加入，而不和团体外的分子混合。如此仍是事实上的团体加入，而不至和党的组织混淆。同时我们须向国民党宣传，因为党要做到群众化，党的组织不宜太严格，如按期到会等。

B、在三省范围内C．P．于必要时可与国民党党部开联席会议，或取各派代表协商的形式，以处理一切有相互关系及共同行动之问题。

C、切实调查“左社”之内容而监视其行动。

---

① “三省”系指湘、鄂、赣。

D、江西同志尤其是任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常表现猎取官职的倾向，江西党部应严厉的纠正之。

E、武汉民众团体的领袖宜和国民党重要人物发生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徐谦与邓演达。

政治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

吴廷康同志鲍罗廷同志联席会议通过）

目前民主革命运动，会有一个危机到来，因为一方面在国民政府内和国民党内渐增冲突，另一方面，革命化的城乡民众和国民政府国民党亦渐增冲突。

尚未消除之反革命派（如总商会、银行公会内大部分买办分子，尤其是湖北的将军团。）还有很大的经济势力于革命军占领地；帝国主义之新政策，企图讨好得胜者，并谋中国分裂成二个政府。这些倾向均能使国民政府之发展及国民党之指导向着右走。同时工人运动及城市一般劳动者的运动，正在增长，乡间农民运动亦自然发展，这些运动均有日渐膨胀之趋势。

中国共产党看清了这个严重的时期，以为现时民主革命之发展，决不能使国民政府及执政之国民党和城乡劳动群众脱离！故应：

（一）很坚决的反对国民政府反对领导它的国民党之右倾。换言之，即不使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站在土豪劣绅地主大商买办阶级方面去。中国共产党将努力改进对国民党整个的关系，庶几能推动国民政府左倾。

（二）很坚决的认定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提出左派首领，使左派获得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应使左派由我们的援助获得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地位。

（三）我们党独立的宣传和鼓动，此时比以前更重要，惟须指出我们同志的观点之错误及其危险！他们以为我们党之独立，即是组织工、农、小有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各地方都多少有此倾向，在广东最甚）。这样解释我们党之独立，必定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

（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增对于农民运动之指导，应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最近国民党联席会议所决定的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之上，向政府（尤在军事领袖）要求帮助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即日益发展及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争斗之中心，而不能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

（五）我们仍应继续努力在产业工人中工作，使我们在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地位稳固。目下应整理城市阶级斗争的阵线，特别注意非工业的劳动者或手工业工人向中小资产阶级斗争发展之对于一般民主革命运动的危险。

（六）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目下特别须反英）同时必须扩大"统一中国""社会制度民主化"的运动。"国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应成为普遍的口号。

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委员会通过）①

一、关于武汉职工运动：（a）手工业工人及店员运动，宜设法与国民党合作；（b）关于手工业工人及店员的组织，宜做统一运动，而不能取集中形式；（c）关于产业工人运动宜由罢工时代达到组织时代，工会整理和党的发展党的支部训练；（d）产业工人罢工尚未停止时，须注意不致发生破坏秩序的一切行动；（e）对于解决劳资问题临时委员会任其自然停顿，另由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各派代表组织一特别机关处置劳资纠纷事件，劳资两方均不加入此机关；（F）关于团体契约权问题，我们可退让，至雇主辞退工会职员及罢工领袖须得工会许可，雇主不得雇用工会会员以外之人；（g）严格训练纠察队不得再有胁迫及侮辱商人之事发生，亦不得侵及政府之司法权及警察权；（h）扩大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作；（i）扩大“工农联合”的宣传，工人宜在宣传上并在实际争斗中援助农民；（j）总工会及国民党省党部均须即速开办一职工运动学校。

二、明年第四次劳动大会，应改在“二七”纪念日召集。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至迟应在明年一月十日前齐集汉口，筹备此大会。

---

① 年月是编者判定的。

其嘉对于杨澄政治报告的决议[1]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2]

据杨澄最近的政治报告可以看出：（１）广州现时的政权仍是中派的政权；（２）最近所发生的许多事变，他们主观的原因虽是要打击Ｃ．Ｐ．，而客观的结果Ｃ．Ｐ．并未受着什么打击；（３）中派现将右派和左派均拉过去结合在一块，左派之反Ｃ．Ｐ．是因我们工作中有注意不到的地方；（４）中派对于Ｃ．Ｐ．进攻的风潮所以不能扩大的原因，一是Ｃ．Ｐ．应付从容避免冲突，二是许多左派领袖极力运动消灭此风潮。其嘉对于这个报告有以下的意见：

Ａ．广东最近所发生左、中、右联合向Ｃ．Ｐ．及接近Ｃ．Ｐ．的左派进攻，杨澄策略的错误，均由（ａ）否认左派、（ｂ）忽视左派领袖而来。

Ｂ．否认左派的结果，必是Ｃ．Ｐ．代表群众与整个的Ｋ．Ｍ．Ｔ．冲突而自己陷于孤立地位。其实Ｋ．Ｍ．Ｔ．并不是整个的，甚至左、中、右三派内部亦不是整个的，随着时间、环境的不同，左、中、右派本身亦非固定不变。我们的策略是应该分别拉出接近我们、于我们有利的分子与之合作。

Ｃ忽视左派领袖的结果，使我们与Ｋ．Ｍ．Ｔ．的合作更发生许多困难。杨澄在原则上虽忽视左派领袖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上，在最近事变中已感到须与领袖时时接近之必要了。

Ｄ．以上两点主要错误若不迅速纠正，则我们与Ｋ．Ｍ．Ｔ．关系未来的纠纷尚要继续发生的。对于此问题，杨澄须详细检阅此次汉口中央特别会议的决议。

Ｅ．在实际工作中有以下四事我们须得让步：

１．广大学生会的选举过去是我们的错误，如甘派一定要求由他包办，我们可以允许他放任他去做，他会碰着许多新的困难，仍要来与我们合作的。此所谓以退为进的政策。

２．工农商学联合会本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今甘等主用后者而反对前者，若我们定要坚持，这完全是感情用事了。

３．在工农运动中，我们对农运不能让步；因为现时农民所要求的都是生存迫切的要求，都是Ｋ．Ｍ．Ｔ．政纲所允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减租减息等）。然在广东工人运动方面则应大大让步，因为广州工人群众多是手工业工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行动已经达到现时社会经济所能容许的顶点，如自由封闭生产、纠察队捉人等，过此便只有工人夺取政权了。既然工人政权是目前绝不容许的，则我们对于此过分的行动便当让步。我们不可盲目的跟着群

---

① “其嘉”是中央的代称，“杨澄”是粤区代称。

② 年、月是编者判定的。

众左倾，广东还是小资产社会，若果我们利用小资产阶级政权以威骇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对于小商店主之过分要求），这是机会主义而不是革命行动。我们正苦于无法阻止工人群众目前过分的行动（因为我们地位困难），现时政府所颁的四个办法，形式虽是反动的，实质却替我们解决了很困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此办法应当承认。

4．《人民周刊》对政府态度，应站在善意的建议、忠告态度发言，绝不可取恶意攻击形式。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说

斯　大　林

同志们！未说本问题以先，应该声明的就是，对中国问题没有充分必需的材料，以尽量发挥中国革命的全景；因此我只能对于中国革命主要方向的问题，加上几个一般原则性质的指出来。我有的材料是白特洛夫同志的提案和米夫同志的提案，及谭平山同志的两个报告，赖扶思同志的对中国问题发言。我想这些材料虽然可贵，但不充分，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我想这些缺点均值得注意的，因此我的发言同时带了有批评的性质。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

列宁说，中国人很快就将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有些同志了解这个，以为中国应该一点一滴的同样重演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这是不对的，列宁绝没有说中国革命要抄袭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列宁只说中国人将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就是说，中国革命除了有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共同点，还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中国整个革命必定有它的特殊印象。

这些特点是什么？

第一个特点，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时又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很厉害的反对在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因此，它首先与俄国一九〇五年不同。事实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表现的，不仅在军事的威力，乃是中国的工业根本的罗网，铁道、工厂、作坊、矿山、银行等等，均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安排之下。因此反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代理人的争斗问题，在中国革命中不能不成为最主要的职任，因此，中国的革命直接的与各国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了。

从这个特点又产生第二个特点，就是中国大资产阶级非常之弱，它比一九〇五年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更弱。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主要的工业的罗网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手里，而中国本国大资产阶级不能不软弱落后。关于这个，米夫同志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点是中国革命各种要素之一，这是很对的，因此，中国革命先驱领导者的作用，或关于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然的落在中国无产阶级手里，它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更有组织、更先进。

同时，不应忘了中国革命第三个特点，就是靠近中国有苏联的存在及发展，它的革命经验和帮助，不能不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余孽的争斗。这些便是中国革命主要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性质和方向。

二　在华帝国主义的干涉

在这些提案中第一个缺点，就是忽略了或没有充分估量到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干涉问题。若

好好的看一看提案，老实说，便想到现在在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以为反正是南北的争斗或者是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份的军阀的战争；从此更以为干涉必定是当外国军队入了中国地境的事实，若没有这事实便没有干涉。同志们，这是大错而特错的。干涉决不仅是军队入境，而军队入境也决不是干涉主要的特点。在现代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情形之下，若是直接派外兵入境，可以引起种种反抗和冲突，所以现在的干涉带着更柔软的性质，更掩饰的形式；在现代情形之下，帝国主义干涉的方法，就是造成在隶属国家中的内战，财政上援助反革命的力量以压迫革命，精神上或财政上援助在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来反对革命。在俄国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反对革命的争斗，帝国主义者曾尽力掩饰得纯粹的内战一般，但是我们都知道，不仅是我们知道全世界人人都知道，在这些反革命的背后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作主，假使没有他们的援助，在俄国决没有很严重的内战。在中国亦然，吴佩孚与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反对革命的争斗，若是这般反革命的军阀没有各帝国主义的援助，各国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的款项、军械、教练官、参谋等等，决不可能。广东军队力量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们充分具有打倒帝国主义压迫的奋斗精神和意志，在他们以解放中国为已任。中国反革命军阀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们的后面有各国的帝国主义者占有一切在华铁道、租界、工厂、作坊、银行和商业监督权的主人。因此，不仅是看有多少外兵入境的事实，而是看各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反革命的这种帮助；借他们的手来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根蒂。因此，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干涉是毫无疑义的事实，而中国的革命正强烈的反抗它。因此，谁忽略或轻视在中国帝国主义干涉的事实，就是忽略或轻视了中国最主要最根本的地方。

有人说，日本帝国主义有以“倾向”广东和中国一般的革命的征兆；有人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对此亦不落后于日本，这是自己欺自己的话。应该看清帝国主义者，当然日美也在内，吞并政策的本质和它的假面具。列宁常说，很难拿棒和拳头对付革命家，但是有时很容易拿爱媚来对付他们。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同志们永不应忘记。总之，很明显的，日美的帝国主义者很深切了解这个真理的意义，因此应该严格的辨别帝国主义者对于广东的爱媚和恭维。若对帝国主义的爱媚……慷慨他们从自己在华的租界和铁道愈握得紧（编者：此处原稿遗误不清），因为这些是他们在中国决不愿意“放弃”的。

三 在中国的革命军队

看了提案以后，第二注意点就是关于中国革命军队问题。提案中忽略并轻视了军队的问题，（有人说：对）这是第二个缺点。广东的北伐普通以为不是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广东的将军反吴孙的战争，一部份军阀与另一部份军阀争权位的争斗。同志们，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中国革命的军队是中国工农解放争斗最主要的要素，今年五月或六月以前中国的情形，在国民军失败后，进到了反动的统治，不久，今年夏天便有广东军队北伐胜利的发展，占据湖北，而景况根本为之一变，转到有利于革命的形势；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不是，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广东的出兵是给帝国主义的打击，并给它在华的代理人的打击。给了中国一般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组织自由，这就是中国革命军队重要意义和特点的所在。

在以前，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革命的开始，平常总是大部份没有武装或是武装很坏的人民暴动起来，和旧制度的军队冲突，极力瓦解旧的军队或者极力的部份的使旧的军

队，转到民众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特殊的形式。在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亦然。在中国，事情的经过是另外的，在中国不是没有武装的民众，而是武装的民众具有革命军队的面目，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亦其优点之一。中国革命的军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在乎此。所以忽视革命的军队，是这些提案中不应当有的缺点。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应特别注意军队的工作。第一，中国共产党应该极力加紧军队中政治的工作，使他成为中国革命意志的真正的模范的领导者。这是特别必要的，因为现在一切没有一点国民党气味的将军都投诚了广东，他们投诚广东好比就是投诚中国民众的敌人的势力，他们投诚到广东的军队，带来一些分解的成分，要使这类的"同盟者"中立，或者使他们变为真正的国民党人，惟有加紧政治的工作和对于他们加以革命监督，否则军队必陷于艰难的地位。

第二，中国革命者，当然共产党人也在内，应该极力的研究军事，不应把军事看作次要的，因为军事在现时是中国革命一个主要的因素。

中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研究军事，为的是军事逐渐向前发展，能在某些革命军队中占领导的地位，这样才能担保中国革命军队按照正确的道路走，而一直达到目的；否则，军队中的游离和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军队问题的任务。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关于中国未来政权的问题，在提案中没有说到，或已说到而不充分，这是第三注意点。对于这个问题，米夫同志在他的提案中略略说到，这算是他的优点；但是提到了这又仿佛害怕似的，没有彻底的追求。米夫同志以为中国未来的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也算是革命的，能不能够说，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社会革命党和少数党的革命政权呢？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意义。为什么？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的政权是帝国主义的政权，而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是根本不相同之点。麦克唐纳尔的政府，也说是"工人的"政权，但是同时它又是帝国主义的政权，因为它是建筑在保护英国帝国主义的政权，比如在印度、在埃及等的政权的基础上面的；在中国未来的政权，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比麦克唐纳尔的政权要高明些，广东政权不是反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性质的，未来全国革命政权的发端，并且首先主要的它是而且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每向前发展一步，就是给帝国主义者一个打击，所以这个打击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列宁说得对，若是没有进到世界革命时期以前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整个的德谟克拉西运动之一部份，而到现在苏俄革命胜利以后，进到了世界革命的时期，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份，这个特点米夫同志没有估量到。

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按它的本质，会要是我们在一九〇五年所认定的政权，就是工农专政。然而它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将是中国向非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乃是中国革命所应走的方向。

这个革命发展的道路，有以下三种条件的推进：

（一）中国革命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它的趋势是极力反对帝国主义和其在华的代理人。

（二）中国本国的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比俄国一九〇五年时期的本国资产阶级更为软

弱，更利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利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农民的领导。

（三）中国革命的发展，能够利用苏联已得胜利的革命经验和帮助。

这条道路得到必然的一定的胜利，——这个要靠许多的客观的条件。总之，为使中国革命向这条道路发展的努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从此就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和中国未来革命政权问题的任务。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蠢笨的。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这是最大的错误，整个中国革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前途均毫无疑义的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加紧它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这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参加，中国革命的进行，它的性质，它的前途，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为的完全的整个的实现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必要的担保。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第四个注意点，就是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米夫同志以为应该立刻提出组织苏维埃，在中国农村组织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以为这是错误的，米夫同志太激进了，忽视中国工业的中心，在乡村中不能建立苏维埃，就是在中国工业中心，建立苏维埃的问题，目前也说不到。此外还应注意，不能把苏维埃看做超出环境以外的东西，现在农民苏维埃要能够组织，只有中国处于农民运动极度高涨的时候，要求破坏旧的，创造新的政权；同时，在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了隄防，进到了苏维埃的政权组织的阶段的时候。能不能说中国农民和中国一般的革命已经进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不能这样说。所以现在说到苏维埃太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组织苏维埃，而是组织农民委员会；由农民公举的农民委员会来提出农民的根本要求，用各种方法以革命的秩序来实现这些要求，农民委员会应该是使乡村革命化，它自己的周围发展的防卫。

在国民党人中，并且在共产党人中，有些认为乡村革命不能任其放肆的发展，恐怕引进农民参加革命，破坏了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同志们！这是最大的错误，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要愈有力量，愈加坚强，必得赶快的切实的引进中国的农民参加革命。作提案的同志，特别是谭平山、赖扶思说得对，认为即刻满足农民各种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很必要的条件。我以为打破某些国民党分子对于农民毫不注意的惯性和中立性的时候到了，我以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广东政府，应该即刻把口头所说的变成事实，提出现在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问题。这就是在农民问题方面应有的前途，至于能够和需要做到什么程度，这全要靠革命的进行；我想中国应作到土地国有，总之，我们决不能摈弃土地国有这样的口号。

中国革命者要唤起无数百万的农民赞助革命，所应走的道路是什么？我以为在现状之下，只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组织农民委员会，并且使中国革命分子参加到这里面去推动农民。（有人问：农民协会呢？）我以为农民协会将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团结起来，或者把农民协会变成农民委员会，把农民委员会当作一种实现农民要求的必要机关。关于这条道路上面已经说过了，但仅只这条道路还不够，如果以为中国革命者来干这个事体就够了，这是笑话。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其中约三万万五千万是中国人，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以为九万个的中国革命者能够吸尽农民的海洋，这是骗人的，所以还应该找旁的道路。

第二条道路，经过新的人民革命的政权机关推动农民。无疑义的，在新解放的省份会要按照广东政权的形式建立新政权，毫无疑义，若是这个政权和政权的机关，要想真正能推进革命，应该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共产党人和中国一般的革命者的责任，就是参加到新政权的机关内，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经过这个机关帮助农民群众满足其本身日常生活的要求，方法：或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或是减税减租，按照客观的情形来实施。

第三条道路，是经过革命军队去推动农民。关于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重要的意义，我已经说过了。中国革命军队是这样一个力量：它第一次牵入到新的省份，它第一次与最蜂涌的农民群众接近，农民对于新的政权及其质量的好坏，首先拿它来判断。农民对于新的政权、对于国民党，及一般的对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靠革命的军队的品行和它对于农民和地主以它对于农民帮助的程度为转移的。若是中国革命军队带来了很多的怀疑分子，这些分子他将变坏军队的面目，由此可以知道农民眼中军队的政治面貌和它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多么重要。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一般革命者，应该极力使军队中反农民分子守中立，保持军队的革命精神，要做到使军队帮助农民，引起他们上革命的道路。有人说，在中国，革命军队受一般人民热烈的欢迎，但是一到军队驻扎后，就发生了很多的魔障，这在我们苏联内战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事实，原因就是军队解放了新的省份，驻该地不得不靠该地人民的给养，我们苏联的革命者常常能够弥补这个缺点，经过革命军队尽量的帮助农民反对地主。中国革命者也必须仿效着苏联来弥补这个缺点，经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要靠这些道路和连环，在中国才能实现正确的农民政策。

六　中国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第五个注意点就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问题。我以为在提案中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已充分的指明。赖扶思同志问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向着谁，向国民党的左派或中派呢？很奇怪的问题，我想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向着无产阶级，指导中国解放运动的行动向着革命，惟有这样的提出问题才是对的。我知道在中国的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不愿意使工人有改良他自己的物质的和人权的地位的罢工，使工人避免罢工（有人说：在广东和上海有这样的事实）。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决没有估量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比重和作用，这个当然是提案中间一种坏的现象，若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现在顺利的条件去帮助工人改良他的物质的和人权的地位（那怕就是经过罢工），这是很大的错误。然则中国的革命又为的什么？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罢工的时候，肉刑拷打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不会有的，应该毫无顾忌的废除中世纪的余毒，在中国无产阶级中间提高他们自己实力的感觉和价值的感觉，使之能够成为革命的领导权，否则，莫要想中国革命得到胜利，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经济的和人权的要求，是在大大的改良他的地位，此层应在提案估相当的位置（米夫说：在这提案中已说到了）。是的，在提案中说到了，但是这些要求的提出都不十分深入。

七　中国青年的问题

第六个注意点，就是关于中国青年的问题，很奇怪的，在提案中没有计算到这个问题。然而现在中国青年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谭平山报告中说到这个问题，可惜不十分深入。青年农民若是他能接受国民党的意志和政治的影响，这些都是大大推进革命的力量。应该知道，处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没有谁比中国的青年更深切更痛苦更强烈的感觉同这个压

迫奋斗的必要。这个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尽量注意到极力加紧青年中的工作。在中国问题提案中青年应有他的地位。

八 结 论

我要指出两个结论：——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路线，和农民问题的路线。

毫无疑义的，中国共产党现时所提出的要求，不能限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样的要求在现时就是反革命的张学良也赞成的。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前进些，应该提出铁路国有的问题当作前途，这是必要的，这些都是应该要做的；往后应更注意到最重要的工厂和作坊国有的前途，关于这个问题，应首先提出中国人民特别仇视、特别剥削的企业之国有。

复次，应该推进农民问题，使它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我以为归根结底应做到土地国有，其他的，不待说是很明显的。同志们，以上都是我指出其主要的来说的。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上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

（一九二六年）

谭 平 山

一、中国革命发展中的新阶段和阶级分化的过程

从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时起，直到现在，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一起统治着中国。虽然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制度，但是，由于国家的经济落后、群众落后，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乃同买办官僚、政客等勾结起来，并以其为桥梁联系当政的军界要人，所以他们不仅毁坏了革命，而且清除了革命党。孙中山曾多次组织起事反对军阀，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还是遭到了失败。只是最近四、五年来，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提出改组要求，中国的革命运动才重新振作起来，现在显然进入了新阶段——实现革命统一的新阶段。我们知道，现代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应该完成辛亥革命，另一方面它包含有新的因素。现在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资产阶级可能试图夺回从前在1911年到1914年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再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第二种是无产阶级确实保住在上海事件时已赢得了的革命领导权。在这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与资产阶级的影响相反，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将巩固和确立下来，中国革命运动将成为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政府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的那场斗争，势将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现在面前有两种趋势。可以做个比喻：在中国革命中有两架赛车在竞争，一架是资产阶级驾驶的，另一架是无产阶级驾驶的。在这个竞赛中谁超过对方，谁就头一个达到目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由于争夺革命的领导权而展开的竞赛，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只有现在才到了决赛时刻。在辛亥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资产阶级，但后来，它同敌人和解了，并让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攫夺了全部政权。

1919年资产阶级的运动有了新的推动因素。这种高涨表现于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的确，军阀们是准备签署这个条约的，但由北京学生发起并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五四运动，迫使他们拒绝签字。在广大群众眼中，这一行动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意义，以致掀起抵制外货运动，从而引起排斥外货和振兴本国工业。这种措施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引起了资产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原因如下：

1．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一向是尽可能更有效地防止殖民地的工业发展，但是当地的资产级阶，则努力积累自己的商业资本，以便将来建立本国工业。这样，当地资产阶级与帝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举行的时间是1926年11月—12月。

国主义在殖民地以及在中国的利益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2．在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改组了本国工业并首先生产军需品以后，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和买办，就有可能将自己积累的资本用于建立本国工业。这样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反帝运动的经济基础；

3．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受1917年俄国革命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唤醒了群众的进取心，组织了五四运动。这一运动应当看作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起点。

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建立了反封建、反军阀的共同战线，但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发展、而且以更大速度发展起来的，却是无产阶级。民族运动越来越扩大，阶级斗争也日益激烈。1921年广州建筑工人的罢工，1922年香港海员的罢工，1923年华北铁路工人和矿工的罢工，都证明了这一点。1925年5月的上海事件，标志着无产阶级运动达到了顶点。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站稳了脚跟，精神抖擞，它强有力地推动了民族革命运动，并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了运动的领导权。能够说明这一过程的特点的一些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1．各阶级模糊不清的、自发的、原始的统一阵线，逐步发展为明显的、有一定目的的阶级阵线；

2．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3．联合美帝、反对日帝的纯资产阶级运动，发展成为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

4．最近六、七年来，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条约和华盛顿会议一直抱有希望，但是这些希望落空了，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却实实在在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5．①最近六、七年来，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得很快。最近几年的罢工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中国工会联合会、铁路工人联合会和海员工会已遍及全国。到处出现了农会，农村里开始发生明显的阶级分化，因而阶级斗争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每次民族革命斗争中都显露出工农群众的巨大威力。在所有这些战斗中，无产阶级都是运动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力量；②后来国民党改组了，清除了许多买办和官僚。国民党致命地打击了广东买办组织（商团）和地主组织（民团），逐渐转变为左派分子的党；③城市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和抗捐抗税的运动不断出现。在这方面，上海和广州中、小商人的联合商业组织反对商会的行动是很重要的；④革命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日益左倾。

凡此种种阶级分化的现象一直在持续，甚至不断尖锐化。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争取到领导地位。我们已经说过，无产阶级通过广州政府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形式领导的统一战线，在上海事件时发展到了顶点。

当资产阶级看到无产阶级将“亲手”赢得民族革命的胜利，而这场革命又威胁它的利益时，它就试图夺回领导地位，以便在客观上消灭革命。它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思想体系，宣扬没有阶级斗争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害怕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乃组成国民党右翼、中国资产阶级、买办、大地主和帝国主义分子的统一战线，从而组织了反革命、反苏维埃的运动。

上海事件之后斗争发展的阶段，显示出两个特点：

1．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竞相争夺革命领导权。各种反动派别在思想上和策略上围绕这场斗争组织起来了。在思想体系方面有戴季陶主义、民族主义和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极右

翼）。实际上，我们亲眼看到张作霖应上海商会的要求解散了上海总工会，上海商会在上海事件时镇压过工商界的罢工，国民党右翼勾结香港政府来破坏香港的罢工，以及广州五月三十日的事件；

2．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有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又有矛盾（事实有：去年6月，在上海由八国成立了反革命的、反苏维埃的同盟；英、日之间关系暧昧；美国报界公开攻击英帝国主义，并勉励中国资产阶级；八国都讨好广州政府，然后又因大沽事件提出最后通牒；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对付国民军；张作霖在中东铁路的挑衅等等）。

二、国民党问题

1．所谓国民党问题，我们指的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在民族革命过程中，为了集中一切力量和确定统一的斗争目标，这个战线是必要的。

谈到组织形式，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利用党的形式或超党派的形式？如果后者的形式好一些，那我们就可以不要国民党，而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各种职业团体（农、工、商、学等等）的代表联合会。如果我们应该运用党的组织形式，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么在现在的国民党中组织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控制，清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要么不要国民党而成立新的第三党，例如工农党或联合党。

超党派的（无党派的）组织形式是不适宜的。为了解决第三党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探讨一下：

（1）现今的国民党是否已经与某一国家的帝国主义打上了交道；

（2）它是否已经放弃了执行反帝的使命；

（3）它是否已经失掉一切阶级的信任；

（4）能否保证国民党的革命分子转入新的第三党。

（1）和（2）两点已被事实所推翻；（3）——在现今顽强的反军阀斗争中，革命阶级对国民党尚未失望。在回答（4）问题之前，我们还应该研究其他两个问题：

甲、国民党是否已与准备妥协的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它是否阻碍了工农运动，是否在军事独裁的条件下限制过人民的政治自由，是否妨害过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是否完全取消了群众在共产党旗帜下的团结以及共产党人深入开展革命的全部工作？

乙、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政府中目前占上风的中间派，是否还在继续搞军事独裁，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分裂是否已不可避免，以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感到需要一个新的第三党？

以上各点的先决条件，暂时只是作为尚未定型的趋势存在罢了。

2．我们能否做到无产阶级对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国民党的左翼是否仍是国民党力量的基础？我们已经在前面讲过，上海事件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产生了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即开始为争取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而斗争。这个问题不仅在国民党外，而且在国民党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回答无产阶级能否做到对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分析国民党的社会成份。按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成份，可以分成反映着复杂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五种类型。

极右派

这个集团代表买办和大地主（伍朝枢、古应芬）的利益。

广东省整个权力都操在这个集团手中。它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与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勾勾搭搭。这个集团人数不多，但作用很大。它得到右翼的支持，并利用中间派谋求自己的利益。三月事件系由它发难，5月15日国民党扩大全会以后，它串通香港政府企图攫夺政府的权力，并打算将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

右翼

右翼是由大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和富裕侨商组成，后者在右翼中特别多。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他们，所以他们是倾向于革命的，但常常被极右翼作为工具来使用。他们没有老练的领袖和独立的政治立场。我们可以称之为极右翼的信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是极右翼的群众。

中间派

它代表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渴望独立自主的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确，这一派的拥护者在国民党里为数不多，但它现在独揽军权，因此，我们应该予以特别注意。它的经济基础不是最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因而它必须在军队里经营自己的势力。它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完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看作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武装保卫者。

这一派系的领袖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应该说后者受前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前者的思想体系。戴季陶是三月事件的实际发难者，而蒋介石只是他的工具。

让我们粗略地分析一下戴季陶的思想体系。

他反对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划分为阶级，用社会分为自觉和非自觉分子的理论来对抗阶级理论。自觉的、执政的分子能保护非自觉的、被管理的分子的利益（因而，自觉的资本家能保护劳动阶级的利益，自觉的地主能保护贫农的利益，等等）。他进一步断言，社会的阶级性可以化为乌有，并用所谓的民族性来代替。

他用革命专政来对抗阶级专政。他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同于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因此共产党人断言，通过阶级专政才能消灭阶级社会，而采用“国民革命”形式的孙文学说（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在政治建设中则运用国家政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一切阶级的革命力量都趋向“革命专政”，其目的是缩小阶级权力，通过国家政权来建设社会的共同经济机构，从而逐步消灭阶级。

戴季陶轻视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共产国际，想建立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国际，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他在国际政治方面采取名副其实的消极立场，拒不接受合作。他只是同意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他还准备与之妥协。

他承认他的正统思想体系是古老传统（儒教等等）的继续。实际上，他的思想体系是古代封建思想体系的继续。

他赞成民族革命，但称它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

孙文主义学会支持他的思想体系，而国民党右翼同民族主义分子一样是他的盟友。

总的来说，戴季陶的思想体系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封建的思想体系和符合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独自发展需要的理论。

左翼

左翼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多数国民党员属于左翼，它联合城市的中、小商人，中、小农民和佃农以及知识界。左翼的主要领袖是汪精卫。

该党的地方组织，约十分之九处于左翼和共产党人领导之下。左翼政治路线的基础是国民党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该党左翼要求建立民主政府。它的政治口号是：召开立宪会议，废除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主张联合苏联，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

但左翼有许多弱点：组织涣散，优柔寡断，易于冲动，缺乏基本的革命理论，斤斤计较，畏缩不前，魄力不足，能力不够等等。往往胜利则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失败则萎靡不振，意志消沉，等等。因此，如果共产党人不予以帮助，左翼恐难以独立行动。

共产主义派

属于这一派的是在国民党里工作的全部共产党人、城市无产者和加入国民党的一部分少地农民。所有这些人都是在共产党人直接领导下，按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工作。狭义地来说，他们是左翼的同盟者。

从对国民党社会成份的分析中我们看出，大多数党员跟随左翼，党权主要掌握在左翼手里。

1）出席今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左翼和共产党人的代表一百六十八名，中间派的代表六十五名，右翼代表四十五名。

2）根据今年5月国民党全会所发表的材料，党员数目为三十一万六千人，而按党组织部的精确统计，只有二十五万人。如果不算七万国民党的士兵党员，那么左翼和共产主义派就有十五万人，而中间派、右翼和极右翼总共不超过三万人。

3）十分之九的地方党组织处于共产主义派和左翼的领导之下。

4）在今年10月1日国民党最后一次全会上通过决议，让汪精卫重返国民政府任职。

目前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共产党对国民党各派系的态度

（1）国民党内的共产主义派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自然也就仇视极右翼和右翼，因为他们保护着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利益。

（2）国民党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很薄弱，每一分钟都有被左翼推翻的危险，因此它需要国民党内共产主义派的支持。国民党中间派和共产主义派一起工作，互相利用。如果国民党中间派想更多地扩充军事势力，毫无疑问要拉拢尚未跟随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以便打垮共产主义派，巩固自己的军事独裁。

（3）左翼和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日益改善，因为左翼从自己的失败中认识到，如果国民党排除共产党人，左翼就不能独立工作。因此，左翼的大、小领袖以及群众都意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派才能是、也真正是他们的同盟者。

2．国民党与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相互关系

（1）两党联合全会决定了国共两党相互关系的性质。组织这次联合全会，对中国革命，甚至对整个无产阶级运动，都非常重要。我们的任务在于扩大和加深从中央委员会到地方基层组织的这种联系。这不仅从消极方面来说，可以消除两党之间的冲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还能同国民党一起制定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此外，这次联合全会使共产党在权利上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共产党能够争取到合法地位。

（2）如上所述，十分之九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受左翼和共产主义派的影响。

（3）一般性的社会机构和组织中的工作，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进行，共产党人独立在其中工作的那些无产阶级组织除外。在农民运动的队伍里，我们也采用与国民党一致的策略。

3．能否消除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的联系？

国民党极右翼和右翼同帝国主义者保持着联系，但这两翼在国民党里都没有多大势力。国民党内有军事力量的中间派是否已联合帝国主义，还未完全证实。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军事独裁地位，中间派将不得不联合极右翼和右翼来打击左翼和共产主义派，并同不跟随国民党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阻止无产阶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左翼，因为它依靠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所以不可能与帝国主义拉关系。

如果把国民党看作一个整体，就应该断言，若是中间派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国民党内就将发生巨大变化。左翼将坚决地与国民党划清界限，而后者必将彻底崩溃。我们已看到，国民党的力量仍然掌握在左翼手中。因此，无产阶级有可能领导国民党并杜绝其同帝国主义者的联系。因此，共产党能够并应该本着以下条件与国民党进行合作：

（1）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在它的旗帜下团结群众的活动不应受到阻挠，以便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

（2）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合作，不应支持和增强军事独裁，以便整个运动不致落入资产阶级手里。

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全民各阶层统一战线中心的国民党，对于我们的斗争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需的。

4．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

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策略。以前我们没有这种策略。因为我们的理论太抽象，我们犯了许多错误。需要详细地谈谈下面一些具体的策略措施：

甲、总的策略

在对国民党的总策略上，我们尚未犯过严重错误。这个策略首先是加强左翼，其次是与右翼斗争，第三、孤立党的中间派并使其向左转。

这三点紧密相联。如果不同右翼进行坚决斗争，我们就不能巩固左翼，孤立中间派并使其左转。换句话说，同右翼斗争也就意味着加强左翼，孤立中间派并迫使其左转。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未采取任何具体办法贯彻这一策略。有些同志认为，把左派领袖争取到我们一边，可以加强左翼，另外一些同志认为，要想加强左翼，必须把许多共产党人作为国民党员输送进去。无论是第一种意见，还是第二种意见，显然都是荒谬的。

乙、实际执行这个策略的方法

1）思想斗争。国民党内现今独揽军权的中间派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戴季陶思想体系的直接影响下实现的。我们应该与这一思想体系进行最严肃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在我们对国民党的工作中，应该占有适当的重要地位。我们只有驳倒戴季陶主义，才能掌握对中间派的思想领导，消除它与极右翼、右翼以及国民党外资产阶级的联盟。

为了进行这种思想斗争，必须提高中国共产党员的理论修养和培养宣传干部，共产国际应当尽量利用国际经验和策略来帮助中国支部，必须把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策略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及小册子等译成中文。

2）关于国民党内的组织变化问题。国民党的组织章程，几乎同共产党党章一样，有严格、硬性的规定。这不符合中国情况的需要。这种严格的章程不仅没有好处，相反，甚至有害，因为第一，有了这个组织章程，国民党就不能成为一个应把一切阶级联合到自己队伍中来的真正群众性的党；第二，愿意为民族革命利益工作的进步资产阶级分子和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国民党党章的严格要求，而不能参加国民党；第三，准备作任何妥协的资产阶级，乃有可能建立独立的党，从而把这些中、小资产阶级分子拉走；第四，已参加国民党的工农群众，受党章的束缚，有逐渐与国民党同化的危险，开始对自己的阶级利益漠不关心。

所以，为了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广泛的组织，为了使每个愿为民族革命和国民党纲领奋斗的阶级都有可能参加国民党，它的组织章程应该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党章应该改成类似英国工党的党章，使无党派人士和团体有可能参加国民党。这种组织形式有以下优点：

（1）国民党会变成一个联合一切阶级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从而能够结束军事独裁并阻止新的独裁产生；

（2）一切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资产阶级分子可以无顾虑地加入国民党，而工人和农民也能以整个组织的形式入党（例如工会、农会等等可以与国民党联合）。这样一来，这些分子脱离本阶级的危险性就不存在了；

（3）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个别成员或整个组织，除了国民党的总纲外，还有本阶级单独的阶级纲领。一方面，可以缓和、甚至也许可以避免由于国民党员的各种成分的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特别是无产者，能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全民族的利益而斗争，同时还能维护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不至受国民党组织形式的阻碍。党章的修改可以巩固各阶级的统一战线。

丙、为国民党左翼制定基本理论

虽然广大群众追随着左翼，但左翼还是缺乏基本理论，因而群众不能以准能获得实权的那种毅力去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因此，必须向左翼提供民族斗争的理论，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可以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我们应该把有关民族问题的一些最重要的书籍和小册子译成中文，在中山大学培养左翼干部，与国民党左翼合办杂志。去年5月，我们已经出版了这种杂志，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廖仲恺逝世后，杂志停刊了。我们应该恢复这项工作。一方面，我们可以向左翼提供民族斗争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国民党内同戴季陶主义、在党外同妥协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这样，也就可以避免共产主义派与非共产主义派之间的争执，可以支持左翼，而左翼为了不投降中间派，也是需要这种支持的。

丁、关于领导国民党左翼的问题

自三月事件后汪精卫离开广州时起，左翼失掉了领袖，是要投降中间派了。近来。在10月1日国民党最近一次全会上，由于群众的压力，提出了恢复汪精卫左翼领袖职位并参加政府的要求。如果他能作为中国的代表先参加即将召开的殖民地大会，然后再恢复职位，那就太好了。

戊、关于参加国民革命政府的问题

去年7月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这是一个虚有其名的左翼政府。从那时起，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右翼手中，有这一事实可兹证明：六个政府委员中五个属于右翼。工农运动由于种种阻碍不能全面展开。三月事件以后确立了中间派独揽军权，但政权仍和从前一样，为右翼所

掌握。实际上本应属于左翼的整个政权彻底丧失了。原因如下：

1）左派领袖没有能力利用政权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

2）右翼势力其实并没有彻底瘫痪，因此它能够进行活动，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我们策略的错误。主要军权掌握在中间派手中，其影响由于戴季陶主义而更加扩大。

工农代表未参加国民政府，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他们若是参加了，就会加强左翼的影响。我们知道，保护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左翼，如果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就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鉴于这一切情况，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和领导国民党左翼。但是，如果我们不参加国民党，我们对左翼的领导就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因此，共产党人不参加国民政府，也是引起左翼政权崩溃的原因之一。参加政府的问题，现在具有更为严重的性质。由于广州军队的胜利，乃产生改组国民政府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就采取正确的立场。如果我们认为必须参加政府的话，那可以采取下述两种形式：

1）国民政府应该由立宪会议委任，那时我们就要在立宪会议上推荐自己的候选人担任政府委员；

2）如果政府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成立，我们应该通过国民党推荐自己的候选人，即共产党人应该以国民党的名义参加政府。

组成政府的这两种形式都是可能的。不过，按目前情况判断，依照第二种方式产生政府的可能性更大些。不应该忘记去年的惨痛教训。那时我们没有参加政府，虽然这被认为是我方的高尚行为，但实际上我们牺牲了工农的利益。去年下半年，广州政府只是名义上的左翼政府，它本来是应该保护群众利益的。这个政府在与我们长期谈判后，连工会法都没有颁布。此外，政府也没有接受（消极地否决了）我们以各社会组织名义提出的农民的要求。当大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发生冲突时，政府总是站在大地主一边。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事实。

改组政府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右翼千方百计地力求保住政权。如果我们不参加政府，我们不仅将重蹈旧辙，而且也将使右翼政权日益巩固和扩大，这样一来，恢复左翼权力就将不可能了，整个政府也就最终成为纯资产阶级的反动独裁。

己、群众参加政权的问题

分析下列因素，可以最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1）工农群众通过参加地方管理，可以在国民党内奠定左翼政权的基础；

2）这样做，工农群众有可能为掌握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作好准备；

3）这样做，可以铲除军阀的政治基础。中国军阀的势力仰仗着买办和地主的影响。群众参加政权，至少可以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部分权力，从而取消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

4）依靠群众参加，把政府改造成为工农政府；

5）我们提出了“全部政权归群众”的口号。我们所说的群众，当然指的是工人和农民，中、小商人和知识分子，职员及一切真正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

6）应该通过农村国民会议、区和省国民会议以及最后一级——立宪会议来实行必要的措施。

庚、铲除军事独裁和预防其再现

这里我们的意思是要克服以前的错误观点，即把蒋介石看成是南方有感召力的人物，把冯玉祥看成是北方有感召力的人物。我们应该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一切进步的中国军界首脑人物以支持。同时要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以准备新的起义。

辛、我们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我们应该制定独立的政治路线，以便向群众显示出我们的真正面目，使群众不致把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国民党路线混同起来。

2）我们应该与国民党建立比过去更加广泛的正式的合法关系，例如，更经常地组织两党的联合全会等等。此外，我们一方面应该宣传群众，另一方面，向国民党提出我们的主张和政治建议。这两种方法应该看作是我们在广州政府军占领区内争取合法地位的一种准备。

(29)

3）我们应该在中、小资产阶级中间，特别是农民中间开始直接的组织工作，以便把这些阶层组织起来，根据需要再把这些组织整个地转入国民党的行列。

三、工会运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详细报告，所以我只谈谈最重要的几点。上海事件以后，工会运动在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1）在组织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有一百二十万工人参加的中国总工会。此外，还建立了全国性的海员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

2）工人在每次全民行动中都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但是运动本身有一定的弱点：第一、组织不够严密；第二、缺乏经济斗争的完整纲领。

这方面的建议是：

1）制定经济斗争纲领；

2）巩固现有组织并把尚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

3）培养工会干部；

4）与红色工会国际建立直接联系，并由它直接领导工会运动。

四、农民问题

军阀的支柱是大地主阶级。为了推翻中国的军阀政权，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斗争，应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组织才能加强，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现今的农民运动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农民热情振奋地参加了民族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现在我们要讨论下列的设想：

1）关于组织农民运动的问题

只是广东一省有农会，此外，只是七、八个省里有农民组织。最近期间，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农会。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农会内是否需要设立农村工人部，以保护其个人利益。

2）土地问题

在国民党最近一次宣言中，有一个“只有进行革命，土地才能归农民”的口号，这是一句空话。我们这方面应该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无条件地满足农民的要求。

3）实行最低的土地税

农民直到现在还交纳高达其收入百分之七十的重税。国民政府应该限制税额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

4）禁止农村高利贷

在中国农村，放高利贷并不是合法的行业，但每次高利贷者与农民之间发生冲突时，当

局总是站在高利贷者一边。

5）取消各种非正式的捐税

这些捐税本来是应该向有产业的农民征收，但实际上地主把这些过重的负担都推到佃农和少地的农民身上。

6）关于农村统一战线的问题

除了富裕农民以外，农村居民的各阶层在经济上都依赖于高利贷者和地主，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必须把所有中农和贫农以及农村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战线，以便与大地主、高利贷者进行斗争。

7）关于武装农民的问题

中国地主，特别是广东地主，为了压迫农民而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因此，武装农民是农民运动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一）中央委员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

甲、经济方面

（1）政府应限制土地税数额，农民至少应留下一半收成。

（2）限制高利贷，利率不得超过年利百分之三十。

（3）取消任何预征捐税的办法。

（4）应根据市场价格计算捐税。

（5）实行统一的度量衡。

（6）禁止囤积粮食和商品，鼓励成立合作社。

乙、政治方面

（1）争取农民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2）区政权应由居民选举产生。

（3）乡村自治机构应由村民选举产生。

（4）争取公布预算。

（5）取消民团捕人和讯问的权力。

（二）中央委员会关于广东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

甲、经济方面

（1）佃农减少租金的要求，在广东省已经激起相当强大的农民运动。我们为佃农利益提出的口号，应切合实际并通俗易懂。例如，我们应该要求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从前如果地主拿收成的百分之六十、佃农拿百分之四十的话，从现在起要从百分之六十中减去它的四分之一，这样地主就拿百分之四十五，而佃农拿百分之五十五。

（2）小农和小土地所有者最重的负担是苛捐杂税。为了满足这些阶层的要求，应该提出一个口号："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取消非政府机关征收的一切非正式捐税（例如民团捐）；实行统一的所得税。"

（3）利率不应超过年息百分之三十。超过这一规定就是违法。国家应成立农民银行，向少地的农民按最低利率发放贷款。

（4）政府应促进农村合作化的发展，应严禁粮食和商品的囤积居奇。

（5）建造大规模的排灌水渠网。救济饥民。

（6）实行统一的度量衡。

（7）地主与佃农间的不平等契约和各种例行协议，如佃农向地主交付实物偿还租金等等，都应废除。政府应颁布有关土地的特别法令，并组织人民法院，由农民选派代表参加。倘出租土地的地主拒绝服从政府法令，人民法院有权制裁这些破坏法令者。地主与佃农间的冲突，也应由这种人民法院来调解。这种机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应该估计到，有许多地主会拒绝执行政府法令。

（6）改善农村中的工人、劳动儿童和妇女的经济状况。

乙、政治方面

（1）统一居民的武装组织。每一区只应存在一个居民武装自卫组织，其成员应是本区的固定居民（在本地出生的）；领导人由组织的成员选举。

（2）乡自治会应由全乡居民选举。

（3）乡自治会的预算应该公布，会计及其助手在乡村大会上选举产生。

（4）乡村法院，应由全体居民或居民代表伙同地方政权代表组成。

（5）区应该实行苏维埃制度（由五个成员组成），而且应该由全区居民领导之。在过渡时期，比较妥善的办法是由政府任命苏维埃的领导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应有上告的权利。

（6）农村的自卫武装组织，应联合成为本区的统一组织。区的武装组织不应由区自治会领导，而应由省政府机关的自卫部领导。

五、关于城市中、小商贩的问题

上海事件以后，分化过程也冲击了城市商人。群众的压力最初曾迫使大商人参加运动，但后来当他们看到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他们的利益相矛盾时，他们便开始同军阀妥协，以期阻止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据他们的主意，上海总工会被解散了，许多工人领袖被捕，部分人遭到了枪杀。

中、小商人在运动初期站在工人一边，可是后来与他们疏远了，开始对民族运动抱消极的态度。一小部分人甚至倒向大商人，跟着他们走了。最近几个月，中、小商人反对大商人的运动又重新抬头。在上海发生了一系列反对军阀苛捐杂税的示威游行，以及抗拒交纳大商人征收的自卫团捐的行动。广州的小商人退出了大商人的商会，成立了独立的组织。

因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城市统一战线问题，即应该努力尽可能更广泛地扩大无产阶级对中、小商人阶层的影响，把他们争取到民族斗争方面来，不让他们跟大资产阶级走。

六、青年运动

中国青年运动是由青年学生运动发展起来的，然后转变为工农青年运动。由于革命运动的高涨，青年学生的分化过程现在具有更清晰的形式。在革命发源地——广州，工农青年运动发展得特别快，而学生运动则落后了。在上海和北京，革命知识分子逐渐转到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方面，转到国民党右翼方面去了。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右翼共同组成了反革命战线。但在这两个城市里，还有一些知识界的团体和派别仍然坚持革命立场。

七、妇女运动

中国的妇女运动有以下两个特点：

1）从争取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运动，转变为提出经济任务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

2）从个别省份的地方规模的运动，转变为全国范围的整体运动。

在上海和广州有女工组织。广东省农会有许多农村妇女热情振奋地参加反对大地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显示出她们的重要作用。"妇女解放协会"已经在三个省份建立了组织。今年6月本应在广州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但因某些情况未能召开，延期到明年。几乎所有的中国妇女都无文化，没有独立的职业，依靠丈夫和亲属过活。因此，极需组织一种社会活动，以求妇女能有机会从事公益劳动，能够扫除文盲。

八、关于党的地位及其活动问题

甲、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时期的策略

1）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正是世界帝国主义实行对华扩张政策的时期，从而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并应领导群众进行这场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民族革命是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起着削弱国际帝国主义的作用。

2）在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工农应该把改善经济状况和争取政治自由作为自己的目的。只有当广大劳动群众得到解放时，民族才能有真正的自由。

3）要与一切阻碍劳动群众斗争、破坏劳动群众利益的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直到他们彻底垮台为止。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群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那末阶级斗争甚至在民族革命的背景下，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压迫和剥削群众，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与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携起手来。由此可见，劳动人民与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仅符合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而且也是整个民族利益的需要。

4）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中国人民应该与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紧密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外国帝国主义从中国驱逐出去。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终将被打倒。

5）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被推翻、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新生的私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那时，这些国家的劳动者一定能组织自己的国家机器，以便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并逐渐地将其转移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轨道上去。

依据这个理论原则，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国民党合作。

最近五、六年中国社会关系的发展，一般革命运动的发展，迫使全国工、农、小商人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上海事件，甚至穷乡僻壤都响应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这一切证明了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工农开始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因此竭力支持政府。工农与买办、地主的进一步斗争巩固了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省人民群众免除了各种各样的官方和非官方的苛捐杂税，解脱了反动军阀的压迫，这个事实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民族革命的成果。苏联与广州政府的合作，蒙古、土耳其、印度、叙利亚、摩洛哥的革命运动，法国、英国、德国等等的革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在反帝斗争中的支柱。

一方面是，广州军队最近的胜利，革命力量的集中，工农群众组织的加强与扩大；而另一方面是，军阀士气沮丧，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矛盾重重，等等，这一切可证明中国革命的统一大业在最近的将来是会实现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党，面临着这伟大的使命，应该具备健全的组织，实行正确的策略，以便始终不渝地、勇往直前地推行中国革命的事业。

乙、对党的评论

由于革命浪潮的高涨和上海事件后明显的分化过程，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增加了。根据今年5月的资料，现有一万二千名党员，其中百分之六十六是工人，百分之五是农民，百分之二十九是其他各阶层的人。

让我概略地提一提党的成绩和缺点：

1．党的优点：

（1）党员工作积极；

（2）党员群众纪律性强；

（3）大多数党员在争取群众的思想斗争中起领导作用；

（4）党员的群众工作做得相当好，并能领导群众。

2．党的弱点：

（1）同志们工作积极，但理论工作方面却有很多缺点；

（2）他们遵守纪律，但对纪律的理解很机械，缺乏政治生活上的教养；

（3）他们在思想上能够领导群众，但有时不善于保持已赢得的地位；他们不善于集中力量向敌人发动总攻；

（4）他们能够引导群众，但因缺乏必要的力量，乃使党不能完成全部必要的工作；

（5）党在组织方面，从下到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6）领导机构不统一。它们在思想方面是集中的，统一的，这是事实。但实际上，由于一系列的各种原因，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有三个几乎是各自为政的领导机构；

（7）党没有统一的政策，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年青的党说来，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对国民党的政策上，共产党执行的策略不是没有矛盾的，例如，共产党对孙中山北上问题的态度，以及对国共两党联合全会的态度，就是个证明，还有，我们对国民党的让步也可证明这一点；

（8）党员人数还不多；

（9）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不够密切；中国支部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不够，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支部也缺乏应有的具体领导。

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应尽可能迅速地消除这些错误，否则我们的工作将遇到很大的危险。

对于中国目前局势下提出的实际要求，应该考虑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对党的工作问题的建议

1．统一领导机关。因为缺乏统一的领导，党的活动能力被削弱了，可能发生党落后于事态发展的情况。因此，统一领导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方面，应采取的实际措施如下：

（1）中央委员会应当尽快地迁往全国的政治中心；

（2）必须派遣有经验的同志到上海、北京、汉口、广州等最重要的城市去。

2．建立健全的领导机关。从地方基层到中央委员会，一切组织，特别是中央领导机

关，都应该健全起来。中央委员会应该扩大，最有经验的同志应该尽可能地集中在中央委员会周围。

3．扩大党的队伍。既然中国领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革命发展如此迅速，变动如此频繁，那么，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目真是少得不成比例了。不过，中国实际上只有一百七十万真正的产业工人。客观地讲，巨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不可能这样迅速地产生出来。同时，中国有一千多万手工业者和三千多万少地农民，只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我党就可以从这两个阶层的队伍中吸收新的力量。这个问题应该由共产国际来解决，因为它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

4．提高中国支部的思想修养。党的干部的思想修养应该提到应有的高度。由于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对理论修养工作应该特别注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①]

以前中国革命发展的程度，未能将他的性质与内容，具体的在国际上表现出来；因此，以前国际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案，不是抽象的指示一点东方民族运动的一般倾向，便是分析中国眼前较琐屑的事象以及目前一些工作方针。最近（去年十二月），国际第三次大会②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自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伟大的表现出来，又加以北伐胜利及南方工农运动有了普遍的发展，不但促起国际对于中国问题之注意，并且中国革命本身，已经发展到略略可以显示他的性质与前途；因此，此次国际扩大会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撇开一切枝叶问题，大刀阔斧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

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

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将要发生什么毛病呢？通常所谓国民革命，包含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义，若死守着这个意义来做国民革命，并且以此自画，对于一切有超过这个意义之必要与可能的企图，都等待将来的下次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再来做。若照这样的方针这样的战略来做国民革命；那末，我们的革命还在将来，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

此次国际扩大会的决议案告诉我们：中国的革命前途，在客观上不会是这样，在主观上更不应该是这样。国际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发生的；他的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

① 此件时间不迟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不早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② “国际第三次大会”可能是“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之误。

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

国际这个提案，不是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不是说我们离开国民党，不必继续和他们革命的合作；不是说已经不需要民族的联合战线，而由无产阶级孤军独战；不是说要推翻国民政府，而就要实现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苏维埃；而是说要更扩大更强固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仍旧要和国民党合作——和一部分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仍旧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政权之下，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达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将国民革命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民族解放到工农解放，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在这整个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自不免有先后轻重的现象，而且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

在此次国际提案中，自然未曾说将来中国不会有第二次无产阶级的革命，或不需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命运，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过，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根本错误。革命是活的，不象演剧和做影戏，必须演完这一幕才能开演那一幕。

这是此次国际中国问题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这个根本方针与战略决定了，其余若加入国民政府，若采用急进的农民政纲，若注意军事工作，都是相因必至的问题，便不要再加以原则上的讨论了。

• • • •

中央政治局已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

各区委各地委各特支，接到国际此提案，即须召集负责同志详细报告及讨论，随即分派负责同志到各支部讨论。讨论的重要点，首先决定赞否此次国际的根本方针与战略，然后再讨论几个特殊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民主独裁制；（三）和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四）农民政纲。这些问题，各级党部讨论的结果，都应有一决议案；每个同志如有疑义或意见，都可写寄党报登载，以便共同讨论。甚至于第五次大会后，仍然要继续讨论。因为国际此提案之执行，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

欢迎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鲍罗廷顾问宣言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先生到了，我们革命民众和武装同志，都喜欢得象什么似的；我们好象婴孩得到了慈母的安慰一般，在这一天当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一种热烈的情绪！

自国民政府明令出师北伐以后，中国革命的空气，骤然地高涨起来，不出几日的光景居然占领了整个的湖南、湖北、江西，并且把长江一带的军阀的黑暗势力肃清，使整千整万的被压迫民众，从此得到了解放！

然而这次军事上的胜利为什么会有这样迅速？我敢对各位武断地说：这完全是苏俄实际的帮助，以及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主持得力所得的结果。

苏俄自他本国的民众得到了解放以后，极力地想把其他的被压迫民众，从帝国主义铁蹄下拯救出来，他曾经帮助过土耳其独立，现在又要实际地帮助中国，使中国被压迫民众，得到解放了！自鲍顾问来到中国，我们的国民革命，就渐渐走入正当的轨道；他对于我们革命的工作加以极大的帮助和指导，一生精力，尽瘁于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导师应当要表示一种很热烈的爱戴，欢迎，尤其是对于能实际帮助我们的苏俄，更加要以恳挚的态度，表示与他携手！

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被压迫民众利益的政党，国民政府是拥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中央及政府委员，是为中国被压迫民众利益而奋斗的导师。自国民党改组以后，他们的努力一天胜似一天，虽然其中受过反动派几次很猛烈的摧残，可是他们的精神，还如铁石般的坚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他们的努力，如拥护省港罢工，统一军政财政民政，均有很好的成绩。他们能够不屈不挠地秉承总理的遗志做去，在军事上政治上已有种种的施设。这样我们当然要表示很热烈地欢迎，庆祝我们湖北及全国的革命工作，从此得到人来指导了！

现在，国民政府已迁到湖北来了！我们的民众将得到更进一步的解放，永远永远地在革命政府指导之下生存。看呵！青天白日的旗帜飘摇在广垣的江干！让我们高呼，我们欢唱：

欢迎中央及政府委员的革命精神！

欢迎鲍顾问的革命精神！

拥护总理联俄政策！

农工商学军联合起来！

打倒英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封建余孽！

扩大反英反奉运动！
中俄联合万岁！
国民政府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

（原载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前敌》第七期）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日高涨扩大似一日，工人农民的大群众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而争斗，在许多大城市中罢工运动如潮而起。许多省的农民也起来成立他们的争斗组织，和反动势力的地主劣绅争斗。这些革命势力之兴起，无人能止之。工人群众渐渐组织到战斗的工会之内，冲破了以前地方的行业的界限，成功了强有力的统一势力，以领导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争斗。农民群众日益卷入革命漩涡，并且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争斗这个事实也就要到来。在此革命高潮中，革命的军队也渐渐接近工人农民及被压迫的民众，虽然其首领有些还在动摇中。

由于革命军之胜利，由于工人农民的争斗，并且由于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之进攻，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手工业工人都一天一天革命化了。

这些现象都使帝国主义者及其所雇用的一切反动势力见之发抖！

自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是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向中国武装的进攻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剧烈的向帝国主义反抗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一次，中国革命的工农及一切民众反抗运动更扩大更加强一次。

“五卅”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国民运动之真正开始，帝国主义者知道不是那一国的问题，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帝国主义者联合的以武装势力在上海在汉口在广州等处向中国民众进攻。“五卅”运动，被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势力及他们间接的武装势力即奉直军阀镇压下去。不久同情于国民运动的国民军起来反奉，占领了天津，帝国主义者大起恐慌，他们又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国奉冲突问题，他们知道民众开始与军事势力结合是革命运动发展的表现，国民军如果占住了北方的第一交通大港——天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北部的统治权力将根本动摇；于是他们第二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出兵满洲，封锁大沽口，炮击大沽炮台，复在辛丑条约国名义之下联合的以哀的美敦书威胁国民军，一面间接的用奉直军阀武装势力以讨赤名义向国民军总攻击。

国民军在京津南口苦战了半年，终于为英日帝国主义所雇用的武装打手奉直联军所败，退出南口；可是同时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得广大的民众援助，一直攻下长岳武汉，帝国主义者更是惊慌失措，他们更知道北伐军之目的不是简单的南北战争，并且不是单纯的军事势力，而是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反动势力之一种有力的表现，其胜利结果，将使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全部动摇；于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分途力助他们所雇用的武装打手奉直军阀，一面在南方使孙传芳攻打北伐军，一面在北方巩固张作霖张宗昌的势力。

自孙传芳在九江败退，北伐军进到浙江，一直到最近汉口“一三”事变，一切帝国主义

者更惊慌得发狂起来，他们都知道"一三"事变不是汉口民众和英国水手冲突这样的简单的问题，乃表现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和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势力直接的决战时期渐渐接近了；于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在英国帝国主义者领导之下，第三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联合的在长江一带示威（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除原有驻华海陆军外，现又由英国帝国主义的提议，成立四国出兵协定大派海陆军集中上海；英国已由本国派遣第一舰队及水兵一千陆军八大队，由印度派遣英兵及印兵两大队到上海；法国则增派舰队及安南兵到上海；美国则令亚细亚舰队全部动员集中上海；日本已从佐世保派遣驱逐舰四艘，又巡洋舰一艘载陆战队到上海。）；一面复间接命令他们所雇用的打手奉直军阀向北伐军及国民军进攻。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其陆军部最近计划：五十日以内将有英兵二万要集中上海。他比法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更露出了凶恶的面孔。

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而且还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

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此次联合的向中国国民运动进攻，无论在硬的方面，在软的方面，都比前两次联合进攻凶恶而且阴毒。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

他们（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打手奉直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好友稳健分子温和派）的胜利，即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

什么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收回海关矿山航权路权为国有，一切帝国主义者无条件完全放弃他们对于中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统治权力，及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雇用的军阀，解除其武装。这个胜利是全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利益，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需要这个胜利。可是，这个胜利决不是什么稳健温和方法能够得到的，只有不断的争斗与牺牲可以得到。有些人提议可以用温和稳健方法向帝国主义者收回权利，不取急进的革命行动，这种反革命的说话分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消灭中国的国民运动。这是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后，许多稳健分子温和派所试探而失败的旧路，现在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去试探了！

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时期已立在我们的面前了！一方面是国民革命运动之高潮日益增涨，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及其雇用的反动势力联合进攻，很明显的表现出中国革命决胜负的决死战之时期日近一日了！我们须立即准备！在此时期中，我们比以前要有更坚苦的战斗！在此时期中，凡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必须是枪口向着帝国主义的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拥护帮助正在和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争斗的国民政府，扩大巩固我们有组织的力量以拥护帮助国民政府！我们因为拥护帮助国民政府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我们对于反帝国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所可利用的反动势力（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劣绅土豪等）之争斗，一刻也不能休息！

工人们！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的工会！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统一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无产阶级的目的，统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

农民们！起来！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革命的农会！推翻地主劣绅的政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创造在农会领导之下的乡村政权！你们的争斗和城市中工人的争斗联结起来！

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大半个中国还是国内外的黑暗反动势力统治着，即国民政府统治之内，外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内而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土豪，仍在横行，国民革命之成功，还须

要你们长期的势力争斗。此时帝国主义及其所雇用的奉直军阀联合的向革命进攻，更是说明你们需要更广大更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农民对于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土豪的革命爆发，更是为你们肃清所有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可利用的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政权，更是你们最有力的后援。民众势力高涨起来，正是你们的敌人所恐怖的事，也是一班稳健分子温和派所恐怖的事，而不是革命政府所恐怖的事。你们若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而有一点反对工农民众，你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所雇用的军阀，立即可以利用之以反对革命。不离开革命，不离开民众，全世界革命的民众都站在你们这边，你们并不是孤立的，大胆前进！我们应该一致高呼：

一、反对英国帝国主义领导的四国对华出兵协定！打倒帝国主义者对华阴谋！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

二、巩固工人农民革命的军队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联合战线！

三、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

四、解除奉直军阀的武装！

五、肃清全国反动的旧势力！

六、在乡村中城市中省会中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召集革命民众的国民会议统一全中国！

七、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八、中国工农运动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

（一）汉口一三惨案的背景

英帝国主义之危机——首先就他的本身而言，第一是经济的恐慌与资本输出之减少。现在英国所欠之债，共计英金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或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定六十二年还清，则每日须付美金五〇〇，〇〇〇元（这是欧战中所欠的），据去年九个月内英国资本输出之统计，与美国相比较起来更形危险；美国为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英国为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知英帝国主义之穷了。第二是，商业之衰落。英工商业近来的确是一天一天的衰弱起来了，这或者是物极必反的定理罢。至于其降落的程度，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的四年中间减少了六千四百万磅。近来工人之失业者尤其是日益增加，大有难乎为计之叹。矿工之罢工，尤与英帝国主义者以根本的打击呵！至于政党之分歧与工人阶级之左倾，殖民地之觉悟与国际的冲突，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后与各国无产阶级之群起，尤为英帝国主义之最大危机，而且是决没有方法可以消除的。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8日

自革命军势力达到长江流域以来，英帝国主义者在各地之屠杀，层见迭出。国人于痛心疾首之余，愈感收回租界为刻不可缓之事。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沿袭其炮舰政策对待华人的结果，亦是民族革命高潮中必然不可避免的现象。

本来，我们早已知道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和革命民众的势力，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是不可并存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消亡，帝国主义的基础不拨〔消〕灭，革命的民众始终是不够〔能〕得到安静的。单就中国来说，目前一般民众所直接感受的最大痛苦，便是军阀的搜括蹂躏，买办阶级的苛虐榨取，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的剥削和摧残，但是，从根本上说来，这些反动封建势力的存在，都是和帝国主义有息息相连的关系。……所以中国目前所需要的革命运动，是国民革命，也可以说是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意义，便是要利用帝国主义者自身所造下的危机，铲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一切基础，以求中华民族的平等独立和自由，建树一个真正民主统一的中国。

……

所以，我们站在革命的观点上来说，收回租界，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实际行动的问题，而不仅是一个口号。因为我国从种种事实上已经说明了，租界在现在的中国，的确是革命途程中一个很大的障碍，而且可以说是革命党人的陷阱。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1日

英帝国主义者的忠顺走狗吴佩孚、孙传芳，自从被我们打倒了以后，国民革命的势力，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它八十余年来在长江流域惨淡经营的特殊权利，优越势力，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同时在它国内劳动阶级，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勃兴起来。煤矿工人罢工，迄今尚未解决。在它统治下的各殖民地，也纷纷推动革命的狂波，要求独立，以谋脱离其羁绊。诸如此类事实，都是以使他心急意乱，手忙足慌起来，更图穷匕见，处处发泄其兽性，不惜以其极卑污的阴谋诡计，毒辣手段炮舰政策，来威吓欺诈我国民众，以图扑灭我们的一切革命势力，实足表现出它随着革命的高潮，达到临危的前一夜，不过是一线的余光返照而已！

预想与事实真是符合的！自从国民革命的势力达到了武汉以后，英帝国主义急得疯狗也似的咆哮起来了，处处施展其阴谋，在北方封闭天津市党部，捕害国民党员，在汉口造谣中伤，调军舰，置沙包，布电网，架机关枪。组织暗杀队，侦探队，停闭工厂，驱逐学生；令汇丰银行歇业，封锁武汉金融，以谋破坏武汉的革命新根据地，早料到它必有一场大屠杀，以遂其狼子野心。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二）汉口一三惨案的真相

本月一日、二日、三日为武汉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迁汉，和北伐胜利之期，各党部各人民团体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员，为使各界深切明了庆祝的意义起见，特别组织了讲演队到各处重要的地段讲演。三日下午三时，有宣传员数人在一码头江汉关前面中英交界的空场内讲演。听众极多，肩颈相接，宣传队内特别派有专人照拂，秩序井然。英租界当局以为是挑衅的机会到了，遂飞调大批武装水兵登陆，于沙包前置电网，架机关枪十六架，取作战姿势，放空枪威吓。殊知听讲民众，训练有素，置之泰然。英兵遂蜂拥上前，实行驱逐。听众知其有意挑衅，均退入华界。英兵复汹涌冲入，用刺刀向人丛乱杀，当将码头工会会员杀死一人，杀伤十余人，李大生君的大肠随刀拖出血〔流〕遍地，方汉山君腰部深伤，均命危旦夕，听众重伤者八十余（闻有数人五日晨已死），轻伤者三百有奇。然英兵尤愤愤冲杀未已，嗣经政府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李国煊、宛希俨诸同志，曲为劝退，方得免于大难。壮烈的悲剧，竟由此演成是怎样光怪离奇的事呀！

处着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我们的生命完全是它铁蹄下的牺牲品，要想我国革命得以完成，我们的生命有所保障，必须先擒着这个吃人的魔鬼一英帝国主义者。现在让我把它八十五年来在中国侵略屠杀的成绩展览出来，然后再决定怎样去裁判它。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5日

公安局之报告，为呈报事，昨日下午二时，据职局警察第六署长戴维夏电话报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一码头中英交界地方演讲，民众聚集静听，秩序井然。乃英人无故调多数水兵登陆，密排武器示威，并干涉演讲。听讲民众，置之不理。讵英兵胆敢以刺刀杀伤数人，徒手民众因无力抵抗，请派警保护等语。局长此即派督察长饶仁华率领保安队驰往救护，并由电话通知武汉卫戍司令部及前敌总指挥部，速派队前往，协同维护。旋据第六署署长戴维夏呈报，英兵以刺刀刺伤民众祝香山、方汉山、李大生等，并呈缴英兵马枪一支，上冠刺刀，血迹甚多，随带同王庚书及受伤人祝香山到局。询据王庚书供称，适才经过该地，见

英兵持枪刺伤数人，经众将枪夺下等语。复据保安队队长段海山、侦缉队队长李清澄报称，英兵又刺伤张义贵、明宿生等，局长并亲履该地与英人交涉，撤退英兵，令勿开枪激变，并劝导民众静候政府处理。幸双方允可，局长以事关外交，即亲赴南洋公司联席会议，报告经过情形，去后，接据督察长饶仁华报称，局长离开该地后，英兵又刺伤一人，不知姓名等情。据此，查此次英兵无故登陆，刺杀民众，幸未酿成巨变，嗣经局长交涉妥后，复以刺刀伤人，实属野蛮已极，除将枪刀存局待缴外，理合将英兵肇事情形，及已查明之受伤民众之姓名，缮单呈祈鉴核，恳向英领严重交涉，以重国权，而张公道。谨呈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

原载《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三）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关于一三惨案的公告

中央联席会议今晨（一月四日）发出公告，原文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闻英水兵行凶之事，我同胞一人被杀，数人杀伤，政府同人，不胜愤激，政府必当采取适当方法，保护人民，在二十四小时内，当可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惨剧发生，及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政府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于一月四日午后七时，在新市场正式宣布，特此公告"。（一月四日）

原载《向导》第183期

（四）中国共产党对汉口英兵惨杀华人事件的态度

此次汉口英界惨杀事各团体联席会所议决八条件很好，因为现时的政治局面尚不能提过高的条件，我们的行动须注意以下几点：

1. 所提条件应以低而能坚持为原则。

2. 外交上应引导群众与政府一致（因为现时的政府实质是能受我们影响的），要群众与政府合作。

3. 绝对制止对外国人个人的暴行，以及侵害外人住宅商店等，当使群众明了反对帝国主义是有计划的行动，须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

4. 政府派往租界的军队必须选择纪律最严的军队，不仅注意使外人无所借口，并可向外人表示革命军军纪训练究竟与北军不同，这个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们对此次事变煽动的口号是：

1. 反对英国兵又在汉口杀人。

2. 反对英国公使以二五加税帮助张作霖、孙传芳。

3. 撤退英国海陆军。

4. 收回英国租界。

5. 排斥英国货。

当在全国鼓动起很浓厚的反英空气，并指出此次英国公使对华提案完全是一个骗局。

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7年1月）

（五）武汉国民政府派兵进驻英租界

昨日（四日）下午七时，国民政府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等复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于此次惨案之态度和办法，大致略谓，中央临时联席会议昨晚开会时，对于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之八项条件，决定全部接收，且有先已由外交部分别进行者，故此次之对英交涉，政府与人民完全一致。同时昨晚会议中决定令卫戍司令部派精良军队入驻英界，维持秩序，保护安全，此项命令，已于昨晚实行，最后并勉励民众整齐步骤，维持秩序，共争最后之胜利云云。

新市场大会散后，政府委员又召集各团体代表在南洋大楼开联席会，徐谦主席，由外交部秘书吴之椿，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先后报告交涉经过及派兵驻防英界情形。大致可分二点，（一）外交部对于此案，前晚即已提出口头抗议，限其立刻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英领旋于今晨答复，完全照办，并允许中国军警入驻英界。（二）昨日政府已派军队三连入英界，驻英巡捕房后堆栈内，今日决再加派一连前往，营长一人，党代表（陈群）一人，驻英捕房办公，所有在英界之中国兵士，均受党代表之指挥，党代表则受外交部之指挥云。（一月五日）

原载《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六）武汉三十万人民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作出重要决议

武汉市民对英示威大会，昨（五日）在济生三马路举行，参加者不下二三十万人，由市党部代表李国煊主席、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指挥，当议决要案及通电如下，通电云："全国各团体各报馆转全国人民公鉴：英帝国主义者之凶横暴动，以为全世界之公仇，近见国民政府北迁，革命势力高潮，对我革命民众，益加敌视，既纵使其商轮在团风撞沉我国商轮，淹死四百余人，复指挥其驻汉水兵，乘我民众欢欣鼓舞之时，冲入华界，惨杀我听讲之民众，死者伤者，狼藉道途，闻耗之余，全市震悼，本日农工商学各界市民一律罢市、罢工、罢课、罢业，在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讨论对英办法，并经议决八项办法请求政府即刻向英领事提出，限其于七十二小时内有圆满之答复，否则自动封锁英界，实行对英总罢工，并请求政府为防止此后再有此类惨案发生，应立即自动收回英界，收回海关，撤消〔销〕英人在华内地航行权，撤消〔销〕英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以杜后患，事关民族存亡，望全国同胞，一致声援，与英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国家前途实深利赖。武汉市民反英示威大会三十万人"同叩。附大会议决案如下：（一）请求政府立即实行下列事项，（甲）立即向英领提出严重抗议，（乙）英政府须负责赔偿此次同胞死伤之损失，（丙）英政府须立即将肇祸凶手，交国民政府依法惩办，（丁）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戊）英政府须向国民政府道歉，并担保此后再不得有此类惨案发生，（己）英租界内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演讲之绝对自由，（庚）英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辛）英租界须由国民政府派军警管理。（二）如英领事对国民政府所提之条件无圆满答复，民众立即准备，（1）自动封锁英租界。（2）自动对英总罢工。（三）本日

大会，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惨案真相。（四）本日大会一致议决，民众自即日起，实行严厉禁止买卖英国货。（五）国民政府对英态度，与民众完全一致，民众应一致团结，服从政府，谨守秩序，誓为政府后盾。（一月六日）

原载《时事新报》1927年1月11日

（七）刘少奇在国民党（湖北、武汉）省、市党部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

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于昨晚（五日）九时，假普海春三楼大厅，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到会工人代表四百余人。总工会代表刘少奇演说，略谓：

党部同志及工人，同站在革命战线上，所以我们要站住立脚点。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工人革命，有很光荣的历史，适才已经有许多同志说过，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不过此次湖北工人运动，社会或许有一部分人不明了，致不满意，我须当特别提出说明。大家要知道，武汉工人约有三十万，工会三百余，而总工会之成立仅三月有奇，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短促，欲其尽善尽美，实有不逮，我们自已也知道，但是半年或一年以后，工人受有相当训练，我必其能为良好而忠实的革命者。刻下即有差处，应要求社会原谅，切不要因此抑制工人运动，致阻革命力量。此外尚有三点，须就此申说：(一)欲完全〔成〕革命，必须先解除农民的束缚。农民的束缚是什么？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打破这个基础，农民就得解放，生产力及〔即〕随之增进，工商利益俱可进步。到此，革命就能成功。我们应当联合力量，共谋此种共同利益。（二）就是英租界英人屠杀同胞事件，现在英人自知理屈，英租界已让我们接收，从这点观察，我们看得出来，英人已经无统治英租界能力。在先英恃其横蛮，屠杀同胞，我们为人道计，对英不能不死力反抗。现在英租界既已让出，就是我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地域了。我们同胞，特别是工人们，应当恰〔恪〕守秩序，帮助政府维持英租界治安，由此可以表现我民众运动，是有秩序的有意义的了。（三）就是根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议决案，于一月内召集全省省民会议，要求克期完成，并要求工人代表参加，帮同〔助〕政府解决一切困难问题云云。……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

（八）董必武主持的武昌市民对英示威大会及其四项决议

（人民社消息）湖北省党部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为“团风”、“一三”惨案，特于昨日（七日）下午二时，召集武昌市民，齐集武昌阅马场，举行市民对英大示威运动。到会群众二十余万人，虽大雨滂沱，而群众露立会场，至数小时之久，最后并冒雨游行，毫不懈怠。

其对英人之愤慨，于此可见。会场搭一主席台，一指挥台，四演讲台。中央党部特派员董必武总主席，全省总工会代表余光清总指挥。……总主席董必武报告：大意谓英帝国主义者，在此革命高潮中，敢纵使其铁舰撞沉我商轮，死者达四百余人。日前于新年庆祝会中，又无故屠杀我同胞，此种残忍之手段，直欲杀尽我同胞而后已。我革命同胞，已起激烈反抗，现虽英租界收归我政府派军警管理，而束缚我们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尚多，英帝国主义者，仇视我民族益甚。所以我们要求生存，就要于今日大会中集中力量，续死难同胞精神，以与英帝国主义者奋斗云云。（六）讲演：各团体代表均有沉痛演说。（七）通过议决案四件：一、维护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二、拥护各人民团体要求决议案，三、厉行对英经济绝交决议案，四、拥护武汉市民反英大会决议案，由吴德峰向众宣读，全场鼓掌通过。（八）高呼各种口号。（九）奏乐，唱国民革命歌。（十）游行，由会场出发经百寿巷，到长街，过司门口散会，时已下午五句钟矣。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8日

（九）谈判经过情况

汉浔案交涉之经过

汉浔案既起，驻北京英公使遣其参赞阿马利来汉交涉。一月十二日来访，作初次之谈话，英代表要求退还汉口英租界，恢复以前状态；友仁当告以如此办法，必致引起较现在更险恶之局势，现在双方之交涉，只可以现在之新状况为根据，不能以以前之状况为根据。关于此点，英代表不能否认，遂由双方以此种新形势为根据，即以国民政府因三日事变发生实行管理英租界为根据，继续进行磋商，前后凡十六次。一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一方面答复英政府十二月十八日之宣言，一方面对于汉案为明了之表示。

汉口□□□□国民政府对于□□□□□□汉口租界之一种交涉，因为（一）中国民族□对与帝国主要之冲突；（二）国民政府与其他国政府之关系，亦将因此而生影响。汉浔案之解决，小之为汉浔案两租界之收回，大之为取消不平等条约全体之初步，亦即中国国民革命在对外关系上之初步工价。故一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所发表之宣言，不仅为对于英国政府十二月十八日宣言之答复与对汉案之一种表示，而实为中华民族运动对于世界之一种正式宣言也。

国民政府宣言云：“吾侪所以要求自由平等，且不惜投艰赴险以求达目的者，盖中国人民不欲沦胥于亡，则建设新国家为刻不容缓之事；倘此新国家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以建设之者，则中国首先须有处理自己事务之权，换言之，即独立是已。”又云：“此主要目的为何？盖即恢复中国因战败被英人剥夺之完全的自由是也。”独立自由，即该宣言中之主要意思也。

汉案之于中国民族运动有重大之关系，凡同情于此运动之世界民众，莫不了解；而英国之劳动界对于国民政府在汉案上所占之地位，尤为极力援助。盖其与其代表同情之世界民众一同认识汉案重大与深远之意义也。故英国劳工运动代表有电致友仁云：

“英国劳工运动工业及政治方面代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通过下列之议案，阁下于此可以窥见同人等欲竭其棉薄，求得一确定之方法，使中国之地位立于完全的独立国家之基础上。……英国劳工运动并致其极诚意之同情于中国工人，而拥护其经济状况之增进，且希

望中国工人能以坚决和平之谈判，引导其国家脱离眼前之困难与危险，使确立于世界独立国之林，并能以自由意志订立种种条约，登进其国民于幸福庄严之域。”又接英国援助中国自由劳工会电文云：“顷接国民政府宣言声明愿以经济平等及互相尊重政治及领土主权为根据，与任何列强单独谈判，解决条约及其他附属之问题。本会阅诵之下，无任欢忭。”故汉案所以能得世界民众之同情者，正以其为中国民族运动途径之程序也。

汉案磋商，于一月底即已就绪。不意英国政府自本国及印度调集大宗军队，以上海为集中之目的地；其时我军右翼正向江浙进攻，军事紧急，英国此项军队究竟其意何在？实予我军以重大之怀疑。且汉案交涉，行将就绪，而英国大兵压境，形同威迫，苟于此时签字，实为国民政府之威严所不许。故友仁拒绝签字，并向英代表声明：苟非英国政府将此项军队改其方向，使趋于非中国之境域，则友仁绝不签字。同时复于答复英国劳工界电文内将此意重行声明云：敝人方竭力设法使汉口英租界得和平解决，一方顺应英人之希望，一方保持民族主义的中国尊严。惟今日英国来华海陆军队集中上海，声势汹汹，如临大敌，为鸦片战争以来所未有，此战争空气倘能立即除去，则汉案交涉即可立时结束。自此以后，双方交涉暂告停顿。

原载《国民政府行政文件集》第2辑，1929年1月出版

谈判情况的概述

就外交言，据各要人所表示，国民政府之举措，始终以民意为旨，而汉案交涉，由外长陈友仁身任其衔〔冲〕，与英参赞阿马利谈判多日，解决条件，于一月底已拟就，双方均表示同意。内容虽未宣布，但大致当为英方交出汉口英租界，改组特别区，设管理委员会。委员人选，华人四英人三，而委员主席则属华人。其他关于修订条约亦有谅解。惟英政府于谈判声中，派大批海陆军来沪。陈友仁认为迹近威吓，非国民政府所能忍受，故签订条件与否，须以英方能否中止派兵并愿否撤回军舰以为断。二月一日，陈氏在汉正式发表宣言，提出此项要求作为先决条件，谈判因而停顿。但闻阿马利致电英政府及英公使请示后，似已有变通办法，故七日起，陈、阿又续开谈判。一俟中止派兵问题商决，则汉案条件即可签字公布。武汉民众前虽提出八条件，要求政府严厉交涉，但当局斟酌环境情形，如能大体办到，则民众亦可不致发生问题。

…………

原载《申报》1927年2月18日

外交部宣布汉案交涉之经过

二月十二日英方代表阿马利至外交部，将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氏在下院演说要旨交与陈部长。该演词大意谓：“英国政府已预备接受陈友仁君代表国民政府所书面担保，对于租界及居留地之将来方针，并预备阿马利君签字于汉口、九江租界之协定。至于英国之出兵上海，或有人误会以为含有参加中国内争之意味。故英国政府为排除此种误会起见，敢明白宣言：彼对于暴徒之蠢动，军队之骚扰，或其他武力袭击时，固欲保留其权利，采取必要之手段，以保护其侨民之生命利益。但彼绝不计及思利用军队，以企图此种必要的保护以外之行为。对于中国之内争，必继续维持其严格之中立，使上述各项协定皆已签字，上述各项担保皆已承受。则除自印度出发已在赴上海途中之军队，即将在沪埠登陆外，其他队伍之调自地中海以及英国本土者，将仅在香港集中云。”昨日陈部长对英外长演说，向阿马利声明

云：二月十日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君在下院演说之词，国民政府业已知悉。张伯伦君所述关于英国武力在上海集中之原定计画〔划〕之改变，国民政府视为一种让步，此项让步，足使汉口英租界区域之协定有趋于结束与签订之可能。但英国军队在上海登陆（虽然此项军队之人数业已缩减，其目的亦已严格限定，有如英国外交部长所云），实无法律之根据，国民政府对于此种英国军队在上海公共租界之登陆与驻扎，应提出抗议。同时陈部长复声明，关于汉案之协议，乃根据汉口现在之新情形事实而定，故不能视为将来解决他处英租界或别国租界问题之前例云。

英代表谓，当将陈部长所声明各项，请示英政府办理。至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外多揣测之词，其实该协议内容不外如下：

英国当局将按照土地章程，召集纳税人年会，于三月一日开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之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在华人之新市政机关于三月一日接收以前，租界内之警察、工务及卫生事宜，由主管之中国当局办理。

英国工部局一经解散，国民政府即当依据现有特别区市政办法，组织一特别中国市政机关，按照章程管理租界区域。此项章程，将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通知英国公使，在汉口五租界合并为一区域之办法未经磋商决定以前，此项章程继续有效。

原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十）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协定及其他有关文件

一、汉案协定

英国当局将按土地章程召集纳税人年会，于三月十五日开会，届时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之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

在华人之新市政机关于三月十五日接收前，租界内之警察、工务及卫生事宜，由主管之中国当局办理。英国工部局一经解散，国民政府即当依据现有特别区市政办法，组织一特别中国市政机关，按照章程，管理租界区域。此项章程，将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通知英国公使，在汉口五租界合并为一区域之办法未经磋商决定以前，此项章程，继续有效。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名

英国驻华公使代表阿马利签名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二、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签字后之换文

（甲）英国驻华公使代表阿马利致陈部长函

外交部长钧鉴：谨启者，鄙人敬以至诚奉告左右：英国当道，对于本日签订之汉口英租界区域协定，极愿尽其能力之所及，实践并保证该项协定之施行。英国当道并承认在上述租

界区域内之华人将与英国人民享受同等的权利。专此布达，敬颂台绥。

英国驻华公使代表阿马利启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乙）外交部长复英国驻华公使代表阿马利函：

蓝浦森公使钧鉴：谨启者，接奉台函，内述“英国当道对于本日签订之汉口英租界区域协定，极愿尽其能力之所及实践并保证该项协定之施行。英国当道并承认在上述租界区域内之华人将与英国人民享受同等之权利”等因，敬谨领悉。鄙人敢掬至诚，环告左右：在中国当道方面，亦极欲尽力所及，以实践并担保本协定之施行。且承认在新区域之行政下，对于英国之利益，将不致有所歧视。专此奉复，敬颂台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启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三、国民政府对英代表宣言

国民政府宣言：关于前称汉口英租界区域之地位所协定之办法，特以该区域内新局势之事实为张本，除九江租界区域外，此种办法非图作为解决在中国他区之英租界或他国租界问题之前例。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

四、收回九江租界之协定

关于汉口租界所订之协定，将即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在最近九江之骚乱中，英国侨民若受有直接损失，凡系出自国民政府官吏之行动，或由其重大之疏忽者，国民政府允担任赔偿。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名

英国驻华公使代表阿马利签名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

五、对英代表及其他各国声明书及英代表备忘录

国民政府据各方面所得消息，觉得关乎租界以及国际居留地之问题，国民政府有及时重新声明其政策之必要，俾得免除误会，并以预防无谓之恐慌。

在一月二十二日之宣言中，国民政府曾经明白宣示其愿望，并其迅速之准备，将以谈判与协商之手段，解决国民政府与列强间之一切悬案。此项宣言，对于在华英、日、法、意、比诸国租界与其他国际居留地地位之更改，当然适用，且亦继续适用也。

此项宣言之主要意思，盖谓国民政府所采之政策，不欲使用武力，且不允许利用武力以实行更改任何或一切租界与国际居留地之地位。

此宣言中，尚有一重要之点，国民政府所欲郑重声明者：凡在华租界以及国际居留地地位之改变，关系国家至为重大，以是除国民政府本身外，一切地方当局，或其他之中国当

3

道，皆不能与有关系之列强对于上述事件有所谈判。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

六、阿马利以下列备忘录与外交部长

阿马利君受有训令，命对于陈友仁君下列宣言，加以注意：

（中略，即上项宣言全文）关于该项宣言之末段，阿马利君得有训令，称英国政府碍难允诺，不与中国任何部分之官吏磋商关于在此等官吏事实上管理下之区域中之各项事件。

高承源《广州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0年8月出版

关于九江英租界协定函件

（甲）英国公使代表阿马利来函

陈部长钧鉴：敬启者，关于上月二十日签字之九江英租界协定，经双方赓续讨论之结果，并为决定九江租界区域之将来地位起见，鄙人应致函左右声明：英国政府决定将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并自三月十五日起，将九江租界区域行政事宜，无条件的移交国民政府办理。特此布达，即颂台绥。

英国公使代表阿马利谨启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

（乙）外交部复函

阿马利代表阁下：兹接本日大函，内称关于上月二十日签字之九江英租界协定，经双方赓续讨论之结果，并为决定九江租界区域将来之地位起见，英国政府愿将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并自三月十五日起，将九江租界区域内行政事宜无条件的移交国民政府办理等因。业经知悉。此复，顺颂台绥。

外交部长陈友仁启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日

关于赔偿九江英侨损失之函件

（甲）外交部长致英国公使代表函

阿马利代表阁下：敬启者，兹遵照二月二十日双方签字之协定，特附上银额四万元之支票一纸，以清偿最近九江骚扰中英国人民所受之损失。但须约定，因为避免会同审查个人赔偿要求之迟缓及费用起见，英国当局应负责清理有关系的英国人民之赔偿要求。其清理办法将受本方面之严密审查，且赔偿损失只以二月二十日协定所规定之直接损失为限，并须约定赔偿要求之副本及其他有关系的文件，国民政府之代表有请求察视之权。该项清理赔偿要求

之后，倘尚有余，当由英国政府退还国民政府。特此奉达，即颂台绥。

外交部长陈友仁启

三月二日

（乙）英国公使代表阿马利复函

陈部长钧鉴：敬复者，顷接大函，并附下银额四万元之支票一纸，业经收到。兹将奉告左右，英国政府代表有关的英国人民接受此项支票，以清偿最近九江骚扰中英国人所受之损失。因为避免会同审查个人赔偿要求之迟缓及费用起见，英国政府当负责清理有关系的英国人民之赔偿要求。其清理办法，将受贵方面之严密审查，其赔偿损失绝对只以二月二十日所规定之直接损失为限。英国政府并承认赔偿要求之副本及其他有关系的文件，国民政府代表有察视之权。该款清理赔偿要求之后，倘尚有所余，英国政府当退还国民政府。特此布复，即颂台绥。

英国公使代表阿马利启

三月二日

关于九江河岸码头地位执照之函件

（甲）外交部长致英国公使代表函

阿马利先生阁下：敬启者，关于解决九江英租界将来地位，本日双方互换之函件，鄙人特奉告左右：主管之中国当局，将正式认可英国当局所业经发出之河岸码头地位之执照，仍以十年为期，在中国当局奉正式认可之前，该项执照亦照常有效。此达即颂台绥。

陈　友　仁　启

三月二日

（乙）英使署书记台克满复函

陈部长钧鉴：敬复者，刻接尊处日昨致阿马利君之大札，关于解决九江英租界将来地位，日昨互换之函件，称主管之中国当局将正式认可英国当局所业经发出河岸码头地位之执照，仍以十年为期，在中国当局奉正式认可之前，该项执照亦照常有效等因。业经知悉，专此布复即颂台绥。

英使署书记台克满启

三月二日

高承源：《广州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0年8月出版
（选自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

中央、区委联席会议决议

——关于停止暴动后的若干政策问题并组织特委指导工作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停止今天的暴动。

二、经过商界调和由上总发令复工。

三、对同志同工人的宣传（主要口号为准备进攻而停止）。

四、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

五、极力保持海军实力并扩大之（与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

六、扩大并充实市民公会，并宣传市民政权。

七、领导左派政策：

（一）C.P.同志在市党部积极工作，并领导左派。

（二）开始严厉打击右派如张继等。

（三）积极包围左派领袖。

八、开始组织红色恐怖。

九、整顿并发展党团与工会的组织及工作。

十、抚恤死者及救济失业者。

十一、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

组织特别军委与宣委。

特委名单：仲、农、炎、松、尹、述、恩①、璋。

军委名单：恩、顾、颐②、炎、钟。

宣委名单：尹、超③、语④、昌、伟⑤。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

① 恩即周恩来。

② 颐即颜昌颐。

③ 超即郑超麟。

④ 语即高语罕。

⑤ 伟即徐伟。

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

——关于上海总罢工、武装暴动、农民运动、上总等问题的讨论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

到会者：亦农、士炎、尊一[①]、永和[②]、文进[③]、松林、禹夫[④]、昆弟[⑤]、持民[⑥]、硕夫、佐臣[⑦]、叔平[⑧]、培生[⑨]、泽鸿、元青、徐伟。

一、选举书记组织宣传职工等及各项组织。

（一）书记：亦农

组织：士炎

职工：松林

宣传：硕夫

（二）主席团

书记

组织

宣传

职工

（三）秘书长：步先[⑩]

（四）全体区委会及扩大会、主席团会，过去区委未曾整个起作用，以后要改正。

为经常指导外埠工作起见，应常开扩大会。扩大会以全体区委及地方部委、独支及大的支部的负责同志参加之。

决：全区委会二星期一次，每三次开扩大会。

---

① 尊一即刘尊一。
② 永和即张永和。
③ 文进即谢文锦。
④ 禹夫即马禹夫。
⑤ 昆弟即张昆弟。
⑥ 持民即张持民。
⑦ 佐臣即张佐臣。
⑧ 叔平即张叔平。
⑨ 培生即杨培生。
⑩ 步先即韩步先。

主〔席〕团会：每星期二、四、六晚八时。

（五）各种委员会。

1．职工运动委员会

成伟①、立亚、松林、士炎、泊之、复他、永和、禹夫、大道②、梅坤③、叔平、元诗、伯和、C．Y．一人，士炎主任。

学生委员会：

郭子民、刘振铎、余泽鸿、陈昺德、刘尊一、刘荣简、王心远、杨振铎、黄承镜④、蒋寿田，主任：余泽鸿。

妇女运：

比难、尊一、世瑜、英如⑤、钟鉴、陈彭、叶素芳、姚云漪、李译、蔷葆⑥、亚璋⑦，主任知识尊一，女工亚璋。

军委：

汝梅、顺章⑧、梅坤，顺章主任，士炎参加。

济委：

王弼，南京杨世昌，杭州、宁波、徐州、晓先⑨、张应春、何洛、周莫英，王弼主任。

农民运动委员会：

戴盆天、曹家渡、宁波、无锡、徐州、安徽务平、如皋、泰兴、崇明、温州、江阴、（沈选）杭州、南京，主任亦农兼。（专设一秘书）（要多组织农民宣传队）

二、区代表大会后的宣传问题，此次代表大会有重大意义政治的及有许多重要决议案，所以要特别加以宣传与训练同志的工作。我意：

（一）各支部要严重讨论，特别注意于政治的与党的政策。

（二）各地方部委要召集活动分子大会，上总方面召集积极分子，区委召〔集〕活动分子会。支部开大会，并各会都要做决议案。红色月要切实做，宣传部做宣传大纲。

士：此次应说明：

（一）革命的前途，如反蒋及浙江战事等。

（二）党的各项工作。（科学化）

我们要有系统的做宣传：

（一）上部先召集活动分子会。

（二）十天内把各种记录弄好。

（三）宣传部附大纲，说明读法及设许多问题，要各支部都有文字上的答复。

（四）中央及国际报告都是大纲，我们可以先由各地方实际讨论，然后区委再专开会讨

---

① 成伟即王成伟、王承伟。

② 大道即龙大道。

③ 梅坤即徐梅坤。

④ 黄承镜即黄逸峰。

⑤ 英如即朱英如。

⑥ 蔷葆即吴蔷葆。

⑦ 亚璋即王亚璋。

⑧ 顺章即顾顺章。

⑨ 晓先即丁晓先。

论，聚合意见提出全国代表大会。总之，要有系统的做。

决：照办。

区活动分子会、知识分子〔会〕（星期五　商务宿舍）。

工人部委委员及大的支部书记（星期日杨树浦）。

职工负责同志（星期一法界）五丰里62号。

报告分政治的、党务的。

区发一通告（限令做报告，本埠三天，外埠七天）（外埠每星期一封信）。

训令红色月通告从第一号起。

三、上海问题：

（一）执行区代决议，要有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主要的总罢工，次要的武装继续。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表示民众力量，仍旧欢迎北伐军来，至于暴动中联合战线主要的为小资产阶级，现要开始准备罢工，武装技术，联合战线等详细讨论，由主席团执行，并找中央及国际的代表详细讨论。

决：赞成提交主席团讨论办理。

（二）小沙渡、闸北、南市问题：

上海暴动将到，小沙渡工人过去压迫很厉害，现在走狗刘金荣已打死，工会可以大发展。同时未来应付时局，小沙渡工人特别强悍，可大用，因此小沙渡要建立特别强健的部委组织法，部委应增加人。

暴动时南北市系中国地，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南北市部委应特别健全。

士：此问题关系目前党及时局特别严重，小沙渡只要有人就可以做。南市因过去工作太弱，所以特别困难。闸北尚无群众基础，最主要的如共和路等地方都未顾到。现在健全部委有二问题：

（一）是否马上要调动部委。

（二）三部委是否要有行动计划，区委应特别注意第一项。

昆：调动部委，要早一点去，以免临时去的人情形不熟。

决：由主席团切实办理。

四、上海附近农民问题，现在曹、法、浦、引、北都有农民，可以做农民工作，我们应特别讨论。

永：农民运动，区委应特别关于人才等问题要特别注意。在上海附近农民多非正式种稻，但如白兴斤〔北新泾〕等处，因前年遭战事影响，农民很革命。

亦：李平书有一农民会，我们要松林介绍同志与虞洽卿接头去见平书，再要市党部、工农部及曹家渡部委负责进行。

徐：C．Y．有南翔等好几处农民支部及同学。

决：找与农民有关系的同志开会议，并设法与李平书接洽。

五、上总问题：

亦：（一）健全上总问题：从复他、泊之、朝伶〔吟〕[1]被捕后，将恢复半年前状态，非立刻添人不可。

---

① 朝吟即帅朝吟。

（二）代表大会问题：在目前政局将变时，全上海要做大的宣传，所以有召集代表大会之必要，做系统宣传，同时改选新委员。

（三）划分二十三产总问题：此问题很重要，在上海变动后，各种工人都要起来，且闻傅筱庵已准备有总的黄色工会的组织，我们要特别注意。

讨论：

士：上总健全问题：

（一）注重技术人才。

（二）上总问题，多到主席团会讨论。

（三）产总方面要叔平兼任，杨部委永和去任书记，法部委调刘平衡。

决：暂照士炎办法。

陈鸿调上总任宣传工作（一星期后再调）。

代表大会缓开，在政局改变后，产总问题分廿三部份，可照办。如何划法，由职工运动详细讨论。

六、反英问题：

中央来信要我们赶快做反英运动，并有八办法。

现在英兵不断来沪，全世界已引起大问题，各国C．P．都在民众中做反抗工作，运动很大。印度、法、德、国际等共产领袖，都要来华参看，我们要发通告：

（一）学生、上总、学联、各界联合会、妇〔联〕、市党部登启事，召市民大会，散贴传单、标语。

（二）接洽商界，要他们做反英工作。

（三）各学校停课问题，由学委去进行。

（四）要各报馆工人表示停工一天。

现在蒋介石要来，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主妥协。

决：工人区举行飞行示威（经常的三天），先召集工会代表会，发宣言。

下星期一，各英厂关车（新怡和、和丰、祥生、老怡和）、电车停车五分钟。先去煽动，后到区委最后决定。

关车时要发宣言给大班及报社馆。

传单要市党部、省党部去办。商人方面要林钧去活动。最好做到各码联及南商会、妇联、各团联、店总、手总，学生要学联总、各大学同志会，上总联名登启事召市民大会，题目为上海各界发起反对英兵来华各团体联席会启事（泽鸿负责进行）。

七、反蒋问题：

此问题我们党已决定，蒋现为一切反革命派如黄郛、贺德霖等所包围，具体表现：①反对政府移汉。②要以黄郛代陈友仁，贺德霖代宋子文。③每月一千二百万军费无帐目。反工农、反C．P．与苏俄，将联合日本及张作霖对付C．P．，佐分利已与他密会，并派吴铁城去东京，此外，如庇护贪官污吏等，左派现很反对，徐谦为领袖，三月一日要先开会，蒋非消极即反叛与屈服。

我们决坚决反对，拉住左派，现在左派中如邓演达、唐生智、徐谦、宋子文等都坚决反对。四军前纯靠邓演达拉拢，现因邓反蒋，四军将离开蒋。

我们现在要给民众知道，蒋实反革命，说北伐军、国民政府很好，而蒋不好，再将蒋之

罪状宣布，特别是工人群众。宣传时，只用口头不用文字。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特委会议记录

——宣传、军事、党务情形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

到会者：老、亦、尹、松、白、子①、述、恩、士。

报告：

一、宣传工作：

尹：（一）宣传大纲——内容：总的策略以上做过三个，以后每天一期；小报每天二期，昨天起。

（二）《平民日报》——内容：社论、消息（上海、全国、国际）满地红，每期七千字。语罕、超麟负专责。

（三）快报——每天一次，昨晚今晨各出一期。

（四）新闻——每晚发稿，定名“市民通讯社”，味辛②负责。

（五）《上总日刊》——每天出版，载小论文及工人消息、会务，但因印刷困难，改出《上总通讯》，油印的，最好出铅印。

（六）市党部《国民日刊》——已要他们每天将稿送来审查。

（七）口头宣传：

1．传单队。

2．造谣队，分市民与工人二种。

困难点，技术上不灵通，出版品多，延搁很是不好，又抄写也不好。

现缺一交通，校对与发行（应自成系统）。

仲：宣传工作报告，应着重分配方法与数目影响如何各点。

白：宣委应与各方面发生关系，尤其是要参加部委会与党发生关系。

二、军事报告：

恩：海军方面——建威船已解散，因拖不出口，只留几个水手看船，内幕是为了该船群众有力，而新海军社人最多，又留一建中，无甚力量，余都调吴淞口。

陆战队有二千多，川沙方面有一千多人到，已派人调查。

---

① 子即肖子章。

② 味辛即何味辛。

杨树庄要郭有亨〔恒〕到九江接洽党务，且可将来指挥海军，郭只好前去。

军委决定：要杨尽量想法去见杨树庄。今天不能去，明天再想法。如再不成功，只好到九江，不但见蒋，且要与国民政府发生关系。

南京有永济舰来电对上海海军很表同情。我们决定：不但用公开的信给杨树庄，且要加紧社〔新〕海军社运动。

告平民书，要他们无论如何要印发。

建威解散的人有三十余，新海军社占十五六人。

仲：我们要设法使这些人加入C．P．，要切实招待，第一步加入新海军社。

亦：海军以后要开放门户，这次即为开放门户之结果。

陆军方面：今晨消息，党军今晨五时到松江，联军集中明星桥，党军人数有一万五千，交通只能到梅家弄，溃兵已退回很多，明星桥与松江间是否有战，不可必〔知〕。

西路已到宜兴说，未见确实，而是党军已到长兴，准备攻宜兴，与苏州尚隔一太湖。

前敌溃来的兵，除松江方面外，宁波也退来很多。

李宝章部队，闸北已与毕庶澄兵冲突，实则因毕军到二营，一时断绝交通，致有此误传，惟李宝章的兵，在闸北已完全退出，所有湖州会馆等重要地方都让给毕军。

毕军部下也很动摇，其兵士曾向李部下说党军快到，我们快要跑了。

兵工厂内有机关枪连。

毕庶澄来的兵有二种，一为陆战队一千多人，一为陆军二千余人，至于毕将退浦口说，恐不确。

孙传芳预备跑日本，与昨天消息相同。

保卫团方面——南市由民左主持，有一百八十人随时与我们可以合作。闸北曾与李军冲突，被捕四人，因此很怕，把枪收起，不敢出来，只商务有三十余，内十七个同志，我们预备临时借用。

吴淞保卫团，今已派人去打听。英国兵舰重要的只有四条，其布置比较严密。中国及印度巡捕都不发枪，租界防备很严，不许鲁军闯入。

仲：今闻帝国主义已在樊〔梵〕皇渡缴孙传芳溃兵械五十余。

恩：组织上，自卫团五百可以达到，纠察五千尚难办到，技术预备小、曹、杨较好。

交通方面已弄好，每区域必派一交通，运输很便。

东西已买到五十个，明天可以再买。

东西的分配，罢工一开始，即以自卫团手溜〔榴〕弹队在前面，就一路到曹家渡樊〔梵〕皇渡依次到闸北缴溃兵的械。南市、浦东各自做。

关于训练方面，已发大纲及口头宣传。

今天决定：

（一）政治趋势，北伐军到得很快，即可压退毕庶澄，于我们很有利，我们要注重打听消息。

（二）北伐军来得慢，毕庶澄可守住上海，我们只好做后方扰乱工作，比较要迟缓而困难一点。因此，从明天起，要去参加各自卫队群众的会议。

特别队——闸北、浦东、南市都有组织，人数达六百，中有曾在兵营中人，对于缴械，较有把握。

仲：将来的问题，特别队究竟属于那方面，应有规定。

恩：特别队可并在纠察队，自卫队现正在做红色恐怖，将来属总工会。

仲：将来这些小组织，都要编入纠察队，以免紊乱，甚至于我只有武装不要队员。

三、党务与政治报告：

亦：今晨与钮谈，钮主要意思，现在局面为包围政策，他给计划书给蒋介石，主包抄上海与南京。对于上海，主要联合一起做，不要无谓牺牲。李宝章，他说如投降没有出路。他最后说我们做事应讲信用，同时拿出投降〔书〕给李宝章与国民政府。其条件：（一）要他首先说，表明态度。（二）开战时，可发军费等各条。我说李投降，群众反对如何。他说可以提条件。

后松林说李靠不住，应先要他开始攻打毕庶澄，才许其自新。

仲：此为老钮想拉到李宝章，自扩充地盘。

据钮说只把李部下兵士运动好，即可打倒李宝章。

最后讨论上海问题，他问何时发动，我们并未具体与他说患〔定〕。

他说过去有许多误会，以后即叫我与松林及他解决一切。每晨七时开会，最后决定要动，每天三方面讨论进行。

关于军事消息，他有许〔多〕书面报告，说张宗昌军队向浦口退。毕庶澄部下可以活动。

大资产阶级，虞很不满意于我们把他的名单（革命委员会）发表。小商人都害怕。商总联会说此次不罢市，是学联不发标语所致。

川沙确有军队开到，大概即为陆战队。

市党部机关无定，已要他们于今天召执行委员会恢复机关。左派王、史等对我们表同情，而骂杨杏佛、钮惕生右倾。

商人方面，已要林钧去活动，大概可组织三、四十人。

学生会因C.Y.枢开代表会，无人做事，宣传队可组织一百队。

妇女有二十人每天开会，做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等工作。

普通群众心理，我们同志及市党部一部分分子很恐慌，实际是他们自己扰攘，实在很不好。

党的工作，今天部委报告比昨天较好，但仍不见十分积极。负责同志太害怕，同时疲软得很，不积极去工作。小沙渡余立亚工作较好。

今天告诉他们做群众夺取武装，群众的市民代表大会等，后天无论如何要开成会。每工厂都要组宣传队、交通队。宣传大纲，有印发一千五百份者。部委活动分子会，杨树浦、引翔港、南市、闸北、曹家渡都已开过。

现在状况，部委同志落伍，愈老而地位愈高的更坏，群众是很好的，党不成问题，只是这批分子不好，中间隔住。——仲：部委可以改选几个——。知识分子表现也很可笑，上海大学有五十余同志，只三个同志来找党。支部书记今天始来，并要求枢蔚津贴他们的生活。——仲：可选送较好的到杭州工作。

四、工会情形：

松：今天又开各产总会，据报告，昨天各工会并没有开会，只是很小的开一部分，工会

尚在极少数人的活动中，并没有到下级干部领袖中，因此有许多宣传不能深入群众，传达队未能切实组好。

店总今天勉强恢复，今天下午五时集会，未知成功否。

补救的方法，靠现有各产总主任与组织员很难有效，因都麻乏〔烦〕得很，所报告的消息，都靠不住，在这样形势之下，只开高级会议是不够的。今天想一特别方法，每一工会的重要活动分子调出二人，召集开会，不知能否有效。宣传方面，已出一《上总通讯》，刊物很难办起。——仲：《上总通讯》可以的，不必一定要日刊。——份数印五百，只分配给工人领袖。——仲：要在各厂中都发现此项通讯。——白：如有人把通讯材料〔拿〕到工厂中去口头宣传最好。

店总已派周湘、郭景仁、陈铁梅下去工作，对于四大公司失业的店员，都暂时在店总工作，以安慰群众心理，大约可召集到十余人。店总原委员十七人，实际存在者只一二人。总之，店总在政局未变前很难活动。

明天罢工一小时问题，今天估计把握很小，邮务可以挽回，电车恐不成功，因他们很怕，原因是我们没有人在那里工作。法商电车较好，惟群众反对领袖，因领袖很有与杜月笙等妥协倾向。第二次罢工，要号召方法好，仍可召集一部分。至于明天罢工一小时恐做不到，实对帝国主义示弱，显见我们在总罢工中受了损失，我意如果明天做不好，索性在报上不发表。

士：明天罢工是有的，如纱厂、邮务、印刷、商务都有可能，只是电车困难，烟厂也可以。

士：党与工会的方面：

据今天下午看到情形较好。总之，在政治局面改变后，仍可号召，如在继续压迫中，则工会至多只有一万人力量。其原因是上总没有好的人才去督促，大道与朝伶〔吟〕、叔平不得中层领袖的信仰。第二原因是工会的宣传比党迟慢，所以群众很散慢〔漫〕，有许多群众都在盼望上总消息。有几个同志如王荃连人都找不到，非常不好。

我想在党的工作上，从现在起要找〔抓〕得再紧一点，且要直接去找支部群众。今天我在小沙渡开会，到三十余人，兴趣非常高昂。最后决议第二次罢工，不准留下一厂。南市本很懦弱，今天电车、地毯等各工人都到，精神非常之好，他们提出很实际的问题，研究费许多时间，电车决定明天打走狗，且决定第二次总罢工，可有把握，提出几个宣传的要点，他们决定今晚再开支部会，作更切实的决定。杨、小、南都有宣传队，如果第二次命令下来，立刻由宣传队到各工厂宣传。

我想党的方面已抓得很紧，工会方面也要照样去抓，要每天去开会，报告消息。

下午我又去开邮电部会，王克全已出来，要上大学生某任内部工作，勉强可以支持，所困难的只有英界电车及新厂电器工人，余无问题，最好的为老厂电器。

部委因枢蔚天天抓得很紧，所以只是很机械的执行，不能自动，如能去帮助他，就可活动一点。总之，在党与工会方面，经过这次运动后，假使党与工会能抓得很紧，前途仍可挽回与维持。尤其是上面同志，能与下面接触，抓住下部群众。

还有一点，这几天用钱最多，而工作很少，是很不好的现象。

群众的夺取武装。

群众的市民会议。

这二个口号，无甚问题，惟群众的小政府问题，尚多未明了者。

士：在政治上，我说明蒋介石对于工人的态度，工人都知道非工人先干不可，群众实有许多好的现象，很勇敢，很明了。

讨论：

（一）明天集中邮电工作（党与工会）。

（二）注重小会议。

（三）罢工问题，罢工命令要预备好，如果上总方面得很逼近的消息。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特委会议记录

——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指挥人员及市民会议、市政府名单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晚九时）

到会者：仲、述、璋、亦、一、尹、伟、士。

亦农：今晨开党团书记会，知二消息，一吴、杨、钮开会。吴说C.P.对于市民会议是表现造反，说民选市政府为脱离国民政府。又汤济沧从杭州来信，说何应钦到上海要改组市党部。又汉口市党部、湖北省党部通电反蒋。现决要市党部赶快发表他们的文电，明天开执委会力争市民会议，省党部速去调张曙时、朱季洵回来。

学生无甚报告，商人方面今天已请吃饭。李次山、孟心史等已来问市民会议组织法，足见已引起社会注意。

党的会，工作很紧张，店员、邮电成问题。

今晨得到杭州消息，已告诉他们几点：

一、上海工人阶级尚不能纯来做政治运动，所以要做市民会议问题。

二、发展左派。

三、用非常手段把上海市民会议组织好，所有工会二天内公开机关，选好执行委员会。

今天去找杨杏佛、钮惕生，在未找他们以前，闸北火车站兵都往苏州开。后因杨、吴找不到而去找钮，吴也来了，绍裘也来了。吴稚晖首先对我态度很好，我就给仲甫信他看，吴说我们主张也如此。钮看信后也说无不同意思。杨杏佛来了看信也说很对。吴说从前确有误会，我们以为C.P.的民众仍有强奸气，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对于暴动，他们觉可不必徒然牺牲。我说要协商一切，他们很注重此二字，钮说人家谣言开炮是对我，因炮向法界开，蒋介石本革命的，但旁边有人挑拨，他说C.P.也有人挑拨。我解释挑拨之多。由于革命进展，吴稚晖又出《平民日报》是政权问题，惟暴动工党太激烈，C.P.的意见已清楚了，钮也说杀反动派口号太激烈，后分二点讨论：

一、为市民政府问题，他们都说可以赞成，惟人选要规定。杨杏佛说要按照区域、按照职业；吴说召集一会议来解决；钮说C.P.应参加。我问可否以市民公会明天就召集会议，推出代表，打电给汉口及蒋总司令。吴说这样近于御用。钮说我们自己分配好，C.P.与国民党占多数。我又主由市民公会召集代表会议，推出代表。钮主60，我说要少。他说十五个。钮说由国民党与C.P.定名单。他们要我定名单，决明天下午二时召集临时会，钮说要我与汪寿华为顾问，有表决权。

二、暴动问题，吴说什么目的，钮说李宝章已退南通，毕退苏州，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且说工人武装是应当的，但不要徒然牺牲。杨杏佛说是否流氓要乘时捣乱，钮说

当然不免。杨说工人武器很弱，如牺牲，则将来北伐军一来，原气消损，就无事可做了，因为我们还要与帝国主义反抗。我说工人暴动，是为北伐军来，为防止抢劫，现在工人情绪很高，未便抑遏。后提出总罢工，他们都赞成，罢工欢迎北伐军，罢工维持上海治安，罢工防止抢劫，他们都赞成。我就说与工会负责人去设法，后我告以仲甫去谈。他们说最好赶快谈一谈。总结今天接谈，解释许多误会，吴稚晖也不再放大炮了。

仲：市民大会选举，要在北伐军来后，至少要有千余人的代表大会才好通过名单，终要每个工厂及商人团体都参加。

松林：我今天见钮，他说可以同意于民选政府，他们说明天下半天讨论，他说民选市政府近乎滑稽，但借此训练民众也好的。对于沪宁路罢工说确为人民表示力量，对总罢工不甚表示意见。

今天上总开邮电代表会，法捕房、华英捕房都知道了，逼法捕房取缔，说上总明天要总罢工，他们拿到一张传单，是南市部委出的，中有赶跑外国兵及暴动的口号，法捕房很误会，就不准开会。后我答应由上总具函英法捕房说这次上海工人行动于英法租界无碍。同时，他们有一军事会议，已把龙华、南市、闸北地图都画好，运来新式炸弹，遇必要时就对华界开炮能自发火。杜月笙来关照，劝我们不要这样做。

军事消息，捕房方面说党军已攻苏州城，沪宁路有好几处电线割断，锣〔螺〕丝去掉，但即修好。李宝章确已投降，警察也投降。毕庶澄早晨消息，兵开苏州。现上海统有鲁军二千，今晚毕庶澄招待各报馆记者。苏州有二团兵投降，开到吴江前线投降。宜兴也有二团投降，是陈俊义部下。鲁军在松江有二团。南京非常震动。

工会方面，水电代表会经再三商量，仍开成，七点钟到七十余人，七点四十余分钟即散会。对于第二次罢工，大家决要坚决，甚有认第一次罢工是由电车破坏。关于汉口及市民会议，都说明了一下，大家很感动。此外决定：一、总同盟罢工，已先分送。二、以上总名义写信给各厂家要他们谅解。三、小沙渡工人代表改组为各工会联合会，派代表对日厂家提前〔出〕所定四条件。又召集工头会议，要他们帮助罢工。曹家渡较弱，引翔港也派代表与日厂家磋商，不压止罢工。店员今天预备组五大公司组联席会议，使之一致行动。余为估衣、南货业等。决集中全力于大店，以影响小店。手工业要组传达队二百人。海员招商局可以解决，条件和我们最初所提一样，已向厂方借船一艘，以便举行庆祝。杨树浦等处，对于工贼流氓已预备找他们，告以如不反动，就可不对付。

工会发展，金属业已增八厂。丝厂已设法与丝茧公所接洽，要做到如上次一样的自动罢工。

仲：要赶快预备组织员，一罢工立即组织工会，推执行委员会，组织员要预备二百人。

松林：工团联合会内部已冲突，国民党右派张继与邹鲁几乎用

仲：国民党会议时，要提出反对西山会议派，因江维藩等已在活动。

手枪相打。因《江南晚报》受江维藩等经〔津〕贴，江为组织国民党本部者，而张继不赞成受本部经〔津〕贴，以致决烈〔裂〕。工团联合会是程小青他们做的。现上总已致函各报馆，不要随便登非正式的工会消息，以免工人误会。

恩来：军事消息，松江鲁军要退军，来电要龙头，四点半已开去二个，足证鲁军确在退走。今晨北站及苏州河孟昭月军队已开南京及出海口。此外，吴淞开二次车，载来鲁〔军〕二千，预备撤回，原因是苏州吃紧，早晨北站只一千兵，下午从吴淞来二千，此兵不知为何停

止，关系我们明天动作有关系，也许今晚已开走。南市老营盘的兵、兵工厂的炮，都在往北站运。海军，南京的都已调到吴淞，陆战队电报，今天才打。

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分五区，引翔港〔管〕靶子场东，杨树浦管靶子路以上，闸北管五区湖州会馆等，小沙渡管四区警署从麦根路来，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做破坏铁路运动，合起来，如果明天无甚兵队，就集中青云路开会，如有兵就在火车站以北开会，使兵参加。南市只做骚扰工作。兵工厂有四机关枪连，有人活动，可响应攻龙华，否则，就逼之投降，同时去攻警察厅。如果上海明天无兵力，就在开市民大会后，自卫团等就去拆断梵皇渡等处铁道，使鲁军不能从松江调回。自卫团已组七百，别动队一百八十，浦东已有接洽，有几县保卫团愿响应。器具今天下午收到一万三千款，明天预备去购买，炸弹也要明晨接头。如果明天发动，衹少要预备三千元，尚无着落。此外，指挥人才应分南、北市。

士炎：我提议今天讨论集中市民会议及暴动问题，又明天必要开二种会。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

铁路工作，吴淞罢工情形很好，北车站龙头部工人已骚动起来，但未罢下，破坏工作已出发三处，大概终有几处发生效力。

讨论暴动问题：

仲：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

述：太迟缓，我意苏州下或松江下，必要动。因为苏州一下。他必无力顾后路。

仲：我们武力薄弱，鲁军作兴索性蛮动一下。

恩：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我意要集中在明天鲁军是否集中苏州而放弃松江与上海问题上讨论。

仲：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农：指挥机关要统一。

士：负紧要责任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次要的同志，主要的同志经常聚在一块。

农：中央要有一个马上找得到的地点，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指挥处白天此地，晚上在述家。人数区委负责同志及中局负责同志，定期到的时间为七点、十二点，紧急时亦、恩、松、独。

群众集中地：北火车站后面，罢工命令可以不改，但上总要赶发一详细路线通告。

杨、引、小、曹、北都在闸北；南市、法界〔在〕南市体育场；浦东在浦东胡家厅；余如虹口、店员等都在闸北，店员须绕道北四川路到北车站。

指挥人：闸北：士炎、顺章。南市：恩来、梅坤，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禹夫、中华、良为。

工会与党的人员分配：

士炎：上海工会工作，可调胡禹民或笃实。党的工作应加入，我意一飞来做宣传工作。

仲：胡禹民武笃实可调一人，松林仍参加主席团——松、顺章、泊之、复他、笃实。

党的方面：士炎代理书记，亦农参加政治，同时参加主席团，再加派一飞。

暂时决定如上（看这次行动胜负如何，再作最后决定了）。

市政府问题：

仲：代表人数，祇少一千人，工人占一半。

工人名单由上总负责，学生由学联负责，我们的要先选好。临时把名单经群众通过，学生一百人，商人二百人，自由职业者一百人，工人与学生要注意妇女与青年。

发号司〔施〕令，要市民公会出面，所以要特别在事前拉住市民公会。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可多预备候补的，军人只限于军队。

恩：群众大会，要预备宣言，打电国全〔民〕政府及蒋总司令。

名单十五人：

市党部　杨杏佛，

商界　虞洽卿，

省党部　侯绍裘，

商界　王晓籁，

政治会　吴稚晖，

国民政府　钮惕生，

小商人　余化龙，

C.P.　罗亦农，

学生　刘荣简，

工会　汪寿华，

自由职业者　谢福生，

大学教授　李石岑，

店员　顾顺章，

军人　何应钦，

手工业　王成伟，

军事　钮惕生，司法　谢福生，

教育　李石岑，公安　周孝恭，

外交　虞洽卿，劳动　汪寿华，

财政　王晓籁，建设　杨杏佛，

秘书长：丁晓先，

主席：钮惕生，

预备：张曙时　侯绍裘。

在群众大会后，临时政府未成立前，〔以〕上海总工会名义出布告维持秩序。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记录

——罗亦农下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半）

全体都到。

农：此刻是下预备动员令。

军事方面，吴江、宜兴已下，苏、常、宁、松旦夕可下。区委本决定，只要苏或常一下即动作。我们动作的目的，是夺取民众政权，工人要得到武装。毕庶澄投降困难，条件太大，但他尚有几千兵，我们不能抵御。所以，现在决定要苏州及松江下后再动作。总罢工已得政治分会的同意，可以没有阻碍。今天市代会执委会要通过全市总罢工、总罢市的提案。所以，现在各部委、各产总的人都要辛苦点，今晚十一时及明早六时等命令。

明天下午二时开市民代表会议，代表绝对要到。正午十二时上总开预备会，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的同志代表和工人代表务必要到，通过名单，备二时正选举临时市政府。

罢工工作，水邮电最要紧，要随时可罢。罢工后绝对要跑到街市上来。

宣传工作，按照区委所决定的大纲派宣传队去街市上及各种群众中讲演。各部委要于罢工后随时派交通队来区委听消息，以备向群众宣传。

动作胜利后，即开全市市民大会。

行动大纲（另录）。

炎：群众所走的路线，各部委、各产总都要绝对注意。罢工令最怕是正午十二时下，水邮电要成问题，所以要特别准备。今晚无罢工令，明早八时在此开会。中、租界交通断后，租在恒丰里接洽，中在福源里。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

——各部委报告武装起义的经过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2

沪西：打的时候，群众散了，未受大损失。我们的同〔志〕与纠察队在前面打，一切机关都是我们打下来了的，枪支缴得不少；但指挥不好，只知前进，不知守住机关、器械，故被右派得了现成便宜。最后，右派又借我们无符号，恐吓我们要枪支，又被他们骗去了不少。最后我听见这个消息，便跑到前敌，召集未被缴械的三百余人，马上买布发符号，适接闸北来信要调人，我就领着这三百人打到闸北，至北站遇党军到了，遂由①

海员：两点钟以后南市海员集中高昌庙兵工厂。闸北的海员因通不过租界，未能得到闸北。浦东的海员起来缴械，共只得到十三支枪。罢工人数二千余人。

手总：罢工以后我们在闸北，其他指挥人亦〔在〕闸北，故南市未能指挥，缴了十三支枪。会所拟设在闸北。杨树浦缴的枪被杨树浦拿去了。一共有七十余支枪，和许多子弹，第一批枪被拿去不少，第二批还保存着。

公共：到晚上，各业工人才完全罢工。共计有二万八千人。群众的组织还好，昨天银行职工会已成立，食业工人已起。同志的发展，先施、永安、大东等都有发展。

浦东：原定一时半罢工，但未到一时半都罢下来了，并开始军事行动。因人数太多，欠秩序；缴的械都很分散。大会未开好；昨天又开大会。小轮驳帮助摆渡，但要煤钱。纠察队维持得很好，没有抢劫的事。指挥得不好，许多乱七八糟的司令、指挥都来接洽，骗枪械。罢工人完全在街市上。组织部工作不好，致对于一般右派流氓，不能应付。罢工人数三万，缴了一百二十支枪。

法界：罢工人数三千余人，有组织的一千五百人，要求组织的八百人，是十几个小厂。纠察队都在上总，缴的械亦在上总。自卫团缴了四十支长枪，一个〔挺〕机关枪，他们搬到南洋大学去了，现在还不知拿出来了没有，右派极想骗去。学生都在演讲；捕房总想加点压迫，但群众不怕。今天的市民大会可到。法界预备开一个华法区区民大会。同志增加二十余人。

印总：罢工人数一万以上，有无组织的，现在预备组织起来。缴了几支枪都丢失了。萃英工会纠察队缴了流氓的几枝枪，在天宝里与鲁军相拒，后党军来了，遂缴了他们的械，但

① 原文如此。

都被党军拿去了。

金总：罢工人数有三千四百余人，群众无法集合，因在大英地界，每天能集合的只五百人，群众心里很激昂。先被捕房捕了几人，后要出来了。我们缴的枪，都被商合会（红帮）拿去了，现预备去缴回来。指挥太少，秩序很坏。

南市：我昨天才到那里，情形很好：枪械，五百多支步枪，盒子炮、机关枪都有。下午开群众大会。立刻将上部的组织整顿好了，又整顿下部的组织。下午又到龙华去接党军。后得信，夜晚右派要解决我们，我们遂用汽车放步哨，并破获右派机关一，捕了二十九人，一个大流氓。宣传方面，所有右派的布告都撕了，贴上总工会的布告。下部现正在改编。昨晚开党务会议，讨论器械集中问题，现已经将好的枪械埋起来了。昨晚又捉了三个人，右派的，尚有三个盒子炮。捕来的人拷供，供出他们的人和机关。右派及流氓因无发展的余地，故发生抢劫的事。高昌庙兵工厂、龙华子弹厂及造船厂的工人因受压迫太大，不知此次运动的意义。反动派亦想拉工人，故决定立刻成立工会，并解决几个走狗。传单已尽量的印了。现在要若飞负责整理一个有系统的报告。有一个小银行，是傅筱庵的，现已封了。南市现在成了军事热，群众不知自己的工作。故现在立刻整顿并组织工会。今天演讲队、慰劳队今天〔今天二字系衍文〕都出发。

吴淞：罢工后开市民大会，缴了四十多支枪。

松林：现在政治问题很重要，昨天的十九人是否能全就职还是问题，现已去接洽。

昨见白崇禧，已决定与工会解决一切武装，所以各工会的武装纠察队都要在工会旗帜之下。对市政府问题，他不置可否，主席他要我们去劝钮出来。

亦农：此次运动是胜利了，但我们一审查，最大的错误，就是手忙脚乱。现在绝对要冷静，今天具体的工作：

一、各工会一律公关〔开〕，机关不要在公共机关，要在逆产的房屋及坏的慈善机关。

二、器械要集中，各区在各区收藏，租界的搬到闸北。

三、慰劳队要出发，上总要特别慰劳白崇禧。

四、各区运动的经过要做成很详细新闻发出。

五、公开宣传C．P．。

（选自《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复工通知及宣传要点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时）

各部委、各产总主任：

上海特别市市政府临时会议已承认上海总工会所提出的全上海工人总要求二十二条，我们这次运动可以暂告一个段落。现在区委决定明天上午十时各工厂须一律复工。复工的宣传要点是：

（一）此次运动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很多，终算得到相当的胜利；

（二）上海特别市市政府临时会议已承认上海总工会所提全上海工人的总要求，是工人们牺牲血肉的结果；

（三）此后我们的工作：（1）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2）继续为谋本阶级利益而奋斗；（3）提高本阶级的政治地位；（4）与全上海市民一致合作做收回租界的工作。

以上各点，务须迅速执行，至要！

（选自《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全国政治军事现状的分析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罗亦农同志在上海活动分子会时的报告

目前全国政治局面，确已入于革命潮流高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由来当然为北伐军战事胜利的结果。因北伐军的胜利全国各阶级无论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很明显的各自表示其态度，各军阀领袖也都感觉不安想为最后之挣扎。综观各方面现状可分四点说：

（一）北伐军方面：北伐军现有地域已占全国二分之一，计两广、两湖、江西、福建、贵州及云南，四川之一部分，都已入其版图，此如浙江等地。照目前形势也将为北伐军所得，惟究竟：（1）北伐军是否可以即继续为反奉战争而取得最后胜利统一中国？（2）北伐军在目前将如何巩固其已之地盘，而从事于军事和政治的建设？实为目前最严重要的问题。

北伐军既由两广而两湖，而江西福建，并可发展到四川、贵州、云南实为莫大之成功，但自江西战后，损失甚大，嫡系兵士损失80％下级干部死60％，团长50％，虽有许多俘虏尚待，从事整理与训练，因此，北伐军在目前不宜再有战争。

同时东北方面还有奉鲁军之威吓，由于各方面的关系或许难免与北伐军接触，因此，北伐军对于军事上的补忘实在非常迫切。

此外北伐军对鄂西方面正在作肃清直系小军阀的战争，如果真告成功，可使四川发生很大的影响。贵州方面袁祖铭方面得着援助也就可以把贵州问题全部解决，云南唐继尧地位也很危险，其部下都反对他，如果北伐军能够解决四川与贵州，云南问题也必随带可以解决。

至于北伐军对长江下游及河南问题的策略也很关重要，惟照目前北伐军的实力及国际间奉鲁间各方面关系看来北伐最好的方策在使河南与江浙皖三区间构造成一个缓冲的局面，决不宜有用武力解决之野心。

再从民意一方面看来北伐军所得地盘既已很大，举凡一切政治上的设施都应赶快有一好好的安排，否则内部纷乱即足以影响对外的发展。

总之我们依据各方面的情形分析对于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纳起来如下：（1）北伐军在目前宜极力在既得地盘内从事于军事与政治的建设，准备第二次反奉战争；（2）在东南及河南方面宜创造一缓冲的局面，以便乘间休养。

（二）西北军方面：目前中国革命第二个军事力量就是西北军，西北军从冯玉祥回国后，已有中心的领导人物，且冯个人的态度非常积极而左倾，内部团结也渐巩固，实际兵力尚有十余万（能战的有七万余），惟其目前最重要的出路在与北伐军联成一气，否则自己有崩溃的可能。因为西北军处此内外交迫的境地，实在很难支持。

现在西北军已攻出潼关，进据灵宝，如能占据洛阳则可保持其陕西之势力，同时闻西北军已集中三分之二的兵力于陕南思图经过鄂西与北伐军联成一气，果如此则北伐军与西北军

共同准备反奉战争中国革命前途殊可乐观。

（三）奉鲁情形：在反动势力方面之最大者，当然要算奉鲁军，可是奉鲁军内部也非常复杂极不一致，其大概分派固为奉军张学良，杨宇廷、韩麟春等之鲁军张宗昌，完全在互相嫉视与牵制的状态中，而奉军与鲁军之二派内部也各有派系，如奉军内部则有张学良杨宇廷之新派，吕俊升等之旧派，如此中又有亲日亲英亲美之不同。鲁军内部则有张宗昌派有褚玉璞派。因此种种他们的行动也不能一致，过去他们的策略，在孙传芳九江败退后，鲁张即极端正张南下取得苏皖，更进一步与北伐军决一雌雄。这完全是张宗昌原有地盘太过狭小，历受奉方种种压制不能使他稍有发展，想借此大大扩充其势力，而吐其数年来抑郁之气，独树一帜。同时张作霖因欲实现其总统之好梦，且鉴于西北军之日益壮大不能不对鲁军有所妥协而减轻其肘腋之患。不料杨宇廷到津后，此计乃不能不改变过来。因为杨之观察比较精密，他鉴于（1）国外则日本帝国主义又屡次阻止奉鲁军南下之政策，且表示将不愿再作实力之援助；（2）在国内西北方面西北军之威吓，河南及东南方面则吴佩孚部下有与北伐军合作之可能，孙传芳部下也各表示与奉军合作，奉鲁军如果悍然不顾势必先与这许多反奉军队接战，则使胜利也必受很大的损失，何能再与西北军北伐军决胜负呢？因此奉鲁军虽各抱野心，但为环境所迫，只好暂时的一致依照下列策略共同进行：

1、暂不与北伐军直接发生冲突，从事予发展和巩固在大江及黄河以北的势力；

2、迫令阎锡山商农驱逐西北军；

3、取得绥远占领京绥路，使西北军不能从后方直捣奉军；

4、不使西北军在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阴谋破坏田维勤、魏益三、靳云鹗与北伐军之接近，因此集中大兵于徐州，严重戒备。

奉鲁军这样一致的策略确为有利的，但同时北伐军方面也就可以乘机造成河南与长江下游之缓冲局面，未始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孙传芳情形：孙传芳这次所以能够回南并不是他的实力关系，孙这次到津，完全被奉鲁军软禁起来，他数次图逃都被觉察，他之所以回南，完全是奉方因恐孙之不回，会促起下游各小军阀之反奉乃不得已放他回来。

孙传芳现有兵力实际不过二万，他的死党只有孟昭同一旅军队尚可一战，解如卢香亭等则皆精萃丧亡，毫无战斗能力，至于冯绍闵白宝山且有捣孙的危险，孙传芳目前冀图：

1、使苏南皖北及全浙地盘完全稳固，如果做不到，则

2、退守苏常，淞沪及浙江。

现在正为此冀图向各方面活动，对外希望任何一方不向他进攻，对内则以提升官职尽力联络部下，同时向日本购买大批军械，并在所属区域内拼命搜括金钱，以备将来休养充实再图向外发展。

不过孙传芳此种冀图之可能性完全关系于浙江，或竟为北伐军所得，则孙最后地步已全消失，全盘计划都将动摇，但目前浙江尚难以武力解决，只可以武力威吓，帮助周风岐等独立，北伐军如果必须以武力解决，也非在四五星期后闽方何应钦军开到不可，孙传芳看这一点，所以用很狡猾的态度对付浙江，只许浙江自治不许党军入浙，因他这样他的最忠实的走狗仍可操纵浙江政局，事实上无疑仍为孙传芳所统治。

至于吴佩孚现在确已不成势力，其部下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等与北伐军确有关系。二星期前吴曾委靳出兵攻打北伐军，靳即通电说明其军队实不能应战，有有每兵只子弹七八

粒无能作战遵语，足见目前吴已失掉对部下的指挥力。

总观各方面军事性情况中国目前革命的军事力量确已日趋稳定，此后且将益发开展，而反动的军阀力量，则已在自己崩溃，因此民众是革命潮流自然要日益高涨起来，这实是我们值得乐观的。

（五）帝国主义的态度。在此国内革命潮流高涨的时期，对于帝国主义的影响当然很大，他们目前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大可注意。他们一向认中国革命运动为赤化运动，认中国革命政府为赤化政府，现鉴于中国革命的飞涨突进，已经感觉到决不能再用造谣离间及武力压迫所能遏抑，又因他们各国间的利害关系并不一致，国内民众之不能赞同，尤其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受自由党、工党二党的攻击非常利害，所以已改变其态度，最主要的英帝国主义也不敢纯靠其武力干涉，而将与国民政府表示好感与联络，最近新派来华的英国公使闻已受本国政府之使命将与国民政府非正式的谈判与联络，同时英帝国主义当然仍有他的阴谋与破坏，在目前他们想拉住张宗昌，并帮助孙传芳势力之恢复，乘北伐军久战疲劳之际猛烈的加以攻击，以冀消灭北伐军在长江一带之势力，其计不可谓不毒。

日本态度更是狡猾，他们在民众面前表示假意的好感，在政治上军事上则想拉国民党及北伐军在他影响之下，国民党右派之按月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领薪水的达四十人之多，所以右派在汉口重庆及其他各地设立俱乐部等反动机关都由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经费，此种阴谋实在非常危险。

美国因在华利益没有象日英两国之浩大，且想乘此获得华人之同情，以便与英日帝国主义为资本侵略之竞争，所以他们早想承认南方政府，但因各方面尚多顾虑未实现。

总之目前各帝国主义对华之态度，确已逐渐减少其反动与压迫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运动不仅在国内有很大意义，对于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实足发生很大的影响。

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之危机及其矛盾性。

中国革命运动目前虽在大大的发展，但同时就伏着许多危机及其矛盾性。

（1）改良的资产阶级之觉悟和其运动的发展。革命之流之日益高涨，各阶级的力量，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却各渐次的尽量的表现出来，因此一般改良的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都感到政治工作的重要，都想运用力量影响于政治，这种现象民族革命的意义及产业落后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上都有很大的意义。但现在中国一般的资产阶级的领袖还没有彻底明了中国民族革命的意义及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各阶级的关系，只是逐逐于眼前的私人利益，就会破坏了整个的革命事业。这次汉口的资产阶级感于工人势力之澎涨，工潮不断发生，就在汉口总商会召集一次资产阶级的大会，到会人数仅达数万，为中国从未有的清一色的资产阶级会议，他们在这会议中公然通过工人工作时间应以习惯法，以进退工人听厂主自由等，完全对工人采取压迫手段之议案，并以罢市要狭政府执行此项决议案。虽然汉口资产阶级此项行动，后面仍不免有帝国主义日本人作把戏，但也可见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程度的提高与其政治活动之积极。

上海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固在尽力的运动上海市自治之实现，想在市政府组织成立后握到一部分甚至全部分的政治实权，因此不得不与工人群众取合作的态度，想借助工人的力量，达到其政治的成功，但同时他们已开始忧虑工人势力在自治实现后的勃兴将予他们以不利，所以他们已提出要组织劳资仲裁机关，无形中表示不许上海工人有与汉口，广东工人同样之行动，这都是以表示中国资产阶级力量之日益壮大，但太重视本身利益不懂革命团结之重要，

结果就会破坏整个的革命。这是第一个危机及其矛盾。

（2）地主土豪劣绅之不能消灭。中国目前民众革命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发展，还只集中在城市方面，没有普及于乡村，因此在城市方面虽已收到相当革命的效果，但乡村间仍布满地主劣绅土豪之势力，同时一大部分的统治者，还离不了贪官与污吏，他们就可以与地主土豪劣绅勾结一起来压迫工农。广东湖南都有此种现象之发生。湖南方面竟发生劣绅枪毙农民领袖之惨剧。因此中国革命之前途在农民运动还未特别发生以前，这些地主劣绅土豪都可以摧残革命破坏革命。

（3）国民党左派尚没有深厚群众基础之右倾性。目前国民党左派只是以其浪漫的民族革命性的发展，在革命势力尚未扩大时表现其浪漫的革命行动？并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他的社会立脚点。因此在革命胜利时期这些左派分子就会发生右倾的危险。因此一方面既无他的群众在他后面督促他始终向革命路上走，同时另一方面他可以趁机做官，自然会把他的革命性逐渐消灭的。

而且这些左派为维持其地位起见，有时感觉到自己没有群众的危险就会与右派合作而攻击有群众的共产党，同时共产党因为没有一个左派群众做缓冲自然就会有工农群众即时直接与右派以及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直接冲突之危险，最近广东湖南左派都在联络中派，左派一致的向共产党进攻而压迫工农运动，都足以证明左倾因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有很大可能的右倾性，这是第三个危机及其矛盾。

（4）军事运动之发展远过于民众运动之力量。中国目前革命运动之发展，并不是从下层民众发展起来，而是军事力量超过民众力量。一切革命运动都以军事为中心，大有军事力量可以包办革命运动之形势。在革命行动中我们只看见军事领袖而不易看到民众的领袖。因此就发生军事领袖可以操纵一切党务政务的现象，蒋介石的权力实已超越一切党部政府权力之上。这样自然的结果就会形成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相勾结之新军阀成为工农群众更大的敌人，这是第四个危机及其矛盾性。

（5）共产党还未成为广大的民众运动的坚实的核心。我们既已知道中国革命目前的状况一方面正在向前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实行包含着许多危机及矛盾。此种危机及矛盾的唯一出路，在于共产党员是否真能做广大群众运动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目前唯一重要的工作即在于发展群众运动，如果中国共产党真能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的核心，他的政策可以左右群众，他真能群众化就能使改良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减少，不敢无顾虑的压迫工农而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就能逐渐消灭地主土豪劣绅的势力，就能使国民党左派有群众而减少其右倾性。就能使民众力量之发展赶得上军事力量之发展而监督各军事领袖不敢抱武力独裁之谬念，而民众甚至现时加以压迫与摧残。否则中国革命运动会变成第二个土耳其革命。土耳其的共产党因为不晓得注意民众工作，及有广大的民众，虽做了许多帮助国民革命的工作，但等到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即遭到基玛尔的严重压迫与摧残。

最近蒋介石曾电李济深要他们以武力制止工农运动，李济深已开始实行压迫工农运动的政策，逮捕总工会代表，解散工会代表会都是予先告诉我们去，在革命的胜利中，共产党快要受到新兴的压迫，换句话说共产党在民族革命快要完结的时候立即开始要坐国民党的牢狱了，这是何等紧急的时期，可是目前中国的共产党实在还未能左右广大的群众，还不能真正做广大群众的核心。虽然我们已经可以影响许多群众。这是第五个危机及矛盾矣。

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

——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的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

北伐军的胜利，革命势力之伸张，帝国主义奉系军阀以及一切城市和乡村的反动势利〔力〕均发生恐怖，而另求新的压迫民众势力的方法，遂由蛮横镇压的手段转到分裂贿买的阴谋，不由外面进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所谓国民党稳健派（即右派）和奉系军阀确有在日本帝国主义指导之下成功〔为〕一种妥协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国民党稳健派已进行积极的在消灭党内急〔激〕进势力。K.M.T.内的斗争。已成为目前革命中最严重问题，政府迁移南昌问题，改订省党部代表大会选举法问题，摧残工农运动问题，皆是右派进攻的具体事实。如果日本的阴谋继续得到成功，这种妥协的危机，不仅是打击K.M.T.的左派和C.P.，并使中国革命遭受很重大的挫折。自从蒋介石、张静江决定三月一日在南昌召集K.M.T.中央委员会后此问题日趋严重，因为这次会议实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决胜的最后关键。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革命的损失。在这斗争中，中央已决定我们斗争的态度及目前具体工作如下：

A．斗争的态度

1．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C.P.与K.M.T.的争斗，无论在任何斗争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

2．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除非是投机的左派才有自己夸妄和防闲C.P.的胡想，真正的左派都自己知道左派势力之涣散与软弱，倘使没有C.P.作他们的先锋，他们很难在争斗中撑持得住。我们以往在K.M.T.中的斗争。均是要左派顶头去干，我们只在后面出主义〔意〕，不肯直接上前。左派能力既弱，当然只有失败。左派一退，我们也跟着退，不仅革命工作受着损失，同时也引起左派对我们怀疑，怨恨说我们狡猾不可靠，只指使别人干而自策安全。比如在三月二十，五月十五以后，柳亚子、朱季恂等便是这样非难C.P.。最近江西K.M.T.省党部的选举，陈果夫、张静江等任意改变选举法以限制C.P.，反左派分子当选。左派曾提出要反对，我们并未加以援助，左派因此也颇不满我们。潭秋同志批评此事说："虽然陈等最后要强迫通过，但在代表会上有稍浓厚的反对空气，以防其更进一步的进攻，而且这种强奸式的通过，也可给左派一个深的印象。"潭秋同志的批评是很对的。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前进，要使这个争斗在形式上是左派与右派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C.P.与K.

M.T.的冲突。我们现时只有先战胜K.M.T.内的右倾势力的进攻，才能保证与党外右倾势力争斗的胜利。

B．目前的具体工作

1．现时武汉K.M.T.中央政府联席会议诸人，以徐谦为领袖，坚决反对国民政府移南昌，反对蒋之个人独裁，他们预备在三月一日以前先在武汉召集一中央会议，以免为蒋先发制人。自然这个汉口的会议，右派分子一定不肯来参加的，我们务须尽量帮助左派，使这个汉口会议能够开成。凡是我们同志之为K.M.T.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或候补监察委员者，均须前往出席。各地左派分子为中央执委及中央监委正式、候补委员而又反对政府迁南昌者，均须设法劝之赴汉，时机迫切，望各地接洽后立刻进行。

2．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蒋之最大罪状如下：

（1）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黄郛介绍佐分利在牯岭与蒋秘会，最近蒋派吴铁城赴日，已到东京。日本政府要人时刻宣传说，奉方可与南方之稳健派可以妥协。张作霖宣言对于南方除过激派以外，皆可协商。蒋介石亦正努力做反左、反共、反俄、反工农运动，以示非赤）；

（2）一切右派反革命分子皆集中到蒋之左右，不仅张静江、陈果夫，连黄郛、贺德霖、赘德柏等皆成蒋之亲信，蒋准备以黄、贺代左派之陈友仁、宋子文；

（3）所有政府财政收入皆集中到总司令手，国民政府所属六省，收入每月不过1500—2000万，而蒋一人便要1200万，以这许多的钱收买走狗，植党营私，至于各军的兵士反冻饿不堪（有些军队甚至还没有棉衣，军饷只发六成，换言之即只开伙食）；

（4）积极作反共、反俄、反工农运动；

（5）张静江、陈果夫等擅改省党部代表大会选举法，不承认大会选出结果，凭藉中央命令自由圈定，以便造成自己私党；

（6）纵容浙江派贪官污吏抓钱，尤以黄浦〔埔〕学校及总司令部贪污之风最甚；

（7）名虽迎汪，实则反汪，使汪实际不能回来；

（8）硬要政府移南昌，停止武汉的联席会议（徐谦等现不接受此命令）；

（9）软禁邓演达于南昌（邓现已费尽艰险逃出）。

武昌联席会议，左派诸领袖对于蒋现时之反动行为愤慨万状，若蒋胜利，不只是左派的失败，实是革命的失败。所以我们当竭力帮助左派，宣传蒋之罪状，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惟各地宣传时须十分注意：

A．只能在口头上宣传；

B．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名字，而只是依据以上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反蒋。我们要左派在此次反蒋中须有一行动政纲，并须努力宣传此政纲，使社会人士了解左派反蒋的原因，而不致误解私人权利的冲突或C.P.的什么阴谋。此政纲大概有以下七项，如左派联席会议正式发出时，各地党部须指挥所领导团体一致拥护。

1．统一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2．继续北伐军革命战争，歼灭奉直军阀，召集国民会议；

3．北伐胜利各省，应即实行联席会议政纲；

4．财政统一，军需独立；

5．肃清企图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分子及一切贪官污吏；

6．继续扶助工农运动；

7．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斗争。

附告：这篇通讯，只许负责同志阅看，在各方面切实应用，阅后当即焚毁，慎勿随便丢弃至要。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

（罗亦农三月十五日在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

一、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及其前途：

（一）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

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已经高涨到了极度，全国民众革命的情绪，非常热烈。敌人方面，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势力，已根本动摇与崩溃，尤其是帝国主义者，实已陷于恐慌忙乱的状态。他们正在想种种方法，企图破坏革命，消灭革命。因此，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实已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间，未来的中国革命命运之安危，将纯全取决于现在中国革命的民众是否能够更勇猛的向前进攻，抑先自退缩。

（二）右倾势力之发生及其危险：

在这样严重的时期中，我们看出两个最重要的危险现象：

1．从北伐军占领武汉及江西以来，中国革命运动，就很广泛很迅速的发展起来，在发展中表现力量最伟大的当然是工人、农民及革命的军事力量。影响所及，许多小资产阶级及一切民众，都倾向革命。其结果自然要消灭旧有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的统治力量。因此，也就促起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的联合一致向革命的力量进攻。此为第一个危机。

2．目前中国的革命，有二个方向可以走出，即：一为革命的工农群众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夺取政权。一为改良的资产阶级来领导㳺〔游〕移的中小资产阶级，甚至勾结帝国主义，集合所有洋奴买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力量，向工农阶级进攻。现在此反革命的倾向，已经打入了革命的战线。其具体的表现，即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活动，领袖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包围，根本丢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运动——而反对联俄、联共及压迫工农运动，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的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这是第二个危机。

（三）左、右派的争斗：

国民党因为内部发生右倾的危险，所以产生了最近左右两派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之表现，即以武汉与南昌为两方冲突之焦点。蒋介石要想挟持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实行其军事独裁之策略，以压迫一切革命的民众运动；同时武汉方面的民众与军事力量，都非蒋所能左右，所以他不愿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可是事实上南昌既非全国政治的中心，也非交通的要道，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之迁鄂，又系去年中央委员会之决定，蒋介石当然无权擅

专。因此迫得武汉方面左派分子不能不起来为强烈之反抗。此外蒋介石的反动事实，还有很多，约略举出如下：

1．现在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名义上虽在武汉，事实上另有一部分人暗中把持，此一部分把持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主要人物，实为南昌之蒋介石及其爪牙。

2．中山外交政策为联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蒋介石既已反对联俄，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谋妥协，既派吴铁城到日，表示可以担保中国人不再反日，又派戴季陶赴日为许多亲日的宣传与活动。最近东方社电通披露许多南北妥协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信使往还的消息，蒋并无一字声明。

3．不继续积极北伐，想与奉表示妥协。派李石曾为其全权代表，与杨宇霆谋和并提条件。

4．任意压迫工农运动。广东方面县知事枪杀农民协会会员，反说县知事办事能干，农民协会会员是土匪。

5．招引一切反革命人物研究系、交通系及其他腐败官僚领袖。如黄郛、贺德霖、龚德柏等都很信任，甚至想以黄郛代替陈友仁，贺德霖代表宋子文。

6．划取国民政府全部经济收入五分之四为蒋一人之军需。但其部下兵士，甚至到了冬天没有棉衣穿，足见他在经济上实有许多黑幕不堪揭布。

7．擅改国民党选举法。在江西省党部的改选执行委员完全由蒋自由圈定，尽量排斥左派与C．P．。

8．汪精卫之迟迟不归，完全为了蒋介石之暗中反对。

9．无故软禁邓演达于庐山。

总之，南昌已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点。其与武汉之斗争，实为革命与反革命之斗争。我们应该赞助武汉，打倒南昌。此种斗争，在历史的意义上说，实在也是必然要经过而无足害怕悲观的。

（四）武汉左派斗争之经过：

在武汉方面，国民党左派领袖之对右派斗争可以说非常坚强而勇猛，他们用了毅然决然的精神，实行下列诸重大工作：

1．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在武汉开始正式办公。

2．开中央党部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3．许多党员很热烈的举行复党运动。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正式发表通电反对张静江，提出：（1）政府迁鄂，（2）确定党的最高指挥权，（3）请汪销假，（4）肃清党内昏庸老朽分子。诸条件要求中央党部通过并执行。

4．二月二十一日即在武汉召集中央政府等机关扩大联席会，决定三月一日在武汉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

5．写信给蒋，要他赞成下列诸条件：（1）外交政策之统一，（2）财政政策之统一，（3）指导机关之统一，（4）一切革命势力之统一。

在左派这样坚决对蒋进攻的形势之下，蒋当然是很难忍受，所以在南昌发表许多反抗的言论，公然揭破假面具，将与反革命势力合作以对付左派与C．P．。但结果因他蛮横得太无理由，以致大多数军队及党员都起来反对，所以武汉左派革命的空气也益发浓厚而有力，这是很可庆幸的！

（五）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之意义：

昨天报纸所载，武汉方面，似乎已开始形成左派的胜利。中央会议已决定了外交、财政各种统一的议案。中央委员也已改选完竣，军事委员会重新组织，把蒋介石独裁的权位根本取销〔消〕，此为革命与反革命争斗的一个胜利。

我们预料武汉此次中央会议的决议，将来必有实现的可能。其意义，挽救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危机，给新右派以严重的打击，国民党国民革命此后将更发展而稳固。我们应号召广泛的革命的民众起来表示拥护，坚决的勇敢的扶助此项决议之实现，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对付所有反革命的势力，根本加以铲除。否则，北伐军纵到处胜利，不过产生许多新军阀，加上许多新压迫，中国民族仍不能脱离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这是何等吃亏的一件事！

（六）蒋介石的出路：

蒋介石在此次中央决议之下，可以说已到倒台地步。今后的出路：1．完全屈服；2．一走了之；3．暂时隐忍。一面养精畜〔蓄〕锐，谋将来报复。照各方面情势看来，蒋必走第三条路，他将注全力于东南。他曾说到南京后与C．P．算帐，他以为所有反蒋运动都是C．P．所为，他实看轻了C．P．以外的一切民众，连真正左派在内。

（七）北伐军到江苏后之东南革命局面及东南革命运动与全国革命运动之关系：

现在的重大的问题，即为东南是否将纯在蒋介石统治之下，要看东南一切革命民众的力量，是否能够镇压一切右倾的势力。如果东南革命的民众，能够认识目前革命运动的危机，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开展。蒋介石到了江苏也必不能随便压迫民众，发展他反革命的企图。蒋之蛮横命运，将益发短促，因此东南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全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实有非常密切而重大的关系。

（八）本党挽救革命右倾之具体策略：

我们党在此革命右倾的危险期中，当积极向右倾的势力进攻，应竭力图谋挽救。具体策略：

1．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2．督促所有国民党所属各地政府，实行联俄联共及发展工农运动的政纲。

3．鼓动全国民众直接取得政权，召集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

4．反对军事独裁，赞成民众革命的独裁。

5．鼓动民众直接裁制反革命分子，所有买办、工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用民众的力量根本铲除。

6．武装工农。

7．C．P．尽量参加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军队的工作。

8．扩大反英运动，开始反日运动，指明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中国革命右倾的主谋。

以上几项策略，我们如果应用得好，全国革命必将左倾，所有危险，都可免除。否则，如果东南方面革命失败，武汉也很难孤立，因此我们要很自信的很坚决的做去，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九）革命的前途应当是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

我们在此地可以下一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必须是革命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直接取得政权建立民主独裁制。此项民主独裁制之实现，我们应完全取

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否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的势力，很能结合一起，来破坏我们的革命，消灭我们革命的力量。此实为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C．P．存亡的问题，同志们应特别注意！

二、东南革命运动及本党的作用：

（一）东南革命运动在全国革命运动中所占的地位：

现在全国革命运动的重心，实以由武汉转移到东南。所有右倾的势力，既不能在武汉立足，又不能在南昌存在，今后将移植到东南。因此，今后的东南，实为全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中心点。

（二）右派势力之企图：

现在蒋介石等许多右倾的军事领袖及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于江、浙抱有很大的企图，他们想拿住江、浙，以反对C．P．、反对苏俄及反对国民党左派，而与帝国主义者、奉系军阀妥协。

（三）东南各社会阶级的分析：

江、浙的民众运动尚未十分发展，二省有组织的农民不过二万，以与二省全部农民四千万为比较，相距实在太远。在另一方面，江、浙产业发达较早，资产阶级的政治企图也比较开展，他们虽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反对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反对工农阶级的发展。还有地主、劣绅、土豪的势力，在江浙二省也特别伟大。至于比较接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如学生、中小商人、店员等民众，也没有较广大的组织。上海的工人运动比较发达，但其余民众的力量仍很幼稚。这种形势，实在是非常危险的！

（四）革命的领导权：

可是革命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经过有力的奋斗，才有胜利的希望。现在我们只要认定目标，积极反对反革命的军事独裁，同时要反对改良的资产阶级之改良主义实现，用很坚决的态度与改良的资产阶级争得革命的领导权，建立真正革命民众的民主独裁制。这样，许多右倾的势力，自然也就无从发展了。

（五）对于右倾势力的态度：

至于我们对于右倾势力的态度，要绝对取进攻的形式。要有计划的有步骤的领导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猛烈的向右进攻，直接夺取政权，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丝毫不能退让。区委对此早具决心，特别是从上月上海总同盟罢工到现在执行得更是坚决。

（六）同志们一致的错误：

可是过去各级同志们，对于此项策略，都不明了，都不能坚决执行。在国民党负责的同志，往往不能拉住各级党部的群众力量；在工人方面，不能很迅速的执行区委决议对资本家提出条件，以致资本家自动的增加工资，工人反表示感激，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

现时民众革命的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很可以争取群众。但我们的同志都不自信，都不知道在这时候的工作，比往常要重要十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此种表现在上海在杭州在宁波等各地党部，都不能免，实在是背叛革命的行动，等于反革命。

（七）今后的工作：

今后希同志们要痛改以前错误，集中所有的力量，领导民众积极的向右倾的军事力量与改良的资产阶级进攻，组织所有的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左派，拉住小资产阶级。

三、上海革命运动的现状及市民代表会议

（一）上海革命运动之高潮：

上海社会现在已入于最革命的状态，工人阶级个个都很兴奋。最近两礼拜，增加十万有组织的工人。商人方面，无论小商人大商人都已积极起来参加民众政权的运动。学生方面，也表示积极，对于市民代表会议之推出代表者达二十余校。帝国主义天天惶恐，派许多军队来沪弹压，三月十二日中山二周〔年〕纪念，民众在南京路大闹，不敢有所干涉。日本厂主对工人进攻，很是退让。军阀李宝章与毕庶澄、常之英都互有冲突，军心非常动摇。资产阶级傅筱庵设法来运动工会，希望不要去攻击他。许多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右派，都起来表示革命。中国工厂资本家都承认工人开办工会，并拨房子给工会。总之，上海革命的力量，正在大大的发动，而反动方面的势力，则日渐崩溃而惶恐。

（二）北伐军之进攻：

上海民众革命力量虽在高潮，但其爆发仍有待于军事力量之促动。现在北伐军纯取四面包围的形势攻打直鲁联军。最近几天，安徽方面，党军攻打很急，蚌埠动摇。南京非常危急。江苏方面，何应钦军在宜兴一带积极进攻，总攻击令闻于十五日可下。浙江方面，松江也有白崇禧军担任进攻，但不视为重要。主要的在宜兴方面，以便进取常州无锡而截断沪宁路。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中，我们预料党军必可取得胜利，因为鲁军从河南而安徽、江苏、浙江，战线实在太长，同时鲁军兵士志在抢劫，毫无战斗能力，很难应战。因此，党军之取得上海，为期必很紧迫，而我上海民众革命力量的大爆发，也必就在目前。

（三）市民代表会议——民众的直接政权：

现在的问题，就是上海的民众专门欢迎北伐军来统治上海，抑上海的民众与北伐军合作，建立民众的直接政权？有许多同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懂得民众政权的意义，只是专门等待北伐军到来，自己一点不动作，这是很大的错误。要晓得上海为中国民众力量最伟大的地方，上海的工人阶级，为全国最有力量的民众。上月总罢工，只有数小时的命令时间，即罢下三十余万的工人，实为全世界所稀有的现象。在别一方面，上海有几十万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历来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买办的压迫，非常严酷，所以他们都是很革命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的民众快到革命成熟的时期。如果北伐军一到上海，上海的民众革命运动立即爆发起来，共同推翻了封建军阀的势力，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治，必能影响到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将更加推动了印度、爪哇等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因此，上海实为民众与北伐军合作的问题，而不是民众欢迎北伐军的问题，如果是民众欢迎北伐军，上海必仍为一个反动的局面。

因此，我们目前的中心思想，是要上海的工人群众及所有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等等的民众直接夺取政权。其方法：要各种民众自动的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民众力量自己制造法律，自己推出代表，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由这市民代表会议在革命爆发时产出市民政府，这就是革命的民众政府，革命的民众独裁制。此为上海目前的革命中心问题，最近总同盟罢工及市民暴动以〔直〕到海军开炮，牺牲许多工人学生的生命，都是为得这个问题——上海市民革命的民主政权问题。

（四）市民代表会议必须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

但是市民代表会议有许多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改良的资产阶级想把他拿住在自己手里，

要把他造成一个日本式的半封建制的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样就将变为改良的反革命的会议。

我们希望这个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成为全上海革命民众的苏维埃。但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因为没有工人阶级为骨干，便没有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因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不与一切反动势力妥协的。

（五）市民代表会议应有的特点及其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区别：

这个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应该有几个特点：

1．应以职业为单位直接选举代表，不劳动的无职业的流氓，不能当选为代表。这一点与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因为看了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所以主张以区域为单位，以便无业流氓、土豪劣绅都可参加政治。

2．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的关系，不象从前议会选举，与民众不发生什么关系。

3．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此三点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完全相反，我们必须做到，不能让步与妥协。

（六）市民代表会议与国民党：

上海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杨杏佛等都不明了市民代表会议的意义，甚至把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规例都不顾到，孙中山的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规定九种团体有代表当选权。杨杏佛等偏偏反对市民代表会议以职业为单位的选举法，而主张以区域为单位。他并主张把这民众自己召集的市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要经过国民党市党部的最后决定。这种强奸民意的横蛮思想，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真意。因此，在思想上，我们要与这些糊涂的国民党领袖们争斗，绝对不能退让，最后可求解决于武汉国民政府。在事实上，国民党为领导革命的政党，对于市民政府之监督权我们应该承认的，但决不能监督这纯粹民意机关的市民代表会议，而只能与未来的市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认清楚。

（七）本党与市民代表会议：

C．P．现在正在领导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取得政权，直接建立民主政府。所以C．P．也要参加市民代表会议及将来的市政府，为革命运动的保障与重心。因此，我们每一个同志的责任应该努力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市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以便随时参加政治以建立稳固的革命的市民政权。

（八）市民代表会议与小资产阶级：

全上海有二百万人口，其中有七八十万是中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意义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C．P．应领导工人群众，联结小资产阶级在市民代表会议中合作。这就是工人群众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实际以工人为主体，C．P．去领导。

四、北伐军未到上海以前我们的具体工作：

（一）各方面的积极向右进攻要有决心，很自信的去领导革命的民众，积极向一切反革命的势力进攻，不稍松懈。

（二）号召全上海民众起来拥护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并努力促成其为事实上的市民政府。各工会各学生会各民众团体，都要发表宣言通电表示拥护。

（三）市民代表会议，中及小商人太少。我们应多拉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起来拥护与参加，以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四）北伐军就快到来，我们应积极为各阶级共同行动的〔作〕准备，罢工、罢市、罢课与民众的武装暴动。

（五）积极进行精神与物质的红色恐怖。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

（六）工会运动，过去对于工人的直接行动进行尚慢，此为党的最重要的工作。现在上海工人，在事实上已可取得半公开工会，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诸利益，因为资本家非常害怕。区委前曾提出各工厂工人都要提出条件与厂主直接谈判，又要使工人明了现在已到工人们吐气的时候，应该向资本家提出要求。但各同志都不明了此中急策，执行得很是不好。以致昨天尚有工人感恩资本家自动加资的现象发生，此是何等落后倒霉的表现，比上次被军阀杀死许多工人还要重大可耻！挽救的方法，所有工会、部委应负责去解释，说明资本家之所以肯自动增加工资的原因，仍为工人自已努力的结果，是资本家眼看工人有力而害怕，不能不有此退让。此外各同志要绝对执行下列两〔四〕件事：

1．召集所有工人开会，告诉工人革命的时机已到，大家赶快起来奋斗。

2．每工厂工人都要提出条件——工时减少，工资增加，改良待遇，尤其要注意八小时工作制，此为许多资本家所不愿意答应的。但我们提出此条，必可得到社会的同情，每〔我〕们要提出八小时的每天三班制。

3．每工厂都要建立工会，并要资本家承认。

4．工会要注意建设工作，如办俱乐部，办工人学校，办壁报等。千万不要将工会会费存在银行里不用。

以上各条，如在北伐军未来以前，都得到效果，工人群众必格外相信工会感激工会，以为工人并不一定要靠北伐军到来才可得到利益。否则，北伐军一到，他们所得的利益，将全归功于北伐军，将看轻工会的作用而不信任工会。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

（七）国民党的工作：

1．过去在国民党工作的同志，有一很大的错误，就是不知道培养左派领袖，发展左派群众，因此不能多与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接近。现在市党部有七千党员，左派党员仍不能占绝对大多数的地位，以后要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2．要赶快发展国民党员。上海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同情于革命，十万到二十万人可以加入国民党，我们要大大的开放门户，吸收他们进来，尤其是中小商人、教职员、学生及许多自由职业的群众；

3．各区党部的改选，要纯为左派与C．P．当选，绝对排除右派；

4．尽量划除右派的组织与力量。

（八）学生与妇女的工作：

1．妇女运动——过去大家都轻视妇女运动，往往以玩笑的态度对付妇女运动，这实在是很错误的，以后要绝对纠正。在目前的妇女运动，应该要尽量的发展妇女团体，吸收妇女知识分子；

2．学生运动——要尽量的消灭右派的势力，每个学校都要成立学生会，学生要直接参

加学校行政，要求学校经济公开，赶快运动开学，每个学校要公开国民党区分部，自然随带可以发展C．P．与C．Y．的组织。

（九）党的内部工作，要加紧严密各级党部的组织，最主要的为发展党员的工作。从上月二十三日到现在，只发展一千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以后要努力吸收。目前有许多新出来努力革命运动的工人与学生教职员，都可尽量介绍。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此为提高党的威权最主要的工作。

五、北伐军到上海以后我们的工作：

（一）召集市民代表会议，建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

（二）号召上海人民提出人民的总要求，由市民政府执行，实行解放人民的压迫与痛苦。

（三）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收回租界，具体的行动临时再行指定。现在我们要先有此观念，要明了此项运动之扩大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上海一般革命的民众还都非常懦弱，同时上海的资产阶级想取得政治领导的地位，如果我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很是热烈，他们只好跟了我们跑，不能有丝毫妥协软化的表现，或者他们纯全投降于帝国主义，这是我们领导革命的重要工作。

（四）把所有各阶级民众都组织起来，完成市民代表会议的组织。

（五）运动工兵大联合，要使每工厂工人，每学校学生，以及许多妇女团体、商人团体都组织慰劳队。北伐军一到，各慰劳队都分期前往慰劳。导以军乐，携带食品，整队跑到军营里面，做各种联络兵士、宣传兵士的工作，使各军队官长将来不能随便指挥兵士做反叛革命、压迫工农的战斗。慰劳队中的讲演者，必须是我们的同志，以免反动派羼入做反革命、反C．P．的宣传。

（六）工会运动，要特特〔别〕加紧。上海的工人在社会上已有很大的威权，将来公开活动，必为各方面人民所瞩目。因此我们对于工会运动，要特别注意下列两项重要的工作：

1．保持工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

2．要使每个工人都加入工会。每工会都要有较大的房子，收会费，召集代表会选举执行委员会，开办俱乐部，出壁报，设立消费合作社，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办学校等，常常讨论上海的政治与时事问题，实行八小时制，消灭工贼走狗等。

（七）学生与妇女要做扩大与统一的运动。

（八）国民党要更积极的取得政治领导权，扩大机关的组织，消灭右派的势力，出版机关报，拉住中小商人与店员。

（九）党的内部，区委派人参加政府，为上海几十万被压迫人民说话并批评政府之过失，监督政府之行动。别一方面，公开党的政治宣传，办工人日报，把党的政治主张与策略公开的在民众前揭布，至于党部的机关，区委与部委都不能公开，不过区委为与许多政客及民众领袖接洽便利起见，特别设一半公开的机关，部委在必要时，可利用工会为半公开的接洽机关。支部都要建立机关，但须由各支部自行设法，或在同志中集资或利用工会的机关，区委不能为经济上的帮助。

（十）党的组织要大大扩张，要增加几万个党员。同时要严密各级党部的组织，每个同志都要有支部，绝对受党的指挥，每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中，都要有严密的党团。

（十一）上海附近有许多农民群众，我们也要开始发展，以增加并扩大革命的战线与力量。

六、党的政治纪律问题：

（一）思想一致与行动一致：

过去我们的党纯在被压迫期中，人数也不多，所以没有多大的纪律问题。此后情形就大不同，同志们切须明了C．P．的基本条件：1．党的思想一致。2．党的行动一致。因为C．P．如一部整个的机器，不能有某一部分之缺陷。C．P．系战斗的军队，不容有某一部队之松懈，全体同志应该要一律懂得党的策略，一致服从党的命令，共同行动，才有成功希望；如果每个同志随便行动，整个的党必将因之破坏。列宁说："如果谁破坏了党的纪律，等于帮助了资本家。"这是很诚切的规条，我们同志应严格奉行！

（二）最近的纪律问题：

最近我们同志，有三件无意有意的破坏了党的纪律的行动：

1．中山纪念日，我们同志被国民党右派打伤多人，事前毫无准备。区委并无命令要同志们带同群众到环龙路四十四号门前去示威，而是我们同志个人的鼓动，以致受此奇辱，这是何等可以痛恨的一件事！

2．上海临时市政府之产生，区委曾预先拟好一名单，以妇女同志中无有职业而可以当选代表者，所以没有列入。同时此名单是很秘密的，负责同志知道了，绝对不能随便泄漏与讨论，但有一部分知识的女同志，竟为此召集会议，对区提出责问，不知因此犯了：（1）有损区委威权；（2）有坏团体组织，同志自由召集小会反抗上级党部机关的风气二大纪律了。

3．吴淞有一同志，因为不满意于区委所派到该地工作的同志，以全厂同志的名义写信给区委控告该同志，也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纪律与党的威权：

党的权威全仗同志能够严守纪律，否则纪律松弛，党就失掉威权，就不能指挥同志向前奋斗，到此时党也就等于消灭。因此每一个爱党的同志，要到处严守党的纪律，时时提高党的威权，绝不丝毫有所破坏，这样才算得是个真正信仰党的党员。否则，与反动分子有什么区别呢？

（三）今后的纪律问题：

今后区委为防免党在半公开时期中同志们或许发现许多弊病起见，要特别注重纪律问题。每个同志对于区委所决定的一切政策，绝对不准有丝毫违反。各同志对于政治上及其他一切有关系的活动，绝对不准有个人的浪漫行动，都要先经区委之决定。区委受代表大会之付托，中央党部之监督，将绝对负责指导各同志的工作，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决不再有宽恕。望各同志特别注意！

七、结论：

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间，尤其是最近的东南，已为全国革命的第一个重心。我们党要积极取得民众革命领导的地位，领导工农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很坚决的、很能与右倾的军事势力、改良的资产阶级决斗，直接取得民众政权，实现革命的民主独裁

制；同时要更加严密我们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的力量，以接受这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希在很迅速的时期中完成我们党的重大使命。同志们，其各努力！

决议案：

全上海活动分子听到区委主席团亦农同志报告之后，认为主席团对于全国及上海革命运动的认识非常得当。对于区委所指示北伐军未到上海及既到上海以后的各种具体工作非常重要，全上海活动分子大会议决一致拥护并执行。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

——政治局势的变化与我们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

农：现在上海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继续奋斗的问题。昨开特务会议，曾仔细讨论。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现在反革命的势力已集中于上海了，张、戴已至上海，蒋也快来了。

白昨向日记者表示工人如有扰乱的情形，各国都可出租界缴械。在上海最左的军队是薛岳，但白要调薛驻龙华，并分散其势力。蒋在江西已开〔始〕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并将吴淞及南市大部分的兵力调来，四围布防，保护上总与俱乐部。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幸而胜则已，不幸亦可影响全国，断绝蒋之政治生命。

军事行动尚有军委负责，并于今天检阅纠察队，我们现在要准备的是政治工作。我想明天下午再召集五百人的活动分子大会，解释现在严重的局面。各部委、各产总要随时准备能总同盟政治罢工，并要组织特别宣传队作政治宣传。我们要挽留薛岳明天走，今天下午闸北开国民党党员大会，同时上总要有五千人去挽留薛岳。组织二百人的代表团要质问白与刘，要他们表示态度。薛岳明天到南市要开工兵联欢大会，闸北等刘来时亦开工兵联欢大会。

仲：一、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害的都是C．P．。

二、在南京下关英美打死中国１—２千人。

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

留薛未见有效，但必须作，因薛尚〔在〕沪附近，将来仍有作用。刘是很软弱的，我们仍要联合兵士，缓和冲突。

宣传方面，只宣传江西事件，不提上海。

明天的市民大会，我们要注意把群众分配，我们要在大会上做工作：

一、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

二、将薛调走，上海治安有影响时，问白是否负责。闸北的群众要到薛处挽留。

此外，我们要找商界有力的领袖，与市党部代表去找蒋说薛在沪很相安，如薛走，出了事怎办？（代表就是虞洽卿，孟心史）防御战争一定要准备。

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反英工作现在只能：

一、作民众的宣传。

二、英厂罢工。

三、排货。

最好要将反英与反蒋联合一起，暂时对日美不管，减少敌人。

罢工，英界继续罢工，华界英厂罢工，口号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国兵。不日陈友仁就要到上海，可办交涉。

英界英厂罢工工人都可住在闸北，使刘持〔峙〕不敢动。如交涉胜利，上海工人又有一件功绩，但秩序要注意。

商界方面，先要商界罢市，如不罢市即捐款援助工人，商界必愿意，然后再全国募款。国际援助，即可解决经济问题。

决：经费要准备五百万，先要一百万的基金。

罢工后交通不要断绝。

炎：一、各部委要考察纠察队队员是否可靠，今天十一时俱乐部要总检阅。各部委要马上回去准备，靠不住的可令其回厂作工，并可用钱买枪。

二、下午要开纠察队大会，决议全体加入C．P．。从明天起，要有四小时的军事训练、四小时政治训练。

三、闸北留薛的成功，南市就要准备对付刘。如不成功，即集中力量于闸北。

四、吴淞军队是薛岳的，所以吴淞纠察队要调到闸北。浦东要积极做工兵联欢的工作。

五、预备粮草，上总要在四周租民房布防。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

——政局变化与我们的策略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时)

区委报告：

昨天已开会，说明这次暴动的历史意义及今后工作的方针：

今天因为政局转变非常之快，今天政局已有非常危险的局面。

上海现已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集中地，为挽救中国革命唯一重要地。

昨天已说张、戴到上海。

今天刘持〔峙〕要求，是去年三月二十日最卖力一人，同时蒋介石今天下午四时也到了上海。

蒋来别有用心，我们应当有明确观念，上海有八十万工人，曾直接与帝主冲突，有经验与力量。同时反动势力也最雄厚，有改良资阶与帝主势力。

昨天我们感觉很多问题，重要的为工人与纠察队问题，这次工人大流血大牺牲夺取许多枪械为自己解放的保障，上海工人有力武装，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与一切行动都有保障，同时C．P．也跟随有力。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昨天有许多谣言，使帝主非常害怕，说工人要武装收回租界，同时吓坏了右派软弱的国民革命分子。

白崇禧初到时不敢有所压迫，现被许多资阶与反动分子包围，他前晚有决定三办法，最后即为解除工人武装问题。

同时薛岳军最左，主张工兵联盟，主张工人有武装，所以白崇禧昨天明令把薛军调散在高昌庙、吴淞一带，使他不能与工人联合。又把刘持〔峙〕军队驻闸北，要他来缴湖州会馆的械，取消上海总工会。这些当然是张静江等所主使，这完全为破坏革命，帮助帝国主义的行动。

白崇禧来沪后，对于各帝国主义领事往还很密，并许日兵入租界缴工人的械。

上海的工人有很大力量，经过很大牺牲、很大奋斗，迭次暴动与奋斗。区委策略，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不稍退让，如胜则全国政局可大变，如败则我全上海工人为全国革命而奋斗，也很有意义。刘持〔峙〕军很腐败，未见得强于直鲁军，我们未必不胜利。

蒋介石现为一切反动势力所包围，现在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帐，以出其在武汉方面之失败。

今天消息，蒋在江西下令枪毙赣州总工会委员长，解散市党部，在九江纵流氓捣毁市党部。此次蒋之所以急遽来沪，有人说他为南京英军打死华人，而是要保存其残余命运与帝主妥协。最近南京案非常重要，打死华人两千人，比万县案还重要，蒋毫无表示，匆遽来上海，完全为想压平上海民众力量。同时又闻宋子文、陈友仁将来上海，他恐怕要与民众结合，所以他先来压迫民众。

总之，上海的问题，是收回租界抑造成反动局面，其责任全在工人身上。

我们的策略：

南京问题绝对不能忽略。

上海问题，帝国主义者神经过敏，恐我们要武装收回租〔界〕，我们并无此项决定。不过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策略：

扩大反帝运动。

维持工人武装。

具体工作：

一、上海举行反英总罢工，所有华租各界一切工厂办事人都罢下工来，要使租界死寂，不能不交还租界，但应注意点：

（一）避免武装冲突，所有罢工的工人都跑到中国地界来，不到租界中去。

（二）为避免冲突起见，决定邮务及电气不罢工。

（三）罢工中最重要的是西崽、奶娘等家庭工人，使外国人感到深切的困难。

（四）罢工日期准备一个月。

（五）罢工开始要经市民代表会及国民党同意，然后发表命令，各部委在事前赶快去做宣传的工作，说明反英收回租界的政治罢工的意义。

二、此次反帝总罢工的意义，区委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曾说为夺取反帝革命的领导权起见，要扩大反帝运动，现在事实上就可应用。同时蒋等右派都到上海，我们既开始反英大罢工，则蒋如打中国工人，就完全失其过去信抑，从此就为〔会〕消灭其政治生命，资产阶级如压迫工人，也必大遭民众反对。反之，右派与资阶如果因为工人反帝运动的扩大，不能不跟随民众跑，而收回了租界。

上海的工人功绩较之过去各种奋斗伟大十倍。蒋现与帝主勾结，得帝主金钱帮助，是不会没有的。前次戴季陶到日，曾借到三百万，此次可想见其多了。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伟大。

简单的说，我们要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

明天的工作：

一、上总举行升旗典礼，要号召八十万群众示威。

二、在南市要开纪念孙中山会，总的口号为继续反英运动，全上海总罢工。

我们为革命的行动的政党，我们要以全力对付右派，反对英帝国主义，我们要尽量事前宣传与准备。

同时区委决议工人可以加入民党，使民党左倾。

以上责任完全为我们同志在目前中国革命最严重的时期，我们应积极准备与工作。具体的策略为扩大反英运动，援助南京惨案挽救反动局面，消灭反动势力，为中国革命开一新局

〔面〕。

补充：关于我们的力量问题。军事的同盟，我们已有了，不便明说；政治的同盟，下礼拜二市政府已正式宣告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批准，这是我们最有力量的政治同盟。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南京事件速记录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主席（孙科）：关于南京事件的宣言，是否要宣读？

谭延闿：报纸业已登载，不必宣读。

主席：陈部长尚有报告。

陈友仁：关于南京事件，外交部最近所接电文有三：第一电为中央通讯社由上海发来：（译读电文）据称在上海方面调查南京事件，乃奉军有意所为，希图嫁祸于革命军，外报更从而扩大其词，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均信革命军决不至于如此。蒋介石上星期六（三月二十六日）到上海对人言，他的军队决没有参加。同时，他又对字西林报的访员否认党内分裂的现象，并谓外舰炮击南京，使国人对外发生误会，而美兵加入，更使人怀疑。他又说，当他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到南京时，南京完全是一种紊烂状态，北军毫无约束，总是离间革命军同外人的感情，作国民运动的仇敌，有一在南京的外人，曾看见攻击外人的兵士，遇着党旗也批成粉碎，这是在中国的外人所应注意的。星期日（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有五万人的大会，蒋亦到，群众要求政府立刻办收回租界的交涉，否则全国当总罢工。第二电亦为中央通讯社驻上海访员拍来：（译读电文）据路透社华盛顿消息，美国的舆论主张与英国联合，实行对华反抗，证以上海银行界的私人消息，可知此说非假，三月二十九日字林西报有一社论，要求英政府立刻停止与国民政府交涉一切，等到有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政府产生后再议。在南京的外人，曾摄影甚录，认为是必报之仇。上海租界内，除法界表面尚好而外，公共租界的空气都是有意寻衅。二十九日有一华官通行证行至租界，亲见英水兵将党旗撕毁，可以证明他们的用意。现郭秦旗已就上海交涉员，蒋介石也派人到南京去调查真象。第三电是三月三十一日由伦敦来，报告英外长张伯伦在下院演说南京事件及对华方针（阅读译电全文）。

陈友仁：本日民国日报载，据十七军政治部报告镇江英租界已收回。

邓演达：总政治部尚未接得报告

陈友仁：英领已提出抗议。

谭延闿：先拍电去问。

陈友仁：最近曾同日本领事谈话，据他说南京事件尚无确实消息，须至四月一日才有详细的书面报告，当可供我们的参考，不过有几件事已经明了，肇祸的是程潜的军队，因为有他们所忘记的军装可以证明。有一日水兵被杀，衣亦被剥，这种举动实在很不文明，此外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也是真的。在汉口的日侨，很怕工会，因为日侨搬家，码头夫任意敲索。更因为谣传国民党的隐健分子都走了，共产党马上就要起来，所以尤其害怕，汉口最近因为工

厂停闭，失业的将及二十万人，日本侨民两千人之中，只走了三十人。若有人想以武力夺取日本租界时，应采取何种方法。最好一旦有事，请国民政府派兵到租界去。对于政府驱散南阳丸大福丸上的士兵，很表示好感。蒋介石已解散上海的工人纠察队，白崇禧在上海拜会各国领事，各国对他的印象很好，蒋并向外人道欠。

陈友仁：今天宋部长有电来，说是英日联合，上海的危险很大。但我想只要不发生扰乱日租界的事或不至于如此。不过在汉口屡次发生在日界抢东西的事，应即设法消灭。

鲍罗廷：可否补充陈部长的意见？

主席：可以

鲍罗廷：现在的情势的确是很严重，英美已准备干涉，日本的态度虽然不很清楚，但据北京来电，说是许久不造谣言的日本人，最近在北方又大造其谣，他们虽不是代表日本政府，但反对南方的这种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现在假定英已准备干涉，美或中立，或赞助英日，如果我们有适当的方法可以使他不致同英美联合。所以在危险的局面时，要有一定的政策，用那个政策，可以使英日分离，可以使帝国主义者分化。我们更要注意，南京事件，乃是北方的挑拨，并不能以之为干涉的口实。在这几年来，有比南京事件更严重者，南京事件并算不了什么一回大事。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自己中间，有许多灰色态度的人，他们现在已有一只脚站在反革命方面，将来或许两只脚都站过去，因为有这些灰色态度的人，希望帝国主义者过来说话，所以英国人才有勇气向我们进攻，假使帝国主义者切实帮助反革命派，那就可以使革命军消灭。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局面下，我们应当使用各种的对付方法，极力宣传，打消帝国主义所散布的一切谣言。（一）日本民众对于中国有两种畏惧心，一则革命成功之后，危害及日本的经济，再则怕将来太平洋战争发生时，中国要加入反日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要很公开的，诚实的对日本民众说话，要打消他们的两种畏惧心理。我曾接着日本财政界名人正金银行的加能来电说日本人民，很愿意同中国人民，有公开的谅解。所以我对于陈部长保护日人生命财产的提议，很表赞同。（二）本党及各团体，应付于英国工党及英国人民发宣言，声明南京事件应由英国的保守政府及北方军阀负责。若他们再不起来干涉他们的政府的这种弱暴行为（炮击南京）那我们就要施行最大的经济绝交。（三）请国际工人代表团发表宣言，请他们对世界工人及自由主义者报告中国的实在情况。（四）对本国的工农商学兵各界发表宣言，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政策明白告诉他们。（五）特别对武装同志宣言。（六）组织三人委员会无论对内对外的宣言，每天至少要作一篇。（八）关于对付美国的策略，请陈部长想想，下次再提议。

主席：关于对外政策，陈部长提议保护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持租界内的治安。鲍顾问提议对日人发表宣言，解释他们所畏惧的两点，并对英国及国际工人代表团及本国的农工商学兵各界发表宣言，有无异议？

徐谦：赞成是当然赞成，但我们要明白，日本传统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他们表面上尽管同我们敷衍很好，但他们看得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用的分化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是要一个一个去打倒他们的。将来帝国主义者的大联合，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只说保护日本侨民，难道别国的侨民就不应当保护吗？至于说到分化日本人民，日本的人民工党政党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分化了他们也是没有用处，不过，这样去作总是应当的。总之，是因为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者才想乘机分化我们。既是他们形成一个联合战线，我们站在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的，也应该团结起来，说到这里，不能不希望以扶助弱小民族自命的苏联

33

出来有所表示。简单的两句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内如何解决分化，对外如何联络苏俄。

主席：徐同志的意思错了。英日虽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但不能说他们的人民，个个都是帝国主义者，其中也有不少同我们表同情的。至于否认日本民众的力量，更是不对，假使他的民众没有力量，不去干涉他们政府的行动，那我们中国老早就完了！所以我们想要去分化他们，并不是不顾事实的乱发议论。

鲍罗廷：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大家都应当发表意见，共同讨论。我对于保护日侨及其他各国人民，与徐同志同意，对于反动分子，应有对付方法，也与徐同志同意，从前在广东，只有一省，外交还可以支配，现在反动分子自由委派重要官长，损伤党权，使帝国主义跃跃欲试，情形和从前已不大同了。所以我们要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要同（反）反革命运动联合举行。至于对日问题，与徐同志的意思不同。若将我们的政策，同反革命的政策相比较，可以看出他们是秘密磋商的，我们是公开说明的，如果我们剀切表示不顾危害日本人民可使他们不再伤害我们的行动，如同他们帮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日本有他们传统的政策，诚然不错，但是俄国在初革命时，日本也是怕上当，但是后来慢慢的对付，居然拉拢了。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俄国当时差不多是一样，只要很公开的慢慢拉拢，花点时候去对付他们，一定可以使得他们阻碍他们的政府干涉中国的事情，至于不采用同样的政策去对付英美，我想再用不着解释。

主　席：关于这一点尚有何讨论？

谭延闿：鲍顾问的主张是对的。

邓演达：日本对于中国革命的观察，我们可分析一下。从政府方面说，如果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只是民族的革命，那他们就要想到，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经济一定很有进步，日本方面方以得着利益，但是他们在东三省有很多的特权，要是中国革命成功，将来一定是收回，那又与他们是一种损害，这就是书上所说的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如果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有社会革命的倾向，那他们就要怀疑恐惧，或加入帝国主义者的战线中，也未可知。从人民方面说，只要不是带有封建色彩的人，一定知道用帝国主义政策，用传统的外交政策，准是得不着利益的，尤其是工农阶级，更决不会赞成，那么我们究竟是利用他们的政府呢？是唤起他们的民众呢？还是二者兼行呢？我们不妨对他们的政府，完全用一种策略，允许他们在东三省的既得利益，对他们的人民，则完全用宣言引起他们的同情。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

鲍罗廷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策五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

鲍罗廷：蒋同志现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这一定失败的！假使他起初就不到上海，或一到上海即退出，中央是不用打电报的，但现在是不成了。以前我见蒋同志，曾问他去不去上海呢？他说一定不去，现已竟然去了，而且他在上海并形成一个反动局面了！这种反革命行为，究竟与孙传芳何异？本来他去上海，应该要先请示中央许可的，他现在竟自由行动了！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行为，也是不理中央，自己乱做。现在他在上海，对外对内各种情形，都走入反革命的路去，没法子使他能革命的。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如他真能接受中央训令，离开上海，而是最好了，如不然，他便甘心反抗中央，那中央还靠他做革命工作吗？

（摘自《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本，1927年4月）

（选自《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

——罗亦农报告：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

士炎：现在上海犹处危险时期，不仅是关系上海革命，也为中国工人胜利与失败的关键。现在大多数同志尚未明了现在政局，所以召集此会。

亦农：在现在很短时间内，要使同志明了目前紧要时局非常必要。上海工阶是中国革命势力最集中最雄厚最有经验的地方，上海工人在历史上做过二个很大的功绩，一为五卅反帝运动，二为上月二十一号的武装暴动之成功，都为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个功绩。同时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尤其伟大。如果能够继续下去，中国革命运动有无新希望，中国革命一气呵成向社主路上走，是很有可能的。

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每个革命力量表现胜利的时候，反革命的势力也愈益团结反攻。

这几天上海的工阶已到保持他的胜利，更进一步求得胜利或者不能保持他已有的胜利，此阶段关系全上海、全世界革命，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在工人运动及本党策略上都要一根本策略的确定。

这个关头的来源，很显明的就是国民党新右派的向革命势力的争斗。

此新右派的争斗，早已发生最激烈的为武汉与南昌，在战线阶级上一方面为C.P.工人及革命的左派与中小资产阶级，此争斗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蒋介石为一切右派反动派的集中点，但他在南昌时力量尚不够，所以饮泣吞声的几个月，他想把南京打下后与C.P.算帐，可是此次南京的打下为左派军派〔队〕，所以争点就移到上海。

上海为一切反革命势力集中的所在，为反革命与革命争斗的焦点。右派人物有李济深、吴稚晖、戴季陶——凡是与武汉国民政府立于反对地位的人物都集中在上海。

此争斗形势是整个的，不是很简单的上海问题，如他们胜利，就根本影响国民政府。

此争斗的主谋为蒋介石，蒋在江西、安庆、芜湖、杭州、宁波都有烧工会、捣毁党部的事实。

上海虽尚未爆发此种行动，但正在酝酿中。

现在我们看新右派的势力，第二军、第一军、第十四军、第二十六军、第六军大概是左派居多，尤其是南京、上海虽都为第一军，事实上第一师未见是左派。但左派如无积极的准备，新右派也有胜利可能，因为他们有许〔多〕想升官发财。

在革命战线外，帝主虽未见得与新右派实行结合，但帝主种种行动都帮助新右派，如说汪将与蒋联合反共及工人冲入租界等谣言，都是直接、间接帮助新右派反武汉政府。还有资产阶级及银行家也都造谣挑拨说汉口要免蒋职等，他们都是助蒋而反汉，因为借此可以使蒋

部下益团结而积极行动，他们又以几百万款子给蒋并包围蒋、白。又有许多土豪劣绅都起来，助蒋以保持他们的地位，如无锡、宁波……都发生此种事实。

总之，新右派联结……一切反革命力量向总工会工人进攻。

我们研究为何许多反工人的势力都集中在上海，因为上海为工商业最发达，反革命势力最集中的地位，因此仍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同时帝主感觉得他们的最后胜负将取决于上海，所以抵抗力愈大。新右派感觉在武汉在各方面都不能胜利，所以他们也要在上海作最后的奋斗。我们要看清蒋介石完全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所〔以〕革命的党部人员去见他都见不到。但所有银行家、工业家随时可以去见。

我们还要认清这争斗是封建势力与无产阶级的争斗，如李济深、黄绍竑等都是代表大地主反对农民运动的，此次出死力为蒋活动，此外如吴稚晖、戴季陶等又都〔是〕封建社会的人物。

中国革命运动非常复杂，过去革命力量最大的为工人与农民，更使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害怕。不幸一部分新右派军队与之结合，纯为意大利法西斯蒂的行动。

蒋介石不仅代表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向我们争斗，他还联合破落伍收买长江一带的青红帮来帮助他，如芜湖、安庆等打工会党部都是流氓所做。蒋曾用六十万款子收买青红帮，这是表示蒋介石最后暴露其流氓性。

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自命为无政府党，现已联蒋反对工人，完全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行动的表现，他们代表很多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我们要认识清楚。

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李济深等都坚决表示要反对共产党，要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这就是分裂革命势力，使反革命势力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根本危险，我们所提民主独裁制的政治将完全无望。

在上面的结论，此争斗是很整个而有全社会阶级的关系，此争斗的爆发，将为军事的破裂。蒋介石等已在准备一方面压迫南京左派的军队，一方面为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

现在南京左派的军队在包围中，安庆的李军及无锡、苏州等处都调有蒋的军队，蒋又将调薛岳到南京，现在用许多方法笼络薛岳，薛的态度有点改变。同时上海调开薛岳，更易解决上海的工人。此外赖世璜、周凤岐的军队都来上海，昨天李宝章也已投降，李的通电中毫无革命意味，完全服从蒋介石。广东新右派也把教导师改为省防军，并派钱大钧到江西。在上海纠察队所驻的地方，他们派来五千多人四面占据民房来包围，同时对部下军队大肆煽动。在外交上，蒋对宁案及帝主一概不提，与帝主妥协。此次汪精卫一到上海，他就很聪明的发表通电，其作用：

一、抵抗武汉。

二、借重于汪，更团结部下而好拉左派。

三、在民众中可以缓和反蒋的空气。

蒋在政治上有很多计划，几天以前想召监察委员会推翻武汉国民政府的决议案。最近又想软禁汪精卫在上海，用种种威吓手段，造谣欺骗并冀图再召集国民党中央会议，推翻武汉议决及排斥C.P.。

汪精卫的态度非常之好，政治观念很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他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

汪来后，上海争斗比较缓和，前晚蒋已下动员令，后因汪来即收回，但蒋是没有调和余地，他的出路只有胜利与失败，毫无妥洽的可能，冲突是不可免的。

上海除掉C.P.与新右派对抗的形势外，整个的上海民众除掉大的银行家与资产阶级外，都是反对蒋介石的。因为他们所希望的蒋介石，已不是现在的蒋介石，蒋用武力压迫市政府之成立，同时他新定一省政府名单，一个商人都没有，因此，商人都表示反对，视为新军阀。此外，许多知识阶级学生都不能满意于蒋，即上海国民党员也反对蒋介石，如不见党员及派便衣侦探到市党部威吓等。总之，蒋已入于讽〔疯〕狂态度，已脱离民众向反革命路上去。

上海的帝国主义对蒋非常赞同，天天造谣促蒋压迫民众，天天帮助蒋介石。

我们可以认清上海的冲突不能免的，如果上海的工人能与江、浙、武汉左派势力联合，一致把新右派势力打倒，则中国革命运动前途将大放光明，而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我们党领导工农阶级与新右派决斗胜利，则我们党必大发展，操得很大的政权。否则，我们党我们工人力量都将大受打击，所有工会、学生会都将被打倒。现在他们已在另组市党部，另组工会。蒋对部下说上海的工会是少数流氓的组织，所以他们一旦下手，来势非常危险。

我们的策略，我们唯有与蒋奋斗，我们有实力有群众，只要策略应用得好，有胜利的希望。同志不应害怕，要积极活动，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的策略：

一、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所有上海的工人，要积极准备，认定自己是主体，去领导各阶级民众起来奋斗。我们要坚决保持工人武装，在事实上我们希望暂缓爆发，区委在政治上军事上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在目前要使民众明白上海的局面，对民众说明新右派要解除工人武装即为向一切民众进攻。在具体的工作上我们要尽力拉住商人，积极帮助工人，并对蒋威吓。余如市政府要尽量使商人参加，我们一方面要使工人与商人建筑很好的关系。学生方面要召集全上海学生代表会对蒋表示，并要提出拥护上总的武装，我们要使学生明了此争斗的意义，能做到罢课。在工会方面要努力宣传此争斗的意义，要准备罢工，如果蒋介石来缴纠察队的械，所有工人都罢工，到华界来援助缴蒋军队的械。有许多人主张上总武装暂时收藏，这是自杀的政策，我们只有向前奋斗，只要北伐军不来解除我们的武装，我们当然不去挑衅。

我们在此时期，决难避免冲突，我们情愿不避免大的流血与牺牲，未来的历史是很光明的。

各部委、工会负责的同志，要组织宣传队到各种民众中去宣传，尤其是要尽量与兵士谈话要做到兵士将来不受上级命令而打工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二、武装力量与新右派的争斗：

（一）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

（二）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

（三）找许多联盟武力。

三、挑拨离间新右派的军队：

（一）我们要使新右派的兵士受我们的宣传与联络，使其内部瓦解。

（二）在迎汪运动中要热烈的表示，要利用蒋电在他的部下煽动，赞助蒋实行集中党权的电文。

（三）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的分子也可不怀疑，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是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

上面这许多工作，我们要有决心，要认清现在的争斗，是整个的社会关系，我们不能退让，我们要为主体，我们不避免冲突，但不取进攻的形势。我们在目前要尽量〔做〕民众的宣传与罢工、罢课、罢市等准备。

我们希望蒋介石从市政府开刀，市政府要积极进行，要宣布各种革命的文件，要举办各种革命的工作，听凭蒋来开刀。

至于武装冲突的形式，我们希望一爆发，各工人群众、学生群众、国民党群众马上起来罢工、罢课等运动，并使群众赶到闸北援助工人，绝对不能疏忽与弛〔迟〕缓。

在此形势中，新右派已在秘密调查我们的机关与同志，我们要准备很多技术秘密机关，要能一爆发立刻秘密起来。在未发动前，仍要保持与群众接近的形式。

总之，革命是我们领导的，我们要坚决认定积极负责，开始奋斗，此责任完全要我八千多同志担负起。

士炎：目前上海的局面，新右派已在布置第二个三月二十号。但我们已有民众拥护，不致再蹈失败覆辙。

我补说：

一、今天消息，武汉国民政府已要蒋离开上海，到南京准备北伐，这是很对的办法，现在就要看老蒋是否服从，如不服从则目前斗争将反紧迫。但于此我们可以证明上海的民众，已得武汉国民政府的后援。

二、新右派已发表反对两党联合的政府，我们要说明这是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不能反对C.P.参加，并不是两党的政权问题。

三、右派在民众方面已在进攻，如另组学生会、工会等。在政治上白崇禧已派人检查新闻，昨天市党部及工会的新闻都不删略，市党部应起而交涉。此外，已在贴反动标语，我们除准备外，在社会上、民众上不能让步。

四、要注重许多建设工作及广大民众的工作，如群众的统计活动的同志，要赶紧做此种工作。市党部也只有积极活动，负责工作。关于组织等等的运动都要好好进行。余如学生等都如此。

五、党的内部，前天统计有8374人，140余支部，当然要打折扣，究竟确实多少，各部委要负责清查。

六、浦东三县都为我们同志暴动夺下，昨已被白崇禧派兵夺去，我们因无群众而完全失败。足证我们在上海如果有广大的民众，就能保持市政府与纠察队。

问题：

一、反蒋的宣传程度。

二、工人要求问题，是否可以宣传反蒋。

三、对准备罢课宣传，区委应有很好的指示。

四、迎汪市民大会开否。

五、国民党对各军政治部被捕反无抗议。

六、对工界联合会及右派组织的学生会之态度。

答复：

一、反蒋宣传，我们要认定客观环境，并不象我们所预定，客观上实在民众已很反蒋，我们为何不能宣传反蒋，我们要积极宣传。唯反蒋宣传要有办法，不能贸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我们可把蒋的军队包围俱乐部的具体事实宣传，说工人非保持武装不可，又把蒋之反对市政府事实宣传。

二、说市政府受蒋压迫，不能行施〔使〕职权，所以工人要求不能实现。

三、学生宣传也要用很巧妙的方法，可先讨论整个的上海政治问题，如撤除铁丝网、海陆军、市政府等。蒋无表示是否妥协及解除工人武装等，我们要派代表去问蒋，对工人表示同情，同时准备罢课援助。

四、市大〔会〕可以开，日期定礼拜日。

五、国民党应当注意。

六、工界联合会策略已交上总，学生代表会尚无确定，可先宣传反对。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总工会为反抗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总同盟罢工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

昨日（十二日）晨四时，突有由租界冲出之武装流氓，身着制服，袖佩“工”字符号，在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向本会纠察队攻击。驻本埠军队各师团营部预奉有命令，也同时动作，以种种欺骗手段，缴去本会纠察队全体枪械，并抢去工会纠察队驻所一切物品，虽一衣一履，囊括无遗；缴械而后，呼啸入租界而去。本会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自晨六时起，各处工友陆续罢工出厂援救，对兵士哀号泣恳，竟遭射击。前后情形，惨不忍言。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事实俱在，证据确实。本会至此，惟有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本会所领导八十余万工友，誓死奋斗，宁愿死于以国民革命为旗帜者之手，虽死亦有荣。谨此宣言，惟各界同胞鉴察。

——原载《蒋逆铁蹄下之东南》，转录自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

上海总工会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全国通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全国各界同胞钧鉴：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突于本月十二日上午四时，下令沪上各军与租界当局所收买之流氓便衣队，包围上海闸北、南市、浦东之工人纠察队，用机关枪扫射八时以上，死伤多人，全体缴械。窃我上海工人，素为反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先锋，历次响应北伐军，推倒孙、张军阀，牺牲极大，卒能驱除顽强抵抗之奉、鲁军阀，使上海工作上不无微劳，而所得者仅此夺自奉、鲁军阀军手中之枪械，而编成纠察队用以自卫。此纠察队并非如军阀之欲发展各人之野心，割地盘争权利，实系根据历年来受帝国主义者、军阀、流氓及一切反动分子压迫的经验，为自卫计，不得不成立此一种武装联盟，与商人之商团、市民之保卫团同属民众武力，正合革命需要。反令勾结帝国主义，扑灭民众之武力，得称为革命军正当之行动耶？

我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均在本会指导之下，经过长期之训练，组织严密，向少无意识之举动。当鲁军败退时，帝国主义及鲁军阀之枪炮所引起之宝山路大火，工人纠察队一面与鲁军搏战，一面救息火灾，于鲁军被缴械后，立即恢复秩序，于此可见工人纠察队是市民秩序之维护者。党军抵沪，即再三宣言对外一切外交问题，悉与国民军同一步骤，决无单独行动，以致行动步骤不一致。白总指挥抵沪后，曾正式宣告工人纠察队与别动队不同；蒋总司令也曾声明此言，谓“工人武装为自卫计，乃属必要”，并谓“决不缴械”，今言犹在耳！是工人纠察队毫无违法可言，且国民政府出有通令保护。兹姑退一步言，即令根据如何理由有缴械之必要，同属革命组织，兄弟骨肉，有何不好商量？尽可预先通告，事前商量，乃必出此残酷高压之手段，演成市街之流血，危害市民生活之安全，破坏军民之联合，使帝国主义者笑，乘我兄弟阋墙之际，更可乘机进攻，岂但于法律手续有所不合，并于革命前途影响实大。此等举动在帝国主义、军阀为之，吾人亦视若寻常，今乃竟由革命之北伐军对于革命之工人纠察队为之，实为国民革命之污点，我工人甚为耻之。我工人自始即信托北伐军，虽帝国主义者日日造谣，谓党军将如何敌视工人，将缴工人纠察队之械，工人卒不之信，此于党军用欺骗手段来缴械时更可证明。不意堂堂皇皇之党军，竟听帝国主义者之谗言，并协同之以缴中国工人之械，若全国党军皆如此，吾人不能不为国民革命前途痛哭！

现在上海全体工人愤懑自卫武装之被掠夺，总工会之被蹂躏，为革命前途计，为打倒新军阀及帝国主义计，已宣布一致罢工，不达目的不止。我人要求交还纠察队武装，肃清反革命派及一切流氓、工贼，向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保护工会，惩办负责之军事长官。除电请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外，特此布闻，深望全国同志一致援助。

——原载《蒋逆铁蹄下之东南》，转录自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工人们！劳动者们！受尽压迫的人们！

共产国际向你们呼吁，号召你们向帝国主义表示公开的和群众性的抗议，因为帝国主义要把世界拖入新的世界战争灾难的深渊之中。

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开始到现在已近十三年了。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从满目创痍的战争破坏中复苏过来。迄今为止，数十万残废人，千百万卑鄙战争中的负伤者依然流落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欧亚大地上的斑斑血迹至今未干。迄今为止，全世界依然在危机的痉挛中震颤，而危机的根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现在，大炮炮口又硝烟迷漫了。依然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已经挑起和正在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杀人战争。有一百七十多艘军舰停泊在中国港口。日、英、美和其他“大”国的几万名陆军，已经踏上了浸透着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血汗的土地。中国各大城市实际已被“文明的”杀人匪帮所占领。他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在长江中到处游弋。各港埠也被资本强盗据为己有。中国遭到舰队的封锁。满州被日军占领。帝国主义军队与反动匪徒张作霖串通一气，进行着灭绝人性的反对革命的战争。

尽管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分歧，现在已经不要宣战、不要冠冕堂皇的名义，同心协力地进行着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同时，它们也已开始准备反苏战争。对苏联驻北京代表团的袭击、抢砸、拘捕、殴打、沙俄白卫军和英国人、美国人包围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对苏联进行明目张胆的挑衅，这一切事实都说明，这是帝国主义海盗有步骤策动的一个完整计划。

英帝国主义企图束缚英国工人运动和取消无产阶级工会的一切权利，因为它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以便去建立它的军事“功勋”。

法国金融寡头在国内实行“军法”统治，要把全国变成兵营，因为它要尽快准备大屠杀，尽快酿成帝国主义政客所需要的新事变，尽快挑起再次分赃的新冲突，尽快准备再次干涉无产阶级革命。

现在，一切资本力量都已集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反对工人运动的堡垒——苏联，因为它们正在准备新的世界性大屠杀，要干一场比1914年更为罪恶、更为血腥、更为残忍的大屠杀。

国际联盟，这个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最虚伪的机构，为这场大屠杀百般掩饰。国际联盟就是帝国主义强权者扼杀各国的联盟。这个联盟说的是和平，干的是战争，说的是保护弱小，干的是消灭弱小，说的是裁军，干的是疯狂扩军。它一手摇橄榄枝，一手持剑。卑鄙的帝国主义屠夫，就用这把鲜血淋漓的剑杀害了叙利亚、埃及、印度、摩洛哥和中国的千百万被难者。

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的领袖也为这场大屠杀掩饰。他们空口侈谈和平，而把主要精力用之于同和平的堡垒——苏联的斗争。对于国际帝国主义下流无耻和出卖灵魂的报刊所编造的谣言和诽谤，他们也是百般支持和推波助澜。

在这场日益发展的大搏斗中，帝国主义利用了旧世界的一切败类渣滓，号称先进民主国家的英国和美国竟同墨索里尼的刽子手、同张作霖之流反动强盗、同被革命扫帚赶出去的旧帝俄白卫军携手合作了。他们收买叛徒，他们雇用刽子手。因此，劳动人民必须为保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英勇斗争。

帝国主义者不仅封锁了整个中国，而且也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团结，收买了蒋介石。此人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叛徒，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核心人物。

蒋介石与外国人达成协议，在上海发动了政变，解散了上海政府。他的将领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并秉承外国强权者的旨意，枪杀了几百名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妇孺。我们怀着极大义愤和对刽子手的满腔仇恨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是国民党革命派的敌人，是工人运动的敌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敌人。

各国工人阶级、各国被压迫人民都应当看清，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反帝斗争。工农运动强大的浪潮，吓破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胆。这个运动囊括了如此众多的人类，如此广大的群众，以致于任何帝国主义力量都不能扼杀伟大的中国革命。无论是派遣舰队，还是实行封锁，无论是收买还是谎言，帝国主义者都不能扼杀这个革命。

他们现在准备通过新的世界性大屠杀来扼杀这个革命。但是，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群众必将奋起反对这场大屠杀。士兵们必将奋起反对这场大屠杀。各被压迫民族必将奋起反对这场大屠杀。印度已开始酝酿风潮，英军指挥部已决定从中国调出旁遮普部队。帝国主义军队中已开始搜捕。欧洲工人阶级已开始抗议。苏联千百万工人群众上街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抗议扼杀中国，抗议新的大屠杀。

中国革命的巨大规模及其给与殖民地世界与欧洲无产阶级的影响表明，资本主义危机非同寻常地加深了。由于危机的加深，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又集结起来，而且把彼此酝酿战争的分歧暂时搁置起来。帝国主义者出兵中国以及他们险恶的对苏挑衅计划，必将危及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因此，共产国际号召全体工人、农民，号召一切劳动者、一切反对战争的人们，勇敢地投入抗议活动，勇敢地参加反战斗争。

不要听信资产阶级报刊的谎言！

必须要求从中国撤军！

要采取一切措施制止调运武器和士兵！

打倒新的世界战争的挑拨者和祸首！

打倒屠杀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刽子手！

打倒蒋介石和其他叛变者以及残杀的策划者！

上海工人万岁！

国民党革命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载1927年4月15日《真理报》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附〕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黄绍竑

一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我是同蒋介石合谋发动的桂系军阀首脑之一。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会议，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枢纽，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济深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这次反革命政变使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遭到屠杀，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我过去对于这一段充满血腥的罪恶历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济深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曾经鼓励我写历史资料。他说，“你应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如果有那些不清楚的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你。”现在李济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参加过那次反共会议的，在大陆只有我一个人了，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把这一段经过写出来。我写这一篇资料，目的主要是暴露事实真相，可能写得不全面，分析批判更是不够的，希望读者指正并严加批判。

二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宁接到李济深从广州拍来急电，要我立刻秘密去广州商量要事。那时我因家眷还住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广州是时常来往的，因而我这次去广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乘专轮到广州后，立即同李济深见了面。他取出一份蒋介石由南昌拍来的密电给我看，内容是要李济深和我两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问题。电报里虽然没有说明是什么重要问题，可是李济深和我都不约而同地料定，一定是为了反共，因为那时候南昌、武汉以及各地的国共斗争已经很露骨了。我和李济深互相交换了一些情况和看法，在反共这个问题上彼此所见略同，不谋而合，于是，我们就决定同去上海。他说，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他并且提醒我说，现在码头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监视很严，我们行动要秘密。我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妻子。为了保持行动秘密，她劝我把留了六七年的落腮胡须剃去。我就匆匆忙忙剃去胡子，坐了一只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轮船泰山号。

在泰山号船上，我同李济深见了面，同行的还有冯祝万（那时他是参谋长还是财政厅长，已记不清）、陈孚木及随从一人。我们当晚10点多钟就到了香港，李民欣早已在码头上秘密

迎接。他同香港的一班买办有联系（他的老婆是香港某买办的女儿），从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已经由他办好了。我们下了省港轮船泰山号，马上就上了美国邮船庇亚士总统号。第二天，邮船就向上海开行了。

在由香港赴沪途中，我们在船上也作了几次秘密谈话，内容无非是补述一些当地情况和商量到上海以后的共同主张，由陈孚木作记录。陈孚木是廖仲恺被刺时同时遇难的陈秋霖的老弟，此行替我们担任秘书。

4月2日上午，邮船驶入黄浦江，还没有泊码头，白崇禧就派他的参谋长兼上海市市长张定璠乘海关小火轮到船上来迎接我们了。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们说，租界里万不能住。他说："自从我军克复上海之后，租界的周围都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严密封锁，他们同租界里的外国军警隔着铁丝网对峙着，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险。白总指挥要你们两位到他的总指挥部去住。"我们就乘小火轮直接开往设在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我们在小火轮上看见满江外国兵舰的大炮都褪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区，情况的确相当严重。船到了高昌庙，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码头上迎接我们，李宗仁也住在总指挥部里。

三

在我们到达上海以前不久，蒋介石就已经到了上海。我们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应钦、吴稚晖（当时任南昌总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陈果夫（中央监察委员）、陈立夫（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同来的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住在总指挥部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后，他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到会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主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我也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从而，我的结论自然也是"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在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他居然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恶作辩护，把南京惨案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说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发言最多。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

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诬蔑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反共）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白崇禧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吴稚晖的发言满口无锡土音，我不大听得懂，只听见他说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等等谬论。他的话我虽然不太懂，但是当时我对他这个人还是相当“敬仰”的，认为他是“理论家”（蒋介石称他为国民党的“瑰宝”）。陈果夫不大说话，我同他是第一次会面。他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个钱庄的挡手。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部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

这次秘密会议上各个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慄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企图扑杀革命的反动阶级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而我们这几个桂系军阀头目追随蒋介石合谋叛变革命的滔天罪行也就从此开始。

四

在4月2日秘密会议以后，为了使“反共清党”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开了一次秘密谈话会。参加的有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查阅当时上海报载出席的还有汪精卫、甘乃光，实际上此二人并未参加）。由于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都是少数，无法代表国民党中央，这次会上就决定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地方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这个咨文是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陈果夫等包办的，内容如何，当时我并未看过，现在将查到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咨文摘录如下：

> “（衔略）窃本会职责所在，‘党员施政方针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尚应过问，则弃裂本党政纲、酿成亡党卖国之行为尤应举发。是以本会委员分赴各地，遄集上海，遂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开临时会议，决定于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到会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人杰、吴敬恒、李煜瀛、陈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经出席委员共同讨论，……全场一致议决将访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单另附）咨请贵委员等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一面由贵会公决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共议处分。（下略）”

这个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进行处理，实际上不过是替蒋介石叛变革

命的阴谋作政治上、舆论上的准备，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这个咨文所称四月二日举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一节，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监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三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但把三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复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贵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乱党国，中正所辖各军汛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从中监会的咨文和蒋介石的这个复函看来。似乎蒋介石的反共并非出于他的策动，而是根据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举发，实际上，这完全是蒋介石一手布置的烟幕。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是一贯搬弄这一套手法来掩人耳目的。

最后，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联名发表了一通长达三千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摘武汉国民党左派“不合者”二事，列举“可痛心者”九事。电文最后说：“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披沥奉陈，敬候明教。”

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叛变革命的政治准备就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下手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从这个“护党救国”通电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2日起，在蒋介石、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帮会流氓以及我们这一小撮反动军阀和投机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场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特委会议记录

——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到会者：延①、立②、亦、士、恩、尹。

立：述之、子璋到后，中局讨论上海问题的结果，有许多意见，派我、延及维金斯克来上海，并加入士炎及恩来五人组特务委员会，并望我们在二十五号以前回到汉口开代表会。

我们来的任务：

一、催大会代表，要亦农去，延年留上海代理书记。

二、组委员会：今天新决定委员会亦农及三俄同志参加共九人，决定开三次会，议程：

（一）区委报告。

（二）委员会报告，以后区的工作报告（由区委报告）。

（三）委员会与区委联席会议，一方面报告中央议决案及以后区的工作方针，并讨论议决案，或再由委员会对部委会报告。

今晚要讨论区对于武汉以后对于全国政策的方针，决定后由委员会联名电武汉要他们执行。

恩来：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以上错误，沪区完全承认，并要把此意告诉武汉。

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亦农：我们对于中央并不要责难，不是以沪区意见对中央提出。

---

① 延即陈延年。

② 立即李立三。

上海过去做〔犯〕了许多错误，而武汉对于上海太不注意，甚至对于上海市政府表示不赞同，我觉武汉方面对于上海的观察不见清楚，关系也不见灵密，也许是交通不便所致。

对于政治军事，昨天区委讨论，对于恩来意见都一致赞同，唯对中央致电固很必要，但只处提出意见态度，而不是提出抗议。

士炎：致电中央大家意见都已一致。唯我在这几天感觉，目前实为中国整个的革命与党的最严重的时期，如果策略稍有差池，关系非常重大，上海为无产阶级力量表示得最伟大的地方，与全国各处，有不接气的地方，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坚决的策略，关系今后党的进行实在太大。我意现在如要消灭新军阀与资产阶级，问题并不简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坚决的策略。所以我们此次致电中央，除说明恩来意见外，同时要表示很坚决的态度。我们要看清反动力量非常浩大，敌人进攻，已到万分紧迫的时期，我们在"三月二十日"的右倾错误，已经得到教训，但那还不过是政权党权的争斗。现在的形势，比三月二十日还要重大，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以自陷于危境。此外奉方与老蒋究竟有无发生关系，也值得研究与注意。

立：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犹移。现在不但是军事上犹移，已发生政治上的犹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现在武汉既连下不准蒋缴纠察队械、要蒋保护市政府、不准蒋在南京开会三电，可见武汉方面对于政治上的策略又已坚决，其所以不即下讨伐令者，纯为军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电报，要多注意军事分析。

讨论电报：

发电名义——个人签字。

电文内容——

延年：在政治上，要说明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在军事上，武汉方面第一、第七军必可开拔南下，他们预备四万支枪到南京。

士炎：军事上除奉系问题外，还有帝国主义与青红帮的两个问题也关重要。

立：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蒋巩固得多。在军事上，老蒋的巩固进程比我们快得多，如果愈延长，他的力量愈巩固。再加老蒋用反共的宣传，将来很可取得政治上的巩固地位。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赶快打蒋是毫无疑议，且我们目前不打蒋，蒋将来必打武汉，到那时就非常危险。现在武汉所最困难的为经济问题，非打到江浙，在经济上就无办法。

电文起草——决定恩来担任。

（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等号召广州工人罢工抗议“四一五”大屠杀*的传单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全广州工友们：四月十五日，反革命派蒋介石、李济琛、①古应芬对于我们工人施以巨大的摧残，封闭我们工会，枪杀我们工友，拘捕我们的领袖和工友，并且公开的反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我们为了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且反抗反革命派的摧残和恐怖起见，决定举行政治总同盟罢工一天。兹特颁布罢工纪律四条，各自遵守：一、自二十二日早起，一律总罢工一天，二十三日一律复工，不得参差。二、不示威，不巡行，不得扰乱。三、极力维持市面治安与秩序。四、绝对服从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命令。各工友接到通告后，立即执行，不得违误为要。

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打倒反革命派蒋介石、李济琛、古应芬！恢复被摧残工会！释放被拘捕工友和革命分子！农工商学兵联合万岁！工人团结胜利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
省港罢工委员会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
香港总工会
一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

——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北京《晨报》，转录自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

---

* 这天广州的铁路、海员、轮渡、印刷和油业工人等都举行了罢工、反动派实行残酷的镇压。

① 李济琛，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李在广东也进行了“四一五”大屠杀。一九三三年因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媚外政策，于当年十一月同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公开宣布和蒋介石破裂，并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事败后，流亡海外。抗日战争爆发回国后，仍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坚持民主、反对内战，曾经三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继续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我党中央发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他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来到解放区，参加了政府工作。他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于1927年4月16日通过，汉口

为了扩大和深入中国革命，必须给奉军以决定性打击。这个任务必须完成，因为彻底消灭奉军，意味着给帝国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这同时，必须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战胜企图分裂革命运动的蒋介石和资产阶级。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国内军阀和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国民政府必须有一个巩固的基地。

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然而最需要的是保卫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否则，巩固革命基地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进行。为达此目的，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这个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立即占领直到河南省南部的地区；

（2）与冯玉祥建立紧密和有效的合作，使他的军队能逐渐向陇海路推进；

（3）从浦口撤出的第二军和第六军，必须向北进军，占领安徽西部。

这些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最终将导致占领陇海路，成为保卫革命的第一线。长江是第二线，在第二线后面，发展工农的力量，以巩固革命的基地。

越过陇海路之前，巩固基地的工作拟根据罗易同志讲话中的建议进行。认为在国民政府直接占领新地区之前，南方和西南各省的革命力量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推测是错误的。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作出向北进军的决定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应予考虑。

（选自《罗易赴华使命》）

两天后，中共中央委员会撤销了这个决议，同意了国民党关于立即派军队到北方去的决定——罗易注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期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够，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十一部分。

一　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

中国革命在这两年当中有很大进展。它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到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事件和郭松龄倒戈；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国民军第一军退出南口；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革命军占领上海；第四个时期，是从占领上海后到蒋介石叛变。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事件，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从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到上海事件爆发，是革命的胚胎时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曹锟失败和冯玉祥政变反对直系的时候召开的。当时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如下：一方面，孙中山到达北京，形成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另一方面，上海发生了二月罢工，这就掀起了小资产阶级（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和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要求而斗争）运动的高潮。因此，这是运动的转折时刻。

一九二五年五月的上海事件有它的特点。第一，这个运动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在此以前，虽然也发生过反帝斗争，但是并不具有这样的公开性质。第二，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力量已被全国人民所公认。以前，工人的反帝斗争只是被看作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上海事件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上海事件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引起的。我们知道，上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每次罢工都不能不引起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上海的运动不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运动，必然要扩大到全中国。因为，首先，正如我们所说的，在上海五卅事件以前发生过总罢工和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而这一运动受到了北方军阀的镇压。人民群众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召集国民会议，于是更

* 这份报告译自二十年代中期翻译的俄文稿，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找到的。这次由俄文转译成中文时，曾参照另一份五次大会《中央政治报告》（可能是陈独秀报告的摘要稿）的俄文、英文和德文稿作了校订。但是，有些地方的语意仍不够准确、完整，或前后矛盾，或悖于历史事实，或前后文不相衔接和协调，等等。这些可能是当时译成外文时的误译或因不恰当的省略所致。对这类问题，除译者作了几个脚注和编者加了几条注释外，不再一一列注。

加有力地开展了反对军阀的斗争。因此，上海事件才能这样广泛地扩大到全国。五卅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很多阶级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仅有小资产阶级，不仅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落后的官吏和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运动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的工人。然而，为时不久，各个阶级逐渐脱离联合战线，只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

此外，还应当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革命事件对军队的影响。最早是冯玉祥政变反对曹锟，尽管这也是革命事实，但从主观上看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五卅运动以后，国民军的官兵有了革命认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行动，也是由于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旧军阀之一唐生智转向广州政府，并参加了北伐。然而，很难断定他们会变成忠实的革命者或是投机派。但是革命浪潮已开始影响军队，这是事实。因此，军阀的反动统一阵线已经瓦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困难就在于：被压迫民族没有武装，而压迫者却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人拥有相当多的武装力量，尽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可是我们能够夺取过来。我们能够使军队具有革命意识，并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能够直接夺取军阀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对军阀。

从上海五卅运动开始到郭松龄倒戈，乃是革命发展时期，即革命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者既然不能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就只好做出让步。他们召开了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这个时期，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分歧。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在威胁无产阶级，并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其目的是镇压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戴季陶主义起初只是企图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此刻却打算把这种力量完全消灭干净。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已公然向无产阶级进攻。以前，在革命高涨时期，即上海总罢工时期，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冯玉祥的军队转向革命方面。郭松龄倒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张作霖。因此日本不能不进行公开干涉，以便压倒郭松龄。郭松龄失败后，革命浪潮低落下来。在革命浪潮低落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组成联合战线向革命进攻。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反对赤色危险。国民党右派召集西山会议，将国民党分裂成两派，他们的活动至今仍在续续进行着。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南口失陷，这是革命运动低落和反革命高涨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七、八个月之久。经过这次反赤运动，在帝国主义之间和军阀之间均发生了分裂和冲突，日英两国的冲突和奉直两系军阀的冲突就是例子。这些事实都发生在举行北伐之前。

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占领上海。这个时期的标志是革命运动的高涨。三月二十日事件固然是反动时期的因素，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无产阶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也想与资产阶级合作，依靠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两个期望进行北伐的对立阶级实行了合作。在三月二十日事件以后，尽管工人阶级的处境困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仍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一运动发展到占领上海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已得到加强，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再续续与无产阶级合作，而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以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明显，是潜伏着的，现在这些矛盾已十分明显。

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事件与过去的事件不同，因为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阵线。尽管革命队伍的数量减少了，但革命群众的质量却提高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极大的巩固。

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来看，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生明显的阶级分化。应当使工农

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进行加强军队中的左派运动的工作，以便更加提高军队的革命情绪。我们必须完成这两项任务，因为这会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党在上述各时期的策略

在第一个时期，在五卅事件准备时期，我们举行了经济罢工。那时我们是孤立的，必须利用小资产阶级，让他们与工人一道参加经济斗争，从而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这是五卅事件前的策略。这一时期的策略的第二点是召集国民会议。孙中山北上时，党内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广州的同志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北上，革命运动可以扩展到广东范围以外。中央的意见是：孙中山留在广东可以巩固广东的革命成果，从而肃清反革命势力。这些观点的差别是，一部分人希望发展革命运动，另一部分人主张巩固革命运动。现在，回想起这些争论，我们觉得，当时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孙中山北上，扩大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这个成果很重要，因为如果孙中山留在广州，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时广州的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任何巩固革命力量的工作也不能进行。

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工作已扩大到全国。当时党在策略上的错误，不是缺乏积极性，而是不了解孙中山北上的意义，没有看到他北上对全国革命发展的影响，只是看到孙中山与唐生智会见*的危险性。

党在五卅运动时的策略，起初是吸收各阶级参加这一运动，可是当时党并不相信有进行全民革命的可能。事实上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左派参加这一运动，是想保全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右派也是为了自己才极力利用这一斗争，但并不积极参加斗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又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必然脱离这一运动。小资产阶级则采取中间态度。结果，只有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军阀则有可能镇压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党的策略错误造成的，而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资产阶级不仅不愿受我们领导，甚至不愿与我们联合。五卅运动中有许多独特现象。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我们的敌人说我们想用这种策略来掩盖我们和军阀的勾结，可是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已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中等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经自觉地行动了。戴季陶在其小册子里就指出了这些事实。他的小册子不是偶然发表的，也不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他的小册子里写道，资产阶级已成为自觉的阶级。这本小册子必须读一读。

这种理论后来就形成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没有在革命战线里呆很久。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决定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们当时已经非常坚决地反对了戴季陶的理论。早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

*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孙中山北上是会见段祺瑞。——译者

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我们确认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五卅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队伍。戴季陶反对无产阶级的小册子，反映了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恐慌。在全会的决议里，我们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另一方面，应当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同时，还应当进行独立的工作，一旦国民党离开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决议就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的。现在当我们考察这个决议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发展和巩固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这点是正确的，而准备退出国民党，这种策略则是不正确的。毫无疑义，我们没有理由退出国民党，我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做工作。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不明确，只有蔡和森同志非常坚决地反对。由于这个决议，使得我们的策略很不明确。关于准备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决议里没有谈得十分清楚①。问题的这种提法，只是使我们产生思想混乱。这里所说的是为准备而准备的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走上妥协道路的问题，从上海五卅事件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不仅大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联合战线。

我们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已注意到农民问题。农民中的多数不是地主和一般农民，而是贫农和无地的农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就会发生小地主反对无产阶级的危险。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与小地主联合起来。我们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要失去活动能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后，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们都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们的同志注意了农民工作和农民运动。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有将近一千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②。这个策略没有错误，我们必须续续实行。现在党内农民占百分之十八。中国人口大部分是农民，据我看来，将来党内农民的数量应与工人的数量相等。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在党内应占百分之三十左右。我们不仅应续续实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而且应续续把农民吸收到党内来。

在五卅运动中，还有一个香港罢工的问题。香港罢工（抵制），使香港受到破坏，至今尚未恢复。这次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肃清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方面，积极支持了国民党。罢工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功绩。关于这一罢工问题，党内有两种意见：一些人主张尽快结束罢工；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者本身也不愿意结束罢工。从原则上说本来应当尽早结束罢工，克服这些困难。幸好，我们同志的工作和国民党左派政权的工作做得好，又有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这三个条件才没有发生危险。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罢工再拖延下去，必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就会失掉工人对我们的信任。现在李济深破坏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个责任不在我们。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开始到南口失陷，这是反动时期。

在郭松龄倒戈时，革命似乎仍处于高涨时期。但实际上这时帝国主义已开始进行干涉。当时北京的同志想组织“首都革命”。愿望倒是英勇的，然而是错误的。第一，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没有作出明确的估计。第二，他们忘记了脱离武装力量的殖民地革命的危险性。他们没有同国民军合作，想独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行动是幼稚的，虽然这也是英勇的，但英勇得太过分了。这个危险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没有经过党中央的同意而擅自决定的③。

现在我们对整个五卅时期的政策做一个评价

在广州，一方面，战胜了陈炯明，另一方面，平定了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为了反击封建地主而同资产阶级共同完成的。这些地主不仅仇视无产阶级，而且也仇视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因此，当时曾策划暗杀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人。然而，暗杀这些人的活动未能得逞，只杀了一个廖仲恺。这次暗杀阴谋是封建反动分子在他们军事失败之后干出来的。他们在社会上还保留了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攻的某些力量。这一点从暗杀名单上可以看得出来。廖仲恺被害的过程，暴露了胡汉民、许崇智、熊克武与陈炯明的关系。许崇智以前曾和我们一起进攻过陈炯明，而现在却同他勾结起来了。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广州政府惩办这三个人，但我们的中央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没有公开阐明这一政治罪行，因此社会上对它认识不清楚。右派分子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压迫国民党，并把胡汉民遣送到苏联。对此，国民党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如果进行了，那至少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而会认为这是党内的个人冲突。由于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所以这件事便失掉了它的政治意义。

在反动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去年的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在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生的。蒋介石就是武装起来的戴季陶，他的所做所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戴季陶主义形成以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学会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为镇压无产阶级而成立的。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戴季陶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甚至镇压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他们说："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

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而在广东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和鲍罗廷却认为，如果我们不去镇压国民党右派，我们就不能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个意见也是正确的。但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国同志都没有向中央谈过我们能够镇压蒋介石和援助左派。

鲍罗廷同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甚至今后也不要在军队里进行工作。可他事先也没有就此向中央提出过任何建议。

这就是说，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是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才提出来的。镇压蒋介石，就可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中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退出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联合战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资产阶级的援助而独立地进行革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进攻资产阶

级等等的问题。现时，党就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

国民军第一军在南口遭到失败以后*，广州军队的北伐开始了，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涨起来。从占领湖南省后直到占领上海期间，农民运动在某些省得到了发展。在收回汉口的英租界后，中国革命不仅席卷全国，而且还威胁到资本主义世界。

关于北伐问题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了关于北伐的问题，但直到五月，北伐军才开始北进。在召开北京会议时，吴佩孚已准备进攻广州。

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来到上海，给我们作了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北京会议的决定，但我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

当时我曾打电报给北京，电报中说：第一，必须解决北伐问题；第二，党中央应当留在北京。

共产国际代表去广州考察那里的形势，适逢三月二十日事变。我拍电报给汪精卫和蒋介石说，必须开始北伐。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的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如果军队不北进，内部将要发生冲突。可是为了服从莫斯科的决定，他不得不反对北伐。

共产国际代表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如果蒋介石利用北伐镇压和剥削人民，那末首先遭受灾难的是广东和广西的人民。因此，党对北伐的策略如下：

（一）支持北伐；

（二）北伐应当具有防御性质；

（三）党的策略应当是反对一切企图利用北伐来剥削人民的人。

现在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

（一）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对报告作以下的补充：

第一点，我谈的反动时期，中心事件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即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国民党五月十五日决议案这段时间。

第二点，关于党的反帝策略。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主要注意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中国，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英、美、法、日四国，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英国和日本。但在这两国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在中国，日本在经济上几乎被英国所压倒，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军队可以迅速地调到中国的领土上来。因此，我们的反日斗争就具有较温和的性质。

---

* 原文如此。——译者

二　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资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叛变革命，我们在广州可以看出这一点，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江亢虎宣传过社会主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可是这个运动在长江流域却把流氓无产阶级和贫农等广大群众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当然，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运动。

孙中山也宣传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因此，很多人反对他。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④，该阶级的代表宋遯初等反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当时的宋遯初就是现在的戴季陶。

虽然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但这种趋势已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初参加了五卅运动，但后来又退出联合战线。

现在我们来弄清什么是买办，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说，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资产阶级左翼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他们不满意军阀破坏交通。但如果帝国主义者稍作一些让步，这部分资产阶级就会向他们妥协。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出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左派就会叛变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资产阶级左派想稍微参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们甚至还想稍微参加一下工农运动。例如，蒋介石也试图组织工会。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很复杂的。

虽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要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仅要吸收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吸收大资产阶级。在三月二十日以后，我们已知道蒋介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路。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已看出，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过了一些时候，它又转到了反革命方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动政变时，资产阶级很高兴。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四月十二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三　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俄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参加纯无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在中国，他们不仅参加了革命，甚至还会参与民主专政。但他们毕竟是动摇分子，不能独立行动。他们或者受资产阶级领导，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里可以看到，在乡村里就难以看清楚。暴动时，小资产阶级参加了罢工，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

在去年七月全会上，我们确定了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但执行得不够好。因为：第一，

我们的同志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策略；第二，我们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不够密切。在这次全会上，不但确定了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还决定参加马路商界的运动。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地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

四　土地问题

现在我们专门来谈谈土地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农民运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问题是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这就是从第四次代表大会到去年七月全会这个时期的农民运动问题。从去年下半年起，农民运动已由广东发展到湖南，由提出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进而到提出土地问题。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必然随着总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由于提出土地问题，农村的阶级矛盾加深了。这从根本上粉碎了地主的设想。提出土地问题的农民运动，早在去年就以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出现了。去年的斗争旨在反对大地主，口号是“打倒劣绅”，用这个口号与地主作斗争。当时的斗争只是反对大地主的斗争。

湖南的斗争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当时已产生了平分土地的运动。这里的农民运动不只是反对大地主，还反对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对富裕农民。这个运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

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而，尽管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然而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正在发展，但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我们目前是进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还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

五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革命运动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当影响的。在实际斗争中，也在显示它的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抱悲观态度。广州罢工委员会几乎就是第二个政府。湖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无产阶级常常独自行动。在北方，如果工人不行动起来，其他阶级也不会行动起来。

在五卅运动中，付出最大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各阶级都在其领导之下。可以说，凡是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方，就没有运动。因此，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

第一，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第二，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如果它没有这种力量，那就只好与资产阶级一起行动。

到目前为止，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是从资产阶级叛变开始的，这就证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百分之九十九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本身应当坚决争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进行革命。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上海。上海事件，这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必须加强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作。无产阶级积极地进行了斗争，我们的敌人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在这一斗争中谁更强大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从数量上看，可以说，二者大体相等，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大资产阶级却十分坚决。为什么上海的无产阶级不是仅仅与小资产阶级一起行动，而是吸收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呢，这个问题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在我看来，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和总商会没有参加五卅运动，可是总商会的左派分子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了这个运动。鲍罗廷所持的意见是：上海不能做为革命基地，必须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并从那里打击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如果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就得向他们妥协。在他看来，上海只能争得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进行争取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斗争。他认为在上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统治上海的不是孙传芳或李宝章，而是帝国主义。鲍罗廷的宿命论是机械宿命论。可是毕竟不能轻视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似乎和鲍罗廷一致。以前，我并不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提出来讨论。上海事件，这不仅是过去的问题，而且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尽管我现在并不认为鲍罗廷的意见完全不对，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讨论。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蒋介石、银行家们和大工业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这里有三点需要讨论：第一，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第二，上海的失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第三，鲍罗廷的意见或他的西北理论。

六　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报告里无法做详细统计。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队伍。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谈的是旧的军事力量。士兵的来源，首先是诚实的农民（国民军里农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业者。士兵来自不同的阶级，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各不相同。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假如说我们的军队发生动摇，那并不是由于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于阶级成分庞杂。军队不能为工农的利益作战。他们易于接受爱国主义等资产阶级的理论。目前军队的动摇是他们的社会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

七 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

这个理论是鲍罗廷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东南部是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论证了他的理论。

他说，太平天国运动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想占领上海。中国革命应向西北方向发展。因为：第一，那里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第二，那里可以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应当讨论这个问题。昨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位代表说，我们既不要坚持西北理论，也不要坚持东南理论，哪里存在着国民党政权，我们就可以留在哪里，并在那里加强我们的工作。这是不正确的。结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任何方针了。结果我们就似乎成了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革命是国民党的革命，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现在的中国革命是我们的革命。至少我们应当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工作。因此，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八 国民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应当提出几个要点。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国民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弄不清什么是国民党，我们就不能解释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起初，我们加入国民党时，很多同志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如果加入国民党，就会背叛工人阶级；现在这些同志又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事实上，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党内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地主和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它的理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许多国民党员都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果国民党是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们就不应该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见，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外与其合作。因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才加入了国民党。现在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不是各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的问题。我们肯定地回答说，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尽管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如果这部分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我们就应该将其开除出党。既然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三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那么，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入国民党，这个联盟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以前我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而现在则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公有的党。如果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呆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这个联盟就不能是很巩固的。这个联盟将来会不会巩固，这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是否愿意让资产阶级呆在自己的队伍里；（二）国民党能否取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能够成为国民党的同盟者，而资产阶级则不可能；（三）如果国民党内没有农民参加，而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它也不可能巩固。因为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农实际上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

九　改组军队问题

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如果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军队就会实现革命化，军官也不会从地主阶级中选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万岁”和“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我们想要使军队革命化，但又不去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十　建立革命民主政权

很多同志会惊奇地说，现在我们有了革命军队和国民政府，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我们现在距离革命民主政权还很遥远。不仅是我们这样说，如果问一问国民党左派，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说，国民政府就是军阀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域内必须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如果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军阀的包围有所减轻，我们就应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争取建立这样的政权。在军阀统治的领域内，我们要先进行革命，而后才能谈得上革命民主政权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开始走向建立这一政权的道路。假如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好一些，我们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个策略能否在实际上贯彻实行，只有对国民政府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估计，才能判定。国民政府最初受到总司令人员的变动的巨大影响。去年，政权由胡汉民之手转到蒋介石手里。刚刚不久以前，才改为实行集体管理。去年，蒋介石独揽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和革命军的大权，甚至还想统治共产党。政府整整一年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汪精卫回国以后，政府才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这个左派政府里有共产党员，如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个政府就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如果这样认为，那是错误的。这个政府只是走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途径。为什么不能把现在的政府叫做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呢，因为在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而已。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并不象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

十一　财政经济政策

目前，尽管政府是新的，但财政经济政策仍是旧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执行的还是军阀的那一套制度。现在革命时期，我们必须采用新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来代替封建军阀的制度。现在的经济制度仍旧是以前的，要改变这种制度，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有无决心，而且这也是我们党的任务。在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国民党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准备夺取政权。如果我们今后还这样下去，政权就会落到反革命手里，象辛亥革命后那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帮助了

国民党，进行了群众运动工作，并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工作，而没有把政权夺到我们手里来。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夺取政权。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决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但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军事、财政和经济情况，不知道如何领导。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现在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对国民党的工作进行批评。国民政府正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扩大它的政权。这个政权既是我们的，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它工作得不好，这就不仅是国民党的过错，而且也是我们的过错。

帝国主义的干涉，现在比以前有所减轻，可是奉系军阀、蒋介石和四川都在向我们进攻。今后，可能还会遭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我们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发展和扩大群众运动，而且特别是要巩固革命中心。否则，奉系军阀统一北方，蒋介石统一南方，革命运动将会停滞五年至十年。因此在目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巩固革命中心的问题。

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

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只有九百九十四人，现在已增加到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党员的成分，根据三月份的统计，百分比如下：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农民占百分之十八点七；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军人占百分之三点一；中小商人占百分之零点五；其他成分占百分之四点二。妇女在党内占百分之十。各地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如下：湖南一万三千人，湖北一万三千人，江苏（包括上海）一万三千人，广东九千零二十七人，北方地区三千一百零九人，江西三千人，陕甘三百八十八人，山东一千九百二十五人，福建一百六十八人，满洲（包括沈阳）三百八十人，北满一百三十七人，安徽二百三十三人，四川二百人，以上共计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一）湖南区委，其中包括衡阳；（二）湖北区委，其中包括襄阳；（三）江浙区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铁路沿线部分；（四）广东区委，其中包括广西、云南、福建和南洋；（五）北方区委，这个区委包括以下几省：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六）江西区委；（七）河南区委；（八）陕甘区委。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有四位通讯员，他们分别驻在莫斯科、海参崴、巴黎和日本。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二百八十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九百七十二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四百二十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有六十个。现有共青团员三万五千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人。

现在谈谈各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国民党左派统辖的地区有：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在这些地区，工农运动可以自由发展。（二）国民党右派统辖的地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省。这些省份的群众运动已被扑灭，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三）奉系统辖的地区有北方、河南和山东等地区，以及南满和北满。这些地方的群众运动受到了镇压。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

* 总人数与各省人数之和不符。——译者

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象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如果只是由地委和区委领导一切工作，我们党的情况就会象朝鲜的党一样。现在，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工厂和学校里，支部并不是工作的中心，而只是召集会议和组织报告。因此，支部只是传达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命令的组织，而不是工作机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并把支部变为真正进行工作的组织。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提出这两个问题。宣传部这两年来的工作，不能称作宣传工作，实际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不管怎样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数也在逐渐增加。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只有七千份，而从北伐开始，已增加到五万份。

《新青年》杂志出版了五期。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两年当中，我们翻译了以下十六种书籍：（一）《共产主义ABC》；（二）《民族问题和共产主义》；（三）布哈林：《农民问题》；（四）波格丹诺夫：《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五）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六）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七）《共产国际纲领》；（八）布哈林：《唯物史观》；（九）《苏共的团结》（两册，已出版，尚未翻译）；（十）《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十一）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十二）《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十三）《不平等条约》；（十四）《中国关税问题》；（十五）《戴季陶主义和国民革命》；（十六）《论北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宣传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没有工作计划，不给地方发通告，也不向中央报告工作。宣传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动材料却很多。例如，在江苏、湖南、广东和浙江等省，我们出版了许多鼓动小册子，其数量由九万册增加到了四十万册，可是这些出版物散发得很不好。例如，我们的十万份号召书，人们读到的却不到五万份。从数量上看，鼓动材料很多，但利用得很不好。上海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书放在那里没有人读。材料和出版物的散发情况很不好，因此，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好。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今后，宣传部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使中央宣传部更加坚强有力；（二）要使地方宣传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建立密切的联系；（三）扩大翻

译工作；（四）改进书籍的散发工作；（五）关于党校问题。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五百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我们必须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版这种报纸。

现在谈谈中国的职工运动。虽然中央职工委员会并不强大，但某些地方对这项工作却很注意。成绩最好的是香港大罢工，其次，我们在上海、湖北和湖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湖南。缺点是中央职工委员会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全国的职工运动就没有统一计划和统一要求。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无论是在中央职工委员会里或在工会党团里，我们都应该有统一的领导。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我们有二十九万有组织的工人。到第二次大会时，有五十四万人。到去年五一节第三次大会时，有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各地有组织的工人人数如下：江浙有一百三十万人，湖北有四十万人，湖南有三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一人，广州有五十二万人，北方地区有一万人，山东有五千人，江西有十三万人，海员有八万人。以上共计二百八十三万八千七百九十一人。

今年，有组织的工人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职工运动也在逐渐开展和壮大起来。这是各地党组织加强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工会工作计划。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同志早在党成立以前就做过职工运动的工作。我们的职工运动的历史已有五年了。

农　民　运　动

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两年。根据现有的统计，有组织的农民的数量如下：湖南有五百二十万零四千一百一十二人，湖北有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人，江浙有二十三万人，广东有一百二十万人，北方地区有二万人，江西有三十万人，河南有一百万人，陕甘有十一万六千人，安徽有八千三百人，四川有三万七千人。以上共计九百八十二万九千四百一十二人。有组织的农民的总数比工人多。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青　年　运　动

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共青团员比党员多，而现在党员却比共青团员多了。青年一代组织起来的比老一辈少。这是因为：第一，共青团中央不是很强大的；第二，我们抽调了很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做党的工作，从而使共青团的干部减少了。现在共青团里并不都是青年人。就是一部分少年先锋队队员也已超龄了。因此，共青团应该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共青团必须青年化，少年先锋队也应如此。假如共青团员都是青年人，党就不可能从他们当中抽调工作人员。但是，党过去确实是很少注意共青团。这是党的过错。党和共青团都怕对方从自己这里抽调工作人员。

（李　玲译）

注　释

①　上文说北京扩大会决议曾提出了“准备退出国民党”，这里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谈得十分清楚”。这些说法与扩大会的决议都是不相符的。十月扩大会决议既没有“准备退出国民党”，也不存在论述“不清楚”的问题。十月扩大会有两个决议谈到了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的第七节即最后一节“中国共产党之职任”（五）在分析指出了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促成了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和提出了阶级妥协口号等等之后，明确写道：“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

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分析了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的出现和国民党从一九二四年改组以来内部的分化，指出了戴季陶的小册子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理论上的形成等等之后说：“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又说：“具体说来，应该：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

（二）工农群众之获得；

（三）非必要时，我们的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四）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的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的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

②　此处的数字，如是指农民协会会员，则可能有误。因为截至一九二七年六月的统计，湖南农协会员只有四百五十多万人，全国合计才九百一十五万多人。

③　上面一段关于“首都革命”的分析应当说是对的。但这句话却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出入。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的党、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一开始就说：“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并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强调指出并号召：“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十二月二日，党中央又发出六十六号通告，认为“目下各地民众的示威运动非常重要。北京的民众示威各地即须响应，吾校〔党〕各地分校接到本校〔党〕及少校（即青年团——编者）合发之告民众书（即《为郭松龄倒戈告民众书》——编者），应即翻印广布；同时即应努力召集群众大会，做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并即发散各项文电。之后列举了（一）通电攻击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应即解散；（二）致电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质问其政治立场，促其推倒段政府；（三）致电郭松龄，促其站在人民方面，勿作日本之傀儡，勿拥护亲日卖国的段政府，……

④　这种关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的说法和下面的论述，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同下面所说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自相矛盾。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议决）

本党第五次大会所规定的普遍原则足以范围国共两党的关系。我们在此革命阶段中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健强并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向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依然加入国民党内，因为在此时期的社会成分上说，国民党代表一个革命的同盟，此政治同盟将领导德谟克拉西的革命破坏封建制度，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共产党根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政纲政策的基本原则，系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领导其阶级的斗争向最终的目标——社会主义实现方面前进。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需要革命的发展。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就是发展革命的一个条件。所以强健并造成此同盟是无产阶级的职任。

因为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是最革命的一个阶级，他就是巩固那个政治同盟并推动这个同盟遵守一个坚决的不变的革命政策向前进行。然而在此革命的阶段中，无产阶级并非占有革命全部的指导。他只是保证左派国民党，按照环境的要求进行革命。

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此阶段中，建筑在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领导权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他合作，强健左派，帮助他领导革命，可是同时不要失掉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利益而行动的政治独立的性质。无产阶级决不在牺牲阶级独立性条件之下，加入左派的国民党。无产阶级只有借用他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执行巩固国民党和推动国民党逐渐前进。

无产阶级因为要保证革命的前途，必定加入左派的国民党，共产党的策略一定要兼顾到同盟中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利益。第五次大会关于如何保证城市小资产阶级乡村企业者和无产阶级的协调，已经有了明白的规定。现时革命的发展，使本党对于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上，亦有规定明确政策的必要。

遵照第五次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提出下列的实施办法俾国共两党的关系（特别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之可能的困难，消灭下去。

（一）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

（二）劳工部颁布劳动法，包括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恤金，保险，劳动条例，店员工作条例，更须注意。

（三）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店员不干预营业。由总工会代表，劳工部，商民协会，店员总会组织委员会考查店员提出的条件，并按照物价比例规定合理的

限制。

（四）现时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不禁止，不阻扰。

（五）除发现有反革命的活动，或有反革命的嫌疑者，商民得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

然而影响国共两党关系的小资产阶级之不满意，并不能因此条件之实施，而和缓起来。城市小资产阶级经济的苦痛，系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实行经济封锁的结果，至于连年军阀的战争，苛税（厘金等）的征收，也是造成小资产阶级痛苦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必须帮助小资产阶级去反抗此种压迫，除非打破经济的封锁，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并不能改善。欲打破经济封锁，只有革命的胜利才作得到。所以在反抗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中，无产阶级同时就保障着小商人及手工业生产者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为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

夏斗寅的叛变，是表现目下反动分子假充革命党的事实依然存在。这些反动分子虽说站在革命战线里，他们却时时想利用机会反对革命破坏革命。但是革命的运动已经强大起来，消灭革命已非易事。革命的势力是建筑在大多数工农群众之上，工农已有为革命而战斗的意志，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革命的运动未曾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削弱，革命的势力现已立于不败的地位。故对于夏斗寅及其同类定能以必要的手段应付之。

象夏斗寅一类的反动派，以反共产为借口，实行反革命反国民政府的阴谋。他们想联合在城乡的各种中等阶级（如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的小生产者知识分子等）于反革命旗帜之下，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又制造共产党将破坏中等阶级的谣言，以引起社会的恐慌。

处此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关于与中等阶级的关系上，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如果是破坏中等阶级的，他便不用亦不能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而且使自己的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所以实际上，共产党对中等阶级的态度，以这个事实作证明，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正式决定，工农小资产阶级之革命民权的同盟，是中国国民革命将来的发展和最后的成功的唯一保证。这三种阶级长期的攻守同盟，除非在互相保障条件之下决不能形成。无产阶级决不能一面和中等阶级互相同盟，又一面破坏这个同盟军。反动派藏在“共产党运动过火”的假招牌之下，滥造谣言；我们不用很多的申辩，就可以知道，他们实际是想破坏国民革命，分裂反帝国主义的民权的联合战线。

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等阶级的态度，已经剀切说明。现在我们总起来叙述如下：

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

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城市减轻压迫小商人的苛税苛捐。年来军阀内争，封建式的苛捐如厘金等破坏商民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经济封锁，同时也给经济金融以很大的打击。共产党因为反抗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商人的利益同工农的利益一般拥护，所以主张除反革命者外，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

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夏斗寅等类反动派的宣传，完全是谣言，帝国主义痛恨共产党，张作霖绞杀共产党，孙传芳以反共产为口实，用暴力压迫响应革命军的上海工人，蒋介石屠杀工人，捕拿共产党，李济琛残杀共产党。那些杀戮共产党者之为人及其目的，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是反革命者，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现在夏斗寅也拿着“反共产救中国”之“鲜明”的政纲，举兵叛乱了。但是他实际所要求的是什么？他的要求和其他反共产的英雄的要求是一样的。他不是想救中国，他是想保障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的封建势力，使革命不能达到

根本铲除这些东西。

夏斗寅等类的军阀，吮吸劳苦群众的膏血，当然要痛恨共产党，恐惧共产党，要共产党的头颅，作他们"拥护"国民政府的代价（国民政府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可疑的反叛的拥护），但是民权的中等阶级决不要被他们所迷惑。封建军阀势力在国民政府治下的复兴，不但不能帮助商业的发展，反到要蹂躏中小商人的利益。夏斗寅是想拿口头帮助中等阶级谋利益的圈套，来昏迷中等阶级的观察，使中等阶级能帮助他叛变的军事行动。

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边发生不安。夏斗寅欲利用军队中不安的情形，以达到他的反革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小地主的政纲已明白规定，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一面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情形之外，同时将其客观的原因述说一下。消灭这些客观的原因，可以挽救现状，消灭反动派的借口。

农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北伐军到来，希望能将他们从多年压迫奴役之下拯救出来。当中国国民党农民政纲颁布的时候，正是久经践踏的劳苦农民开始为新生命斗争的时候。他们见到农民的政纲，满腔燃烧着热望，于是自然表现出来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政纲实行的时期确实太延搁久了，农民焦急的等待着。在这个情景之下，急促不谨慎的行为，实行上恐不能免。如果国民党能照着自己的农民政纲，按步就班的实现农民的要求，那么，农民运动中这些不幸的事实，或者不致于发生。

革命答应过要给农民土地及自由，这些事件实现的愈快，社会的情况愈好。中国共产党严格遵照国民革命的进程，领导农民反对封建的剥削及宗法的压迫。乡村之中，农民和封建宗法的统治已经起了斗争，共产党的政策，如上边所说，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推翻封建宗法的专制，建立乡村民主的政权。共产党更拟于特殊情况之下，要求政府允许小地主抽到某种规定的佃租。乡村封建宗法统治的破坏，不仅有利于农民，乡村和城市的经商阶级都能得到经济的进展。农民经济情况的改善可以促进商业。封建统治的衰灭，可以扫除商业发展上的束缚。如果小地主对于国民政府所保证的某种租率认为满意，对于革命柱石的农民运动不加反对，农民对他们一定不加妨害。

6

所以想防止自由发展的农民运动，不能免之幼稚现象，唯有将中国国民党所规定的农民政纲从速施行出来。这可以巩固革命的基础，使农民群众集合于国民政府的周围；至于夏斗寅等类的叛变只要以迅速的坚决手段消灭之。

中国共产党决定向以反对共产党的过火行为保障中等阶级利益为借口的夏斗寅正式宣战，号召工农群众随于国民政府之后削平夏斗寅的反叛！城乡中等阶级为夏斗寅等反动派所蒙蔽，他们势将违背自己的利益。中等阶级的真实利益，必从国民革命的胜利（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中得到，万勿受夏逆斗寅的玩弄，在反共产口实之下反叛革命。并且应当急速起来和工农携手，共同保障革命，反对反叛的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誓竭诚与国民政府协同共进，并郑重声明维持与中等阶级的联盟，保障中等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确信夏斗寅的造谣，在国民革命军和中等阶级中，决得不到轻微的影响，此次的叛变指日肃清，夏逆不久定要成擒，依反革命罪案尽法惩办。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赞助国民政府实施国民党的农民政纲。

打倒反动派罪魁——夏斗寅！

打倒反国民革命的一切封建军阀！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的大同盟万岁！
国民革命的领袖国民党万岁！
国民政府万岁！

中国共产党

五月十八日汉口

3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鄂省委拟，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一、武装纠察队指挥问题

A．大队调动——如总工会调动须得卫戍司令部同意，如卫戍司令调动须得总工会同意。（理由）因武装纠察一方面为军队性，一方面是工会的纠察，故调遣时，须得双方同意。

B．保卫工会之小队调遣——如守卫等事总工会应有调派之权，事事须得卫戍司令允许，双方都感繁困。

C，无枪纠察完全归总工会指挥。

二、 停工问题

A．政治停工必须得总工会命令，总工会应极慎重，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

B．五一节全国及鄂省总工会代表大会开幕日应全体停工一天。

C．各产业工会成立改选等代表大会开会日，该产业工会停工一天。

D．商店停市，非得政府命令不得行之。

E．店员分会开成立或改选会停工半天。

三、 司法权

A．工会无政府命令不得拘捕非工人。

B．工会得拘捕工贼及反革命条例之工人。

C．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工人有审判权，但不得审判非工人，如因误会而拘捕非工人，应立即送往政府相当机关。

D．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者，在未审判前及审判后，判定不到一星期拘留之罪，有拘留权，一星期以上之徒刑，即须交政府适当机关。

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

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

这些纠纷已引起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解决此目前严重的问题之态度是：（一）城市中工运问题，应该迅速执行已决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决议案及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而解决。（二）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其曾愿捐助者得不在此例）。（三）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

固然湖南农民运动之发展有些地方，其势非事实上进向没收大地主之土地不可，这种趋势，是一部分劳苦贫农要求所必然发生的，而且局部的在各省实行是可能的，可是必须在两个条件之下：（一）能使革命军官中立。（二）能与左派群众及领袖共同行动。固然如此，但是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还是巩固革命已得之胜利，即是建立乡村政权（乡民会议直至县政权），以政府形式继续深入农民反土豪劣绅之斗争。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速记录（摘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时间：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

地点：汉口中央党部

出席者：谭延闿　陈公博　吴玉章　孙　科　徐　谦　汪精卫　林祖涵　谭平山　陈友仁　顾孟余

列席者：苏兆征　董用威　詹大悲　张肇元　彭泽湘　周鳌山①江董琴　连声海　于若愚

主　席：孙科

汪精卫：唐总指挥二十四日有一个电报来，是打给谭组安同志和本席转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内包含三个电报。第一个是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二十一日打把唐总指挥的，说是十九、二十、二十一等日，长沙农工纠察队同驻防军队发生冲突。纠察队分三处抢三十五军留守处的枪械，同时并揭出打倒三十五军的红旗。三十五军为自卫起见，乃将纠察队解散。秩序虽然恢复，情形仍狠严重。本人（张自称），供职无状，未能先事预防，应请严加处分。第二个是湖南省执行委员会二十二日打把唐总指挥的，不外说工农运动，流弊太多，以后应设法消弭等语。第三个是唐总指挥的复电，告诉他们三个办法：（一）驻长沙各军暂时统归张代主席指挥；（二）召集长沙军界官长全体会议，讨论办法；（三）以上署会议名义贴出各种标语。（宣读唐电）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昨夜二时接到电报之后，就开会讨论，先发电到长沙去，规定两种办法：（一）军队应维持治安；（二）农工纠察队应严守秩序，不得报复。今天早晨，本会主席团又开了一次会。大家知道湖南的这种冲突是要发生，所以才有特别委员会的组织。若不是因为夏斗寅造反，火车不通，早已就去了。现在既然发生冲突，马上就应该有处分。决定请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汾五位同志，驰往湖南查办，并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拟了一个训令。（宣读训令）（张肇元到）

主　席：汪同志已报告长沙农工纠察队同军队冲突的情形，并派五位同志前往查办，请大家提出意见来讨论。

谭延闿：可先将训令通过。

决议——通过。

主　席：五个特派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还有谁？

---

① 周鳌山，湖南人。曾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等职。

汪精卫：还有邓绍汾同志，他是唐总指挥派回去的，本会顺便也将他加入特派委员之列。现在彭泽湘、周鳌山两位同志在外面，可以请他们来，发表意见。

（彭泽湘、周鳌山入席）

汪精卫：特派员去的任务，不止是要解决一时的纠纷，并要切实执行中央屡次的训令同决议案，谋一个根本的解决，对于民众既得的利益，要加以保障，过度的行为，须加以制裁。

主　席：将中央历次的训令同决议案抄了带去。

彭泽湘：特派员对于湖南省党部的关系如何？

主　席：代表中央，可以指挥。

汪精卫：特派员对中央负责，可以指挥湖南的省党部同省政府。

主　席：先由中央通知湖南的省党部同省政府。

汪精卫：请书记长拟电稿，请彭泽湘、周鳌山两位同志发表意见。

彭泽湘：长沙军民冲突，虽然暂时平静，但双方的戒备同恐慌，可以断言还没有消灭。第一点，政府现在没有力量制止军队的自由行动，以后应想一个补救的方法。不然湖南的工农运动，要被摧残净尽。第二点，这次的冲突，一方面是由军官发生，一方面也是兵士受土豪劣绅的煽惑。例如第八军李军长不稳，第三十五军何军长不稳的谣传，都是蒋介石的走狗所造。对于这种恶势力的挑拨行为，应当要以严厉的方法对待。

（董用威、詹大悲、江董琴入席）

周鳌山：湖南目前的弱点，不难解决。所难的，就是怕这一次没有好办法，湘南、湘西都要群起效尤。在湖南的军官如熊震、许国珍、于作龙等，都有点产业，要拥护自己的财产。如果扶助军人，则以后各处的民众运动，都要受摧残，所以本席第一点意见，和彭同志的相同。此外湖南的省党部同省政府还不能十分的合作，两者既不平行，又不相隶属，于是省党部不能指挥农工，省政府不能指挥军队，才酿出这一次的冲突，这是本席第二点的意见。

汪精卫：对于特别委员会的训令不必发表，又另外拟了一个关于这件事的训令。（宣读）

主　席：一面通知湖南省党部同省政府，一面公布。

汪精卫：再要通知唐孟潇同志。

决议——通过。

主　席：特别委员会至迟明天就要走，上午十一点在徐家棚有一次专车，九点钟从一码头乘专轮渡江出发。

汪精卫：鲍顾问说也打算去一趟。

（彭泽湘、周鳌山退席）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国民党中央组织赴湘特别委员会的训令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央为统一革命策略起见，曾于本月二十一日训令各级党部及各级政府机关，由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前往各地指导。日昨中央特训令先行组织赴湘特别委员会，解决长沙农工纠察队与驻军纠纷；特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芬等五人为特别委员。兹将训令原文录后：

湖南长沙农工纠察队，与驻在军队发生冲突；特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芬组织特别委员会，驰往查办。尤须切实执行中央历次议决案及训令，以解决纠纷。关于特别委员会之权限，依照五月二十一日训令办理。该省各级党部及各级政府机关，均受指导。此令。

（载1927年5月26日汉口《民国日报》）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布告*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为布告事。照得农民占全国人口之最大多数，国民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在乎扶助农民，以求解放。本党政府，前才发出宣言及所定政策，对于农民利益，无不特加注意。去岁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联席会议，暨今年三月第三次中央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先后议决，拥护农民利益，具体政纲数十条；最近并特设农政部，以专责成。凡关于保护农民政策，务冀按照客观环境与主观力量，尽其可能，次第施行。惟近来革命势力，发展日速。乡村封建制度，逐渐崩坏；而新的民主制度，尚未完全建设。际兹革命过程，新陈代谢之期，不免发生部分纷扰现象，幼稚举动，时有所闻，甚至轶出正轨者，亦所难免。凡兹事实，乃俱因农民要求迫切，而又无法遵循正轨以达其要求之所致。似此殊非本党政府扶助农民、保护农民之本意。本部职司农政，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再者，目下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所有都市、农村之旧势力、旧制度，因革命之进展而摧毁。最近工作，应即集中一切新势力，建设一种新制度，以创造革命秩序。故在都市工人，急需联合被压迫而有革命需要之工商业者，以建立革命同盟。在农村，亦应本此原则。农民应该与农村中一切民主势力密切联合，然后新建设之基础，乃克形成。为此布告民众：今后农村居民，凡同情于革命者，皆应集合于本党政府保护农民政策之下，共谋新制度之建设，以促民生政治之实现，俾农民得遵循正轨，以达其迫切之要求，即一切农村居民，亦得早日享有安居乐业之幸福。至于反革命分子如何肃清，土豪劣绅如何惩办，农村附逆如何处分，应按照本党政府最近所颁各种条例，一概交由政府机关办理，不得自由行动。如有违犯，定必严惩。本部一面自当督促所属，于最短期间，建立县、区、乡自治政府，改良农村经济，巩固农村自卫，普及农村教育等等，以切实保护农民利益。须知本党政府前后政策，莫不以拥护农民为主要点；最近对于农民所发生幼稚举动，加以裁制者，亦无非为完成解放农民之使命，而非对于保护农民政策，有所变更。各地方长官，应体会此意，善为诱导。倘有挟意曲解，借此压制农民，定当严办不贷。仰各地民众暨各县长，一体知悉。切切此布。

——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汉口《民国日报》

---

* 标题是编者加的。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摘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时　间：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

地　点：汉口中央党部（华商总会旧址）

出席者：孙　科　吴玉章　汪精卫　徐　谦　林祖涵　韩麟符　彭泽民　杨匏安　江　浩　许苏魂　朱霁青　陈璧君　潘云超　邓懋修　谢　晋　高语罕　詹大悲　恽代英

主　席：孙　科

汪精卫：现在有一临时报告，是很重要的。现将唐生智电及湖南省政府两电宣读。当时收到此项电报时，因扩大会议须至今日方能开会，所以兄弟与谭组庵同志便把此项电文，呈军事委员会。长沙事变发生，孙哲生同志、徐季龙同志、谭组庵同志及兄弟已有所闻，认为中央应派员秉公查办，军队与农工团体，均应听候中央命令解决。政治委员会决定特别委员会前往调查，委员是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汾五同志，谭是农政部长，陈是工人部长，彭是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是对于湖南军队及各民众团体皆甚熟悉，邓是唐电请随同中央前往，所以要请其同去。五委员已于日昨十二时出发，近两日关于此事，党报迄未登载，此足见是对此事甚为慎重，惟不指示明白，则一般人愈多所揣测，想入非非，如果依照电报所说，完全为农工团体招至，登载后，只见省政府电，不见工农报告，亦殊不好。唐生智同志谓已请张代主席约束军队，并令其明白表示态度，并拟定具体办法，用意甚好。现在可以宣布，宣布方法，可谓中央已立派特派员去调查原委，如此，则外间可以明白长沙军队态度，如果中央一句话不说，将更令人启疑，现在打算拟一训令，现在宣读，看各地意见如何？（宣读训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长沙事变，不出以下原因：（一）误会；（二）反革命派的挑拨或有一分说十二分，或无中生有；（三）农民的幼稚行动。至少是以上三种原因，构成此次事变。现在应该禁止再有冲突发生，至于详细办法，俟特别委员会调查拟定办法后再议，中央在未得特别委员会报告之前，先将训令发表，似亦有此必要。中央训令请各同志看看，是否应该如此办？

主　席：长沙事件，汪同志报告已经是很清楚的。训令业经拟好，由中央发出，各位同志有无再须讨论？

决议——训令通过照发。

汪精卫：唐电完全发表，省政府两电摘要登出，由党报明日发表。
主　席：各位对于交党报发表有无异议？
　　无异议，交党报发表。
汪精卫：湖南两电，只须一句话就够了，说湖南工农与军队冲突，现将唐电、中央训令同时登出。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摘录）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

时　间：十六年六月三日下午四时

地　点：汉口中央党部（华商总会旧址）

出席者：孙　科　汪精卫　徐　谦　吴玉章　江　浩　杨匏安　韩麟符　朱霁青　邓懋修　潘云超　陈公博　彭泽民　许甦魂　谭延闿　孙宋庆龄　陈璧君　林祖涵　恽代英　詹大悲　顾孟余　毛泽东

主　席：谭延闿

汪精卫：现有两个意思须向大会报告：(一)三十一日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已克复郑州，今早电报，邓演达、张发奎两同志于六月三日已到开封，北伐第一步计划已经达到。关于此点，应奖励第四方面军、第二集团军各将士，奉天军阀可以说是经第四方面军第二集团〔军〕击溃，所剩无几。蒋介石本与孙传芳、张宗昌联合，又复勾结夏斗寅、杨森，扰乱北伐后方。本席提议应有通电奖励前方劳苦将士。（二）长沙事变，应有处置。今天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亦系中央特派员，唐生智同志亦派其赴湘。今天看见兄弟，谓执行中央命令一层可以做到。制止军队，制止农协，应该同时进行。此次长沙冲突很厉害，农会与军队自相残杀，并闻何军长老兄及某团长均被杀，如只制止军队，不制止农会亦属不好。目前处置，应制止军队，制止农会。因为不制止农会，则湖南人民更形恐慌；只制止农会则军队日渐刁难。现在距长沙事变，已有多日，中央如不设法，则旷日持久。一面请由岳州回来同志报告，一面请周副军长前往。决议——奖励前方将士电照办，推定汪精卫同志起草。

陈公博：上星期三中央政治委员会派谭平山、彭泽湘、周鳌山、邓绍汾及兄弟五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赴湘调查军队与农工冲突，同行有鲍顾问。到蒲圻有谓长沙已无事；有谓长沙现象不好，是不能去的。于是由蒲圻发两电致岳州，周团长电复欢迎特别委员会去，当晚十二点半到岳州，在岳州得到长沙消息不大好，遂主张谭平山、鲍顾问、邓绍汾先回，暂留周鳌山及兄弟二人。后因在岳州无大作用，遂请周团长将特委意思转达长沙。因当时须有决定，遂主张省政府改组，军队不得再与人民冲突。关于长沙事变，在岳州接到许多报告，有谓农协将农民集中湖南，拟缴三十五军留守处枪械，有谓军队解散农会。有谓当夏斗寅叛变，武长路消息隔断，甚谓鲍顾问被枪毙，汪同志赴南京。有谓岳州无

米，买米只定五升，多买须由农协批准。湖南农协不能指导分会，当时采取政策，容有错误，且组织涣散，既少训练，行动不免带有幼稚，湖南本来产米，但以去年水灾，各地有米与无米不同，于是禁米出口，因党部投机分子太多，往往有农协与农协冲突，党部与农协冲突。有县党部自由逮捕人民及处决，有时农协错误。特别委员会提出意见五点：（一）改组湘省政府。（二）改组湘省党部及农协工会。（三）制裁越轨军人，由周斓调查。（四）命令停止军队与农工之军事行动，不听者严厉惩办。（五）其余善后问题，听中央办理。

主　席：刚才陈同志对于湖南事变报告甚详并提出五点请大家讨论。

汪精卫：文字须修正后再宣读。

主　席：昨接张翼鹏来电请（一）派员携带米款；（二）令周副军长严密护路；（三）转催周副军长派兵回湘镇慑。

决议——（一）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由中央体察情形，决定改织〔组〕办法。（二）湖南省党部及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其改组方法由中央决定之。（三）长岳一切部队归副军长周斓指挥，所有越轨行动之军人，由周斓查办。（四）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如有不服制止者当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之制裁。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五）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

汪精卫：此决议抄一份送周斓，一份电令长沙遵办。

……………

恽代英：关于湖南事变及河南党务。最近到咸宁、嘉鱼，看见许多事件真令人发笑。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有些是不大高明，可是与咸宁、嘉鱼工作人员比较，真是高明得多了。我现在关于纠正党务及民众运动幼稚病有三点意见。（一）民众团体，应该组织。因无妥当人员不应立时组织，如此，两方都顾得到。（二）中央所在地、开办大规模农工运动训练班。（三）中央党部对民众运动易起纠纷之地，应规定详细宣传和行动方针。如中央最近政策是要规定保护工农仍须保护工商业者，否则，使反动派易于从中挑拨。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全国农协电请解决长沙事件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

驻长沙团长许克祥，弁髦政府，破坏党部，屠杀农工，摧残教育，称兵谋变，扰乱后方，已属罪不容诛；其拒绝中央调查，违抗唐总指挥命令，更属公然叛逆。全国农民协会，特于昨日胪举许克祥反革命之事实，通电声讨，并请政府立予免职查办；倘若不知悔改，则请明令讨伐，以肃军纪。兹将原电觅录于下：

（衔略）均鉴：许克祥借口湖南农工运动过火，于上月马日在长沙围攻工会农会，解除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之武装，屠杀革命同志，解散省党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搜查教育机关，封闭长沙师范，驱逐查抄湖南省政府建设厅长、教育厅长，劫夺汉口民食维持会米款七万元，并仿蒋逆介石举动，组织所谓救党临时特别委员会，以破坏各级党部农工运动。过火与否？与党部、学校究有何项连带关系？建设厅长与教育厅长，岂亦为所谓暴徒？而须遭其放逐、抄查。汉口民食维持会米款之劫夺，湘鄂交通之阻碍，尤为扰乱北伐后方。此等举动，即谓出于误会，而其破坏革命纪律，违抗军令及政府，则已昭然若揭！其结果不仅工农备受其摧残，中央威信亦为之扫地！省政府更在胁迫之下，形同解散，是完全反革命之行动也。初期民众运动，犹未经训练之新兵，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原为革命同志共晓；革命军人，决不能因此而离开工农，更无论借口而加以压迫。即有意见，亦当绝对尊重党纪军纪，呈请政府办理。农工为革命之主力军，国民革命之目的，即在解除农工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痛苦。是以本党从前有禁止武装袭击农民之决议，最近更有保护工人纠察队之命。许克祥何得故违法令，举兵袭击工农，解散工农纠察队，一如蒋介石在沪宁之所为乎？至工农运动中，发现幼稚行动，原为政治指导尚未完全强固之民众原始现象。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对之早已拟定具体办法。明令执行。湘省农协，亦正在开始纠正。如代武汉前敌军民采购米粮，并助各军招募新兵等事实，均为万目所共睹。何图许克祥不守党部政府办法，擅用武力，横施摧残，解散党部，实行政变，显系目无政府，扰乱北伐后方，破坏总理农工政策；响应蒋夏诸逆，欲由湖南发动，推翻武汉革命根据地。事变以后，中央特派专员赴湘查办，复被许克祥拒绝。唐总指挥敬电指示解决方法，极为得当，亦抗不遵行。近更愈演愈烈，派兵袭击湘潭、常德等处□□□屠杀，是许克祥不仅为三湘工农之凶手，更已成全体武装同志之罪人，全国民众之公敌。曩者国民政府，尚未明令讨伐，原期其翻然悔悟，勒马悬崖。今彼竟公然拒绝调查、违抗唐总指挥命令，倘若再予姑容，则彼或将误认为政府默许其行动，而日益凶横，愈难制止。若然者，不惟湖南革命势力将被其消灭净尽，各地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亦将继之而起，使北伐之进展，及整个革命前途，均受极严重之打击。敝会为防止反动势焰之高涨，保护国民革命之胜利计，谨率全国一千万有组织之农民，恳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予免职查办。倘许克祥犹复不知悔改，则请明令讨伐，肃清乱源，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全国农民协会汇（三日）叩。

长沙湖南省政府勋鉴：奉读卅电，骇异万分！民众运动之初期，犹未经训练之新兵，幼稚行动，万难完全免去，原为革命同志所共晓，革命军人决不能因噎废食，抛弃民众，甚或借口压迫。即有意见，亦应尊重党纪军纪，呈请政府处理。此贵省政府唐主席之正当主张，民众与军人均应恪遵。事实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以及敝会，对于匡救民众运动初期之原始现象，均已厘定具体办法，明令执行。湘省农协，亦正在开始纠正。如代武汉前敌军民采购米粮，并助各军招募新兵等事实，均为万目所共睹。许克祥借口以谋叛，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解散省党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封闭长沙师范，蹂躏教育机关，驱逐查抄省政府建设厅长、教育厅长，擅自组织所谓救党临时特别委员会等反革命事迹，昭昭在人耳目，万难以巧辞掩饰。然长沙一隅，既为许克祥所盘踞，中央特别委员会，犹被阻止；唐总指挥电令，犹被窜改；省政府委员家属，犹被抄查。此等暴行，试问于农运何涉？卅电当系许克祥滥用政府名义所发，出言背谬，无怪其然！惟许克祥已为党部政府民众之公敌，敝会业已电请政府免职查办，贵省政府诸委员，虽不幸被其劫持，并宜设法自拔，除此元凶，以救党国。谨贡忠言，幸采纳焉。全国农民协会汇印。

（载1927年6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农民群众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农友们：

国民革命是要使你们从长期剥削中获得解放，是要去掉你们所难忍受的痛苦，是要使耕者能有其田。

全中国的农民是反对非人的生活。你们要结果帝国主义的优越势力，你们要推翻吸吮人血的军阀。你们要从那不自耕种而坐收田租以供其浪费的大地主手中夺回土地。你们要破坏压逼乡民的豪绅的政权。

国民革命的急速发展促进农民反抗豪绅的潮流。湖南农民已经做了农民运动的先锋。从贫苦农民身上榨取利益的反动阶级已经被农民运动吓得不得了。广东农民协会已经在李济琛恐怖之下，做了牺牲者，但是他们尚在英勇的奋斗。现在反动派又在湖南抬起头来。

反动的军阀，又在湖南握有凶横不法的政权，已经把赞助农民运动的省党部及省政府解散。在长沙以至全省有许多农民与工人都被惨杀，这些反动派是要消灭湖南农民运动。现在农会是向这个反动势力抵抗。他们这样做不单只保存全国农民的利益，还是保存国民革命的真意义。所以现在湖南农民是应当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扶助。

6

湖南农民是整个农民运动的先锋，应当反对大地主豪绅及反动的军阀。你们应当在乡村中建设民权自治政府及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把大地主资本家公司与基督教会的土地收归公有。你们应当破坏豪绅的政权。你们应当将豪绅所霸占的所谓公有田地，以及庙宇祠堂的田地拿回来，交与乡村自治政府中的土地委员会。你们应当武装起来与反动势力奋斗，而保持革命中所得之胜利。长沙的反动军阀应当推翻。

当进行这样争斗时，湖南农民应当知道怎样结合友军。大地主与豪绅是农民的敌人，他们也压逼小地主。所以农民（佃农，自耕农，无土地的雇农等）应当与小地主结成同盟，共同参加反抗大地主与豪绅的争斗。因为要巩固同盟军，对于小地主无论如何是不能加以扰害的。革命军人正在向帝国主义与军阀作战，也是农民的友军。对于他们的土地也不能没收，对于他们的家属更不能波及。革命兵士大部分是无土地的贫农出身。对于他们家属有侵害，对于他们有夺取财物的行动，都是有害于农民运动。这些幼稚行动给反动派的军阀官僚有很好机会去鼓动兵士来反对农民运动。禁止这些幼稚行动是农民协会的重大责任。

农民们！湖南农民是应当努力去推翻在长沙的反动军阀。他们起来推翻反动派，大家是应当帮助的。如果他们消灭下去，不仅全中国农民运动是被摧残，即国民革命也要动摇而破灭。反动派的地位将重新建立，而帝国主义的死亡亦将迟延。反动派军阀所要的不仅是压逼农民运动，而主要的是要消灭国民政府。

农民不要把兵士看做敌人。农民与兵士之间要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兵士都应当为农会会员。兵士原来也是农民，完全为经济所逼不得已投身军队。他们是无土地的。无土地者是盈千盈万在中国。他们应当有土地。对于这些盈千盈万无土地的人，应当设法实行屯垦的政策

而安置他们。兵士应当加入农民运动，去实现这个要求，所以兵士们应为本身的利益而加入农民运动，去反抗反革命派与反动派。

湖南的农民，〔不〕要屈服长沙的反革命派，要大家积极准备武装起来去推翻他们，帮助国民政府重新在长沙建立政权，拥护国民党反抗反革命的军阀。

打倒长沙凶横的军阀许克祥等！

打倒大地主及土豪劣绅！

恢复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湖南的政权！

建设乡村自治政府！

田地给农民与兵士！

3

全国农协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之训令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训令日昨发出临字第四号云：为令□事农民运动，过去因为发展甚速，组织上未能健全。加以土豪劣绅猛力反攻，遂使乡村斗争日趋急剧，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即不免发生无组织之行动。已经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及第二号训令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极力纠正。务使各地农民，俱在农民协会指挥之下，有组织有计划的继续与一切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斗争。以尽我农民在革命过程中推翻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统治的政治基础之职责。并指出各地农民目前的斗争目标，应为建立乡村自治而奋斗。现据各方报告，在湘鄂赣三省中，土豪劣绅进攻农民，非常猛烈，在江西六月五日当局遣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后，各地土豪劣绅，纷纷乘机蠢动，吉水劣绅则勾结流氓，进攻农民协会，下乡捉人；南昌一区，劣绅则拘捕执行委员，新建土豪劣绅则逮捕农协会员，牵去农民耕牛；铜鼓革命团体，均被捣毁；弋阳反动军队，更大行残杀农会职员；泰和四区农协，不但为反动派所捣毁，并被捕去职委二人。在湖南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许克祥即屠杀省农协、省工会、工人运动讲习所、党校等处同志及农民工友共三十余人；事变以后，更派兵袭击湘潭、常德各县民众，而农民死伤枕藉者，将及万人。并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斩决而以脚踢其头，并用洋油注其腹内而焚之；旁观民众，莫不愤怒万状。在湖北尤为凶猛，湖北各县土豪劣绅不但勾结土匪及会党的腐败领袖，惨杀农民。如阳新土豪劣绅用洋油烧死农民九人；沔阳土劣勾结硬肚会惨杀农民五十余人；天门土劣勾结土匪惨杀农友二十余人；钟祥土豪劣绅勾结硬肚会惨杀农友十余人；汉川土豪劣绅勾结流氓杀伤农友十余人；麻城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黑枪会、白枪会残杀农友百余人，烧毁民房数十村皆是。他们更利用反动军队力量，以图根本扑灭农运，因以动摇革命根据地。夏、〔杨〕、许、张、于诸逆相继叛变，每到一处，即将在押土豪劣绅释放，使之率领逆军到处屠杀。嘉鱼杀死农民卅余人，咸宁武昌均杀五十余人，天门烧农民房屋三百余间，杀二十余人，公安烙死数十人，枣阳残杀五百余人，沔阳残杀二十余人，宜都残杀数十人，麻城乡捕杀，烧毁房屋，奸淫妇女，共杀死五百余人。随县前后杀死一千人以上，罗田惨杀六十余人，黄安惨杀一百余人，钟祥劣绅王恕堂更占领县城，挨户搜索，惨杀二百余人。其他夏口、黄冈、应山、应城、圻春、江陵等县的豪绅，亦莫不闻风兴起向农民进攻，挖眼拔舌，刳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均为豪绅对待革命农民的残酷刑罚。对待妇女，则以绳穿贯其乳而驱其裸体游行，或零碎割死，农民之死难者，已达四五千人。而荆门松磁宜昌等县，仍在继续屠杀中。即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仅距汉阳县城十余里之地，亦不免发生土豪劣绅围杀农民之事实，湖北全省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

总计湘鄂赣三省党员农民工人之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其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感情之毒计，亦正积极进行。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故甚其辞，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之冲突，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于以推翻党国，虽人民痛苦、亡国灭种，亦所不惜。同时贪官污吏起而与土豪劣绅，互相响应，共同捏辞诬蔑农民，以图离间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如黄冈农民协会本无铲挖烟苗事项，而贪官污吏，竟蒙呈中央予以解散，即其著例。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因已明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洋奴以及一切反动派乘我军北伐与奉军战斗剧烈之际，向我国民政府联合进攻之毒计，而训令全体武装同志，对于指鹿为马，过甚其辞之传言，谨慎调查毋堕反动派之阴谋。然日来各城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溃军屠杀农民事实，仍有愈演愈烈之势；贪官污吏离间政府与人民之阴谋，亦复屡出不穷。各机关近来接得诬控农民之状纸，每日不下数起。在此种严重情形之下，各级农民协会极应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介石。（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及一切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萧翼鲲，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省工会、省农协及一切被摧残之革命团体，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并令湖南省政府唐主席从速镇压湖南之反革命派。（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农民协会之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对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因为土豪劣绅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未由巩固也。此令。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沈。六月十三日。

（载1927年6月15、17日汉口《民国日报》）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摘录）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时　间：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四时

地　点：汉口中央党部

出席者：陈友仁　孙　科　谭延闿　汪精卫　孙宋庆龄　陈公博　林祖涵　吴玉章　谭平山

列席者：詹大悲　苏兆征　陈其瑗　张肇元　董用威　于右任　彭瑞初　庞人侃　连声海　于若愚

主　席：汪精卫

主　席：还有几件事报告：（一）唐生智同志说：上次柳林发生红枪会拆毁铁路，希图破坏北伐事件，已经查出是蒋介石派刘积学去作的。（二）冯玉祥同志当面告诉本席，说他将出兵的时候，蒋介石打了几次电报把他，劝他不要发动，等第四方面军在河南被奉军歼灭之后，然后再会师中原。冯同志并说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收到那些电报之后，越发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的东西了。（三）蒋介石说要在二十天之内包围武汉，所以主席团急急赶回来，筹商巩固后方的计划。此外，现在有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来请愿。刚才开军事委员会时，唐生智同志也在那里，对于湖南的事讨论甚久。不过有好几个人都是新从河南回来，请那一位同志将湖南最近的情形报告一下。

吴玉章：张翼鹏等有一个联名的通电来报告，请于书记长去拿来。

主　席：据周斓同张翼鹏的报告，说是农民协会反对政府，请派兵剿灭，请愿代表团又说些什么？

书记长：有请愿书。

吴玉章：上星期六他们已经来请过一次愿，说得痛哭流泪，情形很是凄惨！当时是于书记长接见，曾经打电报告主席团同唐总指挥。

主　席：他们的请愿书中有七项要求：（一）明令讨伐许克祥。（二）恢复湖南省党部。（三）请唐总指挥回湘。（四）枪毙许克祥等。（五）解散湖南伪省党部。（六）恢复湖南省总工会。（七）救恤被难的同志。如果各位对此没有什么意见，可将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诸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但五月二十一那天晚上，则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械。至于农民协会为什么要扰害军人的家属呢？前不曾查得清楚，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

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作杀人放火的勾当。主席到河南去的时候，已听见有讨伐许克祥的呼声，一纸讨伐令本不难下，但要先决定是否应该用兵？而且许克祥是有管束的，是否还要问问他的官长？唐生智同志，因为许克祥是他的部下，为此事曾自请处分。但他统兵在外，与其加以处分，不如命他去收拾。（八）军事委员会讨论甚久，认为我们对于下游同鄂西鄂北各处，都在用兵。但有些地方是用主要的兵力对付，有些地方只消用一点的兵力对付，有些地方简直是可以不必用兵力。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可否由中央训令唐生智同志，要他到湖南去根据中央历次的议决案解决这个纠纷。

吴玉章：中央没有其他得力的人可派，就请唐同志去也可以。

主　席：吴同志赞成。各位意见如何？是否要唐同志加入特别委员会，或是作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陈公博：本席认为不必要唐同志加入特别委员会，由他全权办理就是。今天湖北总工会有一个呈文，是说的江西的事件。并听说后天开欢迎北伐将士凯旋大会时，民众将有对于湖南、江西事件的表示。最好先决定办法，当面告诉他们，不然弄得他们作大规模的请愿不好。

主　席：先决定湖南的问题，再讨论江西的事件。

陈公博：请湖南请愿代表团来，当面告诉他们。

主　席：是否要对他们说明理由？

陈公博：要说明。

（詹大悲退席，湖南省市县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彭瑞初、庞人侃入席）

主　席：关于湖南的问题，军事委员会同政治委员会都讨论〔过〕。自从事变以后，中央所得的报告，一是民众方面，一是省政府同军队方面，双方不同，各是其是。中央知道二十一晚所发生的事，是军队的错误居多，但同时农民协会也有错误。各位（对两代表而言）的请求，大略可以达到。讨伐许克祥一点，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已经说过，许克祥的长官是唐总指挥，现在唐总指挥已自请议处，但中央能原谅他，不下处分，仍责成他根据中央历次的训令同决议，全权办理此案，以谋一个根本的解决。请两位代表将中央这个意思，转达各请愿团体。

彭瑞初：代表可不可以报告？

主　席：可以。

彭瑞初：湖南的农工在过去几千年封建势力之下，受尽万分的痛苦。自五卅以后，方渐渐觉悟，到最近才特别发展，虽然难免发生幼稚的毛病，但绝对没有超出轨道以外，绝对是在党同政府的指导之下活动。例如第二次北伐，中央责成湖南采办军米，湖南今年的收成本是有限，但做出亘古未有的减餐运动，以服从中央命令。不过有些反动派跑到各县去骚扰革命军人的家属，动摇前敌的军心，嫁祸于农工团体。起初还能以全力镇压下去，自从夏斗寅叛变以后，交通阻隔，谣言日甚，……酝酿了几天，才有二十一晚的大屠杀。自此以后，就形成绝大的反动，造出空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许克祥将张代主席

软禁，挟天子以令诸侯，组织救党运动委员会，密令截杀中央所派的特别委员，捣毁建设厅、赶走邓厅，长宣布戒严，检查学校，凡类似工农或有工农团体徽章者，捉住之后，马上枪毙。他们杀人的方法，异常惨酷，一个人总要受几点钟的痛苦然后才死，尤其是对于剪发的女子，施以万般侮辱，还要枪毙。究竟死了多少人，现在不得而知，大概总有一万左右。有许多同志，也都是生死不明。这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到现在已有二十几天，反动的区域，是一天比一天加多，恐怖的方式，也是日新月异。但中央还没有下讨伐许克祥的明令，湖南的民众对于中央多少是有一点失望。所以各团体有七项请求，希望中央迅速断然决然的解决湖南这次的事变。

主　席：扶助农工是政府的一个大政策。我们知道有反动派在造农工的谣言，但同时农工自己也须承认在过去的行为中多少有些错误。如果农工以为自己毫无不是之处，那就不得了。刚才这位代表报告，说湖南党部同各民众团体绝对服从中央的命令，但是在中央审查周详，讨论了二十几次，结果还是主张保留，等到适当的时期再行公布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居然在五月中旬的长沙日报中，由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宣布了。这无怪乎中央听了要生气，中央也不愿意再说什么。不过中央以后决不会不要农工运动，对于将来的农村自治也有各种办法，希望两位代表出去转告各团体，在这局面之下，悲愤之余，还是要用慎重的手段。

彭瑞初：中央的训话，代表等很诚意的接受，还要请派一人出去，对请愿的各团体报告。

主　席：请陈公博同志出去报告。

（彭瑞初、庞人侃退席）

主　席：湖南的事件，就训令唐生智同志遵照中央训令及决议案办理。

决议——通过。

主　席：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呈请辞职，军事委员会同唐生智同志都主张以周斓代理，有无异议？

决议——通过，交国民政府任命。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公开信的答复

（1927年6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本月四日贵党所致本党之函，经已接读。农工政策，本为本党总理的主张，农工群众，更为本党颠扑不破的基础。自十三年本党改组之后，此义更为显明。在过去的时期，无论在粤奋斗，无论出师北伐，都为着民众的利益来战斗，都本着总理的主义来战斗，这不仅本党党员所共喻，也是全国人民所共喻。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人民要求解放的革命，特别是穷苦农民。自第二次代表大会以至本年三月第三次执行委员全体会议，本党同志无不注其全力以解决农民问题。关于土地问题，也会经过长期的深切讨论。因为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便无从解决，农民问题不能解决，革命便不算成功，这都是同志们很明白的。

可是自蒋中正叛变以后，各地的反动势力，都跟着这个叛变的暗示，到处蔓延。长江流域，本来受治于军阀的时期很长，革命势力本不稳固，所以跟着蒋中正的叛变发生不少的反动事实，经过各同志努力，现在还未能完全镇定。这是何等严重的局势啊！但这种事实，在每页革命史上，不能避免，并且每个革命党里，都不能避免。本党承认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们并不因此而改变总理及本党的政策，并且还要加紧我们的工作。不过同时我们也承认我们许多同志，在过去工作的当中发生不少行动的幼稚和观察的错误。本党指导农工运动的同志们，往往有许多不能本着党的决议，甚者有时误解党的决议，去指导群众，这个错误的指导，不仅松懈了党的组织，而且还要妨碍全体工农的利益，本党顾及革命的整个前途，不能不毅然承认已往许多同志的幼稚而加以严切的矫正。

贵党自十三年本党改组以来，不断努力，以参加国民革命；并且有一部同志，加入本党以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故在此严重时期，又希贵党一方面帮本党矫正过去工作的幼稚，一方面严切训练贵党各同志，使能在此危险时期，同负重大的责任。

至关于湖南事件，本党已两度遣派负责同志赴湘，严行查办，截至本日，虽未接有详细确实之报告；然有两项原则可以先为贵党告者：（一）对武人越轨行动，必须制裁；（二）对农协幼稚行动，必须纠正。至于第一步解决办法，已见本党前星期五的决议，可以毋庸赘述了。

谨致革命敬礼！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选自《罗易赴华使命》）

译自中文。——罗易注

此信原刊登于1927年6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此处用原文。——译者注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速记录（摘录）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时　间：　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
地　点：　汉口中央党部
出席者：　谭延闿　孙　科　林祖涵　吴玉章　王法勤　汪精卫　陈友仁　邓演达
列席者：　于右任　苏兆征　孔庸之　张肇元　詹大悲　于若愚　连声海
主　席：　孙　科

主　席：　唐生智同志来电，报告处置湖南事件所拟办法（宣读来电）：(一)党部及民众团体，着即停止活动；（二）仇鳌开除党籍，永不叙用；张敬兮开除党籍，褫夺军职，许克祥记过一次，留营效力；（三）有少数党团不服从中央命令，仍不停止活动，可按反革命罪从严惩治。

（陈友仁到）

汪精卫：电中说起省党部同省政的情形么？
主　席：不曾
汪精卫：要赶快成立省党部同省政府，才有人负责。
于右任：对于许克祥未免处置得太轻了。
主　席：大家意见如何？
汪精卫：中央上次是将湖南事件交唐生智同志全权办理，只要他能镇压下去，可以照准。
主　席：可不可以公布。
汪精卫：应该公布。

决议——电复唐生智同志，照所拟办法施行。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附〕马日铲共真相（摘录）

许克祥

……二十一日下午四时，除与我的室人陈紫云及同事……从事研讨，对未来的行动作了一个大体上的决定。……二十一日晚间九时三十分，召集各营长黄子威、许振初、罗荣贵、梁铎、曾紫斌、周柏桥、曾方中、田畴等及参谋人员，举行紧急秘密会议，……说明我军应采取的立场与铲共的重大意义，并宣告总司令蒋公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表清党反共的宣言内容，及目前湖南全省尤其是长沙的危急状况，强调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

刚到了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团官兵分三组出发，向小吴门、东长街、营盘街、东茅巷等处共匪的机关所在地挺进，同时要求尹东旭①同志随我团队伍一同出发。〔尹〕回到他的驻地长沙小东街长沙戒严司令部，很迅速的也率领一部分的军队，策应我军，……我个人率领士兵二十余人来往于三组之间，亲负联络指挥的责任。共匪当时气焰嚣张，目空一切，事前对我准备铲除他们的情形，竟毫无所知，迄至我军向他们进攻，他们才由睡梦中惊醒，措手不及，我军破巢直入，他们大多数只能束手就擒，由于全团官兵行动的神速，作战的奋勇，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重要的匪窟：如湖省党部、湘省农民协会、湘省总工会等为共匪所把持的机关，均先后予以击毁。间有一部分武装匪干顽强抵抗，致有数处发生激烈巷战，经我军痛击之后，除少数匪干如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乘隙逃亡外，其余大部或当场死亡，或被俘获。我部也有官兵同志四十余人，壮烈成仁，还有少数民众为流弹所伤。……及至二十二日拂晓，长沙浏阳门与南门外及妙高峰一带，尚仍有少数共匪，率领赤卫队和纠察队企图反扑，我着周营长率兵迎击，甫经接触，匪即纷纷向株州方面溃退。周营官兵，见匪徒多系无知农民，不忍射击，遂任其作鸟兽散。到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已把共匪所有在长沙的七十几个机构，一律予以封闭、并交由当地警察负责看管。……

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后，次一步骤即为政治性的消毒工作。……长沙市附廓各地的共产分子都匿迹销声，凡共匪所组织的赤卫队、纠察队同时都土崩瓦解。惟湘潭的县长程一中，与共匪杨昭直……还盘据该县，变本加厉，……当即派周营长率兵一营由易家湾渡过湘江，向湘潭进剿。接触不到一点钟之久，匪徒纷纷作鸟兽散。周营进驻县城，程匪一中逃亡，数日后，捕获杨昭直，应该县人民之请，予以枪决，湘潭县遂告安定。

…………

铲共军事行动既告一段落，……经过两三天的奔走联络，得与本党忠贞同志陈其祥、彭国钧、蒋静一、张敬兮、左益斋、曾纪騤、尹东旭、刘德乾等，以及在长沙教育界、工商界著有声望的本党同志数十人，计划筹备组织救党委员会，……决定于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假长沙小吴门正街烈士祠（原名曾文正公祠）举行会议。

在开会的前一天（五月二十四日），我接到张翼鹏的电话说：武汉政权已派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等四人来长沙慰问军民，现已到达岳阳，可否让他们来到长沙，征求我的意

---

① 尹东旭，马日事变时任长沙戒严司令部参谋长，兼代戒严司令。

见。我经过审慎的考虑，当答以鲍等四人，可在岳阳暂停，候明日的大会决定，再行奉告。同时立即暗中由尹东旭派兵驰赴长沙市北门外三十余华里沿粤汉铁路的霞凝站一带，严密警戒以免鲍匪等乘隙窜入。我作了这个紧急处置之后，因思长沙邻近各县都有唐逆的部队，如派兵围攻我团，万难抵抗，究竟怎样办呢？所以在二十四日的那一天，使我忧心如焚，通宵不能成眠。待至二十五日拂晓，我私心业已定计：就是决心等候当日的救党委员会组织成立，然后提请大会通过，密电驻在岳阳的友军周彭两团长，把鲍罗廷等四人就地枪决。当时驻在岳阳的友军，一团为周磐所率领，一团为共匪彭德怀所率领，……我当日推测唐逆生智派鲍等四人来长沙的主要任务，无非想把我拘捕，解往武汉，送上断头台，并将我团部解散，……因此我事先必须准备好，未来的行动和步骤。

到了二十五日上午九时，救党委员会宣布开会。到会的有王东原、李仲任、周荣光、尹东旭、张翼鹏，及湖南省党部委员彭国钧、仇鳌等二百余人，……

当经决定：先行成立救党委员会，积极推行救党工作，并领导省政，办理善后事宜。当场推定我与王东原、张翼鹏、张敬兮、李仲任、周荣光、彭国钧、左益斋、仇鳌等为委员，并决定即时开始办公。当提出仇鳌为委员时，有不少同志认为他是跨党分子，表示反对。但我因为在马日以前，曾看到共匪在长沙所办的“光报”，载有攻击仇鳌的文字，所以当时认为他是反共的，而予以解释，才得到大会的通过。

大会把救党委员会委员推选出来以后，随即宣誓就职，接着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我首先提出下面的问题，请大家讨论，我并说：

昨晚接张翼鹏代主席的电话说：“武汉的中央政府派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周鳌山等四人，来长沙慰问军民。鲍等率步兵两连，已于昨日下午六时到达岳阳，本定昨晚乘车来长，经我在电话中坚请张代主席转电鲍等暂停岳阳，俟救党委员会开会决定，再行电告。如果冒险前来，沿途与我军冲突，发生危险，概不负责，现鲍等仍留在岳阳。我认为武汉政府是拥共的，与我马日铲共的原意完全相反，与今日救党委员会的宗旨，是绝对不相容。鲍等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匪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不知各位以为然否？”当时除张翼鹏因畏惧唐逆生智的淫威不愿表示意见外，其余各委员都情绪激昂，一致赞成我的意见，并主张去电佯为欢迎，一俟他们到达时，就拘捕枪决，以快人心。我认为还是密电驻在岳阳的友军，把鲍等四人就地枪决为好，这个意见提出后，经绝多数通过。委员中惟仇鳌有跨党嫌疑，我为坚定他的意志起见，经授意各委员，一致公推仇鳌，立即草拟发出驻在岳阳各友军就地枪决鲍等四人的电稿。不料仇鳌坚以病辞，拖延十余分钟之久不愿执笔。我便对他说：今天到会的人多怀疑你是跨党分子，我想替你洗刷这种嫌疑，所以推你草拟这个电稿，如果你坚辞不办，那更不会得到各同志的谅解。今天是国民党忠实同志开救党会议，绝不容许有共党嫌疑的分子参入会内，你如果真是跨党分子，我敢向你作进一步的表示，那就是对你会有极不利的事件发生，请你慎重考虑！仇鳌经过这一番劝告之后，才执笔把电稿拟妥，由我请张翼鹏签署领衔，张当时拒绝，因为他的内心虽同情我的铲共行动，但他是唐逆生智的幕僚而暂代唐逆主持湘政的，何敢领衔发电给驻在岳阳的周、彭两团长，就地枪决武汉政权所派出的代表呢？所以张翼鹏便想脱身事外，归罪于我一个人，不愿领衔来发这个电报，以免开罪唐逆；而我却认为张氏当时的地位，是替唐逆代拆代行，这个电报如果他不愿领衔，则周、彭两团长势必不肯执行任务。我曾一再坚决的要求，他被我与二百多个党员包围，无法推诿，只好照办。张氏领衔之次，即为我与王东原及各委员联名盖章。散会后，由我把

电报底稿亲送到电报局，并监督发电员拍出；但不幸被彭匪德怀在接到这个电报时，立即通知鲍罗廷等四人逃回武汉去了！

（载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8月）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

——农运策略

（一九二七年六月）

各省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

兹将政治局（六月一日）第□次会议通过之农民运动策略大纲通告如下

务必迅速令农民部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

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

一、最近的时期中，贫农与地主间发生空前的急剧的冲突，革命的农民运动突然的飞展。因此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问题，也便爆发了，这是革命的当然的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更加剧烈的冲突之继续发展，则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暂时的联合战线的关系，实在含着很大的危险。本党应当预察这种危险而给农民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二、现时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还是革命军队中的重要核心。但是，同时他们皆是地主阶级出身，大多数自己是小地主。贫农力争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打击了军官的利益，因此，军官的政治态度便要改变。如今还没有靠得住的军官，也没有阶级觉悟的军队。如果现时在军队中的军官，完全离开革命，那就足以使整个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灭。

三、各级党部应当迅速执行第五次大会的农民政纲——就是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同财产。这种策略现时非常的必要。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策略便可以完全在政治上取得地主同情的军官，使与工农结合永远的同盟。——一切私有地产者的阶级关系，是很确定的。这样的策略，仅只是延宕与革命军官剧烈冲突的时间，求得整顿工农运动的组织力量之可能。我们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得到充足的时间，来组织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武装，而且我们的影响，应该深入军队之中，一方面是逐渐改良军官的成分，另一方面是提高军队的阶级觉悟，使反革命者难于利用兵士来做反工农的工具。

四、现在应当特别注意小地主之间甚至自耕农及半自耕农之间，虽可寻出界限，然而他们的经济，都建筑在私有制度之上。所以不正确的政策，真可以使自耕农的群众，都落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之下（如平均田地甚至于平均佃权，以及均分财产，强迫捣毁祖宗牌，没收兵士邮寄回家之款等，都是不正当的政策）。

均分田地的口号，现在尚不能提出（至于均分财产，则根本上不应当宣传）。均分田地，非先给土地国有不可。各级党部应当对于农民协会的指导者，详细解释均分田地口号之危险。这一口号可趋使小地主甚至于富裕的佃农，都站到地主方面去。

五、农民协会的基础，应当从无地的农民移转到大多数的佃农、自耕农。同时对于无地农民的迫切要求，应当有具体暂时解决的办法。至于根本政策如屯垦荒地，亦应当急速公布。“无田地者应当得到田地”这一口号，是应当提出的，同时，要对于无地的农民解释：以国家财力实行屯垦政策来解决无地贫农的问题，以及实行均分田地，都要革命完成之后，

方能实现。无地的贫农，实在是革命的先锋，现时他们应当加入革命的武装势力以至于直接到革命军队之中去。

六、关于土地的斗争，应当有极明显的政纲，——就是没收大地主。不论国民政府的态度怎样，没收大地主的田地，是要实行的。这一要求的实现，不能单靠国民政府的命令，还要农民自己的力量。但是，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没收大地主田地是农民运动现时的职任，要在最近□期间开始执行。

七、最近几月以来，革命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普通的罚款禁止米境……往往殃及小地主。此等无组织的行动，自然要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甚至于农民协会之内也发生纷扰，一部分私有田地的农民自己与农民协会相冲。有些地方还实行禁烟禁酒等的“道德运动”，于是亦用强迫手段，如铲除烟叶等的办法。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农民自己相斗，使小商人亦起反感，至于怠工罢业，因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之金融经济的封锁政策反而容易领导小资产阶级，同向农民协会攻击，——因为农村之中的经济日益停滞，以至于牵及国民政府领域内之一般经济商业生活。这种无组织的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贫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

八、然而那些无组织的行动，客观上是革命初起时之风暴时期的必然现象。这些现象，表现土豪劣绅威权与政治力量堕落而动摇。实际上正需要直接建立农民政权，由风暴时期进于巩固革命胜利——农民政权的时期。国民政府对于乡村自治的政策，过于迟缓的实行，而对于肃清土豪乡绅的封建政权至今没有决心。因此我们的党应当执行下列的职任：

须以农民群众为首干，联合农村中一般被压迫的人民，彻底的推翻豪绅的封建政权之势力而建立乡村自治，进行没收反革命及大地主的田地，满足贫农目前的要求，并使农民在各地的斗争，与国民政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总斗争相联结，替国民政府建筑更深的社会基础。总之现在主要的职任是以农民为领导建立乡村自治的革命的农民政权，用一切可能的适当的方法，以政府的形式继续反土豪乡绅大地主之斗争。

这种新的农民运动之策略，其意义是：注重农民政权的斗争，这是实行土地革命，所最必要的，并使国民革命军之军官与中小地主中立；亦就是要推动左派国民党，使他们和我们共同赞助农民自己进行没收大地主田地的初步土地革命。

这种策略，并非降低农民运动的，而是对于农民运动，更加加以觉悟的无产阶级正确指导，引导农民作更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之斗争。

九、所以目前农民运动的根本任务及我们党指导农民运动的任务如下：

（1）农民协会，不但要团结无地的农民，而且要凡是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都要团结，以建立革命的联盟。而且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都应在联盟之内。

（2）按照着农政部所颁布的条例，以及本党所决定的方针，进行乡村自治的运动，组织革命的农民政权。

（3）解除土豪乡绅的武装，使农民夺取其武装，组织并巩固农民的武装势力（农民自卫军），自卫军的队员应以农民协会会员充当。当乡村自治政权稳固后农民自卫军当为唯一的乡村中政府军队（或将称为保安队），以□征兵的制度，使个个革命农民受着武装训练。

（4）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预备工作，调查大地主的限度，搜集必需的材料。引进国民党党部及其群众参加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在农民群众及一般民众中解释宣传这个问题。

（5）指导改良贫农生活状况的斗争。更加注意减轻佃农剥削之斗争。实行减少捐税的运动，宣传并要求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实行。研究改良雇农生活的办法。实行建设消费借贷生产的合作社。

（6）引进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参加指导的工作。真正农民不但要多多参加乡区农民协会的机关，而且要参加县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农民协会的机关中，应多量加耕种田地的贫农，使他们成为协会之中心。

十、农民协会现时最危险的病象，便是本党在许多时机中，欠缺党的指导。

各级党部对于各地斗争的形势，农民协会组织的成份农协机关的成份都缺乏精确的考查；对于各阶级农民的趋向，亦没有明晰的观查；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的数目，武装农民的数目，亦不能够详细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正确的整理材料。

十一、农民协会内部的情形，亦是不大好，省县乡区的各级协会之间，尚未发生密切的关系。有些指导农民运动的负责人员，往往惯于虚报农民组织的数目，夸大农民斗争的事实，——这简直难于有正确的实际的指导，而且妨碍政治方针之确定。农民运动之指导机关里，缺少真正农民和非同志的参加，这是很大的缺点。省县农民协会指导员的成份里往往只有不知乡村情形之知识分子。

十二、因此我们党对于农民运动之组织上的责任是：

（1）必须检查农民协会机关之成份，而且要开设非党员的及真正农民的训练班，以求一般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使党的指导深入乡村群众，各省农民协会应当积极注意实行这件事。

（2）引进革命的国民党员参加农民运动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如果国民党不参加农民协会的运动，那么非但国民党脱离了农民协会，而且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脱离农民运动的同盟。因此，同时必须发展国民党组织于农民之中，扩大并强固国民党左派在农村中之基础。

（3）必须努力整顿共产党党团的工作，农民协会中之党团与团部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达到密切的关系。各级党部机关应时常注意讨论农民运动，尤其是省县党部之农民部与各级农民协会中的党团。如此，方能准备正确的指导。尤其主要的，是要努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于农民之中，并且必须强固党的支部工作。党对于群众的指导必须切实建立，——要征取向来在旧式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等）指导之下的群众。

* * * *

各级党部尤其是湘鄂赣，接到这一个大纲，必须加以详细的研究，迅速规定具体办法，来执行这一新的策略，并且将运用此策略于各该地的具体的情形的计划，即报告中央至要至要。

中央常务委员会　　安中原①

中央农民部　　宗容民

① 安中原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宗容民是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各省省委鉴：

六月一日政治局通过的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已由农字第五号通告，通告各省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此种策略关系农民运动前途，亦即整个革命运动之前途，异常重大，尤其对于湘鄂赣各省农民部必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无得怠忽——此策略大纲所指出之最主要者为农民政策建立之运动，然分析要点有三：（一）土地革命之开始，如没收大地主及土豪劣绅之田产等，并非过火，仅为现时革命阶段之策略起见，指明不没抄小地主及革命军官之重大意义。（二）指明均分田地甚至财产，则确为对于现在之不正当的政策。（三）指明其他政策，虽有本系正当的，然因本党指导力之弱及农协执委成份之缺少农民，致令永久以无组织的行动出之，——此等无组织行动固为革命初期所难免或且必需，然长此以往未能及时加以组织指导，使已得之革命胜利得以巩固，而进展于新的时期，则其流弊甚大，此等无组织之行动，如下列各事，目前尤当绝对迅速纠正！

（一）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都在大地主政治影响之下，实行反对革命运动。现时农协本身必须使此种行动不殃及小地主及革命军官。至于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现时不但不能停止，而且正在他们反攻时期，必须更加坚决的进行，但是，在现在政局之下，必须在每次斗争中设法尽量的搜集此等土豪劣绅之罪状及证据，不能再用原始的方法；此等真凭实据即可交给政府机关办理的工具宜切实注意。

（二）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止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亦当绝对停止。关于阻谷问题，农协需精密计算乡村之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或多量供给军用。农协捐款，除巨绅土豪之罚款外，其他均须指定用途，例如协作社之建设，本应与捐主以某种权利，似此方能收充裕经费联合小商之实效。否则农协在本乡的写捐，往往使小商人恐惧怨恨，而实际并未收得此款。此等行动宜立即纠正，反正收不着的，宜立即公布取消。至于农协向外来采办货物之商人捐款，则亦非办法，——农协应有组织的规定适当的物价，勿使奸商垄断而剥削农民，却□不可过于恐骇外来商人，使农村经济与城市商业断绝关系，关于不必禁止谷米出境，亦是同样的情形和理由。

（三）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改革男女关系的运动等，自然都有进行的必要，但是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

用强迫方法。农协并非共产党，实际上是农民政权之雏形，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而由国共两党党部去耐心解释宣传。——可以没收庙产，而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至于宗法迷信尚深的农村中，甚至于反对这些陈腐东西，都必须以谨慎出之。

关于组织问题。各级农民协会，均须尽可能的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尽可能的实行改选，一方更须使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尽量参加各级农协之执行委员会。整个农民协会必须以耕田的佃雇自耕农等贫苦农民为中心，而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学教师等，建立革命联盟。此种改选运动（代表大会）应以巩固农协实行新政策为号召。一方面可以略举无组织行动之各该地的具体事实加以匡正（通过相当的议决案），别方面关于乡村自治运动之要求应极热烈的宣传，由各区各乡农协向政府请愿，再则对于没收大地主反革命派亦须对一般人宣传，各级农协应标明不没收小地主，使农民群众及其他阶级皆能了然。最后，此种改选运动中尤须注意揭露豪绅反攻之凶恶于全社会，议定抵御镇压之具体实行方法。此种各级区乡县以至省的农协代表大会，如因剧烈之武装斗争而难于开会时，则现有农协委员会必须举行上书□事，组织确不健全者，必须改组。

各级农民协会，对全国农民协会必须发生亲密的关系。全国农民协会已发布之临字第一号训令，及将发布的临字第二号训令，各级农民协会尤其是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必须通电拥护，一方面表示各级农民协会已有实行新策略之决心，他方面亦可以提高全国农民协会之政治地位。

各级农民部，须知农民运动已至极严重的时期，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所以，各级农民部，务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严厉执行，至要！至要！

安中原①
宗容明

① 安中原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宗容明是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

中国革命已进展至一新阶段，全国农民协会，为使农民运动适应此新阶段，曾训令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切实执行新策略。该会为使此项新策略，更能顺利执行起见，更于昨日发出临字第一号训令，训令各省农民协会，强固组织，严肃纪律，保护革命同盟者之利益；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并谓倘有阳奉阴违或执行不利者，必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为反动派借名滋事，捏词诬害者，亦须立予扑灭，毋使滋蔓！自此以后，中国农运必能在该会指导之下，获得伟大的发展。本报特将该训令原文，觅录于后：

为令遵事。前此蒋、夏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最近许克祥在长沙谋乱，亦以农工运动过火为号召。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火与否之问题；但一方面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亦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实〔是〕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始能适应新环境，已由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中明白指出。现为使此新时期之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立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

（一）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人，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作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的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佃、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之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之主要分子，并为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业品，虽为商人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亦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济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的扶助商业之发展，以防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

*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71页《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即此《训令》。该件最后的署名是：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

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

（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期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亦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

（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

（五）加紧宣传工作，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反动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农民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及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须真实将农运详细情形，尽量发表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彻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本会所示途径，努力工作。

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亦须报告上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载1927年6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

（选自《马日事变资料》）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

——农运策略的说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

各省委特委临委鉴：

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我们同志尤其是农运负责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各方面必须有深切的了解与明确的认识，并须根据第三次大会之土地问题议决案，而具体的运用，然后可以使党切实领导农民运动，以推进革命势力的进展。因此各同志对于这个通告，务须特别注意，并且切实执行。上次农字第五号通告，是关国民政府治下农运之新策略的政治局议决案，然而各地都应注意参考，这是湘鄂农运的经验，本次通告则为一般全国农运策略之说明，仍是根据那议决案的原则：

（一）政权问题

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固然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在阶段主要特点是农民政权之争斗。（一）自耕贫农众多而尚受新旧军阀压迫的地方，非有建立农民之革命民权的目标，不能使此等贫农形成斗争中的领导者，而联合一般人民去开始反对军阀豪绅的运动，亦不能使他们真正明了革命战争（北伐东伐或西伐）的目的和意义。此种政权的斗争方能促起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二）新旧军阀之下佃农及失业民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广东）亦须立此目标以指挥暴动，虽则此处的主要特点仿佛已经是没收大地主，其实没有争政权的目标，单纯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够的，此等地方的主要口号是为土地而争政权。（三）国民政府之下，农民事实上取得政权的县份及区乡，曾经有许多地方（至今还保存着几县呢），可是以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任令农会孤军独战，现在的新政策是事实上帮助农军反攻。如今豪绅的反攻在湖南湖北江西都演成剧烈的危机，民已得之胜利（事实上的民权）几乎全被摧残，此时农民政权之斗争所以更加要加紧，要对于豪绅的进攻，组织极坚决猛烈的反攻，在这斗争过程中便要开始没收大地主，就是要以行动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左派，一面对他们让步（见上两次通告），别方面就挟持他们去共同反对劣绅土豪，自然必须以建立民权为目标。第一农民群众有势力的地方，立即成立自治筹备处，吸引小资产阶级参加，标明除劣绅大地主反革命（已被没收者）外，一切小地主享有公民权选举权，农民群众势力尚小的地方，亦宜以此政权斗争为目标。而实行武装斗争时便是为乡村自治而战，为镇压乡村反自治者而没收其土地。各级农协，应群起要求政府颁布自治，第三①农政部与农协发生亲密关系，双方互相响应，农政部从上而下的帮助农协之政权斗

① 原文如此。

争，农协自下而上的拥护农政部之政策通电，控诉豪绅请愿派代表等运动都可以增加这农政部的威信。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

我们知道农民运动中贫农最革命的，中农也来参加革命了，其结果引起其他一般被压迫的民众都积极起来根本上推翻封建政权。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否则农民政权不能巩固，贫农领导政权应当指导吸引一般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封建势力的分子，代表农民及其他乡村一般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的特别是贫农利益的向土豪劣绅地主封建势力给以严厉的镇压。同时乡村农民运动及农民政权，必须在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赞助并巩固革命的国民政府。

封建地主阶级乃几千年来压迫剥削农民最利害的一个阶级。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政权，则农民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从做起。所以农民运动的初期，必须领导农民用种种革命手段实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权力。标明为民权的政治而斗争的目标。必造成很紧张的革命空气，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认为过火的批评实际就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而企图消灭农村的斗争。我们必须严厉的加以纠正。非如此不能根本摇动乡村封建政治使一切斗争得到胜利农民政权确实的建设起来。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惟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使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治组织（如民团、团□、团防局等）完全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应即建设民主的区乡自治制度，以保障农民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

农民不特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参加县政治的方法是：一面使县政问题皆山县长与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的民众的团体开会议解决，一面促县政府改民选委员制。

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他们要求国政府省政府赞助农民争政权之争斗，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农民协会的政治地位应当尽量的提高。

（二）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之进行在阶级分化没有明显的地方，减税运动可与富农小地主等共同作战，在阶级已有明显分化的地方，减税运动以及实行统一的农业累进税之要求，仍是各种农民作战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对高利贷，也不特为佃农之问题，应即竭力领导他们努力斗争，至于减租运动，则尤为重要，这实是没收大地主运动之第一步。在经济斗争中，更当注意青年农民的利益。但不能与整个经济斗争脱离，对于雇农手工业者，在目前情况之下，不宜另有独立的组织，惟农协对于他们的利益，应该切实拥护。如雇农人数太多，农民经济斗争扩大则农协内可以组织雇农部（手工业部亦是如此），但对于农村的联合战线，亦须注意巩固，因此一方面要使雇农要求得到满足，他方面为防止会内的冲突计应使雇主及一般群众了解雇农改良生活的必要，有必要时农民协会应为小农雇主及雇农冲突时之仲裁机关（青年雇农牧童亦在此例），经济的斗争之进行，各地的宣传亦有不同，张作霖治下则减租减税没收大地主，三种斗争宜看各省农民经济状况而定。注意之点主要是要引导这种经济斗争，收得到最广大的群众，而且能立刻转变到政治斗争以至军事行动，蒋介石治下亦是一样的，但是广东应当特

别注意更须明确的以农民政权及没收大地主为暴动之标帜，在湘鄂赣三省则除①情形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尤须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经济斗争在程度剧烈的地方，必须转入农民协会自己开始经济的建设事业，如借钱的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二）至于减至苛捐杂税的运动必须各地方调查实情向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田税的问题与土地问题应联合在一块进行并须指出非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之趋势，至没收后之土地则须征收农业累进税。

土地问题确为不能不解决之重要问题，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不但是佃农贫农即失地之农民及短期之雇农亦有迫切的要求，就是苛捐杂税等等压迫之下的自耕农也大多数感觉土地之缺乏，并且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即为改变现在的土地制度使耕地农有实现而进于国有，我们即使在阶级分化未明的地方亦须宣传第五次大会之政纲，使农民及一般人民了解解决土地问题之必要与策略。土地问题应与经济斗争之发展合而为一，应使农民了解减税减租并不能彻底求得解放，必须进到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阶段方能开始解放农民的土地革命。

对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则必须使之中立，使农民得和国民党左派及一般被压迫民众结合进攻土豪劣绅大地主。我们的党在目前必须用很大的力量进行这个工作。实际上小地主与富农不一定是土豪劣绅，不可使他们落于土豪劣绅大地主领导之下因而巩固反动的政权。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小地主及中等阶级一方面虽然可以反对土豪劣绅，他方面客观上也是农民的剥削者，所以对于他们要求减租是不没收其土地财产之交换条件。全国的减租运动都须注意这一点；并须宣传国民政府之佃农保护法，国民政府治下，则须要求此法之严格的实行。

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原则在减租减税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然后国家开办屯垦方能解决失地农民及兵士之土地问题。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也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利用合作社加入军队兴办工程等方法）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所以客观上如果有紧迫的必要，一方面固然可以由农民协会，最好是乡村自治政府设土地委员会，设法分配若干土地与此等贫农，但只是将没收之公产庙产大地主荒地官地来分配，而不是均分，别方面必不可过早的提出均分土地的口号，尤其是均分财产的口号。

阻卖问题是乡村中荒歉或因剧烈斗争而经济破坏的时候所必然发生的。农民协会以及将来自治机关，必须注意这种斗争，不使过于延长，随时筹算本地所需米粮，如已有多余，即需竭力流通，这不但对于保持与国民党左派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如供给军米问题），而且为农村经济本身的利益，亦是必要的。

（三）武装问题

农民政权的斗争与土地的斗争，直接要求本党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的问题，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相适应。农民运动，往往一开始便急转直下进于武装的冲突的，各省军部须派有军

① 原文如此。

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在北方各省，则须取得红枪会的实力与群众，使之脱离土豪乡绅的影响而置于指导之下。成乡村自治机关的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并使有一批复一批的武装训练与补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各省军部及农民部，均须积极切实准备，同时必须号召农民加入军队。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

（1）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

（2）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民协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标大刀木棍等武装二件。

（3）对付旧有地主阶级的武装如团防民团保卫团等分为三种办法：（一）使政府下令各省均限于组织农民自卫。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须一律解散，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二）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能以农民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三）不能实行两种办法的地方，则用改选其办事人方法，使在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移转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我们必须在此种移转的过程中参加活动，在团丁中设法施行政治宣传，使之减少为地主阶级利用敌对农民的思想并表同情于农民协会，渐次归到农民协会手中。

（4）全国农协会提出，提出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请国民政府颁布。

（5）应使国民政府照各省农民自卫军状况领取或廉价购买枪弹。

（6）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

（7）中央及各省的军委（未组织军部的应即组织），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军委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应与农委开联席会。

（8）应有计划的、经常的宣传民（缺十余字）装之残暴、无理，农民应即建立自己的武装。以保障农村革命的胜利。

（四）组织问题

农民协会之组织，一开始便含有与乡村中旧政权对抗第二政权的性质——这一层意思，应当十二分的注意。农民革命在运动始起的时候，不论是减租减税或减息，不论是武装的争斗，总之都是反对豪绅大地主的斗争——亦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固然阶级分化不胜〔甚〕清楚的地方，小的豪绅会联合在协会或红枪会之内，共同反抗军阀及当地巨绅。但斗争稍稍发生，小的豪绅便要反动，便要转到一般农民联合乡村中小商人小学教师等而反抗豪绅大地主的阵势。一般农民之中自然是贫农，和地少的自耕农无地的佃农雇农以及游民群众，占中坚的地位。所以农协的组织，应当以贫农为中心。但是又不可以游民为唯一的基础。而应以佃农等耕种田地的贫农为其基础。经济落后的地方，小工业及小商业并非与农业有明显的分化，那就同时要吸收这种分子到农协之中，至于中农富农也不用排拒——斗争的过程往往使他们自愿加入农协——只须农协机关（执委会）里巩固贫农的领导地位。应竭力引导本地真正农民参加农协机关。愈多愈好。农协会在自治政府未成立之前他是乡村中的第二政权，亦就是乡村中革命分子的团结。乡村政府建立之过程中他居于领导地位。乡村自治政府既成立之后他是

政府的中坚。事实上等于指导政府的组织。共产党因民党之党团经过农民协会而指导乡村政府——农民协会便成了更扩大的国民党，他在中国之政治的民权化的过程中占着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五）联合战线问题

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中农□□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学教师进步的智识分子，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在北方的工作，须特别注意于领导富农及智识分子（小学教师等）一同努力作反军阀的运动。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小商人及智识分子均有暂时被蒋介石诱惑的可能，宜尽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以暴露蒋介石欺骗民众的罪恶，以强固农民斗争的联合战线。在湘鄂赣三省亦须联合小商人及智识分子，使其坚决的站在农民方面。再须宣传土地问题之解决，不但对贫农有利而且有利于乡村中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也只有他们和贫农联合攻击豪绅大地主，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

当富农小地主对农村革命尚持怀疑，甚至恐惧的时候。农村革命之中心势力的贫农，固不可不去推动他们，以实行的行动去领导他们，使他们一同尽力于农村革命，但要注意他们的利益，决不可以使他们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北方各省的初期运动尤宜注意于此。

农民必须与城市工人结合密切联合战线，具体的发生密切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帮助，如经常的互派代表，遇事互相报告，互相以实相助，指明工人的敌人与农民的敌人是互相勾结的。他们双方常常各造谣言，离间工农，实则他们是共同剥削压迫农工的。

（六）会党问题

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勇敢的精神，很有对于共同奋斗的义气。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机械的纪律）及其游民的性质使他们往往为豪绅所利用，他们的组织，在农民之中，往往很有发展，他们久受压迫，他们因农协起来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自由，故他们对农民协会的组织的感情很好，农协应取得他们的群众，这是非常必要的，假若，农协排拒他们，则他们在旧式的首领指导之下是有被地主利用成为法西斯蒂的可能，我们对他们应该有积极的很好的宣传与训练，同时须有具体的部分解决乡村游民目前迫切要求的方法，以及国民革命对于他们的政纲，使他们能明了本党能代表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可介绍会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会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凡会党的行动与农协冲突时，应设法调和，纵使证实其为受人利用而反动，也应□惩处其首领，不要伤及群众，以防遇此被压迫之贫穷群众都无路可走更形反动，就是攻击其首领，也不宜操之过激，只宜以具体事实暴露其首领不能彻底为农民谋利益的罪恶。不能放任他们使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对红枪会问题亦是如此。

（七）国民党问题

从前农民对于国民党往往不愿意加入，土豪乡绅又往往利用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以打击农民，以后对于国民党由乡村直到城市的党部，都应领导农民群众加入。我们党经过国民党

乡村党部之党团作用去指挥农协及自治机关的工作，乡村农民的国民党党部应成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在政治主张及策略上，都应当从下而上的给上级党部的左派以建议而督促之实行。至于国民党的农民部，第一应站在党的地位给予农民运动物质经济的帮助，第二，在形式上予农民运动以指导，在农村中宣传国民党之革命的农民政纲。国民党农民部对于农协并非统属的关系，须使农民协会的整个系统，俱置一于全国农协之下。但如国民党，致以上级机关的态度命令农民协会则亦不宜加以直接反对，而应辨别其政策之革命与否，加以纠正或敦促。农民加入国民党后应注意向其宣传国民党政策及左右派之分别，使农民的政治观念进步，这样，才不致如现在有许多地方农民反对国民党，又有许多地的农民以为凡有国民党的名号便都是革命的。

（八）共产党的发展问题

第一，应在贫农中间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第二，要用党团指挥各种农民团体，对于农运工作尤须有精密的计划。例如每级农民部对于该县农运工作至少应有每半月的计划，而省委农民部则至少应有每一月的计划——应根据第五次大会决议案及中央之政策，加紧努力地为土地革命农民政权而奋斗，自然应当有系统有组织的逐步筹划。

（九）青年工作

C．Y．中央最近已有具体的决定，曾经C．P．中央农委的审核，兹从略。

（十）协作社

协作社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现时已是非常之重要。所谓协作社，不必一定照着“西洋学院”的组织而要实现其主要的意义，帮助贫农脱离重利盘剥及奸商之垄断居奇等种剥削。所以各地可以就原有的组织或农民自己的习惯为改良之形式，不必尽同。必须造成协作社的人材，研究各地农民自己的经济，从速创办协作社以补助农民的经济斗争。——尤其是信用合作社。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关于协作社之决议草案

1．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工人阶级手中时，那合作社的组织可容易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2．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资产阶级手中时，那末合作社在经济方面可以说完全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了。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可以利用他来作改良派的宣传，以愚弄小资产阶级，他们用合作社的机关为借口说凡此便可消灭资本主义，以取消工人阶级的奋斗政策，及其阶级斗争。

3．国民革命的发展，使目前中国的近状到了介乎1.2.之间的一种情形了。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

在目前中国民主革命尚未完全得着胜利保障之时，合作社之工作应该采如下之方式：

（一）利用合作社为强有力的经济武器以反抗奸商重利盘剥者的压迫，此种经济的武器可以成为改良贫农一部分生活的工具。（二）合作社应当形成一种引导农民加入农协使其参加乡村斗争的组织形式。（三）合作社应用全力以帮助农协的发展，合作社成为一组织各种农民的形式，乡村有许多手工业者，他们本身的利益自觉农协尚不能把他代表出来，但利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则可引导之参加农协。

4．在组织许多大规模合作社之前，应向农民宣传合作社的意义与其重要，同时并须作提高农村文化的宣传，所以协作社可起首组织的地方必须在那有强有力的农协组织的地方，因该地之群众有合作社之要求，换句话说合作社是要跟着农协的发展而发展，同时须受农协之领导。

5．在阶级的地位上我们收集合作社的会员应采取与农协收集会员的相同标准，如此才能抵制和操纵合作社乡村的资产阶级及压迫者之影响①，同时合作社社员虽应采用农协收集会员的标准，但并非只有农协会员方可入合作社，反而言之，合作社必须成为引导中农，贫农加入农协之一工具。

6．当北伐军继续向北方军阀进攻，帝国主义者向华侵掠（如英国集中实力于上海等）时，合作社只能得着政府很少的帮助，因此，合作社的经济，需自己独立，只有向乡村募集的方法，所以在乡村各公款内，农协应当拨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基金，在目前情形之下，我们所要组织的合作社当一方面要费少许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要成效很快，这种的合作社即为消费合作社，在那个有农产品输出的乡区（棉花丝茶等）我们可以组织交易合作社，在目前最困难组织的为农民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合作社，需要多数的金钱，机器与较高的文化，在乡村所有的修地筑堤的旧式社会，农协应当使之根据合作社的意义改良，在乡村手工业区，应当组织为他们组织购买原料、分卖出品的合作社，此最后的两种合作社的程式可说为达到生产合作社一种最近的组织。

7．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应当在城市或省会之地建立中心的合作社，以便在较便宜的市场购买生产品以帮助农民，所以应在有二、三十小合作社组织的乡区，组织一中心成为较大的合作社，省会亦然。

安中原②
宗容明

① 此句原文如此。

② 安中原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宗容明是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电报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没收反动派、大地主与乡绅土地的提案，共产国际纲领是主张没收反动派的土地。中国共产党曾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去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土地委员会再三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开始曾提出全面没收土地，但结果仍决定只没收大地主所有者的土地。国民党在汪精卫回国的同时也开始讨论土地问题。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除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外，没收所有土地。这个决议得到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认可。但是因为害怕受到军队方面的反对，决议未曾公布。军官的大部分出身于中小土地所有者阶级，从而对土地改革怀有反感。但是，作为军人口实的，还不是没收土地，而是以下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即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大米的转运被禁止；向商人强征课税；农民可以富裕之家索米而食；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分配给农民。这些"过火"行为，驱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特别是那些家庭受到打击的军人更是那样。

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有90％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夏斗寅的叛变和长沙的武装政变就是这种全面反感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共产党也必须实行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动，缓和没收土地政策的进行。为了能够集结我们的力量对抗反动趋向，必须制止受到中小土地所有者支持的乡绅与掠夺者的共同进攻。与此同时，需要很好地制定一个计划，组织足够的力量，作为实行没收土地的准备阶段，还必须实行农村自治和建立农民武装。不这样作，将会引起同大部分反动军队的直接冲突，并同国民党发生分裂，而且我们还可能沦为反对党。现在国民党内的普遍空气是，一方面要求同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赞成镇压共产党。要在最近的将来制止国民党这种倾向，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谭平山的就职演说是暧昧的，这是在夏斗寅叛变之后的事。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是在平息夏斗寅之前决定的。所以，谭平山作为政府的一员，不能公开拥护与国民政府不同的意见。贵方的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即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民主的专政为目的。但是，它在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所以，通过改组，更换汪精卫是困难的。我们认为，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同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吸引这些左派领袖，找出一个共同的政纲。假如同他们分裂，要创立我们自己的军队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不是废止没收大地主与反革命派土地的政策，不是禁止由农民自己去没收土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纠正"过火"，没收土地，揭露反动派的夸大宣传，消除军官和左派国民党员的经济恐慌，克服妨害农民运动的障碍。无业、无地的农民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原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分一切财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同佃农与自耕农的冲突。这点必须改正，必须以贫农作为运动的中心。

（选自《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7期）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

——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

（一）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这一革命在中国目前已经受了一个挫折，其原因：（1）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主观上的组织力尚不能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联盟；（2）工农武装没有建设；（3）我们党动摇不定政策的错误；（4）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一新的历史的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进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的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惊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略上的答复。

（二）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嘘的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穷苦农民身上，在北方，苛捐苛税的繁重已经迫使大多数的农民抛弃土地，得不着生活，南方各省，农民的痛苦与北方无异，屡经奋斗所得的些许自由，又重新完全被剥削。无论南北大多数遭受过度的压迫的穷苦农民（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失业农民以及大部分自耕农）他们已经觉悟起来，到处和他们的敌人奋斗，尤其在南方自李济琛唐生智之屠杀以来，农民之反抗奋斗，更加英勇而坚决，同时新旧军阀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内部矛盾，不仅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反而一个一个很迅速的正在继续崩溃下去。因此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目前的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应。我们的党只有坚决的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怎样开发土地革命的潮流呢？只有敏捷的认清客观情势，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广大的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才能达到此目的，此时，“不缴苛捐杂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共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实现革命民权”，“实现乡村农会政权”，“民选县政府”，“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武装”，“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抗税之自由”等口号，应当是开发土地革命的总的动力。

（三）在北方各省如直鲁晋豫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多数，他们苦于繁重的税捐日益

破产，流为土匪或逃亡他省。在这里我们要以自耕农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联合一切农村穷苦民众及小地主结成斗争的联盟，反抗一切苛捐苛税，及预征钱粮，反抗一切战时的征发，实行减租二五，同时从这种斗争的发展进行夺取乡村政权，夺取武装以至于没取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等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及地户。

在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则佃农占多数，次之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受地主重租的剥削，同时自耕农小地主则受军阀税捐的剥削极为繁重，我们应立即于实行“二五”减租，反抗苛捐苛税预征钱粮的口号之下实行罢租罢税，一面借以揭破武汉南京政府减租减税的伪善面具，一面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团结一切农村穷苦民众以至于小地主，进行严重的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农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现在应用全力宣传聚集农民群众力量而实现之的口号。

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对超过年利百分之二十的高利贷的争斗应彻底进行，因为这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共同要求。

（四）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其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

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耕地的或失业的）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这是乡村政权的一个正确的形式，要开始在各地实现起来。

（五）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应当指出在农民协会组织上要特别注意的几点：

（1）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

（2）农民协会既团结了一般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并且在一定条件之下，小地主也包括在内，则农协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小地主一般的不吸取在领导机关内，此外在区分执委内，佃农自耕贫农失业农民至少各占五分之一，在区执委内小学教师的当选是有必要的。

（3）各级农协设立妇女部及青年部，乡村儿童运动及儿童团体完全受农协青年部之指挥，农妇概加入农协不另组织女界团体。

（六）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但是现在所谓革命军实际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到处屠杀农民，武装冲突已成为农民运动中极普通的现象，因此在现时阶段中农民运动确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谋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今指出几项大要的办法如左：

（1）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2）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的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

（3）对团防局保卫团等地主阶级的武装在不能即刻夺取其武装时亦采用上项的办法。

（4）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5）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了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对敌者（在没有被他们的反动领袖拍卖以前），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是异常之恶劣的，他们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的领导走上革命正规为一定的目标而奋斗，而以“打家劫舍”为惯常生活，其行动与思想完全随其领袖为转移，因此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面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其方法与上项大体相同。

（七）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的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职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①视党的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感觉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概。党在平时既不能尽其组织上积极的责任，□时，自然更不能希望其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如果本党的领导能正确的在农民中建立起来。那末，第一，要使党的支部能够深入到乡农协，并□□正成为群众争斗的核心。第二，党对农民的指导必须经过党团（改正过去□□领袖的错误），党团要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第三，各省党部的农民都要□的建立起来，对一省的农民运动每次定出一月或两月的计划，督促并□各级党部切实执行。

安中原
宗容明②

① 此处似缺字。

② 安中原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宗容明是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讲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一、几个小问题

同志们！我应当道歉，今天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迟到了，未能完全听到托洛茨基在这里，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说

可是我想，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

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

我将尽可能在论战中排除个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个别委员的个人攻击是不值一谈的。

看来托洛茨基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把自己扮成一个英雄，使执行委员会把讨论战争危机、中国革命等等问题变成讨论托洛茨基的问题。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这样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对！”）况且，与其说他象个英雄，不如说象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些被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揭穿了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人，痛骂布尔什维克，这对布哈林或斯大林并不是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就不讲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型的半孟什维克赞扬我而不骂我，那对我倒是莫大的侮辱。

反对派现在的这种派别言论是否违背了他们在1926年10月16日所承担的义务，这一点我也不多讲了。托洛茨基认定，根据反对派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他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要硬说声明的内容只限于这一点，这就只能叫做诡辩，不能叫做别的。

在反对派10月16日的声明中不仅说到反对派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说到这些观点只有在党所许可的范围内才能坚持，派别活动应当抛弃和肃清，反对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意志和中央的决定，反对派不仅应当服从这些决定，而且应当诚心诚意地“实行”这些决定。

既然如此，是否还需要证明反对派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已经被他们自己极粗暴地破坏和撕得粉碎了呢？

在反对派的许多提纲、论文和演说中，下流地和极端诬蔑地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这一点我也不多说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断地硬说联共

（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似乎过去坚持而且现在还在坚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论断是捏造，诽谤，故意歪曲事实，这几乎是用不着证明的。实际上，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来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就用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代替了那一个政策。

只要看看这些文件，如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著名宣言①、斯大林的给宣传员的提纲②，以及布哈林日前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提纲，就会确信这一点。

反对派的倒霉正在于他们不造谣不歪曲就活不下去。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二、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

既然很多省份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仅握有经济权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既然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呢？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

因为不同时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不能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因为谁要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一定要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

因为不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打倒并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共产国际（自然联共〔布〕中央也是这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① 指1927年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见本书第292—295页。——编译者

② 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199—207页。——编译者

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和刚才说过的共产国际的观点正相对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没有决定的意义。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对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估计过低，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

请让我引证托洛茨基几天以前送交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众所周知的提纲吧。托洛茨基这个提纲的标题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托洛茨基在这个提纲中写道：

> "布哈林借口'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似乎起主要作用来为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辩护，他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布哈林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是根据经济的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些烦琐哲学的定义，'封建残余'仍旧不能替如此明显地促进了四月政变的政策作辩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①]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不仔细看这一段引文就会以为托洛茨基不是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路线，而是反对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这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这一段引文中所说的是否认封建残余在中国的"主要作用"。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是把中国现在日益展开的土地革命宣布为上层的革命，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以要把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说一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背叛共产国际路线的行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托洛茨基惯用的欺骗手法。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号里面的力量。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论调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所持的观点就是如此。

请让我指出：这种观点正是张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观点。

如果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承认张作霖和蒋介石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们所要达到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办事员的观点了。

如果封建残余应该放在引号里面，如果共产国际宣称封建残余在革命现阶段上有主要的意义是不对的，如果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关税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残余及支持这些残余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那末，中国的土地革命还有什么内容呢？

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哪里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根据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土地革命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吗？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里，千百万的农民被卷进极伟大的土地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赶走地主，"用平民手段"[②]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② "用平民手段"系马克思语。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垮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和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编译者

制裁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封建军阀的压迫不是中国的压迫的主要形式，那末，这样强大的土地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和军阀的基本同盟者，那末，千百万农民的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怎能同时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呢？

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现在就有二百五十余万会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种会员在湖北和河南现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间在中国其他省份又将有多少呢？

还有“红枪会”、“硬肚”等等，——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现实吗？

难道可以真正地断言以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口号的千百万农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对真正的不容怀疑的封建残余，而是反对想象出来的引号里的封建残余吗？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陛下”的办事员的观点了，这难道不明显吗？

由此可见，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从1905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在1917年2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

请让我举出几件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事实，例如举出1917年2月革命前夜的事实，那时我们正走向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托洛茨基硬说，既然农民中间的分化已经加剧，既然目前我们这里存在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无产阶级把自己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末农民的作用就会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不会有1905年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了。

列宁对这一点是怎样回答的呢？请让我从1915年列宁关于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论文中引出一段话来：

> “托洛茨基的独创的理论（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注）是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他们已经变质了，他们可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可笑例子！如果说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现在正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说'没收地主的土地'（托洛茨基继1912年1月代表会议之后在1915年所重复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说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坚决精神也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带动起来（第217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竟糊涂到了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1905—1915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分子，促进了农村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从1906年以来就主张农村无产阶级要单独组织起来，并把这个要求列入孟什维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城市无产阶级的接近。但是'农民'同马尔柯夫—罗曼诺夫—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对抗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个真理是如此明显，甚至连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洋洋万言的几十篇文章也'推翻'不了。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们的忙，这班政治家们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而这就是现在问题的症结。"（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398—399页）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点在于他看见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而看不见农民，不了解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这个特点构成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半孟什维主义"也正是在这里。

从这个基本错误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糊涂观念。

三、屠杀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及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盟的武汉左派国民党

就拿武汉问题做例子吧。共产国际关于武汉的革命作用的问题的方针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既然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末，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

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

共产国际的方针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代表什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不代表什么，或几乎不代表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

什么。”

就说武汉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汉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要求和这个空架子作坚决的斗争呢？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人竟开始支持空架子，参加空架子，领导空架子呢？共产党人必须和空架子作斗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共产党人拒绝和空架子作斗争，便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提议和空架子作斗争，即使采取共产党人立即退出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办法呢？为什么托洛茨基提议留在这个空架子里，不退出这个空架子呢？这里的逻辑何在？

这种“逻辑上的”不对头是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对武汉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顿，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后又胆怯起来，不敢在自己的提纲里做出相当的结论呢？

或者拿季诺维也夫做例子来说。季诺维也夫在他今年4月提交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中，把武汉国民党估计为1920年时期的基马尔派的政府。但基马尔派的政府是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是没有而且不能有共产党人的位置的政府。看来从对武汉的这种评价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和武汉作坚决的斗争，推翻武汉政府。

具有人类的普通逻辑的普通人是会这样想的。

季诺维也夫却不这样想。他把汉口的武汉政府估计为基马尔派的政府，同时提议给这个政府以最有力的支持，提议共产党人不要退出这个政府，不要离开武汉国民党等等。他直截了当地说：

> “必须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从那里组织对卡维涅克们的反击。在最近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帮助汉口组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见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谁能懂得呵！

托洛茨基说武汉（汉口）是空架子。相反地，季诺维也夫却断言武汉是基马尔派的政府。由此应该做出结论：和空架子作斗争，为推翻武汉政府而斗争。然而不管托洛茨基也罢，季诺维也夫也罢，都不敢做出从他们的前提中必然产生的结论，而季诺维也夫甚至更进一步，提议“给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反对派纠缠在矛盾里了。他们失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一切前途。

观点糊涂，在武汉问题上失去任何前途，——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把糊涂叫做方针的话，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方针。

四、论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

或者再拿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做个例子吧。

关于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我们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三个决议：列宁论在落后国家中成立非无产阶级的农民苏维埃的提纲，罗易论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里成立工农苏维埃的提纲，以及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特别提纲。

列宁的提纲是说明在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中亚细亚诸国成立“农民的”、“人民的”、非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列宁的提纲里没有一句话说到在这样的国家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列宁的提纲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对落后国家的革命的直接援助是在这些国家里成立并发展“农民的”、“人民的”苏维埃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这个提纲指的不是中国或印

度，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并且在这些国家里建立工人苏维埃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先决条件；这个提纲指的是其他较落后的例如波斯等等国家。

罗易的提纲主要是指已有工业无产阶段的中国和印度。这个提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显然，这个提纲对中国有直接的关系。

标题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特别提纲，根据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这个提纲断言："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苏维埃不可避免地会变成对苏维埃的讽刺。"显然，在讨论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最后这个提纲。

如果同时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和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国民党的存在，以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后两个提纲的指示，那末，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是怎样的呢？

现在，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提出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口号。

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为推翻现存政权而斗争的机关，是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出现不能不造成两重政权，而两重政权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权应当归谁的问题尖锐化起来。

俄国在1917年3月、4月、5月、6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存在着临时政府，它握有一半政权，而且也许是较为实在的政权，因为当时军队还是支持它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工兵代表苏维埃，它们也握有似乎一半政权，虽然不是象临时政府那样实在的政权。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取消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中间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因为既要推翻这个政府，就不能加入这个政府。

能不能说1917年3月至6月俄国的形势类似现在中国的形势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不仅由于俄国当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现在则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由于俄国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和帝国主义的政府，现在的武汉政府则是反帝国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意义下的革命的政府。

反对派在这方面向我们建议些什么呢？

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但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不只是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它们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反对派不懂得：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新政权机关，才能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这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就会变成空架子，变成现存政权的附属品，就象1918年在德国和1917年7月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形一样。

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

我很怀疑季诺维也夫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托洛茨基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因为他在自己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说："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号召经过两重政权的过渡制度去建立实际的政权机关。"（见托洛茨基的提纲《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由此可见，我们在中国成立苏维埃，同时就是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就是推翻武汉政府和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权。大概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拿俄国革命历史中1917年十月革命前一

时期的事变作样本的。当时在我国的确有过两重政权，当时我们的确推翻了临时政府。

但是我已经说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加入临时政府。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建议共产党人现在立即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呢？怎能成立苏维埃，建立两重政权的制度，同时又加入你要推翻的武汉政府呢？托洛茨基的提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托洛茨基在这里已无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宫里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他“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有人向我们说：既然如此，又怎样去了解1905年在俄国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呢，难道当时我们不是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但是，第一、当时只有两个苏维埃，一个在彼得堡，一个在莫斯科，这两个苏维埃的存在并没有造成俄国苏维埃政权系统。

第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当时都是反对旧的沙皇政权的起义机关，这再度证实：不可把苏维埃看做仅仅是组织革命的中心，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和新政权机关才能成为这样的中心。

第三、工人苏维埃的历史说明：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顺利条件，也就是只有具备了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顺利条件，这样的苏维埃才能存在和进一步发展。

1905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维埃，以及1918年德国的工人苏维埃所以灭亡，不都是由于当时没有这样的顺利条件吗？

假如1905年在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这样的广大革命组织，那末可能当时在俄国就不会有苏维埃了。但是，这样的组织当时在俄国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俄罗斯工农中间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俄罗斯人自己就在压迫其他民族，而类似左派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只有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因为这种压迫会把国内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一个广大的组织里去。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

但是，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

假如中国没有象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

某些同志根据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将来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他们把这一点看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一般说来，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没有的。在我们俄国，在1917年初，也曾谈到革命有经过苏维埃而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第一、国民党不是苏维埃，说国民党适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事业，并不是说国民党就能适合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事业，其实，工人代表苏维埃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合的形式；

第二、即使在1917年俄国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是那样地稀少，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那样地强大和众多，以致革命的每一推进和帝国主义者的每一进攻，都必然会使国民党发生新的分化，使共产党因国民党的威信降低而更为加强起来。

我想，中国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中国，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是不得不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因为在现今的条件下，没有工农代表苏维埃，这种过渡是不可能的。

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必须在各地广泛地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成立苏维埃的基础，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成立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的工农代表苏维埃。

在中国成立工人苏维埃，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篇空洞的“革命的”演说。不能象托洛茨基那样轻率地看这个问题。

首先，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说要退出国民党，因为不能既成立苏维埃，推进两重政权，号召工农建立新政权，同时又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里面。

其次，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就是说要以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要以类似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的那种联盟，代替现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在那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下，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而在国民党党内结成联盟的政策是完全适合于这一点的，那末在这里，在成立苏维埃的条件下和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问题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要准备并建立这种政权，则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

其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使共产党人负有义务的。现在中国工人每月得八个卢布到十五个卢布，生活条件极恶劣，工作时间非常长。这种情形必须立即结束，而且可以结束，只要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等等。但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工人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他们会向共产党人说（而且他们是对的）：既然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又是政权机关，就不能压一压资产阶级，“稍微”剥夺资产阶级一下吗？如果共产党人在工农代表苏维埃存在的条件下不走上剥夺资产阶级的道路，那末他们就会成为空谈家了。

试问，现在，在革命现阶段上，是否可以而且需要走这条道路呢？

不，不需要。

将来，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而且需要拒绝剥夺资产阶级呢？不，不可

以。如果以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保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那就是流于妄想，不了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中阶级力量斗争的诀窍。

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并不象某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流的极轻率的人向我们描述的那样简单。

从原则上来看，一般地是不是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之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可容许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这种参加是完全容许的。

我可以举出马克思1848年在德国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当时这个革命的民主政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就是由马克思主编的。

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处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内，把革命资产阶级向前推进，同时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右派同盟者的不彻底性，正象中国共产党处在国民党内应当用一切办法批判自己的同盟者左派国民党人的动摇和不彻底一样。

大家知道，直到1849年春天，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脱离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并着手成立一个具有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由此可见，马克思甚至比作为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政党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走得更远。

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在1848年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例如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不应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是策略问题。但是，在原则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这是无可怀疑的。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环境中参加革命民主政府并在那里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那末，关于这一点，我们已有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示。大家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在工作中的巴枯宁主义者》①中是赞成参加这种政府的。大家知道，列宁在1905年也是主张容许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的。

五、两条路线

总之，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

共产国际的路线。封建残余和依靠这种残余并为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军阀上层建筑是中国现状中的基本事实。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15卷第105—124页。——编译者

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应当利用共产党人的这种参加使无产阶级便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并促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更快地到来。

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成立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新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机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而共产党则应成为中国新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最适合于并且最能适应中国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组织形式的时候，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做的那样，提议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立即建立两重政权，——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促使武汉垮台，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中国的封建残余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国，封建残余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原来土地革命现在在中国是有的。但它从何而来，连鬼也不知道。（笑声）

既然这种土地革命是有的，那当然只好设法支持它了。

现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自主的革命，即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马尔主义（季诺维也夫）。

一方面，必须建立两重政权以推翻武汉政府，其办法是立即成立苏维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须巩固武汉政府，必须给武汉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帮助，其办法原来也是立即成立苏维埃（季诺维也夫）。

照例说来，共产党人应该立即退出这个“空架子”，退出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可是最好是让他们留在这个“空架子”里，就是既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既然武汉是“空架子”，为什么他们还要留在武汉呢，——这实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奸贼和叛徒。

所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就是如此。

几乎再想不出比这种所谓路线更荒谬更糊涂的东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不是和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办事员，或者说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这些旅行家游历了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①之类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国革命基本方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确实爆发了什么革命，既象土地革命，又象反关税革命，于是就决定写一堆提纲，4月写了一个提纲，5月初写了一个提纲，5月底又写了一个提纲，把这一堆提纲写好，就扔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们以为这许多糊涂的和矛盾的提纲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们，这就是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你们必须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加以选择。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

① 苏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是苏联高加索著名的风景区和疗养地。——编译者

我想在最后用几句话谈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派别言论在当前的政治意义和作用。他们抱怨说，没有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对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闻所未闻的谩骂和不能容许的斥责。他们抱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制度"。实质上，他们要得到瓦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自由。实质上，他们要把马斯洛夫一伙人的作风移植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里来。

同志们，我应当说，托洛茨基所选择的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时机太不恰当了。我刚刚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绝交的消息。用不着证明，现在到处都会展开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了。有些是以战争和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一些则是以分裂来威胁联共（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但是，几乎用不着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胆小的孩子。在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战线"。布尔什维主义历史表明，这些"战线"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决心和无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怀疑，我们也能够粉碎这种新的"战线"。（鼓掌）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附〕"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若干资料

（一）

八次全会期间，从中国传来了反对长沙军事政变的自发的农民暴动的消息（见下面106页）。共产国际应当如何对待呢？全力支持农民的时候到来了吗？问题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小组委员会讨论，此时，布哈林告诉他的两位同事意大利的艾尔科利（陶里亚蒂）和法国的特兰，中国农民正在夺取土地。多年以后，特兰引用布哈林的话说："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如果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而当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可不顾我们现在的同盟者。"

特兰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牺牲无产阶级的所有同盟者，而是要确定牺牲哪个同盟者——是起义的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共产国际以国民党的合法决议为武器来指挥中国革命，它今后的地位不会比眼前更有利。

当辩论进行时，布哈林建议请示斯大林。布哈林出去打电话，艾尔科利和特兰继续讨论。

斯大林在参加中国小组委员会时，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论点。他坚持认为，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要转到敌对方面，而这就意味着内战。他说，"大多数武装的中国人是雇佣兵，我们不能筹办大量足够的资财，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特兰争辩说，"然而这些雇佣兵大量的是破产的农民，只要提出土地纲领，他们就会开

小差的（跑向共产党）。”①

在讨论过程中，斯大林出示鲍罗廷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左派决定反对土地革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同共产国际的破裂。斯大林坚持说，资产阶级左翼的力量仍很强大，“它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散掉，在暴动的农民能够同工人起义协同行动以前，我们就将被打败。”斯大林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战斗还是使用策略。

特兰宣称：“我们必须战斗。”

斯大林反驳道：“战斗意味着必然失败。”他说，共产党人应当使用策略，而不会遭到任何损失。“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②

斯大林采取的立场表明，至少有一位他在中国的代表已经告知他，为什么在这紧急时刻以不推进土地革命为好的理由。罗易在这个问题上突然投降，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艾尔科利表示赞同斯大林。他写的《关于中国委员会的报告》③中，他认为，特兰坚持说斯大林主义者未能正确地估计小资产阶级的本性是错误的；同时，他过早地预示同武汉政府的破裂，也是错了。按照艾尔科利的看法，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同一性质的、团结一致的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也不是同一范畴，“因此，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同小资产阶级的某种成分来一个决裂”④。

艾尔科利感到，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土地革命，对正在发展的农民暴动掌握领导权，“采取一切可能的形式”开展和组织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化。但是同时，重要的是“要使农民阶级留在国民党内”，“要保证小资产阶级靠自己工作得到的财产不受侵犯”，并且“要支持他们反对高利贷资本的斗争”⑤。

艾尔科利认识到，土地革命会“吓跑许多中间分子”，并因而引起“局部失败”。为了防止这种失败，共产党人自己必须在国民党之外通过农民委员会和农民协会来推动土地革命，但是务必在国民党机构之内保持控制权。他认为，由于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某种‘典型’的苏维埃类型的组织”⑥，上述意见是完全行得通的。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为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整个军队，清除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并补充共产党员和“可靠的国民党左派分子”⑦。

自然，只有斯大林主义派别有权坚持其论点。特兰让步说：“你们是多数，你们决定吧。”

布哈林说：“少数必须服从纪律。”

这话触怒了特兰。他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提出自己的保

---

①② 这篇对话（有删节，但未更动）摘引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委员会会议纪要》，见《新斗士》，1936年2月8日，第3页。伊罗生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4页的注释中说，这篇报导是《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委员会会议纪要》（原件为法文）的英译文，该文系特兰应伊罗生之请，由1927年所做记录写出的。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1927年5月，第145—151页。

④ 同上书，第150页。

⑤ 同上书，第146页。

⑥ 同上书，第147页。

⑦ 同上书，第148—149页。

留意见，并公之于众。难道你们要对我使用武力吗？”①

斯大林反驳说：“不要过甚其词了。”

根据特兰在《新斗士》上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内发生的情况的叙述，再来看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很有意思的。关于委员会的大多数认为需要限制土地革命的意见，决议说：

“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同时，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爆发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成为实际上工农革命的组织政治中心，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另一方面，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巩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②

那末，这项任务如何实现呢？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③。同时，中共必须“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共产党不许融解于个别政治组织之内，它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恰恰相反，须知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向左，才可以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④

但是，决议说，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解释为党脱离非无产阶级阶层的群众，仅仅是指要保证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部的领导作用：

“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⑤

所以，中共的任务是“把国民党转变成包括城乡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组织”。中共一定要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广大的、党员有选举权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组织”。中共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必须对国民党的工作不断施加影响”。因而，中共“必须在武汉临时革命政府工作中，发挥最大的干劲”。共产党必须大力参加“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关的工作，“同时，批评最接近的同盟者暴露出来的不坚定性，保证政府政策不偏离正确路线”；此外，主要通过国民党，促成革命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不实现此项任务，不扩大群众运动，没有农民革命，不坚决改善工人阶级地位，不变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伟大的组织，不继续加强职工会，扩大共产党，不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能的。”⑥

---

① 《新斗士》，1936年2月8日，第3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722页。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通过，1927年5月18—30日；又见《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35期，1927年6月16日，第737—741页。

③ 同上书，第722页。

④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722页。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通过，1927年5月18—30日；又见《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35期，1927年6月16日，第723页。

⑥ 同上书，第724—726页。

还有一个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写进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这就是重新组织军队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雇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①

斯大林在第八次全会开幕前几天给中山大学学生讲话时，以同样的态度谈及将来中国的军队问题。②

同时，在中国，唐生智曾向北京方面发动了他的新的北上攻势。据布兰特叙述，到5月中旬，"唐发动的战役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在斯大林看来似乎胜利已成定局，因而他能够确有把握地欢呼这一胜利。他的确欢呼了，并振振有词地进行论证，（表面上看来）恰似鲍罗廷在汉口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一样。象鲍罗廷说过的那样，他指出，现在是同逗留在武汉北面的冯玉祥将军携手合作的时机了"③。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举行会议，进一步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之间保持正常关系问题展开了辩论。蔡和森说：

"鲍罗廷〔后来在政治局〕说，'第五次大会仅仅在原则上解决了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但未能提出任何具体的策略方案，现在我们有责任来着手做这项工作。'接着，他提出下列建议：'（1）降低店员和其他人员的要求，以满足工商业小资产阶级；（2）保护小地主，以照顾乡村小资产阶级；（3）采取措施，制止民众直接逮捕和枪决反革命分子。'他还顺便提到'工会的专政'问题，但没有详细加以论述。"④

在政治局的辩论中，陈独秀是追随鲍罗廷的。陈独秀"指出，讨论上述三点是不够的，需要阐明整个群众运动及其领导问题。目前，汪精卫开口闭口不离'领导权'，他一再声称，由老百姓行使领导权就要失败，共产党没有能力领导民众，如此等等。陈独秀讲话的基本点，就是要求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权拱手交给国民党。需要（我们）回答的基本问题是：'让步，还是不让步'"⑤。

稍后，提到陈独秀的上述讲话时，蔡和森回忆说：

"陈独秀要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那时，我亦赞成他的提议。但是罗易想法不同，虽然他没有明确解释他的立场，只是说些无意义的话，'好吧，我们再也不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了'。显然，罗易同鲍罗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罗易并未和我们通气，因而一些会议的参加者亦同他闹得不愉快。"⑥

政治局在第二次会议上，讨论和接受了罗易为调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关系而起草的决议〔文件二十三〕。根据这个文件，共产党人必须继续实行合作，以便加强左派，帮助左派"领导国民革命"，但是不能丧失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利益。规定武汉政府的劳动部设立解决劳资纠纷的法庭。与此有关的，是规定限制"店员的过分要求"，并且"不准阻碍同帝国主义的商业活动"。

蔡和森指出：通过这个决议的这一段话，"鲍罗廷的西北理论的基本策略要点被接受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722页。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通过，1927年5月18—30日；又见《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35期，1927年6月16日，第72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9—240页。

③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21—122页。

④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4—35页。

⑤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5页。

⑥ 同上。

了：要进行北伐，就要推迟土地革命，同意对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让步。两个半月以后（五次大会于5月初结束），作为这些让步的后果，接踵而来的是武汉上层领导的政治灭亡和中国革命的第二次严重失败。（五次大会后的时期），政治局的目标、它的错误、它的活动以及它的意见，都直接来自让步政策！”①。

根据蔡和森的回忆，罗易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贯给予热情的支持。他坚决地主张，基本的政治口号是“进攻”，即土地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根本领导权。但是，“谈到‘让步’，罗易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第二位的，暂时的。然而，就是由于这种态度，他无意中使政治局同意和接受了西北理论。因此，罗易显然投降了这种理论而并未意识到这一点”②。

3月间，武汉政府曾同意任命两名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分别为农政部长和劳动部长。谭平山在5月20日就职时说，农政部的政策就是执行国民党的农业政策，激励农民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实现农民同“革命军队”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并且加强武汉政府领域内的农民组织。汪精卫正式欢迎谭平山就职，并称他为“非常善于处理农民问题”的领袖。③

5月18日，就在谭平山就职前夕，原属武汉政府的一个将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了。夏斗寅带领驻扎在武汉和长沙之间铁路沿线的一个团，向国民党左派政府所在地进攻，图谋推翻它。多年之后，罗易写道：

“国民政府的态度引起人们怀疑它与叛方订有默契。夏斗寅带着少得可怜的、不到二千人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到武昌郊外。武汉政府借口一切可动用的军队已调遣北上，没有力量抵抗叛乱分子，就绝望地等待着它的崩溃。局势的发展暴暴了仓促向北京进军的动机——武汉应被解除武装，以便于反革命的进攻。”④

罗易认为，汉口国民党的警卫部队有足够的力量抵抗进攻，但是，至少有一些军官明显地同情叛乱。在那紧急时刻，“很明显，国民党为了革命的利益，应当脱离那些妥协退让的盟友，在群众支持下独立行动。当发生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的时候，当曾经对国民政府输诚的军队同叛乱分子串通一气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愿为革命效忠的群众武装起来。”⑤

根据罗易为党的《宣言》（〔文件二十一〕，此件系政治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叛乱问题时委托罗易起草的）所加的注脚，认为从策略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加强”左派小资产阶级同将军们之间的“冲突”。“为了使小资产阶级脱离公开的反革命军官，应当对小资产阶级作某种让步。”然而相反，在中央委员会内普遍地“倾向唐生智”，根据罗易的意见，这种倾向是鲍罗廷鼓动起来的。⑥

蔡和森的叙述提供了某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蔡和森和李立三）提议加紧训练武装力量，以我之暴动对付敌之暴动。但是，罗易和瞿秋白以为现在的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只有这些关系调整好了，我们才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建立军事基地问题，并倾全力达此目的。”⑦

根据蔡和森的看法，罗易起草的《宣言》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

①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人民论坛》，1927年5月21日，第1、5页。
④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3页。
⑤ 同上，第514页。
⑥ 同上书，第518—519页。
⑦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7页。

“1．承认农民运动过火，说这些过火行动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中共并未参与。换言之，中共对农民运动的加剧不负任何责任。

“2．承认中共不仅保护工农利益，并要保护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之利益，希望后一种说法能阻止工商业者倒向夏斗寅。然而，从以上论点，足见罗易完全没有头脑并丧失了革命的基本原则！”①

无论如何，《宣言》是在这种形势下发表的，其目的（按照罗易所说）是为了“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任并鼓动它反对反革命的军官们”。还发表了一篇对叛乱士兵的“呼吁”，敦促他们脱离他们的指挥官〔文件二十二〕。可是，在“国民党最高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未能迫使武汉政府正式谴责夏斗寅。根据罗易对文件所加的注脚，谴责夏斗寅本来可以成为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附近的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劳动”，以保证（武汉）国民军的供应。若干年后，罗易说，“如果工人们得到他们制造的一部分武器，他们能够很容易地解除反革命警卫部队的武装。如果国民党能发表一个公开的宣言，说明军官们之所以反叛国民政府是因为国民政府要给农民土地，这就可以把士兵争取过来，因为他们都是无地的农民。”可是，几年以后罗易清楚地觉察到（这是他在1927年5月中旬只能模糊地察觉到的），“国民党既不要武装工人，也不愿给农民土地。因而，它不能保卫革命，并参与了反对革命的阴谋。”②根据罗易的回忆，更大的“悲剧”是，许多共产党领袖也具有武汉政府的这种倾向。

粉碎夏斗寅叛变的，是共产党将领叶挺。

蔡和森写道：“李立三和我提议，叶挺部队连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立即占领粤汉路，扑灭夏斗寅之叛变。如唐生智谋反，则我军直取湖南为根据地，并进攻湖北和广东。叶挺部取如此进展势态，将协助工农纠察队之发展，而工农纠察队对我军据有之阵地亦必能提供相当之援助。”③

几年以后，罗易回忆说：“武昌城由二百名士兵守卫，而警卫部队的司令恰巧是一名共产党员。当叛军一下子出现在城郊时，共产党司令已经不能再等待长江对岸国民政府总司令部的指示。由于没有可能从汉口得到任何增援，警卫司令叶挺自己采取了主动行动。他集合了大约一千五百人的非正规部队，包括当地军校的几百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全是国民党员，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战斗，击退了叛军。”④

蔡和森指责罗易未能提醒政治局对付反革命，却集中注意于建立同国民党左派的正常关系问题。此外，蔡和森和李立三的建议只是部分地被接受。“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都开去迎击夏斗寅。工人纠察队要求国民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二千支枪，和几千元月饷，汪精卫等在口头上答应了。同时，既然党认为中心问题是国民党左派问题，于是把夏斗寅的叛变解释为一件临时的事变。”⑤

按照蔡和森的叙述，这时鲍罗廷和谭平山正到处喧嚷，这不是同国民政府的决裂吗？鲍罗廷争辩说，共产党人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决裂，并且，如果兵工厂的工人继续罢工，结果将是自取灭亡。怎么办？国民党领袖全都在反对共产党，他们说：“目前计划要做

①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9页。
②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4页。
③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7页。
④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4—515页。
⑤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8页。

的事情全属荒唐！幼稚！发狂！”①

蔡和森说，群众对时局开始有所认识，并且不明白共产党对“正在施行的恐怖”为什么采取这样消极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为什么共产党不反对”剥削者和国民政府。至于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则仍旧未能了解唐生智、汪精卫、冯玉祥等这样一些人物的特性和动机。②

5月21日，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全民革命》宣言。宣言指出，工人和农民需要“正确的指导”，批评他们向雇主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宣言说，“革命的同盟者，工厂主和商人”也需要“适当的保护”。“我们的政策是把他们都团结在一条战线上，使他们都从革命得到同样的利益。”③

第二天，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上发言指出：“帝国主义不会用军事力量干涉中国。它们将通过三种方法推行其经济侵略：第一，利用中国一切具有封建观念的反革命分子；第二，利用中国资本家作为他们的扩张工具；第三，威胁中国的小资本家并破坏中国革命群众的团结。

“所以，真正的国民党员必须同小资本家合作来完成革命。”④

5月24日，罗易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个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和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决议〔文件二十三〕。根据罗易后来的注释，这个决议“既未通过，也未否定”。决议重申共产党人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必要性，但是，对武汉政府中许多人对共产党抱有根本的敌意，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基本的事实是，国民党左派的广大群众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而其领导则包括“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确，汪精卫是试图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唯一的主要领导人。罗易认为：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策略不应决定于同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而应决定于使整个国民党成为发展革命的工具的必要性。

“我不主张在国民党内实行政变。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使国民党摆脱现领导；但是要马上实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文件二十三〕

简言之，这项任务就是“从下面重建国民党”，动员革命的国民党群众反对其反动的领导，动员农民并在区乡建立武装的“民主政权”。〔文件二十三〕

夏斗寅的叛变刚刚被扑灭，许克祥及其他驻长沙部队的国民党军官在5月21日晚又发动了政变，推翻湖南省政府，监禁政府委员，解散国民党左派的地方委员会，对共产党地方组织采取镇压手段。多年以后，罗易回忆说：“叛军是（武汉）国民军总司令唐生智的直接部属。他在前线同他们有电报联络。”⑤那时候，正在撤退的农民遭到野蛮的屠杀。⑥

据蔡和森说，共产党人仍然主要是关心他们同武汉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治局的全付精力集中在调整与‘左派’的关系上。我们在两湖失败的根由即在于此。假使中央政治局一开始便集中注意力于镇压反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巩固两湖根据地，我们决不致遭受这种严重的、可耻的失败。假使当时认定我们的任务是扑灭许克祥、夏斗寅之叛变和镇压唐生智、谭延闿之反革命，‘左派动摇者’或许会终止动摇，以致改善我们

①②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46页。
③ 《人民论坛》，1927年5月21日，第1—2页。
④ 同上，1927年5月22日，第1页。
⑤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7页。
⑥ 同上，第552页。

同他们的关系。”[①]

在这种情况下，蔡和森深信，罗易实负有相当责任。“当时，我和李立三对局势的洞察，虽然没有人们现在所见的这样清楚，但是，假使当时罗易能接受我们的提议，把中央政治局的注意力集中于发动自己的势力去镇压反革命和其他阴谋，两湖是决不会失败的。”[②]

在长沙，共产党员同国民党左派地方组织的成员一起，着手组织对叛乱分子的武装进攻。他们的计划是重新夺回城市，以此“拯救革命”。罗易在回忆中写道：

“有两万多农民从四面八方扑向长沙，差不多到了城门附近，他们却接到要撤退和解散武装队伍（军事编队）的命令。指示来自武汉共产党首脑机关。同时，武汉国民军总司令唐生智宣称，他将亲赴长沙，建立秩序。那里的反革命叛乱分子就是他的部属。共产党领导人竟容忍极其明显的卑鄙的政治花招愚弄自己；由于唐生智亲自插手事件，他们便决定放弃武装起义。突然的毫无保证的撤退，对于一支正规军队来说都是最挫伤士气的，对于一支临时组成的队伍来说更是如此。动员起来的农民在混乱中撤退，反革命叛乱分子利用这个机会，攻击撤退的农民，残酷地屠杀他们。”[③]

根据罗易的叙述，在汉口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相信传到武汉来的关于农民“过火”的流言，普遍一致认为，同反革命斗争最有效的办法是限制农民。[④]

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他曾在最近提出了关于湖南农民的报告，而现在，他为党的纪律所约束，必须谴责他刚刚辩护过的农村中同类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遏制农民。罗易回忆说，“共产党的农民部长谭平山抱着这个目的准备去湖南，但是，事情立即发生变化。”[⑤]在湖南，农民和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处在被消灭的危险中。

根据一个国民党左派的叙述，汪精卫要求鲍罗廷说明，他根据什么来证明在武汉没收土地的政策是正当的：

“鲍罗廷否认他对运动应负责任，但指出他的同事罗易，一位印度共产党员，是一切乱子的鼓动者，鲍罗廷说，罗易得到斯大林的完全信任，甚至超过他自己。”[⑥]

罗易认为，在由农民自愿军组成的革命军队成立之前，征集一支对长沙发动暂短攻击的几千人的非正规部队，是可能的。但是，为了保证临时组成的部队的服役开销，需要给军队预付一个月的饷金，而鲍罗廷掌管着钱财。罗易说，起初鲍罗廷答应供给所需经费，但是当一切安排停当（“不顾中共领导人的可耻的不合作态度”）时候，当农民协会能够围攻长沙的时候，他却自食其言。

蔡和森写道：

鲍罗廷异常焦急，急欲与谭平山和国民党中央组织之查办团（由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和两名唐生智的代表组成）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英译本误写做夏斗寅——译者注）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此事由鲍罗廷决定，而罗易是反对的。”[⑦]

---

①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38—39页。

③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51—552页。

④ 同上，第550—551页。又见布兰特等编：《中国共产主义史料汇编》，第109—114页。

⑤ 同上书，第551页。谭平山任职一个月后，由于他未能把农民领“上正轨”，而请准离职。《人民论坛》，1927年6月30日，第1页。

⑥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73页。

⑦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9页。

5月26日，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打电报给省农会和工会，说武汉政府“已委派一个五人委员会今晨离此前去解决长沙事件”，指示全省工农同志“耐心等待政府官员，以避免更大磨擦”①。

罗易后来写道：在那个关键时刻，“我竭力反对共产党人为了安抚反动军官，而阻止农民的革命行动。我指出，以军队在前方作战、不许扰乱后方为借口，限制土地革命发展的自杀政策，已经使反动势力转向进攻。继续限制必将挫伤农民运动，并鼓励反革命在乡村抬头。但是，我的反对意见被置若罔闻”②。

于是，罗易建议谭平山应带着下列指示去长沙，“他的使命不是限制农民运动的‘过火’，而是建立乡村自治政府，授于农民协会以必要的政治权力。”罗易相信，这样做实际上（如果说不是名义上）将建立苏维埃。罗易认为，农民协会是乡村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团结的阵地。谭平山以其农政部长的地位掌管地方自治政府和警察。所以，罗易坚持认为，他所提议采取的行动是在谭平山的职权范围以内，“正确地、大胆地指导”农民协会，可以很容易使农民协会“成为革命政府的基层单位，解除地主雇佣的地痞流氓的武装，并创建民兵，作为真正革命军队的核心”③。

在这方面，蔡和森的观点跟罗易的观点没有太大区别：

“那时，鲍罗廷犯了几个错误：第一，查办农民运动‘过火’，其本身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第二，不用武力而打算用合法手段去对付反革命，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第三，预计的查办没有搞成，国民政府和鲍罗廷的威信扫地，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④

谭平山及其“五人查办团”行至湖南边境，据说，在那里他们被增援许克祥的军阀何键的部队赶了回来。⑤另外，根据蔡和森的叙述：“当鲍罗廷及其查办团抵达岳州，许克祥发出就地逮捕与处决之电报”。于是，该团人员皆急忙赶回武汉。⑥

现在很清楚，谁要到长沙，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作后盾。

蔡和森说，罗易从一开始就反对冒险，“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缺点在于未能采取反对措施”。⑦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和罗易在争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上，各自作了发言。根据蔡和森的叙述，鲍罗廷主要指出下列五点：

“1．现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中共来说）。他们没有表现出什么缺点和异端倾向。过去的错误皆由于工农运动过火。实际上，领导运动的不是农民，而是地痞和哥老会。〔哥老会是秘密的农民组织，在北方各省特别强大，它指导农民的斗争，反对军阀和政府当局的搜括。〕

“2．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以便能够继续与他们合作；假若我们跟国民党闹翻，中国革命将遭受失败。

“3．同国民党合作，就是指同它的中央合作，现在国民党中央还是好的。离开国民党中央，或推翻它，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在我们某些党员中显然有主张决裂的倾向（例如国际代表罗易）。

---

① 《人民论坛》1927年5月28日，第5页。
②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51页。
③ 同上。
④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9页。
⑤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31页。
⑥⑦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9页。

“4．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乡村自治——这些措施就是土地革命。

“5．中共中央和工农组织应联合发表对群众的呼吁，号召他们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关于制止工农运动过火的命令，以及拥护最近公布之一切法令。”①

另一方面，罗易争辩说：“1．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经不再代表左派，相反，他们维护土豪劣绅、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应当领导人民起来推翻他们。

“2．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不能说是政变。

“3．现在我们的目标应是工农民主专政。（罗易在这一点上未进一步阐明）

“4．中共中央应立即发表对民众的宣言，指明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之一切法令的反动性质。这些法令旨在压迫工农运动和保护封建制度”。②

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纪念“五卅”运动（英国巡警在上海向示威学生开枪）的《宣言》，强调民族资产阶级“背叛”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充当革命动力的责任〔文件二十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是集合广大的农民群众（包括士兵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军阀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宣言》没有提到长沙屠杀。

在湖南，中国共产党五人省委发动三十万武装农民的暴动，于5月30日进攻长沙。蔡和森说：

“李维汉（政治局委员）见此决定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他的解释是：‘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将进攻武汉并推翻国民政府。这样，是我们占领了长沙而失去了武汉。只要武汉政府还存在，我们便应请求它用法律手续来制止许克祥的叛乱。’”③

同时，根据罗易后来的叙述：“在绝望中我试图越过糟糕的共产党政治局而采取行动。我要求召开有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全会，我的要求遭到反对，借口是，在那紧急的日子里，党的重要人物不能离开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层领导人反对召开中央全会，是因为地方工作人员急切等待决定性的行动，并一定会赞成我的计划。”④

罗易感到，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简直看不见采取革命行动的可能性。他说，“他们大多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同国民党政客有密切联系。”⑤

于是，罗易直接请示莫斯科。6月1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

①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4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42页。
④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52页。
⑤ 同上，第550页。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①

很明显，即使是这个指示也不足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暂缓执行”②。于是，给莫斯科发去一个外交式的答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③作为最后的一着，罗易寻求同“个别同志”（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合作。罗易说：

“加仑〔V·K·布吕切尔〕（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完全同我一致。那时，还有许多俄国同志也附和我的意见。但是一切权力集中在鲍罗廷手上。莫斯科在政治上支持我反对他的机会主义。然而在其他方面，他仍处在统治地位，因而俨然是共产党的太上皇。中共上层领导人大多是他的门生，思想上接近他的路子，所以都拥护他，常常无视国际的指示，并当场反对国际代表。”④

罗易仍然竭力保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6月1日，他写了一篇题名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论文〔文件二十五〕，这篇文章指出，夏斗寅叛变和长沙政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国帝国主义”。因之，反动分子的基本任务不仅是“消灭共产主义和准共产党”（如他们所说），而且要摧毁全国的反帝革命。当反革命分子说到“准共产党”时，他们究竟指谁呢？乃是指非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以，把这些革命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武汉政府，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象征。那些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组织叛乱以消灭“共产主义”和“准共产党”的家伙，就是国民革命的敌人，国民党的叛徒，反对国民政府的蟊贼。

罗易为了努力推动国民党左派更积极地行动，“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建议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左派领袖写一封公开信〔文件二十六〕，提出国民革命纲领”。⑤

这个文件坚决主张解散长沙叛乱委员会，任命合法的临时政府，发动对叛乱的讨伐，并且武装农民群众。这个文件给人一个印象，即罗易上了唐生智的当。可不是吗，《公开信》说要授权唐生智“派遣必要的部队到武汉去镇压反革命”哩！⑥总之，中共政治局认定唐生智是“左派将领”，解决长沙问题非他莫属。⑦

多年以后，罗易写道，不幸的是，给国民党左派的公开信的提出，“并未得到中共领导

* 公开出版的书中，这句话的英译文是：“必须终止对（不）可靠（原文作“可靠”，恐有误。——译者注）的将军们的依赖。”另外，陈独秀关于这句话（是叙述，不是引用）的说法是：“必须根除不可靠的将军们。”（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6页。此信的俄文译文载《反对派通讯》，第15—16期，第22页。）——编者注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32页。

②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35页。

③ 休斯顿：《孙中山、国民党和中俄政治经济联盟》，第187页。

④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52—558页。

⑤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481页。

⑥ 请将《公开信》的这一段文字与《中国的十字路口》（《共产国际》第11期社论，1927年7月30日，第212页）相比较。

⑦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48页。大约在那时，唐生智从河南发出命令给湖南省政府，禁止“部队自由活动”。他还命令维持和平并退还“工农纠察队”的全部武器。《人民论坛》，1927年5月29日，第1、4页。

人和其他决策人物的欢迎。纲领有序言，提出了如前段中所引述的一些论点。然而这个纲领的起草和发表，并未取得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批准。①

现在，罗易已经丢掉他对唐生智和国民党左派中央所有的任何残留的幻想。6月9日，他提出建议——《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文件二十八〕，明确地号召采取行动，然而已经太迟，无可挽回了。罗易指责说，为了保持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共产党竟同意取消整个群众运动。“被国民党诬蔑为工农运动‘过火’的和被陈独秀斥之为‘幼稚越轨’的种种表现，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它们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同武汉政府的分裂越来越不可避免。共产党能够为了保持这种关系而背叛工人阶级吗？不能。共产党人必须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发动农民暴动，摧毁绅权；必须“自下”改组国民党；必须立即计划攻占广东，收复该省，保护革命。采取上述行动刻不容缓。

其实，这一切已经太晚了。蔡和森后来指出：“假使罗易能坚持，更果断，中央政治局或许让步，并采纳他的计划。可惜，罗易未能有力地捍卫他的主张，而最终投降了。”②

（二）

1927年6月，鉴于蒋介石、李济琛和夏斗寅的叛变，共产党人感到要依靠唐生智（此人对共产国际目标的“忠诚”越来越使人怀疑）的军队，和冯玉祥及其经过俄国训练和装备的国民军。

同时，潘朵拉的盒子〔一〕里的种种灾难从斯大林的来电、从与国民党左派关系的恶化、从农村革命的兴起，以及从各种军人真相毕露的趋势中迅速地扩散开来。蔡和森说，在这最后阶段，中央政治局暴露出完全没有能力指导党的事务。③

在这个时候，罗易察觉到汪精卫这个人处在“进退两难”之中，他是“站在正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船上一个绝望的悲剧人物”。在罗易看来，共产党人的“愚蠢策略”（鲍罗廷关于在唐生智领导下实行军事联合的政策）正在把汪精卫赶“向反革命集团的怀抱”④。罗易有理由相信，或者说，他认为他有理由相信，汪精卫正在等待营救。蔡和森说：

“罗易和鲍罗廷都想拉住汪精卫，但罗易愿意驾驭汪并为其首，而鲍罗廷却甘做汪的尾。结果，罗易‘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鲍罗廷则‘既善顺随，又会揣摩’。”⑤

的确，整个政治局“再一次恢复了”对汪精卫的幻想，把他当做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政治局还以为唐生智仍然迫切寻求同汪建立有效的联盟。正如蔡和森所指出：“这样，汪精卫就成为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⑥

汪精卫从欧洲回国的途中，曾经路过莫斯科。根据罗易的记述，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答应给他全力支持。罗易在给莫斯科打电报请求支持他的计划时，他认为他的建议（诸如没收土地、摧毁“不可靠的将军们”的权力、建立革命法庭和武装工农）是给汪精卫以“再度保证”。罗易后来回忆说：“他（汪精卫）同意此项计划，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

---

①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81页注。

②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47页。

〔一〕 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 s box）：根据希腊神话，主神宙斯命令潘朵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她私自打开盒子，于是里面的疾病、罪恶、疯狂等各种灾害，全跑出来，散布到世上。——译者注

③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0页。

④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8—519页。

⑤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5页。

⑥ 同上，第50页。

时到来。”①

“必需的再度保证毕竟来得太迟了。同时，汪精卫相信共产党人背弃了他（原文如此），就同右派进行谈判，这些人叫喊要用共产党人的血来抚慰蒋介石。在那个紧急关头，我想必须做最后的努力，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于是，就把莫斯科来电送交给他……，此外，工作计划他已经知道，他曾表示赞同。如果我能肯定保证必要的援助即将到来，他愿意遵守协议。”②

汤良礼从武汉政府的观点出发写道：当汪精卫从“六一”电报得知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新态度”的实质时，他“非常吃惊”，并且，他告诉罗易武汉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电报的条件。两人争论了一会儿，但无结果。分手的时候，汪精卫问是否可以给他一份译文。

“罗易犹豫片刻，然后说：‘好，我明天送你一份，因为文字上有一两处需要改动。’第二天，汪精卫接到许诺的副本，并立即出示孙夫人和陈友仁（原文如此）。陈友仁得知其内容，面如土色，他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③

第二天，罗易又去见汪精卫，根据汤良礼的叙述，罗易说：“我很高兴我已给你看了电报，它可算是最后通牒。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④

汪精卫回答说，1923年越飞和鲍罗廷制定的第三国际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完全不同于你们最后通牒中提出的条件。不是我们拒绝你们的条件，而是你们破坏了协议”。⑤

汤良礼说，罗易接着做了一个说明，大意是他不同意鲍罗廷的条件和政策。汪精卫答称，他对新条件不感兴趣，“我们只尊重我们原先同意的条件”。⑥

根据罗易后来的叙述，汪精卫曾将电报给他的同事们看，“如有名的反革命分子孙科、陈友仁、谭延闿，他们为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所信任，视为左派”，“这些人早已与南京有来往”，并且“已经同蒋介石达成秘密谅解”。⑦

汤良礼说，罗易“遭到鲍罗廷的严厉训斥”，鲍罗廷立即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他撤回罗易”⑧。蔡和森的叙述与此相似：

“罗易将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在他来说是严重的失策。对此，政治局全体大为不满。于是鲍罗廷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罗易〔不久〕就被召回。”⑨

汤良礼的看法是：“罗易认为国民党左派只有同共产党人合作才能生存，否则他们就要被右派消灭。所以，需要把斯大林的电报告诉他们。可是，鲍罗廷懂得国民党左派比罗易想象的强大得多，并且他知道，假如他们看到这个决议，他们会立即断绝同共产党人的关系。所以，他曾扣压这个决议。而当他得知罗易鲁莽从事，将决议泄露给汪精卫时，自然很恼火。大部分共产党人支持鲍罗廷，他们也认为公开行动的时机尚未到来，于是他们把罗易赶

---

① ②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20页。

③—⑥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81页。

⑦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20页注。

⑧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82页。

⑨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9页。据吉斯勒说，鲍罗廷或者是他的一个属员，给莫斯科做了不利于罗易的报告。只有加仑站在罗易一边。至于斯大林，他总是倾向于一个军事傀儡政府。《吉斯勒访问记》，1958年6月19—22日。

回俄国。”[1]

根据当时的情况，鲍罗廷要中国共产党人限制土地革命，并依靠汪精卫和唐生智的军事力量。这就是纯粹“自上”的策略。相反，罗易仍然希望促使汪精卫有更好的革命的精神状态，并希望发动土地革命。罗易不信任唐生智，他与鲍罗廷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提议依靠冯玉祥的军事力量，而不依靠唐——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冯也不可信。因而，罗易要求“自下革命”。但是，除了通过汪精卫和武汉政府的力量外，找不到发动革命的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鲍罗廷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如蔡和森所见：

“一方面，罗易支持同汪精卫合作，另一方面又‘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罗易的理论与实践大相悬殊，这就是鲍罗廷常常占上风的原因。罗易的主张经常矛盾；而鲍罗廷的建议一以贯之，因为他总是顺从汪精卫等人的心理。”[2]

罗易的弱点，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中是常见的。几个月后，蔡和森说：“事后追论，罗易不失为一介书生：他总是在纸上坚持原则，而在实践上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3]

（选自《罗易赴华使命》）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82页。

②③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5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①

国民党革命同志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你们这封信，是在国民党最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革命同志领袖对于革命的主义政策实行叛变，居然压迫工农运动与共产党分裂，这种叛变可以使国民党变成反动派工具，和反革命军人的傀儡。四个月以前国民党的中央指导机关，还有勇气力量和蒋介石破裂，不使其反动的军事独裁得以摧残党权，那时，国民党中央还想和革命的工农共同前进。现在呢，背叛国民党的领袖，已经对于摧残工农运动，压迫共产党，投降封建势力，取消民众革命胜利等类行动，公开的颂扬和赞助了。

武汉政府本来是反对蒋介石之反动的革命斗争的中心，如今却是在反动军人及其政治领袖的淫威之下，变成军阀政府；中国之内，这种军阀结合的地域本有许多，现在的武汉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武汉政府现和蒋介石等类革命之公敌，实际上毫无差异，每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首先便是工农兵士以及一般忠实党员，凡愿努力继续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伟大的奋斗事业，立志为国家民族谋解放，而牺牲的战士，都应当详细的明白：几千几万的中国同胞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之中，英勇的牺牲了，他们誓死而争斗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却发生如此现象？为什么领袖之中发生叛变的行动？以后革命的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新任务是什么？

现在的领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政策，实行怪异的改篡，却想借口于六月间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秘密文件，来解释他们自己篡改孙中山先生政策的理由。但是谁亦不能欺骗的，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可以知道这是企图懦怯无耻的巧自文饰，国民党指导机关对于国民党主义政策之叛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很远的，决不是单单因为那所谓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国民党现时领袖之叛变，实际是因为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争斗，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和四个月前蒋介石之背叛革命是一样的；如今武汉的领袖实际上是投降了蒋介石！

国民党现时领袖的叛变，断非是偶然的，和出人意外的事变。这种叛变实在反映中国革命中间有许多种资产阶级成分的骑墙派，而实际上终竟是反动的态度——这些资产阶级经过买办阶级而与帝国主义连络，经过地产制度而与封建势力勾结，经过军官领袖而与军阀制度相勾连。因为他们剥削工农，所以必须反对工农运动，因此种种，他们不能执行真正的民众

① 时间是编者判定的。

革命，此等社会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伪国民党领袖，和民众是相隔离的。所以只想用民众运动以满足国内几部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使各种劳动阶级仍旧处于无权利穷困不堪的地位，他们只想利用群众做自己的工具，想踏着革命的民众兵士和党员的尸骨，去造成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不愿意劳动民众得有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民权，他们宁可重新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和封建豪绅结合，只要能镇压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之争斗，而使之俯首贴耳的服从自己，他们甚至于已经不能够继续单纯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要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非有广大的群众不可，而他们——例如蒋介石、唐生智，宁可去请日本顾问，却不肯依工农运动的力量，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情形，就足以解释国民党领袖以前动摇犹豫及现在决然叛变。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国民运动中封建资产阶级派第一次攫取国民党党权的尝试，那时伪左派的领袖就不能组织革命分子及一切力量以抗御此种反动，却任令反动势力笼罩广东，这种左派遁逃国外，不战而走。其意若曰："民众自己将会对付新军阀，我辈但须坐待成功，归来即可高居领袖地位。"三月二十日之后八个月到今年一月间，蒋介石又想用迁都南昌的手段实行政变，那时的伪左派领袖又不能立刻勇敢地决定号召民众起来和他奋斗，他们动摇犹豫迟徊不决者整整的两个月，蒋介石却正好利用这两个月的工夫，组织团结反动的势力，一直弄到屠杀上海工人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伪左派的领袖，不肯决然的根据工农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蒋介石奋斗，他们是在研究军事投机的方法，直到看见可以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等新军阀的偶然结合之势力，方才与蒋介石破裂，同时这种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的计划对于伪左派是可以预藏着一种反对工农民众的武器以备工农民众真正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积极奋斗之时，他们可以有恃而无恐，可以转过来便压迫民众。因汪精卫等之动摇犹豫，而蒋介石得以镇压东南各省的工农运动，与李济琛等相勾结，以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汪精卫等类的伪左派领袖到现在已经暴露自己的正面目了，然他们时常以空口应承，说要民众，说为民众而奋斗以及其他种种革命的空谈，巧自文饰，以掩藏其骑墙政策及其与蒋介石奋斗之不彻底。今年三月间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面上的决议案是很革命的，但是伪左派的革命领袖不肯实行这些决议案，明明规定要实行土地改革劳动立法，平民自治等等，然而等到群众真正起来跟着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来的口号而勇敢奋斗的时候，这些所谓左派领袖却不仅不肯起来为民众运动之领袖连同自己所有的政治法律的权力，以助工农运动，铲除封建余孽，反而仇视并破坏这些民众运动。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实行土地革命，等到湖南被压迫的农民与封建势力决死抗争之时，伪左派领袖便动辄以"过火"咒骂农民运动说农民协会尽属流氓土匪，不但不协助农民之艰苦的争斗，并且奖励反动军官压迫农民。城市中工人店员斗争，也遇到他们的仇视。他们不但不惩罚阴谋破坏金融经济实行反革命的买办奸商以及蒋介石的奸细，反而在工人店员努力赞助革命而与这些反动买办奋斗的时候，迭次的对于工友店员施以抑制，放纵反革命的买办豪绅。劳动法的命运，也和乡村自治条例及土地法令一样，始终不得公布；即许有所谓保护工农的命令，也始终不能见诸实行。任令贪官污吏军事长官摧残民众，买办奸商进攻工人。总之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虽有许多的革命的决议案，而事实上国民党领袖并未施行分毫政治法律的权力而解决工农小商人的痛苦，一面反而只以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的权力压迫工农。当这个时候，有些所谓左派领袖如顾孟余等，已经和反动的领袖（刘佐龙）阴谋举行反革命的暴乱，准备驱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密藏军火于汉口日租界并在军官中实行反革命的宣传。后来，杨森叛乱，于学忠等

扰乱湖北的西北境，夏斗寅进逼武昌城，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阴谋推翻国民政府，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国民党革命同志出江西——此等反革命举动，陆续继起，不可胜数，而国民党中央不但不征调一切力量以裁制反革命军人，却迭发反对工农运动的训令，命令，宣言，文告以助长新军阀的反动，文饰他们的反革命。这种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七月中旬。实际上这些伪左派领袖，放任夏斗寅的叛军，使能巩固其势力而摧残十余县的工农团体，他们承认朱培德"停止"江西的工农运动，他们自己默认许克祥的长沙政变，便能畅心如意的屠杀湖南人民，摧残工农运动，他们自己下令解散湖北好多县的农民协会。这些伪左派领袖不但不要民众，并且不要一切革命党部及党员，不论其为共产党与否？反动军人当然不但反对工农，并且反对民权主义的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江西各县党部曾被迫而停止工作，湖南省党部县党部都被解散。国民党中央对于这种事件，不但不反对，而且自己也帮着实行（如解散黄冈等县党部），这些领袖既摧残工农，又摧残自己的党部及党员群众岂非背叛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六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徐州会议的时候，冯玉祥公开的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等到这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必须决定选择一条道路！或者同着革命的民众前进，或者同着反革命的军人反动。这时候，冯玉祥对国民政府提出反动要求，唐生智赴湘后，亦来两电，要求"改组"工农运动，实际上便是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并且要求排斥共产党（如何健对于军队的排共令）。

这些领袖，在群众运动有力量时候，放纵反动军人去压迫他，到了群众运动已受历次的摧残削弱之后，当然更加要站到反动军人方面去，因此，这些国民党的领袖，完全接受反动军人之排斥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等新要求。

这些情形本是最近六月底至七月半武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篡改国民党的革命政策的真相，而决非借口于所谓共产党的秘密决议案所能掩饰的。最近国民党领袖在冯玉祥、唐生智系的反动军官淫威之下最后的决定压迫工农运动，本此目的而与共产党破裂。现在他们要掩饰这种反动政策，反而归罪于共产党对国民党之不忠实。然而，譬如孙科，他在五月间对美国新闻记者谈话，就说：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当国民政府的部长完全是为着容易对付工农运动起见，汪精卫等亦是如此见解。这算是对于共产党的忠实态度吗？这实在是要利用共产党做压迫工农运动的工具，共产党决不肯被人如此利用，国民党的这些领袖，都正因为共产党不肯帮助他们压迫工农运动，而宁可与共产党员破裂，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工农运动政策是不肯背叛的。国民党领袖既得政权，实际上早已有了实行这种政策的可能，应当尽力进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及其他革命的口号。事实上，弄成了国民党领袖不肯自上而下进行这些政策和口号，却任令民众是孙中山先生主义之最好的实行家，比实际上背叛孙中山先生政策之领袖高明万倍，国民党领袖既有政权，他们早有实行改组军队的可能，使军队真能拥护民众利益。然而他们不但不进行这种"使军队成为民众武力"的政策，不但不遵循孙中山先生向来认为军阀并非革命可靠的同盟之遗训；反而痛骂共产党要增加工农分子于军队之中，并肃清背叛革命的军官，为一种罪恶。国民党的这些领袖们，既然不能了解这种革命的根本职任，既然不能代表国民群众的这种迫切的希望和要求，他们就不配僭称国民党的领袖。他们是篡窃权位，是镇压国民党革命意志的政客吧了。现在的时候，既然国民党的领袖将国民党拱手让之于反动将领专恣的掌握之中，那末要求国民党组织的民权化，使其多数党员推举革命的领袖，——实在是最近理最切要的要求。

国民党指导机关之现状是如此，国民党中央已成反动军官掌股上之玩物。犹豫徘徊于革

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变成反动的实行者，参与反动的行为。武汉领域之内，如今也和蒋介石的领域一样，工农运动都受很大的压迫。无论国民党中央发表许多虚假的欺人的空论，决不能掩盖许多铁一般的事实，武汉已有二十五个工会被封，湖北许多县的农民协会已经捣毁，湖南的工农运动已经被摧残，江西也曾被暂时“停止”，国民党中央已经允许唐生智及其他将领任意驱逐共产党，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显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进行工农政策而实行压迫工农运动，不联合共产党而与共产党破裂，不联俄而在机关报上宣传反俄，汪精卫所领导的一切领袖也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中山先生的遗训。

即使现在为满足唐生智蒋介石的私战，对于民众这种战争丝毫都没有益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如果国民党不能脱离这种指导机关，这是国民党的亡党。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

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革命的国民党的政纲是什么呢？

（一）首先便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叛徒，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

（二）反对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一派的人——他们是甘心做反动将领的工具了。

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

（三）决然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壁垒及其一切余孽。最主要的封建壁垒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地主豪绅军阀贪官污吏重利盘剥者对于农民的剥削掠夺制度，只有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才能肃清封建制度的关系，要实行这种口号只有农民自己起来力争土地，从豪绅手中夺回政权。

（四）消灭城市工人，手工人，店员的牛马奴隶们的劳动条件。只有满足他们要求方能造成解放劳动民众的前提，要工农组织之完全自由，对于工农运动予以切实赞助。

（五）力争真正民主政权的建立，便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群众及劳动群众。推翻压迫剥削民众背叛革命之官僚军阀的政权。

（六）取消一切军阀性的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由革命的将校指挥而不用封建性的军阀。实行武装工农。

（七）无妥协的实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与苏联亲密的联盟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及工人阶级结合巩固的联合战线。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力争中国的解放与统一，反对买办阶级的影响及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

（八）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力争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及工资的增加，实行救济失业工人，要恢复一切工农组织及工会的权利——这是几年来革命运动胜利的成绩。

（九）力争一般革命群众工农团体的一切政治自由，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篡窃国民党旗帜的假国民党。

国民革命的胜利，真正民众的胜利，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都只有站在这种纯粹的遵照中山先生学说的政纲之上方有可能，只有实行这种政纲方能辟开发

展革命的道路，使大多数中国人民得到利益而不仅为各种封建资产阶级中少数高等华人博取权利。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真正革命的党人，应当团结起来开始为这个政纲而奋斗。

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我们决不服从现在这种伪国民党中央之开除共产党分子的决议，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权僭称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他们已经违背国民党的主义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遗训。

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盟，都应当团结起来，努力救党，自然不要放弃任何公开的可能，但是要准备着这些伪国民党领袖会竭立追逐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使丧失一切自由，而处于秘密地位。所以要准备着在无论何等环境无论何等条件之下，我们大家都应当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努力为解放中国广大的劳动民众而奋斗，而牺牲，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毋使国民党竟亡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之手！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领导机关，因为湖南农民运动，实际表现国民革命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而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摧毁，于是发生恐慌与摇动，又因为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封锁武汉，唐生智军队的反动与二六军右倾，及冯玉祥的公开背叛武汉，于是完全屈服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军阀豪绅地主等，国民党的政策，始而动摇，对于许克祥不加惩罚，对于夏斗寅不加扑灭，既而嘉奖许克祥及夏斗寅所领导之豪绅土匪屠杀工农摧残党部及人民团体，并且政府自己亦下令解散党部及人民团体。最近受反动军队之要挟，国民党中央居然于七月十五日开常务委员会（C.P.未到）决定：（1）一月内召集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C．P．问题；（2）在未开会以前对于有违反国民党主义及政策，加以严厉处罚；(3)派代表到莫京商议合作办法；（4）对于工农团体及共产党员之自由，用训令加以保护。但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宁愿做军阀的秘书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汪精卫派之虚伪主义现已完全揭破。汪将国际向他提议国民党应组织两万C．P．，三万工农分子军队之电报做一种煽动分家之材料及投降蒋介石唐生智之掩饰。国民政〔府〕一面下令保护工农及C．P．，但反动军队一面摧残党部民众。中央对于此已发表宣言，攻击武汉政府之反动，声明共产党参加政权之条件已消灭，命令谭苏退出政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与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奋斗。谭苏二同志已示威的退出国民政府。民众对此更形愤怒，即将国际电报公布在中央日报上每日登载。我们已发表对此电报之答复。孙夫人发表宣言不满于现中央之政策而避住上海，邓演达因不满汪等亦早已离汉他去，左派下层领袖除一部分受买外，现拟择一地点集会以求团结左派在党内反抗反动的与虚伪的领袖。中央对于现时武汉反动之策略如下：

1．认武汉中央政府已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故我们应攻击其反动行为，披露其虚伪，不可再事拥护其罪恶。对国民政府固然不应再说拥护，对汪精卫亦须历数其改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之罪恶。

2．与国民政府合作之条件基础既已消灭，当然应立即召回国府内之党员。惟仍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者即国民党员，所以我们与其他革命分子是真正党员，汪精卫等已不是真正信徒。我们要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

3．我们现在要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

4．要根据答复“容共政策经过”之一文，宣传汪精卫等借该电报以文饰其反动。

5．要根据现武汉中央之虚伪欺骗政策。指出武汉政府一方面颁布保护工农及“二五”减租，一方面任由军人摧残屠杀工农占据捣毁工会农会。在两湖应积极领导工农要求工农会的自由立即惩办摧残工农占领工农会的武人，如此以揭破武汉政府之假面具而使工农认识其

真面目。当政府不能接受民众要求时，总罢工与抗税是必要的。

6．要积极领导两湖工人，反抗资本家之进攻及毁约并应要求增加工资补偿因票价低落及物价增高之损失。武汉的失业工人在十万以上，我们要领导他们向政府要求工作及救济并向资本家要求失业救济金，如此我们一方面能使他们成为反抗反动政府的一支有力军队，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成工会的拥护以反抗反动派之分裂工会政策。

7．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向土豪劣绅反攻，残忍地推翻其乡村政权而建立农会政权。

8．领导城市贫苦居民做要求平低物价，纸票兑现，收回国库券之运动。

9．我党要准备全国秘密工作，办法另详组织部通告。

安中原①

---

① 安中原是中共中央的代号。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

李 立 三

一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结合的取消派

昨日《上海晚报》（英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转载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的消息："托洛斯基声明服从苏联党的政治路线，要求恢复党籍"。这不一定是事实，因为他已经完全走到反共产国际、反苏联的方向，很难回转头来，即令是事实也不一定是托洛斯基的诚意，或许是他所惯弄的阴谋手段吧？因为在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的受到极大多数的攻击的时候，表面上声明服从党，服从决议，而脑中却仍然极力进行他的反党的活动。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所决不会忘记的。

不管这一消息是否确实，不管托洛斯基是否诚意，但是托洛斯基反对派已经为国际党人以至每一个无产级级的觉悟分子所唾弃，已经走到他的山穷水尽必然死灭的道路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他公开的反对苏联党反共产国际，尤其是在他公开的投到张伯伦的怀抱里——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发表反苏联的文章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反苏联反世界革命的助手，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认识了反对派与无产阶级的叛徒社会民主党毫无分别了。因此，许多有名的反对派的干部，还不愿意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们，如齐诺维也夫、康米涅夫、腊狄克……等等都渐次觉悟过来，声明自己的错误，服从党的路线，重行回到党里来，所剩下的不过是一些决心做张伯伦的朋友、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叛徒罢了。

这样的一个招牌，现在中国的机会主义者，却把他顶起来。他们说："过去整个的根本路线，都是机会主义，只有托洛斯基是对的"，高呼着"世界革命的领袖（？）托洛斯基万岁！"这不是很奇怪的吗？不，一点也不奇怪。在过去虽然他们都反对着列宁主义的路线，但在表面上还有"左"的"右"的分别；在现在的革命根本问题上，他们都是一样的走到取消主义了。同时机会主义之在中国，正如托洛斯基主义在国际上一样，为共产党人以至每个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所唾弃，不如顶起一个托洛斯基的新招牌，还可以欺骗于一时，以掩饰他的反党的行为，这样就造成了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的 取 消 派 的结合了。于是他们宣言："我们是已经彻底觉悟的机会主义者，所以皈依了托洛斯基主义，中央还沉溺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必然要断送革命消灭党。我们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被消沉下去，不得不向他们攻击了"。他们这样把党看做第一个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豪绅、买办资产阶级还是次要的，不管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军阀战争与革命斗争的紧张，不管一切的专一的来向党进攻。这不是很明显的破坏党反对革命、帮助敌人的行为吗？

他们现在的口号就是说："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断送了中国革命"。其实每个同

志只要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训，仔细考察一下，都可以了解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托洛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并且可以找到他们根本错误的共同点，与现在其所以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原因。

二 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机会主义吗？

现在取消派——从托洛斯基至陈独秀都是一样——攻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说“这是机会主义的根本来源，这是违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不错，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是反对孟塞维克联合资产阶级的策略，可是列宁对殖民地民族革命却明白的指出：“共产主义者，可以并且必须与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暂时的联合”。他说：“共产国际在落后的国家中，应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但是他绝不能与他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虽然这种无产阶级运动或尚在萌芽的形式”。（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我们共产主义者，帮助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仅仅当这种运动真正是革命的，且运动的代表不阻碍我们组织农民和被压迫群众的时候。倘若没有这种条件，则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奋斗，反对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及附属于资产阶级的第二国际的首领”。（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演说）

这里明显的指出，在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共产主义者应当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这是不是列宁自相矛盾呢？不是的，这是因为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与俄国革命有很大的不同的客观条件。

当时俄国是压迫民族，而殖民地的国家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所以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都必然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继续生存与发展，主要是靠剥削殖民地，所以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如果帝国主义失掉他的后备军，必然更快的崩溃。因此，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大的助力。所以共产党的策略，必须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夺过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即令这一民族革命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在客观上并没有变更他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的意义（因为这一革命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因为在殖民地民族中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最厉害的，是下层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因此，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要掀动广大的下层劳苦群众起来斗争。那么资产阶级虽然只想这一革命合于自己阶级的利益，半途与帝国主义妥协，使革命夭殇；但是，共产党可以领导下层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反对这样动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领导革命彻底完成。这些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虽然是为着自己阶级的利益与解放，可是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所以共产党人毫无疑问的，应当帮助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并且与这样的资产阶级暂时协作，以推进这一革命的扩大与深入。

托洛斯基根本不了解列宁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不了解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不是机械式的民族压迫民族；帝国主义最大的作用是与殖民地资产阶级相联系……”。又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势力的根本来源，不是扬子江上飘泊的军舰——这是一种辅助品——而是经济上政治上中国资产阶级与外资相联”。

他在这样认识之下，于是根本否认了列宁的观点。他说：“丝毫也不要相信似乎资产阶

级会准备或者能够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不妨害工农”。他既否认了这样的前提，自然列宁提出来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的策略，根本不能成立了。

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使殖民地成为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因此他要极力阻止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着适合这样的目的，所以极力扶助殖民地的封建势力做他统治的工具。虽然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有联系，但在殖民地革命尚未起来的时候，帝国主义并不认他是最好的工具，而且要极力束缚他的发展。这样就使殖民地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发生极大的矛盾，就使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发展不得不与帝国主义争斗。但是到了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自谋发展的运动，掀动了广大的下层工农劳苦群众起来了的时候，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都受着这一革命的威吓，必然要实行共同分赃的方法，互相让步，互相妥协，联合起来以镇压这一革命运动。所以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虽然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起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是他参加这一革命斗争无论如何只是暂时的，决不能持久的，很快就要与帝国主义联合一块来对付工农。不过虽然是“暂时的”，我们也必须利用这一“暂时的”作用，而极力在这一“暂时的”当中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推进革命的发展与深入，一直到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领导革命彻底完成。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这样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中国民族工业在欧战期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一日一日的尖锐起来。帝国主义一方面握住了中国的海关和轮船、铁路等的运输机关，并竭力在中国来开设工厂；另一方面竭力扶植中国的封建军阀，使苛捐杂税与战争灾祸不断的起来。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自然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因此，在欧战后不久帝国主义的商品重行侵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遂走到了停滞与衰落的时期，特别是中国比较发展的纱业，更加恐慌得厉害，几至多数破产。当时民族资产阶级感觉到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不得不积极起来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这样就掀起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名的五四运动，便是在这样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之下起来的（一九一九年欧洲各帝国主义尚未能恢复中国的市场，当时民族工业感觉到最大的压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这一运动主要是反对日本），而且资产阶级的确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力量。这一运动，的确具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伟大的意义，的确是中国革命开始的爆发。这一运动掀动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渐次觉醒起来，走上革命的舞台，不久遂发生了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伟大的斗争——海员罢工与二七运动。这样伟大的运动，使中国资产阶级在事实上认识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同时也认识了这一力量的可怕，但是并不能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此以后就已经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因为他当时感觉到当前最大的压迫还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工人阶级的力量虽然可怕，还不是他当前致命的死敌，还想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所以不久就有国民党改组的事实。

国民党改组不久，遂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沙面大罢工（一九二四年九月），当时国民党左派对于这罢工是予以积极帮助的。几个月后就有因五卅运动而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一罢工是极明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当时国民党左派的确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一罢工，在各方面来帮助罢工，对于反对罢工的都加以打击。同时广东农民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许多地方与地主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国民党左派主要的倾向上也是站在农民方面，帮助农民来反对地主，农民的组织可以完全自由，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并且曾经收缴地主的武装来

交给农民。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当时资产阶级的确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确没有妨害工农的组织与斗争，并且曾经加以帮助。那么托洛斯基所谓"丝毫不要相信似乎资产阶级会准备或者能够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不妨害工农"的话，在事实上竟有了相反的例证。

托洛斯基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他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还占着统治的地位，帝国主义其所以能够统治中国，还不是与中国的资产阶级相勾结，而是扶植着中国的封建势力，并且他为着要使中国成为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更要扶植着中国的封建势力来束缚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这样遂使中国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发展不得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甚至不得不暂时依靠着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因为这时工农运动初在发展还没成为他致命的死敌）。因为藐视了中国的封建势力，自然不会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与中国封建势力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中国资产阶级遂在托洛斯基意料之外而暂时的实行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暂时没有妨害工农，表现了他暂时的革命的作用。

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托洛斯基始终是不懂得的。列宁再三说明"要把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分别清楚"的意义，托洛斯基更是不懂得的。

中国资产阶级既然"暂时的"实行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在这一"暂时的"当中，的确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无产阶级当然应该利用这一作用，促进革命的发展，尤其是极力在这"暂时的"当中去组织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以促进革命的深入。后来事变的发展，革命在全国高涨起来，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南中国以至中部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工农群众的组织与斗争，极迅速的发展，客观上不是充分证明了这一路线的正确吗？

所以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策略，"可以并且必须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结成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联合战线，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都充分证明了他的正确，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

三　国民党是什么东西？

取消派攻击共产国际路线的又一根本问题，就是说共产国际错认了国民党的阶级性，"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共产国际却肯定他是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

国民党到底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这是有历史证明的。国民党在其初发生时，即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社会阶级，包含了初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华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工人（如海员）、破产的农民、失业的群众（如会匪）、甚至只反对满清的汉族封建地主势力，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官僚军阀都加入了国民党，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容的垃圾堆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所以从孔子道统以至平均地权，甚至阶级斗争的思想都包含有，成为一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固然是反映当时社会思想的复杂，同时也就是反映党内成分的复杂。所以这样的党，的确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样的党，在民族革命的阶段上，是可以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并且可以使它随着革命的发展与深入而转变它的阶级的内容——从民族革命各阶级联盟到工农联盟。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可能。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开始改组的时候，共产党初加入国民党，便发生了极右派——所谓西山会议派，这是一种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结合，当时已经把这一极右派排斥出党。继续着发生了以戴季陶思想——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为中心的新右派与左派对抗，左派的基础包

含了当时党内工农小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左派占着很大的优势，国民党的中央组织，共产党已占有很大的力量，尤其在各地的地方党部，几乎大多数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于是左右派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北伐到达长江，左右派遂完全分裂，南京的右派与以前的极右派、甚至北洋军阀的余孽相结合，而形成一种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联盟；武汉的左派，工农的力量更加充实。假如当时坚决执行了共产国际使广大工农群众都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以及一切坚决斗争的路线，那么可以渐次推翻那些动摇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至把他们驱逐出去而转变到工农的联盟。

如果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那么它的组织决不会随着客观的阶级变动而分化，尤其不能让共产党盘踞着它的组织的领导地位。

以前国民党的主要政纲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所以一切反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都可以加入而形成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现在的叛变以后的国民党主要政纲是压迫工农，所以一切反对工农的社会阶层都可以包含，而形成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始终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

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政党，所以共产党应该加入进去，并且要领导广大群众加入进去，在国民党的内部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以至把资产阶级赶出去而实现工农的联盟，共产党成为这一联盟的中心领导。后来的失败，决没有证明这一根本路线的错误，而极明显的是由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违反了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的错误。

四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当时中国党对于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一点也不了解。在第三次大会讨论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的时候，曾经发生很大的争论；陈独秀领导的右倾的思想，赞成加入国民党，同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应该有什么独立的工作。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这是无疑的取消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的左倾的思想，起初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赞成共产党加入，但要保留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这是一样的不了解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策略。

这两派主张的根本思想，都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的理论。前一派的主张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应该竭力帮助资产阶级，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到将来再说，所以甚至觉到共产党都可以取消。后一派的主张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固然应该参加，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准备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业工人决不应该加入国民党中去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洗染。很明显的，这两种思想都是把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有一座万里长城的隔离，而不知道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三次大会的结果，没有能把这样的机会主义的思想驳斥下去，因此一方面固然实行了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另一方面机会主义的思想却充满了当时的指导机关。于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要有独立的工作"，"一切运动都是国民运动，工人运动只是国民运动的一种"，成为当时指导机关的路线。这是很明显的与列宁指示的"不要与资产阶级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完全相违反；这就是极可耻的以阶级利益去服从民族利益，以无产阶级去服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这样自然不会去在这联合战线中力争革命的领导权，更不会有"对待同盟者要犹如对待敌人一样"的认识。所以在接受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时候，就只认识了应当"加入"的一点，而完全没有注意加入以后在联合战线

中争取领导权的策略。他们遂这样的把列宁主义的路线，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五　广东时期

当时中央既然完全在这样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之下，于是加入国民党以后，对资产阶级采取可耻的让步的政策。认代表半封建势力的西山会议派为右派，而以戴季陶思想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派为中派，采取向中派让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实际上对右派也是一样的让步。当时广东的党一方面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广东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同志还是坚决的执行国际的指示，于是广东党与中央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的确是代表着两个路线——国际路线与当时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争斗。当时广东的路线，一方面积极发展群众的组织与争斗，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采取不断的向右派进攻的政策——一般人叫它做剥笋政策。征服了商团事变以后，马上肃清东江，削平杨、刘，继续着又驱逐胡汉民、许崇智等，左派与共产党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机会主义的中央却天天斥责广东太急进了，骂广东破坏了民族联合战线。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争论，就是在国民党二次大会以前，广东党坚决主张反对右派，把当时几个著名的右派领袖如戴季陶、孙科等都驱逐出广东，并且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把国民党造成左派与共产党联合的中央。可是当时中央的主张却确实与广东相反，认为当时革命形势（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在全国各处都受到了打击，必须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于是广东驱逐出来的右派领袖，到了上海，中央却马上与他们开联席会议，并订立极可耻的条件：一、共产党员在各级党部指导机关中不得占有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二、由共产党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候这些右派领袖回到广东以后再开。于是这些被广东驱逐出来的右派领袖在共产党中央自行让步的政策之下，又回到广东参加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了。所以当时广东与中央的争论是极明显的两条路线：中央主张向资产阶级让步来保持联合战线，广东却主张以进攻政策不断的排斥右派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三月二十号的事变。这一事变的意义，很明显的是当时资产阶级要先打击无产阶级的力量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然后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结果完全合于他一个阶级的利益。在这一事变中，广东与中央又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第一，讨论这一事变发生的原因，广东党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中央的主张又确实相反，认为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自然假如共产党在国民党——联合战线内，始终不企图争夺领导权，始终很驯服的服从资产阶级，并且还要极力领导无产阶级去拥护他，自然不会有三月二十号的事变，不过这只是极可耻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吧！第二个争论，就是对于三月二十号的策略问题。广东党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放弃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放弃革命的国民党旗帜给资产阶级，这就是莫可补救的损失，在这个时候是应当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同时积极的准备着新的进攻以继续夺取领导权的争斗”。另外在上海有少数同志的意见，认为三月二十号是莫大的耻辱，应毫不犹豫的退出国民党。当时中央的主张却是第三种意见：陈独秀在当时提出来的有名的一句话可以完全表现出当时中央的意见，就是“办而不包，退而不出”，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三月二十号的事变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是想包办国民党的事所逼出来的，所以“以后只应办而不要包”；马上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向右派退让，所以“只要退而不要出”。当时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固然是错误的；可是陈独秀的名言“办而不包，退而不出”不是十足的表现了专一奴服

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吗？

广东省委的策略是极其正确的，暂时让步的意思，不是恐怕与资产阶级的破裂，专一以让步来保持这一联合，却是因为当时当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战线之内的力量尚未强大，广大的工农群众也尚未组织起来，还没有战胜资产阶级取得完全领导的可能。假如采取退出的策略，不只是把这一革命的旗帜送给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当时的封建军阀，所以应当采取暂时的让步，以准备新的进攻来夺取这一联合战线的领导权。所以暂时让步只是新的进攻的准备，决不同于机会主义的专一奴服资产阶级的以退让为目的的政策。

三月二十号的事变，已经在事实上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革命的可能性，共产党经过这一事变的教训以后，应当更坚决的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批评资产阶级的动摇，积极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准备自己的力量，以镇压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到来，以夺取这一革命联盟到自己的领导之下。广东省委当时的策略主要是在这样的路线之下进行的，不过对扩大群众基础的工作还不十分坚决。北伐开始的时候，曾向中央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北伐过程中，到底准备推翻蒋介石呢还是拥护蒋介石"？广东的路线是主张在北伐过程中要同时积极准备推翻蒋介石的。可是当时陈独秀的中央答复得异常奇妙："不是推翻蒋介石，也不是拥护蒋介石"。这无异于说："现在是北伐的时候，为什么想到推翻蒋介石去"。这不是帮助资产阶级的最妙的理论吗？可见当时中央始终没有想到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回事。

上面的事实已够证明这两个路线的争论，当时既然陷入了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自然对于广东省委每一个问题的策略都是反对的，如省港罢工问题的争论、农民问题的争论都是一样。广东省委在这一阶段中，的确在总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执行了国际的指示而得到了很多的成功（有人以为当时领导广东党的是谭平山，这不是事实，当时广东省委的书记是我们党内极有政治天才并且极有组织能力的陈延年同志，"四一二"以后在上海被蒋介石屠杀了）；而中央在一切问题的主张，都表现着是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六　资产阶级的叛变

北伐开始以前，资产阶级唯恐革命超越了他的阶级的利益，企图首先夺取革命的领导，使革命发展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遂举行了三月二十号的政变。共产党以暂时退让来应付这一次的政变，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遂一手握着军政党的大权而举行北伐了。可是北伐进展的结果，革命的发展与深入，仍然是突飞猛进。北伐军做了群众革命火药库的导火线，稍一引燃，遂天崩地裂般的炸裂起来，谁也不能控制。北伐到达武汉不到一月，已经有五十万工人组织在武汉总工会之下。两湖的广大农民群众都蓬蓬勃勃的起来斗争，到一九二七年的正月，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已经组织到四百万人，农民自动的起来驱逐豪绅地主，许多地方，农民协会成了实际的政权机关。北伐军的兵士群众与下级军官，很多都受到了这样群众革命的影响，而左倾起来。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如果共产党有决心的、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来争夺革命的领导，来监视动摇的资产阶级，毫无疑问的可以把当时不可免的资产阶级的叛变镇压下去。可是当时共产党的中央完全陷入在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只注意帮助北伐，全没有注意在北伐过程中来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准备自己的力量以镇压不可免的资产阶级的叛变。这样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叛变得到了成功，而形成了南京与武汉的分裂。

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第七次扩大会议（这时还是北伐军初到武汉的时候），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有一极详细的决议案，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阶级关系、前途，都有极正确的、极详细的估计，对于党的策略更有深切明显的指示。

在这一决议案上指出：

一、"北伐胜利的结果引起了广大工农起来，使帝国主义又受到莫大的打击，往后的胜利，必更能增加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到许多倍，以至战胜帝国主义完成中国独立与革命的统一。所以帝国主义将用拚命的力量打破那有推倒帝国主义的危险之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的有用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革命势力中找寻它的同盟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以分裂革命的队伍，以打击革命势力。"

二，"在此时期，是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大资产阶级看见反帝国主义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超过了他的控制，客观上危害他的阶级利益，于是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在这过渡时期历史上，必然的，大资产阶级必定日渐离开革命，而不可避免的"。

三，"中国革命发展之现阶段，从历史上说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握到革命的领导权，则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的阶级政权，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前途。否则资产阶级倘若胜过无产阶级，则中国实际统治又将落于帝国主义之手。"

四，"在现在革命运动发展的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张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个阶级能够抓住这问题而加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必然成为革命的领袖。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不去勇敢的接迎土地革命，以拥护农民群众客观的一切政治与经济的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

五，"有系统的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想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企图，彻底的批评在左右之间的一切动摇。使国民党成为真正平民的政党——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被压迫者的坚实同盟。"

六，"共产党应当加入革命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使国民革命的农村政纲有实际的表现。"

七，"必须从经济上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基础，就是革命政府，应当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因此以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势力，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若不超出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范围之外，决不能推倒帝国主义的。"

八，"要在革命中占领导地位，无产阶级必须坚强其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共产党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使他能尽这个历史的使命。创立群众的产业工会，强固全国总工会，更加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应当转变到政治斗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制定劳工法、社会保险、救济失业等。"

从上面这些主要之点，可以说把中国革命画成了一幅最清晰的图画，而且把党的进行的道路，都在图画上规定出来了。可是当时中央堕入在机会主义的泥坑，对于这样的决议案，竟好象是五花八门莫名其妙一样。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

题决议案的解释上，一方面解释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把国际决议加上了机会主义的曲解。

对于革命性质与前途的问题，国际决议案上明白指出“现在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力争革命的领导，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可是在中央的解释上却说：“国际这个提案，不是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是说现在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性”。这真是一塌糊涂的解释，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真是只有“天晓得”呵！

对于当时最迫切的资产阶级叛变危险，国际决议案上从各方面指出这一不可免的当前危险，指出资产阶级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破坏革命，指出资产阶级必然要离开革命，指出如果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中国统治将仍要落到帝国主义的手里。指出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战胜资产阶级而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并且指出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各方面的策略，在中央解释上对于这样的严重的问题一点也没有注意，却说“国际告诉我们：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是甚么话？这完全是彭述之主义“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的理论。对于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句也没有提到，马上说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所以革命的前途要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的，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自然用不着争呵！资产阶级的离开革命有“天然”来战胜他，自然用不着共产党来注意呵！这真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了！

尤其严重的，国际决议案上指出许多当前的迫切的问题与战略，如帝国主义压迫革命的问题，农民运动与土地问题，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银行问题，国民党问题，共产党加入政府问题，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工人政纲与农村政纲问题，这些都是当前迫切摆在议事日程上马上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央的解释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或许都是让“天然”来解决罢！以“天然”来解决问题，真是中国老子“无为而治”的学说。不是的，机会主义者本来只预准在这一革命中做资产阶级的助手，一切问题都有资产阶级来解决，又何劳共产党来干预呢？这真是“双料的机会主义”！

在讨论国际决议案的时候，中央内部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瞿秋白同志不同意中央的解释，尤其不同意中央对上海暴动的策略，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批评彭述之主义，批评当时的机会主义。这本小册子，对于当时的机会主义，的确是一个有力的攻击。但是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中央对于国际的决议，既然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了解，自然在实际行动的策略上，还是一贯的执行他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中央直接指导的上海三次暴动，在政治上仍然表现很严重的机会主义。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暴动的时候，发出的唯一的政治口号就是“欢迎北伐军”，一切革命的政纲，群众迫切的政治要求，一点都没有提出。至于政权问题“推翻军阀政府，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权”更没有说到。这就是极明显的机会主义。暴动推翻军阀政府以后，欢迎北伐军来组织政府，以表明民众只是帮助北伐，并不企图夺取政权，尤其可以避免工人阶级要干预政权的嫌疑，才不惹起资产阶级的反感呵！

号召第三次暴动时，的确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已经提出了革命的政纲，并且提出了建立“市民政府”的口号，在暴动开始的时候，已实际的建立各区市民政府。可是在这当中仍然犯了一个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抛开一般急进的小资产阶级，而极力与资产阶级妥协。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叛变，蒋介石已经从南昌开刀，经过九江、安庆、芜湖一直杀来(杀工人)上海；武汉已经提出“打倒蒋介石”，“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中央的路线仍然是联合资产阶级，仍然提出“欢迎蒋总司令”的口号。结果市民政府因资产阶级的背叛，因蒋介石一纸禁止的命令，遂至无声无息的消灭了。到“四一二”的一天，上海工人阶级遂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革命的上海，一瞬间遂变成了反革命的上海！

当时客观的形势，革命正是空前的高涨，上海八十万工人都组织在上海总工会之下，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离开资产阶级而同情于工人阶级；就是在军事上，同情革命的军队，仍然是优于反革命的军队，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都动摇起来。所以，假如中央是一贯的坚决执行国际的路线，在进行北伐的当中，已准备着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叛，退一步说，就是在三次暴动的时候，不采取专与资产阶级勾结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而是极力与资产阶级斗争，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很坚决的、有计划的预备第二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叛，那么当时上海的工人阶级不一定遭受这样可怕的失败，全国的革命也不一定受到这样的打击。或许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四一二”，可以变成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四一二”。“四一二”的失败，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确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上海三次暴动是中国革命史中伟大的一页，是暴动的艺术上的伟大成功，可以垂为历史的教训，可是并不因此就掩盖了当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假如当时在政治上能正确的执行国际指示的路线，不犯这样深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期表现机会主义最明显的，还是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本来机会主义最庸俗不过的，眼中只有占有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始终看不见无数百万受封建剥削压迫的劳苦的农民。北伐开始的前后，鲍罗廷同志曾说：“我们认识左派，一定要看他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的标准”。当时机会主义的中央，不只是不注意这一句话的意义，甚至绝不相信中国要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把他这一句话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话。北伐进展以后，农民斗争如火如潮的怒发；不过两三月之久，湘、鄂、赣三省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群众在一千万以上。各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倒豪绅地主，乡村政权归到农民协会。湖南农民已经自动起来夺取土地，革命怒潮把农村中最落后的群众，妇女儿童都发动起来了。国际决议案已经在客观的事实上证明是千真万确，而当时中央一点也没有注意，土地问题，更一点也没有谈到。国际决议案说：“如果不去勇敢地接近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一切客观的政治与经济的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如果因为犹豫，且误给资本家一阶级合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问题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位上，那便是错误。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必须免去这个错误”。当时中央正犯着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当时——北伐军到武汉的初期——湖北省委的政策，还是能相当的执行国际的路线，一方面极力发展工农运动，同时极力反对资产阶级阻碍革命的企图，积极准备推翻蒋介石的领导。可是中央——当时中央还在上海——却批评武汉太急进了，批评武汉的工人斗争的要求提得太高，行动太激烈了。尤其最奇怪的——不是，机会主义表现得最明显的——批评武汉“一三”事变（一月三号广大群众各自动起来收回英租界），说：“这样胡干（群众是胡干

啊！）将会断送革命”。这还不够证明当时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如何的严重吗？

“资产阶级叛变的胜利，是党的机会主义帮助了他”，一点也不是过分的批评啊！

七　武汉时期

资产阶级的叛变，使革命遭受了部分的失败，另一面却推进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特别是农村斗争更激烈的发展与深入，群众武装的日益扩大，这些事实都证明，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路线，领导革命向前发展，那么以几千百万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战胜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残余封建势力，而彻底完成革命，仍然是极可能的。可是中国党却堕入更可耻的机会主义，实际的政治路线与斗争的策略，完全与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反，中国革命在这样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而走到完全失败。

湖北省委在北伐军到武汉的初期，比较是在正确的执行国际的路线，曾经与中央发生过很大的争论。到“四三”惨案——日本水兵惨杀车夫，引起日租界工人总罢工的前后，中央从上海移到了武汉，于是一切策略又陷入到机会主义的漩涡里。这时转入机会主义路线的原因，鲍罗廷同志实有很重大的影响。他从广东直到武汉的初期，的确都是在正确的执行国际的指示。当时广东与湖北省委都相当的受到他的影响，而能正确的执行一切策略，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到了资产阶级叛变以后，尤其是帝国主义积极进攻的时期，革命愈加深入，同时斗争也就愈加艰苦，他忽然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怯懦病，惧怕革命的继续深入，而使革命战线发生不可免的新的分化，于是极力以退让、妥协阻止群众斗争的策略，来避免这一新的分化，以外交式的勾结代替群众斗争的策略，这样的转入到机会主义的泥坑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党的五次大会上，虽然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可是对于国际整个的路线仍然是异常模糊的（当时我也是反机会主义的一个，但是对于国际的整个路线实在是不懂得的，并且对于机会主义的系统的思想也是不明白的）。反机会主义的阵线既然是这样的软弱，当然不能攻击机会主义的要害，发动全党同志的注意。无法使机会主义受严重的打击。同时，当时国际代表鲁易（现在他完全是右派的主张，共产国际已经将他开除党籍了），自然是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可是他只注意鲍罗廷的右倾，而忽视了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在他的演说中竟这样的说：“中国党是从斗争中产生出来，决不会发生机会主义”。这不仅是当时调和倾向的思想，而且是极端错误的意见。于是软弱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五次大会上的影响，几乎完全消灭了。自然在组织上更形成一种调和派的结果。

五次大会后的新中央，集合了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但是旧的机会主义派，仍然是居于领导的地位，所谓反机会主义的分子，既然是十分软弱，且不久都跟着鲍罗廷的路线跑了，就是五次大会前反机会主义最坚决的秋白同志也是一样。的确武汉时期整个的中央都堕入机会主义的错误。于是党的指导，不只成了群众的尾巴，而且是替资产阶级服役，破坏革命的进展。

差不多与中国党第五次大会同一的时期（五月初），共产国际召集了第八次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这一次的决议案是根据七次扩大会一贯的路线，对于革命的形势、前途与策略都是有更深刻的指出，对于当时一切严重的问题，都有极正确的解答。如果这一决议案在中国实际的斗争中发生了些微的影响，武汉的危机，都不是不可以挽救。把当时中央的政策与这一决议案来对比，确好是完全相反！

国际决议指出“资产阶级叛变以后，革命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革命继续的前进与深入，国民党左派领袖与某些军官的继续叛变，很有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共产党必须极力调动广大的下层工农群众，严厉批评一切的动摇，应时时的揭破一切勾结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的趋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制裁这些动摇的分子，然后才能防止或镇压那些国民党上层领袖不可免的叛变”。当时中央执行的路线，却是一味惧怕上层领袖与将军们的动摇，极力遏止群众的斗争，以让步、妥协来企求这些领袖将军们的谅解，不离开革命。

国际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它的任务，只有保有工人阶级先锋队独立的政治面目，和那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群众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当时中央执行的路线，又是完全相反，完全跟随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袖跑，实际上就跟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跑。这些领袖们“骂工农运动过火”，也就跟着骂“工农运动过火”。这些领袖们要制止所谓过火的斗争，也就命令总工会定发布什么“革命纪律”来遏止工人的行动。并且造一个理论说：应该与国民党“共同决定，共同行动”。这是极明显的完全抛弃无产阶级先锋的面目，而把自己融解到国民党之内。

国际决议案指出“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是中国革命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等，这些口号必须在全国，特别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域内实现出来……”。当时中央执行的策略，却是将五次大会决定的一个机会主义的土地政纲都把它取消。陈独秀并且倡言“只有先扩大然后深入，打到北京后，才谈得到土地问题”，（这正是与决议案指示的“一方面向外发展，同时要在武汉政府区域深入革命”针锋相对），并且骂农民自动手分配土地，是流氓土匪运动。谭平山就农政部长的宣言竟公开的承认农民运动过火，说什么“要纳农民运动于正轨”，这与国际决议指示的“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的爆发与扩大”，又确确相反。把“促进”变成了“压抑”。尤其是“马日事变”，阻止农民暴动，阻止农民反攻长沙，并且还宣传唐生智是真正革命的，这是多么可耻的机会主义呵！

国际决议案指出“必须极力领导工人的斗争，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废除一切钳制工人的法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中央执行的策略，却是极力压制工人的斗争，把总工会变成劳资仲裁的机关，颁布什么革命纪律，还接受武汉政府的“不得政府的允许不得举行罢工”的法令，甚至骂童子团反抗一切中世纪行会式的剥削束缚的斗争都是过火，命令总工会收缴他们的武器（可怜的很，并不是什么枪炮，而是一根三尺长的木棍子呵）！这还不明显的是替资本家服役吗？

国际决议案指出：“对于民族及外国资产阶级在各种企业内怠工破坏，希图制造经济的紊乱与破产，政府便须没收，国有这些产业”。中央当时执行的，却是极力压制工人自动占领资本家怠工关厂的企业，甚至因此命令总工会改组汉阳的机器工会。

国际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参加政府任务，是要自上而下促进革命的发展，监督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实现革命政纲，使革命政府与民众间亲密的联合起来”。当时中国党参加政府，执行了相反的任务，做了资产阶级压抑群众革命的工具。

国际决议案指出："应极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工会、农会等整个的加入国民党，极力扩大国民党的民主化，实行领袖的选举，实际的使工农政权在国民党这一〔特〕殊组织的形式之内表现出来"。当时中央对于这一指示是完全怠工。

国际决议案指出："应改编军队，改雇佣兵为革命的志愿兵制，在军队中确立共产党的影响，使兵士与工农组织间密切的联络……"。当时中央却造出"军队只能有一个领导，应该巩固革命军，不应该破坏革命军"的理论，遂这样的使所有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同志，都成了将军们的姨太太，不能在兵士中做一点宣传的工作，以免破坏革命军队。

国际决议指出："应当极力武装工农，尽可能的扩大工人自卫团，与农民自卫军等的组织"。而中央却为着避免反动的将军们借口，命令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武装送给敌人。

当时可耻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实在还多得很，我想用不着再叙述了，已足够证明，当时中国党实在是完全违反国际的指示，专一执行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替资产阶级服役，来破坏革命的了。现在陈独秀们却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所断送"，企图这样信口诬蔑，隐藏历史的事实以欺骗一般群众，掩饰自己的罪过，除去了用"卑劣无耻"来批评，实在找不出更确当的字样！

陈独秀们始终一贯的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可是铁一般的历史，使他无法直接辩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于是找到托洛斯基反对派做他们的大旗，高呼着"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都是机会主义，只有托洛斯基才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的错误，不过是执行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只有托洛斯基才是'真正老牌王麻子'的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样很巧妙的把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推脱得干干净净。假如把这样的话翻成了外国文字，苏联工人阶级以至各国工人阶级听到了，肚皮都要笑破！"托洛斯基反对派，只是列宁主义的冒牌货，老早把他拆穿了，并且现在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反苏联、反世界革命的工具，中国落后的机会主义者，却还把他顶起来做招牌，这足以显明中国党的幼稚罢"！其实不然，这决不是这些机会主义先生们的幼稚。托洛斯基是什么东西？尤其是托洛斯基最近反国际、反苏联的行动，他们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这不过证明他们决心离开党，决心投到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做宠妾的第一步的最聪明的办法罢！就他们现在的政治倾向来诊断他们以后的转变，可以预言：他们第一步是离开党，第二步是联络第三党改组派，第三步就是……，这样"曲线"的策略，是每一个机会主义者离开革命，走向反动的步骤。

托洛斯基对现在中国问题的主张，完全走回了他的孟塞维克取消派的老家。他所提出来的口号如"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一点分别也没有了。与中国机会主义者的观点，真正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这样取消主义的错误与危险，留待下面再来批评。现在简单把一般机会主义者所极力宣传的托洛斯基在武汉时期的主张，来分析一下：托洛斯基对中国武汉时期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就是《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看这篇东西的内容有些什么？

这篇文章第一个中心问题，批评共产国际的民族联合战线的路线的策略，在理论上的批评，上面已经说的很够，用不着再来重复。若就事实上来说，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在殖民地民族革命中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必须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或协作，明明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来的路线，为什么说共产国际违反了列宁主义的路线？明明在这里攻击列宁主义，却要自称为列宁主义者，还要把列宁主义树在反对派的头衔上，这不是不可解的矛盾

吗？不，列宁主义已经是被全世界无产阶级所崇信的伟大的科学，如果自称为反列宁主义者，必然马上直接为无产阶级所唾弃；不如打起列宁主义的招牌，还可以在表面上欺骗一般群众。这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所惯弄的把戏，社会民主党直到现在，不还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吗？第二、如果托洛斯基真是反对民族联合战线的策略，为什么在广东时期，不反对帮助广东政府，而且认为必须坚决的帮助呢？为什么在这一个大纲上还不公开的主张退出国民党呢？托洛斯基始终不能自圆其说，始终无法解释自己的矛盾！第三、如果托洛斯基是承认民族革命初期采用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的政策是对的，只是反对共产国际继续采用这样的政策，这就是故意造谣！在北伐一开始的时候，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已经指出资产阶级叛变之不可免，和各方面同资产阶级奋斗的策略。至于事实上仍然犯到这样的错误，这只是中国党的机会主义所造成功的，决不是共产国际路线的错误！托洛斯基这一反对民族联合战线的观点，表面上是很左倾的，可是实际上与当时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同一结论。左派社会民主党正如托洛斯基一样，骂“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合作，是出卖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这是什么意义？这不过是帮助帝国主义当时阴谋破坏中国革命的一种方法吧！凡属无产阶级的叛徒，常常喜欢用左的语调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他的资产阶级走狗的真面目！

第二个中心问题，就是主张在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这又是很好听的左的口号，很易煽惑人的。关于这一问题，在《中国革命与反对派》的小册子上，登载的斯大林的中国问题大纲与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演讲，有很详细的批评，这里用不着重复说明。现在只指出这一问题的一个中心点来。托洛斯基这一主张，并不是离开他的整个的路线而独立，而是在他的路线之下得出来的结论。他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武汉的国民党政权就是反革命的政权，所以应当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共产国际的路线是，认为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的特殊的组织，蒋介石的叛变，是反映资产阶级的离开革命，武汉国民党便是代表着革命的新的阶级结合——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以当时武汉国民党是革命的组织，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因为国民党是一种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的特殊组织，所以他的阶级内容可以随着客观的阶级关系的转变而转变。因此，在武汉时期共产党的策略，应该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使他成为一种群众的组织，同时极力扩大国民党的民主化，实行群众的民主选举，渐次推翻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以至把他开除出国民党，使国民党政权转变成为工农政权，使工农政权在国民党这一特殊组织的形式之内表现出来。这就是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假如革命已经向更高的阶段发展，预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当然毫无疑问要建立苏维埃以代替国民党政权，所以应当极力扩大并巩固工会、农会的组织，以准备苏维埃的基础。这是很明显的两个不同的路线。在理论上，如果说托洛斯基主张建立苏维埃是对的，那么便应首先退出国民党，若一方面留在国民党之内，同时又建立苏维埃来反对国民党政权，怎样来解答这样的矛盾呢？托洛斯基明明陷在这样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并不主张马上退出国民党，另一方面却主张马上建立苏维埃！在当时的事实上，运用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来建立工农政权，比较用苏维埃政权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策略要便利得多。如果不采取比较便利的策略，而机械的采取再来一次革命的策略，不过是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多造进攻武汉的机会吧了！有些同志认为“托洛斯基整个的路线是错误了，可是在主张武汉时期建立苏维埃却是正确的”，这是不了解主张在武汉时期建立苏维埃，是托洛斯基整个路线中得出来的结果，如果承认他这一点是对的，

那么便要承认整个路线都是对的；如果已经认识他整个路线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一点更毫无疑问的是错误的。

在他这一篇文章中，除开这两个中心问题外，都是一些造谣、诬蔑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巧辩，找不出值得批评的东西了。可是在这一篇文章中，暴露了托洛斯基主义的几个根本的错误，必须特别指出的。

第一、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问题，他只认识“帝国主义最大的作用，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相联系”而不知道，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固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最主要的作用，还是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互相依靠。他只认识“帝国主义依据海关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而不知道帝国主义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来束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他得出了“如果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指武汉时期），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的制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则中国必不可避免的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他不知道，“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产阶级，则中国实际的统治仍然要落于帝国主义之手”（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决议案）。这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失败了，则中国整个革命都要完全失败，帝国主义必然更残酷的来统治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必须又可以得到一时的恢复。托洛斯基这一错误观点，就是取消主义思想第一个主要的根源。

第二、他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封建势力的存在”，“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已占着统治的地位”。他不知道，中国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仍然是中世纪的封建形式，现在统治中国的军阀便是建在这样封建剥削关系的基础上（自然要依赖帝国主义的维持）。因此，他看不见中国资本主义还受着极严重的封建势力的束缚，而以为资产阶级只要战胜无产阶级便可以畅利的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取消主义思想第二个主要的根源。

第三、他主张在武汉时期“要很快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要马上组织苏维埃，这就是他的根本思想不断革命论对中国的运用，这就是要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专政。在他这篇文章里，极力辩明这一点，说这是对他“妄加诬蔑”之词。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无赖的巧辩。工农专政的存立主要是在肃清封建势力的任务。他既不承认封建势力，还占着中国的统治地位，认为辛亥革命已经是中国的“二月革命”，那么所谓工农专政到底是对“谁”的专政，既没有封建势力的存在，那么工农专政又怎样能够存在。可见他所提出工农苏维埃口号，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专政。并且在他这篇文章上已经很明白的说出，要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上虽然引用了许多列宁的说话，可是根本的思想，还是他自己的不断革命的理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托洛斯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在武汉时期的主张，只是一种空洞的好听的高调，一点也不切合当时实际的情形。自然不足奇怪，唱空洞的高调，本来是口头革命家所擅长的呵！不过陈独秀们在当时既不执行国际的指示，而拼命的固执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到现在，却利用当时这样的高调来攻击国际正确的路线，实在证明这是一种极无聊的躲闪！

八　怎样发生盲动主义的错误？

武汉革命时期，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遂使革命受到严重的失败。尤其是党受到莫大的打击，政治上已经走到绝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几乎完全丧失；组织上已经走到分崩离

析的状态，一般同志无所适从。许多动摇的分子如施存统之流，遂实行叛变，投降敌人。当时的形势，党真有暂时瓦解消灭的可能。共产国际为着挽救中国党的灭亡，因此解散当时中央政治局，超过中央的组织，直接召集全国暂时紧急会议——这就是在党的历史上有极重大意义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坚决批评过去党的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在政治上指出武汉失败使革命又受了一次打击，但是革命因为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动，必然向着新的阶段——工农革命的阶段发展。因此坚决的决定了新的策略，提出了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当时还想利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的确是“八七”会议一个很大的缺点，可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临时政治局很快的纠正了这个缺点，宣布国民党为民众公敌）。在组织上提出了彻底改造党，引进工人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这样在政治上、组织上都给了党的新的生命，全党同志在党的新的精神与策略之下，重新兴奋起来。把党在瓦解崩溃的前面挽救过来，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同时党的新的口号深入了群众之后，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使工农群众感觉到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出路，而重新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坚决的斗争，把党因机会主义丧失了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相当的挽救过来。所以“八七”会议的确是党的历史的一大转变，因为有了新的政治路线与精神，才打破一切反映革命失败而必然发生的颓糜、悲观、动摇、失望的情绪，才建立起新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谁不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谁便要永远堕在机会主义的泥坑，无可解脱。

现在陈独秀们极力诋毁“八七”会议，一方面说它是盲动主义的开始；另一方面又说并没有把机会主义根本纠正过来。这不只是证明他们完全是这一历史转变的落伍者，而且暴露了他们要将党的领导回复到机会主义的企图。

当时提出“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方针，不只在政治的意义上，针对着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适合群众的要求；而且在政治的形势上，武汉与南京政府，都是在动摇崩溃的状态中，工农斗争虽然受到新的打击，却仍在不断的爆发，革命的浪潮高涨并未完全过去，所以提出号召群众武装暴动的口号，在总的路线上是非常正确的。只有机会主义者，才常常对着“武装暴动”的口号表示畏怯退缩，以为只有暴动前一秒钟才能发出暴动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在任何形势之下都不要暴动，因为如果没有党预先去组织暴动、号召暴动，决不会有成熟的暴动），甚至广大群众已经自动的拿起武装，他还高喊着“放下武器呀！”。布尔什维克党认识“武装暴动”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只要看见革命高涨的可能的时期，便要指示群众以最后唯一可能的出路，并且要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与鼓动，来坚定群众的决心。而且要实际的到群众中去做实际的组织准备的工作，因为他了解，没有准备，没有精密组织的突发的、原始的暴动，决不会有胜利的可能。所以当时在总的策略上，指出“暴动夺取政权”的可能与必须的前途，并没有丝毫盲动的意味；至于在每一个实际暴动当中，而发生了策略上错误或时期估量的不正确，并不能因此遂推翻这一总的路线！

因此，在“八七”会议以后党所组织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虽然在每一个暴动的具体的策略上，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错误，并且都不是胜利的暴动，但是在总的路线上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

机会主义者与托洛斯基指斥这些暴动都是盲动，这是根据他们一贯的政治观点出发得出来的结论。他们认为武汉的失败“已经是革命最后的失败，已经是历史的转变时期，就是武

汉失败以后，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时期，党应当取消一切革命的口号而准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合法运动"（托洛斯基），取消一切政治的口号，而单纯的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后向中央的建议便是如此），自然要觉得这些暴动在总的路线上都是盲动，"八七"会议的路线根本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这不过证明，托洛斯基与机会主义者在这时候都已经开始走上取消主义的思想了。

广州暴动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企图挽救革命的最后一次的英勇的斗争，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有它伟大的历史的意义。

暴动的爆发，使全世界帝国主义与全国反动的阶级，都震惊起来，马上互相妥协联合一致的来镇压暴动，同时在指导这次暴动的主观方面也犯了不少的错误，遂使暴动受到严重的失败。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反动统治阶级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共产党员加以极残酷的镇压，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都被解散，许多革命的干部与领袖尤其是共产党员，遭受空前的大屠杀。在这样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革命势力受到莫大的打击，因此第一次的革命高潮，随着广州暴动的失败而完全过去。所以广州暴动的确划分了革命历史的时期：一方面在革命的阶段上，开辟了中国工农苏维埃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形势上，结束了第一次的革命高潮。

革命的形势转变了，领导革命的党，应该很迅速的抓住这一转变，而提出新的策略，然后才能适合于领导革命的新的任务。如果不能极灵敏的注意客观的革命的转变，而死守着自己划出来的环圈，那么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便要不可避免的脱离群众。广州暴动以后，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抓住革命形势的转变是最主要的原因。

广州暴动的失败，不可否认的革命势力是受到了最后的、严重的打击。固然革命的根本矛盾一点也没有解决，统治阶级决不可能稳定他的政权，革命是有新的高涨的必然。可是革命的主观力量经过这样严重的挫败以后，决不是马上可以恢复，所以革命浪潮，决不能马上高涨，其尤不是一直高潮。因此当时党的策略的路线，应该转变到重新聚集力量，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应该把"武装暴动"的口号，从直接行动的口号转变为宣传的口号。当时指导机关，忽视这一革命形势的转变，只看到统治阶级无法稳定的一点，而忽视革命队伍在经过严重的压迫以后的溃散、疲困的状态。不知道自己的队伍在这样零乱的状态中，就是敌人的力量异常的削弱，仍然是无法向敌人进攻，因此而误认革命的形势是"继续高涨"，"一直高涨"，并使主观的造出"在革命形势的方面，也是无间断性质"的理论。在这样的错误估量之下，自然在策略上无法转变过来，而仍然机械的守着在革命高潮时"直接暴动"的政策。用这样零乱颓弱的队伍而去与强大的敌人作拚命的尝试，甚至队伍完全击散了，而以少数干部作毫无把握的，孤注一掷的牺牲，这毫无疑问的就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了。

所以盲动主义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不认识革命的转变，不承认革命的失败，而发生对革命形势的错误的估量，盲动策略的表现是脱离群众、不要群众、而以少数的先锋队作拚命的牺牲。党在这样盲动策略之下，又受到了可怕的损失，如果继续的是这样发展下去，将不可免的要使党走到灭亡的道路。所以盲动主义是与机会主义一样的可以损害党的生存的危险。

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极力批评当时党的“左”倾的错误和危险。指出在革命性质上认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或者认中国革命是不间断的性质都是不正确的。指出在革命形势上第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第二个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党的任务是在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党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必须极力反对党内的盲动主义，反对玩弄暴动，强迫罢工，个人恐怖先锋主义等，这些正是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恶劣的倾向。最后指出党必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尤其要反对托洛斯基派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死灭了的取消观念。

这一决议的确针对了当时中国党的最大危险，痛下针砭，把党从异常严重的削弱崩溃的状态之中挽救出来。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都同样的攻击当时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可是他们的根本观点与共产国际的观点根本不同，而且是异常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盲动主义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不承认革命的失败与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只是战胜了无产阶级，而且战胜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因此他们以为武汉失败已经是革命的最后失败，广州暴动的失败简直是革命的死灭，以后便是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政权稳定的时期，党的任务只是准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议会运动和训练教育的工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自然会以“八七”会议的路线就是盲动主义，自然要主张取消一切政治斗争，而单纯的做经济斗争，自然要认为凡属政治性质的斗争都是盲动，结果便是无盲不动了。这是由于没有认清楚，资产阶级的叛变，是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革命失败不只是无产阶级失败，而且是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到了胜利。因此工农革命势力虽然受了严重的打击而暂时溃散，可是革命的根本矛盾一点也没有解决，统治阶级因为内部的冲突决不能统一稳定，革命势力因为剥削压迫更加残酷，因为统治阶级不能稳定的客观条件的便利，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起来作新的坚决的斗争，而走向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观点，完全是取消主义的观点。似乎批评当时的盲动主义是对的，可是他们的根本观点却犯了严重的错误，因此他们的批评不只是过火而且走到了取消一切。这样的批评不只是不正确，而且有莫大的危险。

列宁说：“不站在正确的观点，决不会有正确的批评”。又说：“当我们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决不要使左倾派引为是自已的胜利，当其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决不要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一方面极力纠正当时党内右〔左〕倾的危险，同时指出必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取消观点。

九　结　论

历史上不可掩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正确，证明了托洛斯基主义只是一种表面的左倾高调，而根本上正是一种孟塞维克主义；证明了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观的错误，是由于当时中国党的指导机关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堕入到机会主义的泥坑。并且可以证明，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都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在世界革命已经进到无产

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的助力。共产主义者决定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首先要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所以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协作，这是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夺过去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之必要的策略。可是中国革命发展到很高时，帝国主义必然要采用与中国资产阶级分赃的策略，以收买中国资产阶级，同时中国资产阶级受着工农运动发展的威吓，从前认为束缚他最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相〔想〕帮助工农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现在工农运动的发展直接损害他的利益，又必然要帮助帝国主义以压迫工农，所以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决不是长久，而终结是必然叛变的，这是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特性。所以在这一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力争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要坚决促进农村革命，发动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动摇，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从与资产阶级的暂时协作，过渡到工农联盟，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使中国革命从世界革命的助力转变到世界革命的主力。托洛斯基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这一主要的特点，因此企图把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革命的策略，机械的运用到中国来（实际上还是根据他的不断革命的观点），而反对列宁主义的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的民族联合战线的路线。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而误认资产阶级可以始终于革命，以为资产阶级的动摇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所逼成的，于是时时采取对资产阶级让步妥协，甚至走到压抑工农运动，以企求资产阶级不动摇，以避免民族联合战线的破裂，因此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独立的面目，而跟随着资产阶级的尾巴跑，遂这样的把与资产阶级协作时期中，必须与资产阶级力争革命领导权的主要点忘记了，而把列宁主义的路线变成了孟塞维克的路线。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封建剥削关系在全国占着极大的优势，形成中国军阀制度的基础；帝国主义扶持中国的封建势力，以束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统治中国。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摧毁封建的基础；无产阶级只有与广大农民联合，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革命，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是不可分离的两大任务。托洛斯基不了解这一点，忽视中国的封建势力，而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因此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忽视土地革命，而欲以工人阶级孤单的作战，要求在武汉时期便须建立苏维埃的政权，便须“很快”的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专政，而超过工农联盟的国民党政权的阶段，所以极力反对共产国际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路线。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的极庸俗的眼光只看见资产阶级的权势，而忽视伟大的农民革命的作用，不去极力扩大土地革命的斗争，而只跟随着资产阶级的尾巴跑，专门与一些资产阶级的领袖们作上层的勾结。遂这样的违反了国际正确的路线，甚至说国际的指示是“实际行不通的高调”（陈独秀的话），固执他自己机会主义的策略。

中国既然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摧毁封建势力，决不能达到中国的解放与统一，这样客观的条件，规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发展，必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斗争，而发生了暂时的革命作用，

同时他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都有联系，到了工农群众广大的起来，革命发展要走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时候，便同样的违害了他的利益，而必然要很快的叛变革命，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来镇压革命。这样的客观条件，就规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时也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才能完成中国的革命。托洛斯基不了解这一点，而以为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便须直接为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斗争（这就是托洛斯基不断革命理论的精髓），所以反对共产国际必须经过利用国民党特殊形式的工农专政的过渡再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而主张在武汉时期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以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动力必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应帮助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要力争革命的领导，要准备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路线，而走到专一服从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

所以在中国大革命的时期中，托洛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虽然表面上一个站在"左"方，一个站在右方来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可是他们主要的根本错误，都是一样的，所以列宁指出托洛斯基主义是一种半孟塞维克主义，是一种唱左倾高调的机会主义。因为他们的根本错误是一样的，所以在中国革命失败以后，他们的思想可以都走到取消主义而完全汇合起来，组成了共同反党的取消派。

且在历史上中国的托洛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是混淆在一块的，彭述之手里做的是机会主义，口里不是还唱着"永续革命吗"？（见《中国革命论文集》，彭述之著的永续革命论。永续革命即是不断革命，又有人译他做无间革命，在外国文上都是一个字）。如果批评他们思想糊涂以致弄不清楚，的确还是一种不正确的宽恕之词，实际上托洛斯基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根本思想的错误是一样的，所以无论在主张上、在组织上，他们都可以联合起来，这是毫无足怪的。现在陈独秀们说："过去的确实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不过主要是国际的根本路线的错误，中国党是执行机会主义的），只有托洛斯基主义才是对的"。这不过是一个欺骗之词，从机会主义到托洛斯基主义，并没有什么根本思想的改变。尤其到现在，已经共同的走到取消主义的时候，更是丝毫的分别都没有了。

六次大会是正确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成为一切决议案的基础，而且彻底的纠正了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的思想。中央一年来的工作，都是在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而与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尤其是机会主义的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党在一年来的进步，证明六次大会的路线与中央的正确；可是同时就是有力摧毁机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这样就引起着机会主义者的异常不满而积极的向党进攻，甚至认党为第一个敌人，把帝国主义国民党都放在次要的地位，只看见他们努力的向党进攻，而没有一点去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这不是明显的帮助敌人吗？他们既然这样的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以及现在的中央，都是正确的依据列宁主义的路线来指导革命，指导党，那么他们要将中央六次大会以至共产国际都一齐推翻，又何足奇怪呢！俄国机会主义的孟塞维克派，不是已经公开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反革命派吗？托洛斯基不也是步随了他们的后尘，而渐次走入资产阶级的队伍里去了吗？离开了列宁主义的人们，结果没有不投到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了的！列宁主义在俄国已经克服了一切敌人，它在中国因为客观革命发展更利的条件，将要更快的战胜党内这样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联合的取消派，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

（1930年1月）

〔附〕中国革命的教训

（摘自1927年8月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

察委员会联合全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在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时，可能有、而且已经有三条主要路线，这三条路线应当客观地加以研究。这三条路线是以对中国革命本身性质的不同看法为前提的。第一条路线是直截了当地变成孟什维主义的右倾路线。它所持的出发点是，直到战胜帝国主义之前，直到统一中国之前，必须在一切发展阶段上都毫无保留地保护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此要作出任何让步，如为了“避免吓跑资产阶级”而制止和反对土地革命、制止工人运动和反对工人的“过分要求”等等。第二条路线是托洛茨基的路线（真是马后炮），它在原则上根本否认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和结盟的可能性，而不管革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而且它还认为，同资产阶级的结盟和协调只会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等等。最后，第三条路线是共产国际执行的列宁主义路线。这条路线认为，必须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但是，只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这样做。它同时又认为，当发展条件发生变化、阶级力量重新改组以及出现其他情况时，必须中断这种合作的关系，并要同这个过去的盟友作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陷入了右倾。这个倾向十分错误地把民族革命同土地革命对立起来。它的代表者预先就肯定了，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不理解，在原来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的发展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不理解，与此有关的阶级力量的重新改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都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他们否定了阶级斗争观点，也就必然滚到孟什维主义的轨道上去。现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可以满意地指出，兄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克服了右倾，领导路线已经端正了。

托洛茨基的观点首先是在形式上把中国革命同俄国1908年的革命相提并论。同孟什维克相反，布尔什维克当时坚决反对同自由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托洛茨基路线的严重错误在于，托洛茨基同志及其拥护者（如季诺维也夫同志等人）不理解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基本区别，不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与高举反帝旗帜的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基本区别。因此，列宁直截了当地写道：“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

地和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①]他又写道：“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②]最后列宁又直截了当地写道：“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而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③]可见，列宁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根本不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它粗暴地抹杀了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之间的区别，抹杀了社会民主派最具特色的东西。

共产国际路线的基本特点在于，这条路线是建立在对不同的革命阶段和不同的阶级组合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革命发展时期，当资产阶级还具有革命性的时候，也就是说，1）当它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2）当它还不阻碍共产党人用革命精神教育工农群众和建立工农革命组织的时候；3）当它还不阻碍创建、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独立政党的时候，共产国际就主张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在广州时期和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叛变、民族资产阶级由革命阵营转入反革命阵营前夕，就曾经是这种情况。在此期间，不仅中国共产党得到发展，而且工农运动也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工会）和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发展阶段，由于同资产阶级取得了一致意见，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才得以顺利发展。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的策略，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和发展，恰恰在这一点上首先得到证实。蒋介石政变意味着各阶级力量的重新改组。因此，共产国际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新的策略路线，即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坚决无情地打击帝国主义者和张作霖的联盟，坚决无情地打击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策略路线。留在国民党左派内和武汉政府内的一部分激进小资产阶级已向蒋介石宣战，这就给共产党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共产党本应利用这个机会，以便组织“反击卡芬雅克之流”和动员群众。但是，由于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和帝国主义者的压力，引起了各派力量的重新改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的大部分上层分子开始打击工农运动，脱离了革命。下一阶段就得相应地改变策略和口号，脱离武汉政府。共产党人要宣布向这个不再是“真正革命”的政府进行公开斗争。

在各个发展阶段，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及时预见到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必须教育群众应付这个转变。共产国际认为，独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积极工作，而且还要同自己的临时同盟者，哪怕是最左派的犹豫和动摇现象作坚决斗争，要不断积蓄自己的力量——建立群众组织和军队等，要创建相应的强大据点，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工农和城市贫民去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革命。开展土地革命，农民自下而上地夺占土地，开展工人运动，武装工农，实现国民党民主化，撤换动摇的领导者，这就是共产国际的主要口号。

共产国际在引导革命前进的同时，也曾坚决反对过超越尚未过时的革命阶段的观点。共产国际正确地谴责了在当时条件下退出国民党这个群众性组织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把国民党交给右派，而且还可能使共产党人孤立于国民党群众之外。共产国际也正确地反对过苏维埃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在当时意味着越过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而它们又确实是在执

---

① 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8页。——编译者

② 同上书，第49页。——编译者

③ 同上书，第60页。——编译者

行着革命的政策。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一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右倾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为它牺牲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利益而迁就自己动摇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又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为一些反对派理论家或则公然为资产阶级大唱颂歌（如拉狄克的广州“工农政府”之类论调），或则捏造关于中国革命的极端机会主义理论（如托洛茨基的“关税”理论）。

如果说，尽管共产国际的策略是正确的，中国革命仍然遭到了重大失败，那这首先是由国内和国际阶级力量对比造成的。这次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工农群众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去战胜敌人，即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以张作霖为首的封建势力和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或其同时行动的力量。这次失败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工人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个组织坚强的、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从另一方面说，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由于不断背离共产国际的指示而要为中国工农的失败承担应有的责任。

当前时期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在其遭到严重失败的同时，发生了各派力量的激烈改组，在各派力量改组过程中，工农和城市贫民结成反对一切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同盟。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转入了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即直接为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前一发展阶段的经验生动地说明，资产阶级不能解决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任务，因为它既要进行反对工农的战争，就不可能彻底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进而越发倾向于同帝国主义妥协，而这种妥协实际上对帝国主义统治几乎丝毫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解决国内革命任务，因为它不仅不支持农民，反而积极反对农民，所以也就更加倾向于同封建势力结盟，而甚至不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从另一方面说，它几乎不可能同农民妥协，因为在中国要想不触动豪绅和小地主的利益，即使进行微小的土地改革也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资产阶级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在较短时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这种前景，可能性就更大了。

中国共产党是当前一切革命敌人集中火力攻击的政党。现在它面临着极其艰巨、极其重大的任务。它首先应当化险为夷，以图自存，从党的领导所犯的一切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撤换领导，并把有直接革命斗争经验的新领导人由基层提拔到中央；与此同时，党还应当在武汉地区建立秘密机构。

共产党应当进行坚决的、不间断的斗争，反对将民族解放斗争利益同工农阶级斗争利益对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理论。革命的叛徒，如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之流，以孙中山的旗帜招摇撞骗，广泛散布这些反革命思想，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服从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领导。共产党应当解释清楚，只有经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者的阶级斗争，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完成中国的革命统一，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共产党还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存、巩固和扩大工人的工会和农民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

共产党应当采取一切措施发动国民党左派基层反对它的上层，并在这方面发展成为强大的运动。与此同时，共产党应当大力宣传苏维埃思想。既然共产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将该党转变为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并使其实现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势将走向高涨，那就必须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为直接斗争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和手工业者苏维埃。

同时，必须尽一切努力发展土地运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武装工农，以奠定真正革命工

农军队的基础。党应当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揭露蒋介石和武汉政府的叛变，毫不留情地撕下他们的一切假面具，要以工人阶级真正先锋队的姿态把工人阶级领导起来，并带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一道前进。

译自《联共（布）历届会议决议汇编》第二部分第345—349页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附〕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

维经斯基

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着一个最艰难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对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领导问题。

革命的主要困难在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于帝国主义拥有优势力量。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集中力量强行破坏城市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同千百万暴动农民的运动之间的联系。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党是革命的政治和组织因素，它的作用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了。党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和策略措施都必须彻底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与集团的一切微小影响。只有坚决地、毫不妥协地经常同自己队伍中这种影响作斗争，党才能坚持革命阵地，排除万难，完成自己争取与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一历史使命。

当前，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右倾危险，这是一种露骨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陈独秀主义的倒退观点同中国的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同流合污，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

虽然"左倾"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盲动主义成分，正如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决议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党的队伍中代表"左倾"危险，还仍有影响，但上述一切客观困难，如同中国共产党过去遗留的错误一样，主要是助长了右倾情绪的发展，使右倾危险成为主要危险，因而主要火力必须对准这种危险。

所以，不仅揭露现在的陈独秀主义，而且揭露过去的、主要是1925—1927年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势在必行。但不能仅止于此。还应当挖出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一切主要错误的根源，这样才有助于党同当前的右倾危险作坚决斗争。

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必要对我在中国研究所讨论陈独秀主义时所做的发言，加以补充。这里我还应当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

根本不是事实。

下面引述几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这表明，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之初是如何教导中国共产党的：

1．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2．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全部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胜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

3．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取消苛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制；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

4．必须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并利用关税收入、盐业垄断以及部分财政操于外国资本之手等等事实，使全体贫苦农民懂得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

5．当然，领导权应当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运动最近发生的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全部重要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6．共产党必须不断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这个军队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

这个指示清晰地描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景，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基础。

再进一步叙述就可以看出，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这就导致违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列宁主义方针，实际上没有贯彻执行这一指示。

在中国革命浪潮增长时期，特别是从1926年夏起，陈独秀主义已彻底暴露。

这不是说，陈独秀的一套观念仅仅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的。恰恰相反，陈独秀的孟什维克理论和策略，正是在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在各阶级力量营垒分明的革命阶段，开始原形毕露，陈独秀的全部观念和整套观点必然会形成这类理论和策略。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谈陈独秀主义的发展历史。第一，因为中国革命自开始北伐时期后，中国孟什维主义的意义和作用已尽人皆知；第二，因为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科穆纳尔同志和其他中国同志的报告，已充分阐明了陈独秀主义的历史，而我和这些同志的看法没有分歧。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要谈两点意见。第一，陈独秀的观点在北伐之前就在党的政策上反映出来了，经常是以一种对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表示怀疑或提出疑问的方式反映出来的，而我斗争不力，没能使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理论，也没有把同他的争论拿到党内。起初，陈独秀的观点还处于萌芽状态，这同共产国际的明确方针并不抵触。在这一点上我有

过错。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认为，陈独秀的错误是不久前才成立的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革命历史，它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革命传统，只是刚刚开始走上学习马克思学说的道路。基于这些原因，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我想，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在回顾分析这个现象的时候，应当说，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是调和主义的，因为正是有了上述原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极为薄弱），对这个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对陈独秀）在方针和观点上的微小错误就要特别警觉，必须把这些观点公诸报端，召集会议教育全党，与之进行原则性的斗争。

不言而喻，对陈独秀这样一个党的领袖的观点持这种态度，就不可能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斗争，也就是放松了极为重要的原则中的一条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独立自主、争取中国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进行斗争的依据。

但是，“不进行这种斗争，不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共产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战略目标——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实现”（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第二点意见，就是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无疑，陈独秀在党内影响很大，但还是同他的观点作了斗争，虽则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也缺乏应有的尖锐（这里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普遍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家长制习惯，也起了不小作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开始迅速形成了针对陈独秀的反对派，尽管当时没有得到我的支持。

虽然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多年影响，虽然中国革命惊人的迅速成熟，以致没有充裕时间培养革命干部，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革命惨重失败后，仍然很快恢复了元气。这个情况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当然，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也同陈独秀一起离去了，但保留下来的老干部同共产国际和党一道，吸取了1926—1927年暂时失败的教训，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道路，并善于引导党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所以，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共产国际和苏联当然对中共现有干部有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由于中国革命的经验更加强了，这就使党摆脱了陈独秀分子的影响。

只有持这种看法，才能理解，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尽管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叛变之后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下基本走上了正确道路，不仅有力量转而采取新的政治路线，认清新的革命阶段，而且以惊人毅力在战略和策略上贯彻执行这条路线。

说完这几点意见之后，现在来谈中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我在内）在1925—1927年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根源这一问题的实质。

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

只有从这个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各个阶级力量的阵容，以及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等

方面来说明这个革命的各个阶段，才能剖析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中国革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完成北伐告终。当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正在重新改组，这一方面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背离革命，另一方面则标志着土地革命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武汉政府时期，其特征是，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进行联合，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国内封建军阀分子的联盟。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无产阶级加强了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个别非剥削阶层的影响。在这个时期，由于土地革命发展和我们参加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争取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激化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以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害怕土地革命扩大和帝国主义进逼而叛变革命为开端，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了同盟。在这个阶段，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不断发展。这个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标志，就是直接争取实现以苏维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有两个时期，这就是1919年至1925年（上海事件）和1925年至武汉时期之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革命最初时期。在此期间革命是全国性的。除帝国主义的直接工具——封建军阀集团及与其勾结的官僚、显贵、地主、买办外，各阶层人民都投身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运动。孙中山一派，特别是他本人，如果能够正确地参与和领导这个已经爆发的全民运动，是非常有可能成为国内最大政治因素的。

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含混不清，自相矛盾，但基本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压迫的愿望，因此，已广为流传。当时，各阶层人民在孙中山思想中添进了自己的内容。这种情况说明了孙中山及其一派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同封建军阀集团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武装力量。

但是，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和领导，孙中山一派，即当时的国民党，是无法利用这些客观条件的。

共产国际的功绩正是在于，它依据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译者）提出的原则方针，考虑到建立一个能组织全国运动的军事政治中心对中国革命今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如果建立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族革命政党，孙中山一派是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必然要采取依靠苏联的方针，因为这是由全国反帝运动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在这个革命阶段，各阶级力量配置基本情况如下：一方面是中国军阀和封建地主，受各种帝国主义势力扶持利用的买办和官僚上层，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即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不言而喻，这个全国性的反帝战线内部有阶级斗争。由于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阶级斗争的道路也随之扫清。几十万工人和数百万农民参加了斗争，后来就在中国工商业中心城市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强大策源地，并使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阶段。

几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是革命运动的表达者和这一阶段的初期组织者。他们在城市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商人资产阶级行会和公会范围内，并在其帮助下，从事革命宣传

和组织抵制帝国主义商品的运动，还赢得了除买办阶级外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

在紧接着世界大战后的这段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没有参加反帝运动（无论是抵制洋货运动，还是反基督教运动），而是专干军事投机，企图利用广东省内军阀的局部斗争，其目的是联合某一军阀或军阀集团夺取广州。至于反帝斗争，则孙中山集团只是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利用日英矛盾，而且依靠日本。

这就表明，国民党对于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以后国内爆发的运动根本不理解，国民党和孙中山如同其他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派别一样，还处于美帝国主义所散布的和平主义幻想的影响之下。在抵制洋货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时期，学生组织曾向孙中山发出呼吁，但没有得到他的支持。

因此，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反帝运动，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统治全国的安福系的斗争，国民党都没有参加。

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开始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矛盾加深（华北发生的两次战争：1920年夏直奉反安福系的战争和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的直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和苏维埃俄国对华和对东方各国人民政策产生了影响；只是这些情况才推动孙中山一派寻找参加和领导解放运动的道路。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人数很少的组织，其中主要是在学生中从事宣传的知识分子，而且刚刚开始同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工人建立联系。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开始日益影响中国产业和手工业工人群众，推动他们去争取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

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大城市发生了带有明显阶级内容的群众性罢工（如香港海员罢工，上海制烟、印刷、纺织工人的罢工，以及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共产国际纲领有如下一段话最深刻地说明了当时工人阶级状况及其对资产阶级的态度：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的初期高涨（约在1919—1923年）同战后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高涨有机地联系起来，其特点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服从于当地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斗争利益。”

1922年1—2月间的香港海员罢工和京汉铁路罢工都是阶级的罢工，同时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这些罢工显然向前推动了民族革命运动。孙中山及其广州集团只是在香港罢工之后，才有了雄厚的基础。而京汉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则直接转移了吴佩孚和英帝国主义者对广州已经准备就绪的打击。

因此，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始于全国反帝运动高涨时期，尔后成为民族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因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互依存的关系就是如此。

这些罢工过后，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国民党还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全民阵线的军事政治中心，但是，如果有共产党的帮助，它能够成为这样的中心。

应当看一看，1923年底这个民族革命政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之际，国民党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情况。追随孙中山的中坚派可以说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派别”，就其成分而言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和知识分子。此外，国民党内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反映了本国工业的利益，赞成民族运动，同时又代表着一种摇摆不定的、倾向于妥协的特殊派别，这个派别可以称之为民族改良主义”①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一部分华侨商人也属于这

① 摘自《共产国际纲领》。——作者

个派别。国民党对工农群众，尤其是广东的工农群众中的一定阶层是有影响的。

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正确？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是否一方面需要力争由这个军事政治中心来领导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在这个军事政治中心通过共产党人的影响来确定反帝斗争的策略和战略，而另一方面又帮助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呢？中国共产党尽管犯了错误，然而中国革命运动后来几年的经验仍完全证明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条件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原则，也就是说，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必须保持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和有批评国民党的权利。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应当在整个民族阵线内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各种小资产阶级派别划清界限。

至于说到加入国民党的前提，也是完全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所确立的方针的，因为国民党确实是反对统治当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在自己的地盘内并不阻挠共产党人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

但是，我们没有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利用这些提供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坚定地提出这样的任务：通过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城市贫民和农民。

1925年五卅惨案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

五卅惨案是标志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新阶段的历史性事件。这个事件中最为主要、意义最为深远的是，中国大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首先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反对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的英勇斗争持续了几年之久，这就为建立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全国阵线创造了条件，而在这个阵线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说，只是在五卅惨案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才有了中坚力量。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国内各派力量进行了大改组。帝国主义者则全力反对革命运动，然而他们之间在中国的矛盾也加深了。所有这一切说明，中国革命的主力开始冲破束缚初步发动起来了。

由于这一事件，民族革命运动基地——广州的作用较之从前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影响第一次遍及全中国，香港工人抵制性罢工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

五卅惨案后，苏联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极大地增长了。广大城乡人民群众热烈同情苏维埃国家。中国当局不得不对苏联表示友好态度。

这一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并开始同中国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因为小资产阶级和大部分无产阶级仍处于中国资产阶级影响之下。

在此政治形势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就是要认清五卅惨案的意义，理解到这个事件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其特点应是反帝运动和土地运动相互联系。必须认识到，没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参加土地斗争这个基础，革命就不可能前进。

应当说，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上述指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提出了农民问题，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在内，没有正确地理解，业已发生的事件究竟有什么意义和多么深刻，也没有正确地理解，将来在革命中土地和农民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全部显露出来并使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成为反帝的土地革命时，前途究竟如何。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如在上海发动了总罢工，而且在如何对待帝

国主义者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提出了基本正确的口号和正确的战略、策略。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包括我在内，由于对业已爆发的革命的性质和规模有了上述不正确的看法，以致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当时上海总罢工开始几个星期以后，曾经参加抵制运动和在物质上支持上海五十万无产阶级罢工的中国资产阶级就开始动摇，叛离而去。当时，尽管如此，罢工仍坚持了约两个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却错误估计了国内的总形势。民族资产阶级的叛离，说明了全国阵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开始扩展到也反对中国资产阶级），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企图逃避对革命的资助和利用有利于商业（由于抵制洋货）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开始认为，这是革命低沉的迹象。

这种估计说明，没有看清运动的发展前途，没有充分理解运动的规模，而这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却估计过高。的确，共产党当时的方针主要是，发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实行维护全国阵线的政策，并要十分留心资产阶级的微小动摇，但对土地运动发展问题，对提高和发动农民群众问题，却没有足够的注意。

这种情况在广东省这个国民党影响和力量的中心，尤为突出。而且必须着重指出，1925年广东省的农民运动在全国最为先进、最为重要。

不言而喻，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作用有了上述的错误估计，就必然导致在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问题上，并进而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采取孟什维克的方针。

除上述能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面貌的特点之外，还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通过坚决揭露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办法，在思想和政治上与其划清界限。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一条基本组织原则。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某种"家长制的集中"。在此情况下，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未被吸收来参加领导工作。各省党委和下级党组织常常各行其是。全体党员在一年内（1925—1926年）由900人发展到5—6万人，他们还没有团结在政治和思想上经过考验的共产党纲领（当时还没有党纲）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足够明确的布尔什维克方针来对待工会运动和对待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建成的工人群众组织。许多地方的产业和手工业工人行会组织，依然在国民党官僚，甚至是在买办阶级走狗（如广州机器工人工会）的影响之下。我们共产党却对这种状况安之若素，不去争取这些组织中的群众，也不把行会组织改造为产业工会。

青年和妇女工作也很薄弱。这方面的客观条件，很少去加以利用。

但能不能象1926—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叫嚷的那样说，中国共产党是孟什维克党呢？当然不能。

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是在各个革命阶段迅速更替、各种社会力量迅速改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在社会经济过程刚刚出现，随后又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党犯了错误，是一回事；在资产阶级地主俄国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孟什维主义，或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孟什维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再者，陈独秀的观点不断向孟什维主义发展，是一回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犯有错误，但他们能克服这些错误并进一步朝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则是另一回事。党的无产阶级干部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而陈独秀恰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

把这一切混为一谈，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光荣的革命斗争道

路，并继续锻炼自己和实现布尔什维克化。

北 伐

1925年五卅惨案和北伐（实际上是1926年7月开始的）之间这段时期的特点是：革命运动总的来说是在发展，但发展极不平衡，北方各省落后于全国运动，农民运动落后于城市革命运动。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决定性斗争已经开始。起初，是国民党以外的那些敌视革命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如陈廉伯之流）开始组织起来。嗣后，1925年秋国民党右翼同这些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合流，企图在封建军阀反动势力的中心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西山会议标志着反动势力的麇集过程，而其基础要比封建军阀集团更为广泛，投靠他们的有：买办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反动的上层知识分子。不言而喻，各帝国主义集团扶持和促进了这一活动。

在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迅速形成了具有更为鲜明的反革命色彩的右翼。国民党右翼形成，反动势力聚集华北，两者南北呼应，同时并进。

1925年秋，戴季陶写的一本书，就是正在组建的右翼在思想上的突出表现。

这本书的主旨是要证明中国不可能有、也没有阶级斗争，也就是要证明，必须维护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戴季陶的其他言论也是这个思想，其中主要有：必须使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因为他们"承认"阶级斗争，必须成立既独立于第二国际也独立于第三国际的东方各国人民的国际。

这本书当时就已经提出了国民党反革命派的未来纲领的思想：反苏和以屠杀共产党员的方法实行国民党的"清党"。

此时，帝国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在准备武装干涉和支持反动势力的同时，依靠民族改良主义者制造民族革命阵线内部的分裂。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上述形势下所采取的行动（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是反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和反对国民党左派的，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全中国范围内"约束革命"，"限制革命规模"的一次初步尝试。

这里我不再谈怂恿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的直接原因，而只要说明下面的情况就够了。广州政府军队战胜国内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之后，蒋介石以及与其合流的军事政治集团加强了地位；此时，在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基本上是担任国民党的上层组织领导，而在忠实可靠的工农群众之中却没有广泛的组织联系。中山舰事件就是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它暴露了共产党在组织上巩固其巨大政治影响方面的弱点。

我们不会利用革命运动巨大发展的局面，用我们的口号去团结城市群众，把他们集聚在共产党的周围。

中山舰事件是对中国共产党最严重的警告：由于革命过程的发展，资产阶级正准备叛变，无产阶级必须全力加强同农民的联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正确地理解中山舰事件。从上述各种现象来看，对此事件的全国意义也没有足够深刻的估计。因此，也不懂得，在此事件后仅同国民党左派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是不够的（即使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乃至全党都动摇过），而这种联系本身就应该有利于发动土地革命，组织农民群众和武装工农这一主要目标。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国民党左派，保卫广州政府，这

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正确的原则策略方针，但只能从属于上述主要目标，即发展土地革命和武装群众。然而，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认真去实现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互关系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执行维护反帝统一战线这一基本正确政策时，开始犯机会主义错误。这是因为它不理解，只有迅速发展土地革命并由共产党领导这个革命，以及在国内有决定意义的城市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内部矛盾，以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势力量。

但要做到最后这一点，就可能、而且必然同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共产党没有应付将来可能和必然要出现的局面的方针。

如上所述，蒋介石3月20日的行动，说明民族改良主义者要争夺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也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与此同时严重地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商业高利贷资本有联系）。以蒋介石为首的民族改良主义者一方面对自己能否有力量反对工农运动仍然非常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也还不放弃反帝斗争。3月20日以后，蒋介石以中派的面目反对国民党右派（广州的同志们把蒋介石及其信徒称之为新右派）和他在4月30日发表声明，说他仍忠于孙中山关于支持联合苏俄和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遗训，已经证明了上述情况。

蒋介石在3月20日以后知道，打击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决裂，而同时又进行反帝运动是不可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如此之高涨，以致蒋介石要贸然反对这个运动，而又不冒被抛进历史垃圾堆的风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他在中山舰事件后举棋不定和施展伎俩的原因。

当然，中国共产党没有轻信蒋介石的声明，而是清楚地认识到，应当准备同这个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作斗争。但如何斗争？仅仅通过把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周围的途径吗？还是靠广州政府支持其他左派将领的军事力量来反对蒋介石，或者不仅用这两种方法，而主要是用迅速组织自己的力量，在广东及其相邻几省发动和组织土地运动，并竭尽全力武装工农群众的办法，这就是当时的主要策略问题。应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共产党只重视前两种方法，而且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运动去揭露蒋介石和向广大群众戳穿他的反革命实质。

如上所述，在3月20日之际和北伐之前，我们在城乡的组织工作还很薄弱。广州有几万工人连续罢工数月，反对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罢工委员会是一股同广州政府旗鼓相当的很大力量。广州政府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内部封建买办反革命势力的一切措施，都要依靠共产党广东省委领导的罢工委员会。

尽管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党在广州无论数量上（总共才几百人），还是组织上都是弱小的。当时我们党没有在报刊上和在广大群众面前独立行动。

此时，农村已经发生了规模颇大的土地运动。农民支持广州军队反对陈炯明等反革命将领，组织农会来夺取土地和农村政权。我们党对这个过程的极其伟大的意义重视不够，没有投入主要力量来组织这个运动。

这是北伐即将开始前的形势。

国民党内部的形势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收罗了更多的力量。

由于广东内部受香港英帝国主义操纵和资助的反革命势力直接威胁着当时的民族革命基地——广州，城市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农民保证支持蒋介石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显然，蒋介石的胜利巩固了他的地位，而他却贪得无厌，意欲攫取军队、政府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一则由于战胜了内部反革命势力，整个广州政府得到巩固，再则广州无产阶级同英帝国主义者进行英勇斗争，以及全国工人群众和城市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广州的威信，使广州成为反帝革命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军阀反革命势力集中攻击广州，是可以理解的。随着革命进一步发展，两种力量的冲突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广州是否开始进攻。国内的总形势和广东形势都要求进攻。

北伐对于推动中国革命起了巨大作用，同时这又是一个反映中国革命过渡形势中基本因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北伐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中国资产阶级力求在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统一国家；一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力求推翻国内现存的封建军阀政权，夺取土地和争取民族独立。

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又转到镇压工农运动方面。北伐在客观上发动和发展了国内的工农群众斗争，正是这一重大事实促使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以及国民党以外的资产阶级、买办和地主分子寻找一切可能途径，利用国家政权和国民党的威望，去限制和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

在共产党内，对北伐有两种态度。一种表现是，有的人借口北伐在客观上有革命意义，默认这样的说法："共产党的作用就在于全力协助北伐取得军事胜利，不可让工农群众为争取自身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过火行动使局势复杂化"。这个观点历来未公开提出过，而是由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对该革命阶段的形势估计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①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形势和蒋介石"问题"大体情况如下：（一）北伐之所以有利于革命，不仅因为它就其意义来说是一个使国家革命化的因素，而且还因为北伐是国民党和广州政府摆脱当前内部局面的一条出路，如果不进行北伐，国民党内部必然分裂，国民党所依靠的军事集团之间就会兵戎相见，首先蒋介石就要进一步进攻；（二）北伐之所以需要，是为了使广东摆脱蒋介石；（三）为了北伐成功，需要帮助蒋介石，并提高其威信（1926年5月28日蒋介石确是取得了独裁大权：他不仅是总司令，而且是政府首脑和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这并不危险，因为蒋介石反正已从广东出师北伐去了；（四）蒋介石在北伐期间的成功将不可避免使他同其他参加革命军队的人发生冲突，然后我们就能够加以利用；（五）所以，不必在后方同他发生争执，换言之，不必开展工农运动。

另一些同志主张不需要北伐，因为北伐必将加强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力量，不让我们有机会去组织工农群众和发展革命运动。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即将开始时还没有这样一条正确的方针：在全力支持北伐的同时，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建立独立的组织，首先是发展和组织农民运动，发动真正的土地革命。

由此可知，共产党也没有武装工农群众、认真深入广州政府军队去建立自己力量的坚定方针。

在这个当时对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党的全部政策就是致命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如果不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武装工农群众，要认真考虑取得革命成果，巩固和加深这些成果，是不可能的。

① 领导方法上的错误之一就在于，对类似的观点没有加以揭露，公诸于众，而是任其暗中存在，影响共产党的政策。——作者

的确，随着革命运动在北伐过程中的发展，共产党日益壮大，全力组织城市工人群众和帮助农村建立农会。但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党周围，进一步使革命深入发展，在各地建立新型革命政权，坚决粉碎旧政权机构的口号。由于城乡千百万群众前所未有的自发热情，中国共产党本来极有可能组织和发动群众去同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共产党对革命新阶段的性质，对利用群众极大热情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理解不足，因而未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各种革命力量的对比在北伐过程中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变化。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决议，这个决议压制了北伐地区内的土地运动①。中共中央在客观上赞同了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机会主义地理解关于全民族阵线的列宁主义方针。

关于"劣绅"和"良绅"的看法在这里得到了党内公认。这个看法认为，农会不应同北伐期间同情广州军队的那些豪绅作斗争。

同时，随着北伐的发展和人民群众自发热情的更加高涨，国内各阶级力量进一步改组。

1926年秋，广州军队进军长江以后，对国内其他地区影响很大。此后，华北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高涨。河南、直隶、山东和其他地区的农民群众已发动起来。城市工人运动开始活跃。在发生这些现象的同时，反动的反革命势力也开始集结。张作霖成为反动阵营的主角（1927年4月在北京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并杀害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而蒋介石侈谈其继续北伐的同时，实际上与张作霖结成了反革命同盟。

国民党的民族改良主义右翼已羽毛丰满，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封建军阀集团的联盟开始逐渐形成。

武汉时期

共产国际密切关注中国事态，在1926年11月第七次全会上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及其今后发展前途，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路线。

第七次全会决议的基本思想是，北伐已取得胜利，民族革命运动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民族革命运动过程中，几十万工人和几百万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的斗争，革命已转变到下一个更高阶段。

问题是，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深入发展能否导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民族革命已经碰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自下而上以革命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的任务。

如果不坚决打击形形色色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残余：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和经纪人，一句话，如果不铲除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反帝反军阀斗争就不可能前进一步。②

如果共产党不采取大胆果断的策略，如果党不引导农民群众焕发的热情（1926年底和1927年初农民群众运动的高潮如火如荼，遍及广州政府管辖的整个地区，也就是说几乎遍及半个中国），就不能设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攻。

不言而喻，在革命运动发展的同时，民族革命阵线内部发生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一方

①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中国问题》编辑部认为我要对此决议承担责任，这是不对的。我是在全会通过决议以后才获悉的，而且反对这个决议。但我的错误是没有坚持撤销它。——作者

② 当然，帝国主义的基础不仅有上述资本主义的成分，还有银行、大工业、设备和交通运输。——作者

面对工农运动的规模惊恐万状，另一方面又被帝国主义者的自由主义的建议所诱惑（如英国政府1926年12月的声明）而准备脱离和阻挠革命，准备叛变。以前站在封建军阀反动势力一边而在北伐胜利进军途中混入广州军队的那些新军事集团，也支持在民族革命阵营内酝酿分裂。

1926年秋是北伐军最为努力，革命浪潮继续高涨而资产阶级叛变的风声日甚一日的时期。

在国民党内部，这一过程明显地表现在各种力量的迅速改组上：一派力量集结在十分明显地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周围，而资产阶级又是同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①另一派力量则集结在国民党左派集团周围，当时国民党左派基本上代表尚未分化的革命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1926年12月，广州政府实际已形成两个中心，一个在汉口，另一个在蒋介石领导的南昌。因此，民族阵线已开始分裂。

此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各集团）同地租和农村高利贷资本的收入休戚相关，不会去反对封建地主制度，恰恰相反，随着土地运动的发展，将会日益转到反革命立场。

当时，向共产党全面地提出了需要重新制定对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对这一形势作了说明：“当前形势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过渡性质，此时无产阶级必须在两种前途之间作出抉择：同资产阶级主要阶层实行联合，其前途将会如何；进一步加强同农民的联盟，其前途又会怎样。”

为了做出这一抉择，中国共产党自己必须弄清这个阶段的性质和今后革命发展的前途，以及对国民党的策略。共产党必须充分理解“中国革命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就不可能消灭帝国主义”②，也就是说，已经到了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关头。

处境的困难在于，革命依然是反帝的，要求共产党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北方军阀的一切力量。资产阶级显然已脱离革命，但有一些资产阶级阶层继续留在民族阵线内，反对帝国主义，对此应加以利用；还应当充分利用脱离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但所有这些利用资产阶级的策略性措施都必须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即进一步发展和推动土地革命，而不是单纯维护统一战线。1927年冬，蒋介石反对孙传芳的斗争和同年2月蒋介石进攻上海，可作为说明形势极端复杂的一个典型事例。当时，蒋介石已开始反对武汉，拒不执行国民党全会决议，显然在准备分裂。但是，他的部队打败孙传芳和继续进逼上海，这对反帝斗争有巨大作用，激发了沿海各省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当然，在这种形势下，就不能不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南方军队了。1926年冬，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就是在推翻盘踞上海的北方军阀政权和建立武汉政府政权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些起义必然帮助蒋介石取得胜利，而蒋介石却将要到上海来，镇压革命了。

托洛茨基提出问题说，共产党当时本应同国民党决裂，引导工人阶级反对中国资产阶级。这种提法显然是冒险主义的提法，必然导致工人阶级覆灭，民族革命惨败，而使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反动势力取得胜利。无疑，中国共产党如果走托洛茨基的道路，就必定会脱离广大群众，被国内反动势力粉碎。譬如在上海，如果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

① 我在一本论中东铁路的小册子内认为南京这个中心只代表资产阶级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早在1930年1月我就改变这种看法了（参见《革命东方》第6期）。——作者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作者

的口号，就可能被孙传芳的军队消灭，那时，国民党军队即使不参与此事，也会表示完全同情的。

但如果不走托洛茨基的道路，这也绝不是说，共产党就可以支持武汉政府而不必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个别部队，不必独立地武装工人，吸收和依靠城市贫民去同民族资产阶级抗衡，不必支持、发动和组织江苏省已经爆发的农民运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采取这一切革命措施。在这方面，上海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其他革命中心推行机会主义策略的一个典型。这个策略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了力图维持反帝统一战线，尽管知道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已在这个阵线内部准备投降，却仍把主要赌注下在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政府和资产阶级地主代表蒋介石发生矛盾上，而没有去独立组织自己的力量，即独立地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

中国共产党知道，武汉政府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政权，但在革命进一步发展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作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可能成为这样的政权。然而，中国共产党没有认真考虑，要使这个政府变成这种专政的政府，全力支持它反对蒋介石是不够的，应当进一步发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促使这个政府革命化。

宁汉斗争应当视为革命不断深化的情况下的内战。战胜蒋介石进而攻取南京，其意义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新战果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即反帝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利用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和蒋介石营垒内部矛盾的意义，仅仅是实现基本任务的必要策略，但是它不能解决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后来所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代表起初不愿参加武汉政府，而后来在这个政府中的可耻行径正是这个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的表现。反对参加这个政府（我也在内）和赞成参加这个政府的人，其间没有区别，因为前者和后者都没有看清武汉政府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前途。如果前者为自己对政权问题的态度辩解说，参加当时的武汉政府，就会使共产党信誉扫地，而后者提议参加武汉政府，是为了“同国民党一道对革命负责”。后来，当土地革命和武汉政府辖区的工人群众斗争极大高涨时，后一种论调就解释成为不许共产党人在农村搞“过火行动”，不许工人提出过高要求，因为共产党人要“同国民党一道对革命负责”。

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说明整个武汉时期① 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关于这一点，已有比较多的文献资料。

我只讲一点看法。在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1927年4月）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很快就形成了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派，而在即将召开五大时（5月20日）②，中央委员会内就已发生了转折，实际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彻底揭露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方针，也没有揭露他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和对各阶级的估计问题上的孟什维克观点。陈独秀同意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对此理解为他已转到正确的立场上了，虽然他在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报告是含混不清的，仍保留

① 这里应当说明，我在关于中东铁路的小册子（维经斯基著《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者对华政策》，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社，1929年出版）中对武汉中央的估计是错误的，第一，说南京已在4月打败武汉中央是不正确的，第二，武汉中央的政策实际上和蒋介石的政策没有区别，也不正确，我这两个论断都不确切，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作者

② 中共五大是4月27日召开的，此处应为4月20日。——译者

有机会主义的全部特征。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对陈独秀做出任何组织结论。还必须指出，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给了机会主义策略以可乘之隙。

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件表明，对陈独秀的揭发是不充分的，而且让他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

现在说几句关于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任何国家都不象中国这样，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是如此气味相投。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托洛茨基关于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不断革命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可能成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权形式，这种理论主要是源于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如上所述，陈独秀主义也轻视农民，并按照孟什维克的办法选中了资产阶级为其同盟者，而反对农民。

这就在中国形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主义的共同基础。说明不断革命论后果的明显例子就是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他们两人都滑到国民党反革命派的立场上去了。

中国革命继续不断发展，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问题已在中国苏区得到具体解决。

中国革命的困难主要在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于国际帝国主义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却组成了武装的联合战线反对工农群众。尽管如此，中国革命仍节节胜利。

如果中国共产党坚决而彻底地清除其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这是主要危险，它反映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代表着党的队伍中的陈独秀主义残余），它就一定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与此同时，1927年革命失败后，党内的盲动主义政策立即重新抬头，这也威胁着中国共产党，因此，反对左倾的斗争，应当比反对右倾主要危险更顽强、更坚决。

编辑部附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报告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观点。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做出相应的报告。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作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载《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

王福曾 译　郑 禄 校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1924年

1月初 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鲍罗廷、瞿秋白、陈独秀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鲍罗廷叙述了自己作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工作情况，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使民族革命运动真正地依靠人民群众。国民党的改组正在朝着这个方面进行。……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得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赞同的、经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的计划进行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支持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起来的。"①

1月上旬 鲍罗廷由上海回到广州。

1月21日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

1月20日—30日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孙中山亲自提名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成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和各委员会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针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在会上讲话并印发意见书，严正指出："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25日，鲍罗廷获悉列宁逝世消息后，在大会的悼念会上作了纪念列宁的讲话。他说："列宁现已死，而列宁主义仍在，所以列宁死了以后，关于东方，关于被压迫民族，国民党之责任须加重一点，国民党领袖责任亦加重一点。列宁虽死，列宁主义万岁。"②孙中山决定大会休会三天，以示哀悼。

大会选举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国民党新党纲党章及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

3月8日 鲍罗廷应加拉罕之约，由广州启程前往北京。

同日 少共国际派达林再次来华到达上海。达林出席了3月底在上海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在会上作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务的报告，4月初离华回国。

4月16日 鲍罗廷和加拉罕应孙中山要求，向莫斯科发电要求给广州派五十名军事工作人员，并要具有丰富战斗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

---

①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26日。

4月 维经斯基回到中国，准备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5月10日—15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参加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人。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提出在国民党中扩大左派，批评了那种认为共产党应帮助整个国民党、调和左右派错误的看法。会议要求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指出我们党的基础应建立在工人阶级之上；指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会议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

5月 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到达广东。

5月31日 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定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正常邦交。双方谈判代表：苏联方面为加拉罕，中国方面为顾维钧。鲍罗廷也到沈阳参加了协定的签订仪式。

5月 设立在黄埔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开始入学。

6月16日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出席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在讲话中说明创办军校的目的"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强调要学习苏联榜样，建设革命的军队。①

共产党人周恩来②、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及军事教学工作。苏联顾问沃洛佳·波里亚克任顾问组长，主管教务；切列潘诺夫和尼古拉·捷列沙托夫从事学员队列、射击及战术训练。苏联顾问帮助制订军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6月中旬 维经斯基由当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陪同，第二次会见孙中山。孙中山向维经斯基了解列宁逝世后苏联国内的详细情况，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苏联的情况很感兴趣。维经斯基对这次会见留下的印象是：孙中山这时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充满自信。

6月22日 鲍罗廷自沈阳经上海返抵广州。

6月25日 鲍罗廷在广州东山以国民党训练员身份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进行了谈话，当谢、张提出"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不必另挂共产党招牌"时，鲍罗廷断然回答："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驳斥了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右派言论。

6月17日—7月8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强调了殖民地国家的统一战线问题，指出在同上层谈判时，共产党必须保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大会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等出席了大会。李大钊在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作了发言，谈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在发言中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③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同托洛茨基集团的反列宁主义路线作了斗争。会后，李大钊留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① 讲话全文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48—858页。

② 周恩来于8月自法回国，9月到达广东，11月任职。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92页。

斯大林出席了这次大会。季诺维也夫仍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斯大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6月底 维经斯基在实地了解广东商团一系列敌对活动后，写了《中国南方时局与孙中山政府》一文，指出："国民党虽具有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传统，但就其社会成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这样一个党能否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去反对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并与之彻底决裂，立即开始依靠劳动阶层，这正是决定中国当前国民革命运动命运的大问题。""国民党是愿意反对外来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的斗争的。但他们缺乏决心和勇气来改变航向，使自己全部政策转到劳动群众的利益方面来。和国民党共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工农和年轻知识分子组织起来，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宣传和演讲，逐步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转到中国劳动群众方面来，反对大商人和封建地主；转到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①

夏 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到达广州，有乌格尔（列米）、萨赫诺夫斯基、丘芭列娃、沙尔费耶夫、艾蒂金（勃拉伊洛夫斯基）、舍瓦尔金等人。

7月 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在东江执行任务时，不幸落水牺牲。

9月4日 共产国际发表《告欧美工人暨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广州商团叛乱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阴谋，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广州人民的斗争。9月间，苏联成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苏联各地人民开展了规模宏大的"不许干涉中国"运动。

9月24日 李大钊在莫斯科写了《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呼吁中国革命人民不应辜负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情支持，要和帝国主义及军阀作斗争。

10月初 苏联运载支援中国革命武器弹药的轮船到达珠江口，随船又到达一批军事顾问，有斯捷潘诺夫、罗加乔夫、齐利别尔特等。

10月10日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任会长。孙中山强调"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②。

10月13日 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规定"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③

10月中旬 孙中山在共产党和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下，动员黄埔学生军和驻广州各军队，镇压了商团叛乱。

10月底 加伦④来华接替巴甫洛夫任军事总顾问。

---

① 《共产国际》1924年第36期，第187—206页。转引自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载《共产国际和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

② 《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上海太平洋书店1926年影印版，第6—7页。

③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④ 加伦，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889年11月19日生于俄国雅罗斯拉夫州巴尔辛克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中。1909年在莫斯科梅提辛斯基车辆制造厂当钳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0年2月，反动当局因加伦号召罢工将他逮捕，被监禁两年零八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加伦被征参军。1915年1月受重伤，退役。1916年，加伦在喀山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5月，萨马尔斯克党组织决定派加伦加入112预备团队，在士兵中宣传革命。在国内战争时期，加伦在红军中因作战英勇，荣获四枚红旗勋章。1921—1922年，他曾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陆军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4年10月—1927年8月，加伦两次来中国。1929年以后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官；1935年授予他元帅军衔。1928年在肃反中死去。1969年苏联出版的《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中译本书名《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一书，有专文介绍加伦的生平。

11月2日 孙中山决定应冯玉祥电邀北上。

11月10日 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在对时局的主张方面，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①

11月—12月 11月13日，鲍罗廷随孙中山、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途经黄埔时，检阅了军校学生的演习。17日，孙中山一行到达上海。中午孙中山在寓所接见各界人士，谴责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北上目的是要在国民会议上谋求和平统一。21日，孙中山离上海取道日本于12月4日到达天津。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自天津到达北京，鲍罗廷在车站迎接。

11月 李大钊由苏联回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

12月19日 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拉斯考尔尼科夫的信中说：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准备讨论党深入工人群众的问题，"也就是在小组内进行宣传过渡到工厂中去进行宣传鼓动"。②为使大会集中讨论这个中心问题，维经斯基建议不要把重点放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只限于确认以前的决议，作某些修改。这封信呈交了斯大林、库西宁和共产国际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1925年

1月11日—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者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等二十人；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于中央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以及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决议案。大会的各项决议案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会议确定对国民党的方针是："扩大左派，批评中派之游移态度，反对右派。"大会主要决议是在维经斯基帮助下起草的。大会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大会为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月—2月 鲍罗廷到张家口访问冯玉祥，冯玉祥同意国民党宣传人员进入国民军宣传新三民主义。

2月—3月 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北伐，由黄埔军校学生军担任主力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帮助制定了作战计划，其他军事顾问如斯捷潘诺夫、切列潘诺夫、别夏斯特诺夫和政治顾问什涅伊杰尔等都参加了战斗。3月下旬，东征胜利结束。

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留下了遗嘱和致苏联遗书。致苏联遗书中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③

---

① 《申报》1924年11月18日。

② 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载《共产国际和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

③ 《孙中山先生遗言》，上海书店1925年版，第33—34页。

3月13日 俄共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唁电，对孙中山逝世表示哀悼。

3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孙中山逝世发表《致中国人民大众书》，呼吁中国工人农民要紧密地团结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把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继承下去。

3月21日 苏联政府应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之请，正式决定援助国民军。

3月21日—4月6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维经斯基自中国返苏，代表远东殖民地委员会出席全会。斯大林于3月30日在全会的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的演说，他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①

维经斯基于5月返回中国。

4月 冯玉祥和鲍罗廷以及苏驻华武官格克尔举行会谈，讨论并决定了苏联向国民军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国民党向国民军派政工人员。

春夏之际 张太雷负责组织了一个翻译室，归鲍罗廷领导，参加工作的有杨明斋、黄平、傅大庆、卜士奇等，当时在中国的胡志明（公开用名李瑞、阮爱国）也曾在此工作。

5月17日 鲍罗廷由北京经河北、河南回到广州，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并作了报告，勉励与会者"打仗要为人民利益而战，不要为个人私利而战。"②

5月18日 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会议上发表题为《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指出东方民族大学的任务是把同志们"造就成真正的革命者，造就成由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具有列宁主义的实际经验的、能够真心诚意地完成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当前任务的革命者。"斯大林在论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对于东方各殖民地及附属国家的任务时指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协的两派，因此，共产党人应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到工人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的政党、工农政党的方式，如'国民党'之类。"这一联盟的任务是："揭破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③同时指出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必须不束缚共产党的手脚，不限制共产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自由，不妨碍把无产者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并使共产党便于对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

5月30日 五卅惨案发生。

6月1日 上海总工会成立。上海实行罢工、罢课、罢市，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地。

6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及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共同发表《关于青岛和上海惨案告工人、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向中国的战士们致热烈的问候，并号召全世界工人与东方被压迫人民全力支援中国工人的斗争，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施行残暴压迫。

6月1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赤色职工国际执行部致电第二国际及职工联合会国际联盟，指出中国人民正遭受帝国主义之横暴压迫，"欧美工人，无论属诸何党何派，皆有速起援助中国人民之责任，第三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拟联同第二国际及职工联合会国际联盟，

---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61页。

② 《中国军人》第6号，1925年8月17日出版。

③ 中共中央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92页。

一致举行募款运动及援助中国工人之集会，并建议召集援助中国国民之国际会议，以讨论长久援助之办法。”①

6月中旬 苏、日、英、法等国工人响应共产国际号召，热烈支援中国罢工工人，先后将捐得款项汇到中国接济中国工人，仅南俄哈里夸夫省工会就捐助上海、汉口罢工工人一万卢布。

6月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的坚决主张下，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自东江回师广州，平定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参与了作战部署。

6月 鲍罗廷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两次发表演说，指出目前有三件要紧的事：（一）研究军事学问，使训练与组织都可得到好处；（二）要告诉兵民，我们要反对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求得解放；（三）要仔细研究怎样做到和人民结合。不要以为打倒杨、刘后军人买办已经打倒了，帝国主义者利用中国的买办阶级反对中国革命。对付他们的办法有二：（一）我们学校和军队要使广东人民尤其是工农了解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为了保护人民；（二）要以武力对付买办阶级，巩固革命根据地广东。②

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任主席。同日，国民政府发布各部部长委任令，聘鲍罗廷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同日 鲍罗廷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军事会议。出席此会的尚有加伦、罗加乔夫、尼洛夫、切列潘诺夫、斯捷潘诺夫、列米、捷列沙托夫、齐利别尔特等人。会议议决委派斯捷潘诺夫、切列潘诺夫、玛采利克、齐利别尔特、尼洛夫分别为蒋介石部、黄埔军校、朱培德部、湘军、陈铭枢部顾问。

7月 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

7月 加伦因病回国，途中曾在上海、北京、张家口稍事停留。加伦离广州期间，顾问团长职务由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库伊贝舍夫（季山嘉）代理。加伦于9月在张家口停留时，把自己对北伐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制定了《今后南方工作的展望，或1926年国民党军事工作的宏大计划》。③他在计算了一切准备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后指出：“北伐的行动可在1926年下半年开始。”他建议北伐的作战方针是首攻两湖，消灭吴佩孚；再攻江西，然后全力夺取武汉三镇；最后选适当时间讨阀张作霖。

7月—8月 7月24日，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苏联全国总工会代表团抵京。代表团主席为全苏总工会委员兼全苏金属工会委员长列布什，成员有全苏总工会委员兼该会远东部部长勃林斯金，全苏总工会委员斯穆尔基斯，全苏金属工会委员兼全苏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特别通讯记者瓦克索夫。他们来华目的是调查中国工人阶级之地位、工人团体之状况和五

---

① 《工人之路》第9期，1925年7月2日，第四版。

② 据《鲍罗廷先生演讲词》（1925年6月），载《先锋》半月刊第2期，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官学校印。

③ 1925年3月，加伦已将计划中的一部分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及国民党将领等组成的小组做了报告，在6月15日军事会议上作了第二次报告，6月底又向湘军军官和将军们作了第三次报告。1925年9月，综述了这个计划的最后方案。见《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卅惨案真相，并代表全苏工人阶级向中国人民致热情的关怀和声援。代表团一行四人于7月30日抵上海，访问了上海总工会办事处，由刘少奇、刘贯之等人接待。8月22日，代表团到达广州，经参观访问后，深感中国南方工人组织是严密和坚强的。

8月20日 廖仲恺遇刺身死。在鲍罗廷建议下，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联合会议议决组织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此案。

8月 加拉罕回苏。

9月29日 冯玉祥派遣以熊斌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研究苏联政府的经济建设、军事组织及教育事业等。

10月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是总结五卅以来党领导国民革命的经验，确定今后斗争方针。在《中国现时的政局和共产党的责任议决案》中肯定了工人阶级在这次反帝斗争中体现了自身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分化已日益明显，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规定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但在具体方法中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

10月 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为纪念孙中山，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①鲍罗廷在10月7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此事，并成立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随即在广州、上海、北京选拔学生赴苏学习。

10月—11月 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军队，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

11月 国民党中央决定于次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举的大会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林森等在北京西山集会，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决议。周恩来、陈延年、鲍罗廷主张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中，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则担心如果国民党分裂，将会影响广东的革命局面，就在上海与孙科、叶楚沧、邵元冲谈判，采取完全让步的方针。谈判曾得到维经斯基的协助。

11月底 加拉罕返回北京。

12月 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制定工业化方针，批判了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

1926年

1月1日—19日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共产党员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宣布西山会议为违法，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分子分别给以开除党籍和警告处分。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为这次大会中

---

① 此后，莫斯科东方大学培养中国学生的任务，移交莫斯科中山大学。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任副校长。中山大学设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有关中国的学术问题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米夫任该研究室刊物《中国问题资料》（1925—1928年间出版）主编。1927—1929年夏，米夫任中山大学校长。1929年秋—1930年夏，威格尔任校长。

共党团书记，选举时，他执行退让方针，结果造成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2月3日 鲍罗廷以“奉召回国述职”为由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请假一月，离广州赴北京。

2月初 苏俄视察团由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①]率领来到中国，考察华北和华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并视察在广东和冯玉祥部队中苏联顾问的工作情况。代表团成员有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地区区委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和工农红军指挥员隆格瓦等。视察团到北京后，与苏驻华大使加拉罕、参赞索罗维约夫、武官叶戈洛夫以及维经斯基一起讨论了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

2月 维经斯基回苏。

2月中旬 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视察团提供了关于广东革命运动和苏联顾问团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广东的革命运动，他认为“随着许崇智出走、梁鸿楷被解除武装、胡汉民被派往莫斯科，在广州似乎形成了一个统一而又牢固的政权，……可以认为，在六名军长中有四名是可靠的。我们同他们未必会发生误会，……有了这些指挥官就可以做很多工作。”鲍罗廷在报告中把北伐和土地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他说：“在北伐军所到之处，要采取措施，促进工运和农运发展，……要特别注意解决土地问题。”他宣称只有那些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唯有经过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人才可算是国民党的左派。

2月17日—3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六次全会，维经斯基和中国共产党代表蔡和森、李立三均出席了会议，国民党代表胡汉民列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阶级已“显示出自己是民主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倡导者和主要战士。”指出革命武装力量的使命“是坚决打击封建军阀集团，成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维护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决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提出的斗争口号必须能把农民所理解的切身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同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一般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要不断巩固和扩大共产党自身组织，才能保证自己对运动的领导。决议认为“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②]

会后，蔡和森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6年上半年，他应中共旅俄支部邀请，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重要报告，系统回顾和总结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蔡和森于1927年3月底回国，4月初到达武汉。

2月21日—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未出席。会议确定应准备北伐战争，不仅在广东进行准备，而且更要在北伐必经之地开展群众工作，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2月下旬 苏俄视察团在包头与冯玉祥会面。

3月2日 布勃诺夫在上海和陈独秀晤谈。

---

① 布勃诺夫（Бубнов，А.О）化名伊凡诺夫斯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十月革命前与伏龙芝一起在伊凡诺夫-沃兹涅新斯克进行地下斗争。十月革命时，是领导武装起义占领冬宫的军委会领导核心五人小组成员。国内战争时期，领导过多次战役，1921年因镇压喀琅斯塔得叛乱有功，获红旗勋章。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时，是中国委员会委员。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36—140页。

3月13日 布勃诺夫一行到达广州。稍后，张太雷向视察团作了关于广东政治形势的报告，报告在结论中说："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试图在第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①

3月18日 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

3月20日 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此时，鲍罗廷、加伦均不在广州，维经斯基尚在莫斯科。蒋介石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毛泽东等人主张回击，但苏联顾问团未予采纳。

3月22日 布勃诺夫和第一军顾问斯捷潘诺夫访问蒋介石，蒋介石向布勃诺夫表示对季山嘉等人不满；布勃诺夫向蒋介石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图。

3月24日 布勃诺夫召集顾问团会议，向顾问们指出在军事工作和政治领导方面存在的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预见到国民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冲突，对广州国共合作的局面估计过于乐观，对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太快，没有考虑到中国军官的心理和习惯等。他要顾问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越权，要"通过对国民党左翼的工作，来直接增强国民党本身。"②会议决定季山嘉、罗加乔夫、拉兹贡离任，让加伦返任。从此，蒋介石精神上占了优势，气焰益盛。

3月下旬 鲍罗廷离京，准备绕道张家口、乌兰巴托、上乌丁斯克、海参崴，由海路回广州。

4月 联共（布）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认为在中国"必须执行把共产党员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斯大林后来于1927年4月21日在《中国革命问题》提纲中解释这条路线时说，实行这条路线是"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②

4月5日—7日 鲍罗廷在库伦（乌兰巴托）停留三天，三次往访正拟赴苏参观访问的冯玉祥，谈及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合作事宜。

4月29日 鲍罗廷经海参崴回抵广州。

5月—9月 冯玉祥访问了莫斯科，订立了借款合同。

5月初 鲍罗廷与蒋介石多次商谈国共合作问题，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鲍罗廷为要使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为使蒋介石积极参加北伐，对蒋介石采取了让步政策。

5月15日—22日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九条，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要大家签字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

5月底 加伦回广州任职。

6月初 鲍罗廷给全体苏联顾问作报告，其中谈到了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力量划分。他认为

---

①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85页。

②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3、375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1页。

国民党由五个派别组成：一、原先的国民党人、西山会议派；二、与买办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右派；三、以蒋介石的军人集团为首的中派分子，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国民党左翼个别代表人物；五、中国共产党人。

6月初 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再度来华，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脱离国民党的倾向。6月中旬，到达广州。

6月23日 加伦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北伐计划。北伐的目的是打下武汉，然后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这个计划得到与会者的同意。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加伦任军事总顾问。北伐发展神速，8月下旬，北伐军前锋即到达湖北境内。

7月12日—18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维经斯基作为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在《中央政治报告》中说国民党已分化为四种力量：反动的右派（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代表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共产派代表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分子；左派（汪精卫、甘乃光等）代表小资产阶级；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蒋介石等）代表资产阶级。报告说："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报告认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渡时期，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①会议着重讨论国共关系问题，通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指出："现时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当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会议认为"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②会议批评了共产党要退出国民党的观点，也批评了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组织及党部工作的做法。

8月 加拉罕回苏。

8月底 共产国际再次派达林来华，办理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等事宜。

8月—9月 8月17日，冯玉祥与苏联顾问桑古斯基和共产党人刘伯坚自苏联启程回国，9月3日抵库伦。9月17日，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发表宣言，阐明他在苏联帮助下，认识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国民军要建立在民众基础上，要以国民革命和扶助民众运动为职责。国民军开始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遥相呼应。

9月26日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李大钊写信，阐明国际对冯玉祥军队的意见："（一）此时国军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并说明以上三项原则，系根据广东经验，至于冯玉祥要求派工作人员四、五十名，国际准备选派最少最好者前去。③

10月1日 鲍罗廷在黄埔军校给第四期毕业生作《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报告，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仅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不够的，如不能解决土地问题，那些口号便成空的了。"他说："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无革命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57—58页。

③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化的乡村，便无革命的地方政府，无革命的地方政府，便无革命的省政府；无革命的省政府，便无革命的全国政府。即有也是空的，靠不住的，所以，一切问题，一切工作，都应集中到农村中去。”①

10月10日 北伐军攻占武昌。

10月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在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②

10月—11月 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号召全体党员向托季联盟展开坚决斗争。托洛茨基被开除出政治局，季诺维也夫不再担任共产国际的工作。

11月4日—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联席会议拟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审查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

11月8日 北伐军攻占南昌。

11月16日 鲍罗廷和国民政府代理外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等离粤经赣北上，同行者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财政顾问施泰恩、真理报记者达林，以及农民运动顾问约尔克和塔尔汉诺夫等人。

11月22日—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于11月30日在中国委员会③会议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12月16日，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斯大林的报告和全会通过的决议都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斯大林在讲话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出：“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斯大林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并使土地国有。”④决议相应的规定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应是“土地国有”，但在目前，“必须根据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分别制定土地革命的策略。”⑤

斯大林的报告还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要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⑥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留在国民党内加紧工作。决议规定：“（1）系统地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思想及其变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图；

---

①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学生毕业纪念册》，广东省档案馆存。

② 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上所作《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报告中，说明这封电报是错误的。这封电报的内容在几个星期之后就由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所规定的路线纠正和取消。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7页。

③ 此时，中国委员会主席是加拉彻（英）、谭平山，书记是罗易和彼得罗夫（苏）。详见《罗易赴华使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30—334页。

⑤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80页。

⑥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25—326页。

（2）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3）坚持不懈地批判摇摆于左右翼之间、摇摆于进一步发展革命与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的中间派。”①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在谭平山提交全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提出了如下意见："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不够密切，中国支部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不够，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支部也缺乏应有的具体领导。”②

斯大林在12月7日的会上作了《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批判托季反党联盟。这次全会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会议决定取消主席制，建立集体领导。全会结束后，成立了政治书记处，③主要负责人是布哈林。

12月1日 鲍罗廷在南昌群众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人民贫困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政权的压迫和剥削，强调实现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要解决土地问题。

12月10日 鲍罗廷等人到达武汉。

12月13日 在鲍罗廷建议下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委员除鲍罗廷及外交、司法、交通、财政四部部长外，尚有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董必武等，徐谦为主席。

12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举行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是与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联席会议。12月13日，陈独秀作政治报告，提出"反对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他批评鲍罗廷认为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才是真正的左派的观点，说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陈独秀认为国民党人中只要是赞成减租减息的就可算是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会议决议于是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12月 共产国际针对当时中国有人认为开展工人斗争会引起危机、失业和工厂倒闭这种错误思想，给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文件上说："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的总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必须在农村中展开斗争，但同时必须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我们认为调解室、仲裁法庭这种制度是适当的，只要在这些机关中可以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警告：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④

12月27日 鲍罗廷在国民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就广东国民党拟定限制工人的处理办法提出反对意见；呼吁保障人民言论结社罢工等自由。

---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83页。

② 同上书，第198页。

③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规定由执委会选出主席团，在执委会休会期间，主席团是处理执委会事务的常设机构，主席团选举政治书记处，为执委会和主席团的执行机关，它为执委会和主席团准备议题，并有决策作用。这是对政治书记处职能的事后说明。

④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9页。

12月31日 鲍罗廷在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上提出"省民会议案"，指出此会开会时必须顾及革命的民主主义，必须使社会最重要的阶级均有代表出席会议，"从省民会议将来产生全国人民会议。""对于商工农及知识阶级之政策，均可于人民会议中一一实现之。"①会议通过了此议案，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各派二人组织委员会，议定湖北省民会议组织法和选举法。

1927年

1月3日 英帝国主义调集水兵登陆，对武汉工人市民进行武装挑衅，死伤三十多人。

1月5日 蒋介石与刚到达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代理主席张静江及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等召开所谓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武汉联席会议反对这种分裂行为。

1月9日 蒋介石自南昌到武汉侦察形势，企图活动在汉中委同意迁都南昌，遭大多数人反对。武汉人民在欢迎会上质问蒋介石何时迁来武汉，鲍罗廷也对蒋介石有所批评，指出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蒋介石回南昌后仍坚持迁都南昌，并于2月26日操纵南昌方面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撤换鲍罗廷，武汉方面坚决反对。

1月上旬 汉口、九江的工人及群众收回英租界。

1月2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关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干涉危机的呼吁书》，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保卫和支援中国革命，不准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莫斯科、伦敦、柏林等大城市均举行声势浩大的声援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群众大会。

1月底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党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如按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则"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党中央在《解释》中表示，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

1月 达林返苏。

---

① 《国民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记录》。上海图书馆存。

② 转引自王渔：《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究竟在何时形成？》，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48—58页。

1月—2月中旬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①取道海参崴到达广州。同来者有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的中共代表谭平山和为了加强中国革命而派回国的中山大学学生四十三人。与他一起抵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组织的国际工人代表团，包括英共的汤姆·曼、法共的多里奥特、美共的白劳德和代表团秘书、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人员施脱勒等七人。他们来华的目的是：收集帝国主义在中国残暴侵略的罪行材料，回国后发动反武装干涉运动，使各国民众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2月21日，广东省各民众团体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集会欢迎共产国际代表、国际工人代表团及留俄归国同志，罗易和国际工人代表在会上讲了话。

2月 联共（布）中央派米夫②率宣传工作者小组访问中国，曾到广州、武汉和上海。小组受中共中央委托宣讲如何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作为译员随同参观。米夫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6月回苏后写了《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文。

2月25日 加伦自南昌发出关于进军上海和南京的电报，全文如下："尼基京并转鲍罗廷、普利契、戈莱斯基、泽勃罗夫斯基、齐冈、波洛和沃伊尼奇：（1）预料在我军到达上海时，已宣布进行总罢工，准备发动起义。罢工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的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进军上海的迟缓有使工人受到镇压的危险。我们务必加紧进攻上海。（2）要向白崇禧和其他将军说明，必须乘敌人混乱之机，立即开始进攻上海。无论如何不要提出必须支援罢工者这个理由，因为我担心他们（将军们）为了削弱上海工人不愿这样做。总司令部将下达这次进攻命令。（3）总的作战计划将于两天后下达。总司令部今天决定：白将军各部队占领上海，同时派部分兵力占领苏州。何应钦各部队从杭州地区进攻镇江和南京。第七军和第九军主力调往杭州地区，在宁波地区留一支不大的部队守卫。以后再把这些部队或调

---

① 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年2月22日生于印度孟加拉一个婆罗门家庭。青年时代曾从事反对英殖民者的活动，1915年为寻找武器曾奔走于亚洲各地，到过日本和中国。1917年6月，罗易作为亲德反英的印度民族主义革命者在美国被捕；7月，乘保释机会逃到墨西哥。1918年12月，墨西哥社会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罗易被选为总书记。1919年10月，在鲍罗廷帮助下，罗易把墨西哥社会党转变为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罗易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写了《补充提纲》。在1922年11月的共产国际"四大"上，罗易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后，被派赴中国，1927年7月回莫斯科。10月，前往柏林，恢复他过去所从事的与印度有关的活动。在1929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上，罗易由于在德国参加了德共布兰德勒反对派的活动，被共产国际开除。1930年11月，他返回印度，1931年7月，在孟买被英国当局逮捕，判刑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易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1954年1月25日，在台拉登因病去世。

② 米夫（Л.Мцф），原名亚历山大洛维奇·米哈伊尔·福尔图斯，1901年8月3日生于乌克兰，1917年后，在党内用米夫名。1918—1920年参加国内战争，1920—1921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研究员，同时开始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1923—1925年，他在顿巴斯做党的工作。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米夫任副校长。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时，他曾为中国革命起草过一份提纲。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被免职，米夫接任校长职。1928年3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年春，共产国际派他任驻中国代表，1930年秋到中国。1931年回苏后，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工作上保持密切关系。1936年5月—12月，担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1937年1月，直接领导中国问题研究所，兼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1938年10月去世。1969年苏联出版《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中译本书名《中国革命和苏联顾问》）一书中，介绍了米夫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到上海，或调到南京和镇江。（4）第二军归江右军总指挥程潜辖制，经宁波或广德开往南京。（5）现在白所属各部正开始向苏州和上海进攻，为保障其后方，将第二军的部分兵力调往杭州北面之广德方面。这就可在初期从宜兴方面保障白所属各部。随着何应钦抵达杭州地区，敌人向太湖东部发动攻击的危险便可完全消除。加伦。”① 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在到达上海近郊龙华后，根据蒋介石密令，按兵不动。加伦上述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2月—3月 维经斯基自上海至武汉，与鲍罗廷商谈对蒋介石的政策，鲍罗廷这时主张联合唐生智反蒋，维经斯基则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维经斯基去南昌寻求同蒋介石妥协，事无结果，又经武汉返回上海。

3月初 共产国际在致中共中央文件上说：

“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没有这种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须把它们成立起来；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靠隐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

“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

“必须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针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遇到极大的危险。因此，现在实施指示比任何时期都更必要。”②

3月7日—1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7日开预备会，10日—17日开正式会议，鲍罗廷参加了会议。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进行了斗争，会议改选了常务委员、各部部长、政治委员、军事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等新右派的国民党各部部长职务。会议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出征动员令须经军事委员会议决，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交总司令执行。在党内，提高党权，发扬民主，防止军事独裁倾向。

3月21日 上海工人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

3月24日 北伐军占领南京。当晚，英美军舰炮轰南京革命军队与和平居民，死伤二千余人，酿成“南京惨案”。

3月2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就炮轰南京事件告全体男女工人、全体劳动者、劳动青年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书》，号召高举抗议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全力支持中国革命。

3月28日 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上提议：“（一）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快开幕，可去电说明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农民之决议案宣言，鼓励其战斗精神；（二）南京上海克服，应发表宣言，指出时局之重要意义，组织一委员会起草；（三）发表另一宣言，要求撤退外兵；（四）由外交部对列国致一通牒，请求撤退外兵，近来革命

①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2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9—20页。

空气太沉寂了，这个运动可打破帝国主义者妥协之倾向。（五）汉口英租界已在外交部指挥之下，德、俄租界亦宜统一归外交部管理，因反动分子聚集在德、俄租界。”经讨论，第（二）、（三）项提议通过，决定起草宣言委员会由陈友仁、顾孟余、邓演达组成，请鲍罗廷顾问参加；第（四）项提议，决议由外交部长起草，经政治委员会通过发表；第（五）项提议，决议交国民政府及湖北省政府照办。①

3月29日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全苏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在全世界面前完全现出它那公开的掠夺者和压迫者的原形了"，"加深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②

3月3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并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③

3月 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在莫斯科联邦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大会的报告中论述了中国革命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清楚认清与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现在尚未解决，……因此无论如何不能以扑灭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任务，和在国民革命战线上爆发内部阶级斗争的任务同时对立。""按照蒋介石的阶级性，虽说比克伦斯基'更右'、'更坏'，但只要他暂时尚未反动，尚未变节，只要他能积极实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阶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应使国民党左倾，改变国民党的成分。谁也不能说以这种方法改变国民党内部力量可以继续到底，也许冲突的爆发便在不久的将来。但只要这种方法一日可行，就应进行一日。"④

4月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到达汉口，法共多里奥特和美共白劳德在会上讲了话。鲍罗廷在会上指出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反动局面，这种反革命行为，究竟与孙传芳何异？……现在他在上海，对内对外各种情形，都走入反革命的路去，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⑤

同日 罗易自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

4月5日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这个宣言掩饰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起了麻痹工人阶阶的作用。

同日 汪精卫离沪赴汉，10日到达汉口。

4月6日 张作霖的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

4月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汉口举行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欢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达汉口，罗易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的报告，指出帝国主义正在竭力破坏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处在危险时期，共产国际愿竭尽全力帮助中国革命。鲍罗廷

---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上海图书馆存。

②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79、181页。

③ 曼达连：《中国共产党为何失败？》，载《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

④ 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国际评论》（1927年6月5日）。

⑤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上海图书馆存。

也在会上讲了话。

4月上旬 中共中央开始从上海迁往武汉。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5日，李济深在广州杀害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

4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是国民党革命派的敌人，是工人运动的敌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敌人。"①

4月13日—16日 中共中央全会在武汉召开。在先进行北伐还是先进行土地革命问题上，罗易和鲍罗廷意见分歧。鲍罗廷主张共产党应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立即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再攻北京。北京攻下后，再搞土地革命。罗易则认为应先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革命根据地，再进行北伐。会议通过了巩固根据地的决议。两天后，决议实际上被撤销。

4月16日 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致电中央，建议迅速出师东征讨蒋，中共中央未采纳这一建议。

4月18日 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4月19日 武汉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继续北伐。

同日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所谓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首要分子令。许多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

4月20日 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武汉与外地联系被截断，武汉政府处于财经困难局面。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为反动分子所卖，一时没有力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能不向后退却，使他们没有一点借口。他提出五项办法：（一）政府与工会人员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之革命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犯革命纪律的工人；（二）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南，西至（四川）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并由（武汉）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武汉）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此委员会有调用纠察队与武装力量之权；（三）除得第二条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四）（武汉）政府应尽可能的力量，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品之最高价格；（五）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②

4月21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发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提纲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③

4月22日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294页。

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上海图书馆存。

③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03—204页。

义的工具。

4月26日 鲍罗廷在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对土地问题的意见，指出最重要的是实现农村自治，只有建立强大的农村自治组织，才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对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已入了反动势力之下的省份，应派同志秘密活动，使农民起来，推翻反动势力。”①

4月27日—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以及鲍罗廷均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鲍罗廷和陈独秀提出帝国主义在东南势力太大，革命根据地应移到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西北去的理论，现在宜扩大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土地革命。罗易在会上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现在应使革命深入，实行土地革命，以巩固革命基地；他批评了鲍罗廷、陈独秀的西北理论，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表现。但是对于如何实现领导权，如何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罗易没有提出具体办法。

任弼时、瞿秋白等同志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了一定的批评，但是没有从政治上彻底认清投降主义的实质。大会仍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

4月28日 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及武汉各民众团体在汉口召开会议，欢送国际工人代表团并欢迎太平洋劳动大会日本劳工代表团到达。国际工人代表团汤姆·曼多理奥特和白劳德以及日本劳工代表团的东佐司均在会上讲了话。

同日 李大钊等二十人壮烈牺牲。

5月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关于若干中国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抗议书》，号召全世界工农开展强大的抗议运动，反对威胁中国工人阶级和准备新战争的帝国主义绞杀者的新暴行。

5月9日 斯大林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在今天中国的南部，例如在革命的国民党正掌握政权、运动正在‘全部政权归革命的国民党’这个口号下向前发展的武汉政府地区，号召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就是号召起义以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这……显然是不适当的。”因为“这样的时机还没有来到。”斯大林认为，“现在要使中国的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要成立并巩固种种工农群众组织，从工会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到农民协会和农民革命委员会，以便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把这些组织变为将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基础。”②

5月13日 斯大林发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再次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是愚蠢的。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这些势力是不可能的。”并说：“整个革命已随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③

5月18日—30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5月24日，斯大林在全会第十

---

① 《武汉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上海图书馆存。

②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15—216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34页。

次会议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不承认中国农村存在封建残余，他认为在中国主要是商人资本渗入农村，主要应反对富农和高利贷者；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反关税的革命。斯大林认为封建残余是现在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而帝国主义是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基本同盟者，因而斯大林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① 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② 斯大林还批驳了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应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意见，指出苏维埃只有作为新政权机关，才能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立即成立苏维埃，势必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权两重政权，而且不可免地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但这时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人应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使无产阶级便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者的作用。

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共产党中，……党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者，不能常常表现充分的坚决，而且在党内对于发展群众运动表现相当的畏怯，尤其是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没收土地、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同志内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更加高了。"③

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出重要指示，其要点是：一、开展土地革命，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改组国民党。"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三、"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四、组织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④

中共中央于6月1日收到上述指示。

5月18日、21日 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

5月22日 中共中央推罗易起草的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和《告夏斗寅部下士兵书》，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件揭露夏斗寅叛变是以反共为借口，实际是破坏国民革命，分裂反帝统一战线；警告中等阶级勿受夏斗寅欺骗，中国共产党将保障中等阶级的利益。

5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易和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争论，鲍罗廷的意见是："（1）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2）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与他们取得合作是中心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的完全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3）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

①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61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0页。

③ 同上，第503、504页。

④ 指示内容详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31—32页。

的中央，或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些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罗易）；（4）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5）中共中央及一切工农会现在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之一取缔农民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①

罗易的意见是：（1）现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所组成，他们对国民革命抱公开的敌对态度，我们应帮助国民党左派群众除去其反动的领导人。（2）除去那些反动的领导人，不意味着与国民党根本决裂，我们与国民党广大党员没有纠葛，共产党仍应留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作为革命民主联盟的组织机构。（3）我们应为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而进行斗争，必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政权保留在三个阶级联盟的基础上。（4）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说明如何实现中共五大向全党提出的基本任务，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的一切法令，这种法令不仅反对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②

5月25日 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以及唐生智的代表周鳌山、邓绍芬）赴湘调查和处理许克祥叛变事宜，行至岳州，许克祥电令当地驻军处决委员会成员，委员会闻讯即返回武汉。

5月20日—26日 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举行，会议受赤色职工国际领导，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罗佐夫斯基出席了会议。苏联、日本、爪哇、朝鲜、法国、美国等均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等十五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提出太平洋地区工人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新战争的威胁，帮助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决定成立太平洋劳动会议书记处作为该会常设机构，办事地点设在中国上海。

5月下旬 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禁令。5月底，下令解散湖北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黄冈和黄陂县农协。

6月初 北伐军配合冯玉祥国民军占领郑州、开封等地。

6月5日 罗易向汪精卫出示6月1日收到的共产国际来电，第二天又给他一个副本。汪精卫这时已被帝国主义的封锁、蒋介石等军阀的围攻和工农革命运动所吓倒，罗易此举，为汪精卫所利用，作为叛变革命的借口。

6月10日 郑州会议召开。参加者有冯玉祥、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唐生智、邓演达等，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唐生智班师回汉，河南军事交国民军担任。会后，冯玉祥派李鸣钟去南京向蒋介石通报郑州会议情况。

6月15日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时，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否则，“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③

6月17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除鲍罗廷等顾问的职务。

---

① 这是出席会议的蔡和森对鲍罗廷发言的归纳，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此文收入《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一书。

② 罗易发言全文见《罗易赴华使命》，第283—293页。

③ 《罗易赴华使命》，第324—325页。电文据英文回译。

6月19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罗佐夫斯基出席了会议。大会庄严宣布："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将坚持斗争到底。"大会选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苏兆征等三十五人，后补委员二十人。

同日 冯玉祥到徐州会见蒋介石，胡汉民等也从南京先后到达徐州。

6月20日—21日 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会后蒋冯发表联合声明，冯玉祥并致电武汉国民党领袖："综合徐州会议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廷回国。"①

6月30日 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十一条。

7月12日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鲍罗廷参加下，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最后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决定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

同日 鲍罗廷和瞿秋白去江西庐山。

7月14日 《真理报》刊登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指出武汉政府解除工人武装，阻挠土地革命，反对共产党人，因此，它已成为反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人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发表政治宣言阐明退出的原因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但不是退出国民党。要与国民党基层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机关；要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要纠正中共中央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

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随后，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失败。

7月中旬 张发奎部东征讨蒋到达九江一带，中共中央派恽代英、邓中夏、李立三等赴九江了解该部情况，恽代英向中央报告可以在南昌举行起义。

7月20日左右 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

7月23日 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的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武汉，协助他工作的是德国人纽曼。②

7月24日 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由武汉到达九江，召开前委会议研究情况。会后，向

---

①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16期。

② 罗明纳兹（Б.Ломинадзе，1897.6.6—1935），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8—1919年任俄共（布）第比利斯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巴库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为驻彼得格勒维堡区党代表。在1926年2月—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全会上，他是少共国际的代表和发言人。1926年4月，作为少共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构。1930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是联共（布）第十四届和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委员。1935年自杀。

纽曼（Heinz Neumann），1902年生于柏林，德共党员。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出席共产国际六大，就中国问题作了发言。1932年底，共产国际派他到西班牙执行任务。1933年末到瑞士。1935年回到苏联。1937年后下落不明。

中央报告，南昌暴动可以举行，贺龙部参加暴动。

7月26日 周恩来到南昌，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

同日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开会，国际代表传达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电："暴动有把握就进行，没有把握就不进行。"可以把军队中的同志撤出，派到各地农村中去。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立即去南昌传达国际指示。

7月下旬 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国际代表一起，进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

7月27日 鲍罗廷等苏联顾问与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走京汉路，在洛阳稍加停留后，经蒙古回莫斯科。①

7月28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回顾了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孤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右派），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推向左边，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革命的第二阶段，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运动中心由广州移到武汉，无产阶级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时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把它推向左边，把它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第三阶段，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反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这时，共产党人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但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只有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②

7月30日 张国焘到南昌，在前委会上提出"起义须得张发奎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7月31日 前委继续开会，辩论数小时，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会议决定次日凌晨暴动。

（选自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① 与鲍罗廷同行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28年写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China' s Million）一书详细记述了这段经历。鲍罗廷一行于8月9日至西安，19日至平凉，20日至固原，24日至宁夏（今银川），住了两周，经戈壁沙漠于9月18日到达乌兰巴托，9月29日到达上乌丁斯克，10月回到莫斯科。同行苏联顾问塔克汉诺夫回国后写了《中国小说集》，对此行也有所记载。

②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99—324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13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677
SS号=10273515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